

拂去历史的尘埃

——给人类文明史一种新的诠释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把世界文化分为东、西两大板块，然后分别划上古代、中世纪、近现代三个刻度，形成一种方格状的“刚性”模式，用以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例如历史、政治、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等。其实，“东”与“西”只具有相对意义，它们并不都是“直线型”的发展，更不是永不相交的两条平行线。这种“几何模型”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有碍于人们对世界文化的深入探讨。拂去历史的尘埃，一切明白如昼。东、西文化并非从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把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西两大板块的观念已经过时。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观察历史的视野必须日益扩大，关注的不是某一地区和国家，而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站在世界的高度来鸟瞰全球。他说：“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不应当把欧亚大陆看成是由欧洲和亚洲两块大陆组成的，而应当看作是由中东、印度、中国、欧洲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区这五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地区组成。”

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必须把它放在长时段中来做考察，因

为，一条弯曲的线，如果只截取其中的某一线段，很可能被视为一条直线，造成错觉。尽管最初兴起的文明往往处于孤立发展状态，但终究要汇入历史的长河。文化总是要相互传播和影响的，在不同文化接触、碰撞的过程中，冲突与吸纳、交融与排他、渗透与变形、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图景。站在 21 世纪反观历史，俯仰古今、环视全球，许多问题值得重新认识，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做评价，不拘泥于固有的说法。

用新的理念、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人类六千年的文明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另外一幅图景：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它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推动力，重新发现东方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地中海文明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延伸、扩展与提升，它们是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梯，而不是两个相互平行的系统。多元文化发展的结果，形成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大文化圈，它们处于“互动”关系。“文艺复兴”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欧洲成为近代文化中心，“西学东渐”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推动历史加速前进，迅速改变世界面貌。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东、西文化的整合将创建世界新的文明。

一、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

当我们按时间顺序检索历史的时候，首先令人瞩目的是古代东方，它最先迈进了文明的门槛，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它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孕育了最伟大的文明。正如美国学者维尔·杜伦在《东方的文明》中所说：“我们的叙述之所以从东方开始，不但因为亚洲是我们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而且还因为它奠定了希腊与罗马文明的背景与基础。”

其一，四大文明古国和草原帝国都在东方。古老的文明，最

初都孕育在大河流域，因为这里土地平旷、土质肥沃、灌溉方便，最适宜农耕发展，人们最先定居下来，建立村落和城市，进行各种创造活动，从而成为世界文化的摇篮。在古代东方，最先崛起的是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它们开启了世界文明，被誉为“四大文明古国”。

“文明古国”并不是一句随口说出的溢美之词，而是有丰富内涵和严格定义的词语，不但起源“古老”，而且有“国”。文明的第一个标志，是漫长的石器时代已成过去，人类迈步进入金属时代，创造了斑斓瑰丽的青铜器。文明的第二个标志，是脱离了“蒙昧”与“野蛮”，产生了阶级和国家，有了王权、法律、监狱和常备军。文明的第三个标志，是出现了城市，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文明的第四个标志，是产生了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字，有可能把知识积累起来并传到很远的地方。文明的第五个标志，是混沌迷离的巫文化逐渐解体，历史、文学、艺术、科学发展起来，迎来了人类文明的新曙光。文明的第六个标志，是由于财富的积累与发明创造，终于凝结为令人惊讶的建筑物，显示人类的智慧与力量。文明的第七个标志，是原始崇拜逐渐被人为宗教所取代。按照以上标准来衡量，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无愧于“文明古国”的称号。

长期影响世界文明的，一方面是创建“文明古国”的农耕民族，另一方面是叱咤风云的游牧民族，他们不断改变政治局势，牵动世界历史。游牧民族很早就建立“草原帝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然而，人们把目光集中在惊天动地的战争，却往往忽略了游牧民族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其实，他们在开辟国际交通、打通欧亚大陆、推动世界贸易和广泛进行文化交流等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其二，关系世界的重大发明都在东方。如果从近现代文明来看，西方显然比东方发达，但如果从世界文明发展的长过程考察，关系世界的重大发明都源于东方。倘若没有东方的发明，人类就会在漫漫的黑夜中摸索，世界的“文明”就无从谈起，譬如农耕与畜牧，文字、天文、历法、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还有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等。

人类在由向大自然索取物品的采集、狩猎经济转变为依靠生产来创造财富的伟大变革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农耕与畜牧，由此开创了两种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并支撑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田园居国”与“游牧行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在“工业文明”兴起以前，它们一直主宰着世界，而这两方面都起源于东方，在东方最先发展起来。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有了文字才可能把经过的事情记载下来，积累起大量知识，并通过超越时空的文字把信息传到远方，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文明。世界的文字，分属拼音文字、音节文字和词符与音素并用文字三大系统，它们都源于东方。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首开其端。无论是拼音文字或音节文字都渊源于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北方闪米特字母。中国的方块汉字构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历法是人类认识时间变化规律的科学，有了历法，人们才有准确的时间观念。世界上的历法，主要有太阳历、太阴历、阴阳合历三大系统，三者都源于东方。太阳历的发明权属于古埃及，后来不断改进而成世界通行的“公历”。太阴历是苏美尔人发明的，伊斯兰历即渊源于此。中国的历法属阴阳合历，既考虑到月球绕地球旋转的周期，又考虑到地球绕太阳旋转的周期，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无论天文、历法、物理、化学、建筑、工艺都离不开数学。在古代东方，埃及开创了几何学，代数

学萌芽于巴比伦，10 进位法和 60 进位法都是东方人发明的。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实际源于印度，后来由于阿拉伯经商、航海与工艺制造的需要，推广到地中海、欧洲大陆和全世界。

医学对于人类来说绝对不可或缺，它关系人的生命与健康。世界上的医学，发展最为成熟的不外乎西医和中医两大系统。西医的理论基础是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一医学体系实际上是由古埃及和古印度开创的，以后为希腊人继承发展，出现了“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特斯。中医是世界医学的一大宝库，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许多奥秘至今还没有被人充分认识。

世界哲学有三大体系，即印度的“宗教哲学”、中国的“社会哲学”和希腊的“自然哲学”，并分别形成三种逻辑学体系。印度和中国哲学是东方文化的结晶，希腊哲学也深受东方影响，没有古代东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就很难出现“自然哲学”。

“四大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东方专制主义政体长期统治中世纪，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都大体沿袭波斯帝国的体制。世界上最早的法典是《乌尔纳姆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是迄今保存下来的第一部较完整的成文法。中国的《孙子兵法》表现出光辉的军事思想，至今仍为军事家们所推崇。

其三，世界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东方。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印度，以后形成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南传的小乘佛教。基督教产生于公元 1 世纪的巴勒斯坦，它由犹太教分离出来，以后形成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伊斯兰教在 7 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以后传到亚洲和非洲。

这三大宗教之所以能走向世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由社会原因导致的种种困惑与不解需要得到精神解脱，而这些世界性的宗教则是对人生的关怀，包含

许多人生哲理、对人生现实的态度和人生的终极。其二是与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高文化结合，如佛教与印度文化结合，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地中海结合，因而有可能把信仰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使人心悦诚服。这两个条件在东方已具备，所以三大宗教源于东方决非偶然。

在整个世界中世纪，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很大程度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有关。三大宗教凭借这些古老的文明而走向世界，而这些古老文明又通过宗教传到亚洲、欧洲、非洲许多地方。直到近现代，宗教的力量仍然不可忽视，造成多方面影响。

二、地中海是世界文化的漩涡

地中海文明值得高度重视，它是世界文化交汇与激荡的漩涡，上继古代东方，下启欧洲文明。基督教与伊斯兰文化都源于此，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在世界上具有特殊意义。地中海处在一个特别的地理位置上，它介于欧、亚、非三洲之间，很难把它定格为“东”或者“西”。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海域：东北以达达尼亚海峡、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相通，北面可进入亚德里亚海和爱琴海，西面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可入大西洋，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前虽不能直接通往红海和印度洋，但中间也只隔着一条狭长的“陆桥”。

从横向上考察，地中海文明应当包括埃及、巴比伦、希伯来、腓尼基、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诸种文明在内，还吸收了印度和中国的文明，中亚游牧民族也不断带来“异质文化”，是一个百川汇集的湾。从纵向上考察，地中海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堆积层，各种文化不断叠加：公元前 3600—前 449 年这一层位上主要是古代东方文化，从波希战争结束（公元前 449 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 476 年）主要是希腊罗马文化，之后有一

个交错的层位，7 世纪开始形成伊斯兰文化层，14—15 世纪意大利开始“文艺复兴”，近代文明由此发端。

按照文化兴起的先后次序，可以明晰地看出一个沿逆时针方向运转的环形文化带，它与从东到西的环海航线是一致的。最先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接着是希伯来、腓尼基和波斯，然后是希腊，进而是罗马，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到阿拉伯，最终在意大利半岛上引起了改变人类文明命运的“文艺复兴”。时间的流逝与空间位置的转换，动态地反映地中海文明形成的过程，形象地说明地中海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漩涡。

古代东方与地中海文明有密切关系，它奠定了地中海文明的基础。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是地中海文明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它们的古老文明直接注入了地中海，成为最初的源头。在世界史上，最先登上“文明”舞台的是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在这里的苏美尔人在距今 5600 年就创造了“楔形文字”，揭开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尼罗河畔的埃及，从公元前 3100 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自称“天下四方之王”算起，经历了早期王国、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期王国几个时期，到埃及被波斯灭亡共 2575 年。

希伯来绝对不容忽视，他们处在埃及和巴比伦两大强国之间，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重压之下发出了最沉痛的呼声。他们创立的犹太教虽然有很人的排他性，但却孕育了对欧洲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督教，以后又哺育出在亚洲和非洲广为传播的伊斯兰教。住在西亚海滨的腓尼基人是最先活跃在地中海上的商业民族，被称为“地中海上的马车夫”，他们开辟了地中海环行航道。腓尼基人真正不朽的贡献是开创了拼音文字，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都源出于腓尼基字母，是欧洲各国拼音文字的始祖。小亚细亚的赫梯，是东方文化带伸向爱琴海的桥头堡，它最大的功绩就是发明了铁器，给地中海文明带来了一种“在历史

上起过革命作用”的新生产力。地中海上最先建立的大帝国是波斯，它促进了地中海文明的交融，波希战争是古代东方与希腊罗马两种文明交替的分界点。波斯帝国的体制，后来为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沿袭，影响极为深远。在世界文化史上，波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二传手”，它把地中海与中亚、南亚、东亚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地中海孕育了璀璨的希腊罗马文化，叠起了古代世界的一座高峰。爱琴海是东方文化西传的第一个接触点，也是希腊文化的先导“希腊奇迹”的出现决非偶然，倘若没有地中海两千多年的文化积累，它决不可能在一片沙滩上建起高楼大厦，更何况希腊人在进入巴尔干半岛时还处在“野蛮”时代。希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是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它给人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希腊文化是地中海文明爆发出来的火花，是古代东方文化的最大受益者。古代东方文化是“源”，希腊文化是“流”，聪明的希腊人利用人类已积累起来的知识进行创造，因而可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然而，整个希腊半岛在公元前 339 年终于被马其顿方阵踏平了，它的接续主要是靠亚历山大帝国，出现了一个“希腊化”时代。公元前 290 年罗马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经过三次“布匿战争”，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囊括整个地中海的庞大帝国。在长达 6 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在继承希腊文化的基础上兼容各种文化，在更大的范围内使地中海文明充分交融、发展，在共和后期和帝国前期臻于极盛，在世界文明史上又竖起一座丰碑。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第二大阶梯的地中海文明在这一时期达到成熟，在许多领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影响范围远远超过希腊，不愧享有“伟大属于罗马”的赞誉。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 1 世纪的巴勒斯坦，在罗马帝国晚期被定为国教，以后分化为天主教与东正教。它是一个“东西合璧”的

世界宗教，凭借东方与希腊罗马文化走进欧洲，走向世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另一个世界宗教——伊斯兰教也形成于地中海，它以阿拉伯为原点，随着航海、贸易、征服与传教的扩大，很快在西亚、中亚、南亚、东亚、东南亚及北非、中非传播开来，建立起一大批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形成了一个广阔的“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人进行了将近两个世纪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对地中海文明做了一次历史性总结，成为希腊罗马与近代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暗道”，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诸多影响。“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转折，是一支响彻云霄的历史变奏曲，它的发源地就在意大利。

地中海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各种文化又在这里分流。直接从地中海辐射出来的有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并因各地社会基础不同、文化取向不同而分别形成了两大文化圈。邻近地中海的印度，不断受到地中海文明的波及，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卷入这一巨大漩涡。远离地中海的中国，在文化交流上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流水线，中国文化西传与地中海文化东来从古至今未曾间断。拉开历史的广角与长焦，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地中海文明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延伸、扩展与提升，它们是前后相继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梯，而不是相互平行的两个系统。

三、世界五大文化圈的互动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并非“东”、“西”两条直线所能概括。对世界文化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有五大文化圈，即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文化圈”的理论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核心是文化传播论。由于某些强势文化的辐射作用，影响其他文化，逐渐扩大范围，

于是形成了具有某些共同因素的文化圈。

五大文化圈植根于古代东方和地中海文明的沃土上。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古老文明汇入了地中海，经过一番交融与冲突之后，又从地中海分离出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南亚相对独立，印度文化通过佛教向外传到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佛教文化圈。中国文化独树一帜，影响朝鲜、日本、越南及周边国家，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常常被入忽视的是游牧文化圈，其实它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个特殊地位。

五大文化圈的传媒方式不同。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是以宗教传播为媒介，把印度和地中海文化传到世界许多地方。汉字文化圈则不然，它的传播手段不是宗教，而是神奇的汉字。游牧文化圈又有不同，它的主角是游牧民族，以“游牧行国”的姿态出现，通过迁徙、贸易和战争引起急风暴雨式的激变，不断改变世界文化面貌。

五大文化圈的辐射范围也各不相同，因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而有盈缩。大体说来，佛教文化圈主要在亚洲，外传以后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小乘佛教三大体系，印度佛教反而衰落。汉字文化圈分为“本圈”、“内圈”和“外圈”，本圈形成于汉族，向国内各民族传播形成内圈，进而传到周边国家而成外圈。基督教文化圈从地中海出发，最先盛行于欧洲，以后传到美洲、大洋洲及亚、非的部分地区和国家。伊斯兰文化圈主要在亚洲和非洲，值得注意的是，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种坚固的社会模式游牧文化圈兴衰无常，时而急剧膨胀，时而又向内收缩，核心部位在中亚。

五大文化圈并非静止不动，更不是“河水不犯井水”，而是处在不停的“互动”状态之中。“互动”是我们的重要观察点，它含有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意思，既有隐形的渗透、交融，又有显形的冲突、挤压和取代，有时还会相互重叠。“十字军东征”，实

质上是基督教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圈激烈冲突的表现，近现代中东的国际纠纷也往往因宗教、文化冲突引起。挤压的现象在印度最为明显，伊斯兰教传入以后，与印度教分庭抗礼，把佛教排挤出来。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原先多信奉佛教，后来被伊斯兰教取代了，印度尼西亚也是如此。重叠现象以中国最为典型，汉字文化圈与佛教文化圈在许多方面是重叠的，其间有一个接触、碰撞、冲突与交融的复杂过程。最活跃的是游牧文化圈，它几乎与其他各大文化圈都有接触，引起剧变，整个欧亚大陆都受其影响。

五大文化圈的形成有先有后，但对整个世界历史文化进程都产生强烈影响，特别在世界中世纪。应当看到，在这一漫长时期中，宗教对文化传播具有特殊意义，三大宗教把与之相依存的古老文化传到世界各地，影响至为深远。战争固然给人类带来破坏和灾难，但它打破了封闭隔绝状态，扩大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在这方面，游牧民族的主动性最大，他们往往掀起阵阵狂涛，引起风云突变，迅速打破世界的均衡，造成突如其来的大变局，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他们是国际交通线的开辟者，是世界上最早、最活跃的商队，对沟通世界文化有特殊意义。

近代文化兴起以后，对五大文化圈都产生巨大冲击，引起许多新的变化，但并不等于这些文化圈从此消失。事实上，时至今日，五大文化圈依然存在。佛教文化圈有所弱化，这主要是指汉传佛教在中国已远不如古代那样盛行，但藏传佛教和东南亚的小乘佛教仍有相当势力。基督教文化圈反而扩大，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以后，迅速越出欧洲，传到美洲、大洋州及亚洲、非洲的若干地区。伊斯兰文化圈的基础并未动摇，对其他文化的反应特别强烈。汉字文化圈对“内圈”的辐射力增强，对“外圈”的影响不像古代那样强烈。游牧文化圈到了近现代，由于农耕的扩大

而被大大压缩，而且多半并入了伊斯兰文化圈。

四、东西文化的分异与整合

近代文明，如果从揭开序幕的“文艺复兴”算起，到现在只有 7 个多世纪；如果以产业革命为开端，时至今日不过两三百年。700 年和 300 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伟大的一瞬”，然而，在此几百年间，人类文明的进展却超过以往的几千年。犹如自由落体运动，在每一点上都呈加速度前进，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了近现代世界历史巨变的杠杆和原动力。

“文艺复兴”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冲动，它是在“复兴”的旗帜下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继承有价值的东西而加以发扬光大。它的历史功绩在于，把人从“神权”的枷锁下解救出来，用“理性”战胜“迷信”，释放出人的伟大创造力，因而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它开启了世界文化的新纪元，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和航向，自此以后，近代文明成了世界的主流，所以恩格斯把它称为“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把它看成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成了近代文明的中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东、西文化的分野才日渐明朗起来。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说到底，是工业与农耕、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奋进与保守的差异。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近代文明蓬勃兴起，使得以农耕为基础的古老文明相形见绌，形成了巨大反差。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子，无所畏惧的“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给世界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迅速改变世界面貌。

欧洲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风暴”，从尼德兰革命到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冲破了“黑暗的中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以

解放黑奴为目标的南北战争，使美洲兴旺起来。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人类在探索新的社会。民主成为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东方专制政体不断上崩瓦解。在世界的大变局中，古老的中国也被卷入浪潮，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独破天荒的第一次科学革命，首先从天体上夺取了第一块科学阵地，经典力学的创立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就是力量”成为近代最响亮的口号，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震撼全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开创了“蒸汽机时代”，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迅速波及到欧美各国。第二次技术革命又掀巨澜，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在此期间，发明了内燃机、电机、电话、无线电、电影、电视。

第二次科学革命又划开了一个时代，人类迈步跨进了现代化之门。首先是“三大发现”对经典物理发起了挑战，接着是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起点开创了一系列近代科学，如原子结构与量子力学、原子核物理、粒子物理、凝固态物理、射电天文学、现代数学、现代化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等。继之而来的是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

从 15 世纪初到 16 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大航海时代”，先是中国郑和下西洋的七次航行，接着是达·伽马开辟新航线、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大航海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七大洲、三大洋逐渐联系起来，“世界”的空间豁然扩大，彼此的联系日益紧密。到了现代，由于交通、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世界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历史的必然，“顺者昌，逆者亡”，“优胜劣败，

适者生存”。

文化的“多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文化繁荣昌盛的根基。倘若世界上的文化都统一为一种模式，住一样的房子，穿一样的衣服，唱同一首歌，跳同一个舞，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枯燥无味，犹如一片浩瀚的沙漠。几千年积淀起来的东方文明，蕴藏着无尽的瑰宝，重新发现东方是人类共同的使命。只有把人类的智慧聚合起来，才能创造更加灿烂的未来，因此，东、西文化的整合必将创造出世界新的文明。中国在世界上的坐标位置，取决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要有独创，也要有扬弃，与时俱进而不盲目追随。

第一篇 古代东方与地中海文明

世界文明的星辰，最先在欧亚大陆和埃及升起，东方显得特别明亮。环视地中海沿岸的古老文明，人们自然要注意到古希腊的宙斯神、太阳神巨像和那高大圆顶的古罗马建筑。然而，在地中海的东岸和东南角上，还有被希腊人称之为“世界七大奇迹”的埃及金字塔和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与希腊半岛遥遥相对的亚历山大港口，屹立着一座高耸入云的灯塔，它照亮了东、西交通的航道。

长期以来，人们在讲西方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的时候，总是“言必称希腊”，无视于浩瀚辽阔的地中海。考古上接二连三的新发现，不断动摇旧有的观念，把人们带回了比希腊更为古远的年代，努力去寻找那些“失落的文明”。1955年，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出版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世界文明史》，他写道：“在现代人中，世界是由欧洲和美洲构成的观点早就过时了。自然，西方文化主要产生于欧洲，但它从来就不是绝对排他的。它最初的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此外，印度的影响，最终还有中国的种种影响，也起了作用。”

被称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写了一部不朽之作《历史》，他虽然对希腊文化推崇备至，但眼界开阔，描述了一个广袤的世界，那就是地中海。当人们把目光转向地中海东岸的时候，首先突显在眼前的就是两河流域，希腊人把它称为“美索不

达米亚”。住在这儿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 3600 年就已经有了文字，建立了早期的城邦国家。尽管这一区域的政权不断更迭，从古巴比伦到亚述帝国再到新巴比伦，文化有了三千年的积累。北非的埃及，如果从上、下埃及算起，到埃及新王国被波斯灭亡，也谱写了一部长达三千年的文明史。不像两河流域那样动荡不安，尼罗河畔显得要安宁得多，埃及古国长期延续。历史事实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开创了地中海文明，它们比“希腊奇迹”的出现至少要早 20 多个世纪，或者说这些辉煌过去之后，希腊半岛的太阳才冉冉升起。

当然，这些古老的文明，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还具有早熟的性质。假如没有后来的交融与发展，并不一定都具有世界意义，要么被封闭起来成为犹如印第安文化一样的“活化石”，要么像克里特、迈锡尼一样突然遭到毁灭而湮没无闻，要么仅仅是一种区域性文化。然而，世界有幸，埃及和巴比伦的文明放大为地中海文明。埃及和巴比伦都位于地中海沿岸，它们的文明直接注入了地中海。这两个古国，不仅濒临地中海，而且彼此间的距离最近，接触与交往的机会最多，因而最先聚合为一个强大的磁力。各自孤立的格局渐被打破，由“点”而“线”，由“线”而“面”，形成了“新月形的东方文化带”。

在这个地中海东岸的文化带上，还有几颗晶亮的明珠。谈到地中海文明的时候，无论如何不可忽视希伯来，“小民族，大声音”，这个悲惨的民族在重压下发出了最沉痛的呼声，震动了整个地中海。腓尼基是“地中海上马车夫”，他们开辟了一条由东往西的地中海环形航线，把古代东方的文明带到希腊、罗马。邻近它的赫梯发明了铁器，并成为东方文化带伸向爱琴海的桥头堡。在伊朗高原上崛起的波斯帝国，横跨亚、非两洲，是地中海上最先出现的大帝国。西亚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大通道，“异质文化”不断渗入地中海，金戈铁马急剧改变地中海的形势，民族关

系错综复杂，平静的地中海越来越不平静。

（一）“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亚

人们一直在追问世界上文明起源最早的地方在哪里？是中国，是印度，是埃及还是其他地方。这个问题在古代似乎很难回答，因为文献不足征。大概是从 18 世纪开始，接二连三的考古新发现使历史的眉目渐渐清晰，经过反复比较，才知道世界上最先登上“文明”舞台的是美索不达米亚。

在亚洲西南部有两条大河，一条叫幼发拉底河，另一条叫底格里斯河，它们都发源于小亚细亚，注入地中海。在两条大河的中下游，形成了一大片冲积平原，希腊人把它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两河流域”。这块平原的大部分在今伊拉克，只有一小部分在叙利亚。

这里是所谓“三洲五海枢纽地”，亚洲与欧洲和非洲的陆路交通以此为连接，而它的周围有地中海、黑海、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它的北边是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丛山，东面是莽莽的伊朗高原，南面是浩瀚的阿拉伯大沙漠，西面是叙利亚草原和黎巴黎山，相形之下，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环境显得格外优越，成为许多民族向往的地方。

进入这一地区的民族很多，主要有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迦勒底人，还有一些“不速之客”。大体说来，它的北部称为亚述，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的北半部为阿卡德，南半部为苏美尔。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肥美的土地，这里始终是多种民族角逐之地，这就使得它的历史跌宕起伏，政权不断易主，先后出现了苏美尔早期王朝、阿卡德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最后为波斯所灭，前后三千多年。

毫无疑问，这里的文明是多元的，但它在历史长河中渐渐交融，在古巴比伦时代臻于成熟，新巴比伦王朝又有所发展，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又可称为巴比伦文明。在国外曾有一种“泛巴比伦主义”，认为世界的文明都源自两河流域，这固然有些偏颇，但它确有许多世界第一，譬如农耕、灌溉与城邦，譬如文字、国家与法律，譬如科学、文学的兴起，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学校和图书馆等不过，这些古老的文明后来都成为过去，在历史上竟至湮没，成了“失落的文明”。

1. 从苏美尔到新巴比伦

古老的文明是天河赐予的，因为在干旱的西亚地区这里得天独厚，在两河流域疏松、肥沃、平坦的土地上，可以利用河水进行灌溉，最早兴起农耕，产生村落和城邦。两河流域远古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 4300 年，大体可分为三个文化时期，即埃尔—欧贝德文化期、乌鲁克文化期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埃尔—欧贝德期开始了原始农耕，辅以畜牧业和渔业，使用石器为主，铜器刚刚出现，陶器为手制品，有了纺织。乌鲁克期铜器越来越多，陶器大都用陶轮制作，产生了图画文字。捷姆迭特—那色期已有较完善的灌溉水渠，农业由锄耕转向犁耕，作物和牲畜品种增多，冶金和制陶技术明显提高，商业有所发展。

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居民尚不清楚，人约在公元前 3600 年来了一批苏美尔人。按“苏美尔”的字义，他们当是“来自东方的人”他们使用铜器，发明了楔形文字，建立起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城邦，奏起了古老文明的第一乐章。“文明”一词为 Civilization，它的词根 Civil 含有“城市”、“市民”、“国家”等意思，说明城邦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的一大标志。城邦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通过灌溉水渠网络一片农庄，建有神庙，有道路通往周围地区。它建立在村社的基础上，设有管理各种事务的长老会，其首

领称为“帕达西”或“恩西”，已有“国家”的雏形。

早期城邦主要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尔萨、拉伽什、乌玛、苏路帕克、尼普尔、西巴尔、启什等，后来又出现阿卡德和埃什努那。城邦各自独立，水道和土地的争夺常常成为城邦间爆发战争的原因，整个公元前三千纪都为战争所困扰。从公元前 2800 年至公元前 2371 年是苏美尔早期王朝时期，城邦之间在争战中逐渐形成两大军事联盟，北方以拉伽什为盟主，南方的霸主则有乌尔和乌鲁克。后来拉伽什兴起，征服了乌尔、乌鲁克、拉尔萨和埃利都，打败了乌玛。频繁战争引起拉伽什人民的不满，人民拥立乌鲁卡吉为新恩西，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最先立法，并开凿了两条灌溉渠。但为时不久，乌玛和乌鲁克组成联盟，将拉伽什灭亡。乌玛的恩西卢伽尔一扎吉西征服了乌鲁克、乌尔、拉尔萨和阿布达，定都乌鲁克城，自称“乌鲁克和乌尔之王”，使苏美尔城邦渐归统一。正当苏美尔走向统一之时，北部的阿卡德兴起，造成严重威胁。

继苏美尔人之后进入两河流域的是阿卡德人，他们属塞姆种族，操闪米特语。他们定居在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公元前 2371 年建立统一阿卡德各部的国家。开国之君萨尔贡武功盖世，经过 30 多次战争降服了乌鲁克、乌尔、乌玛，进军北部的苏巴尔图，出兵掠取小亚细亚和黎巴嫩山区，自称“天下四方之王”。阿卡德王国第一次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扩大了灌溉网，促进南、北交通和商业发展。到了纳拉姆辛统治时代，再度对外扩张，除称“天下四方之王”而外，还称为“神圣的纳拉姆辛，阿卡德强大的神”，将王权神化。但这个王朝存在不到两百年便衰落了，公元前 2191 年被外来的游牧民族库提人灭亡。

库提人的统治遭到苏美尔、阿卡提人民的反对，最后在乌鲁克王乌图赫加尔的号召下撵走了库提人。不久，乌尔兴起，重建苏美尔、阿卡提人的政权，统一巴比伦尼亚，史称“乌尔第三王

朝”这个王朝的创立者乌尔纳姆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典——《乌尔纳姆法典》在他统治时期，乌尔成为西亚一大强国，国王自称“乌尔之上、苏美尔和阿卡德之上”。乌尔第三王朝仅存百年，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被入侵的埃兰人和阿摩利人所灭，乌尔城被夷为废墟。自此以后，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退出了历史舞台。

埃兰人撤走之后，塞姆种族的另一支阿摩利人又闯入两河流域，他们在苏美尔地区建立拉尔萨，在阿卡德地区建立伊新，又在幼发拉底河中游建马里、巴比伦，在底格里斯河中游建埃什努那，彼此争战。巴比伦土地肥沃，地当西亚的商路上，在乌尔第三王朝末期已日益重要，其首领苏姆·阿布姆于公元前 1894 年建立了巴比伦王国，史称“古巴比伦”或“巴比伦第一王朝”。到了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时日益强大，在其统治的 38 年中，统一了巴比伦尼亚，建立起一个从波斯湾到地中海沿岸的奴隶制帝国。他实行君主专制，集政治、军事、财赋及监察大权于一身，自称“强人之王，巴比伦之王，阿穆鲁全国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及世界四方之王”。他宣扬王权神授，以“巴比伦的太阳”自居。建立了一套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派总督分管各地，城市的行政长官均由国王指派。独揽军事大权，建立了一支常备兵，把土地分给士兵作份地以保证兵源。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这一时期制定的。他的最大功绩是兴修水利，把他在位的第四、第九、第二十四和第三十一年定为“开凿河渠之年”，建成了两河流域的灌溉系统工程。但汉谟拉比死后，巴比伦第一王朝便陷入与伊新、埃什努那的战争，并受着东北加喜特人入侵的威胁，公元 1595 年为小亚细亚的赫梯所灭。此后，伊新的伊路买鲁建立海国王朝，史称“巴比伦第二王朝”。67 年后，由北部入侵的加喜特人驱逐了海国王朝，于公元前 1518 年占据巴比伦城，史称“巴比伦第三王朝”。加喜特王朝衰落后，又出现尼

布甲尼撒一世建立的“巴比伦第四王朝”。从第一王朝到第四王朝，前后 760 多年。

两河流域的北部称为亚速，最早的居民是胡里特人，以后从北方迁入了塞姆种族与土著居民融合而为亚速人。亚速城在底格里斯河畔的一个小山丘上，是西亚的一个交通贸易中心早期的亚速只是一个城邦，由首领“伊沙库”总管宗教、行政、司法事务，主持长老会，并由长老会每年推举一人为“里模”，负责管理财政、商业活动，在西亚许多地方建立商业据点公元前 19—前 18 世纪之交，沙姆希亚达德一世夺取政权，自称“天下之上”，统一阿卡德北部，西降玛里，势力达于地中海，但不久沦为小亚细亚米坦尼的属国。公元前 1400 年前后，米坦尼为赫梯所败，亚速国王巴里特一世乘机而起，史称“中期亚速”。中亚速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时强盛，乘赫梯、埃及、巴比伦衰落之机进行军事扩张，北入亚美尼亚山区，西入叙利亚和腓尼基，向南一度统治巴比伦，但在公元前 11 世纪后期分裂，亚速再次衰落。

从公元前 10 世纪开始，亚速又东山再起，那西尔帕三世扩张领土，其后继者萨尔玛那萨尔三世在 35 年中发动了 32 次战争，征服了两河流域北部及叙利亚许多小国，但在公元前 9 世纪末为小亚细亚强盛起来的乌拉尔图阻止。公元前 9—8 世纪亚速勃然兴起，自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起又大势扩张，凭着金戈铁马东征西讨，于公元前 729 年吞并巴比伦，其继承者击溃乌拉尔图，攻入叙利亚和腓尼基，并统治上下埃及和努比亚，版图东接伊朗，西临地中海以致埃及，北到南高加索，南达波斯湾，成为西亚的一大军事帝国。它的强盛与其经济实力有关，铁器的普遍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商业和对外掠夺也使它富裕起来。首都尼尼微成为西亚的中心，有许多石板大道通往全国各地。它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常备兵实行募兵制，由几十人为一小队，若干小队

组成一个兵团，各地还有地方兵团，战争期间又从被征服地区补充兵源。兵种繁多，步兵分轻装和重装两种，骑兵连坐骑也披护甲，战车兵使用两三匹马拉的双轮战车，又有工程兵修路、架桥和修筑工事，还有强大的海军舰队。亚述军队不但能正面攻取和侧攻，而且善于截断敌人粮道，攻城时使用攻城槌，长于夜战和歼灭战，尤其擅长闪电战术。对统治区域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有的给予较多的自治权，有的仅称臣纳贡，有的则设督察，并将全国划分为若干行省。但因其靠军事征服，树敌太多，不断激起反抗，所以它极盛之时也是它开始走向衰落之日，公元前 655 年埃及恢复独立，接着是吕底亚王国在小亚兴起，伊朗高原也兴起了米底，而在公元前 1000 年进入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也日益强大，遂使亚述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终于在迦勒底人和米底的联合进攻下节节失败。公元前 614 年“千年古都”亚述城陷落，又过两年“狮穴”尼尼微被踏平，公元前 605 年亚述帝国为迦勒底人颠覆。

迦勒底人也是塞姆种族的一支，原住波斯湾沿岸，约在公元前 1000 年进入巴比伦尼亚，公元前 626 年建立新巴比伦王国，又称迦勒底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时期是新巴比伦极盛之时，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动一系列战争，攻陷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之后，强迫犹太人迁往巴比伦等地，把他们变成“巴比伦之囚”。新巴比伦的工商业繁盛，巴比伦、西帕尔、尼普尔、乌鲁克等城都是工商业中心，出现了一些有势力的商业家族，如巴比伦的埃吉贝家族和尼普尔的穆拉舍家族。当时的巴比伦是各国商人云集的地方，有亚述商人、埃及商人、波斯商人及迦勒底商人等等。由于财富集中，尼布甲尼撒重修巴比伦城，修筑跨越两河流域的长城，还建了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但新巴伦王国仅存 87 年，公元前 539 年被波斯帝国所灭。自此以后，这个“文明古国”失去了它的光辉，不再崭露头角，

渐渐被人们遗忘，直到 19 世纪初这个“死去的文明”才重见天日。1817 年开始发掘古巴比伦遗址，继后又发掘了尼尼微、杜尔、沙鲁金、乌尔等古遗址，壮丽的建筑、精美的工艺品和大量的泥版文书使世界为之惊讶，于是兴起了“亚述学”，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文明的摇篮”里寻找世界文化的源头。

2. “人类文明的曙光” 苏美尔文字

文字给人类文明带来了一线曙光，使人类从漫漫的黑夜中走了出来，结束了“蒙昧”与“野蛮”的时代，跨进了“文明之门”。有了文字，人们可以把经过的事情记录下来，从此才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了文字，知识才能日积月累，不断丰富自己，不断进行发明创造。文字不但可以超越时间，传承以往的文化，而且可以超越空间，把文化传到其他地方，远距离传播信息。倘若没有文字，世界仍是一片漆黑，既没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更不会有科学昌明的当今世界。苏美尔人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最先发明文字，而我们对苏美尔人的认识 and 了解也正是通过文字。

苏美尔人大概在距今 5600 年就有了文字，它比埃及的象形文字要早，比未人认识的“印度河文字”和中国的“甲骨文”要早一两千年，被称为“字母之祖”的北方闪米特字母的出现大概也是在其产生后 2000 年左右。这种文字大都是用芦苇笔或木杆刻在泥板上，笔尖细，笔尾粗，晒干或烤干后的字形一头大一头小，阿拉伯人把它叫做“钉头字”，而英国人则称它为“楔形文字”。其实，“楔形文字”是它的定型阶段，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日图画文字经象形文字到音节文字的演变阶段。最早使用这种文字的是苏美尔人，以后为阿卡德人继承，然后传给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亚述时代成为西亚通行的国际文字，流传到埃兰、赫梯、米坦尼、乌拉尔图、波斯、迦南等地，因为与各种语言结合情况不同，语音、语法和词汇上有许多差异，解读非常困难。美索不达

米亚古文明的再现主要是靠考古发掘，17世纪初意大利旅行家罗·德·瓦莱发现了巴比伦城和乌尔城遗址，并得到一些刻有文字的泥板。接着，丹麦数学家卡尔斯滕·尼布尔抄录了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的铭文，几年后，法国生物学家米考克斯发现泰西封附近的界碑，记者阿贝·比彻姆进行了第一次考古发掘。18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巴格达代表克劳迪乌斯·詹姆斯·里奇考察了巴比伦等遗址，搜集了许多刻有文字的泥板、砖块、界碑和印章。1842年，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尔·博塔发现了亚速在尼尼微的两座宫殿，以后又发掘了杜尔沙鲁金的一座王宫，获得大批雕刻石板和楔形文字铭文。另一个英国人亨利·奥斯藤·莱亚德爵士发掘了卡尔胡城遗址，发现亚速那西尔帕二世宫殿的墙壁和雕像，还有著名的“黑色方尖碑”和巨型带翼牛。1852年，霍姆茨德·拉萨姆发现了亚速王巴尼拔的“图书馆”，藏有大量的楔形文字泥板，奠定了亚速学的基础。德国人安德烈在1903—1914年对亚速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又获得许多泥板文书。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工作绵延不断，出土文物越来越使人感到惊讶和叹服。

然而，解读这些古老文字是很艰难的。最早进行释读的是英国旅行家托马斯·赫伯特，他在1671年根据波斯王宫保存的铭文推断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读，并确认它是波斯语。1802年，德国人乔治·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在解读上取得突破性成就，他用造密码的原理论证三种楔形文字属于不同语言，其中一种是阿黑明尼德王朝时期流行的古波斯语。真正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是英国青年军官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他在1849年成功地释读了《贝希斯敦铭文》，说明铭文是由古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楔形文字刻写而成，主体部分是巴比伦语铭文。继后又发现巴比伦楔形文字具有“多音性”特征，断定一个符号既可作表意符号又可作音节符号和限定符号，他的成果得到公认，被尊为“亚

速学之父”。与他合称“楔文三杰”的还有兴克斯和欧佩特。1857年，数学家塔尔博特翻译出一份业速王提格拉特一帕拉沙尔一世的铭文，认定是阿卡德语，“亚速学”从此诞生。随后，罗林森等又破译了苏美尔语。理清了这一线索，对楔形文字的研究逐步深入。

考古证明，乌鲁克古城神庙中发现的 570 块泥板文书属于公元前 3500 年的“乌鲁克文化”，它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字，外观并不是楔形，而是一些图画文字，由一个或几个图形构成一个表意的词，复杂的事物以其特征来表达其整体概念。符号越来越多，使用极不方便，于是逐步加以简化和规范化，最后完全失去象形的特征，变成一些象征性的线条符号。因用尖笔在泥板上压成笔画，这便形成了钉头字，其间经历了约 500 年时间才演变成型。与此同时，由于书写方便，将原先从右到左、由上至下的行款，改为从左到右、由上至下的款式。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时期”，为了区别“同字异音”和“同音异字”，开始出现限定类别的符号和发音补充符号，逐步向音节文字转化。

楔形文字的发明者是谁呢？1690 年法国学者欧佩尔特在铭文中发现“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但早期的楔形文字并不具有阿卡德的闪米特语特征，断定它的发明者是苏美尔人，其语言属苏美尔语。苏美尔语在汉谟拉比时代已不通用，但祭司们还使用这种语言，于是从这里找到线索。法国学者修罗·但金的《苏美尔和阿卡德语铭文》和波贝尔的《苏美尔语语法入门》两书，为解开苏美尔语开辟了道路。苏美尔语属粘着语，无词根变化，基本词汇是复词，语段词多保持独立结构，语音、词汇、语法有别于闪米特语。

随着阿卡德王国的建立，阿卡德语流行起来，并上升为主导地位，但他们仍继续使用这种文字，并发展了音节系统以适应阿

卡德语。阿卡德语是闪米特语的一支，但因受苏美尔语的影响而产生变化，例如借用苏美尔语词汇，动词或谓语后置，辅音消失等等。从泥板文书来看，起初可能是两种语言并用，但后来苏美尔语在日常生活中已不通用，被压缩到宗教活动范围。

巴比伦时代，楔形文字应用范围扩大，并发生某些重要变化。统治巴比伦王国的阿摩利人，语言与阿卡德相近，所以继承比较自然。汉谟拉比时代将楔形文字广泛应用于政府文书、法典和书信，并将它刻在石碑上，《汉谟拉比法典》就是用阿卡德语楔形文字刻成的。不过，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三种变化：一是出现会意字，二是发展了表音功能而趋近“声符”，三是进一步加以简化。

亚述帝国时代，泥板文书的内容无所不包，广泛用于宗教、神话、科学、天文、历法、政治、法律、历史、教学各方面，还把历史记录在六边形、七边形、八边形、十边形的石碑石柱上。词汇比巴比伦时代更加丰富，书法也更加精美。亚述人将楔形文字简化为 750 个基本字，其中有 300 个常用字。到了后期，这种文字已演变为音节文字。更重要的是，由于亚述帝国的建立，境内民族众多，并与周边国家广泛交往，因而形成西亚各国通用的文字。埃兰人较早借用这种文字，演化为音节文字。赫梯人操印欧语，但文字上深受亚述影响。叙利亚的乌加里特人把这种文字演化为字母文字，由 30 个符号组成。波斯人早先也使用这种文字，但向音素字母方向发展，有元音和辅音。这种文字在西亚使用了 3500 年，最后被历史的浪涛淹没而成“死文字”，长期不为人知，直到 19 世纪才从地底发掘出来，重新改写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

3. 世界上第一个学校和图书馆

学校与图书馆是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渠道，它们是文明发

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有关两河流域的著述中，学校和图书馆往往成为人们的一个重要关注点，然而，这两个“现代”意味很浓的文化设施居然在距今 5000 年就已经有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带着怀疑与好奇的心情去查阅有关资料，终于渐渐被事实说服，相信确有其事：埃及出现学校大约是在公元前两千纪，孔子聚徒讲学大概是在公元前 5 世纪，苏格拉底在雅典授徒可能也是在公元前 5—4 世纪之间，如此看来，苏美尔学校的确堪称世界第一。世界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希腊化”时期的产物，它比亚速时代的巴尼拔图书馆至少要晚 3 个世纪，如果再往前延伸到苏美尔时代的尼普尔图书馆，更不愧为世界第一个图书馆了。我们由此找到了世界教育与图书馆的源头，窥见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盛况，同时感悟到这种文明之所以昌盛的原因。学校和图书馆的创立是苏美尔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享有特别的殊荣，所以，美国学者克莱默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生活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的苏美尔教师默默无闻的创造和努力，科学和知识要想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学校和图书馆在苏美尔最先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事，首先是他们的文字起源很早，有条件进行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于是传授知识的学校和蓄存知识的图书馆便应运而生。苏美尔人称学校为“埃杜巴”，原意是“泥板书屋”。学校兴起是社会的需要：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机构的建立，需要不断补充“书吏”，充当顾问、谋士、文案、书记员、会计、收税人等；另一方面是神庙也需要有刻经、民事、占星、历算、医学、文学的人。所谓“图书馆”，实际上是堆放泥板文书的场所，时间久了便成为城邦、王朝、神庙的档案库。这种特殊的档册是坚硬的泥板做成，不易被水浸蚀，也不易被火焚烧，成为千年不朽的文书档案，集合成为巨大的图书馆。

在整理泥板文书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有一些学生的作业和教科书，这便引起了学者们重视。在乌鲁克出土了上千块泥板文书，其中就是学生做作业用的单词表，时间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被认为是学校的雏形。20 世纪初在舒路帕克发掘一批公元前 2500 年左右的“教科书”，说明教育已日渐推广，并有所规范。后来在马里城发掘了一所学校的遗址，时间是公元前 2100 年，当是阿卡德王朝末期或乌尔第三王朝初期。这个遗址有两间房屋和一条通道，大屋有 4 排石凳，大约可容 40 名学生，小屋有 3 排石凳，可容 20 多人，房中还有学生的作业泥板，但没有讲台和课桌。从学校遗址的分布来看，可能有四种类型：拉萨尔、乌鲁克和马里的学校均在王宫附近，大抵是宫廷所设；沙杜蓬的学校在神庙附近，藏有许多辞书和课本，可能是神庙所设；另有一类设在书吏住宅区，如尼普尔和基什，发现许多练习作业、文学作品和参考书，且文献中记有某学生是某书吏之子；在乌尔发现的一所学校既不在王宫、神庙附近也不在书吏住宅区，有人推断它是私立学校，教室里藏有 3000 片泥板，主要是教科书、文学作品、教材纲目和宗教文书。

泥板文书的记载告诉我们：学校并不普及，入学的都是富家子弟，起码是自由人，在一份学生名单中列有家长的姓名和职业，他们的家长均为各级官吏。苏美尔人称校长为“乌米亚”（意为“教授”、“权威”或“学校之父”），教师为“泥板书屋的书写者”，行政人员为“泥板书屋的管理者”，学生为“学校之子”，毕业生为“昔日学校之子”。课程主要有语言、文学创作、计算、测量和生物、矿物等，教师按专业分科讲授。学校生活严格，学生从早到晚在校学习，中午自备午餐，放学后回家做作业，稍有过错便实行体罚，殴打是常有的事。

图书馆出现的时间与学校差不多，最早的图书馆是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的尼普尔图书馆和乌尔图书馆，都设在神庙附近。

但往后规模大、数量多的则是王室图书馆，汉谟拉比时代几乎遍及较大城市，亚述时代更为发达，最著名的是巴尼拔图书馆。巴尼拔是亚述的末代国王，他热心文化，在国都尼尼微修建了一个宏大的图书馆，藏有万件泥板文书，泥板上往往刻有“宇宙之王、亚述之王、亚述巴尼拔之宫”的印记。这里有世界上最早的字典，有许多关于语法的书。在科学著作中，以数学和占星术居多，还有地理书。大量的是官方文书，如国王敕令、贡品清单、将军和总督的奏章之类，还有一些土地、房物、奴隶的买卖文书，有借贷和抵押的契约及遗产继承书。有 62 部文学作品，但历史书甚少。在这里发现了一份“书单”，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不过，它既不是按图书的内容进行分类，也不是书名目录或作者录目，而是按图书的大小和形状分类，大泥板和大泥板放在一起，小泥板和小泥板放在一起，并将正方形、椭圆形泥板分开。亚述学家约希姆·麦南写道：“没有比亚述人和迦勒底人的文献更耐久。它们的数量已相当可观，而且还会伴随着新发现而与日俱增，其前景不可限量。但我们现已能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评估，仅尼尼微图书馆的泥板数量就逾万件，……如果与其他民族流传下来的材料相比，我们很容易相信，亚述—迦勒底文明史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古代民族史。”巴尼拔图书馆保存了一大批世界上最经久的书，为保护人类最早的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并奠定了“亚述学”的基础。

4. 《乌尔纳姆法典》和《汉谟拉比法典》

两河流域被称为“文明的摇篮”，不仅是因为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和图书馆，还因为它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制，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社会行为规则的实施。法律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发生、发

展与阶级和国家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苏美尔人很早就建立了城邦国家，因而最早的法律也在此产生。翻开人类的法制史，第一个立法者是苏美尔拉伽什城邦的“恩西”乌鲁卡基，第一部成文法典是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姆法典》，世界上迄今保存最完整而且最古老的法典是《汉谟拉比法典》，它们谱写了人类法制史的第一篇章。

苏美尔有一个拉伽什城邦，统治者卢伽尔安达是个暴君，侵吞了神庙土地，增收各种苛捐杂税，社会矛盾到了白热化程度。公元前 2378 年，乌鲁卡基领导平民起义，夺取了政权，成为拉伽什邦的“恩西”（后改称“卢伽尔”）。他针对社会弊端进行改革，核心是保护私有财产，如免除平民所欠赋税，减轻手工业者负担，禁止掠夺他人财产，废除债务奴隶等，还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和平民义务兵役制，使社会秩序进入正常状态。他的改革虽没有以法典的形式出现，但改革的内容却有铭文记载，具有国家立法的性质。“法”一词兼有“公平”、“正义”等含义，即以某种标准来调整社会关系，所以后来阿卡德王国的创立者萨尔贡因立法而被称为“正义之王，讲正义者”。

到了乌尔第三王朝，它的创立者乌尔纳姆（公元前 2113—前 2095 年）将法律条款经过整理、编订而使之系统化，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乌尔纳姆法典》。这部法典为世人所知是因苏美尔学家 H·N·克莱默和亚述学家 F·R·克劳斯的努力，他们从泥板文书中找到了两块法典的残片，部分解读出来。《乌尔纳姆法典》分为前言和正文两部分，可以断定它是一部成文法典。前言的中心意思是王权神授，讲的是主神安努和恩利尔任命月神南那为乌尔国王，宁苏恩女神之子乌尔纳姆根据南那确定的“公正”原则制定了法典，保证了社会稳定和城邦安全，被称为“伟大的战士，乌尔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正文部分残缺不全，仅存 29 个条款，内容涉及社会伦理、婚姻家庭、土地占有和使用，

奴隶制度，还有司法和诉讼程序及刑法。这部法典在审判程序中，仍有原始的“神明裁判”，以神的名义来证明当事人是否有罪。但它废除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法”，不采用肉刑，代之以罚金，并根据犯罪情况分别惩以白银。在此之后，底格里斯河畔的埃什努那王国也出现另一部法典，称为《埃什努那法典》。

集法典大成的是《汉谟拉比法典》，它产生于古巴比伦王朝的汉谟拉比时代，时间是公元前 1792—1795 年。法典刻在一根黑色玄武岩的大石柱上，石柱高 2.25 米，周围 1.65 米，石柱上端有两尊浮雕像：坐着的是太阳神沙马什，他手里拿着一根象征权力的“权杖”；站着的是汉谟拉比，双手做打拱状，仿佛是在聆听神的“真言”。这根大石柱原先竖立在巴比伦首都，后来埃兰人入侵巴比伦，把它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萨城。公元前 6 世纪，波斯帝国兴起，以苏萨为国都，从此便将这部法典保存在波斯。1901 年，法国考古队将它发掘出来，石柱已断为三截，但拼合起来还相当完整。起初，人们以为碑上的铭文是波斯文，但反复研究后才知道它是楔形文字，而且不是波斯国王所立。经过识读，证明这是巴比伦王朝第六代国王制定的法典，即举世闻名的《汉谟拉比法典》。

这部法典虽然没有《乌尔纳姆法典》古老，但它基本没有残缺，能够完整地反映古巴比伦的法律状况，是现存世界上古老法典中最完整的一部。《汉谟拉比法典》的意义还在于它的系统性，由前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把各种法律条款编纂起来，而不是零散的法律、法规，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这部法典铭刻在石柱上，共有铭文 3500 行公诸于众，说明法律的公开性与永久性，既不是藏于宫廷中的“内部文件”，也不是某种“短期行为”，而是全社会必须长期遵行的法律准绳。它具有“诸法合一”的特征，在编纂上将民法、刑法、实体法及

诉讼、审判程序合为一体。从前言和结语可以看出，它的立法思想有二：一是“王权神授”，实际上是将王权神圣化，借助神的威力来统治人间，犹如太阳的光芒普照大地；二是宣布法律神圣不可侵犯，强调“公正”与“公平”，“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触犯法律的人必将受到惩罚；三是汉谟拉比的权威性，他不仅是“世界四方之王”，而且是“巴比伦的太阳”。

《汉谟拉比法典》的产生，固然与当时统一国家的形成有直接关系，但从法律的条款来看，实际上是美索不达米亚法律制度逐步形成的结果。在法典中，保留着若干古老的习惯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仍有“神明裁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法”延续下来。还有一种称为“和谐”的惩罚方式，即人体的哪一部分触犯法律就惩罚哪一部位，如打伤人砍手，强奸割去睾丸之类。它还继承了《乌尔纳姆法典》、《埃什努那法典》的基本精神，最重要的是维护私有制度，制定有关所有权、债务、婚姻家庭条规，设有诬告罪、伤害罪、伪证罪、侵犯财产罪、侵犯家庭罪等罪名，明确国王具有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并规定诉讼、审判程序等。但在新的情况下，《汉谟拉比法典》又有发展，最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反抗国王的罪名，凡违反王命的人一律受惩，体现中央集权统治的加强；二是维护奴隶制度，明确划分三个等级，确立各等级在法律上的地位。人分为阿维鲁、穆什钦努和奴隶三个等级，但关于阿维鲁与穆什钦努在法律上的含义争议颇大。经过争论，一般认为阿维鲁是享有全权的自由民，穆什钦努是王室的仆从，只有部分公民权，而奴隶在法律上是无权的。

《法典》的正文部分是法律条款，共 282 条。结婚必须缔结婚约才为合法，但缔约的不是结婚者本人而是他们的父亲，男方违约另娶不能退回聘金，女方毁约另嫁则加倍偿还聘金；诽谤自由民的女子要受惩，强奸自由民未婚妻处予死刑；妻子不生育允

许丈夫纳妾离弃，但可生育者则不允许纳妾或遗弃；离异时必须归还女方嫁妆，并给妻了一份财产，从法律上保护正常的婚姻关系。家庭中父权占支配地位，可用女子抵债或抵命，但丈夫无权将妻子抵债；父亲死后财产由所有子女继承，只有犯大罪的女子才剥夺其继承权。土地分为王室领地和私人土地两类：王室土地包括王室直接享用的庄园和牧场，还有王室仆从的份地以及王室的出租地；除士兵以外的份地均可转让或买卖，种份地的人必须承担一定义务；私有土地可以转让、出租、抵押和买卖，均以契约文书为凭。关于债务的条款很多，在保护债主利益的同时限制高利贷，欠债必须偿还，无钱偿还者可用谷物、子女抵债，但不得剥夺债务人的土地所有权；自由民子女抵债只具有“人质”性质，天灾人祸造成的债务可以减免。对于商人“塔木卡”和“沙马鲁”的利益予以保护，特别重视契约。奴隶可以买卖，窝藏逃亡奴隶者处死，战俘奴隶可以赎回，抵债的人质待还清债务后可恢复自由。

法律从本质上来讲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它在一定范围内调节各种社会关系，有法可依，对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两河流域从公元前二千纪就有了成文法，并形成法典，以后又出现了相当完备、系统的《汉谟拉比法典》，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比《罗马法》至少要早一千五六百年。几千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尽管“法”的性质不同，但总的趋势始终不改。

5. 数学及天文历法的创造

在世界科技史上，美索不达米亚也占有重要一席，它的两大贡献是数学和天文历法。在数学方面重大的成就，是发明了 10 进位法、12 进位法和 60 进位法。曾经有人断言，在希腊以前不

存在真正的数学，理由是只有简单的计算而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但这种推断终究被事实推翻，在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那里已经有了较高的抽象思维，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代数学，还有平面几何学他们很早就认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按星体的方位划分为十二个星座。如果说太阳历的发明者是埃及人的话，那么，太阴历的发明者则是苏美尔人。7天为一周的星期制度也是巴比伦首创，延续至今几千年。

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它适应土地丈量、产品计算、工艺制造、工程测量、历法推算及商业记账等需要而发展起来。在大量的泥板文书中，现已发现了 300 多块是专记数学的，其中有 100 块左右是学生的数学习题，其余 200 块则是数学表格，此外还有许多账单、收据和契约。根据专家考证，数学在苏美尔末期（公元前 2100 年）已经兴起，古巴比伦时代达于鼎盛。这里不仅有了记数符号，还发明了进位方法。进位法的意义重大，如果不知进位就根本无法进行计算。10 进位法是“最妙的发明之一”，它是数学运算的基础，它的发明很可能是受到手指的启发，由 1 至 9 然后上升到十位、百位、千位、万位……。但在泥板上出现另一种计数方法，它用大芦管刻画出另一种数列，如 1、4、9、16、25、36、49 之类，它们显然是一个自然数的平方数列，即 2×2 、 3×3 …… 7×7 等。按道理，49 之后应是 64、81……，可是，记数却并非如此，从 1 至 49 即止，这种现象只有放在 60 进位法中才能解释。关于 60 进位法的起源，众说纷纭：可能是因为 60 能被 2、3、4、5、6、10、15、20、30、60 除尽，是一种最便捷的计算方法；可能有如中国的干支法，用 12 天干与 10 个地支进行排列组合而为 60；当然也可能与圆周的等分有关。60 进位法至今仍然使用，如：一小时等于 60 分，1 分钟为 60 秒；圆周为 360° ，即 60×6 ；按阴历，一年为 360 天，即 12 （月） \times 30 （日）。这里显然还有 12 进位法，如一年分为 12 个月，12 与

10 的组合数为 60 等。

在巴比伦的数学用表中，有乘法表、除法表、平方表、平方根表、立方表、立方根表、倒数表和对数表等，而且往往用倒数来表示 60 进位。巴比伦人已会解方程式，已知道的有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和一元三次方程，不过因那里还没有字母文字，未知数的表示通常是用“长”、“宽”、“面积”、“体积”等词语来表达。他们能否能把四项式的三次方程转化为标准式还无材料证实，但根据他们解三次方程和二次方程的办法，或许可解个别的高次方程式。巴比伦人还有了级数的概念，包括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这在月亮周相表中都有运用。平方、立方、倒数、对数、级数以及求未知数的方程式等，说明巴比伦时代的数学已发展到相当抽象的理论阶段，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代数学。

以往人们都以为巴比伦在几何学上的创建甚微，远不如埃及。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巴比伦在几何学方面的成就也令人感到惊异。古巴比伦人已认识到圆的一些特征，把圆周分为 360 等份就是一大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对日、月运行轨道的观测有关，与时间的计算有关他们已能计算圆的周长和面积，认为圆的周长等于直径的 3 倍，圆面积等于圆周平方的 $1/12$ 或圆半径的 3 倍，圆周率已精确到 3.125。还知道圆的内切、外切、弦、扇形等。他们掌握了直角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面积的计算方法，开启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的先河。还掌握了相似形的原理，认为所有的圆都是相似形，两个相似直角三角形的对应边成比例，过等腰三角形顶点的垂直平分线将它分为两个相等的直角三角形。他们还能计算正方形、长方形、正五边形、正六边形、正七边形，分别计算出它们的周长和面积。

巴比伦的天文学起源于人们对天象、气候、物候的观察，而在巫术盛行的时代则以占星学的形式出现，把人象变化与人事联系起来，预卜人事吉凶，如国家兴亡、丰收与灾害、战争与和平

及个人祸福等等。占星术见于记载是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在 70 块泥板组成的记录中有 7000 多个预言，主要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对星象的观察，首先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太阳和月亮，其次是肉眼能分辨的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巴比伦人绘制了一幅“星盘”，在一块泥板上刻有 3 个同心圆，把它们分为 12 等份，每个部分都有一个星座，即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室女座、天秤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座、宝瓶座、双鱼座，以它们为坐标观察日、月的运行。十二星座的名称，后来为希腊人继承，长期在欧洲流行。这十二星座，实际上是太阳运行轨道上的十二个等分点，即所谓“黄道十二宫”。根据长期观测的结果，掌握了星体运行的周期，月亮 18 年零 11 日回到它原来的位置，金星每 8 年为一周期，水星的周期为 46 年，土星为 59 年，火星为 79 年，木星为 83 年。有了这个基础，他们便可预测日食和月食的时间。然而这一切都需要经过计算，所以被称为“数学天文学”。现存的“数学天文学”文献可分两大类，即“程序文献”和“星历表”，前者为计算规则，后者记录某年或某几年月球与五颗行星的相对位置。

巴比伦人创制了一个太阴历的时间系统，它以太阳的升落为一日，以月亮的圆缺为一月，以寒暑的交替为一年。按照这种历法，一年为 12 个月，每月为 30 天，一年共 360 天。后来做了改进，按照月相变化，定大月为 30 日，小月为 29 日，大小月相间，一年为 354 日，岁首定在春分。然而这种划分与实际的回归年有一定差距，于是用闰月的办法来做调整，起初闰月时间不定，以后固定为 8 年 3 闰或 27 年 10 闰，直到公元前 4 世纪才确定 19 年 7 闰。计算时间是用日晷和漏水钟，把一天分为 12 个时辰，每个时辰 120 分，每分 120 秒，与中国的 12 时辰是一致的。他们还根据月相变化，把一个月分为 4，以 7 个神灵主管一天来

与 7 星相对应：太阳神沙玛什主管星期日，月神辛主管星期一，火星神涅尔伽主管星期二，水星神纳布主管星期三，木星神马尔都克主管星期四，金星神伊什塔尔主管星期五，土星神尼努尔塔主管星期六。7 个星辰轮流出现，因而一个周期便是一“星期”，以星期日为开头，这就是星期制度的由来。

此外，医学的起源也很早，在苏美尔时代便有了医方，并把它们刻在泥板上。在亚述的巴尼拔图书馆里，藏有许多医学文献，一类专记症状，另一类则是众多的疾病医方。不过，这时的医学还处在“巫医混杂”的状态，许多不解之迷都归结为鬼神。他们特别重视人体的肝脏，把血液看成是生命之源。外科手术较为发达，但宗教禁忌阻碍了解剖学的发展。美索不达米亚的医学虽然包裹在宗教迷信之中，但某些方面已积累了关于疾病、医药的实证经验，它与埃及的医学一起，成为希腊医学的重要来源，如果没有它们的早期医学，也就不可能在公元前 5 世纪出现“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

6. “空中花园”与“巴比伦之狮”

这里要说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建筑与雕塑，重点放在亚述与新巴比伦，以“空中花园”和“巴比伦之狮”为代表，展示两河流域建筑和雕塑艺术风貌。被希腊人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坐落在巴比伦城的西北角上，它是公元前 6 世纪的遗迹，是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修建的“世界最大都市”的一个精彩部分。严格说来，它是在平地上堆起的一座假山，长 120 余米，高 25 米，用石柱和石板一层一层地向上堆砌，造成一个占地 1260 平方米的方形底座，上面有四层平台，并构筑起气势恢宏的大理石阶梯。平台上铺着厚厚的沃土，种植外地移植的奇花异木，又设法将幼发拉底河的水抽上山去灌溉，远远看去就像是在半空中的一座奇妙的花园。巴比伦城内还有一个重要古迹，

那就是“巴比伦之狮”，它用巨石雕琢而成，狮身长 3 米、高 2 米、宽 1.5 米，神态威猛，阔步向前而咆哮，脚下还踩着石头的人，颇有些英雄气概。

回过头来看两河流域的建筑，古老、苍劲而又独特。因为这里缺乏石料，一般的建筑物均用粘土压制成型的“日晒砖”，石料建筑只用于神庙和宫殿。建筑物多半呈塔形，从下到上逐渐缩小，四周有阳台，并建有阶梯。它的结构独特，形成一种拱券形及山拱券形衍生出来的圆形或半圆形屋顶结构体系，后来又加上装饰墙面的面砖和彩色琉璃砖，其材质、构造及造型风格，对地中海各地产生深远影响，包括希腊、罗马、波斯及阿拉伯。

神庙建筑在公元前四千纪中叶的乌鲁克文化期已经出现，一般建在人造的小山丘上，外形为密排的拱壁，殿堂为“T”形平面，有“十”字形甬道通入，庙内有长方形祭坛，因神庙外墙粉刷着白色，故称“白庙”。乌鲁克有一座神庙建在石砌的台基上，墙垣为半柱式，以彩色的镶嵌画作装饰。苏美尔早期王朝的神庙，大都建在砖砌的台基上，核心部分是一个长方形殿堂，门开在长的一边，另一端是祭坛和神龛。神庙附近有塔庙，用生砖砌成，涂以泥青，结顶处的小房即所谓“神宅”。从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500 年间各地都建塔庙，已知的不下 30 座。乌尔塔庙由 3 座大型塔楼组成，象征三大神，塔基为长方形，共分三层，总高 21 米，下面涂黑色，中间为红色，上面为白色，中央有一连延三层平台的阶梯。最壮观的一座塔庙是巴比伦城的“通天塔”，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巴别塔”（意为“上帝之门”）。据说这座塔建了 45 米还未结顶，外廊像螺旋一样环绕在塔的周围，饰以蓝色的釉砖，塔内镶嵌大量金银珠宝，共修了八层。

与神庙建筑相媲美的是宫廷建筑，苏美尔早期王朝的代表是基什的宫殿，它由两座有门楼的建筑物组成，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巷道，四周有双重围墙。古巴比伦宫殿要庞大得多，有国王的谒

见室、起居室和宾妃住室，院落为方形，在双层围墙内设有仓库、厨房、浴室和学校。建于公元前 2000 年前后马里宫殿，长 190 米，宽 130 米，大约有 220 个房间，需经过 3 个人厅、两个中庭才能到达谒见室。亚速的宫殿最为富丽堂皇，它建在一个高 18 米、长 300 米的方形上台上，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和防卫的塔楼，正面由阶梯引入，正门为 4 座方形碉堡夹着 3 个拱券形门洞，侧面有坡道可供车马出入宫中有两个大院和 30 多个小院，房屋 300 余间，布局规整。房屋用柱与拱架结构，柱身为圆柱形，柱头带冠宫殿入口处有一对人首带翼兽身像，刚劲雄伟，可从正面和侧面观看。碉楼顶部用筹集堞饰边，外面贴彩色琉璃砖，在 4 米高的石板墙裙上有许多浮雕。

城市建筑起源很早，以神庙和宫殿为中心建立起来，一般都有城墙。公元前 2100 年前后修建的乌尔城，占地 88 公顷，有城墙和壕沟护卫，又有两个港口通入河道，内有神庙、宫殿、官邸和观象台，墙外为平民住地。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有两座，一座是亚速的都城“狮穴”尼尼微，另一座是“千年古都”巴比伦城。尼尼微城建在一个山坡上，占地 7.5 英亩，狭长而不规则。城墙全长 12 公里，各边长度不一，分为内外两圈，内墙用上砖砌筑，外墙有雉堞、塔楼，墙外有濠沟。城门共 15 个，均有石兽保护，以沙玛什门最为雄伟。城内有安努和阿达德神庙，建有辛那赫里布的西南宫和巴尼拔北宫。亚速国王萨尔贡二世又在尼尼微东北修建沙鲁金城，占地 289 公顷，城为正方形，城墙高 20 米，厚 50 米，上有雉堞和可供 4 匹战车奔驰的大坡道，还设有 7 座有碉楼的城门。宫殿、塔庙及神庙建在城的西北，主要街道用大鹅卵石铺筑，城南有武器库。

19 世纪掀起了一个研究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热潮，许多考古学家涌向两河流域。1899—1917 年，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施尔德威发掘了巴比伦城，使人们得见昔日的辉煌。巴比伦，在阿

卡德语中意为“神之门”。它起源很早，在古巴比伦时代已成为两河流域最大的城市，新巴比伦国王那波帕拉沙尔和尼布甲尼撒二世时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为世界一大都市。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写道：“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可与它的辉煌相比”。这是一座四方城，横跨幼发拉底河两岸。城的周长约 11 英里，有 3 道城墙：最外层是为了防御米底人入侵而修建的长城；外城和内城均为方形，城墙长 23 米，厚 8.7 米，以日晒砖砌成，并用凸起的壁柱加固；外墙下有 20—30 米宽的护城河。共设 9 个城门，分别以保护神命名，以伊什塔尔门最为壮观，门上有 4 座望楼，彼此间有拱形过道连接，门墙上饰以蓝色琉璃砖，其上横列着黄、褐、黑三色琉璃砖组成的动物浮雕，城墙上部有琉璃砖饰带和雉堞。幼发拉底河将城区分为新城和旧城两部分，新城在河西，旧城在河东，有一座五墩大桥连通。王宫在旧城西北，由东至西并列着 5 个以拱门相通的大院，正殿庭院的墙用深蓝、浅蓝、白色、黄色、黑色琉璃砖砌成。距王宫不远有马尔都克庙，与通天塔并列，著名的“空中花园”就在王宫的东北面。旧城的中轴线是贯通南北的“圣路”，宽约 7.5 米，铺着有红色角砾岩镶嵌的石板路。

雕塑是城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神庙和宫殿的重要装饰物，其主题都围绕神权和王权，技法有圆雕、浮雕、镶嵌等，以石雕为主，也有青铜像和陶像。在泰尔·阿斯马尔的阿布神庙中发现一组圆雕人像，其中有一件高大的阿布神像和一件女神像，对面立着大小不一的祈祷者，还有 12 尊用雪花石豪雕刻的祭司跪像。尼尼微出土的阿卡德国王萨尔曲一世的头像是用青铜制成，面部塑造简练、逼真，须发独特而有力。占地亚的圆雕用花岗石雕成，表面光滑，其中有一件沉思的坐像极为精致，两眼直视，双手合胸，衣衫褶皱清晰，肌肉健壮，座椅上刻有楔形文字。巴比伦时代的一件赤陶狮头，高 2 英尺，做咆哮状，是王国

强盛的象征。亚述时代的圆雕不多，立于伊西塔神庙的一尊纳西尔帕塑像最为典型，比例为真人的一半，没有戴王冠，身披一条饰有流苏的披巾，显出庄严、坚毅的神态。在萨尔贡的罗浮宫中，耸立着两尊带翅巨牛雕像，高 14 英尺。在尼布甲尼撒的宫中，有一尊玄武岩雕像，长 8.5 英尺，它是一只雄狮践踏倒地人的雕塑。

浮雕艺术发达，使用范围颇广。被称为“鹫碑”的安那吐姆石柱是苏美尔浮雕的杰作，上层为伽什城邦国王安那吐姆率军出征的场面，下层是安那吐姆站在战车上指挥作战的情景，石碑北面刻有战神恩利尔之子宁吉尔苏，还有“狮首鹰”伊姆杜古德的形象，碑上刻有伽什战胜乌玛的条约。在沙尔马尼瑟尔城堡中谒见室的工作基座上，有一幅浮雕，刻画的是沙尔马尼瑟尔二世与巴比伦国王马尔杜克、沙克、苏米的握手像。古巴比伦时代的杰作，当推《汉谟拉比法典》柱石上的浮雕像，坐着的是太阳神沙玛什，站着的是汉谟拉比。亚述时代的浮雕最多，著名的如《亚述帝国战争》浮雕、《猎狮》浮雕、《祭献贡物》浮雕、《战后休息》浮雕等。这些浮雕的主题是国王，场面大，形象多，构图宏阔，刻画精致，说明这一时期的浮雕艺术有了明显进步。在尼尼微的亚述宫殿中发现了一件浮雕，描绘的是国王巴尼拔躺在床上，王后坐着与他对饮，有许多仆人为他们轻摇叶扇，周围长着棕榈树和葡萄藤，还有鸟儿在飞。在另一块石碑上，刻画着巴尼拔头顶一篮泥土，亲自参加神庙的修建。在尼姆鲁德西北宫有一幅浮雕，描绘的是亚述王纳西尔帕三世的两个雕像，他们面对一株奇异的圣树祈求，神灵右手持松杖，左手拎着一只小桶，而国王作为高级祭司向神灵举手向头行礼。西北宫的浮雕中，还有一幅生动的狩猎图，国王纳西尔帕二世在坐骑上瞄准一头向他进攻的狮子射箭，马车夫赶着马向前飞奔，马脚下有一头被射死的狮子。

7. 精巧的工艺制造

《汉谟拉比法典》中提到十多种工匠，如：制砖工、织麻工、刻石工、珠宝工、冶金工、皮革工、木工、制船工等，结合大量泥板文书的记载，大体可知两河流域自公元前三千纪开始手工业便发展起来，到巴比伦、亚述时代已有一定水平手工业中，值得注意的是玻璃制造，因为它的配方、烧制、成型都涉及许多复杂技术，而巴比伦和亚述竟然能生产各种颜色的玻璃，并制成玻璃砖和多种玻璃器皿，的确令人感到惊叹。玻璃广泛运用于建筑，据说亚述国王巴尼拔对其用蓝色和红色玻璃砖修建的新年教堂感到骄傲，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也以蓝色玻璃砖修建的埃萨吉拉神庙感到自豪。日常生活用品的制造非常广泛，他们用亚麻和羊毛制成纺织品，掌握了柔革技术，用芝麻榨油，能精炼食盐，能酿造葡萄酒，还能生产香水、肥皂、苏打等等。不过，这些东西都很难留下遗物，也很难知道当时的制造工艺，因而只能言其大概。近两个世纪的考古使人感到震惊，出土的陶制品、青铜器、印章、金首饰、象牙雕刻及乐器，雄辩地说明美索不达米亚的工艺制造极其精巧。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陶器中，有几件珍贵文物，有一只粘上的小塑像是公元前 2300 年的作品，塑的是一匹鬃毛平伸的马，长度不足 1 英尺，口套处钻有一孔供系缰绳之用，是驯养马匹最早的实物见证。在马里的济姆里利姆王宫，发掘了一尊黑陶造像，主人翁是国王伊西塔普—伊拉姆，时代是公元前 2100 年。这尊陶像，蓄有胡须，双手握于胸前，赤足，是当时典型的膜拜姿态。另有一只赤陶浮雕的伊西塔女神像，轮廓清晰，线条柔美，赤身裸体，双足像鸟的翅膀一样，与一般的伊西塔女神像不同。大约在距今 3350 年的努济城遗址中，出土了一件赤陶的野猪头像，嘴筒特长，似乎还没有被人驯化。与此大致同一时代，在卡

拉发现了一个釉陶面具，两眼大睁，戴着琉璃珠子，是亚述时代玻璃制造兴起的一个有力证据。在巴比伦遗址中出土了一尊赤陶小雕像，塑的是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形态生动、逼真最引人注目的是神庙门前的一尊赤陶雄狮头，有 2 英尺高，头部昂起，双眼圆睁，张口咆哮，是两河流域最具特色的雕塑。

青铜器中有几件珍品，足以说明两河流域的铸造技术最具特色的是胡里安人留下的一尊小青铜像，铸的是一头咆哮的狮子，突兀站立，两支前脚搭在一个平台上，很有气势。另一件是巴比伦神马尔都克造像，看去像一条长角的龙蛇，很可能是“权杖”顶端的饰物。在一段弯曲的铜板上，铸造了两幅战争图画，上幅是沙尔马尼瑟二世驾战车出征的情景，下幅是他对哈萨人屠杀的惨状。在亚述的废墟中发现众多的青铜武器，其中有青铜顶饰、头盔、长矛祈求者青铜小雕像是汉谟拉比末期的作品，祈求者大概就是汉谟拉比本人，单足下跪，一手贴胸，一手上举，两眼凝视，脸上和手上还贴有金箔在一个青铜杯状的基座上，铸造了两位神祇合捧着一只碗，它的上方是三头跃立而做扑击状的山羊，看来是以山羊做牺牲敬神的写真。

印章是一种精致的工艺品，用以证明人的身份。最初的印章只是在卵石上刻下简单标记，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出现了圆筒印章，体积通常很小，多为凹雕形式多数印章是用宝石制成，也有用金属、玻璃、象牙、硬木或粘土做成的印章虽小，而图案却变化多端，雕刻细致到非常惊人的地步，有的需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分辨清楚有一颗未完成的巴比伦印章，上面刻着两个人物，中间是戴着角状头饰的太阳神，还留下石钻和铜钻的痕迹。为了在坚硬的材质上钻孔，使用了如同埃及的弓钻，拉动弓弦使钻头飞转。有一只用红玉刻成的巴比伦印章，刻画的是一个生有两对翅膀、身穿羊毛服饰的神祇，侧面是被他打败的三只鸟状精灵。还有一只蓝玉印章，描绘了一个宗教仪式场面，一枚绿石的

印章，绘有耕牛归栏图。另一枚水晶石金顶印章，描绘了一个赤身裸体的英雄与一头发狂的水牛搏斗。

考古学家们在古墓中发掘了一批金首饰，有金冠、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等，大多镶嵌着宝石、玛瑙或天青石、绿松石。在巴比伦出土了一条 200 多块金碎片拼接而成的金项链，上面有 7 个代表神祇的垂饰：新月代表月神欣，辐射状圆盘代表太阳神沙玛什，两个女神像代表守护神拉玛，叉状闪电代表风暴神阿达德，有玫瑰花形状的圆盘象征伊西塔女神。在亚速首都发现了一条用蓝色天青石和橙色光玉髓珠子组成的项链，天青石是从阿富汗进口的，光玉珠子来自印度。又在尼姆鲁德的一处工后墓中发现了一件垂饰，四周用黄金颗粒镶边，中间是一幅用宝石镶嵌而成的棕榈树图，象征圣树。尼姆鲁德的石棺中出土了许多金首饰，其中有一件项链悬着 28 个垂饰，在由金颗粒组成的挂链上镶有宝石，项链的接合处是两个相互缠绕的动物头扣。墓中还发现 72 副耳坠，其中有一副是由吊在半月形钩上的松花组成。最精致的是一顶由 1 英寸宽的金瓣构成的王冠，金瓣编成人字图形，上面镶着宝石，后面的带子末端的流苏作垂饰。另一顶金冠上镶着三排金玫瑰，金手镯由两个半圆形构成，上有凸纹，可以开合。另有一只 3 英寸高的微型金瓶，壁上有许多凹槽，并有金链作装饰。金碗也极精巧，口沿大，中间收缩，下部外突。

在尼姆鲁德出土了数千件象牙制品，时代是公元 8—9 世纪。有一件女人雕像，被称为“尼姆鲁德的蒙娜丽莎”，面带笑容，脸上贴金。在一对家具的牌匾上，刻画着一头母狮猛扑牧羊人的情景，牧羊人的卷发是用象牙雕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身女妖雕像，它张着双翅，爪下握着两具山羊尸体，两边有秃鹫啄食山羊。背贡品人的立体雕像也极生动，他牵着一支羚羊，左肩上扛着一只猴子，右肩上披着一张豹皮。

两河流域盛行歌舞，石柱和石碑上常刻有音乐表演场面，乐器种类繁多。在乌尔国王的墓中掘出了公元前 3000 年的 9 架里拉琴，上有金银和青铜的公牛头饰，以赛克彩石镶边，工艺极其精巧。竖琴架以牛头为饰，牛头用青金石和金箔制成，琴身是黄杨木做的。还有一种“婉妙的三头琴”，它是一种“使人心旷神怡”的三弦乐器。阿卡德时代出现了一种棒状长颈和特小音箱的琉特琴。古巴比伦时代有一种三角竖琴，亚速的三角竖琴有水平式和垂直式两种，水平式竖琴有 8—12 根琴弦，垂直式竖琴有 15—22 根琴弦。吹奏乐器有双簧长笛，小号、哔啷器等。打击乐器有框式鼓、对击棒、对击板、饶钹，还有圆筒形鼓、漏斗状鼓、箭式状鼓、锅状鼓等。乐器的制作，不仅工艺精美，更重要的是音乐效果，精通音律，还要考虑各种乐器的配合，因而在艺术制造上尤其讲究。

8. 苏美尔神话《吉尔伽美什史诗》和寓言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上空，仿佛笼罩着一个神灵世界，主宰着世间的一切。对大自然的崇拜与恐惧，使人们幻想出许多稀奇古怪的神，如主宰天空的安努，掌管赐福与降灾的风神恩利尔，生育女神宁胡尔萨格，土地之神恩奇，月神南那，太阳神沙玛什，风暴神阿达德，水神基比乐产努斯库，还有冥府之神埃里什基伽尔等等。起初的神，大都形象狰狞，是自然物某种威力与特征的幻影，显得特别怪异。后来渐渐人格化了，具有人形而伴以非人的特征，而神界则成了人间在天上投影，于是安努成了天上的“父王”，宁胡尔萨格成了“众神女王”，土地之神恩奇成了主管吉凶祸福的主神，与安努、宁胡尔萨格合称三大神。太阳神沙玛什的职权也伸向人间，变成了掌管审判的神，所以《汉谟拉比法典》的碑柱上出现了它的形象，象征着君王的权力，故汉谟拉比自称是“巴比伦的太阳”。随着世俗权力的增长，胜利者的部落

保护神也上升到统治地位，例如，巴比伦之神马尔都克、亚速之神阿淑尔

虔诚的信仰，丰富的幻想，唤起了人们无尽的创作激情，并给文学艺术套上一个神秘的光环，产生许多极富魅力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 20 多部神话集，9 部史诗，100 多首赞美诗，还有大量的寓言、格言和哀歌。最耀眼的莫过于《圣经》故事，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世界名著《伊索寓言》中也有不少素材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美国学者克莱默教授说：“本世纪人类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恢复、翻译和注释了大量苏美尔文学文献。”让这些古老而珍贵的文学遗产重新放出光芒。

《圣经》的故事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激动着许多人的心，然而，不少脍炙人口的故事都来源于苏美尔和阿卡德神话。“天堂”的故事源于恩奇与宁胡尔萨格的神话，在这里把“天堂”称为“底尔蒙”，被描绘成“洁净”、“无秽”、“光明”的胜境，是“生者的境界”，可以在这里获得永生。“洪水滔天”的故事也不是希伯来人幻想出来的，它的原作者是苏美尔人，据说众神决定发起一场洪水，“毁灭人类的种子”，国王兹乌苏德拉乞求安努和恩利尔，得到神的启示，造了一支大船，拯救了人类。《圣经》中的《创世纪》，也是巴比伦妇孺皆知的神话传说，据说恩利尔将混沌的大海分开，一半是天，一半是地，于是在穹窿状的天空中悬挂着太阳、月亮和星星，而在大地底下却是暗无天日的魔鬼巢穴。《圣经》中的“伊甸园”，实际上是在两河流域，在苏美尔语中，“伊甸”就是“平原”或“草原”。不过，在苏美尔神话中，引诱亚当和夏娃犯“原罪”的不是蛇，而是天神埃亚。女神“宁姬”在苏美尔语中有“来自肋骨的女人”之意，这大概就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捏成夏娃的最早说法。《圣经》中提到的巴比塔，其实就是巴比伦城马尔都克神庙的寺塔，它给作为“巴比伦之囚”的犹太人极大痛苦，所以把它称为“诅咒通天塔”。

大概是在苏美尔人的“英雄时代”吧，产生了三个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他们是吉尔伽美什、恩美尔卡和卢伽尔班达，他们的名字都记在《苏美尔王表》上。这三个英雄人物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下来，后来被人们写成 9 部史诗，其中有 5 部是描写吉尔伽美什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便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这部史诗在苏美尔—阿卡德时期已成雏形，古巴比伦编定成集。全诗刻在 12 块泥板上，每块 300 行，总共 3500 行，分为前言和正文两部分。前言的标题为“乌鲁克之王吉尔伽美什”，描写这位英雄的生平事迹。正文分为“恩奇都的降临”、“森林之行”、“伊什塔尔与吉尔伽美什和恩奇都之死”、“吉尔伽美什寻求永生”、“洪水故事”、“归途”及“吉尔伽美什与恩奇都幽灵的对话”等七个篇章。用诗的语言来歌颂这位半神半人的英雄人物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史诗，故事情节充满神话色彩，而写的却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断面，实为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惊人之作，先于希腊的《荷马史诗》两千多年。

震撼人心的爱情诗在苏美尔时代已经产生，写的是国王与女神纯洁、优美的爱情故事，采用大量的比喻手法和重复、排比句式，富有感情色彩和感染力，可惜只留存两首。诗歌中为数众多的是赞美诗，它有鲜明的祭祀色彩，用于庆典仪式上，著名的有《宇宙主宰恩利尔赞歌》、《沙玛什赞歌》，目的是歌颂神灵的伟大，祈求保佑。《宇宙主宰恩利尔赞歌》，歌颂的是“众神之父”恩利尔，宣扬他赋予天地万物生命的强大威力，说他“感召值得信任”、“指示明察秋毫”，是普天之下“惟一之上”。《沙玛什的赞歌》长达 200 行，歌颂他光照大地，驱散黑暗，主持公道，是一个“正义之神”。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诗歌中，还有一种思想境界较高的哲理诗，《咏受难的正直人的诗》是“关于人类苦难这一古老而现实问题的最早记录”，可与《圣经》中的《约伯记》相提并论；《巴比伦的神正论》采取受难者与朋友对话的形式揭

露现实社会的不公平，《主人与奴隶的悲观对话》用幽默的手法讽刺现存的主仆关系。

一般人都把伊索看成是寓言的首创者，把《伊索寓言》奉为动物寓言的始祖，其实，在这部世界名著问世之前一两千年，这样的寓言在苏美尔和阿卡德已是屡见不鲜，《伊索寓言》的许多原型在这里都可找到。在已翻译出来的大量寓言之中，涉及动物的寓言就有 64 种，包括牛、羊、马、驴、狗、狐狸、狼及鱼和虫。《锄与犁的争论》这一则寓言，以锄向犁的挑战开始，双方自我标榜、炫耀，展开激烈争论，最后以锄的胜利告终，显示人类无穷的创造力。《冬与夏的争论》，以代表冬天的恩腾和代表夏天的埃美什相互争执为线索，各自陈述自己的价值，最后是忠实的农神战胜了埃美尔，建起了一座座粮食堆积如山的农庄。动物寓言饶有风趣，生动活泼而思想深刻，这里有两则表现狗贪婪无比的寓言，有一则刻画狐狸胆小、怯懦而又骄傲自大的寓言，还有一则赞扬弱者以其智慧战胜愚蠢、凶残“强者”的寓言，名为《狮子与母羊》。寓言反映了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知识丰富，有敏锐的洞察力，思考问题深刻，而且善于借物寓事，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一大结晶，并在格言和谚语中也一再表现出来。

（二）持续三千年的金字塔国家埃及

从美索不达米亚往西走，越过西奈半岛，便到了另一个“文明古国”——埃及。“埃及”（Aekaptah）一词，是希腊人对古埃及国都孟斐斯的称呼，意为“普塔神灵之宫”。阿拉伯人把它叫做“米斯乐尔”（Misr），意为“开罗”或“辽阔的国家”。据此，中国史籍上把它称为“米西尔”、“密昔尔”或“密思儿”。古埃及人并不这样称呼他们的国家，而是称为“凯麦特”（kimi），意思是“黑色的土地”，明显地与周围的“红色土地”（沙漠）区别

开来。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角上，北临地中海。它的东面是红海西岸的阿拉伯沙漠，西面是利比亚沙漠，南面是难以通行的尼罗河瀑布群，只有东北方向有西奈半岛与西亚相通。在这个干燥地带流淌着一条世界著名的大河——尼罗河，长达 6500 公里，其上源是发源于中非的白尼罗河和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热带雨林地区的青尼罗河。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滔滔的河水给埃及带来了丰富的水源，带来了农耕，带来了古老的文明。尼罗河定期泛滥，在入海处形成了泥沙冲积而成的尼罗河三角洲，习称下埃及，孟斐斯以南是尼罗河谷地，习称上埃及。

如果说美索不达米亚是西亚走廊要冲的话，那么，埃及却是一个“死角”，它四周为海洋、沙漠、瀑布环绕，显得相对闭塞。正是这个原因，埃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少受到外来的干扰，因而政权的稳定性远远大于美索不达米亚，从早期王朝到埃及灭亡持续了 3000 年，大体可分为前王朝、早期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及后期王朝几个时期。

这个文明古国在公元前 3500 左右就露出了熹微的晨光，很早就有了国家，有了文字，有了宗教。这里有千百年来让世人着迷和赞叹的金字塔，有凝眸眺望、守护“死亡之城”的狮身人面像，有高大的阿布·辛博大神庙，还有“会说话的门农”。埃及是古老科学的重要发源地，后来成为世界“公历”的太阳历就是埃及人创造的，埃及是几何学的开创者，几千年不朽的“木乃伊”至今仍使人感到神秘莫测。然而在埃及灭亡以后，这个古老的文明突然在历史上消失，直到 18 世纪才渐渐露出尊容，使这个古老文明“起死回生”，困惑人类几千年的疑团才逐步解密。

1. 打开埃及之门

在 18 世纪以前，人们除了对着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发呆和感

叹而外，似乎很难说出更多关于埃及的史事。在人们心目中，埃及只是一个“沙漠中的迷宫”，让人有许多困惑不解从拿破仑远征埃及起，埃及的大门渐被打开，一个个疑团慢慢消散。“发现埃及”成为近两个世纪的热门话题接二连三的考古新发现引导人们走进埃及，看见了一个古老而又辉煌的文明。支撑“埃及学”建立的有两大支柱：一是实实在在的考古资料，二是对古埃及文字的解读。

1798年，拿破仑率领大批军队和战舰远征埃及，他指着高高耸立的金字塔说：“士兵们，从这些金字塔的顶上，4000年的历史在注视着你们！”这次远征，在军事上虽然遭到彻底失败，但在文化上却取得了一个预想不到的丰硕成果。他带去了一个由175名专家组成的“科学艺术考察团”，想要揭开“东方美人”朦胧的面纱，探寻被岁月淹没了的埃及文明。当拿破仑的军队在罗塞塔附近修筑要塞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通黑色磨光的玄武岩石碑。上面刻着三段铭文，其中第三段是希腊文，记的是托勒密五世的一道诏书，另外两段铭文根本无人认识，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古埃及文字的极大兴趣。在军中，有一个法国外交官名叫米尼格·维万·德农，他对埃及情有独钟，不停地用他手中的画笔描绘埃及，还写了一本题为《远征时期的下埃及和上埃及》的书，把一个活生生的古埃及展示在现代世界面前。1802—1813年陆续出版的《埃及行记》是一部惊世之作，它是考察团的集体成果，主编是弗朗索瓦·若玛。这部巨著有24卷文字和12卷图录，问世后轰动欧洲，其价值完全可以同特洛伊的发现、尼尼微的考古相提并论。

在此之后，欧洲出现了“埃及热”，许多学者、考古学家、冒险家、古董商、盗墓贼涌向埃及掠夺和盗窃使古埃及文明变得凌乱和支离破碎，然而埃及之谜也渐被揭开，意大利冒险家贝尔佐尼、德国文物分类家莱普西亚斯、法国考古学家马里埃特、

英国埃及学家佩特里等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19 世纪末，埃及学走出了早期探险寻宝的阶段，进入了一个有计划进行科学考古和整理文化遗产的阶段。首先倡导保护文化遗产的是马里埃特，他从 1857 年开始在埃及各地组织大规模发掘，先后发掘了塞拉皮雍神庙及萨卡拉、萨莱、底比斯、阿拜多斯、图拉、曼底斯等十多处遗址，在爱德福、底比斯、阿拜多斯、孟斐斯建立文物管理中心，在布拉克建立埃及博物馆。以严谨的科学方法进行埃及考古的第一人是皮特里，他不仅发掘了瑙克拉里斯城、卡洪城、阿瓦尔纳等几十处重要遗址，成为当时发现最多的考古学家，而且开创了“顺序定年法”，在考古学上划开了一个时代，使埃及考古沿着科学而有序的道路前进。

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孟斐斯的地下神牛墓、德尔巴哈里的国王谷、图坦卡蒙的陵墓和塔尼斯的王室墓穴，被誉为“埃及学四大重要的考古发现”。孟斐斯神牛墓是 1851 年发现的，先是马里埃特偶然在沙堆中发现了狮身人面像，然后沿着两列巨像走到尽头，找到了塞拉皮雍神庙的遗址，从神庙中取出了公牛雕像。他们在这里挖出了一个地下建筑，它由几条相互交叉的长廊组成，共有 64 间墓室，墓穴中有花岗岩制成的巨大石棺，棺内是一头涂上防腐香料的牛，还发现了大量壁画、浮雕和小雕像，证实了希腊史家狄奥多斯关于埃及葬牛的说法。1881 年又有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在底比亚西岸德尔巴哈里的峭壁上发现了一批隐藏 2000 多年的墓穴，它们是拉美西斯二世及其子孙们的安息之所，被称为“国王谷”。在此之前，长期令考古学家们尴尬的是，在任何一座金字塔里都没有发现已故法老的尸体，而在国王谷却找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清点的结果，这里集中了 40 具木乃伊，他们是国王的遗骸有人说：“如果德尔巴哈里墓室的发现是一部悬念叠起的侦探小说；图坦卡蒙墓穴的发现，就可以成为一部好莱坞神秘恐怖的影片题材了。”1922 年，考古学

家霍华德·卡特发掘了埃及十八王朝国王图坦卡蒙的陵墓，欣喜地找到了这位年轻国王的金棺，随葬品令全世界震惊。这里有珍贵的珠宝箱、雪花石膏瓶、带狮头的金躺椅、豪华的金战车，还有几座形状怪异的神龛和两尊身穿金裙、脚踏金履、头上盘着眼镜蛇的雕像，后来举办了图坦卡蒙墓随葬品环球展览，再次掀起“埃及热”的高潮。1939年，法国考古学家皮埃尔·蒙太特又在塔尼斯发现了第二十一王朝和第二十二王朝的陵墓，出土了银棺、金面具、首饰及大理石器具等，使沉睡了几千年的法老“重新复活”。

真正打开埃及之门的钥匙是罗塞塔石碑的破译，由此找到了释读古埃及文字的途径，真正走进了文明古国埃及。罗塞塔石碑中的希腊文虽然已经被译出，但其他两段铭文却一直无人知晓，许多学者试图用图画文字来做解说，甚至想借助汉字去释读它，结果都走入了死胡同。成功破译罗塞塔古碑的是法国的学者商博良，他对古文字颇有研究，在深入研究东方文字的基础上，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某些文字符号反复出现的规律性，认定古埃及文字既不是纯粹的表意文字，也不是单纯的表音文字，而是表意与表音结合的文字。他从人名入手，参照其他碑文和世俗体文字符号，抓住专有名词这一线索，进一步研究这种文字系统，终于成功地译出了罗塞塔古碑，于1822年公布他的研究成果。罗塞塔古碑的释读，使人们有可能通过文字记载真正了解古埃及文化，从而创立了埃及学，而商博良则被尊为“埃及学之父”。

埃及被阿拉伯人征服后变成了“阿拉伯埃及”，以往的古埃及文字也随之而变成了“死文字”，早已被人遗忘。自从找到了释读古埃及文的途径，研究日益深入。埃及文字的出现或许稍晚于苏美尔，至迟在公元前3100年以前就已经有了。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古埃及文有三种字体，即碑铭体、僧侣体和人民体。碑铭体又称圣书字，以优美的图形刻在石碑或祭器上，行款自左而

右，自上而下，它有代表事物的意符，有表示声标的音符，还有表示特定类别意义的定符，保持着繁复的结构体系。僧侣体比碑铭体更不容易辨认，它是僧侣们用笔在莎草纸上写成的草书，适用于速写，先是与碑铭体并用，后来主要用于宗教读物。人民体又称书信体或上俗体，它是由僧侣体简化而成，在民间广为流传，写在莎草纸上，到托勒密王朝时期成为最重要的字体，连僧侣们也采用了它。古埃及文字流行了 3000 多年，但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并没有广泛流传，主要在埃及地区，因而没有像两河流域那样构成一个“楔形文字圈”，仅在麦罗埃文和柯普特文中留下一些痕迹。有学者认为埃及文对腓尼基文产生重大影响，这或许是从音符这一点着眼，但目前还没有充足证据可以说明，有待进一步研究。

塞罗塔碑的释读使“埃及学”得以建立，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努力，许多遗址陆续发现，许多文物重现于世，大量有关埃及的考古报告、文献、典籍相继出版，古埃及的图象渐渐凑合起来，历史面目逐渐由模糊走向清晰。以丰富的文物、碑刻、纸草文书为基础，运用现代科学方法重新谱写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确立埃及史的分期。今日的埃及学已经走向成熟，新发现、新成果不断涌现，寻找失落的城市，寻找失落的战争，探索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及木乃伊的奥秘，至今仍然是世界文化的一大焦点埃及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已经越出埃及，关系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法老的复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人类假如想看到自己的渺小，并不需要仰视繁星密布的无限苍穹，只要看一看在我们之前几千年就存在过、繁荣过，而且已经消失了的古埃及文明就足够了。”古埃及的文化遗产属于全世界，更多的人已意识到古埃及是世界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地中海文明的重要源头，它不仅对于东方，而且对西方文明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要想弄明白希腊、罗马文明得以兴起

繁荣的原因，绝对不能忘记东方，不能忘记美索不达米亚，不能忘记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国家——埃及。

2. 从早期王朝到埃及新王国的历史

埃及的史前文化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奥杜韦文化，往后是阿舍利文化、比尔撒哈拉文化、勒瓦娄哇文化。大约在公元前 7000—前 4500 年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并向铜石并用时代过渡。这一时期主要有南北两大文化群：下埃及文化群包括麦里姆达文化、奥玛里文化和马阿底文化；上埃及文化群包括塔萨文化、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和涅伽达文化等。

现代的埃及人绝大部分属阿拉伯民族，他们是 7 世纪以来阿拉伯人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的产物。那么，古埃及人是何种民族，他们操何种语言呢？这也是埃及学苦苦追寻的一个历史悬案。古埃及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的辩论，从 1874 年就开始了，但直到现在还是一个难解之谜。希腊学者如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等把埃及人描写为尼格罗人，《圣经》中说是哈姆人，埃及人自称“凯麦特”，含有黑色的意思。有一尊《拉霍太普夫妇》雕像，是埃及第四王朝初期的作品，拉霍太普的皮肤为棕褐色，其妻的皮肤为浅黄色。在阿布·辛博遗址中发现一幅壁画，有一列战俘肯定是黑人，而另一列战俘的种族却很难断定。据此，学术界多数倾向于古埃及人很可能是东非和西亚的多种血缘，主要特征是体格强壮、肤色深暗、头发黝黑而有光泽。关于他们的语言，一般倾向于塞姆—哈姆语系中的闪米特语，但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与现在通行的阿拉伯语没有关系。

公元前五千纪尼罗河畔已兴起农业，到公元前四千纪出现了铜器，大约是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在灌溉农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城市。从城市出现开始到埃及统一之前是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时期，史称“前王朝的时期”。希腊语称这种小型原始国

家的中心为“诺姆”，指的是一个不大的行政区域，中国译为“州”。它实际上是由氏族演变而成的农村公社，有自己的灌溉系统和管理公众事务的行政机构，有各自的图腾和保护神，有世袭的首领、军队和旗帜，彼此经常发生械斗。那时称为“诺姆”的很多，已知的约 26 个，涅伽达城和希拉康坡里斯城当是较早的城市。大约在公元前 3500 年前后，在尼罗河三角洲形成了以布陀为中心的下埃及王国，国王戴红冠，以蛇为保护神，以蜜蜂为国徽。与此同时，在尼罗河谷形成了以尼赫布特为中心的上埃及王国，国王戴白冠，以神鹰为保护神，以百合花为国徽。上、下埃及对峙五个世纪，经常发生战争。

公元前 3000 年左右，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都孟斐斯，称为“白城”，从此进入了“早期王朝”时代（公元前 3000—前 2700 年）。早期王朝包括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前后约 300 年。早期王朝建立的基础是作为埃及生命线的灌溉系统，王朝把管理全国的灌溉网络为首要任务，并以此来夸耀国王的政绩，美尼斯的一大功勋就是修建孟斐斯城外的大堤和水库。早期王朝初步建立了专制国家的基础，在国王的名字前冠以各种尊号，并渐渐尊称“法老”，意为“宫殿”。为了表示国家的统一，国王时而戴白冠时而戴红冠，并建“红仓”和“白仓”分别贮藏上下埃及的租税。军队无疑是维护统一的重要力量，并发动对努比亚、利比亚的战争，累次进攻西奈半岛，掠夺奴隶和财富。

公元前 2700 年，萨那克特平息了下埃及的反抗，建立了第三王朝。第一至第六王朝的 400 年间，埃及的专制国家最终形成，史称“古王国时期”（公元前 2799—前 2160 年）。法老直接统率军队，任命宰相及各州长，从第五王朝开始法老自称是太阳神之子，大臣朝见法老必须匍匐在地。宰相是法老的助手，总管行政、司法、财政和档案，从第四王朝起以太子为宰相。第四王朝法老斯尼弗鲁对南方邻近部落进行战争，第五和第六王朝多次

征讨努比亚、利比亚，强迫被征服的民族纳税、服役，使之成为“尽人皆是的奴隶”。这一时期的经济有较大的发展，第五王朝曾多次派兵船到腓尼基进行贸易，第六王朝在努比亚采石。古王国时期最宏伟的工程是修建大量金字塔，成为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在当时的条件下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富，势必要破坏经济、激化矛盾，所以往后的金字塔越修越小，到第六王朝末期已处于崩溃。第七王朝至十王朝的 200 多年中，地方各自为政，彼此攻伐，统一的局面破坏，称为“第一中间期”（公元前 2160—前 2010 年）。

在混乱中又渐渐归并为两个中心，即北部的黑拉克列欧和南部的底比斯。公元前 21 世纪，第十三王朝重新统一埃及，到第十二王朝时臻于强盛，史称“中王国时期”（公元前 2106—前 1786 年），前后 300 多年。这一时期灌溉工程扩大，矿产开采兴起，特别是努比亚金矿和西奈半岛的铜矿，造船业也有发展。中王国对外进行扩张，主要目标是产金的努比亚和产木材的叙利亚。埃及船只这一时期远航地中海，与腓尼基、克里特岛往来密切，还开辟了穿越红海的航线，并在努比亚开凿运河。从公元前 1750 年起，国内起义不断，长达 80 余年的战争动荡削弱了第十二王朝的统治。正在此时，来自亚洲的游牧部落喜克索斯人乘机入侵，他们在阿瓦利斯建立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统治埃及一百多年，是为“第二中间期”（公元前 1786—前 1550 年）。喜克索斯人很快接受了埃及文化，同时也带来了养马技术和使用马车作战。

在反对喜克索斯人的斗争中，底比斯建立了第十七王朝，经过多次战争把喜克索斯人逐出埃及。公元前 1584 年第十八王朝重新统一埃及，从此进入了“新王国时期”（公元前 1550—前 1067 年）。新王国包括第十八、第十九和第二十王朝，历时 480 余年（公元前 1567—前 1085 年）。这是埃及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其重要表征就是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而出现。整个帝国像是一座庞大的金字塔，法老居于塔尖，将全国分为南北两大政区，分别设宰相管理土地、灌溉、赋税、徭役，民政多由军事长官兼领。高度的中央集权不仅靠军队和官僚机构支撑，而且借助神的威力，将法老神化，埃及第一女王哈特舍普苏宣称她是阿蒙神之女，第十八王朝的统治者称为“图特摩斯”，意为“托特神所生”。图特摩斯三世的五个头衔表明，他出身于底比斯的“公牛”，像太阳在天空一样持久，有实力强大的神圣权力，是太阳神“拉”活着的形式，是上下埃及之干。第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扩建了卡纳克的阿蒙神庙，还在底比斯建造了一座更加宏伟的拉美赛神庙，在尼罗河的悬崖上开凿石庙，庙前有拉美西斯的巨型雕像，自此以后，修建神庙和巨像遍及埃及各地。

争霸西亚是新王国时期最突出的大事。新王国不但有步兵，还建立了骑兵、战车兵和海军。第十八王朝争夺的重点是西亚，图特摩斯二世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他 8 次攻打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在美吉多之战胜利后直抵黎巴嫩山南麓，亚速、巴比伦和赫梯都不得不向埃及纳贡，还西侵利比亚、南侵努比亚，兵力直达尼罗河第四瀑布。拉美西斯二世时，小亚细亚的赫梯强盛起来，侵占了叙利亚，成为埃及新王国的劲敌，于是双方展开长达 16 年的战争。较量的结果，埃及失败，于公元前 1296 年被迫与赫梯签订和约，将叙利亚大部分土地划归赫梯。拉美西斯二世是埃及军事帝国最后一个强有力的法老，然而也是埃及极盛而衰的转折点，兴盛 200 年的军事帝国在此之后便日渐衰落。

在争霸西亚的同时，新王国还进行了“黄金外交”，扩展陆上和海上贸易范围。伴随着征服者的足迹，商人活跃于地中海。从腓尼基、叙利亚输入各种农产品和工艺品，从黎巴嫩输入木材，从塞浦路斯输入铜，从赫梯输入铁器，并与亚速、巴比伦开

展贸易，从南方掠取黄金、象牙、香料、贵重木材和奴隶。值得注意的是，新王国的船队在这一时期活跃于爱琴海各岛，向那里输出黄金、象牙、手工艺品及陶器，在埃及与爱琴海之间形成一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促进了爱琴海文明的兴起。由于对外贸易的需要，埃及出现了金属货币，以银为等价交换物，其重量单位为“德本”。

由于神权地位的抬高，祭司阶层势力膨胀，竟至造成对王权的威胁，于是出现了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用传统的太阳神崇拜对抗阿蒙神。他宣布宇宙唯一的神是“阿吞”，并将自己名字中的“阿蒙”二字废除，改名为“埃赫那吞”，意为“阿吞的奉事者”。他把都城迁出底比斯，在阿玛尔纳建立新都，称为“埃赫太吞”，意为“阿吞的视界”。他的改革依靠新起的军事阶层“涅木虎”（意为“孤儿”、“贫民”），然而在祭司们的激烈反对下终于失败，他本人被骂成“天下的罪人”。王族与僧侣之间的斗争在新王国后期尖锐异常，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削弱，因此在与赫梯签订和约之后，埃及一蹶不振。第二十二朝过去之后，埃及处于分裂状态，再也没有实现过统一。

第二十一王朝至第二十五王朝是所谓“第三中间期”（公元前 1069—前 656 年），其间有埃及人建立的第二十一王朝，比利亚雇佣兵首领建立的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王朝，下埃及居易斯人建立的第二十四王朝，还有努比亚人建立的第二十五王朝。从第二十六王朝到第三十一王朝，埃及有过短暂的复兴，其中第二十七和第三十一王朝为波斯人所建，史称“后期王朝”（公元前 664—前 332 年）。公元前 525 年，大流士征服了埃及，把它变成了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 332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远征埃及，后来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公元前 332—前 30 年），古老的埃及文明至此终结。罗马帝国统治埃及 400 多年，到了公元 642 年埃及又被阿拉伯帝国征服，从此成为阿拉伯人的家园，关于埃

及的往事渐渐被人们遗忘，惟一没有被滚滚黄沙淹没的就只有那高人的金字塔了。

3. 神灵庇护的国度

古埃及文明，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神秘莫测，高大的金字塔，不朽的木乃伊，神奇的狮身人面像，古老的文字，还有许多千古之谜。这种神秘来自于它的古老，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太为遥远，许多事情难以理解。这种神秘也来自它的独特，在世界其他地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何况，这些“失落的文明”沉睡了几千年之后，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叫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然而，真正使人感到神秘的却是它蒙上了一层宗教的面纱，看不清楚，说不明白。要解开埃及之谜，非从宗教信仰入手不可，只有这样才能懂得它的历史、它的政治、它的文化，真正走进埃及。

埃及国家起源很早，在人类刚从“野蛮”向“文明”的时期，不免带着浓厚的原始胎记。混沌初开，人对大自然感到莫名的神奇，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在敬畏与恐惧、感激与无奈、好奇与幻想的复杂心态下，对各种自然物都崇拜，抓住某一特征把它虚化为神，于是在人们头脑中便有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神祇。埃及史上有所谓“神工制”，勾勒的大概就是这个“洪荒时代”的图景。不过，各地自然环境不同，崇拜的神也不一样。在埃及神话中，赫利奥坡里斯、赫尔摩坡里斯和孟斐斯三地传说的神谱都不一样，故事也不相同。譬如：赫利奥坡里斯有九大神、九小神，赫尔摩坡里斯是 4 对夫妇组成的八神团，孟斐斯九神的成员无论名称、功能都有别于赫利奥坡里斯的九大神。有生命的东西最富神秘感，特别是那些有灵性而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动物，它们不但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而且往往被误认为与自己有某种亲缘关系，于是产生“图腾”，被当作氏族、部落的徽标，所

以，埃及神祇中有不少动物，如狮子、兀鹰、蝎子、隼鹰、蛇、鳄鱼、甲虫、公牛，还有“蝎王权标头”。

不过，在众多的神祇中，渐渐分出主次、大小，那些对埃及意义重大的自然神在信仰中被抬高到主神的地位，而且超越时空，普遍受到崇拜，延续了几千年。太阳和尼罗河对埃及实在太重要了，它们是埃及的灵魂与脉搏。埃及炎热干燥，经常是烈日当空，它的存在最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编出许多神话。万物生长靠太阳，很自然被理解为世界的造物主，因而成了至高无上的大神。日出日落，循环不已，这更使人感到神秘莫测。埃及人对太阳的观察是很仔细的，他们把太阳的不同形态看作是不同的神。赫利奥坡里斯是古埃及崇拜太阳的中心，他们把正午的太阳神称为“拉”，把傍晚的太阳神称为“阿图姆”，把清晨的太阳神称为“岂梯”。各种形态的太阳模糊集合起来，最后归结为太阳神“拉”，并赋予它“惟一创造者”的职能，把太阳和天空中的雄鹰联系起来构成太阳圆盘鹰头人的图像。因为它是神中之神，威力越来越大，职能不断扩充，其他神也向它靠拢而取得显赫地位，所以不断叠加而成“复合神”，例如与公羊神结合而成克努姆—拉，与鳄鱼神结合而为索贝克—拉，与底比斯保护神结合为阿蒙—拉、阿吞—拉等等。以太阳神为核心拉出一条主线，贯穿埃及几千年。

尼罗河是埃及的母亲河，它把埃及变成肥美的“黑土地”，还造成了一个尼罗河三角洲。尼罗河水定期泛滥，把一年分为三个明显的季节：7—10月为泛滥期，11—2月为生长期，3—6月为干旱期。尼罗河哺育了埃及人民，孕育出埃及的国家，给人以丰富的想象，所以许多神话都与尼罗河泛滥有关。无论是赫利奥坡里斯或者孟斐斯的神谱中都有一个名叫奥西里斯的神，它最初可能是尼罗河水的化身，是生命之源的象征。把尼罗河定期泛滥与农作物周期性生长联系起来，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草木

枯了明年一样生长，这种自然交替的现象给人一个宝贵的启示：万物生生不息，时而显露时而隐藏，似乎存在着两个世界，白天是太阳主宰的人间世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地下世界”或“冥界”。不用说，掌握尼罗河水涨落，植物死而复生、动物代代相传的神祇，就是奥西里斯，他是冥界之王。

国家建立以后，法老的权威凌驾众人之上，有如天上的太阳笼罩大地，于是人间与天上的最高统治者便渐渐重合，借助太阳神的神威来进行统治就更加名正言顺，于是神权与王权结合。太阳神被人格化了，还加上了一个王冠，手中握着一根“权杖”，象征生命的“安柯”表示掌握着生死大权。与此同时，太阳神成了国之大神，既是世界的造物主，又是人间的主宰。从第三王朝起，法老们开始修建金字塔，目的是体现至高无上和伟大，而且站在高耸入云的塔尖上更能接近太阳，死后升天。从第四王朝开始，法老与“拉”神的名字经常同时出现，而第五王朝的法老更宣称自己是“拉神之子”，热衷于建造太阳神庙和太阳船。中王国时期，底比斯的阿蒙神因王朝兴起而上升，与太阳神拉结合而居诸神之首，实际上仍为太阳神。新王朝对阿蒙神的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法老们以“阿蒙之子”自称，哈特舒普苏也说她是阿蒙神与其母所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往往在名字前冠以“阿蒙”字样，或称“图特摩斯”（托特神所生）。阿蒙霍特普三世继位，宣称是“阿蒙神的意志”，还在神庙中留下一幅阿蒙神为他加冕的图画。由于阿蒙崇拜极盛，祭司的权力急剧扩张，为了巩固王权，阿蒙霍特普四世实行“宗教改革”，废除阿蒙神而代之以“阿吞”，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埃赫那吞。其实，阿吞的内涵也是太阳神，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太阳圆盘代替罢了。然而习惯势力难以抗拒，改革瞬间即逝，阿吞还位于阿蒙。“拉美西斯”就是“拉塑造的人”，拉美西斯一世的工位名为“门帕提拉”（拉的权力是持久的），拉美西斯二世摄政时取名“乌塞尔玛拉”（拉

始终是强大的)，他即位后大建太阳神庙，气势比以往更加恢宏、堂皇。看来，太阳神是神中之神，凡是上升为主神的都必须沾到太阳的光辉，成为太阳神的变种，所以，“拉”也罢，“阿蒙”也罢，“阿吞”也罢，名异而实同，万变不离其宗。但这种灵活性，一方面有利于太阳神崇拜的长期延续，另一方面为改朝换代上升的地方神大开方便之门，并不断加入新的内容。

奥西里斯也与王权结合，第五王朝的法老都把他们的继承者说成是奥西里斯之子荷鲁斯，也就是说，他们进入冥界后便成了奥西里斯，所以继承者总是荷鲁斯。奥西里斯的权力随之增大，吞并了真理女神玛奥特的职权，从而具有“来世审判”的权力。据说，人死之后，要把人在世时的善恶拿到天平上去称，天平的一端是玛奥特，另一端是死者的心。通过审判，行善者获得永生，积恶者永远死亡。加入了这一社会内容，“来世审判”便具有社会控制意义。新王朝是崇拜奥西里斯的鼎盛时期，图特摩斯三世的尊号上就有“荷鲁斯兴起于底比斯的强大公牛”、“金荷鲁斯是实力强大者”。人们为了顺利地通过“来世审判”，有意将自己的功劳刻在墓碑上或写在墓志铭中，并结合巫术，兴起了《石棺铭文》和《亡灵书》。奥西里斯的“审判”，实际上是人间法律、道德神圣化的表现，无异乎宣布法律和道德都是神订的，法老是按“神定的秩序”进行治理。冥神奥西里斯的出现，使时间由“现世”延伸到了“来世”，使空间由“人间”扩展到“冥界”，而法老的权力似乎也伸进了另外一个世界，用“来世审判”维护现行的法律和秩序。

“两个世界”的观念，究竟是基于“万物有灵论”呢，还是基于“生生不息”的自然观？看来两者兼而有之，错综复杂。

“万物有灵”的观念在古代世界是普遍的，埃及也不例外。他们相信“灵魂不死”，认为人死之后“灵魂”有三种存在形式：一种“卡”，即寄托在遗体中的“精灵”，它是生命的转化，所以

坟墓被称为“卡之家”；二是“巴”，就是死者的“灵魂”离开了尸体四处遨游，白天回到尘世，夜间返回墓中而使木乃伊苏醒；三是“阿克”，它是一种“美丽的灵魂”，是一种对死者帮助的超自然力量。值得重视的是埃及人的自然观，它是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的一种朴素的概括：日出口没，昼夜交替，时间永无终止；春花秋实，枯荣相问，生命永不停息；动物生育，不断繁衍，新的生命总是不断产生；人虽死了，但“精灵”活着，继续传宗接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尸体必须保存而为木乃伊，坟墓必须如同人间生活一样，所以金字塔要修得像法老在世时的宫殿一样高大、豪华，坚固而能长久，狮身人面像总是凝视着日夜不息的尼罗河水。

宗教信仰是了解埃及文化的门径，也是认识埃及社会的要领。埃及既是多神教又是一神教，太阳神构成神谱中的主线条，冥神由它派生出来，实际上是一神统率诸神，犹如法老统领各州一样。神权与王权的结合，即宗教与国家的一体性，对犹太教有重要的提示。中王国及新王国时期，在西亚修建太阳神庙，对地中海区域的太阳神崇拜不无影响。“两个世界”的观念、“来世审判”的观念，对后来兴起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深刻影响。埃及人的自然观不但促进了埃及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对希腊哲学也有重要意义。

4. 举世瞩目的金字塔和神庙

在太空中航行，惟一能看见的就是奔流不息的尼罗河与耸立河畔的金字塔。据报导，已知的金字塔共 110 座，都分布在尼罗河西岸，从北向南集中在萨卡拉、达淑尔、美杜姆、基萨、阿布、古柏拉、阿布西尔、法雍几个点上。埃及几千年的文明史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而这些金字塔却始终没有被风沙淹没。希腊人所说的“世界七大奇迹”大都在不同时代毁灭了，惟有金字

塔巍然屹立在地球上。金字塔均为三角锥体，形如汉字中的“金”字，中国人把它叫做“金字塔”。可是，古埃及人把它叫做“麦尔”（mr），象形字为台阶上的三角图形△，意思是“上升的地方”，而英文名称 pyramid 和法文名称 pyramide 都源于希腊语 pyramis，意为“小麦饼”。这一切都使人感到神秘，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要修建金字塔？它为什么总是三角锥体？为何都散布在尼罗河西岸？它在遥远的古代是怎样建造起来的？……

埃及早期王朝的干陵是一种长方形的，因形如一条长凳，阿拉伯人称之为“马斯塔巴墓”。金字塔是法老的陵墓，它的鼎盛时期是古王国。最早的一座金字塔是第三王朝的法老左塞尔的陵墓，号称“三大金字塔”的胡夫、哈夫拉、孟卡拉金字塔都是第四王朝修造的。从第五王朝开始，金字塔无论数量上或规模上都大不如前，技术和艺术上也失去了从前的光辉，明显走向衰退。第二中间期一度中断，中王国虽有短暂复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从分布上看，第三王朝的金字塔集中在萨卡拉，第四王朝集中在达淑尔、美杜姆、基萨三个地方，阿布·古拉伯和阿布西尔的金字塔属第五王朝，法雍附近的金字塔是中王国时期的。从造型上看，早期的金字塔为阶梯形建筑，后来才演变为三角锥体，其间有一个由前者向后者的过渡阶段，“弯曲金字塔”和“红色金字塔”就处在这个转折点上。金字塔都是石料砌成的，千年不毁。

萨卡拉是金字塔的故乡，它位于开罗西南 24 公里，那里从前是埃及古都孟斐斯。左塞尔是第三王朝的法老，他是金字塔的始作俑者，塔式为阶梯形。它的原型为“马斯塔巴”，原设计是一座 7.9 米高的方形平顶墓，后来建筑师伊姆霍特普感到不能体现国王的威严，于是扩大基础，把它变为自下而上逐层缩小的 6 层阶梯式金字塔，实际上是 6 层马斯塔巴的重叠形式。左塞尔金字塔高 58.6 米，东西长 143 米，南北宽 125 米，通过金字塔的甬道

进入一个 28 米深的墓室。这是一个以金字塔为中心的建筑群，四周有高 10 米以上厚 14.8 米的石砌围墙，南北长 544 米，东西宽 277 米，墙体上有 13 个模拟门和一个供人出入的门洞，占地 15 公顷。墙面上的壁龛刻有 40 个圆柱大厅，象征古埃及的 40 个州。金字塔两侧有被称为“南宫”和“北宫”的建筑物，意在标明上、下埃及的统一。在这里发现了画龙点睛的浮雕，描绘的是左赛尔举行征服上下埃及的仪式和“赛特”大典的上座。这个王陵俨然是人间的城堡和宫室模样，有“王气”而无“神气”，显示的只是王权的威严。在左赛尔金字塔的西南，有一座规模更大的阶梯式金字塔，可惜没有修完，仅有底层和第二层阶梯，据考证为塞凯姆凯特金字塔。

金字塔的转型大概是在第三王朝与第四王朝之交。在距开罗 80 公里的美杜姆地方，也有一座阶梯形金字塔，它是第三王朝末代国王的建筑物，建在一座高约 40 米的小山丘上，共有 8 层，可是后来用当地石料将阶梯填平，形成一座倾斜度为 $51^{\circ}51'$ 的锥体塔，高 92 米，边长 144 米，阿拉伯人把它称为“假金字塔”。那么，“真正的”金字塔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通常认为是第四王朝的斯尼弗鲁王时代。斯尼弗鲁的金字塔建在萨卡拉南面的达淑尔，已将阶梯形改为斜坡面，高 97.26 米，边长 188.56 米。从底部到半腰处的倾斜率为 $54^{\circ}31'$ ，突然发现坡度太陡，再往上修难度大，于是改作 $43^{\circ}21'$ 的斜坡，这种下陡上缓的金字塔便是所谓“弯曲金字塔”或“折角金字塔”。他又在北面建了一座金字塔，高 10.15 米，边长 213 米，倾斜度为 $43^{\circ}40'$ ，外面用红色石料砌筑，称为“红色金字塔”。看来，“假金字塔”已有改型的意图，“弯曲金字塔”做了新的尝试，而“红色金字塔”终于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坡度，完成了这一变革。

基萨也在古都孟斐斯附近，距开罗 16 公里，著名的“三大金字塔”就在这里。斯尼弗鲁之子胡夫建了一座最大的金字塔，

原高 146.5 米，基座边长 230.38 米，倾斜度为 $51^{\circ}51'$ ，塔身共计 250 层石料。据专家推算，这座大金字塔共用了 230 万块平均重为 2.5 吨的石料，最大的约 15 吨重，总重约 570 万吨。核心部分的石料是当地所产的石灰石，外部所用的白石灰石当是从图拉运来的。在北侧离地面 20 米高的地方有一个拱门式入口，经过约 100 米的通道可进入距地面 30 米深的地下室。在通道中间辟有一条坡道通往“王后间”，在此之上有一条长 8.4 米，宽 1.8 米，高 3.1 米的大走廊，尽头就是胡夫墓室，称为“国王间”。这里大致是金字塔的中心，高 5.8 米，宽 5.2 米，顶板重 50 吨，内有一具石棺。以金字塔为主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侧边有葬祭庙（上庙）和河谷庙（下庙），中间以一条石道相连，河谷庙位于河边。大金字塔附近有 3 座小金字塔，它们是斯尼弗鲁和胡夫王妃的金字塔，另外还建有一座被称为“金字塔的夫人伊西丝”的殿堂。这里还残存着许多马斯塔巴，据说是胡夫的儿女、嫔妃及大臣的墓葬，他们死后永远陪伴着已故的国王。

在大金字塔西南 160 米是哈夫拉金字塔，原高 143.5 米，塔基边长原为 215.25 米，倾斜面为 $53^{\circ}11'$ ，基座外部的红花岗石可能是从埃塞俄比亚运来。这个建筑群是古王国金字塔建筑的典范，除上庙、下庙外还有大厅、露天祭坛、壁龛、神殿和仓库。在“T”型大厅中，有一排南北向的 6 根方形石柱和两排东西向的 5 根石柱，柱和横梁都用红花岗石构筑。金字塔东侧有一尊斯芬克斯像（Sphinx），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狮身人面像。他的儿子孟考拉又在哈夫拉金字塔西南 200 米建有一座金字塔，原高 66.5 米，基座边长 108.5 米，倾斜度为 51° ，塔身上层表面为图拉所产的白石灰石，下层表面为红花岗石。金字塔保存尚好，但附属建筑物大都无存，在河谷庙中挖出了用硬沙岩雕成的孟考拉王像和两尊女神像，此外还有 3 座王妃的小金字塔。

金字塔建筑在第四王朝达于顶峰，末期的舍普塞斯卡夫王放

弃了这一传统，在萨卡拉修建墓顶呈弧形的长方形马斯塔巴，谓之“法老的马斯塔巴”。第五和第六王朝虽然又恢复金字塔修建，但国力衰弱，最高的不过 90 米，且极粗糙，有的竟用碎石修筑，现存的如阿布西尔的萨胡拉金字塔和尼斐利尔金字塔。纽塞拉王建有—座小金字塔，但却修建了一座引人注目的太阳神庙。乌那斯金字塔在壁上刻满了蓝色的铭文，称为“金字塔文”。在第一中间期，几乎没有发现第七、八、九、十王朝的金字塔。十一王朝仅见孟霍特普三世的一座金字塔，而且没有完工。从十二王朝开始出现了一些中王国金字塔，如阿蒙尼姆赫特三世金字塔、塞索斯特里一世金字塔和塞索斯特里二世金字塔，最高的仅 70 米，比之古王国时期大为逊色。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的小金字塔是用泥砖砌成，称为“黑色金字塔”。第十三王朝仅留下三座小金字塔，最后一个金字塔大概是新王国开创者河赫摩斯的陵墓吧。

如果说古王国是“金字塔时代”的话，那么，新王国则是“神庙的黄金时代”。神庙在早期王朝就已经有了，崇拜太阳神“拉”。不过，那里的神庙多是露天祭坛，供奉太阳船和太阳圆盘。古王国后期，祭司阶层兴起，神庙渐渐多了起来，《巴勒莫石碑》中提到许多神庙，著名的如赫利奥坡里斯太阳神庙。第五王朝的纽塞那王时期是一个转折，他的金字塔很小，而在阿布古罗布所修的太阳神庙却很堂皇，内部饰以绘画、浮雕。中王国时期，阿蒙神的地位上升，与太阳神拉结合起来，神庙继续发展，著名的如孟斐斯的普塔神殿、赫利奥坡里斯的拉、阿图姆神庙、科普托斯的敏神殿、阿拜多斯的奥西里斯神殿等。新王国时期，对阿蒙神的崇拜进入高潮，神庙修建蔚然成风，最宏伟的就是位于底比斯的卢克索神庙和卡纳克神庙，还有以阿布·辛拜勒神庙为代表的石窟庙。

卡纳克神庙始建于十二王朝，经图特摩斯一世、阿蒙霍特普三世、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不断扩建而成庄严、宏伟的庞大

建筑群，包括阿蒙大神庙、穆特神（阿蒙之妻）庙和孔苏神庙（阿蒙之子）三个部分。阿蒙神庙区占地 25 公顷，围墙略呈梯形，长达 2100 米，设有 10 座塔门，第一塔门高 43 米，长 113 米。最著名的是那座近 5000 平方米的多柱厅，共有 134 根石柱，中间有 12 根高 21 米，直径为 1.1 米的巨柱。庙区内还竖立了 4 座方尖碑，卢克索神庙是从十八王朝一直延续到希腊、罗马时代的建筑群，这里有阿蒙霍特普三世修建的柱廊、中庭和多柱厅，有拉美西斯三世所建的塔门，还有希腊、罗马时代的圣所。阿布辛贝尔神庙是利用山崖开凿而成，大庙高 33 米，宽 38 米，深 63 米，极为壮观。庙门前有 4 尊刻在石崖上的拉美西斯巨像，像高 20 米。庙门至后殿全长 55 米，洞厅内有两排 8 根 9 米高的人形角柱，后殿立有 3 尊神像和拉美西斯二世像，堪称埃及一大奇迹。

神庙是神在人间的居所，是人与神交往的圣洁之地，同时又是神权与王权结合的象征。神庙建筑的象征意义极强：围墙顶部呈波浪状，且为一道道塔门阻隔，象征“原初之水”；高耸的神庙，象征着混沌之中升起的“原初之山”；天花板上的繁星，象征巨大的天穹；展翅的神鹰，象征神灵护卫国土；各种各样的花草，象征大地生机勃勃。它是大自然的缩影，是微型的大千世界。神庙的布局，一般是沿中轴线展开，呈南北方向延伸，依次为塔门、庭院、立柱大厅和神殿，有纵深感。塔门是一大特色，它由对称的东西两座门楼和连接天桥组成，是太阳神必经之路，所以在塔门前铺设一条排列石像的通道。塔门上常有法老执权杖打击敌人的图像，塔门附近有法老巨像或高人的方尖碑。列柱又是一大特色，庭院和大厅有高大的石柱，柱头上饰以草花、莲花、棕榈叶、哈托尔女神，柱子上布满文字和图画。神殿均在幽深去处，光线黯淡，充满神秘、肃穆的气氛。殿中有木制镶金的太阳船，神像就密藏在船舱中。

金字塔和神庙建筑，折射出古埃及的社会意识与宗教信仰。金字塔呈锥体高高耸起，既象征法老至高无上，又尽量接近主宰世界的太阳神，塔尖就是王权神授的象征。法老在世统治着埃及，死后仍在冥界永生，所以他的居室也要像在生时一样豪华，在金字塔里继续享受荣华富贵。金字塔都建在尼罗河西岸，这是因为太阳从东方升起，在西方降到地平线下，日出日没永不停息。神庙建筑显然与神权和王权的结合有关，神在人间常住，庇护这个太阳与尼罗河赐予的国家。金字塔之所以成为世界奇迹，是因为在距今 4000 多年就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把几吨乃至十几吨的石料开采出来，从远处运到现场，又由平地提升到几十米甚至百余米的高度，在当时的条件下究竟用什么方法，至今仍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巨大的石块一层层地往上垒起，结合部天衣无缝，精确程度令人惊讶。塔面的倾斜度掌握得如此精确，塔高与塔基的宽度又配合得如此之好，方位的测定，承重的把握，都需要有严密的计算，证明埃及是几何学发达的国家。神庙建筑，特别是列柱，对整个地中海都有深远影响，无论是波斯式、希腊式、罗马式都与之有着渊源关系。

5. 狮身人面像和“会说话的门农”

走进埃及的艺术殿堂，不禁令人莫名惊诧。人类刚跨进“文明”的门槛，竟会放射出如此耀眼的光彩。古埃及艺术品的丰富程度，超过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可以说，在希腊艺术出现以前，它是最辉煌的一座艺术宝库。要完整地描述埃及艺术看来是件很难的事，因为很少有人对众多的艺术品目睹周全，更何况新的文物不断出土。埃及艺术长久不为人所知，但问世后便一鸣惊人，它有一种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使人心灵震撼，同时又使人扑朔迷离，猜不破它的谜底。它的微妙之处，就在于笼罩着一层朦胧的轻纱，暗地里透出诡秘的宗教气息，叫人捉摸不定。正如

希罗多德所说：“古埃及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具有宗教色彩。”这里，我们只谈雕刻艺术，并通过狮身人面像和“会说话的门农”以见一斑。

埃及的雕刻有其独特风格，既不同于两河流域，也不同于希腊、罗马，受外来影响较少，传统的积淀较深，世代相承而保持它的特质，一看便知它是埃及模式。雕刻往往与建筑配合，或是建筑的一部分，或是以建筑物为大背景。他们喜欢用大石料或就岩石雕刻，以体积巨大而产生一种厚重感，并在规模上造成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击力。有影响力的雕塑多半是法老的像，“神气”十足，“王气”俨然，介乎“神”、“人”之间，有的是人形与兽形的契合，以写实的手法体现某种象征意义，狮身人面像就是典型的代表作。造型典雅、庄重、威严，追求形与神的完美，在纯净的几何线条中显示出生命的力量，信仰的崇高，“使他永远存活”。人物造像遵守“正面律”，多呈静态，无论立像或坐像均取正面，站立者魁梧挺直，静坐者端庄平视，给人以静穆、崇高之感，在静态中表达时空的永恒。使用“散视法”相当普遍，目的是真实地展现实物，临摹本领高超，能准确掌握比例与平衡，技法规整、朴实。埃及的雕刻都是集体创作，有的甚至是几代人心血的凝结，不像希腊那样产生许多著名的雕塑家。由于传统模式的局限和集体创作的原因，变化少，个性不突出。

古王国最早的雕刻作品是第三王朝的左塞王石雕像，它是“正面律”最早的范本，国王正襟危坐，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气势。第四王朝的杰作是哈夫拉王坐像和那著名的狮身人面像，还有孟考拉王和王后像、孟考拉和神女群像，以及拉霍特普夫妇像。这几组双像和群像各具特色，譬如：孟考拉王直立而双手垂直握拳，王后右手搂住国王腰部，左手弯曲放在国王右臂上，夫妻面带微笑；拉霍特普王右手按胸，正视远方，而妻子袒肩露臂，体态丰腴，形成显明对照。第五王朝的卡佩尔像是世界上最早的木

雕之一，它是官吏的塑像，被称为“村长”，因而在造型上与国王截然不同。肥头大耳，大腹便便，脸孔平和，在沉毅中显富贵。另外还有两件“书吏像”，面庞消瘦有神，胸部肌肉放松，腹部稍胖，双脚盘坐，个性特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说古王国时期主要是“孟斐斯风格”的话，那么，中王国则流行“底比斯风格”和“法尤姆风格”，打破了法老塑像过于追求完美、威严的刻板模式。孟图斯特普二世的坐像，头戴红冠，身披白色祭服，双手合抱胸前，两眼平视前方。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雕像，年迈、消瘦、忧郁，两眼深陷，面孔上有深深的皱纹。阿蒙尼姆赫特三世的塑像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法老雕像的典范，法老脸上的胡须与躺着的狮身巧妙结合。有几件表现民间少女贡物的木雕像，身着露肩紧身裙，头顶装贡物的篮子，体态轻盈优美。卡薇特王后像造型优美，有动感和侧面造型的倾向，当是转型期的代表作。新王国时期又兴起“阿玛尔纳风格”，雕塑精致、灵巧、轻松，埃赫纳吞王后尼弗尔提提头像就是一个杰出的典范，被称为“柏林最美丽的女子”（藏于柏林博物馆）。阿布辛拜勒神庙前在山崖上雕刻的四尊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堪称一大奇迹。

作为世界奇迹的孟斐斯三大金字塔前边，还有另外一大奇迹，它就是千百年神奇地凝视着尼罗河水的狮身人面像。这座巨像位于哈夫拉金字塔前，它是由一堵大石岩雕刻而成，长 73 米，高 20 米，宽 5 米，头部是人像，卧在地上的却是狮子的身躯。头上似戴王冠，耳侧垂着扇状的“奈姆斯”头巾，前额上的装饰据说是能喷射毒液的“库伯拉”圣蛇。饱经风霜的面庞带着微笑，两眼凝视前方。面宽大约 4.2 米，鼻子、耳朵和嘴的长度均在 2 米左右，鼻梁高耸，下腭上有长须，脖子上仿佛是项圈。另在狮身前加了两米长的狮爪，看去是匍匐于地而欲跳跃的姿势。在埃及文献中，人们把它称为 *Horemakhet*，意为“地平线上的荷

鲁斯”。拉丁语把它称为“斯芬克斯”(sphinx)，意为“活着的雕像”，通常叫做狮身人面像。司芬克斯有许多神话传说，说它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妖女，人面狮身，表情神秘，所以，凡难以解答的问题都叫做“司芬克斯之谜”。关于它的年代，考古学家认为是第四王朝法老哈夫拉时代的作品，时间大约是公元前 2500 年，而地质学家则认为它的年代可能要提早一倍，不管怎样认为，它都是距今 4500 年前的一座丰碑。狮身人面像平卧在三座大金字塔前，就像是法老陵墓的守卫者，以高大建筑配巨大雕像，相得益彰，使这个建筑群更显得气势恢宏，伟大而且庄严。它的创意非常奇特，狮子是兽中之王，象征法老威震天下，而人面则是智慧的象征，两者巧妙结合，体现出无穷的智慧与力量，又显示出干权的神圣与威严。把人兽合为一体，形象怪异，叫人感到神秘莫测，更增加了金字塔的神秘感，产生一种永久的艺术魅力。远远看去，它的轮廓近乎几何图形，线条刚劲、粗犷，似是而非，而在此似与不似之间使人感悟到它的美与奇。在莽莽的黄沙中，夕阳西下，夜色朦胧，更能引起许多遐想。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它的身上留下许多历史的沧桑，多少古老的遗迹人都荡然无存，而尼罗河畔的狮身人面像却依然屹立在广袤无垠的天际，犹如苍穹中永不熄灭的星辰。

在塔尼斯出土一尊黑色花岗岩雕成的巨像，被认为是中王朝阿蒙尼姆赫特二世的像，也是狮身人面。一头狮子躺在底座上，头部是有胡须的国王面孔，神态沉默，从眼神看去仿佛是在沉思，双唇紧闭，头上有王冠，冠后有披巾，两耳特别硕大。它已没有早先肌肉紧张的状态，但在头发、肋骨、爪子、臀部等细节刻画上仍保留传统风格，威严的面孔与狮身配合得相当协调。1851 年，马利耶特在开罗附近的撒卡拉城古迹中漫步时，偶然发现一座埋在沙里的狮身人面像，继续挖掘下去，周围有各种各样的斯芬克斯像，排列成两行，被称为“斯芬克斯大道”，它的

尽头就是孟斐斯的塞拉皮斯神牛庙。另外，他还在西亚历山大附近发现了 15 座这样的雕像，说明狮身人面像在埃及相当普遍，而且延续时间很长。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卡纳克神庙大道两旁排列着的“公羊头斯芬克斯像”，它的前脚匍匐在地，两爪握着一只小雕像，羊头抬起，两眼平视，目光炯炯，它们是主神阿蒙的象征。

令人神往的还有“会说话的门农”，3000 多年来它们一直忠实地守望着埃及古都底比斯。十八王朝的阿蒙霍普特三世时埃及极其强大，多年的征战建造了一个大帝国，并把埃及的建筑艺术推向高峰。阿蒙霍普特二世大兴土木，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神庙，还在底比斯西岸建造了一座阿蒙神庙和一座祭庙。遗憾的是这座祭庙已被十九王朝的法老拆除，幸存的惟有置于祭庙前的两尊巨像，这是阿蒙霍普特三世的塑像，端端正正地坐着，腰板挺直，两臂下垂而将手放在膝盖上，双脚平列而略微分开。面部有些模糊，神态叫人捉摸不定，在平静中显出威严，在凝眸中显出自信，法国学者把它称为“门农”。“门农”的像耸立在原野上，背后是一座山丘，引人遐想。据说在 2000 年前，有一位希腊地理学家来到这里，他在《旅行指南》中写道：“每当日出时分，石像就会说话，游人每把声音与熟悉的声音比较，认为最接近竖琴或琵琶弦断的声音。”从此便有了“会说话的门农”。大概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皇帝叫人修整了门农巨像，自此以后“门农”便沉默不语了。这个故事当然是后人编出来的，不足为信，但在荒漠中立着两尊雕像，风沙阵阵刮来发出种种声音，引起人们的幻觉与联想也是完全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埃及石雕的神秘性具有巨大的魅力。

埃及不但有大量雕像，还有许多浮雕。浮雕虽然没有雕像那样引人注目，但反映的内容比雕像更加广泛，它不局限于人物，更不局限于法老，而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宗教仪式、

庆典宴饮、房屋建筑、歌舞场面、战争场面、农耕过程、畜牧、狩猎乃至风俗习尚等等，可以说是刻在石头上的史书，是社会生活的凝聚，因此，要深入了解埃及艺术，不能不去研究埃及浮雕。此外还有许多壁画，它们都是埃及历史的写照。

6. 木乃伊与“国王谷”

提到埃及，人们很自然就想起了“木乃伊”，并把它同金字塔、狮身人面联系起来，构成一幅诡秘、深邃、难忘的图景。

“木乃伊”一词并不来自于古埃及语，而是拉丁语 *Mummy* 的音译词。寻根溯源，叙利亚语称为 *Mumya*，而这个词语则源于波斯文 *Murumia*，意思是“沥青或焦油”状的尸体，以后被阿拉伯文吸收而普遍使用。按一般人的理解，“木乃伊”就是“干尸”，与“僵尸”等同。事实上“木乃伊”并不是自然干燥而成的干尸，而是经过繁复的手续制作而成，能长期保存的尸体，包括人体和动物尸体。埃及为什么会留下大量的“木乃伊”呢？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自然观、人生观和生死观。在他们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就像日出日没、花开花落、尼罗河水盈缩一样，只是处在不同状态下的延续，因而“今生”与“来世”无非是存在形式的交替转换。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灵魂”与“肉体”是相互依存的，犹如太阳光照耀下产生影子一样，所以，人死了后要“复活”必须以肉体作依托，否则就成了“孤魂野鬼”。“生命永存”和“灵肉结合”的观念便是制作“木乃伊”的根本原因，它与法老修建坚固金字塔和把自己的形象刻在石头上是一致的。与他们既重“今生”也重“来世”的观念是一致的。

尸体的保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在人死之后，有机物很容易分解、腐烂，特别是肌肉部分，所以，留下的只能是含钙的骨骼、指甲、须发之类。按常识，在炎热气候下暴露的尸体很快就腐烂了，于是把尸体深埋地下，筑起石头的墓室并加上木

棺、石棺，使之阴暗而不受水蚀，结果留下的还是骨骼。有人试图用麻布把尸体严密地缠裹起来以防腐烂，但效果仍然不佳，肢体虽然齐全而肌肉却无可抗拒地腐烂了。被淹没在沙漠中的“干尸”却给人一种启示：要使尸体长期保存是可能的。“干尸”的形成，是因为沙子把尸体中的水分吸干或者从沙中获得某种可以防腐的东西，这便推动人们千方百计地去探索，以人工方法制作“木乃伊”。能确切证明“木乃伊”开始的是在第一王朝国王杰尔墓中的一截小臂，它可能是被盗墓后留下的残余物。其上裹着几层麻布以防骨架松散，尸体曾用“泡碱”（成分为碳酸钠、碳酸氢钠和氯化钠组成的天然盐碱）浸泡过。1890年，在美杜姆墓群中发现了一具“木乃伊”，身体用亚麻布层层包裹，呈伸展状，而内脏则被取出来用树脂浸泡的麻布包着，目的是把最容易腐烂的部分取去后以便更好保护身躯。1910年又在美杜姆17号墓中发现另一具“木乃伊”，内脏取出后在腹腔里塞满药物。在基萨的胡夫之母荷太普赫尔墓中，发现一只雪花石做的箱子，其内分为四格，里面就是“泡碱”浸过的器官残余。看来，内脏并不能有效保存下来，所以需用其他东西来做“替身”，1933年，在基萨发现一具放在木棺中的女尸，面部、假胸、假乳都用麻布缠成的。1966年，在萨卡拉发现了被称为“最早的木乃伊尸体”。“木乃伊”制作技术的成熟大概是在新王朝时期，它的许多奥秘也只有“在国王谷”才渐被揭开。

最早的“木乃伊”是藏在长方形的“马斯塔巴墓”中，古王国法老的“木乃伊”就存放在金字塔里。可是，在所有的金字塔中，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发现“木乃伊”，以致使他们怀疑金字塔是否是法老的陵墓。其实，正因为金字塔修得像人间的宫殿一样富丽堂皇，里面藏着许多宝物，这就使它成为最不安全的地方，盗墓者经常光顾而往往洗劫一空。盗墓活动在十三王朝达到高峰，使用刑法也屡禁不止，所以在中王朝金字塔衰落的同时，法

老们开始将“木乃伊”安葬在隐蔽而荒僻的地方，为了使“木乃伊”确保无虞，有时不得不将其转移，进行二次安葬。这种葬习到了新王国更为普遍，于是便有了“国王谷”。

“国王谷”是指尼罗河西岸毕班、埃尔穆斯克地方的法老墓群，它与卢克索和卡拉克神庙隔河相望，附近是一片沙漠。这里是新王国的首都底比斯，从十八王朝的图特摩斯一世开始，法老们便不再修建金字塔，而将陵墓秘藏在底比斯西岸的荒山峡谷之中，在山麓的峭壁上开凿地下墓室，自十八王朝到二十王朝相沿 500 余年，这便是“国王谷”的由来。为了保密起见，图特摩斯一世有意将陵墓与祭庙分开，而把“木乃伊”藏在隐秘的隧道式石窟中。这样的陵墓在“国王谷”中有 60 多座，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图特卡蒙墓。王后、王妃及国王子女的墓不再围绕着国王墓修建，而是在相距几公里的地方，于是又出现了所谓“王后谷”。贵族墓分布在“国王谷”和“王后谷”的东面，靠近法老祭庙，称为“贵族谷”。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人知，以防盗墓，然而最终并没有逃脱被盗的厄运，不得不派兵把守。即令是在这样严密的监控之下，盗墓活动仍然时有发生，所以二十一王朝的祭司们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将先王们的遗体转移重新安葬。据说，拉美西斯三世的遗骸前后改葬过三次，其他几个法老的尸体也几经转移，转来转去仍然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地点，最后将 13 个法老的尸体一起葬在阿门诺菲斯三世的陵墓。另一些法老的“木乃伊”，包括图特阿摩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在内，都被偷偷运往被山岭隔绝的德尔巴哈里，藏在那突兀的峭壁墓穴中。这个天大的秘密在 1811 年被揭开了，在“国王谷”发现了许多著名法老的“木乃伊”和一批莎草纸文献，清理之后，总共获得了 40 具“木乃伊”。他们的音容犹在，沉睡千年的法老终于“复活”。

“国王谷”的发掘为研究“木乃伊”敞开了—扇大门，几次

重大的发现都在这里进行。1920年考古学家霍尔·卡特发掘了十八王朝法老图特卡蒙的陵墓，在这里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例如：守护着墓室的胡狼雕像，贵重的珠宝箱，雪白的石膏瓶、带有狮的金色椅子，用金子打造的床榻和战车，用黄金、珠石、象牙装饰的精美石船，还有几座形状怪异的神龛。墓室中有一具大石棺，打开以后，第二层为木棺，上面有法老的金像，木棺内又有一层金棺，法老的“木乃伊”便躺在金棺内。这是一具保存了3300年未经触动的“木乃伊”，头部和肩间放着一只黄金面罩，尸体上浇满大量油膏，缠着麻布做成的“护身神铠”，头下垫着一只“护身枕”。图特卡蒙是一位年轻的法老，死时仅18岁，面孔宁静而安详，但不知何故头部有一处伤痕。这一发现不仅震惊世界，而且还引起一场风波。当时的新闻媒体大加炒作，说是把墓打开亵渎了神灵，许多与此事有关的人都因遭到报应而相继死去，于是“法老的诅咒”便成了热门话题，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

19世纪末叶，第十七王朝至二十一王朝的两处“木乃伊”隐藏地在德尔巴哈里被发现，使现代人得以亲眼目睹埃及古代风云人物的尊容。德尔巴哈里本来并非法老墓地，是因为祭司们为了防止盗墓贼不停的侵挠，而将先王们的“木乃伊”转移到这个僻静、隐秘的地方。在一个隐藏地居然发现了40具“木乃伊”，他们身上饰有13圈蓝色莲花的花环，向世人呈现“长眠不醒的形象”。他们当中有塞蒂一世，肤色由棕变黑，体内塞满树脂浸泡过的麻布，化石状的心乌黑发亮；塞蒂二世，头颅虽已折断，鼻梁仍十分清晰，上牙前倾；默仁普塔是拉美西斯的儿子，身上覆盖一层盐，体形肥胖，腹部、臀部、面颊上有“赘余”的皮肤；拉美西斯三世，装有石头做的假眼，嘴唇后垫以麻布使之看上去丰满；拉美西斯五世，脸上涂着土红色，面部和腹部上有小浓泡，可能死于天花；拉美西斯六世，尸体因遭盗墓者破坏而支

离破碎。著名的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也藏在这里，是最受青睐的一具。

拉美西斯二世是新王国时期强有力的法老，他活了 96 岁，统治埃及 67 年，把埃及历史推向辉煌时期，然而在他死后，埃及却像落日一样无可奈何地衰败下来。他的“木乃伊”最初自然是葬在“国王谷”里，后来祭司们把它转移到塞蒂一世墓内，几年后才安葬在开哈比王后的古老岩墓中。这个墓位于德尔巴哈里南部，在一个小河谷的悬崖底下。他原先华贵的棺槨已不知去向，被放置在一个雪松木的棺里，棺盖上用墨汁写着他的名字和铭文，表明墓主是拉美西斯二世。这具“木乃伊”保存完好，安详地平卧着，两手交叉在胸前，身上涂有一层树脂，腹部上的一个凹洞是取出内脏时形成的。从遗体上可以看出，他身高约 6 英尺，下颚突出，鼻子细长，眼睛不大而精明，耳大唇厚。这具“木乃伊”被送到巴黎的曼恩博物馆，许多专家在这里做科学研究，目的是要通过它来探索“木乃伊”之谜。

“国王谷”的发掘引起世界关注，多学科的专家进行合作，渐渐揭开了“木乃伊”之谜。据报导，制作一具“木乃伊”，从人死之日算起到安葬共需 70 天，其间有若干宗教仪式，且与天狼星偕日升起的周期有关。制作的第一步是将尸体平放在专用的桌上，将腹部剖开取出心脏以外的内脏，然后用酒、药物及香料加以清洗，分别浸渍在“泡碱”液中，接着又用钩状工具从死者鼻孔处穿入头颅，取出脑髓，使之成为一具空壳。清洗完毕，以“泡碱”吸干机体中的水分，大约一月后再用香料洗涤并进行防腐。之后用药物、香料等填充腹腔，将切割处进行缝合，然后小心翼翼地进外科整容，使之尽可能恢复生前的模样。“木乃伊”制成后用长长的麻布密密缠起，在麻布层中放进护身符，目的是使死者四肢齐全，能够升天。其实，这也只是一般的说法，“木乃伊”的制作之谜并未完全解开，譬如所用的药物究竟有哪些，

它们对防腐起什么作用，如此等等。

不但法老有“木乃伊”，王宫贵族乃至平民也有这种尸体处理方法，只不过没有这样讲究罢了。据说，平民多把尸体埋在沙漠之中任其自然干燥，还有一种较为简便的办法是将尸体在防腐剂中浸泡 70 天，或在肛门处注射某些药物。埃及还盛行动物“木乃伊”，把那些被视为圣物的动物尸体保存下来。最典型的的就是“神牛”，如孟斐斯的阿皮斯神牛、希拉康波里的耐维斯神牛、阿曼特的布奇斯神牛等等。三十王朝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在萨卡拉神庙中修了两个埋葬动物“木乃伊”的墓室，一个是狒狒木乃伊墓室，另一个是朱鹭鸟木乃伊墓室，它们都是图特神的象征。据说，现存有 400 多具狒狒木乃伊，还有人量朱鹭鸟和鹰的木乃伊。此外，还有狗、猫和羊的木乃伊。

7. 医学太阳历和几何学的开创者

在奇诡瑰丽的古埃及文明背后，隐藏着令人叹服的自然科学，我们从“木乃伊”看到了“西医之祖”，从太阳神看见了“公历之祖”的“太阳历”，从金字塔看见了计算精确的埃及几何学和难以企及的建筑工程。当然，与之关联的还有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木乃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埃及的医学在古代世界里已达到相当的高度。首先是人体解剖，能准确地判断人身的各个部位及骨架结构，知道内脏藏于腹腔，心脏具有特殊功能，头脑内有脑髓，这就为后来的“西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木乃伊”制作过程，察知埃及人有纯熟的外科技术，能够开刀、缝合，而且还有高明的整容技术使干瘪的尸体恢复生前容貌。防腐技术相当复杂，不仅知道哪些部分的机体最容易腐烂，知道如何把机体中的水分吸干，还知道用香料防臭，用药物防腐，用的是何种药物至今并不完全为人所知。虽然那里不免有“巫医结合”的特点，但从大量的纸草书的记录来

看，已经出现了专门的医生，这些医生各有专长，或长于内科、外科、产科，或精于骨科、眼科，还出现了作为行医准则的《希波克拉底誓言》。有一份以发现者埃德温·史密斯命名的长卷，记述了公元前 1600 年以前的医学著作，其中记有外科临床手术 48 种，还有诊断、治疗的各种程序，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医学专著。文献中还记有许多埃及人所患的疾病，后来在“木乃伊”X光检测中都得到证实。《埃伯斯草纸》列出了 700 多个药方，《卡亨草纸》开出一剂避孕药，在十一王朝的一个王后墓中发现一只药箱，此外还有灌肠方法。

当今全世界通用的“公历”，把世界各地在时间上统一起来，历史上不同国家的国号、帝号、年号也因为有了“公历”而能够相互对照，把人类文明的进程纳入了一个统一而有序的时间系统。说到“公历”，人们先是追溯到基督教的“格里高里历”，进而上溯到罗马的“儒略历”，而它的始祖却是埃及的“太阳历”。顾名思义，“太阳历”是根据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来确定历法的，现代科学测定的一个“回归年”，其长度为 365.2422 日，即 365 日 5 时 48 分 46 秒。应当说：“太阳历”的发明比“太阴历”的难度更大，因为“月有阴晴圆缺”的现象最容易为人们所感知，凭肉眼即可察觉月相变化的周期性。可是太阳从东方升起又从西方落下，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要确定它的年界，必须借助长期的天文观测和日影长度的测量。埃及人在公元前三四千纪以前就发明了“太阳历”，这不能不说是历法史上的一大奇迹。在第四王朝的金字塔铭文上已经记有这种历法，时代不晚于公元前 2700 年。古埃及人对太阳和尼罗河情有独钟，很早就以神奇的眼光注视着天上的太阳，注意到太阳升起与天狼星的关系，还把星象与尼罗河的定期泛滥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太阳历”。

对天象的观察，固然是祭司们占星术的能事，但实在是农业生产的需要，因为天象变化往往影响气候，影响农业丰歉，进而

影响人事兴衰，所以祭司们便把这种复杂关系神秘化，以占星术来预言人事吉凶。神庙往往就是观星台，据研究，埃及人修建的神庙必须正对太阳升起时与地平线的交点。埃及“太阳历”测定的根据是“天狼星周期”，即以天狼星与太阳同时升起之日为岁首。年界的基准既定，他们确定一年为 365 天，与科学测定的“回归年”相差 5 小时 48 分 46 秒。他们渐渐认识到随太阳升起的天狼星每 4 年慢一日，似乎也考虑到置闰问题。据大文学家推算，按“天狼星周期”每隔 1460 年吻合一次，其吻合之年当是公元前 1321 年、前 2781 年、前 4142 年……时日的计算是根据“水钟”，埃及人说它是图特神发明的。最早的“水钟”现藏于柏林博物馆，它是图特摩斯三世时代的仪器，由一木条和一根横杆组成，木条上有 6 等分刻度，横杆投影在木条上即可表示时间的早晚。聪明的埃及人又把这种历法与尼罗河水的涨落联系起来，以河水涨到最高点的那一天为起点，将一年分为三季：第一季从涨水、泛滥到退水；第二季是耕种季节；第三季是收获季节。月份的划分大概也是按月相变化，所以埃及文的“月”字就是月亮的符号，每月定为 30 天，年末增加 5 天。

一般的说法都认为埃及的几何学起于土地测量，因为尼罗河每年泛滥之后，人们必须重新测量土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认真研究那令人惊奇的金字塔，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因为它已不是简单的平面几何，而是较高的立体几何，涉及许多复杂的计算问题。早先的“马斯塔巴墓”是一个长方体的建筑，后来演变为阶梯形金字塔，实际上是由 6 个长方体重合而成，左塞王墓的底座东西长 121 米，南北宽 109 米，方位非常准确，而且每层边长的递减数配合得相当好，各层长方体的 4 个角对成一条斜线，每边的立面都是一个等腰梯形，而总体则是一个截去锥顶的正方锥台。“弯曲金字塔”虽然是一种过渡形式，但建筑十分规整，它实际上是由一个锥台与一个锥体组合而成，两

部分的倾斜角度不同而又巧妙结合，且结合部正好在塔高一半的地方。大金字塔的设计和施工简直叫人不可思议，在那样遥远的时代居然会创造出这样规整的庞然大物。从形体上看，它是一个十分标准的角锥体，它由 4 个全等的等腰三角形组成。塔的四方正对东、南、西、北，误差在 $5'30''$ — $1'57''$ 之间，4 边的边长均为 232.805 米，平面为一正方形。底边周长 931.22 米，可用塔高 148.208 的 2 倍除之。4 个等腰三角形按 $51^{\circ}51'$ 的倾斜度修建，塔高 148.208 米。问题在于它是由 250 层砌成，230 多万块巨石都必须保持一定角度。如此精确的计算，简直是几何学的杰作。

工程技术上的难度更是令人难以想像，以致有人疑惑它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的遗迹。在法国埃菲尔铁塔出现以前，大金字塔无疑是世界上惟一最高的建筑，虽然它的高度仅及铁塔的一半，但体积的庞大是铁塔无法相比的，更何况大金字塔早于埃菲尔铁塔近 5000 年。金字塔经历几千年沧桑而不毁，其牢固性比其他建筑无法比拟的，从力学的角度讲，塔越高它的塔基越大，顶部的重荷都平均地分散到 4 个斜面而传达到塔底，形成一种极其稳定的结构。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若干技术问题时，疑团不断产生。譬如采石，在没有炸药，没有铁质工具的情况下，他们是怎样开采石料的，又怎样把它加工成按一定规格的平整石块？又譬如运料，无论运距长短，要起运这样沉重的石料都是很困难的，人海战术不行，那么，他们究竟用什么方法把巨石运到现场？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情况下，要把几吨、十几吨的巨石提升到 100 多米高，采用的是什么方法？砌塔不用粘合剂，合缝处连一张刀片都插不进，这又靠什么技术？自“埃及热”兴起以来，不知有多少人做过推测，但都很难成立。有人设想修金字塔前先筑一道斜坡把巨石往上运，可是，随着塔身的增高，斜坡就会越筑越高，坡道就会越筑越长，几乎每增高一步就得加修一次坡道，其工程是相当浩大的。再说，坡道如果不平整、坚实，重石必然

下陷，即使用圆木滚动也是不行的。有人估计建这座大金宁塔要用 20 万人，花 30 年时间，但这种估计很难令人置信，因为如此浩大的建筑工程，如果不能解决其中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然而，巨大的金字塔毕竟是一座又一座地建立起来了，在现代科学技术如此昌明的时代，人们除叹为观止而外，似乎还不能对它的若干技术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这难道不是一种“超科技”吗？

（三）历史夹缝中产生的希伯来文明

地中海与波斯湾和红海之间即所谓“近东”，沿地中海东岸有一片形如新月的土地，称为“新月肥沃地带”，这里就是巴勒斯坦。它的北面是叙利亚草原和两河流域，南面是尼罗河三角洲，东面是阿拉伯半岛。早在公元前 1800 年，有一批游牧民族来到这里，当地土著人把他们称为“希伯来”，意思是从河那边来的人。希伯来是个弱小民族，但他们创造的古老文明却非同凡响，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夹在埃及和巴比伦两大强国之间的希伯来，在重压之下发出巨大的吼声，震撼了地中海。他们创立的犹太教，后来分化出一个世界性宗教——基督教，而另一个世纪性宗教——伊斯兰教也深受其影响。

1. “小民族，大声音”

希伯来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跟随族长亚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上帝应许之地”迦南，其部落称“犹太”。另一个称为“以色列”的部落，南下到埃及的歌珊地方。因此我们所说的希伯来民族，包括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两部分。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在政治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在历史上给人的印象是东逃西躲，颠沛流离，可是在谈到地中海文明的时候却无

论如何不可忽视他们的历史功勋。希伯来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一登上历史舞台就生存在艰难的夹缝之中，不断受着埃及和巴比伦两大强国的欺凌，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悲惨命运。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重压下发出了最沉痛的呼声，“小民族，大声音”，惊动了古老的地中海。

苦难的历程从移居埃及的以色列人开始。当他们进入之初，埃及为外来的喜克索斯人统治，对以色列人并不排斥，于是人丁兴旺起来。但在公元 1550 年，喜克索斯人的政权被埃及人推翻，建立了新王国，法老美西斯二世争霸西亚，在歌珊地方修建城池，强迫以色列人服役，把他们沦为奴隶，推进苦难的深渊。生存的危机，激起了以色列人的反抗精神和渴求自由意识，他们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在摩西的带领下逃离埃及，使他们获得新生的精神支柱是上帝耶和华，据说，摩西代表以色列人到西奈山与上帝“立约”，接受上帝的“十条诫命”，并成为“上帝的选民”，这“十诫”便成了他们共同遵守的法律。上帝以 10 种灾难惩罚法老，第 10 条就是灭其长子，为了纪念这件事，以色列人在每年尼撒月（三四月间）14 日起守逾越节。

他们经过千辛万苦来到约旦河畔，凭着群体的力量从其他民族手中夺回了“以色列故土”迦南。大约在公元前 13 世纪中叶进入“士师时代”。“士师”是一些有勇有谋、临危不惧的“拯救者”，他们在作战时是军事首领，在处理内部事物中是仲裁者，是各支系的自然领袖，权力既不统一，又不世袭。正当他们处于分散状态的时候，从爱琴海诸岛闯入了一批非利士人，因有铁质武器的骑兵，把以色列人打得太败。为了与外族抗争，必须统一作战，于是扫罗为王起进入“王国时期”（公元前 1030—前 933 年）。继扫罗之后为王的是大卫，他建都耶路撒冷，巩固中央集权，建立了常备军和祭司制度。他的儿子所罗门做了国王之后，实行商业外交，在耶路撒冷修建圣殿，成为统一宗教信仰的

象征。

但好景不长，统一的王国仅存 85 年便处于分裂，北方称为以色列王国，南方称犹太王国。以色列王国于公元前 733 年为亚述灭亡，犹太王国于公元前 586 年灭于新巴比伦，希伯来民族又再次被推入苦海。新巴比伦攻入耶路撒冷后，将圣殿夷为平地，而将大批犹太人作为俘虏，分散在巴比伦城和其他地方，变成了“巴比伦之囚”。半个世纪的囚居生活，引起他们对故国家园的深切思念，于是这种强烈的“回乡观”便演变为一种重返故国、复国兴邦的民族愿望。波斯帝国兴起，居鲁士征服了新巴比伦，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犹太人得以重返家园，在耶路撒冷重修圣殿，这便是所谓“解放巴比伦之囚”。分裂、灭国、囚居、重建圣殿，使犹太民族经受了严峻考验，在强化民族意识的过程中，信仰上帝成了支撑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

往后的历史仍然迂回曲折，历尽艰辛。波斯被马其顿灭亡后，犹太人又成了亚历山大帝国治下之民，在希腊化的浪潮中，犹太人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和文化，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对他们都比较宽容。可是，厄运终于降临，自塞琉古王朝四世腓罗帕特开始，各种灾难接踵而来，圣殿被洗劫一空，虔诚的信徒遭到杀戮，禁止犹太人行割礼，守安息日的权利也被剥夺，取代耶和华的竟然是希腊的宙斯神，一切都叫人无法忍受。宗教迫害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于公元前 165 年爆发了玛喀比起义，不屈的人民又在圣洁的殿堂举行典礼，从此将基斯流月（9月）25 日定为献殿节，庆祝他们重见光明。他们又赢得了民族的自主权，在哈斯蒙尼家族的统治下近 100 年。公元 104 年亚里古多布鲁一世称王，建立哈斯蒙尼王朝，但因穷兵黩武、专制独裁，被犹太人斥为违背摩西律法，国王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对付国王，犹太人请求塞琉古王朝帮助，而哈斯蒙尼王朝则投靠罗马。公元前 67 年，罗马乘胡奴肯二世和亚里古多布鲁二世争夺王位

之机，将哈斯蒙尼王朝颠覆，犹太人又一次被踏在罗马军团的铁蹄下。

在罗马的统治下，犹太人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盘剥，信仰自由被取消，连他们的第二圣殿也被荡平，激起了犹太人极大的愤怒，不惜以生命来反抗暴政。公元 66 年爆发了第一次犹太战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耶路撒冷陷落，迫使犹太人四处流散，进入了“散居时期”。在这次战争中，坚守马萨达要塞的千名犹太人集体殉难，他们“宁可为自由而死，也不为奴隶而生”。以后又举行第二次起义，最后遭到扑灭，从此被禁止踏进耶路撒冷，在往后的 1800 年中漂泊异乡、流离失所。

希伯来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从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那天起就走上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用血和泪写下了一部悲惨的历史。然而他们从来不屈服于暴力，不屈服于残酷的现实，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同命运进行抗争。这个历尽艰辛的弱小民族，最深切地感受到人间的苦，在呻吟中呼唤“救世主降临”，强烈要求“公理”与“正义”。这虽然是一个很难实现的口号，但它始终鼓舞着人们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弱小民族发出的沉痛呼声，有着“惊天地而泣鬼神”的震撼力量，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回响。

2. “上帝的选民”与犹太教

犹太原本只是希伯来民族的一支，但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情况起了很大变化。以色列王国被亚速灭亡之后，有 10 个支派被流放到很远的地方，久而久之与其他民族融合，从此在历史上消失，这便是所谓“丢失的 10 个支派”。犹太作为一个民族，并不完全基于种族的联系，虽然它的根基是闪米特人的希伯来，但不断渗入其他民族成分，例如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色”犹太人。犹太民族的形成是基于希伯来文化的认同感，确切地讲，它

是“只忠于一位神，一本书，一种信仰”的民族。这一位神就是上帝耶和华，这本书就是《圣经》，这种信仰就是犹太教。

犹太教又称摩西教，它是散居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共同信仰，是凝聚犹太民族的精神力量。犹太教的产生、形成、演变，都与这个古老而又苦难的民族息息相关。一部苦难的历史孕育了一个悲歌的宗教，它是犹太人在残酷现实中产生的一种幻想，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生活在“无情世界”中的犹太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每一个信条都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他们的每一次呐喊都是一阵惨痛的呼声，他们的每个故事都凝结着犹太人的血和泪，他们的文字都记满了苦难的历程。而对苦涩的人生，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的“天国”，借以安慰心灵，产生一种美好憧憬而不至于绝望，于是靠着信念顽强生存下来。

犹太教是典型的一神教，这是历史的选择。早先的希伯来人信奉各种各样的神，不但将祖先神化，还往往信“外邦神”，只不过特别崇拜部落保护神“耶和华”罢了。当他们历尽艰险逃离埃及的时候，深感信仰的重要，坚信他们的“救世主”就是耶和华，从而排除其他神祇，笃信一神。他们重返故土，建立起兴盛一时的国家，以圣殿作为团结全民族的象征，耶和华就由部落神上升为民族之神。虎口余生，兴帮复国，使他们感到奇迹的出现是耶和华的恩宠，于是坚定一个信念：“惟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世主。”然而，几十年的辉煌过去之后，南、北分裂为两个国家，先后被亚述和新巴比伦所灭，又再次掉进了苦难的深渊。经过沉痛的反思，他们从反面感受到一个道理，认为之所以会经受这种磨难，是因为不遵守上帝的戒律而遭到惩罚，于是更加虔诚、狂热地崇拜上帝。一神教的确定以公元前 621 年犹太国王约西亚的改革为标志，在重修圣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部戒律汇编《申命记》，于是以此为依据进行改革，重点是清除异教徒，

排除万物崇拜，确立上帝耶和华的独尊地位和圣殿在全国宗教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史称“约西亚改革”或“申命改革”。

在此之后的 300 年间，犹太教出现了一个“先知运动”，把人类追求的一切美德都赋予上帝，又将各种神灵的威力和属性集中于上帝一身，使之成为“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惟一之神。这实际上是一个抽象化、理想化、概括化的过程。正因为它有如此高尚的美德和超凡的能力，所以才具有创造世界、支配世界的权威，从而形成“上帝创造世界”、“上帝创造人类”、“上帝无所不在”、“上帝无所不能”的观念。在“巴比伦之囚”的日子里，圣殿被毁，祭司被废，人们只好默默地颂经、祈祷，不借助任何形象而与上帝沟通、对话，而是把上帝铭刻在心中，“在心里不忘记上帝的话”，从而使这种信仰完全虚化和心灵化。抽象、概括、虚化的结果，具体的形象被模糊、淡化、消失，而心灵则将这一切都理念化了，这样，在人们心中的上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偶像，而是一种至高无上，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理念。犹太教反对偶像崇拜，认为崇拜偶像是一种亵渎，因而它不仅是一神教，而且是一个不崇拜偶像的宗教。

犹太人时刻把上帝铭记心中，相信“上帝与我同在”，把国家、民族的命运都与上帝的恩宠与惩罚联系起来，这就使犹太教具有民族宗教的特征。它关心的首先是民族的生存发展，是国家的兴衰存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把上帝作为团聚全民族的惟一核心，作为支撑他们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力量。他们与上帝立下“永久的约”，只要遵守戒律，上帝就会指导他们走出困境、走向新生，所以，《耶利米书》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为犹太人把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看得如此特殊，宣扬“神宠论”，于是便以“上帝的选民”自居。因为犹太人命运坎坷，几经劫难，国破家亡，离乡背井，四处逃散，在心中郁结着一种故上之

情，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恢复自己的国家，因而有一种强烈的复国主义情绪。这一切归结起来，使犹太人始终以民族宗教的姿态出现，很难跳出犹民族的狭隘圈子。

犹太教特别重视的是与上帝立约的“摩西十诫”，把它作为上帝不可更改的教诲，作为规范伦理道德、社会行为的律法，使犹太人成为“忠于一部圣书，一种共同的宗教信仰，一种生活方式”的民族。在这里，抽象的信仰转化为人们的实践，神的教诲变成了人的行为准则，伦理道德以律法的形式出现，形成以律法为基础、以道德为本位的宗教，每个人的行为都成为“活生生的上帝之语”。由于犹太教肩负着挽救民族危亡、期盼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一时一刻都不离开现实，所以，“在犹太教中，世俗和神圣的界限是暧昧不清的”，在把神的教诲伦理化的同时，又把日常生活神圣化。这就是说，在神学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上帝始终与人同在。它反对禁欲，认为男女的婚爱是上帝的主意，因而家庭婚姻是神圣的，而破坏这种神圣的纵欲则是对上帝的亵渎，由此导致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因为犹太人的生存惟有靠自己的劳动，只有辛勤劳作才能创造自己的幸福，所以劳动被看成是神圣的事。

犹太教有许多节日，重要的如安息日、逾越节、除酵节、住棚节、五旬节、献殿节、赎罪节等，这些节日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与历史印记，反映社会生活及神人关系，具有焕发强烈的信仰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特征，通过这些亘古不变，反复提示的节日不断强化宗教与民族的观念。安息日是惟一写在“十诫”中的一个节日，这是上帝休息的日子，是上帝与他们立约的“永远的证据”，也是人们吉祥、快乐的日子。逾越节是纪念他们逃离埃及的日子，献殿节（光明节）是为了纪念玛喀比起义成功，住棚节是为了纪念回归圣地，它们都是犹太史上永远不能忘怀的重大事件。除酵节、住棚节、五旬节都与历史事件有关，但同时又与生

产有关，除酵节是大麦收割的开始，五旬节是小麦收割的结束，而住棚节则是欢庆丰收，感谢上帝的恩赐。五旬节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让人们永远记住与上帝立约的日子。赎罪日是犹太人反省、忏悔的日子，以“摩西十诫”为准则来反思自己的行为，不断改过自新。从节日上可以看出，犹太教始终把宗教活动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时时刻刻、世世代代都强调信仰，关注民族的命运，关注现实的生活，每次节日都复习一次历史，恢复一次记忆，在历史的长链中延续下来。

在世界宗教史上，犹太教占有特殊地位。首先，基督教起初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异端而出现，尽管从一开始便与犹太教分道扬镳，但毕竟是从犹太教中分化出来，继承了犹太教的三个重要观念：其一是“至高一神”的信仰，其二是“救世主”的观念，其三是信仰“先知”及其“启示”。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一开始便是“绝对一神的宗教”、“信奉救主的宗教”和“启示的宗教”。犹太教的经典也为基督教所继承，成为《圣经》中的《旧约全书》。犹太教的“安息日”演变为基督教的“礼拜日”，犹太教的“逾越节”演变为基督教的“复活节”。犹太教的教会组织形式和祈祷、唱诗、读经、讲道等礼拜仪式，也被基督教沿袭下来。《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实际上与希伯来文化和犹太人的历史密切相关。

犹太教对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一神信仰”的观念，伊斯兰教认为安拉（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超越时空，永恒存在。与犹太教一样，安拉也是抽象的精神实体，严禁偶像崇拜。伊斯兰教的“使者”，也是直接受安拉启示的“先知”，与使者背约，也就是背叛安拉。犹太教以“摩西十诫”为社会行为规范，而伊斯兰教律事实上也是道德行为规范、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模式。安息日的习俗，后来也为伊斯兰教接受，演变为礼拜日。更重要

的是，伊斯兰教也同犹太教一样，把宗教与国家、民族紧紧相连，往往形成全民族宗教，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并不只是与某一特定的民族和国家相联，而是越出阿拉伯民族向世界发展，因而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而不是像犹太教那样始终同犹太民族紧紧相连。

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耶路撒冷，它既是犹太教的圣地，也是基督教的圣地，同时又是伊斯兰教的圣地。最早把这个地方称为耶路撒冷的是希伯来人，意思是“和平之城”，它是以色列王国的都城，在锡安山上曾建有最早的犹太教圣殿。在耶路撒冷南边的伯利恒马赫德山洞，据说是耶稣的诞生地，而且耶稣在这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40天后升天，有他的圣墓教堂，因此基督教也称它为圣地。按伊斯兰教的说法，公元621年，伊斯兰历7月27日，天使唤醒了先知穆罕默德，他乘“飞马”从麦加城夜行至耶路撒冷，踩在一块圣石上升至七层天，见到了真主，于黎明时返回麦加，所以，耶路撒冷便成了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个圣地。在耶路撒冷的旧城里，有一片占地26万平方米的伊斯兰圣地，建有阿克萨清真寺和萨赫莱清真寺，还有“飞马石”、“圣石”等遗迹。正是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世界罕见的宗教圣地，从11世纪开始，天主教会发动了绵延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以夺回“主的坟墓”为口号，举着十字架杀向耶路撒冷，与伊斯兰教展开了殊死战斗。

3. 从《圣经》看希伯来文明

希伯来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留下了一部《圣经》，这就是说，希伯来文明的精髓都通过《圣经》传达出来。这里所说的《圣经》当然是指犹太教的经典了，但它后来为基督教所继承，成为基督教《圣经》中的《旧约全书》，它大体分为四大部分：律法书共五卷，合称《摩西五经》；历史书共十二卷，记述

以色列人辛酸的历史；先知书十七卷，包括“四大先知书”和“十二小先知书”；杂集又称《圣录》，主要是圣经文学。从宗教学的角度看，它奠定了基督教神学、教义、教规、教仪、节庆的基础，并通过基督教传到欧美及世界各地，对西方文化产生多方面影响。但如果撇开宗教不谈，用一种新的观点去诠释《圣经》，就会发现许多被神学包裹起来的真理，它们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人类的进步，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具有深刻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要讨论的是“上帝”。在希伯来人的心目中，“上帝乃无形的世间惟一神”，她创造宇宙和人类，主宰世界的一切，全知全能，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但她又并非偶像，而是一种“绝对理念”。上帝创造世界和上帝造人的说法当然是荒唐的，但它所勾勒的却是一个无穷无尽、生生不息的“世界”，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被假设的“上帝”统一起来。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这里虽然变成了虚幻，但却使人感到它的存在。这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时空观。得到上帝的启示而进行创造，世界总是在不断发展演变，这种“创造”的思想与亘古不变的观念完全对立。它的时空观也有积极意义：在时间上是无限的，虽然看去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但时光总是不断流逝，向着未来开放；空间上也是无限的，深深印在人们脑海中的是一幅大千世界的图景，这与中国人始终把自己看成“世界中央”的观点完全不一样，显得宽阔无比。“创造”、“未来”、“世界”这些观念，都是一种开放式的，丝毫没有“自我封闭”的意识。

犹太教的《圣经》之所以后来成了基督教的《旧约全书》，是因为摩西代表希伯来人与上帝立约，确定了十条戒律，即“摩西十戒”。这里爆发出一个了不起的“契约观”，把人和神处于对等地位，相互间有义务和权利，而不同于单方支配和绝对服从。“十戒”简单明了：一、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二、不可为

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及水中百物；三、不可妄称耶和華的名；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五、当孝敬父母；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做假证陷害人；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契约是双方都要履行的，人要相信上帝，上帝要保护人，崇拜上帝不等于崇拜偶像，上帝休息的日子人也要休息，遵守道德和维护社会秩序是神与人共同的意愿与准则。契约是允许双方选择的，但一经签订就必须履行，违约者必须受惩。这种观念延续下来，致有基督教的《新约全书》，由此可见，契约在西方人的观念中是天经地义的事，具有进步意义。

在“摩西十戒”中，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宣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了偶像崇拜，因为，反对偶像崇拜是上帝的旨意，是人与神共同的约定。既然对至高无上的上帝都无须偶像崇拜，那么，更没有必要去崇拜什么神仙、皇帝、圣人、权威，甚至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罪恶。不崇拜偶像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它在政治上是对东方专制主义的叛离，饱含着民主、平等的思想，正如麦克斯·戴蒙德在《犹太人、上帝和历史》中所说：“摩西律法所内涵的对民主性和正义的追求，对人类权利的尊重，就使以前所有的律法黯然失色。”在思想领域内，反对偶像崇拜就是反对“一言堂”，所以，“十个犹太人有十二个主张”。在学术与科学研究上，树立起不迷信权威的思想，不以某一权威的学说为定论，勇于探索，敢于超越，因而不断有新的突破。犹太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典范，因而人才辈出，“支配当代的三大巨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说富有挑战性，划开了一个时代。平心而论，偶像崇拜的确是一种罪恶，它把人类引入了一条歧路，并成为正义与智慧的一副枷锁，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最不能令人容忍的就是

权威和对权威的迷信。”

“上帝造人”当然不足为信，但由此却导致了人本主义思想的产生，因为“人所共爱的上帝创造了与上帝同样形象的人”，他们生来就是平等的，有权追求自由与幸福，所以“在上帝而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根本”，无论地位高低、财富多寡、智能高下、种族差别都不能抹杀平等的真实性，正如在阳光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正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彼此之间应当相爱，如同爱上帝和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人，“不要向别人要求自己也不愿意做的事情”，这种超越特定对象的泛爱就是所谓“博爱”。以爱为亲和力把社会组织起来，就会消除人间的纠纷、欺压和仇杀，于是形成了他们的慈善观，以乐于助人的精神努力发展公益事业，用“爱心”去填平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公义行为的价值只能以慈善之举的兑现来衡量”。尊重人的权利是人本主义的立足点，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平等、博爱、自由”。“文艺复兴”的精髓就是恢复人本主义，解放人性，呼唤理性，张扬个性，因而出现了一个“巨人时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走进了近代文明之门。西方倡导的“福利社会”，大概也是力图使这种思想兑现。

基于人本主义思想，犹太人大声疾呼“公义”。“公义”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词汇，它包括“公平”、“公正”、“正义”、“慈爱”、“善行”诸种含义，不言而喻，凡是不符合“公义”的都在反对之列，因此，“公义”首先是判断善恶、是非、正邪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讲属道德范畴。但呼唤“公义”必须付诸行动，所以，“行公义”便成了它的纲领。当“公义”运用于社会现实，就体现到政治、经济、道德、行为各方面。政治上的“公义”，首先就要反对强暴，反对压迫，反对种族歧视，反对不平等，提倡为政清廉、司法公正。经济上的“公义”，就是强调买卖公平、乐善好施，自然要反对欺诈拐骗、偷盗抢动、不讲信义、牟取暴

利及损人利己的一切行为。这一切都归结到人们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行为准则，把观念的美德施行于现实之中，变成推动社会不断改良的力量。实现“公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因为它总是在与“非公义”的斗争中推进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流血，然而正因为有不少人“为公义而战”，所以社会才不断进步，历史的车轮才会滚滚向前。

崇尚知识也是希伯来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因被神的灵光所掩盖，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在他们看来，“知识就是智慧”，只有无止境地追求知识，人类才能有“聪慧、真知、智性和力量”，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从神学的观点解释，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大智大慧，“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智慧定天”，所以人们的智慧都来自于上帝，来自于“先知的启示”，因此崇拜上帝就必须通过学习而接近上帝，强调“学习如敬神”。撇开神学理论不谈，追求知识和提倡学习毕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犹太教“视学习如敬神”的思想，把“为学习而学习”当作每个信徒的一种义务，客观上推动了教育的发展，由此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公元前 3 世纪就出现教会学校，公元前一世纪就有了非教会学校，遍及教育的程度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犹太人最善于学习，他们广泛接纳各种文明，在不断迁徙、逃亡、流散的过程中接触各种异质文化，从中吸取养料加以改造、提高，从而成为世界文化的最受惠者，成为最聪明的人。

磨难也许是一种财富，希伯来人经受了人间最大的痛苦，体验最为深切，他们发现了许多永恒的真理，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无形而无穷的推动力。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看问题，揭去历史给它披上的宗教外衣，不持偏见，把虚幻还原成现实，给希伯来文明以公正的评价，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希伯来文明绝对不可忽视”，它是影响人类重要的文明之一。

（四）腓尼基与“亚欧陆桥”

在地中海东岸的古老文化带上，腓尼基是应当受到足够重视，它是一个“文化信使”，在地中海文化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腓尼基是一个航海民族，最先开辟地中海环行航线，沟通东海岸与希腊、罗马和北非，进行了世界航海史上第一次非洲环行，被誉为“地中海上的马车夫”。腓尼基是一个商业民族，在地中海上建立了许多商业殖民地，促进地中海的经济、文化交流。它还有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创造了腓尼基文字，开启拼音文字的先河，后来的希腊文、拉丁文、斯拉夫文都源于此。

腓尼基往北是“亚欧陆桥”小亚细亚，它是东方古老文化带的前沿，同时又是希腊文化圈的外围，两种文化在这里接触、碰撞、交流、过渡，与爱琴海文明有直接的联系。小亚细亚南部的赫梯曾经兴盛一时，它在文化上的贡献，一是最先步入铁器时代，二是最早使用马车，三是把东方文化西传。大概在赫梯走向衰落的时期，希腊人进入了小亚细亚，在这里建立许多城邦，成为接受东方文明的前哨，《荷马史诗》中提到的特洛伊在这里，著名的米利都学派也在这里产生。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亚欧陆桥”小亚细亚和腓尼基一样是我们的关注点。

1. “地中海上的马车夫”

腓尼基位于巴勒斯坦以北，西临地中海，东抵黎巴嫩山，北接小亚细亚，与两河流域接近。这里最早的居民是胡里特人，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来了一批塞姆人与之错杂而居，因为他们很早就与埃及交往，埃及人把他们称为“腓尼赫”。后来在与希腊的交往中，希腊人称他们为“腓尼基”，意思是“紫红之国”。它之所以得到这个美称，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发明，就是从海生介壳

中提取紫红色的染料，能染成经久不退色的绛红布，以此闻名遐迩。其实，这里的“国”都很小，无非是一些城邦，起初兴起的是北方的乌加里特和南方的毕布勒，但自公元前二千纪中期起便处在埃及、赫梯、西顿等国的控制下。直到公元前 10 世纪才在南方兴起推罗，全盛时期不过 30 年。公元前 8 世纪以后又受到亚速、迦勒底的侵犯，最后为波斯帝国吞并。

腓尼基处在沿海的一个狭长地带，山地与河谷、海滨平原相间，人们普遍种植葡萄和橄榄，特别善于酿造葡萄酒和榨取橄榄汁。他们除生产绛红布外，还从埃及学来了玻璃制造技术，能生产价廉物美的玻璃制品。他们长于金属制造，铜匠技艺精巧。因为住在海滨，海岸线长，人们经常下海捕鱼，造船业在地中海处于领先地位，能制造一种有双层桨且装有冲角的战船。由于它地处西亚海陆交通的要冲，又有手工业做支撑，造船业发达，这便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使他们成为最先活跃在地中海上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在海上活动的时间有两三千年之久，除销售自产的葡萄酒、橄榄油、绛红布、玻璃制品及青铜器外，大宗的是转手买卖，贩运铜、锡、银和木材。商人常常兼做海盗，大肆拐卖人口，以贩卖奴隶牟取暴利。他们不但开辟了地中海的环行航线，而且在世界航海史上第一次绕行非洲。大约在公元前 700 年，埃及新王国法老尼科久闻腓尼基善于航海之名，便组织一批腓尼基人扬帆远航，二艘海船从埃及港口起锚，经红海沿非洲东岸绕到非洲西岸，经过三年时间，终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大壮举。当他们回到埃及时，法老惊讶不已，称他们是“地中海上的马车夫”。

航海、经商与海盗活动，促使腓尼基入沿航道进行殖民，足迹遍于地中海。早在公元前 2000 年，便在塞浦路斯、小亚细亚沿岸、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及黑海南岸建立商业据点，逐渐发展为腓尼基人的留居地。他们是东方人进入爱琴海的先驱，对基

克拉泽斯群岛及克里特文化、迈锡尼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并成为城邦海外殖民的先导。在推罗全盛时期，大约相当于希腊的“上政时期”，腓尼基人的航线已延伸到地中海北岸及西岸，进入了马尔他岛、西西里岛、撒丁岛和西班牙，还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西班牙的西海岸，以同样的方式在这些地方建立殖民地。公元前 9 世纪末，腓尼基人进入了北非，在那里建立了迦太基殖民地。航海与殖民，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一是使地中海沿岸各地联系起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东部的物质文物陆续传到西部，西班牙、大不列颠的锡和银运往东部；二是以腓尼基为中心进行辐射，人口分散到各个商业据点和殖民地，形成一个商业网络。

腓尼基人最大的殖民地是迦太基，它位于今北非的突尼斯，是当时地中海上的大商业枢纽，当地的粮食、埃及的物产、非洲的奴隶以及西班牙、不列颠的矿产都在这里集散。自公元前 9 世纪腓尼基在此建立殖民地以来，到公元前 7 世纪时迦太基已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它的疆域，包括北非地中海沿岸、南西班牙、西西里大部、科西嘉岛、撒丁岛和阿利阿里群岛，垄断了地中海的商业。迦太基的贸易具有中介性质，通过各据点进行长途贩运。奴隶买卖占有重要地位，大部分是战争俘虏和海盗掠夺来的。国家政权掌握在富商和大土地所有者手中，最高元首是两个“苏菲特”（军事长官），设有 300 人的元老院，也有公民大会。它有强大的海军，拥有百艘 50 支桨的大兵船，在罗马兴起以前堪称“无敌舰队”。他们也善于陆战，军队由雇佣兵和征集兵两部分组成，装备精良，有战象和各种攻城设备，惯于速战速决。

公元前 7 世纪以后，希腊城邦的工商业发展起来，积极进行海外殖民，向东、西、南三面拓展。东面主要是在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面进入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东岸，在这一带与迦太基发生冲突，致使他们无法进入地中海南岸。公元前

4—前 3 世纪罗马兴起，在向外扩张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劲敌就是迦太基。罗马与迦太基联合，在波洛士战争中战败了希腊城邦，地中海形势急剧变化，一变而为罗马与迦太基的对峙。两大强国之间终于爆发了战争，因罗马人称迦太基为“布匿”，故历史上称之为“布匿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始于公元前 264 年，罗马迅速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与迦太基对抗，经过 23 年的艰苦战斗，以罗马的胜利告终，于公元前 241 年迫使迦太基签订和约，将西西里割给罗马，不久罗马又强占迦太基的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变成罗马的行省。迦太基在镇压了国内的雇佣兵起义之后，决定对罗马复仇，由哈米尔卡率军进入西班牙，夺取很大一部分土地来作为丧失西西里的补偿，并成为对付罗马的战略基地。公元前 218 年第二次布匿战争又起，起初是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出奇不意地越过阿尔卑斯山，然后挥军南下，使罗马几乎处于覆灭的边缘。罗马采取紧急措施，全民动员，逐渐解除汉尼拔对罗马的威胁，把战争中心转移到西西里和西班牙。公元前 205 年，罗马军突然进攻迦太基本土，迫使汉尼拔回师，于公元前 202 年迫使迦太基求和。自此以后，迦太基失去了海外的所有殖民地，战舰大部分销毁，从此退出历史舞台，罗马成了地中海上的霸主。

2. 拼音文字的祖先腓尼基字母

腓尼基人对地中海文明的贡献，还不单是开辟地中海环行航道，促进物质、文化交流，真正不朽的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创造，创制了腓尼基字母。这种创造与航海和商业密切相关，因为要在各地进行活动，各种语言之间很难沟通，需要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字符号来产生共识，即使不能直接通话也可从符号上相互理解。商业活动需要的是一种简便、快速而且能记音的文字。简便是最重要的，否则人们很难学习、掌握和运用，当然就很难快

速地使用推广。由于各地语言状况复杂，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用字母记音，由此向着拼音方向发展。

地中海东岸是文字产生的沃土，苏美尔人在公元前 3600 年就创造了“楔形文字”，以后经阿卡德人、巴比伦和亚述的发展而成钉头字系统的文字。埃及人也很早就有了文字，由碑刻体、草纸书发展为标音字母，也在埃及一度流行。然而，字母文字的故乡并不是美索不达米亚，也不是埃及，而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字母文字的真正祖先是北方闪米特字母，它分为南北两支，向西扩散的一支为迦南字母系统，向东发展的一支为阿拉马字母系统。由阿拉马字母演化出来的有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叙利亚字母、波斯字母、印度卢佉字母、粟特字母、突厥字母、回纥字母、蒙古字母等等，大抵属音节文字系统。迦南即巴勒斯坦一带，腓尼基人的住地就在这里。属于迦南字母系统的有早期希伯来字母、腓尼基字母、利比亚字母等，后来的希腊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都出自这一体系，大抵属拼音文字系统。

在巴勒斯坦发现了一些古碑，时代是公元前 1700 年左右，这是北方闪米特字母最早的碑文。后来在腓尼基的比拨罗地方（今属黎巴嫩）找到了一块公元前 13 世纪前后的古碑，文字学家把这种碑文称为“比拨罗字母”，当是最古的腓尼基字母。比拨罗是腓尼基的重要港口，由埃及经腓尼基到爱琴海的船只多经过这里，埃及的莎草纸也运到这里集散，而埃及人称纸草为 *papyrus*，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比拨罗（*byblos, byblinos*）。“圣经”一词原意是“纸草的书”，所以写作 *papyrusbook*。这块古碑现已解读出来，称为阿希拉姆墓碑。比拨罗既是商业码头，同时又是文化码头，这一事实证明腓尼基文字的产生与商业的需要有密切关系。

腓尼基字母是由北方闪米特字母演化出来，它在闪米特的

26 个字母的基础上简化为 22 个辅音字母，这种文字流行的时间很长，大致在公元前 13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延续千年之久。它通行的范围主要是在腓尼基人通商的地方，特别是它的殖民地。由于各地语言不同，文字也发生变异，于是形成塞浦路斯腓尼基字母、撒定尼字母、迦太基字母、新普尼字母等分支。在北非，又从迦太基字母分化出利比亚字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形成伊比利亚字母和土得坦字母。

尽管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字起源很早，但它们通行的范围主要在埃及和西亚，后来都变成了“死文字”。腓尼基文字不同，它作为一种商业通用文字传遍了地中海，在长达千年所产生的作用是其他文字无法比拟的。更重要的是时间上的延续，希腊人在它的基础上增加元音而创制希腊字母，罗马又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加以改进而创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也从这一系统分化出来，这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文字演变的脉络告诉我们，东、西方文化事实上很难截然分开，许多文化渊源还得在东方寻找。

3. “亚欧陆桥”上的古国赫梯

当我们的目光沿着“新月形东方文化带”向北搜索时，就会发现在它的端点上有一个古老的国家赫梯。赫梯在公元前 15 纪末至公元前 13 世纪初曾经是西亚一大强国，但它在历史上有如昙花一现，自公元前 8 世纪被亚述灭亡之后便销声匿迹，所以使人感到陌生。赫梯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卡帕多细亚的地方，在今土耳其的基其尔—伊尔马克河流域。

小亚细亚是西亚的一个半岛，它的北面是中亚的黑海，西北有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与欧洲分开，并沟通黑海和爱琴海，因而被称为“亚欧陆桥”。东临爱琴海，离海岸不远有一连串小岛，以罗得岛最为重要，往西则是爱琴海文

明的发源地基克拉泽斯群岛和克里特岛，像“跳蹬”一样与希腊半岛交通。南而是地中海，通过塞浦路斯岛可达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埃及。东南而是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发源于小亚细亚南部的亚美尼亚山地。往东是伊朗高原，即古波斯。小亚细亚半岛三面环海，海岸线长达 3000 公里，又控扼黑海通往爱琴海的咽喉要道，且是中亚通往西亚的大走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贸易很早兴起，早在公元前三千纪亚述商人便在这里建立殖民地，最大的是伽什城。小亚细亚处在东方文化带的前沿和末稍，又是爱琴海和希腊文化的起点，两种文化在此相互衔接。

小亚细亚半岛的中部是草原广阔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北部的山脉与黑海岸平行，东部山岭高峻，南面亦为高山阻隔，西部山地破碎，没入海中的部分便成为岛屿、岬角。广阔的草原上适宜畜牧，农业仅局限在有灌溉的少数地方。境内有煤、铁、铜、锡等矿产，有利于冶金的发展。这里最早的居民是哈梯人，在公元前三千纪已跨进了“文明”的门槛。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之初，来了一批操印欧语的部落，土著人把他们称为“赫梯”，稍后又来了一批乌拉尔图人，住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凡湖周围。公元前 19 - 前 18 世纪之交，赫梯人形成了部落联盟，并建立设防的城市。从公元前 17 世纪开始，赫梯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统一赫梯和哈梯各部，又攻占喜克索斯人的据点，洗劫巴比伦城，至公元前 1535 年国王铁列平进行改革，标志着国家正式形成。

公元前 15 世纪末至 13 世纪初，赫梯达于鼎盛。这正值埃及的新王国和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三国在叙利亚一带角逐。汉谟拉比死后，巴比伦衰微，赫梯乘机攻灭巴比伦第一王朝，侵占叙利亚，与埃及直接发生冲突。埃及新王国的拉美西斯二世即位后，与赫梯进行长期战争，双方在公元前 1312 年大战于卡叠什，结果埃及人败，拉美西斯二世几乎被俘。此后 16 年中战争延绵不

断，公元前 1296 年赫梯终于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强迫埃及签订和约，将叙利亚大部分划归赫梯。在埃及和巴比伦势力削弱的情況下，赫梯成为雄峙西亚的一大强国，进而侵占腓尼基。但靠武力征服的国家并不长久，到了公元前 13 世纪末，海上民族侵入赫梯，被征服者纷纷反抗，逐渐崩溃为若干小国。公元前 8 世纪，亚速帝国兴起，将赫梯各小国消灭。大致在这一时期，东部的乌拉尔图兴起，屡次与亚速作战，维持了一个多世纪，在公元前 7 世纪和公元前 6 世纪之交为入侵的斯基泰人和米底人所灭。

赫梯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短暂的强盛，而是在于文化上的创造与传播。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赫梯就由铜器时代跨入铁器时代，发明了冶铁技术，出现了铁犁，这意味着铁器已用于生产。铁器的发明“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它带来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其意义决不亚于开启近代文明的蒸气机，划开了一个时代。由于它的特殊位置，必然向周围扩散，这对地中海文明的发展有无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赫梯征服了乌拉尔图，而乌拉尔图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末已善养马，并用马驮运和拉车，这就使赫梯很早就成为一个使用战车的国家。赫梯与巴比伦毗邻，在文化上深受巴比伦的影响。在赫梯强盛之时，已经使用了楔形文字，不但在铭刻的印章上留下这种文字，而且还出现了《赫梯法典》。在土耳其安卡拉附近发现了几万片赫梯泥板文书，其中有两块就载有《法典》。赫梯的史诗《吉斯古莫斯》，实际上是用赫梯语的楔形文字转述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在多神信仰中往往掺杂着苏美尔、巴比伦的神，崇拜手执双面斧的暴风雨神和大母神。雅兹来·凯亚的露天神庙中，有一些岩石浮雕，描绘许多神祇相会的场面。赫梯的建筑同巴比伦相近，大都使用石料，城墙用巨石砌成，宫殿以石板做装饰，宫门前有石兽像，殿堂上有石柱，柱础上有石雕。

赫梯文化西传，对爱琴海文化有诸多影响。在克里特的诺萨

斯宫，发现有赫梯类似的双面斧形。迈锡尼的某些建筑，使用的石料圆柱和雕刻柱基也与赫梯相仿。他们崇拜的普罗米修斯，其原型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可以找到，很可能是通过赫梯的《吉斯古莫斯》转传去的。克里特的线型文字 A，和迈锡尼的线型文字 B 都刻在泥板上，有可能与这一地区流行的楔形文字有关，当然也可能源于埃及文字，目前尚未证实。赫梯使用铁器之时，克里特还处在青铜时代晚期，这就存在着接受这种新生产力的可能性，只是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许多文化痕像表明，爱琴海文明与东方文明有某种渊源关系，其间的过渡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中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新的线索，“特洛伊木马”大概就是一个信号。

4. 小亚细亚半岛的希腊城邦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把希腊半岛连同它在海外的殖民地统称为“大希腊”。“殖民”是希腊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希腊人走进地中海、拓宽发展空间的具体形态。推动希腊人向外殖民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希腊本土狭窄、贫瘠，又都是“小国寡民”的城邦，随着人口的增殖，不得不在希腊半岛以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所以早期的移民人都是去开辟新的土地。与此相关联的是工商业的发展，需要拓展市场，输入粮食和原料，以本土为中心，通过留居地和殖民点构成一个宽广的辐射网络。政治斗争也是一个原因，失利的城邦集体搬迁，被排挤的分子另找安身之所。因为是“小国寡民”，没有统一的行动，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移民多带有自发性质，并不是征服的结果。事实上希腊殖民地与本国并没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移民在新的地方另建城邦，只是在经济和文化上保持联系。当然，同出一个部族的人往往相对集中，共同占据一片土地或共建一个城邦。不过，移民到了新的地方以后，血缘渐渐混杂，与当地居民

融合，因而后来的“希腊人”大都不是纯粹的希腊血统。

公元前 8—前 6 世纪是希腊向外移民的高潮，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好像“池塘边的蚂蚁和青蛙一样，栖息在地中海岸线上”。移民呈辐射状：向东扩散到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向西进入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和西班牙，向南远播北非。然而主流在东方，以小亚细亚为目的地，一则是因为爱琴海中岛屿星罗棋布，便于辗转迁徙，不像到北非那样横渡地中海；二则是东方市场广阔，黑海沿岸是希腊粮食的主要供给地；三则是小亚细亚地理位置优越，有利于工商业发展。进入小亚细亚的移民有三支：爱奥尼亚人占据小亚细亚沿岸，建立了弗西亚、爱非斯（以弗所）、米利都等城邦；多利安人从伯罗奔尼撒出发，进占罗得岛，在小亚细亚海滨建立西尼达斯、哈利加纳苏等殖民地；伊奥利亚人占据了一些爱琴海岛屿后，在小亚细亚建立西姆斯米利亚等城邦。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是通往黑海的重要商道，所以希腊人在两岸建有许多城邦。在各希腊城邦中，米利都最有号召力，它发动爱奥尼亚诸城邦反对波斯的斗争成了波希战争的前奏。后来波斯为了控制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极力扶植米利都督主，而波希战争自此爆发。

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地位重要，它们对希腊政治、经济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波斯侵占了这些城市，掐断了希腊的生命线，终于导致了波希战争。对波希战争起决定作用的“提洛同盟”，实际上是希腊本土及小亚细亚各城邦的大联合。希腊人打败波斯后，恢复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打通进入黑海的通道，希腊从此进入繁荣时期，由此可见其重要意义。从文化的角度看，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是吸收东方文化的主渠道，或者说是插入东方的毛细血管，因为这些城邦分散在小亚细亚各地，又与东方各国广泛开展贸易，因而成为希腊人学习东方文化的先行者和受惠者，并通过他们把东方文化传入希腊。

“米利都学派”的兴起决非偶然，它因工商业发达而广泛接触东方文化，得风气之先。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泰勒斯到过埃及和巴比伦，在米利都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派，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米尼都出自这个学派。往后兴起的“爱斐斯学派”也是在小亚细亚，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赫拉克里特。“爱利亚学派”虽然形成于意大利希腊城邦，但其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从小亚细亚移植去的，它的创始人色诺芬尼就来自于小亚细亚的科罗封城邦。这些学派开创了希腊的哲学，并奠定以后希腊哲学发展的基础。使雅典哲学活跃起来的“智者派”，大都不是雅典人，很大一部分是来白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从希腊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它兴起于边缘而向雅典集中，倘若没有米利都学派、爱斐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和智者派，希腊哲学不可能有如此的辉煌。

再拿建筑来说，在希腊最先流行的是伯罗奔尼撒兴起的“多利亚式”，可是后来却普遍采用“爱奥尼亚式”。爱奥尼亚式建筑起源于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城邦，其经典建筑就是爱斐斯的阿尔特米斯神庙。最能反映希腊建筑艺术的是雅典的帕特嫩神庙，它的主神庙是多利亚式的，后厅兼取爱奥尼亚式和多利亚式的檐和柱，而它北面的厄瑞克神庙则全部采用爱奥尼亚式。希腊的雕塑，起初多是模仿东方，如同埃及一样取人的正面，戴埃及式假发，双脚平行，显得刻板，大概在公元前 6 世纪以后才改变风格，说明它的源头仍是东方。像这样的例子在其他方面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五）地中海上最先崛起的波斯帝国

波斯即汉代史书上所说的“安息”，它是地中海上出现的第一个地跨亚、非的大帝国。这个帝国在公元前 6 世纪崛起，波希战争以后日渐衰落，公元前 330 年为马其顿所灭，以后又沦为罗

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 226 年再度兴起，建立了萨珊王朝，到 5 世纪发展成为西亚的一个帝国，史称“新波斯帝国”，于 642 年被阿拉伯帝国灭亡。

波斯在历史上起起落落 13 个世纪，对人类文明产生如下重大影响：一、将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腓尼基几大文明区联通，改变了各自孤立发展的格局；二、波斯是中国“通西域”的终端，对沟通中国与地中海文明起过重要作用；三、波希战争是一个重大转折，在此之后希腊、罗马文明上升到主导地位；四、波斯帝国虽然灭亡，但它确立的政体影响到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五、“四方交会”的波斯文化，对往后的伊斯兰文化有诸多影响。

1. 地跨亚非两洲的波斯帝国

波斯位于西亚的伊朗高原上，古希腊人和中国人都把伊朗称“波斯”。伊朗高原处在一个重要战略位置，东与中国、印度接壤，西邻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北靠中亚的里海，南隔波斯湾、阿曼湾与阿拉伯半岛相望，素有“欧亚陆桥”之称。高原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全境高原与山地相间，平均海拔 1200 米，近海地带为平原，东南部为沙漠覆盖。属大陆性气候，具有干燥、夏热冬寒的特点。经济以农牧为主，但波斯人长于贸易，汉唐间波斯商人往来于“丝绸道上”，一度控制海上贸易。

伊朗高原上早期的居民来自中亚的游牧人，他们当中的安德罗沃部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逐步南迁，进入伊朗高原后与当地土著融合成雅利安人，是米底人和波斯人的远祖。米底人在公元前 9—前 8 世纪处于游牧向农耕过渡阶段，分为 6 个部落，臣服于亚述。公元前 7 世纪后半期，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国家，建都埃克巴塔纳（意即“四方交会之地”），仿亚述组成多兵种军队，并与新兴的迦勒底巴比伦结盟，于公元前 605 年攻陷尼尼

微，在灭亡亚述的战争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以后横扫西亚，征服乌拉尔图，与吕底亚争夺小亚细亚，形成一个包括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米底王国。但为时短暂，二世而亡，后来为波斯取代。

波斯人原先住在伊朗高原南部，分为 6 个农业部落和 4 个游牧部落，他们在反抗米底统治的斗争中联合起来，终于在居鲁士的领导下于公元前 550 年推翻米底王国，建立了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在希罗多德的笔下，居鲁士是一个“历史与神话参半”的人物，极富传奇色彩。他组建了一支精锐部队称为“卡拉”（意为“人民”），规定 15—50 岁的男子必须入伍，所以阵容特别庞大，战斗力强，很快统一了伊朗高原。公元前 538 年灭了新巴比伦，公元前 529 年征服了小亚细亚，并使爱琴海东岸的希腊城邦臣服，兵锋直抵中亚的锡尔河。在居鲁士看来，宗教的力量比国家更为强大，所以在政策上对各国的信仰都很宽容，释放了“巴比伦之囚”。他死了以后，冈比西斯继承乃父之业，于公元前 525 年征服埃及。大流士时进一步扩张，于公元前 518 年占领了印度西北部，接着又远征黑海草原和欧洲多瑙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地跨亚非两洲势力达于欧洲的大帝国，将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及西亚文化带囊括在一起，推动了地中海文明的交融、发展。

然而，这个庞大帝国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而是靠武力征服形成的军事行政联合体。被征服的国家似乎还有它们的国王，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波斯皇帝则成了“王中之王”。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专制政体，皇帝高踞于由权力构成的金字塔的塔尖上，被称为 *basileus*。皇帝的命令和裁决都是神阿胡拉·马兹达的授意，因而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皇帝是最高审判官，其下有一个由七人组成的高等法庭，法律条款多由祭司拟定，最后由皇帝批准。将全国分为 20 个“萨特拉匹”（行省），由总督代

行皇帝职权，例如波斯都城附近设有帕萨尔加底、帕塞波里斯、埃克巴塔纳和苏撒四个行省，其余地区则有波斯省、小亚细亚四省、巴比伦亚速省、印度省、埃及省等。各省每年按规定向中央政府交纳贡赋，如印度省 4680 塔兰特、巴比伦亚速省 1000 塔兰特、埃及省 700 塔兰特、小亚细亚四省共 1760 塔兰特。因为幅员广大，贡赋众多，所以财力雄厚。

军队是帝国的柱石，以强大的军队支撑着这个庞大的帝国。它实行“义务兵役制”，每个 15—50 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所以兵源广大。常备兵由波斯和米底人组成，分为 5 个军区，每个行省都有将军分驻。最精锐的部队是皇帝的御林军，由 2000 贵族骑士和众多的“无敌”步兵组成。遇有战争，全国总动员，由被征服国征发大量战士，军官多由波斯人担任，所以薛西斯远征希腊时就组织了 180 万人的军队。因为军队来源不同，所以语言纷杂、着装各异，武器也五花八门，以“人海战术”取胜，但临战时往往成乌合之众。

权力的集中与财力的雄厚、使波斯有条件构筑一个以首都苏撒为中心的驿道网络，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大流士一世曾修筑一条连接地中海东岸各大城市的大道，东起苏撒，西至萨狄斯，全长约 2400 千米，设有“王家驿站和极其完备的旅社”，驿站备有传递公文的快马。往东有一条穿过今阿富汗到达印度的大道，这条大道与中国“通西域”的古道相接，波斯商人把香料贩至中国又从中国贩回丝绸，故有“香料之路”和“丝绸之路”的称呼。大流士还开凿了一条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运河，船只可从波斯湾直航地中海，可惜后继者没有很好维修，不久为流沙堵塞。波斯控制了地中海东部航运，但多半是雇佣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船只。为了适应商品发展的需要，波斯铸造了能在各地通行的“大流克”金币和银币，各省只许铸银币，较大的城市可铸铜币。由于货币不同，政府规定金银比价为 13:5.1，现代货币中

的复本制比价即起源于此。

波斯帝国雄峙地中海两个多世纪，第一次把古代东方的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腓尼基等高文化区囊括起来，打破原先的政治疆界，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使各种文化交流，同时又以小亚细亚为桥头堡向西传播文化，对于地中海文明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波斯的重大贡献还在于交通，它修筑的大道既是“政治之路”，又是物资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康庄大道，因而使波斯成为古代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二传手”。行省的建立，驿道的开辟，商路的拓展，货币的流通，改变了地中海各国孤立发展的格局，并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的先驱，这些帝国的体制大体都源于波斯帝国。

2. 波希战争与波斯的衰落及其再兴

波希战争（公元前 492—前 449 年）是一条重要历史分界线，它既是波斯极盛而衰的下降线，同时也是希腊勃然而兴的上升线，由此引起了地中海文明的一次大变局。波斯灭亡底亚后，希腊在小亚细亚的城邦被征服，通往黑海的商道、粮道被截断，降服于波斯的腓尼基人控制了海上贸易，使希腊城邦的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公元前 500 年米利都发动爱奥尼亚诸城邦起义，揭开了波希战争的序幕。公元前 492 年大流士举兵攻打希腊半岛，在第一次战争中波斯海军在阿陀斯海角遭飓风袭击而覆灭，第二次在马拉松遭到雅典阻击而失败。公元前 480 年，当波斯国王薛西斯率海陆大军攻入希腊半岛时，30 多个城邦结城反波斯同盟，且有强大海军，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战役给波斯军以重创，希墨拉战役又击败腓尼基人，希腊人重新控制了爱琴海，促进了希腊各城邦的兴盛。从公元前 479 年起雅典各城邦对波斯采取攻势，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打通黑海，解放小亚细亚各城邦，建立有二百多城邦参加的提洛同盟，于公元前 477 年迫使波斯签订和

约，承认小亚细亚希腊各邦独立，放弃争夺爱琴海霸权，波希战争以希腊胜利告终。

靠武力征服维持统治的波斯帝国失去了军事优势，很快分崩离析，被征服者乘机举兵反抗，强征入伍的外族军队不愿为之作战，宫廷政变不断发生，终于在公元前 331—前 330 年为马其顿军队攻灭，结束了为时两百余年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波斯处在塞琉古王朝的统治下。塞琉古王朝的中心在叙利亚，史称叙利亚王国，即中国史书上所称的“条支”，其疆域大体与波斯帝国相当。公元前 260—前 255 年，塞琉古王朝联合马其顿王朝对埃及作战，史称“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住在伊朗东北部帕提亚地方的游牧部落乘机建立阿尔萨克王朝，与塞琉古王朝分庭抗礼，以后日益强大，公元 2 世纪时把罗马的势力阻挡在底格里斯河以西。公元 224 年，波斯人阿尔达希尔利用帕提亚内讧与罗马人进攻的时机，起兵推翻帕提亚的统治，定都泰西封，因其始祖为萨珊，故称萨珊王朝。萨珊王朝建立之时，正值印度贵霜帝国衰落，罗马塞维鲁王朝不振，有利于它向外扩张。在此后的两百年间，萨珊王朝与罗马发生了九次战争，主要争夺目标是里海与黑海之间的亚美尼亚。罗马皇帝朱理安于 363 年强渡格里斯河，他死后罗马军事力量削弱，被迫与萨珊王朝订立 30 年和约，归还夺去的五个省区，割让美索不达米亚的 3 个要塞，退出亚美尼亚。到 5 世纪时，萨珊王朝的版图包括伊朗高原、里海南岸、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及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大部分，成为西亚一大帝国，史称“新波斯帝国”。

帝国分为 18 个行省，总督由国王任命。财政收入主要是土地税、人头税和工商税，只有祭司、官吏和军人免税。军队由骑兵和步兵两部分组成，骑兵靠国家拨给的份地给养，步兵从农民中募集。伊朗大部分地区靠地下渠道进行灌溉，萨珊王朝在伊朗和伊拉克兴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渠道长二三公里至四十余公里

不等，井眼一般 8—10 米，最深的达 50 米。手工业以金属冶炼、武器制造、纺织为主，尤以地毯、麻布、呢绒著称，还从中国学会了丝绸，善制香料和宝石。它控扼地中海到中亚、印度和中国的商路，泰西封成为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为了控制商路，罗马与波斯不断发生战争，争夺的焦点在两河流域上游和高加索一带。

萨珊王朝的统治，一方面是靠军队支撑，另一方面则是扶植祆教。阿尔达希尔说：“国王的宝座是祭坛的支柱，祭坛又是国王宝座的支柱。”早在 4 世纪初，由于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许多灾难，人民对统治者不满，通过对正统祆教的异端活动进行反抗，摩尼教运动和马资达克派运动就是在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反抗活动。“马资达克派”是从祆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异端教派，宣称世间有善、恶两种势力，号召人民依靠善神推翻恶神统治，建立平等社会。起义从 491 年开始，由泰西封蔓延到全国各地，到 529 年马资达克被俘才镇压下去。为了重建统治，必须强化中央王权，于是出现了科斯洛埃斯一世的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政治、军事，把土地分给军事贵族使之成为王权的支持者，设立铁甲骑兵并征发农民补充步兵，把全国分为四大行政区，每区设一总督，直接对国王负责。税制改革也是一项重要内容，按土质等级、作物种类、灌溉条件和收成多少规定上地税，20—50 岁的男子依财产多寡交纳人头税，对官吏的免税特权加以限制，保证财政收入稳定。为了扩大财源，采取兴修水利，发给农具、牲畜、种子，鼓励垦荒，修筑道路，保护手工业和商业等措施。

萨珊王朝与罗马帝国的战争绵延不断，到了 6 世纪又与拜占庭帝国进行战争，60 年代哒人和突厥人不断侵入，地方势力也纷纷崛起，内忧外患使萨珊王朝陷入危机。589 年，国王霍尔马兹德四世被杀，王子科斯洛埃斯在拜占庭的援助下复位，但不久又与拜占庭帝国作战，逼近君士坦丁堡。627 年在尼尼微战役

中波斯人败，泰西封岌岌可危，宫廷混乱，不得不与拜占庭议和，归还战争初期侵占的土地。7世纪初，阿拉伯兴起，从南而进攻伊朗，自632年起的十年间，萨珊王朝与阿拉伯展开激烈斗争，终因财力不足，国内分裂，政变迭起，难以支撑。637年，阿拉伯占领首都泰西封，国王叶兹底格德三世向伊朗高原方向撤退，阿拉伯军队跟踪追击。642年在尼哈温战役中，萨珊王朝军队大败，伤亡十余万人，新波斯帝国就此灭亡。

3. “四方交会”的波斯文化

人们对波斯的重视，更多的是从“帝国”着眼，强调它是地中海上有一个大帝国，而对它在文化上的意义很少关注。其实，波斯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是世界文化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虽然波斯不像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那样文化起源很早，但首先把“四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的却是波斯。波斯帝国的建立，把埃及、巴比伦、印度、希伯来、腓尼基都归并起来，形成了当时世界上一大高文化区，三千年的古老文明在波斯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张骞“通西域”的终点就在波斯，从此开辟了一条国际交通大道，把遥远的中国与地中海联系起来。波斯是世界文化的重要“二传手”，在东方文化西传的过程中它起了桥梁作用。一方面，它征服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控制了爱琴海地区，使之直接受着东方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通过腓尼基人控制海上霸权，把东方文明带到地中海各地，包括爱琴海诸岛、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及北非。波斯为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做了铺垫，在伊斯兰文化形成中波斯文化也是重要的来源之一。由于波斯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交叉点”上，它的文化就必然具有“四方交会”的显著特征。

拿文字来说，波斯早先使用楔形文字，以后通用阿拉马字母并形成独特的波斯文，七世纪后改用阿拉伯文。西亚原先是“钉

头字世界”，波斯人也使用楔形文字，并结合波斯语制定了 41 个文字符号，其中有 3 个元音符号和 37 个辅音符号，具有音素字母的倾向。在波斯帝国时期，官方文书和碑刻铭文用的是波斯楔形文字，《贝希斯敦石碑》就是用波斯语、依蓝语、巴比伦语三种楔形文字写成，这一时期的许多碑刻和金、银器铭文都是如此。随着时代的演进，一种更为方便的阿拉马字母在西亚流行起来，并成为这条国际通道上广泛使用的通商文字。阿拉马字母与腓尼基字母都同属闪米特字母系统，叙利亚字母、希伯来字母、波斯字母、阿拉伯字母都源于阿拉马字母。波斯起初采用阿拉马字母的草体书写安息语，共有 22 个字母，称为巴拉味字母。到了萨珊王朝时，由于崇尚祆教的缘故，在巴拉味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阿维斯泰字母，祆教经典《阿维斯泰》就是用这种文字写的，它有 50 个草书字母，具有音素文字的特征，其基础是巴拉味字母，有一些希腊字母的特点。阿拉伯征服波斯后，普遍通行阿拉伯字母文字，但大量的波斯语被吸收到阿拉伯语中。

在建筑上也体现出“四方交会”的特点。波斯的建筑以宏伟壮观而显示帝国的气氛，风格在地中海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波斯式”建筑有多种外国引进的成分，但又不完全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显然是兼收并蓄而加以改进的独特形式。古波斯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是帕塞波里斯的石阶，广阔的石阶从平地缓缓延伸至 5—6 米的高台，它仿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塔形建筑，但阶梯坡度和缓而宽广，平台长 460 米，宽 300 余米，被称为“迄今所发现世界上最壮观的石级”。居鲁士的陵墓朴实无华，它用大石块砌成，高约 35 英尺，既像吕比亚的台阶式金字塔形神塔，又像安纳托利亚人的陵墓，列柱及浮雕仿埃及而又错落有致，细长的石柱大概是仿亚述，而动物柱头却又模仿尼尼微和巴比伦，颇具兼包并蓄的特点。它修建了帕萨尔加德宫，在大殿的废墟上还留下两根残缺不全的黑石圆柱，高达两层楼，而宫殿的后面耸

立着一座神秘的塔状建筑物——阿维斯泰塔。大流士一世在波斯利斯修建了一个宏大、美丽的宫殿，它虽毁于亚历山大的兵火，但还残存着宫门侧柱上的雕刻、大殿巨型石阶上的浮雕和 13 根高大的柱子，从规模上看当是那一时期最宏伟的宫殿，列为世界十三奇迹之一。大流士在埃及的哈里杰绿洲上建了一座波斯希比斯神庙，巨大的门上托着波斯波利斯典型的凹形门楣，神庙浮雕上把大流士刻为法老。薛西斯一世宫殿的觐见大殿称为“百柱大厅”，北端的柱廊上有一对石雕公牛守护，后宫也还有许多遗迹，等待人们进一步发现。萨珊王朝的建筑继承了波斯帝国时代的风格，同时又吸收了新的成分。萨珊的塔格基斯拉王宫，与帕提亚的阿舍尔王宫非常相似。它建有 115 英尺高的“伊万”，就是一种半圆形的拱顶，可跨越较大空间而无须用柱支撑，直接在墙体上垒起。他们对“伊万”作了创新，如对角斜拱利用小支撑结构把邻近的墙壁连接到角落，在方形的房屋上构成一个圆顶，这对罗马式建筑和阿拉伯建筑都产生影响。

“四方交会”的特色在艺术上可表现出来。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大流士下令在波斯波利斯雕刻的一系列气势宏伟的浮雕，它沿着觐见大殿的阶梯向前延伸，后来为其子薛西斯一世完成。阶梯侧的浮雕有一层、两层、三层，描绘波斯帝国境内不同民族的进贡图景，有赶着牛的犍陀罗人，有手拿盾牌和碗的亚述人，有举起瓶子的吕底亚人，有牵着骆驼的帕提亚人，有挑担子的印度人，有抱着动物的埃兰人，还有捧着贡物的爱奥尼亚人及牵着马的亚徐亚人，可以说是波斯大帝国包容的“百族图”。大流士一世在埃及的哈里杰绿洲修建了一座波斯希比斯神庙，神庙的浮雕上把大流士刻为一个法老。在苏辙发现的一尊大流士的雕像，袍子和座子上用埃及、波斯、埃兰和巴比伦四种文字刻写大流士的名字。有一个两英尺高的绿色玄武岩雕像，由埃及权贵乌德亚霍勒森捧着一尊冈比西斯的像，还给他加上太阳神“拉之子”的尊

号。在一件金质的剑柄上饰以两头咆哮的狮子，它是波斯人借用两河流域图案的见证。在帕萨尔发现一块未损的人型浮雕，其上有穿长袍的埃及人在守护居鲁士宫殿的牌楼，他的帽顶是由弯曲的公羊角和竖起的眼镜蛇组成，身上还长出向上张开的翅膀。据专家们研究，它是以叙利亚和腓尼基模式为蓝本，显然是由埃及原型衍生而来，而翅膀则取法于亚速和巴伦。在伊朗西北部的济危伊要塞遗址上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象牙制品，其中有一件金质的胸饰，中心是乌拉尔图的丝带状树木图案，上部两角蹲伏的野兽图案可能是受西徐亚人影响，下部有长着翅膀的野兽，反映了多种艺术风格，包括亚速、叙利亚、腓尼基及希腊的多种因素。有一只金、银制成的怪物像，头上是山羊角，身上长着翅膀，看上去似希腊的赛利纳斯神和腓尼基的贝斯神。各种文化在波斯交融，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由此可以看出波斯对地中海文明的贡献。

波斯成了四方物资荟萃之地，各地宝物流向波斯。有一只金碗与浮雕中亚速人的进贡品相似，它的把是一头拉长身了的狮子，在波斯颇为流行。在苏撒发现一条黄金和宝石做成的项链，它是由印度输入，另一件上嵌绿松石和青金石耳环可能源于埃及。有一剑柄上饰着象牙雕刻的公牛头，象牙来自埃及、努比西和印度，因为西亚是不产象的。象牙角状杯也很典型，象牙是外地输入的，而上面雕的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奥克苏斯宝物中有一金剑鞘，与浮雕上西徐亚人和米提亚人腰间的剑鞘一模一样。在泰佩努什扬要塞出土一只铜碗，碗中有 100 多件物品，其中有螺旋状的银器，专家们认为这是用于商品交易中结账的。文化交流的结果，促进了波斯手工业制造，萨珊王朝时的工艺品明显进步起来，例如：刻有国王追逐一对奔逃公羊的银盘、嵌有石榴石和玻璃的镀金剑柄、水金底金碗、螺旋状浮雕的玻璃制品、银马角状杯、镀银花瓶状水罐、雄鸟银饰的镀银花瓶、玻璃镶嵌的金

碗等等。意味深长的是，几乎所有流传至今的波斯纺织品都不在波斯境内发现，而是在欧洲、中亚、埃及和中国，说明它们流传很广。在土耳其西部发现了一些波斯所产的银碗和带柄银罐，使人相信波斯“像克罗伊斯那样富有”。波斯宫廷所用的豪华金质角状杯，后来成了希腊将军的战利品，在希腊城市埃雷特里亚发现一个宝石蓝雕刻，上面刻的是美丽的波斯女人形象。在西北利亚出土了一件马皮毛护胸的残余物，它是波斯所织。在保加尼亚的杜万里出土一件双耳银瓶，两柄是直立的狮子，左边的兽头上有野山羊装饰，它也来自波斯。又在阿富汗发现一辆金质的驷马战车模型，车轮上有球状突起，车夫立在车上驾车，车上是一尊凸起的埃及喜神贝斯像。大量的考古证明，在波斯帝国广袤的土地上，各地物资广泛交流，不但是埃及、巴比伦、印度，而且到达中亚和希腊，中国的丝绸在这一时期传到波斯，波斯的香料也传到中国。

继新波斯帝国而起的是阿拉伯帝国，然而在文化上波斯却是阿拉伯人最重要的老师，这是因为波斯距阿拉伯最近且文化较高，萨珊王朝长期统治巴格达，阿拉伯建国后首相、大臣和书记官多是波斯人。尽管阿拉伯灭波斯后逐渐改用阿拉伯文，但波斯语词汇大量进入阿拉伯语。波斯的祆教对伊斯兰教的形成颇有影响，尤其是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观。波斯的许多文学作品如《卡里莱和笛木乃》、《稀有的真珠》、《人文学》、《小文学》、《希扎尔·埃夫萨乃》等，后来都被译成阿拉伯文。被誉为阿拉伯文学瑰宝的《一千零一夜》，事实上是来自波斯、伊拉克、印度的民间故事，波斯的《希扎尔·埃夫萨乃》就是此书的原型之一。波斯的史学著作很多，著名的如《波斯国王传记》、《波斯诸王史》、《马兹达》、《琐罗亚斯特教士》、《萨珊国工历史》等。在阿拉伯的阿拔斯时代，阿拉伯化的波斯人与波斯化的阿拉伯人极为普遍，学术著作、格言、诗歌及散文中的波斯成分极为明显。

4. 祆教、摩尼教和景教

伊朗原先信奉的是太阳神米拉、大地女神阿乃塔和牛神哈玛，后来在雅利安人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形成了祆教。在其他宗教的影响下，祆教中出现了被视为异端的佐而文派。到了萨珊王朝时期，祆教的异端形成了摩尼教。基督教传入以后，又从东部教派中分化出景教。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这些宗教不断向周边扩散，甚至传到遥远的中国。祆教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对后来形成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波斯的宗教，同样反映出“四方交会”的特点。

“祆教”是汉语的意译词，意思是“事奉外国天神”的宗教，并根据其仪礼特征而称“拜火教”。西方人根据这个教创始人的名字，把它称为“琐罗亚斯特教”。琐罗亚斯特的生卒年代至今没有弄清楚，所以它形成的时间也很难确定，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 11—前 8 世纪之间，也就是雅利安人的“英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6 世纪波斯帝国兴起，阿里门尼德王朝看中宗教的统治力量，宣布祆教为国教，成为波斯文明的基础。祆教的经典是《阿维斯陀》，其中最古老的部分是《伽泰》，据说是先知琐罗亚斯特的布道歌。它有一套完整的宗教思想体系，其核心是善恶对立的宇宙观，由此产生弃恶从善的社会观和善必胜恶的来世观，以及“三善”救赎的道德观等。

“二元对立”是祆教的立教基础，相传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了天神、宇宙万物和人，而恶神阿赫里曼却偏偏常来捣乱，从此进入了“混杂三世”，双方展开激烈斗争。善与恶的对立长期延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最终是阿胡拉马兹达集合一切从善的力量战胜了以阿赫里曼为首的恶魔，于是天地焕然一新，进入了“分别世界”，人神共享和平与欢乐。阿胡拉马兹达为了战胜阿赫里曼，创造了 6 个天神，他们是：代表智慧和善良的“巴

赫曼”，后来奉为动物神；代表至诚和圣洁的“阿尔迪贝赫什特”，被奉为社会秩序的保护神；代表威严和仁政的“沙赫里瓦尔”，被奉为守卫大地的神；代表谦恭和慈爱的“斯潘达尔马兹”，被奉为土地女神；代表完美和健康的“霍尔达德”，被奉为江河女神；代表永恒不朽的“英尔达德”，被奉为植物女神。它们都体现阿胡拉马兹达的某种神性，有共同的灵魂、声音和行为，集合起来就是至善至美的阿胡拉马兹达，所以，这六大神都是他的化身，或者说是“七位一体”。

既然有善与恶两大势力存在，各自都在召唤自己的信徒，人们要不走人歧途而入正途，就必须弃恶从善，死后让灵魂在“光明世界”里永远幸福。这里有“灵魂审判”的意思，行善积德者由仙女引入无限光明的天堂，作恶多端者则在刀刃般的分别桥上跌入地狱，功过参半者便处于两者之间的“阴阳界”。要在死后获得永生，必须善思、善行、善言，即笃信阿胡拉马兹达，不自尊自大，不心怀叵测；要赞美阿胡拉马兹达和六大神，不得撒谎、行骗、争吵、谩骂、污蔑、诽谤；严守教规、勤事劳动、乐善好施、扶弱济贫。弃恶从善的根本就是崇奉真神阿胡拉马兹达，而火与日月星辰则是带来光明、驱逐邪恶的象征。

祆教有一套基本教规教仪，其准则都写在《阿维斯泰》中，它语言典雅庄严，感情真挚热情，记有祷语、圣诗、神话、仪式、道德、教训等，与印度的《吠陀》有某些相似。按教规，儿童年满 15 岁必须举行成年礼，每日进行五次祈祷。祆教最重“圣洁”，保持宇宙的洁净状态，不允许沾染不洁净的空气，不食不洁净的东西，更不能沾污水和火的圣洁。祈祷前必须洗脸、净手、净脚，重大仪式时有“九天之濯”的洁净礼，粪便、头发、指甲、唾液等不净之物必须包好抛到荒野，尸体要抬到荒漠的天葬台。祆教的七大节日是元旦节、仲春节、仲夏节、收谷节、返家节、仲冬节和万灵节，这些都与农事活动有关。早期的祆教不

立神庙，不设祭坛，不拜偶像，到了阿塔薛西斯二世时才提倡偶像崇拜。“一神教”的倾向，“二元对抗”的理论，“天堂地狱”的观念，以及洁净、祈祷、颂经等教仪，对后来的宗教多有影响。

萨珊王朝建立，极力扶持祆教，提高祭司阶层的地位，激起了人民的反对，于是摩尼教应运而生。摩尼教以创始人摩尼得名，他以“光明使者”自命传播“救世真理”，宣扬“二宗三际”说。“二宗”是指“光明”与“黑暗”两个彼此相邻的“国度”；光明国占据北、东、西三方，最高神祇是“大明尊”或称“明王”，他至善至美，带来光明；黑暗国在南方，有“五类魔”盘踞，集一切邪恶之大成，最大的恶魔是黑暗王。“三际”是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它们是“二宗”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三个时态。“初际”是它们的原初形态，两国虽然相互对峙，却又彼此相安。不幸的是，黑暗王嗅到了“一些快乐”气味，诱发出无穷贪欲，不断入侵光明国，于是大明尊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与黑暗进行无休止的斗争，直到世界最后毁灭，这就是“中际”。最后的结局即“后际”，那时是“明既归于大明，暗亦归于积暗”。宣扬这一说法，是为了指导人们劳身救性，修炼自己，拯救灵魂。为此，摩尼教订出了严格的清规戒律，要求人们做到“四不”（不吃荤、不喝酒、不结婚、不聚财），忏悔“十不当”（虚伪、妄誓、作假证、迫害善人、播弄是非、行邪术、杀生、欺诈、无信等），遵守“十戒”（不拜偶像、不谎言、不贪、不杀、不淫、不盗、不行邪术、不二见、不惰、每日四时祈祷）。它的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二元思想显然来自祆教，而教义和教律不少来自基督教和佛教。摩尼教号召人们争取光明、战胜黑暗，在萨珊王朝夺取政权之初显然利于新王朝建立，所以得到波斯国王沙普尔的支持，曾经显赫一时，迅速传遍波斯全境。但瓦赫兰一世继位，发现它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将摩尼钉死在十字架

上。瓦赫兰二世更是大加迫害，屠杀教徒，迫使他们流亡国外，在阿塞拜疆、小亚细亚、埃及、北非、中亚等地建立摩尼教团，以后又传到中国和印度。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自称东方教会，西方通称它为叙利亚教会或波斯教会，实则是聂斯托利派。波斯教会起源很早，大约在公元 2 世纪传入埃德萨，3 世纪时基督教已遍及波斯许多地方。聂斯托利原先是安提阿的修士和长老，428 年被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认为基督“道成肉身”只能理解为精神上的统一，而不是神性与人性合为一体，因此，童贞女马利亚只是基督的人身之母，而非“上帝之母”。这一言论遭到亚历山大宗主教的强烈反对，在 431 年的以弗所公会议上受到“缺席谴责”，于是将他革职、流放，死于利比亚沙漠的绿洲中。聂斯托利派被宣布为“异端”，但仍作为一个独立教会存在，埃德萨是这一派的重要据点。伊希卜哈担任埃德萨主教时，聂斯托利派声势大增，但他死后却遭到迫害。埃德萨的这一教派在巴达马的率领下越过边界进入波斯，受到波斯教会的欢迎，波斯国王承认聂斯托利派是波斯境内惟一的合法基督教派，并与拜占庭帝国教会断绝关系。后来巴达马制定新的教规，允许教士授圣职后结婚，与西部教会对立，并适应波斯的文化传统。阿拉伯征服波斯后，景教受到保护，教会中心移至巴格达，10 世纪末在波斯境内设立 15 个都主教区，在叙利亚、中亚、印度和中国设立 5 个都主教区，以后不断扩大传播范围。

第二篇 璀璨的希腊罗马文明

希腊、罗马在世界文明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们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体育及政治上取得的成就一直为欧洲人引以自豪，致有“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之誉。然而，从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希腊、罗马文明属于整个人类，它孕育形成于古代东方开创的地中海文明，在此之前已有两千多年的文化积累。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是架在古代东方与希腊半岛之间的一座文化之桥，爱琴海文明首先在这里兴起，成为希腊文明的前奏。倘若把希腊文明与地中海剥离开来，“希腊奇迹”的出现将会成为不可理解的怪事，因为希腊的文字源于腓尼基字母，希腊哲学最先兴起于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埃及、巴比伦的自然科学已有了一定基础，希腊文学、艺术、建筑、宗教在东方都可找到它的源头。但希腊文明并不是古代东方文明的简单延续，而是创造和发展，是在城邦、航海、贸易与民主的特殊文化生境下长出一朵奇异的花。希腊文明的突显不断改变文化面貌，成为地中海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变奏曲。不过，希腊文明的扩散，主要是在“希腊化”时代。在此之后，雄峙地中海六七百年的罗马帝国，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并把希腊文明发扬光大，对欧洲和世界产生诸多影响，所以说“伟大属于罗马”。就地中海文明而言，第一个高潮在古代东方，第二个高潮转向希腊、罗马，持续了将近10个世纪的时间，给人类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它的历史

线索十分清楚，爱琴海—希腊—希腊化—罗马构成了一条明晰的文化演进主线。

（一）爱琴海文明的浮沉

爱琴海在地中海的东北角上，介于小亚细亚半岛、巴尔干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与克里特岛之间，是一个套在地中海边的内海，状如哑铃。海面上岛屿星罗棋布，大小五百余个，环绕小亚细亚西岸的有罗得岛、南斯拉夫群岛、莱斯沃斯岛、莱姆诺斯岛等，巴尔干半岛南端与克里特岛之间是基克拉泽斯群岛，包括安德罗斯、基亚、塞洛斯、提洛、帕罗斯、纳克索斯、爱奥斯、米洛斯、瑟雷诸岛。

欧、亚两洲在此搭界，从小亚细亚半岛到巴尔干半岛，中间只隔着达达尼亚海峡、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海上分列的岛屿，相距不远，犹如一条长链，使小亚细亚与希腊半岛联系起来。它与地中海似乎没有什么障碍，克里特岛横在其间倒像是一块跳板，从埃及的尼罗河口到克里特，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只需三四天时间。向东北航行，通过达达尼亚海峡可进入马尔马拉海，再经过博普鲁海峡便进入了黑海了。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爱琴海处于开放态势，有利于航海、贸易和文化交流，因而爱琴海文明很早便浮升起来。

然而，这里的古老文明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戏剧性地消失了，许多故事仅保留在神话般的《荷马史诗》中，人们半信半疑。沉睡了 2800 年的爱琴海文明，到了 19 世纪前半期，由于考古学家们的孜孜不倦的努力，终于发掘出来，把神话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历史。考古资料显示，爱琴海地区的历史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3500 年进入铜石并用时期。青铜时代跨越了整整 25 个世纪，早期在公元前 3500—前 2000 年，中期在公元

前 2000—前 1600 年，晚期在公元前 1600—前 1000 年。但从考古发掘的遗址来看，一个时期在空间上并不重合，文化中心几次变迁，早期的中心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期以克里特岛最为发达，而晚期则移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地区。

根据现有资料判断，一般认为爱琴海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是希腊文明的先祖。但如果把它放在地中海文明的大棋盘上考察，地中海东岸的“新月形文化带”已伸向了小亚细亚，而基克拉泽斯群岛恰是架在小亚细亚与希腊半岛之间的一座桥梁。克里特岛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它西望希腊半岛，东望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正处在由埃及到希腊、腓尼基至爱琴海航道的交叉点上。因此，爱琴海文明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不受埃及和“新月形文化带”的影响，至少是两种文化的重要接触点，受到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三方面的辐射。当然，这种联系至今还没有被考古资料充分证实，爱琴海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也还留下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空位，有待新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不过，从三期文化的时间次序和空间分布来看，文化流向的脉络大体可知，小亚细亚是文化西传的一个重要桥头堡，腓尼基和埃及的航线加强了爱琴海区域与西亚、北非的联络。

1. 揭开爱琴海神秘的面纱

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以前，人们谈到希腊远古的历史，只能根据《荷马史诗》，靠神话传说来追忆遥远的过去，称为“荷马时代”。在史诗的《伊利亚特》中，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了希腊人对特洛伊的战争故事。据说，帖萨利亚王皮琉斯与海中女神蒂替斯结婚，请了各位女神，惟独不请女神阿芙罗底，使她大为恼怒。阿芙罗底突然出现在宴会上，拿来了一只写着“送给最美丽者”的苹果，引起了女神们的纷争。她们请求宙斯神裁决谁足“最美丽者”，而宙斯把这件麻烦事推给了特洛伊王子巴里斯。女

神阿芙罗底向巴里斯承诺，只要把这苹果判给她，便可帮助巴里斯娶到一个最漂亮的妻子。巴里斯被她的诺言打动了心，宣布苹果属于阿芙罗底，于是他们设计拐走了斯巴达国王门涅雷阿斯的妻子海伦。此事激起了门涅雷阿斯的愤怒，联合希腊各路英雄，渡海远征特洛伊。经过 10 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将特洛伊城踏平。在攻打特洛伊的时候，希腊勇士藏在木马腹中，巧妙潜入城里，最后导致特洛伊城的陷落。这个故事具有无与伦比的震撼力，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充满了爱与恨的炽烈感情，高潮迭起，扣人心弦，以其强大的艺术魅力系住许多人的心，在欧洲广为流传。

不过，在许多读者心中虽然引起激动，但多半不相信这是事实，认为它无非是盲诗人编造出来的一个传奇故事。可是，生于德国一个村庄里的亨利希·谢里曼却对这个故事的每个情节深信不疑，相信特洛伊确实存在，发誓一定要找到荷马笔下的这座古城堡。他是个想像力丰富的人，而且是个执著的“痴迷者”，他在做生意中积攒了一笔财富，在磨难中坚定自己的信念，学会了 12 门外国语。他先在《奥德赛》中描写的伊萨卡岛进行探险，开始触摸这渺茫的“英雄时代”。后来选定了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萨里克山，从 1870 年起进行了 13 次发掘，找到了一座“六英尺厚建筑精美”的石墙，于是雇佣了大批工人开挖，又发现了“墙上有墙，城上有城”，重申他对“荷马不可动摇的信念”。他终于成了把神话变为历史的伟人人物，先后发掘出 9 层遗址，最下层属新石器时代，最上层是罗马时代修建的城池，而自上而下的第 6 层大约建于公元前 1500 年，他断定这就是特洛伊城遗址。此事在欧洲引起轰动，目光都集中特洛伊城。然而由于他过于冲动，地层多被搅乱，1893 年威尔海姆·杜菲尔德才从混乱中理出头绪，确定了 9 个不同层位，宣布“事实证明谢里曼是正确的”。1932 年，美国考古学家卡尔·布莱根又来到希萨里克山，作了一次更为审慎的科学考察，认可了《伊利亚特》“根本的历

史真实性”。1988年，德国人曼弗雷德·考夫曼博士再次考察特洛伊，运用高新技术作了为期15年的全面发掘，进一步确认了特洛伊城。

又是一次意外的发现，1866年因开凿苏伊士运河需要大量浮石，使得基克拉泽斯群岛热闹起来。最先在这一群岛上进行系统发掘的是英国学者詹姆斯·西奥多·本特，他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一个设想，认为岛上曾经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史前帝国”。20世纪30年代，希腊考古学家斯皮里敦·马里那托斯认为，群岛南端的瑟雷岛深藏着一个“长期困扰学者们的谜团的答案”，于是着手进行发掘。引人注目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令人吃惊。1965年，马里那托在瑟雷岛上挖了一道壕沟，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上的建筑通常有两层或三层高，有10幢完整的建筑物。又是一次惊喜，发现了数千件石器、陶器和家用器具，而且还发现了一幅精美的彩色壁画断片。瑟雷岛艺术品不断重见天日，又发现一幅描绘一群蓝色猴子攀援的岩画，还有一幅完好无损的壁画。继后，考古学家克里斯托斯·多默斯在瑟雷岛上又发现了一幅精致的壁画，被命名为《春天来了》。接二连三的出土文物，使人想起了那被遗忘的岁月，回复到爱琴海青铜时代早期。

荷马在《伊利亚特》中特别提到“拥有100座强大的城市的克里特”，这又引起了欧洲人的巨大冲动。1900—1905年，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在克里特岛北部发掘了诺萨斯城，发现了两座时代不同的王宫，还发现不少墓葬。遗物相当丰富，有饰以花纹的陶器、青铜立体小雕像以及若干铜器和壁画。他向世界宣布，这是一个新的文明，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于是以传说中的克里特王米诺斯命名，称为“米诺斯文化”。1979年，希腊考古学家詹尼斯和艾菲·萨柯拉斯基夫妇，在废墟中认真清理文物，发现了“祭祀牛角”、“人祭尸体”、“石法螺”、“壁画之屋”、“金叶角状杯”等稀奇之物，更重要的是难以解读

的线形文字。丰富的文物，揭开了克里特岛的又一个千古之谜。

迈锡尼文化的发现比克里特早，那是谢里曼的又一杰作。1876年，继续特洛伊发掘之后，他便开始在希腊半岛进行发掘，想找到《利亚亚特》中“船日”所列的30多个统治者名单上的遗址，可是直到1939年，只找到两座王宫，一座是阿伽门农的迈锡尼宫，另一座是狄俄墨得斯的梯林斯宫，并在埋藏底比斯城的现代城镇底瓦埃进行试掘。1939年，希腊考古学家卡尔·布莱根靠着难以置信的好运气，在美西尼亚发现了一批泥板字块，接着又发现一座宫殿和一座圆顶蜂巢式坟墓，大胆地宣布这就是荷马所说的“多沙的皮洛斯的国王内斯特的王宫”。不久，有一位名叫克尔·凡特雷斯的英国青年，凭着他惊人的智慧，居然破译了这批文字。1952年同时发生了两件喜事，布莱根在皮洛斯的发掘取得了重大突破，凡特雷斯破解B型线性文字的成果也正式发表，这就使得迈锡尼文化的许多谜团解开，对了解“英雄时代”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揭开了早期希腊历史的重要篇章，称为“迈锡尼文化”。

这一系列考古上的重大发现，神话般地把“神话变为现实”，使人们不得不重写希腊历史，用“克里特—迈锡尼文化”这个有实质意义的名称，取代了神乎其神的“荷马时代”。爱琴海文明的神秘面纱揭开了，使人们感到“希腊奇迹”的出现并非突如其来，尽管因历史变故曾经有过断层，但毕竟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三个不同时代的遗址，表明了地中海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透露出古代东方文明向西传播的一些信息，说明希腊文化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与整个地中海文明息息相关，是地中海既往文明孕育出来的骄子。

2. 基克拉泽斯群岛的黎明

基克拉泽斯群岛像是爱琴海中的一条长链，一端接近希腊半

岛，另一端靠近克里特岛，与小亚细亚附近的南斯拉夫群岛相距不远。密布的岛屿，形如“跳踉”，因为相互间的距离不大，即使在远古，小船也可以自由往来。这个群岛南端的瑟雷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化的中心。据科学家考察，在公元前 1500 年更早的时间，瑟雷岛安静地卧在爱琴海南面，后因斯特朗西利火山爆发，岩浆四散，改变了原来的面貌，形成了瑟雷西亚小岛和后来被称为桑托甲尼的主岛。这次火山爆发，可能是使基克拉泽斯古老文明毁灭的原因，使之变成“着迷于它的丑陋”的地方，把大量遗物掩埋在地底，长眠了几千年。

马里那托斯在瑟雷岛上的考古，主要发掘点在今阿克洛提里镇。遗址上的 10 幢建筑分别用希腊字母或 Xese（琢石）1、2、3、4……命名，惟有两处以特征命名，称为“贵妇房”和“西屋”。他们发现了一条贯穿各屋的街道，根据神话命名为“泰尔基内斯”（九个狗头鳍肢的怪物）。“西屋”内还保留着两个凳子和一只烧过的粘土浴缸。在另一间房屋里，发现了一幅精美的彩色壁画，虽然已经残缺，但仍可清楚看到男人的头、展翅的鸟和一只蓝色的猴子。岩壁上现出了一幅用蓝色描绘的猴子攀援图，景致与周围的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振奋的是，在 8 号建筑的一个房间中，居然保留着一幅完整无缺的壁画，神奇地散发着当年的光彩，被称为“这是史前时代为我们保留下来的最完美的艺术品之一”。之后，考古学家克里斯托斯·多默斯细心地用刷子拂去壁画上的火山灰，显现出一幅被命名为《春天来了》的风景画，燕子在百合花上飞翔，景色是瑟雷岛的春光。虽然在这里并未发现国王住过的宫殿，但迷宫式的街巷、广场和稠密的房屋及复杂的排水系统，说明这里曾经是个繁华的港湾。岛上的居民张网捕鱼，在田里种植庄稼，饲养猪和羊，不时上山打猎，建筑里还有作坊、仓库的迹象，制陶工艺颇为发达。壁画显示出瑟雷岛人的艺术天赋，富有才华和创造力，“贵妇房”中的壁画体现出

爱美的观念，“西屋”的壁画暗示这里曾经是宗教庆典的场所。

通过对遗物的研究和分析，我们看到瑟雷岛与外界有广泛联系。岛上发现盛过橄榄油的异域器皿和葡萄酒坛，很可能与腓尼基的贸易有关。大量的黑曜石显然不是本地所产，它的原产地当是米洛斯岛。有些青铜瓶，风格上近乎克里特岛或希腊半岛。岛上有冶炼作坊，但矿产多是进口，如金银和铅可能来自希腊半岛的劳力安矿或者基克拉泽斯群岛。陶器并非都是本岛自产，例如克里特瓶。令人惊讶的是，在迈锡尼墓中掘出的一对金耳环，图案与瑟雷岛壁画中的一模一样。壁画的色调有红、黄、橙、褐、黑、白、蓝等色，然而，最华丽的却是“埃及蓝”。那些蓝色的猴子，据说只有非洲才能找到，而描绘者要么曾经到过非洲，要么曾经引进过这种猴子了。壁画上有两头正在打架的叉角羚，这也是非洲的特产。“西屋”里的一幅壁画上，描绘在河流两岸长着棕榈树和纸莎草，使人联想起尼罗河畔的埃及风光。“浴缸”上的图案纹饰，在爱琴海其他岛上从未发现，上面绘的是埃及的纸莎草和岩羚羊。有一件用作祭祀的“角状杯”，系用一枚鸵鸟蛋制成，颈部和底部皆为釉陶，专家认为是埃及所产。最有启示意义的是“西屋”里的一幅壁画，画面上有两条船驶进港湾，岸上的人列队欢迎，还举行某种宗教仪式。

无独有偶，在瑟雷岛北边的纳克索斯岛的古墓中，发现了狭长快船的铅制模型，最大的长 16 英寸，人们借此可以了解古代爱琴海的航行情况。在纳克索斯的西面、瑟雷岛的西北面有一个米洛斯岛，它是爱琴海地区唯一出产黑曜石的地方。这种岩石是黑色的火山玻璃，锋利而且坚硬，可用来制作工具和武器，所以很早便有人划船到岛上采石，然后运销到附近各岛。在 19 世纪初，到爱琴海去的欧洲游客，常常带回一些原始古朴的大理石雕塑品，于是引起人们关注。英国学者詹姆斯·西奥多·本特，是第一个在基克拉泽斯群岛进行系统发掘的人，他获得了一些大理石

花瓶、大理石雕像、陶碗及银饰，以后又有人在古墓中出土了若干黑曜石刀剑和大理石雕塑的随葬品，打开了这个远古的艺术宝库。雕塑的工具可能是黑曜石制的，材料是大理石，以女性的塑像居多，朴素而不加渲染，手法极其简洁，刀削斧劈式地勾勒出人体的轮廓，鼻子是一个突起的等腰三角形。在纳克索岛的一个采石场上，立着一尊无头的“萨列戈斯胖妇人”雕像，刻制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 4000 年。大理石“小提琴小像”也属于早期雕像的代表，以简洁的手法表现抽象的人体轮廓。最具代表性的是“双臂交叠标准像”，造型刻板规范，锥形的头颅，尖尖的双脚，两臂交叉，人体各部不太符合比例，时代是公元前 2600—前 2400 年之间。武士雕像是晚期的作品，有一条带子穿过胸前，手中握着一把匕首，时代是公元前 2400—前 2200 年。另有一件“弹竖琴者”雕像，它是造型最复杂的一件石雕，但并非出土物，且被人盗卖了。

基克拉泽斯群岛的文明尚处在“铜石并用”时代，从黑曜石制成的工具向青铜工具过渡。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心在瑟雷岛、米洛斯岛和纳克索斯岛这一区域，航海在这里具有特殊意义，人们使用狭长的扁舟在密集的岛屿之间穿梭，并将小亚细亚、克里特岛和希腊半岛联系起来，腓尼基人和埃及的海上贸易也曾到达这一地区。正是这个原因，瑟雷岛出现了“迷宫式”的街巷、两三层高的建筑物和排水系统，米洛斯岛成为黑曜石贸易中心，纳克索斯岛上有开采大理石的石场，从而成为爱琴海文明的先驱。也正是这个原因，能较早接受东方文明，创造出精美的壁画和古朴的石雕。

3. 克里特的“弥诺斯文化”

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赞颂过“拥有 10 座强大的城市的克里特”，相传强有力的国王弥诺斯在宏伟、豪华的克诺索斯

宫统治着富庶的“海上王国”。这些被神化了的历史，终于被考古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20世纪初，亚瑟·伊文思开始进行发掘，迄今为止，已出土数百个定居点，最引人注目的是克诺索斯宫及法斯托斯、马利阿、查克罗斯等宫殿建筑群，还有若干“别墅”，定名为“弥诺斯文化”。“弥诺斯”是神话中国王的名字，也可能像埃及“法老”一样是统治者的称号。据说，克里特岛上有座查克塔斯山酷似人头，克里特人把它想像为主宰万物的宙斯神，他与一个名叫“欧罗巴”的腓尼基公主结婚后，生下三个儿女，其中的一个就是弥诺斯。这个故事折射出两种关系：一是克里特与腓尼基关系密切，二是国王弥诺斯是宙斯之子。据研究，第一批宫殿建于公元前1900年，两百年后因地震夷为平地，称为“旧宫殿时期”；公元前1700年重建宫殿，大约在公元前1380年被毁，称为“新宫殿时期”。

克里特是爱琴海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250公里，南北宽12—60公里。它横卧在爱琴海与地中海之间，仿佛是一道屏障。岛的东部地势平坦，中部是伊达山，西部为多山地区，适合农业牧业和渔业发展，是一个富饶的地方。克里特岛的居民不属印欧人种，可能是来自北非利比亚一带，也可能与小亚细亚的卡里亚人有关。克里特文化继基克拉泽斯文化之后兴起，和地中海的形势有关，当时埃及中王朝的海上贸易极盛，腓尼基人又积极向地中海西部殖民。克里特岛恰好处在腓尼基、塞浦路斯到意大利半岛、西班牙半岛的航道上，同时又是埃及通往爱琴海的必经之路。两条主航道在此交叉，不但刺激了克里特岛商业的繁荣，而且促成了青铜业的发展。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克里特所用的铜来自塞浦路斯，而锡则来自意大利半岛和西班牙半岛。从公元前2000年起，克里特进入了长达千年的青铜时代，放射出文化的异彩。

克里特岛的文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器物颇类似小亚细亚

和塞浦路斯。孤悬海上的地理位置使它早期处于安宁的环境，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如同《奥德赛》描写的那样：“我们永远热爱的是宴会、竖琴、舞蹈、换衣服、洗暖水浴、谈情说爱和睡眠。”第一批建立的“宫殿”，实际上是设有作坊、仓库、市场、居室和宗教设施的社区，似乎还不具备宫室的规模，而只是宗教活动与经济生活中心，没有设防。许多房屋用作宗教祭祀场所，崇拜自然女神，而所谓“国王”无非是主持祭祀的祭司，凭借神的权威进行统治。有一个被称为“阿尼莫斯匹力亚神庙”的圣地，实际上并没有神庙建筑，人们围着树林、岩洞顶礼膜拜，有一幅名为《神圣的树丛》壁画描绘的就是这样的情景。这里出土了 400 多件陶器，多是用来盛祭品的器皿，有的上面留下一种被命名为“A 类线性文字”的铭文，它系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成，至今尚未破译出来。艺术品中没有战争、压迫一类显示暴力的主题，也很少有统治者的形象。迈阿托斯有一个古老的村落，占地 1500 平方米，有许多用石头和泥砖建成的小屋。“别墅式”的房屋为两层或三层，有一件赤陶模型提供了房屋的样式，上为平顶，有一道楼梯通到楼上，楼的四周为圆柱，前方伸出一个阳台。

位于伊达山北面的埃斯托斯，风景秀丽，登上山顶可以俯瞰壮阔的大海。这里有一个埃斯托斯王宫遗址，入口处还保留着 12 级台阶，奇怪的是台阶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蛇形沟槽，至今没有人知道它的用意。若干大小不一的房间围着一个带圆柱的中央庭院，西侧有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外庭，通过一段宽阔的阶梯与内庭相连。这里有堂皇的大厅、祭祀的内室、堆物的仓库和饲养牲畜的栏厩，中院和西院可能是君王举行庆典的地方。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大量精致的陶器，称为“卡玛利斯陶器”，薄如蛋壳的陶器和造型优美带有花形装饰的陶杯，标志着制陶技艺的高超。陶器色彩鲜亮，流畅的艺术风格显然是从大自然中获得的

灵感，流露出一种敏锐而成熟的艺术感觉。有一只造型优雅的陶罐，罐身上绘满了草的图案。

在克里特岛东端的查克罗斯发现了一座宏伟宫殿，它而向大海，从楼上的窗口可以望见繁忙的港口和远方开来的船队。宫廷旁边的作坊，住着织工、陶工、金属工和雕刻工。这里出土的陶器具有“海洋风格”，先在陶器上绘出逼真的礁石、海草作背景，然后描绘出栩栩如生的章鱼、海豚、船舵、珊瑚、海绵和有壳动物，显示出克里特人与大海息息相关。在这里发现了三件珍宝：一件是用纯金制成的器物，似瓶子却又是尖底的，纹饰精雕细刻，有如阳光四射的图案，有海中游动的生物；另一件是双耳细颈石罐，颈上有两道雕刻而成的环，图案与宗教仪式的画面相似；还有一件是牛头挂饰，两角翘起，两眼大睁，这是克里特人的祭祀之物。在克里特岛北部曾发现一只牛头状的酒具，用黑皂石、贝壳和水晶制成，举行宗教仪式时用它来祭奠，象征丰产和力量。

背靠迪克特山的一片临海的平原上，有一座马利阿宫殿，它位于查克罗斯宫的北面。遗址基本保存古代的布局风貌，宫殿正处在海船上岸与东西干道的交会处。宫殿用本地石料建成，有中央庭院、外庭、神龛，还有宽阔的阶梯、众多的仓库和优美的居室。这里农产丰富，有 8 个巨大的圆形石仓和一排排盛油 and 谷物的大坛子，巨型大口陶坛说明当年的君王积蓄了众多财富。在一段狭窄阶梯后面的一个壁龛里，藏着装饰华丽的武器，有一把带镀金柄的青铜匕首，一把带水晶和黄金柄的青铜剑，还有一个藏在陶罐里的豹子状石斧，它们是宗教仪式上使用的圣物，是国王神圣权力的标志。石斧上的豹子纵身跳跃，斧上布满豹纹，这种动物在克里特岛上是没有的，产于对岸的叙利亚。

克诺索斯在岛的北部海边，这里的宫殿是唯一幸存的一座，规模比法斯和马利阿大两倍，比查克罗斯大三倍。被视为宙斯神

的查克塔斯山正好俯视着克诺索的广阔原野，有众多的农田和丰富的水源，又有一个优良的海湾，因而成为控制全岛的中心。有一个被称为“神圣之角”的建筑物耸立在宫殿的南入口处，它象征神圣的公牛，人们常来此举行宗教仪式。根据壁画，伊文思修复了这座宫殿，庄重的台阶把中央庭院与住室连在一起，五段阶梯向上通往一个巨大的采光井，圆柱不同寻常，上大下小。在一堆黏土字筒中发现一枚石印章留下的印记，它是王权的象征，具有行政效力。住在这里的君王气质高雅，喜爱艺术，在“壁画之屋”里，有一幅壁画描绘了一只蓝色鸣鸟站在花丛之中。还有一幅壁画残片，画的是一位身穿长袍的女神，脸上涂有胭脂口红，被称为“巴黎妇人”。废墟中还发现饰有传统弥诺斯双斧图案的花瓶，风格、形制与迈锡尼艺术相近。这里还发现一些泥板，上面的文字与原先的“A类线性文字”不同，称为“B类线性文字”，记录的是迈锡尼人的语言。

斗牛是克里特岛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岛上发现大量收藏起来的牛角，角尖多被锉钝。在斗牛活动中，往往出现奇特而惊险的牛背腾跃场面，青年男子技艺高超，勇气十足，动作敏捷，敢于与凶猛的公牛相斗。一只金杯的压花装饰图案描绘的是一幅捕获野牛的情景，一头公牛将一名男子踩在脚下，一个年轻女子紧紧抓住牛角，而另一头牛被绳网套住，还有一头牛逃到棕榈树的后边。有一件雕塑作品描绘的是牛背腾跃的场景，人们成群结队地在野外捕牛，有的做出惊险的动作。在一只黄金图章戒指上，清晰可见一个人在公牛背上翻跳。有一件青铜雕塑品，铸造的是一个勇士在半空，冲向公牛头部，在角的上方翻筋斗。克诺索斯宫中发现了几件象牙雕刻，其中有一件作飞身腾跃之势。有一幅壁画，表现的是一头公牛飞驰而来，一个年轻男子在牛背上做腾空动作，旁边还有两名女子。在B类文字被解读出来以后，人们始知牛背腾跃所蕴含的意义，它是在庆丰收节日中的一种宗教

仪式，斗牛之后便杀牛作为祭祀的牺牲。

关于宗教，实行的是一种朴实的膜拜方式岩洞是拜祭神灵的庄严场所，在阴暗的洞中留下黄金双刃斧、青铜小塑像及动物牺牲的残骸。有一尊青铜小塑像，塑造的是弥诺斯男女的膜拜姿势，肃然立正，一手下垂，另一手举至额头。在一个洞穴中，石笋或许可视为女神和她孩子的形象，与《奥德赛》中描写的生殖女神颇相符。在远离村庄和宫殿的山顶上，常常留下许多赤陶祭献品，有呈膜拜姿势的人像，大多数是牛、羊之类的形状。从壁画上可以看出，他们常把橄榄林和无花果林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在阿克尼斯坟墓中出土的一枚黄金图章戒指，树叶在女神的头项，两个男子显出狂喜的神态。查克罗斯宫里发现的角状杯饰有金叶，浅浮雕上刻绘的是一座位于高山之巅的圣殿，殿中有几座祭坛，几只野山羊坐在屋顶，有一只正朝着山顶爬去，还有几只小鸟在山巅盘旋。在一座别墅式的废墟中发现一只皂石雕刻的“收获者之瓶”，瓶上刻着一群农夫从田野回家的生动场面，双双走在一起，有的在唱歌，其中有一人演奏被称为“叉铃”的埃及乐器，为首的是一位身穿鱼鳞图案长袍的祭司，说明祭祀在生产中有重要地位。

克里特是个海上王国，似乎曾建有弥诺斯海军，自旧宫殿时期开始便有频繁的海上贸易。早期的船可能没有舵和桅杆，因当时没有港口，船只只好在海滩附近的浅水中停泊。在新宫殿时期的印章上，从图案上可知船上装有帆、舵、甲板、舷门、船舱和攻击槌，大约有 50 名水手。这时已有港口，这种大船可停靠在安全的避风港中，货物在此装卸。克里特的商业旺盛，从埃及法老的文书中可知，克里特的船只把黎巴嫩山区的木材运到埃及，有一份莎草纸文书上还记有克里特药物，在一块石板上刻有克里特的地名。在拉西斯时期（公元前 1504—前 1450 年），在埃及的一座坟墓中，壁画上绘有非埃及式的腰布，与克里特壁画中的十

分相像，这些捧着贵重物品的外国人被称为来自“凯夫迪欧人的土地和位于碧蓝大海中的众多岛屿”。与此同时，从埃及输入了黄金、象牙及手工艺品，前面提到的埃及蓝和埃及乐器更不待言。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克诺索斯宫的圆柱建筑和双面斧形显然是受赫梯的影响，印章雕刻技术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

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以后，克里特与埃及的海上贸易衰落下来。在此以后，属于印欧人种的希腊部族包括亚加亚、伊奥利亚、爱奥利亚、多利亚等，在公元前 1600—前 1200 年间由巴尔干半岛纷纷南下，进入希腊半岛中部，并侵入了伯罗奔尼撒。当时的希腊人还未脱离“野蛮时代”，没有文字，他们凭着强悍驱赶、屠杀当地土著民族，占据土地，使用奴隶进行农耕。克里特的商业转向伯罗奔尼撒，在迈锡尼、梯尼斯等地进行商业殖民，传播文化，迈锡尼才逐渐兴盛起来。迈锡尼人陆续渡海侵入克里特岛，并把他们创造的“B类线性文字”传到克里特，所以在克诺索斯宫里发现了两千多件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泥板文书，记有赋税和账目。日益强大的迈锡尼，终于在公元前 1400 年左右将克诺索斯宫捣毁，从此克里特文化湮没无闻。继之兴起的是迈锡尼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一条文化传递的线索：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基克拉泽斯群岛、克里特、迈锡尼

4. “英雄时代”的迈锡尼与特洛伊

在《荷马史诗》中，迈锡尼是“英雄的故乡”，《伊利亚特》的“船目”中列有 30 多个统治者的名字，斯巴达国王门农远征特洛伊的故事也在这一时期发生，即所谓“英雄时代”。揭开这一历史真面目的首先是考古发掘，在迈锡尼、梯林斯、皮洛斯发掘了一批宫殿、墓葬、器物 and 泥板文书。与考古具有同等意义的是“B类线性文字”的破译，它“给史前希腊沉默的纪念碑提供了一个语言上的注释”。20 世纪 90 年代打捞古代沉船又提供了

若干宝贵资料，使人们对迈锡尼文化有更多一些的了解。这里涉及小亚细亚的特洛伊，扩大了人们观察的空间范围。

经过谢里曼、布莱根及一批希腊考古学家的努力，发现了迈锡尼、梯林斯、皮洛斯和底比斯的王宫，这些宫殿的时代先后、规模大小虽有不同，但设计大体近似，它们都在近海地方建立城堡，有城端、城门、防御工事和许多建筑物。殿内最大的房间是所谓“御座室”，体现王权的是巨大的圆柱、宽阔的壁炉和华丽的御座，还有象征权力和财富的包金剑柄、有镶嵌的匕首。迈锡尼城的入口处是著名的狮子门，两头巨狮相向而立，形成一个三角形。宫殿在城的中央，周围有谷仓、墓圈、坡道、圣地，还有“战士花瓶之家”、“坡道边的房子”、“冲塔斯之家”、“南屋”等建筑，宫殿内有大院、走廊、长方形大厅、正方形房间、浴室、水房、储藏室、武器库及“列柱之家”、“艺术家作坊”等等王宫中有许多壁画，最有代表性的是狮身鹰首兽、狮子和章鱼图案，它们是王室的象征。宫殿可能遭过浩劫，只发现少量黄金、白银、青铜及象牙制品和石膏小物件，被烈火损坏得难以辨认。这里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许多小国各自为政，相互间展开竞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城堡和宫殿，有自己的管理机构。皮洛斯王国的 16 个城镇，分为 16 个行政区在宫殿里发现的最重要的东西大概要算黏土字筒了，总共近 1000 片，上面的“B 类线性文字”与克里特岛上克诺索斯宫山上的一模一样。

迈锡尼的坟墓，早先是一种深陷的井形墓，即所谓 B 圈墓，时间可上溯至公元前 1550 年，其中有 5 座藏有宝物，如金银器皿、青铜武器，还有一个用金银制成的死者面具和一只带有鸭头状手柄的水晶碗。到了宫殿出现以后，井形墓被一种拱顶蜂巢式大石墓取代，以“阿特柔斯的宝库”最为壮观。这是迈锡尼国王的陵墓，拱顶直径 50 英尺，从墓底到墓顶高 43 英尺，人口高 14 英尺。正面用砾岩雕成，人口两侧是两根精美的双层绿岩柱，柱

上有浅浮雕横梁和刻有螺旋纹的红石盖板。墓顶的每块石头都刻成弧形，每层石头的大小随陵墓升高而递减，最顶端是一块平石。据考证，红石和绿石是从拉哥尼亚进口的。随葬品显得华贵，有许多用黄金、青铜、象牙制成的器物，还有宝石和首饰。

出土物反映了两个突出的文化现象，一是气派非凡的女神，二是威武的迈锡尼战士，显示出他们的信仰特征和尚武精神。女神的崇拜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的小圣像有隆起的腹部和生殖器，后来加入了一位女战神可能是雅典娜，有一件称为“迈托斯女神”的黏土塑像突出了她的生殖功能，另一个迈锡尼小陶像描绘的是抚育孩子，有一尊象牙雕刻的三人像表现了母亲、保姆和婴儿，黄金图章戒指表面有三个女祭司在花丛之中。作为“英雄时代”，武士是“尘世中最强壮的凡人”，他们留下了大量长枪、刀箭、戈矛和匕首，有几把装饰繁复的首剑，在一块印石上有全副武装驾着战车奔驰的图案，钵上的图案描绘的是穿着皮胸甲和角状头盔手持小盾的战士，在古墓中掘出了一顶头盔的碎片，盔是用 40 对獠牙缝成的皮帽。另外有两件东西值得一提：一是用黏土做成的印帝圆盘，它是舶来品，有人认为是最早的印刷术的证据；另一件是长着女人头颅和狮子身躯的斯芬克斯像，它用石膏制成，色彩艳丽得令人恐怖。

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 B 类线性文字的解读，它把希腊早期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延伸了 7 个世纪。1951 年出版了一本《皮洛斯字简》，次年又将克诺索斯宫的字简整理成《弥诺斯文字 II》。就在这一年，英国建筑师迈克尔·凡特雷斯靠着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思维能力，用破译密电码的技术成功地破译了这些古文字。他将这些文字符号进行仔细分析，制成了一张表格，把具有相同元音的符号放在竖列，具有相同辅音的符号置于横列，于是得出结论说，这 88 个符号都是由 12 个基本符号演变而成的，它是一种由音节组成的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辅音和一个

元音，一组符号表示一个词，其间夹杂着若干表示物品的符号。他认真研究了希腊语，经过认真比较之后，断定 B 类线性文字记录的是古希腊的迈锡尼语，它与克里特岛上的 A 类线性文字不同，也与后来的希腊字母不同，是“欧洲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产生于迈锡尼，后来随着希腊的扩张才进入克里特岛，克诺索斯宫中的千片字简是希腊人征服克里特的证据。

B 类线性文字被破译出来，对迈锡尼的社会历史有更深一层了解。这些文字没有私人文书，基本上是官方的档案，主要是记载商业和宗教活动，大抵是一些账目清单。它提到宫殿武器库中有 200 辆战车，大概就是保留在花瓶、印石和墓碑上的柳条战车吧。它记录了分发给驾战车人的重型盔甲，这是对古墓中盔甲的最好注释它记录了青铜的数量，大概可制成 50 万个箭头或 23000 把利剑。从 100 多种职业名称可以看出，社会分工相当细致。王宫附近是手工业中心，有石匠、木匠、造船工和建筑师，有金匠、银匠、铜匠、宝石匠、陶工、纺织工，仅皮洛斯一地就有 270 名铜匠，此外有女奴 600 名。农业也较发达，有农夫、牧人、种树人和伐木工，饲养牲畜的有山倌、牛倌等，主食是谷物，吃的有肉类、奶制品、橄榄油、无花果、葡萄酒和蜂蜜，衣料主要是亚麻布。商业繁荣，记有数百个地方发生的数千宗交易，不但详细登记了商品名称，而且还记有数量和比价，但没有货币。文献中没有关于法律与司法、犯罪与惩处的记录，却记了不少有关宗教祭祀的事，提到的女神有雅典娜、波塞尔、狄俄尼索斯，当然也有宙斯、阿波罗神的前身，祭品有公牛、公羊、奶酪、葡萄酒和蜂蜜。由于得到的上简有限，许多社会历史状况还有待考古进一步发掘。

大约在公元前 1300 年，有一艘大货船沿小亚细亚南岸向西南航行到爱琴海，由于风向反常而触礁，沉入海底。1982 年有一名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一块“长耳朵的金属饼干”，于是引起

注意，从 1984 年起开始打捞，终于发现了这个隐藏 3000 多年的文物宝库。这条船长 40 英尺，船上载的主要是铜、锡、玻璃、芳香树脂及青铜器和陶器。船上的铜约 10 吨，可能来自塞浦路斯，一吨锡来自叙利亚，它们都浇成四柄的铸块，便于放在马背上驮运，另外有许多青铜的凿子、钻头、斧子和剃刀，青铜武器大概是迦南、塞浦路斯、埃及等地铸造，堪称“青铜时代的文物密藏器”。玻璃铸块是由迦南玻璃工在叙利亚、黎巴嫩等地作坊生产的，呈蓝色，其成色与迈锡尼发现的蓝玻璃珠和在埃及发现的玻璃瓶完全一致。沉船中有 100 多只双耳瓶，装着 1 吨黏稠的松脂，可能是用来制香料用的。船中有一根未加工过的大象牙和 13 根河马牙齿，可能来自叙利亚，用来制作小雕像和装饰品。船上还有来自非洲的乌檀香木、来自北欧的琥珀及其他地方的工艺品。在 9 年中，总共潜水两万次，发现了 4000 件手工制品，其中，有一只带有双把的基里克斯赤陶杯，一只由上下两个锥形铆在一起的金杯，有迦南的金隼垂饰，有巴比伦工匠雕刻的小祭司头上顶着的女神像，有亚速风格的武士和鹰首狮身兽印章，有写着埃及王后奈菲尔提蒂名字的双联折叠书写版，还有一枚珍贵的圆筒印章。这条沉船给我们展示了地中海的环行航线，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到塞浦路斯，然后进入爱琴海，西航至西西里岛、撒丁岛，然后回到北非和埃及，迈锡尼的繁荣与这条环形航线有极大关系，因此，迈锡尼文化乃是地中海广泛进行文化交流的结果。在这个“英雄时代”，迈锡尼人控制了爱琴海的海上霸权，征服了克里特岛，还远征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特洛伊，长期保存在荷马史诗中的神话传说终于在 20 世纪初重见天日。正当公元前 12 世纪初爆发特洛伊战争的时候，住在北面的希腊人中的多利亚人汹涌而至，颠覆了迈锡尼政权，也毁灭了这种文化。迈锡尼灭亡之后，许多史实都进入了史诗般的神话，而克里特和迈锡尼的诸神似乎也流传给后来的希腊人，例如宙斯神、米特米亚斯

神和雅典娜，希腊人的火葬方式似乎也被克里特的土葬所取代，雕刻、绘画等艺术或许还影响着后来的希腊艺术。至于文字，B类线性已成为死文字，后来希腊人创造的希腊字母，则是从腓尼基字母演化出来的。

爱琴海文明的发展虽然断断续续，中间存在许多空位和未解之谜，但中心由基克拉泽斯群岛转向克里特岛，然后又转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并与小亚细亚的特洛伊发生战争，大体可看出其发展脉络，而它们的先后兴起都与地中海的海上贸易有关，可见爱琴海文明的兴起决非偶然，“希腊奇迹”的出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二）“希腊奇迹”在地中海突显

西方人对古希腊文明情有独钟，因为从“文艺复兴”开始，他们就以此为源头，怀着崇尚与向往的心情去探源，从中吸取甘甜的养料来发展近代文明，取得了很大成就，因而无论是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自然科学都在这寻求它们的“根”，于是“言必称希腊”，盛赞“光荣属于希腊、伟人属于罗马”。希腊确实把古典文明推到了一个高峰，它的影响最直接的是罗马，是地中海，是近代的欧洲；然而，仅站在欧洲来看希腊反而是一种自我局限，不自觉地缩小它的影响力。把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一个长过程来看，希腊文明闪烁的智慧之光，普照全球，它所包含的思想和精神激励人们去创造和奋斗，开启了近现代的文明。

当我们的视角被局限在“就希腊看希腊”或者“就欧洲看希腊”的时候，便会情不自禁地陷入了不可思议的困境，仿佛希腊文明是从天而降，突兀而起，惊讶地称之为“希腊奇迹”。其实，这“奇迹”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它深厚的泉源就在地中海，在古代东方开创和奠定的地中海文明，如果没有在此之

前将近 2000 年的文化积累，没有地中海这个高文化区的存在，希腊是不可能是一片沙滩上建起高楼大厦的。说是“奇迹”也有合理的一面，因为它不是既有文明在简单意义上的继承与总合，而是一种提升和创造，即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种“奇迹”出现在希腊而不是别的地方，除了地中海的大环境而外，还必须从希腊地理与历史、社会与经济来作探索。

在今天看来是如此贫瘠的希腊半岛，在历史上却竖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不能不考虑它特殊的自然条件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由此产生诸多以工商业为支撑的城邦国家。这里没有形成如同东方那样高度集权和统一的国家，希腊文化的光辉聚焦于雅典而不是斯巴达，真正的奥秘就在于民主。开放的环境使希腊有可能广泛吸纳地中海文明，用人类已有的智慧来进行创造，希腊字母源于腓尼基字母就是最好的例证，倘若没有文字就根本谈不上文明的发展与创新。当希腊人进入希腊半岛之初，他们还处于“野蛮时期”，然而，正因为他们没有传统的束缚，没有固定的文化模式，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去探索，去学习，去创造，因而一切都不同凡响，创造了永远为人类享用的文明。

1. 城邦国家与海上殖民

在世界乃至欧洲的地图上，希腊不过是“弹丸之地”。它位于欧洲的东南角上，是地中海北岸半岛上的国家。希腊半岛实际上是巴尔干半岛向南延伸的部分，它三面环海，东面是爱琴海，南入地中海，西临伊奥尼亚海。从大势上看，它与“东方文化带”的末梢小亚细亚半岛仅一海之隔，而且中间有许多小岛连接，与意大利半岛之间只隔着一条奥特朗托海峡。海岸线漫长而曲折，尤以东南岸港湾特多，利于海上航行。全境多山，品都斯山脉纵贯希腊西部，以东是丘陵与平原相间的地带。因山脉而分为北、中、南三部分：北希腊与中希腊之间是狭窄的德摩比利山

隘；中希腊散布着若干小盆地，如彼阿拉亚、科林斯、阿提卡等，雅典就在阿提卡地方；南希腊即伯罗奔尼撒，以科林斯地峡与中希腊分开，有美塞尼亚、亚尔哥里德、拉哥尼亚等区域，斯巴达就在拉哥尼亚。土地贫瘠，农产不丰。矿产主要有拉哥尼亚的铁，阿提卡的银和大理石，优卑亚岛的铜。这里冬季温暖多雨，夏季炎热干燥，谓之“地中海式气候”。但在希腊境内，因地形关系，品都斯山以西雨量较多，东部雨量较少，年雨量500—1000毫米。

希腊人原住巴尔干半岛北部，分为亚加亚、伊奥利亚、爱奥尼亚和多利亚四个部族，属印欧人种。在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400年间，希腊人不断南移，亚加亚部首先进入中希腊并进至伯罗奔尼撒，后来伊奥尼亚和爱奥尼亚随之南下占领帖萨利亚、阿提卡、优卑亚岛等地。公元前1200年左右多利亚人大举南侵，打乱原先的分布，推动海外移民。伊奥利亚占领了爱琴海中的列斯保、开俄斯等岛，在小亚细亚建立西姆斯米利亚殖民地。爱奥尼亚占领一些海岛后伸向小亚细亚，建立了弗西斯、爱非斯、米利都等殖民地。多利亚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后，有一部分进入克里特岛和罗得岛，在小亚细亚建立西尼达斯、哈利加纳苏等殖民地。这一时期的移民，实际上是入口的流动与扩散，主要是夺取耕地以求生存。

希腊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们还是“野蛮人”，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阶段，几个氏族联合成一个胞族，几个胞族结合为一个部落，进而形成部落联盟。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实行“血亲复仇”由于私有财产的刺激，人们把掠夺财富看成是一种光荣的事业，崇尚武功，推崇军事领袖，是所谓“英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出现了以军事领袖“巴塞勒斯”统领的社会，史称“王政时期”。公元前750—前650年，氏族显贵势力增强，出现了“贵族政治”。公元

前 650—前 500 年，一些有势力的人用武力推翻贵族统治，实行所谓“僭主政治”。“僭主”因不是民众选举产生，被称为“暴君”，然而他们并不是名副其实的专制君主，也没有世袭制度，而沿袭着古老的“军事民主”制，“国王”权力受到贵族会议和民众大会的约束，大事须得到贵族会议全体同意，民众大会有权以大声欢呼或保持缄默进行表决，甚至可以驱逐“国王”。僭主政治的出现，标志着国家的形成。在这一时期，社会迅速分化，国王和贵族上升为奴隶主，部落成员成为自由民，而战争中的俘虏和贩卖的人口则成为奴隶。

希腊各部本来就处于分散状态，占领一片土地以后便各自为政。破碎的地形，在客观上更助长了他们的独立。希腊并不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农耕不甚发达，而海上交通却有利于他们发展工商业。最先进入伯罗奔尼撒的亚加亚人，由于受到克里特文化的影响，手工业和商业发展起来，产生了迈锡尼文化，并创造了 B 类线性文字。往后进入希腊的其他部族，在武力征服高文化民族的同时，也被高文化所征服，同样走着发展工商业与海上殖民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希腊人都在他们的聚居点建起有防御工事的城堡，控制附近的一片农村，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若干城邦国家，总数不下 200 个。整个希腊半岛从来没有统一，各个城邦之间只有在人敌当前时才暂时结成联盟，如伯罗奔尼撒同盟。

在僭主时期，由于人口的繁衍、工商业的兴盛以及城邦之间、城邦内部的斗争，又掀起了一个向海外移民的高潮。移民范围扩大，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是主攻方向，并向黑海沿岸移民，往西则进入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这种移民更多的是经济原因，或人口过甚而向海外扩散，或因经济发展需要在外地建立新的工商业据点，因此，许多移民点后来都发展为工商业城市，如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和意大利半岛的爱利亚。当然也有政治原因，有的是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逃往海外，有的是举国搬迁。希

希腊“殖民地”的概念与近代不同，它只具有移殖人口的意思，不含有政治控制的意义，所以，殖民地与本土城邦之间并不存在“宗主国”的关系，分离出去之后自建城邦，只有经济往来和宗教信仰的联系。这种扩张，产生了三个重要后果：第一，因为不断向外移民，各地居民错杂起来，冲破了原先的血缘关系，而且因移民与当地土著通婚，希腊人在血统上已变成了混血儿，遍布爱琴海沿岸及其他地方；第二，在殖民的过程中，商业活动范围扩大，一方面开拓了许多商业据点，另一方面又促进本土城邦国家的繁荣；第三，由于希腊人活动空间的扩展，有机会广泛接触各种外来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克里特、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就是重要的接触点。这三点对往后希腊文化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希腊走向开放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波希战争以后，进一步打通了黑海商路，促进希腊的繁荣。事实上，希腊的辉煌时期，主要是在公元前 5 世纪以后，这就是出现“希腊奇迹”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也是探索这一“奇迹”的奥秘所在。

在希腊历史上，波希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和马其顿征服希腊的战争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波希战争是由波斯的入侵引起，前后二次，起于公元前 492 年，迄于公元前 480 年，以希腊胜利告终，从此进入希腊的繁荣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斯巴达与雅典两个集团对抗达 25 年（公元前 431—前 404 年），最后雅典失败，从此走向衰落。北方的马其顿在 4 世纪中叶兴起，于公元前 338 年称霸希腊半岛，次年在科林斯举行会议，将各城邦置于它的羽翼之下，从此进入了亚历山大帝国时代。这是希腊历史的三个重大转折点，是研究希腊文化的三个重要时间刻度：波希战争前为“古风时代”，此后称“古典时代”，从马其顿统治开始则为“希腊化”时代。

2. 雅典民主政治与斯巴达寡头政治

我们通常所说的“希腊文化”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严格说来，真正爆发智慧火花的是雅典，尽管斯巴达在希腊历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但它在文化上并没有多人建树。雅典之所以成为一盏不灭的明灯，最根本的是它实行民主政治，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思想活跃的社会环境，并有繁荣的工商业为支撑，于是，四方学者如水之归下，云集雅典城中，出现文化昌盛的景象。斯巴达则不然，它实行的是寡头政治，崇尚武功而轻视文化，重视农业而限制工商业发展，整个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大军营”，这种高压的政治很少有文化发展的空间。雅典和斯巴达虽同属希腊城邦国家，但政治上却形成鲜明对比，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从这里我们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并非所有的“海洋国家”都一定发达，也并非希腊城邦都一概先进，重要的是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

尽管雅典与斯巴达各走一端，但它们的社会制度都植根于古老的“军事民主”制，斯巴达强化了军事首领和贵族元老的治疗，而雅典则充分发扬“民主”的一面，突破“王政”、“贵族政治”与“僭主政治”的框框，实行一系列改革，扩大民主范围，加大民众权力，开创世界上最早的“民主政治”这种分异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基础，斯巴达是一个以农耕为业的国家，分地而耕，不容许工商业发展，保持着古老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集体生活。他们沿袭古风，服兵役是每个成年男子的义务和权利，所以初生的婴儿必须经过严酷的自然选择，从小就进行军事训练，养成吃苦耐劳、沉静刚毅的性格。20岁参加军营，婚后也过军事化生活，直到60岁退役。因为全民皆兵，又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特别尚武，所以有很强的战斗力。凭着军事力量，征服了“希洛人”（包括美塞尼亚人和克里特人），把他们变成奴隶，承担社会生产，使斯巴达人脱离生产而专事征战。又以

归附的庇里阿西人为外围，日耕日战，但没有政治权利，只是一种“半自由人”。耸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政权，当然就是军事首领的一统天下，早先是两个国王“共同执政”，后来实权落在五个执政官的手中，由他们负责统领军队、监督训练、审判案件、执行惩处，并主持贵族会议和民众大会，是典型的贵族寡头政治。贵族会议亦称长老会，协助处理政务，参加审判案件，准备提交民众大会表决的议案。民众大会由 30 岁以上的男子组成，由他们表决国王继承问题和贵族会议提交的议案，推举执政官，但无须讨论，只用感情表示同意与否，实际上是士兵大会。整个社会犹如一个大军营，充满火药味和血腥味，人们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思想，没有文化，没有个性，因而在希腊史上除充当“卫道士”而外，似乎在文化上少有作为，充其量是沉默的体育健将和不屈的战士，以它为中心形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打败了波斯侵略者。

与此相反的是雅典，它在公元前 1000—前 500 年完成了民主化的过程。雅典人是爱奥尼亚的一支，他们同样经历了“王政”、“贵族政治”和“僭主政治”三个阶段，但由于农业与手工业分工，商业、航海及海外殖民的发展，社会分化剧烈，人口流动量大，古老的氏族、部落迅速上崩瓦解，出现了一个开放、活跃的局面。这里的力量并不来自强大的军事，而是来自不断拓展和创造的手工业、商业和航海，因而主宰社会的不是军人，而是从事农耕、手工艺和经商的平民，所以在政治斗争中他们的力量一再显示出来，推动政治改革，逐渐走向民主。公元前 621 年，德拉古被选为六犬法官之一，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开始摒弃传统的习惯法与血亲复仇制度，把一切案件交给法庭审理，从此走向“法制社会”。法典特别重视私有财产，客观上保护和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在适应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体现政治上的平等。公元前 594 年，梭伦被选为执政的“雅康”，实行了“梭伦变法”。这次变法

的核心是扩大雅典人的公民权和参政权利，鼓励工商业及私有财产发展。首先是取消雅典人中的债务奴隶，被卖到异乡为奴的人也由国家赎回。规定手工业者把技术传给儿子，愿定居雅典的工匠可给予公民权，并允许雅典男子与非雅典女子结婚，所生子女亦为雅典公民，这就使得享有公民权的人数有较大幅度增加。公民资格依财产多寡而定，共分四级，如财产增多可由下一级升为上一等级，无形中以经济力量冲垮了原有的等级制度，并引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竞争机制。在这里，义务和权利是相对应的，第一、二等级充当骑兵，有权被选为雅典等高级官吏；第三等级为重装兵，可选为四百人会议代表；第四等级充当轻步兵和水手，可以参加民众大会并担任法官。由一、二、三等级代表组成的四百人大会，显然不同于斯巴达的长老会，它通过立法程序表达平民的意愿，并创立最高法院有效地实行对政府的监督，有权更改执政官的判决在梭伦的提倡下，工商业成了“流行的职业”，在禁止粮食出口的同时强调以手工业品从国外换回粮食，鼓励国外工匠移入雅典传授技术。梭伦改革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也出现反复，一度实行僭主政治，从庇西特拉图夺取政权到希比亚下台前后 50 年。

公元前 509—前 501 年，政治家克里斯梯尼进行改革之后，雅典民主政治走向成熟。改革从划分政区开始，将阿提卡分为 100 个村社“得莫”，然后组合成 30 个二级政区，进而将平原、山区和海滨配搭组成 10 个大政区，作为选举的单位。这种按地域划分居民的作法，打乱了原先以血缘划分的“诺克拉里”；由三类地段组成的 10 大行政区则便于平衡人口数量和经济力量，平均兵役和赋税负担。更重要的是在“得莫”内实行直接选举，组织基层民众大会，养成人民民主生活的习惯。有了这个基础，各大区可选出 50 名代表参加五百人会议，平时由各代表团轮流主持日常工作，重大问题由五百人会议提交民众大会表决。选举

成为产生权力机构的必要手段，选出 9 名最高行政官员“雅康”、6 名最高法院法官和 10 个代表各大区的军事首领“将军”，法院实行民众陪审制。克里斯梯尼又创立“贝壳放逐法”，每年举行一次民众大会，任何公民都有权检举危害社会的分子，在被检举人名下放一枚贝壳，贝壳最多的人便被放逐出国 10 年。这是一种原始民主制的继承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监督和防止僭主产生，又避免因政治斗争而引起内战与杀戮。民主制度在波希战争以后进一步发展，公元前 461—前 429 年伯里克利时期达于顶峰，他庄严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腊城邦都是“小国寡民”，然而却不是“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僵硬模式，而是拥抱大海，商业繁荣的群体。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国家，“主权在民”，政权属于所有的公民在他们心目中，“国家”与“公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离开了公民就无所谓国家。据说在波希战争中，有一个叫地米托克利的将军丢失了领上，当他遭到指责时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赢得了一个自由的城邦比那些领上更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在观念上不是像东方专制国家那样重视领上，而是组成这个国家的公民。权力属于公民，所以民众大会就是最高权力机构，实行直接选举，包括五百人会议代表、十将军、九雅康和六位大法官。他们的任期通常是一年，不断更换，阴谋夺取政权的人不予承认，这样的僭主往往遭到流放的惩处，屈服于“贝壳放逐法”。立法权属于民众大会，经过辩论与表决取得一致意见，表达共同的意愿，而公民也有社会的公共意识。五百人会议成员是各选区公民的代表，轮流掌管日常事务，重大问题须经全体同意才能提交民众大会通过，有权监督各种公职人员，还设有 10 个审计官监督财务最突出的是陪审制度，一切案件公开审理，陪审人员通常是数百人，重大案件曾多达 6000 人。直接选举、民众立法、官不常任和陪审制度，构成了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这正是雅

典放出奇光异彩的根本原因。如果说是“奇迹”的话，这才是天大的奇迹，原始的民主制度在商品社会中转化得如此协调，成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先驱。

3. “欧洲文字的母亲”希腊字母

文字的重要意义是无庸置疑的，倘若希腊没有文字，一切都靠口耳相传，知识的积累与传承，研究与创作、吸收与传播都会受到很大局限，根本不可能以文化列入世界之林，更不可能创造出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希腊原先并没有文字，处于“野蛮时期”。克里特的 A 类线性文字并非希腊人创造，迈锡尼的 B 类线性文字记的虽是希腊语音，但关于这两种文字的起源至今还不清楚，有可能是在当地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也可能受楔形文字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线性文字随着克里特和迈锡尼的灭亡都变成了“死文字”，并没有流传下来，与后来的希腊字母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希腊字母的祖先是腓尼基字母，是从闪米特字母的一支演化出来的。腓尼基人在地中海的商业活动中创造了字母文字，并传播到塞浦路斯、爱琴海沿岸，留下许多遗迹，如塞浦路斯-腓尼基字母之类。在雅典和锡拉岛发现最早的希腊文碑刻，时间是公元前 9 世纪。据说，最先从腓尼基引进字母的是底比斯，他采用了 16 个字母，以后帕拉墨得和西摩尼得各加上 4 个字母，共 24 个字母，希腊人称之为“腓尼基字母”或“卡得摩字母”。起初形成东西两种字体，大约在公元前 5 世纪，以小亚细亚米利都为中心的爱奥尼亚字母为雅典采用，又过了 100 多年希腊文字才统一为爱奥尼亚字母。事情非常清楚，希腊字母源于腓尼基字母，由米利都传到雅典然后推广到全希腊，为希腊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

不过，希腊人并不是简单地沿袭腓尼基字母，而是结合希腊语和商业实用进行创造性改进。它废弃了腓尼基字母中的 qoph

和 *sadhe* 两个字母，沿用了 *b、g、d、z、k、l、m、n、p、r、t* 十个辅音字母，增加了 *x、ph、kh、ps* 四个辅音字母。希腊重大贡献是创造了元音字母，即表示元音 *a* 的 *alpha*，表示元音 *i* 的 *iota*，表示元音 *y* 的 *upsilon*，表示元音 *e* 短音的 *epsilon* 和长音的 *eta*，表示元音 *o* 短音的 *omicron* 和长音的 *omega*，共计 7 个。这在拼音文字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腓尼基字母只表辅音而不表元音，但每个辅音字母都含有一个 *a* 或可变元音，希腊人把元音分离出来，打破了音节字母的限制，既科学地反映了语言的音素，又便于灵活拼写。腓尼基文的行款是从右到左横书，希腊人改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行款，成为世界上后来通用的书写顺序。字体也有变化，崇尚美感和实用的希腊人，把字体加以简化，改为简单、醒目、匀称、优美的几何图形，奠定了后来拉丁字母的基础。字母名称也起了变化，更重要的是由腓尼基的“有义词”变成了希腊字母的“无义词”，后来又演变为“语音名称”，名称的第一个音就是字母的音质，成为纯粹的记音符号。

字母的首创者是腓尼基人，而希腊人做了创造性改变之后，字母成为拼音文字的语言记录工具。从文字发展的历史来看，受希腊字母影响最大的有两支，一支是拉丁字母，另一支是斯拉夫字母，因而成了“欧洲文字的母亲”，成为欧洲文字的源头。受希腊字母影响的还有小亚细亚字母、吕奇亚字母、弗利基亚字母和加甲亚字母，它们所反映的不是希腊语，也不是印欧语，是住在小亚细亚几种民族的语言。从希腊字母的创制可以看出，没有古代东方千余年文字的发展，就不可能凭空产生希腊文字。但希腊文字又不是东方文字的简单继承和沿袭，它的创造性就在于增加元音字母，改变为实用的记音符号，从而直接影响欧洲文字，具有世界意义。

4. “自然哲学”与“逻辑学”

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哲人时代，影响世界的哲学大师多在这一时期产生，时间大约是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之间。在这个人类的“黄金时段”，世界上燃起了三盏智慧的明灯——希腊、印度和中国。空间范围不同，社会、历史、文化也不一样，但共同点都是思想活跃，学术昌明。希腊是地中海文明最耀眼的一个闪光点，它的哲学大体可归结为“自然哲学”，与之相关联的是以“三段论”为特征的形式逻辑。印度哲学在列国时代和孔雀王朝时期也光彩夺目，形成了纷繁的“宗教哲学”和独树一帜的“因明学”。中国文化这一时期聚焦于华夏，春秋战国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的学说大抵属“社会哲学”，逻辑学以“名辩之学”的形式出现。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工商业繁荣，民主政治盛行，既不像印度那样为宗教所笼罩，也不像中国那样实行君主专制，希腊人关心的是“人与自然”，并把自然科学与哲学杂糅在一起，哲学家们大多是科学家，因而形成了“自然哲学”。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一基本问题展开，唯物主义偏重于客观的物质世界，唯心主义侧重于人的主观世界，前者注重人的感性认识，而后者更多的是抽象的理性。也许是人类童年的好奇与童真，有许多天才的猜想，有许多惊人的论断，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希腊的第一代哲学家是米利都学派。米利都并不在希腊本土，而是在小亚细亚的爱琴海边，它是希腊爱奥尼亚人的殖民地，工商业发达。这虽是“东方文化带”的末梢，有机会广泛接触东方文化，它又是希腊的一个商业据点，与雅典有密切联系。被称为希腊“科学和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是个渴求知识的人，他把埃及的几何学引入希腊，继承巴比伦天文学而预测出公

公元前 585 年的日食，他因预知来年橄榄大丰收而发财致富，又献计吕底亚国王挖河而打了胜仗，以智慧超凡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他执著地“去寻找一件惟一智慧的东西”，面对大海，体察“水是生命之源”，感悟到“一切是水”，把水看成是万物之源。他的学生阿拉克西曼德拆说是第一个绘制地图的人，他发挥生物来自水中的观点，猜想宇宙是一个大球，觉得千差万别的物质并非都来自水，而可能是来自性状不同、时空变化的“无限”，比“水”有更高一层的概括。阿拉克西曼德的学生阿拉克西美尼，在这个“无限”的空间探索，直观地感觉到“气”的存在，推测万物生于气的流动与聚散，譬如水蒸发为气，气凝结为云雾雨露，进而冷凝成坚冰，气流动则成风，气助燃而又复归于气等等，因此假定万物之源是“气”，这实际上是“物质三态”的一种朴素的表述。

公元前 6 前 5 世纪之交，在距米利都不远的爱非斯（以弗斯）又兴起一个学派，称为“爱非斯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赫拉克利特。这是一个古怪的哲学家，他因孤僻高傲被称为“哭泣的哲学家”，又因著作费解被称为“晦涩的哲学家”。他追随米利都学派，但似乎从“物质三态”中悟出温度变化的因素，因而把世界的本原看成是“一团永恒的火”，认为万物变火，火变万物，正如货物换成黄金、黄金又变成货物一样。正是因为这种“变”的观点，使他意识到变的法则“逻各斯”（思想、理性与规律），留下许多名言，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还提出“一个最优秀的人能抵得上万人”的观点。他们的观察点不同，说法也不一样，但关注的都是物质世界，好奇地探索世界的本原，用朴素的思维去理解世界，近似于中国的“五行说”，即所谓“朴素的唯物主义”。

与此相反，生于小亚细亚沿海萨莫斯岛上的毕达哥拉斯，后来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克罗托城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

拉斯曾游学埃及、巴比伦、波斯，既接受了埃及几何学和巴比伦数学，又深受东方宗教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真理与荒诞混合”的哲学家。他在数学上很有造诣，发明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在中国则是所谓“勾股弦”定理。他研究过天文、医学和音乐，做出一定成绩。他用数学的头脑研究世界，把事物之间的关系抽象化为数字，譬如各种物质的产生与增减都有一个数量，音阶的变化也有数的关系，于是将“数”绝对化了，认为它是世界本原，创立了“数本主义哲学”。他认为“事物所遵循的规律是数学的”，数学就是“在证明式的演绎推论上的学问”，整个世界就是“和谐与数”。因为和谐是最美的，所以数是最聪慧的。当这种“数”的观念与神学碰撞之后，数字就变得更加神秘，而神的天界也变得更加有序，这便产生了“神秘的数”，例如：1 形成点，2 形成线，3 形成面，4 形成体，进而推论三面体成土、四面体成火、八面体成气、24 面体成水。并把它用于社会，如 1 表示理性（万物本原），2 表示意见（包含对立双方），4 和 9 是正义与公平（它们是相等数的结合， $2 \times 2 = 4$ ， $3 \times 3 = 9$ ），7 是死亡（无因数又非倍数），8 是爱情（八度音最高），10 是玄妙（ $1 + 2 + 3 + 4 = 10$ ）。他和他的学生组成了一个神秘的小团体，教义秘不外传，清规戒律达 39 条。这固然是一种悲哀，但平心而论，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首先，他把哲学提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有规可循的统一体，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概括世界。他揭示了事物之间不可忽视的“数”的关系，而这种“数字化”的观念，导致了“数理逻辑”的产生，在近代科学兴起以后“数码化”得到广泛运用，推动了自然科学迅速发展。

意大利南部西海岸的爱利亚也是希腊殖民地，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对希腊哲学颇有影响的“爱利亚学派”。开创这个学派的是

色诺芬尼，他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受过教育，漫游希腊数十年后定居爱利亚，他虽然接受过米利都学说，但更趋近于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一”，而“一”与宇宙、神又是三位一体，神灵不过是人们按照自己幻想出来的，“普天之下除了猜想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所以西方的神学理论往往追溯到他。他的学生巴门尼德写了一部《论自然》的诗篇，分序诗、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三部分，诗中有许多富于哲理的句子，如“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存在的东西无生无灭，它完整、惟一、无始无终。它没有过去和未来，因为它整个在现在，作为完整、统一、联系着的东西”。他发挥了老师的基本观点，但提出了“思想”和“存在”两个范畴，强调它们的同一性，坚信“理智是世间所有知识的泉源”，“与真理同行”，这种注重主体的思想后来成为柏拉图主义的先导。他们的后继者芝诺是“辩证法的创始者”，著名的命题是“飞矢不动”、“阿喀琉斯永远赶不上乌龟”。“飞矢不动”着眼于某一特定空间的静止状态，“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强调距离可不断分割，看去似觉荒谬，实际上却揭示了运动与相对静止的关系。从毕达哥拉斯到爱利亚学派，把人们的视线由客体转向主体，由感悟向理性深化。

以上四个学派都出现在希腊的殖民地，即希腊的外围，这是因为米利都、爱菲斯、克罗托、爱利亚都是与外界接触较多的地方，有机会吸纳各种思想文化。在波希战争中，许多住在小亚细亚的哲学家逃往雅典。波希战争后，雅典经济、文化蒸蒸日上，对知识有更浓烈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人们可以自由发表各种言论，思想极为活跃，致使雅典成为哲学家的大论坛，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希腊哲学的昌盛，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脑筋特别灵，而是因为雅典有各种哲学思想滋生发展的土壤，这种辉煌实际上是“知识共享”的结果，是人类智慧碰撞出来的火花。哲学争论的主题仍然是“人与自然”，把主观与客观、感性

与理性充分展开，从而产生许多思想巨人，唯物方面如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唯心方面则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因为主体与客体都是同时存在的，把它们展开有利于人类对自己与世界的认识，但也不免顾此失彼，有失偏颇，于是出现了“百科全书式”的大家亚里士多德。在辩论的过程中，思维形式也得到发展，于是产生了“逻辑学”。

雅典哲学的繁荣，恐怕还得从“智者学派”讲起。尽管这批智者被贬称为“诡辩家”或“巧辩家”，到处高谈阔论、舞文弄墨、收费授徒，但他们都不失为“智者”，也就是智慧聪敏的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师承不同，观点不同，但他们见多识广，能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又长于辩论，对于打开人们的思路、活跃学术空气起了启蒙作用。他们议论的问题很多，海阔天空，天文地理、宇宙本原、国家起源、社会经济、神学、人学、自然科学无奇不有，并促进语法、逻辑、修辞等学科的发展。他们虽然没有形成什么体系，也没有留下不刊之作，但可贵的是“追求真理是全心全意的”。他们有些惊人之句，如普罗太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句话就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人的本身。他们当中，有感觉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乃至极端个人主义，看法五花八门，但这恰好是不拘一格的表现，它为希腊哲学家们登上历史舞台敲响了开场锣鼓。

首先登场的是来自西西里的恩培多克勒，他是个传奇式人物，罗素称他是“哲学家、预言家、科学家和江湖术士的混合体”。他综合了米利都学派各家的学说，提出了“四根说”，认为世界是由土、气、水、火四种元素组成。这种“四元世界”的观点，与印度“沙门思潮”中顺世论完全一样。不过，在他看来，这四种元素是相互混合、吸引、分解、聚合的，因而千变万化，使它们运动变化的动因是“爱”和“憎”两种力量，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物质与力量分开”的问题，对科学发展有重要意

义。阿那克萨哥拉是从小亚细亚到雅典定居的哲学家，他写了一本《论自然》，把世界看成是由许许多多的“种子”组成，把“多元论”推向极端，谓之“种子世界”。“种子”是一个生动的比喻，既是生生不息的，又是可以无限分割的，犹如大豆可以磨成粉末一样，这里已隐含着“原子”概念的萌芽。他执著追求的精神受到希腊人的赞扬，死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写道：“墓中安息着伟大的阿那克萨哥拉，他的灵魂超升到最高的真理。”

第一个天才地猜想到“原子”的是德谟克利特，他来自爱琴海北岸色雷斯海岸的阿布德拉，曾经到过埃及、埃塞俄比亚、波斯和印度，见多识广。他被人们称为“智慧”，著作等身，涉猎哲学、天文、地理、物理、数学、逻辑、心理、动物、植物、医学、伦理、政治、历史、诗歌、音乐、绘画乃至农耕、军事等诸多领域，因为经常嘲笑那些愚蠢的人而被称为“欢笑的人”。他感到民主政治比专制主义好得多，说“在民主国家中的不幸，比在君主治下的所谓幸福更可取，因为自由总比奴役更好”。他的“原子论”可能受到阿那克萨哥拉的启示，直接源于他的老师留基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假说，认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是原子与虚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最小物质单位，渺小到肉眼不能看见。它们的形状、大小、位置、排列各不相同，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碰撞，有的分离，有的结合，在分与合的过程中产生万物，甚至灵魂也是由一种圆而平滑的“灵魂原子”组成。“原子论”是希腊自然哲学最光辉的成就，他以理性思考把宏观世界深化到微观世界，以原子的运动、聚散来说明世界的物质性与统一性，这虽然不是科学实验的结果，却向真理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近代物理学受到这种假说的启发，通过实验证实了原子的存在，并创立了原子分子论，进而产生了量子力学和核物理，对现代科技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如果说，从米利都学派到德谟克利所关心的是物质世界的

话，那么，苏格拉底所关心的则是人，是“认识你自己”。在欧洲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的地位有如中国的孔子，他成天东奔西走，在各种公共场合及私人家中讲学和谈论道德，是一个“巡回哲学家”。看去也和那些智者一样，但他自己并不以博学的“智者”自居，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爱好智慧的人”，他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也许是他述而不做的缘故吧，他留下的主要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就像孔子留下的《论语》一样。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早年思考的也是自然问题，但渐渐对当时流行的自然哲学产生怀疑，转而思考人的本身，抓住了这个挥之不去而又令人困惑的主题，把哲学从天上落脚到人间，讨论人及其社会环境的关系。在他看来，理性是人的根基，知识是最高的善行，因此，“美德即知识，知识即美德”，只有不断追求知识才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也许是神学的影响或者是当时还难以回答知识来源问题，他认为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神才是真正有智慧的，而哲学家和教师只是“照料他们分娩时的灵魂”，让他们努力求知，搜寻内心，领悟真理。他看到了“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每个活动都有极强的目的性，并影响社会与自然，这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其实，“唯心”正是苏格拉底思想的精髓，如果撇开世界本原不谈，关注人，关注人的灵魂，关注人的知识，关注心灵的净化，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他的学说直接影响柏拉图学派，影响作为斯多葛派先导的犬儒派及伊壁鸠鲁学派先驱昔兰尼派，还有麦加拉派等，因而成为希腊哲学的一代宗师。苏格拉底在思辨过程中已发现一些关于概念、定义、论证的方法，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颇有影响。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把唯心主义推向高峰，与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尖锐对立。柏拉图受过良好教育，周游过希腊，游学过西西里、意大利、麦加拉、昔兰尼和埃及，广泛接触各种哲学

派别，又精通政治、法律、宗教及数学、天文、力学、音乐，著述丰富，是一个知识渊博的智者。他在雅典城外创建欧洲第一个高等学府，名为阿米德卡学园，因而人们又称他的学派为“学园派”。柏拉图创造性地发挥苏格拉底的“理性是人的根基”，认为我们能感知的只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感官（物质）世界”，而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一个永恒、抽象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高于感官世界，它是世界的原型和模子，而感官世界只不过是它的影子。从“理念”出发，他在《国家篇》中构建了一个“理想国”，国王是智慧很高的哲学家，战士勇于战斗，工匠也很有智能，这样，整个社会便进入有秩序的理性社会。在《法律篇》中，他把这种秩序建立在法制上，认为“人类所以要有法律，是因为人的本性是贪婪和自私的”，只有“以法治国”才能有效治理国家。

《蒂迈欧篇》是他世界观的集中体现，造物主和世界灵魂的观念，直接影响了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足可与《圣经》并列。他的艺术观也是纯理性的，说艺术是摹仿自然，而自然是理性的影子，所以艺术是影子的影子，艺术家的才能就在于灵感，实际上是灵魂的回忆。柏拉图是一个哲学大家，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理念世界”的观念，成为黑格尔哲学的基础。“理想国”中的“乌托邦”开启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先河，在 20 世纪许多国家正在摹仿创建“福利社会”、“法制社会”的观念最先为西方国家接受，并成为现代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理性思维和“理念”模式，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在高科技时代尤为重要。他创办的学园，实际上是后来学院、研究院、学会的前身，智力开发在“知识经济时代”更显得特别重要。他的美学观念对欧洲文学艺术颇有影响，注重心灵美的“柏拉图式恋爱”也风行一时。总之，柏拉图的哲学虽然在理论体系上是唯心的，但它从理性上、主观上揭示了许多有价值的原理，应当科学对待。

无论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讨论的都是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的问题，尽管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但都较充分地展示了事物的一个侧面，发现许多真理，同时也存在许多片面性，因此，经过一段激烈争论之后，势必要进行某种综合，于是产生了“百科全书式”的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但他不持门户之见，孜孜以求地探寻真理。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集希腊哲学之大成，经过研究和思考，有所取舍，既有发挥又有扬弃，这正是看去似乎很矛盾而实际很伟大的地方。他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著述达 150 多种，涉及许多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有哲学、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博物学等。首先，把哲学独立成一门学科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此之前，希腊哲学往往与自然科学杂糅在一起。他把柏拉图理性世界先于感官世界的关系颠倒过来，认为知识来源于感官知觉，“理念”存在于事物之中，认识的过程是由个别到一般、具体到抽象，没有感性经验就不可能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本质，“理念”无非是感觉的抽象概括，开启了哲学经验主义的先河。在哲学层面上，他把认识分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两部分，“物理学”研究可感知的万事万物，“形而上学”研究的则是超感觉、超经验的理性思维，这与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学谓之器”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界看成是形式与质料的和谐统一，以此建立他的“四因”学说，即事物生灭变化的四种基本原因：“质料因”是内在“质”的规定，存在于事物的始终；“形式因”是它的外在表现，有千差万别；“动力因”是运动与静止的根源；“目的因”则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追求“至善”，因此，“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是要寻找第一原理和最高原因，即理性上的“至善”。在他看来，人与动物、植物不同，就是因为有理性思考能力，求知是人的本性。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提倡“黄金中庸”，处事“勿过度”。他是博物学的

始祖，第一次把物质分为生物和无生物两大部类，又将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这在科学史上有特别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逻辑学之父”，第一次把思维形式及其规律作为一门学科，代表作《工具论》，意为“认识的工具”。《工具论》包括《范畴篇》、《论题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和《智者的谬误》，对概念、判断、推理、证明及逻辑谬误等问题作了系统论述，主要是阐述演绎推理，提出了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的“三段论法”，并在《形而上学》中讨论了矛盾律和排中律。到了近代，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继承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基础上，结合更加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写了一本《新工具》的书，建立了归纳逻辑学，使形式逻辑的体系更加完备。逻辑学的产生，实际上是在长期论辩的过程中酝酿形成的，它在“智者学派”中已开始萌芽，苏格拉底在概念、定义、论证方面已有许多发现，柏拉图的理性思维推动了它的发展，而亚里士多德建立起逻辑学的体系，并把它从哲学中分立出来。形式逻辑是理性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使人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准确表达思想的方法，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证明获得准确的知识，推导出新的知识，正如恩格斯所说：“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这种科学、严密的思维模式在科学研究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方近代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此有关。

希腊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无论在唯物、唯心方面都可找到它的源头，在认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两方面都有许多精彩的论断，其合理部分都是人类智慧的瑰宝，是思想不断碰撞爆发出来的火花，没有自由的争鸣就不可能有如此光辉的成就。有人把希腊哲学的特点归结为“求真认知”，这或许是对希腊精神世界的概括说明。渴望知识，不断认识客观与自我，并提到“知识即美德”、“理性是人的根基”的高度，这是希腊哲

学昌盛的原因，也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一大动力。人类的认识永远不会停滞在一个点上，对真理的发现是永无止境的，每个哲学家都会有许多发现，但不可能是“绝对真理”。人们在他们的思想中受到启发，继续去探寻新的真理，决不因某一伟大人物而“一锤定音”，米利都学派、爱非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是如此，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至理名言。

5. 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

希腊人从“野蛮”走进“文明”，以一种“自然人”的心态去看待自然与社会，不自觉地成为“万物有灵论者”，自发地产生多神崇拜。希腊的“神谱”是一个幻想的大千世界，各种各样的神翩跹出场，叫人眼花缭乱。最初是在一片混沌中产生了生命之神亥亚，接着产生爱神厄洛斯，天神乌拉诺斯，从此天地分开，昼夜分明，山明水秀，海水扬波，万物生长。天神地母媾合产生了 12 个提坦巨神、3 位独目巨神和 3 位百臂多首巨神，还有复仇女神、浪花女神，跨入了一个爱情与仇杀、暴力与欺骗、巧辩与说服的纷乱世界。在诸神的争斗中，权力滋长起来，有雷电般威力的宙斯占了统治地位，他与智慧的女神麦提斯结为夫妻，后来又与其他女子生下了战神阿瑞斯、工匠神赫淮斯托斯、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尔特米斯、美慧三女神及几个缪斯和波赛丰妮，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奥林匹斯”俨然是人间世界在天上的投影，宙斯是诸神之王，象征秩序、威严与法律。在他统治下，有主管海洋的波塞冬、掌管惩罚的哈得斯、主宰婚姻的天后赫拉，商业之神赫耳墨斯、美神阿芙罗底、太阳神、月神、智慧女神都属宙斯所管，重要的还有酒神兼种植神狄奥尼索斯，其他小神、仙女不计其数。

希腊神祇的形象都是按人来塑造的，宙斯的雕像、阿波罗、

赫耳墨斯、雅典娜等神的雕像，大概都与“掷铁饼者”、“持矛者”的雕像差不多，很难区分哪是人哪是神。神完全被人格化了，与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他们也有爱憎、忌妒、勾心斗角、淫乱偷情，与人世间并无两样。在这里，人是神创造的，神主宰着人间世界，但神又是人造的，它的某种特征被人加以神化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得很近，以世俗的心理来揣度天上的神，归根到底还是以人为本，只不过在神的头上加上一道神秘的光环。人的个性化在神的形象、性格、行状中充分显示出来，更加典型化。重海洋、爱商业、好争战、追求智慧和爱美显得非常突出，成为某种个性的极端表现。对神的崇敬，实际上是人的理想与期盼，包括对人生百态的认识和理解。在希腊，圣地与神庙的数量远远超过城邦，除了那些普遍信仰的神而外，家家有神、灶神、门神，城邦有保护神，如雅典的雅典娜、阿哥斯和萨摩斯的赫拉等。为了敬神，经常举行庆典、赛会，如祭酒神的庆典、奥林匹亚赛会、皮提翁赛会、尼米亚赛会和伊斯特米亚赛会，强调“与神同乐”，事实上是在祭祀活动中尽量充分地展现人类童年的天性，希腊神话就是由此爆发出来的火花。

希腊神话包括两大部分：即神的故事和英雄的故事，前者是把“神界”还原到“人间”，而后者则是把“人间”升华到“神界”，既充满浪漫色彩，富于想像、夸张；又处处扣紧现实，长于叙事、抒情。所以，它们既是“神话”，同时又是“人话”，或者说是涂上神秘油彩的人间故事。神话首先要提到的是赫西俄德的《神谱》，讲的是开天辟地、诸神产生、人类起源和各种神系，包括前奥林匹斯神系、奥林匹斯神系、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等等。这里的神，无论是宙斯神、太阳神、海洋神、战神、商神、智慧之神、爱美之神以及文艺女神、命运女神，都有超人的智慧和力量，但他们在品格上却都和凡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功名利禄之心，有世俗的人之常情，而且往往有些不轨行为，并不都是那样

高尚而神圣。英雄故事来源于历史人物的传奇事迹，它们被神化之后显得更加离奇，如赫利克斯的十二件大功、德修斯为民除害、耶宋取金羊毛和特洛伊战争等等。他们是人，但他们的作为却又神乎其神，异乎寻常。总之，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具有天真的幻想和稚气的想像，是“人性展开得最美好的社会幼年时期”，因而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成为希腊文学艺术的渊藪。

最脍炙人口的是《荷马史诗》，它是诗化了的英雄传奇故事，保存了一段精彩的历史记忆，所以人们把它所记的这一时期称为“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相传这是根据公元前9—前8世纪流传在小亚细亚民间的口头传说写成，作者是盲诗人荷马，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篇章组成。《伊利亚特》以斯巴达与特洛伊的战争为线索，展开了部落战争时代的横断面。故事非常离奇，从一个“不和的金苹果”开始，阿弗洛狄忒女神帮助特洛伊王了帕里斯拐走了斯巴达王美丽的妻子海伦，引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战争的场面宏大，绵延了10年，牵动了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最后以“特洛伊木马”的传奇故事做结。这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人们都以骁勇尚武为无上光荣，情绪激烈，充满英雄气概，血气方刚的阿喀琉斯一腔愤怒，把友谊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是一个天真任性的古代英雄典型。诗中的人物生龙活虎，豪气逼人，譬如：“如果我赫克托耳像懦夫一样逃离战场，那么我过去所获得的光荣和美名，岂不要被特洛伊的英勇的儿子们和拖着长裙的特洛伊妇女所耻笑。”《奥德赛》描写的是希腊英雄俄底修斯战后还乡的故事，他在海上飘流十年，经历了千辛万苦，遇到许多神奇古怪的事，折射出人与自然的纠葛与幻想。史诗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以英雄人物为中心，风格崇高，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充满激情，在世界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被誉为“希腊人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

希腊神祇、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反映了希腊的自然、社会风貌和希腊人的精神面貌，自然的威力和世间的英雄都化为神奇，处处关照现实生活。在这里，它没有令人恐怖的压抑和诱人的彼岸世界，而是以人为本的人间现实，洋溢着奋进与乐观主义精神，神人同体，半人半神，张扬个性，大胆追求，显露出人类的一片童真，这是希腊社会的折光反映。我们看见的不是匍匐在神灵脚下的人，而是同神交往、对话的人，在观念上与盲目崇拜、迷信神灵完全不同，更多地体现人的价值取向。

在希腊文学中，颇负盛名的还有《伊索寓言》，相传是公元前 6 世纪时希腊奴隶所作，共 300 余则。它是民间口头文学的结晶，其中有些故事来自埃及和西亚，说明地中海各国民间交往频繁。《寓言》的故事短小精干，比喻生动，在人和动物或者动物与动物的对话中表达若干含义深刻的人生哲理，以致广为流传，成为世人熟知的典故。《狼和小羊》告诉我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农夫和蛇》告诉我们，“怜悯恶人，反遭其害”；《乌龟和兔子》的故事，劝人不要骄傲自满；《猫和鸡》的故事，劝人切莫上当……以动物来作比喻，形象生动，特征鲜明，通俗易懂，易于流传，而所寄寓的思想则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终身难忘。正是这个原因，人们一提起某个故事，即刻就会悟出深刻道理，感人至深。从《伊索寓言》这一侧面，可以看出希腊人民的艺术才能和思考能力。

6. 悲剧和喜剧的源头

寻根溯源，欧洲的戏剧，无论喜剧或悲剧，都以希腊为源头。戏剧是希腊“古典时期”的一大闪光点，它起源于酒神的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是掌管葡萄种植和酿造葡萄酒的，春冬两季人们都要祭祀他。这种祭祀原先是农村的活动，转入城市后迅速发展。悲剧源于“酒神的颂歌”，由几十人的歌队与歌手唱和，

讲述酒神遭受的苦难和赞美他的再生，歌者皆披山羊皮，象征半人半神的酒神漫游世界，称为“山羊歌”。喜剧是从祭祀完毕后的狂欢歌舞中萌发出来，出现一种讪笑打诨的场面。进入城市是戏剧发展的新起点，这一转换给戏剧带来了旺盛的生命活力。它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在人口密集之区找到更多的观众，适应商业活动与航海事业的需要，使之变为一种大众化、社会化的活动。如果说原先主要是为了“娱神”的话，那么，入城以后，“娱人”的成分日渐增加。雅典的民主政治赋予它新的生命，使它更加贴近现实，反映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并成为不同政治观点的艺术传媒形式，通过戏剧来表达不同的意愿和要求，致使戏台与论坛结为伴侣。伯里克利时期，戏剧空前繁荣，修建了巨大的露天剧场，每年春、冬两季举行盛大戏剧比赛，竟至出现“看戏发津贴”的怪事。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固然在结局上显得悲壮，但它主要不是写“悲”，而是描写严肃的事情，引起人们的同情与警戒，达到思想与感情的净化。悲剧的内容主要是人和命运的冲突，它虽然以历史故事和神话为题材，但处处关照现实社会，看来是因主人公的性格缺陷而导致悲剧的结局，实际上是在歌颂一种反暴力、反专制的崇高精神，唤起人们的奋进，有巨大的震撼力量。雅典第一次上演悲剧大约是在公元前 534 年，第一个悲剧诗人据说是 斯庇斯，他的剧作保留了酒神颂的合唱形式和抒情诗的特点，只有一个演员轮流扮演几个角色，穿高底靴，戴假面具。后来增加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演员，并形成悲剧的基本结构程式。它由悲剧表演与合唱两大部分组成，以合唱来说明剧情、烘托气氛，起进场、退场、分场的作用。随着戏剧的发展，对白上升到主要地位，合唱减弱。一般采用“三联体”形式，三个相对独立的小戏，在人物和情节上互为贯通。全用诗句写成，有较深的哲理思索。雅典悲剧的三大诗人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

欧里庇得斯，他们是不同发展阶段思想与艺术特色的代表。

埃斯库罗斯被誉为“古希腊悲剧之父”，他生活在雅典民主制形成时期，亲身参加过反僭主的独裁政治和反对波斯侵略的战争，创作了 70 多个悲剧，如赞美阿尔哥斯国王民主作风的《乞援人》、以波斯海军在萨拉米全军覆没为题材的《波斯人》、以希腊传说影射政客争权夺利、卖国求荣的《七将攻忒拜》等。最著名的悲剧是《普罗米修斯》，它由《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与《带火的普罗米修斯》三部悲剧组成，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宙斯神专横跋扈的崇高英雄形象，他宁愿忍受一切苦难盗取天火，把光明与温暖带到人间，表现出雅典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大无畏精神，被马克思誉为“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埃斯库罗斯把演员增加到两人，加强了对话，采用布景、道具、服装、面具，基本形成了希腊悲剧的结构程式和抒情性，诗句优美。

索福克勒斯被誉为“戏剧艺术的荷马”，他生活在雅典民主政治极盛而衰的时期，曾被选为十将军之一。据说他写过 130 部悲剧，是雅典得奖最多的悲剧作家。他的代表作是《俄狄浦斯王》，借用一个惊心动魄的古老故事来反映现实，一个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极力反抗命运，为忒拜城解除灾难，最后发现引起瘟疫的凶手就是自己，悲痛之极刺瞎了自己的眼睛，请求放逐。主人公清白无辜却不自觉地铸成伤天害理的邪恶，他竭力反抗命运却陷入了悲惨的深渊，他敢于面对现实而承担一切责任，赢得了人们的怜悯与宽恕。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希腊悲剧的典范，悲剧冲突、悲剧性格和悲剧效果都达到成熟的艺术境界，剧情发展自然而一步步推向高潮，情节复杂而简练紧凑，主人公不自知的状态使得悲剧的成分更浓，莱辛称它是“最完美的悲剧”。索福克勒斯在剧中增加了第三个演员，打破了“三联体”的传统模式，戏剧冲突尖锐，结构精巧、紧凑、自然，风格质

朴、明快、有力，合唱优美、动人。

欧里庇得斯被誉为“舞台上的哲学家”，他的悲剧大部分是在希腊内战期间写成，相传写了 92 个剧本，内战和家庭悲剧占有很大分量。他酷爱民主，在广泛触及社会矛盾的情况下提高到哲理高度认识现实，希腊诸神在他的笔下失去了神圣的光辉，英雄人物也变成了无耻小人。《美狄亚》以“金羊毛”的故事为线索展开，讴歌美狄亚的聪明、倔强、智谋和胆略，哀叹“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子算是最不幸的”。剧中感情炽烈，爱与恨都超乎寻常，收到悲剧的强烈效果。作者长于写实和心理刻画，不去描写理想的英雄，而是写人的本来面目，更加接近生活。

悲剧是希腊戏剧的主流，它以神化和诗化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严肃、重大的社会主题，叩人心弦，发人深省，以“悲”的情节触动观众的心灵，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而喜剧产生于希腊民主危机到来之时，它以辛辣的讽刺揭露社会矛盾，情节荒诞离奇，风格幽默滑稽，表演轻松愉快，在嘲笑声中使人受到启迪和教育。喜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偶然趣事加以夸张，直接针砭时弊，甚至鞭挞某些当权者或社会名流，注重批判性和讽刺效果，主题思想表现在对驳场中。剧中角色比悲剧多，一般由开场、进场、对驳场、评议场、插曲、退场六个部分组成，斗争一方胜利之后有一个欢乐场面。雅典的三人喜剧作家是克刺提诺斯、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

阿里斯托芬被誉为“喜剧之父”，他留下 11 部完整的剧本，流露出对雅典民主繁荣时代的怀念之情，锋芒指向现实的政治与社会弊端，反对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战争，期盼和平。他惯于使用夸张手法，妙趣横生，在嬉笑怒骂中体现主题。又善于运用民间口语加强喜剧效果，语言诙谐、生动，既有俚俗的插科打诨，又有优美的抒情诗句，但结构松散，人物类型化的倾向明显。他

在《骑士》中大胆把政治煽动家克勒翁写成一个愚弄人民的骗子，在《吕西斯特刺忒》中宣扬妇女也能挽救城邦，在《鸟》中以神话幻想来呼唤建立“云中鹑鹑国”的理想政治。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卡奈人》，它通过漫画式的夸张和看去极不正经的打诨场面，以近乎闹剧的形式讥讽好利好战的政治家和军官，让将军们在哇哇大叫的场而出丑。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像是一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凸凹镜，情节虚构而本质真实，海涅曾经说过，它像是童话里的一棵树，树上有思想的奇花、歌唱的夜莺和攀缘的猢猻，耐人寻味。

7. 克利奥女神与“历史之父”

在希腊神祇中，克利奥是九个缪斯中的一个，她最初的职能是掌管英雄歌曲，到了“古典时代”才演变为史学之神。在此之前，希腊的历史只能从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中找到一些影子。

《荷马史诗》算是有文学记载的开始，但它所描写的“英雄时代”也只是神话中的英雄或英雄时代的神话，虽然有些史实后来为考古所证明，但毕竟只提供了历史的线索，而且它的成就主要是在文学方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历史”的任务是要如实地把事记录下来，并经过科学的整理和编纂，决不是神话、传说、史诗之类想像丰富、似是而非的作品所能代替。希腊史学的真正开创者是希罗多德，他的巨著《历史》被视为欧洲的第一部史书，因而希罗多德也被称为“历史之父”。在此之后，有一位名叫修昔底德的将军，根据他的亲身体会写成了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欧洲史学界奉为客观主义史学家的鼻祖。色诺芬的《希腊史》或可看成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编，被称为“叙事史的杰作”。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合称希腊三大史家，他们的成就是可代表希腊“古典时期”的史学。

希罗多德第一个把希腊的事载入史册，但他自己的生平却很

少见于记载，大体可知他生活在公元前 5 世纪，可能出生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哈利卡纳苏斯。希罗多德首先是一个大旅行家，他漫游过希腊半岛、小亚细亚、波斯、巴比伦、埃及、利比亚，到过黑海沿岸、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环游地中海使他看到了一个比希腊宽广得多的“世界”。耳闻目睹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亲自考察了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地点、路线和遗迹，这就使他的《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能够把希腊的历史放在“地中海世界”的大背景下来作叙述，而不是就希腊谈希腊。他虽然是以希腊人的立场来写《历史》，但并不抱民族偏见，而是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去评述历史，在斥责波斯侵略战争的同时赞扬波斯文化，认为东方是“文化和智慧的摇篮”，指出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高明，希腊字母出自腓尼基字母，希腊的日晷起源于巴比伦，“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他热情地歌颂希腊的民主政治，第一次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与此同时，他透过史实看到，不可一世的专制帝国到头来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在这里，他不仅有史学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有深远的历史眼光。《历史》共分九卷，每卷皆用九个缪斯女神命名，它采取了纪事本末体的编纂方法，以事件为经展开叙述，但也夹杂着一些神话传说，留下一些史话、史诗的胎记。他记述的原则是“有闻必录”，但又不是“有闻必信”。他说：“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但是没有责任去相信一切”，所以，对不同的说法采取“诸说并存”的态度，始终保持史学家求实、审慎的严肃作风。

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晚二三十年，曾经是雅典将军之一，亲眼目睹伯罗奔尼撒战争。因此，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主要来源于自身的体验和当时的直接材料，演讲词大约要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全书共分 8 卷，但因突然去世最末一卷并未完成，留下深深的遗憾。他尊重史实，拒绝把虚构的人和事记入史册，而且

不为尊者讳、亲者讳，也不掩饰雅典的弊端和缺点。因为全书的主线是战争，并不涉及经济、文化，也不牵涉整个地中海，所以脉络清晰，结构严谨，叙事紧凑，不像《历史》那样头绪纷繁、枝蔓横生。在他看来，“神是不可信的”，因而历史只能用人事来做解释。他是一个冷静的史学家，不因个人恩怨而妄评历史，也不以雅典立场而文过饰非，极力从历史事实中吸取经验教训，所以他在导言中宣称，这本书决不是为了一时的轰动，而是希望能传之千古。在那不勒斯博物馆里，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雕像同在一个基座上，但背靠背地各视一方，这是因为他们的治史观点和方法不同。如果说希罗多德是“社会文化史的开创者”的话，那么，修昔底德则是“政治军事史的奠基人”。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说：“修昔底德作品的第一页便是——一切真实历史的开端。”然而，也正因为他只持一家之言，没有留下可供参照、对比的材料，所以后人很难评判它的真伪与是非。

色诺芬是修昔底德的同胞，曾师从苏格拉底，他卷入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因受库于斯巴达对祖国作战，后来被雅典以缺席判决的方式宣判死刑。他继承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业，把《希腊史》写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终结，提供了希腊衰败时期的资料。他开创了传记体史书，著有《回忆苏格拉底》和《阿格格西劳传》。他所写的《万人远征记》带有回忆录性质，记的是他率领雇佣军远征的故事，被认为是“叙事史的杰作”。他还写了一些关于政治经济的书，如《经济论》、《雅典的收入》、《斯巴达政体论》等，对研究希腊历史做了有益的补充。

8. 难以企及的希腊造型艺术

希腊的造型艺术在世界上占有崇高地位，一向被人们视为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希腊雕塑，其次是仪态非凡的建筑。这些雕塑和建筑，显露出希腊人极力追求完美的心

态，犹如在哲学上不断追寻真理一样的执著。他们塑造的，是一种力与美结合得天衣无缝的形象，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无论是雕塑或建筑，风格上都显得庄重而典雅，以“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饮誉千古。人的创造力在这里得到充分发挥，丰富的想像和大胆的构思给人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正是因为这种无忧无虑的自由人的创作，才给人类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希腊艺术最精彩的是人体雕塑，人的高贵在这里突显出来，使人感受到力量、智慧与健美，感受到灵与肉依存贯穿着的生命韵律。在这座艺术的殿堂里，英雄、智者与凡人都有他们的位置，幻想中的神像也化为人形，凝结在众多的雕像上。也许是希腊人对人体自然美的强烈追求，为了一个漂亮的海伦居然引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因为美男子被力波斯的死，人们给他无上的荣耀，每逢佳节总要挑选最美的老人领队，要最美的男子去贡献祭品。鼓筋暴绽的肌肉、坚强有力的四肢和那虎背熊腰的身躯，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它是男子阳刚之美的象征。女人的温柔、沉静、细腻，从那优美的曲线与俊秀的脸庞中透露出来，叫人为之倾倒。哲人的沉思，散发出智慧的灵气。宙斯的神像，从平凡中显出超凡。面部是雕塑家刻划表情的着力点，神态大都安详，动作显得沉稳，单纯的色调和淡漠的表情构成一种难以捉摸的美，而这些注入了人气的石头似乎都会说话。裸体美是一种流行的风尚，这种毫无遮掩的造型可能更能展示人的天性和灵肉的美感。据说雅典有一个美丽的妙龄女子芙丽妮，她得意地从海水中裸露出来，有人指控她亵渎神灵，而人们却为她的美目瞪口呆，以致成为裸体女神雕像的模特儿。

早期的希腊雕塑，显然是受东方风格的影响，同埃及雕像一样刻板，正面取像，两腿平行，头戴假发。这与纳克索斯岛出土的那批雕像颇多相似，但又多了一些模仿痕迹。不过，希腊人终于从这些古朴的雕刻中找到了灵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先是把

手脚与身躯分开，注意背部处理，然后突出胸部、腹部、腿部，而以一只腿支撑身体时的力度表现出来，在嘴角上刻出“古风式的微笑”就完全突破了“埃及模式”。古风时代的男像以裸体为主，女像几乎都穿着衣裳，只能隐约感觉到她的形体美，但后来凸出了胸部、裙子下露出丰满的腿，增添了脸上的笑容，这才显出女性风采。神庙雕刻讲究对称，构图密而有序，表现的故事情节常有动态，如宙斯追杀巨人、女妖梅杜莎逃遁之类。雅典娜神庙的浮雕，展开了这位女战神帮助希腊人攻打特洛伊的情景，形象高大的雅典娜位居中央，围着她的希腊人以各种姿势作战斗状，主题十分鲜明。

古风时期过去之后，希腊雕塑进入了“黄金时代”。在众多的雕塑家中，著名的有米隆、波力克利特、普拉西特列斯和菲迪亚斯。米隆的得意之作是“掷铁饼者”，他抓住了运动员手握铁饼向后摆动到铁饼即将飞出的那一瞬间，塑造了一个静态中有动的永恒形象，整个运动者的力都通过手臂传达到铁饼上，目光盯住那手中的铁饼，一只大腿支撑身体，另一只大腿则作跑跳状，表达出动与静的一个极其微妙的契合点。“持矛者”雕塑是波力克利特的杰作，他捕捉了即将投矛的那一霎那，在静态中显示出一种潜在的运动势态，动作准确，姿势优美，人体比例恰当，被后世推崇为人体雕塑的典范之作。堪称希腊艺术绝品的“科尼多斯的阿芙洛狄特”，是普拉西特列斯的呕心之作，从一个脱衣入浴的女神身上，把女性的曲线美表现得淋漓尽致，温柔、妩媚、羞怯与雍容的复杂心态在此无声的一刻都流露出来，使人玩味无穷，被视为美女塑像的楷模。在伯里克利时代，最杰出的雕塑家兼建筑师当推菲迪亚斯，他主持了雅典卫城及帕特依神庙、伊利特盎神庙的修建。帕特依神庙的雕塑，主题是雅典娜，描绘了她诞生和充当保护神的故事。据说他塑造了三尊雅典娜的像，有铜像“女战神”和木像“处女雅典娜”，她左手持盾，右手持胜利

之神，金衣垂地，神态庄严而平和。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据说也是他的作品，以其富于人性的表现力而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菲迪亚斯的风格影响了一个时代，创造了许多杰作，所以人们把这一黄金时段称为“菲迪亚斯时代”。正如普鲁塔克所说：“这些作品特别令人信服之处，就在于它们虽属人工产品，但却具有永恒的生命。它们的美丽与秀雅，即使在完成的瞬间，已经是千古不朽的杰作。”

希腊建筑聚焦于神庙，无论是在希腊各城邦或小亚细亚希腊殖民地，修建神庙蔚然成风。在希腊人眼中，住宅的豪华并不重要，而神庙的庄严、宏大、气派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城邦兴旺发达的象征。神庙建筑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列柱式”，在殿堂周围环以许多高大的廊柱，看去排列如林，巍峨宽敞，使人有顶天立地、恢宏博大的感觉。这种建筑模式，不但遍及希腊，而且直接影响罗马式建筑，长期在欧洲流行。然而，它的原型地来自埃及神庙，只不过埃及列柱较少，而希腊人用更多的柱子支撑屋顶借以扩大室内空间，并将木柱木梁改用石料，显得更加庄严和气派。事实上这一类型的建筑在克里特和迈锡尼文化中已经出现，而且与赫梯有关。文化的源流十分清楚，源于东方而盛于西方，希腊人的创造是它发扬光大的关节点。

在希腊建筑中，“列柱式”演绎为多利亚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它们既是三种不同的类型，也是三个演进阶段。在希腊半岛最先出现的是多利亚式，继后为爱奥尼亚式所取代，而晚期才出现科林斯式。多利亚式在公元前7世纪已见端倪，主要流行于伯罗奔尼撒，其特点是不用柱础，柱身粗壮且由下到上逐渐收缩，柱头没有装饰，体现力的和谐、雄劲而朴素。爱奥尼亚式起源于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希腊繁荣时期才在半岛上广泛流行，它增加了柱础，在柱身上刻有凹槽，在柱头上添加许多纹饰，显得婷婷玉立、典雅华贵，颇具阴柔之美。科林斯式大约出

现在公元前 5 世纪末，它接近爱奥尼亚式，但装饰性更强，柱头宛如一只花篮。三种柱式相互影响，例如巴塞的阿波罗神庙，外层为多利亚式，内层为爱奥尼亚式，阿波罗神像旁边立着一排科林斯式柱子。

神庙构造比较简单，通常为长方形，分为前后两间，前面安置神像，后面是祭司住室，朝拜者在庙前院中祭祀。论其规模，有四柱、六柱、八柱等，多以大理石或石灰石建成，显得洁白无暇而秀美。古风时代的代表作是小亚细亚爱菲斯的阿泰密斯神庙，它建于公元前 560 年，长 126 米，宽 65 米，下有 10 级台阶，四周围绕 127 根高 23 米的圆柱，屋顶用大理石铺盖，蔚为壮观，也是地中海“七大奇迹”之一，属早期爱奥尼亚式。奥林匹斯的宙斯神庙始建于公元前 475 年，它是一座六柱式多利亚式建筑，殿内安放出自菲迪亚斯之手的宙斯坐像，气势非凡，传达出神界与人间统治权力的威严。最具代表性的是雅典的帕特依神庙，这是一座八柱多利亚式建筑，全用大理石建造，为了避免因门面宽阔而造成扁平的感觉，有意加高柱子，还在柱上加额枋、檐壁和屋顶，使高度达 19 米。殿中安放金色雅典娜巨像，高 12 米，在洁白明亮的殿堂之中更显得金碧辉煌。雅典娜雍容华贵，威严之中带有少女的纯洁和天神的祥和，令人肃然起敬。帕特依神庙的后厅，采用四根爱奥尼亚式柱子，并建造了一条环绕全庙的爱奥尼亚檐部装饰带，长约 160 米。在神庙的北面还建有一座较小的厄瑞克透斯神庙，全部采用爱奥尼亚式，雕刻精美。不难看出，这是一座综合了多利亚式和爱奥尼亚式优点的古典建筑群，成为希腊建筑的经典，诚如普鲁塔克在《伯里克利传》中所说：“伯里克利的这项杰作尤其惊人，虽然它短期完成，却能传之永久。每一件工程都十分完美，立刻成为古迹，而又万古常青，直到今天仍像刚刚建成一样。它像是永世开放的鲜花，看来永远不受时间的触动，仿佛这作品被注入了永不衰竭的气息和永不衰老

的灵魂。”

9. 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马拉松赛跑

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国际活动像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样具有广泛性和号召力，它使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人类共同的体育运动，不断刷新纪录，不断发起挑战，并以夺取奥运会金牌为崇高目标。然而，这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奥运会却产生了小小的希腊城邦，它像原子核一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世界体育史上，近代体育的许多竞赛项目特别是田径赛项目都起源于奥运会，著名的马拉松赛跑也来自于希腊。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因奥林匹亚庆典而起，由宗教活动演变为体育竞赛。希腊是一个神人共享的浪漫世界，人们狂热地举行各种祭礼庆典，在祭祀活动中与神同乐，无数次的庆典使希腊人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在诸多的节庆中，皮提翁、奥林匹克、涅密亚和伊斯特弥亚合称古希腊的四大节庆，奥林匹克就是最隆重的一个盛典。奥林匹克因奥林匹亚而得名，这个被称为奥林匹亚平原的地方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伊利斯城外，希腊人最崇敬的宙斯神庙就建在这里，可以说是奥林匹亚诸神云集的圣地。正是这个原因，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盛典牵动了整个希腊半岛，还牵动了包括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西西里岛在内的“大希腊”。节前的几个星期，就从伊利斯城派出三个信使，头戴橄榄枝编织的冠，手拿棍子，奔赴希腊各城邦，邀请他们前来赴会。为了娱神娱人，庆典期间总要有许多文娱活动，犹如祭酒神必演戏剧一样，奥林匹克庆典除歌舞外，还有体育竞赛。希腊人崇尚灵与肉的美感，认为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体质，增进身心健康，既可使人有健美的体形，又可培养机智、灵活、勇敢、坚毅的性格。斯巴达人最重视体育，这并不完全是因为战斗的需要，而是崇尚人体

美，他们自认是希腊的“美男子”和“美女子”，所以把体育运动纳入庆典与他们的提倡有很大关系。

公元前 776 年，由斯巴达王米库古和伊利斯王伊菲斯特共同发起，将体育竞赛纳入奥林匹克庆典的活动内容，这便是历史上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期共五天，比赛项目有竞走、持械竞走、拳击、赛马、赛车等，最多时达 23 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赛跑、跳远、掷铁饼、投标枪和角力。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庆典，参赛者都必须光明正大，按严格的规则公平竞争，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在庆典期间，整个希腊必须停止一切战争，称为“神圣休战”。所以在赛会之前，由 3 名运动员举起“圣火”，跑遍希腊全境，传达休战的告示，直到结束时才能让“圣火”熄灭。优胜者的最高奖赏是橄榄枝做成的王冠，这是因为宙斯庙掩映在一片橄榄林中，这些树也便成了“圣树”。夺取冠军的人，享有各种特权，如担任荣誉职务，看戏时特设荣誉席，可与最受尊敬的人一起进餐等，连续三届的冠军还有权在奥林匹亚塑像。

在往后的发展中，奥林匹克运动会加进了一个重要项目，就是马拉松赛跑。公元前 490 年，波斯军队第二次侵入希腊，雅典坚决抵抗。当波斯人在马拉松登陆时，情况非常紧急，雅典便派长跑运动员斐力庇向斯巴达求援，跑了约 300 公里才到达斯巴达，但斯巴达人迷信，坚持要等到月满之后才能出兵。雅典全体动员，同仇敌忾，以一万人的兵力在马拉松打败了四万波斯军，在世界战争史上成为一个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光辉战例。战斗取得了胜利，雅典又派斐力庇回城报捷，他一口气跑完了从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到达时连声高呼：“胜利了，胜利了。”然后仆地而死。为了纪念这个爱国的战士，便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增设马拉松长跑项目，长度为 42.195 公里，也就是斐力庇所跑的这段路程。

从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每四年一届，在此后的千余

年中共举行了 293 届，可是到了公元 394 年却突然中断，这是因为西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认为这是异教徒活动，宣布禁止。事隔千余年，1883 年法国教育家皮埃尔·顾拜旦男爵发起举办近代奥运会，得到英、美等国响应，于 1896 年在雅典举办了近代的第一届奥运会，有 13 个国家参加。自此以后，“圣火”传递不绝，参加的国家越来越多，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重大活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希腊走向世界，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第一，它的宗旨是“团结、和平、友谊”，反映了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愿，因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第二，它始终坚持“公平竞争”、“公开竞争”的原则，这种竞争机制，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第三，奥运会的口号是“更快、更高、更强”，激励人们不断创新，永远不停留在某一成绩上，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冠军不断涌现，体现了努力奋进的“奥运精神”；第四，奥运会对于促进世界各国的体育运动起了巨大作用，增强人类的体质是全世界共同一致的要求。这一切都来自古老的希腊文化，由此可以看出它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大交融的“希腊化”时代

希腊的辉煌过去之后，便进入了“希腊化”时代。所谓“希腊化”时代，是指“马其顿方阵”踏遍希腊半岛之后到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这一时期，即公元前 338 年至公元前 30 年，前后三百年时间。“希腊化”实际上是希腊文化向外扩散的过程，或者说是它的“泛化”。希腊文化虽然达到古代世界光辉的顶点，但它毕竟只局限于希腊半岛的“弹丸之地”，充其量扩展到“大希腊”的范围。然而，如果不是“希腊化”时代将这一“弹丸”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并不足以影响整个地中海文明，更不可能影响全世界。从纵向上看，“希腊化”时代是由希腊文化到罗马文

化的中间期，将希腊人的创造延续下来。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亚历山大帝国的推动下，希腊文化迅速向地中海区域传播，而东方文化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影响希腊文化，造成文化的大交融。文化中心已不在雅典或希腊，而是向东移动，亚历山大里亚成了文化繁荣的城市。在希腊文化泛化的同时，政治上却被“东方化”了，亚历山大帝国就是一大标志。在希腊文化横向发展的过程中，某些方面呈衰退现象，例如哲学、文学。但文化大交融也爆发出新的火花，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取得丰硕成果。继雅典之后，兴起了罗德斯岛、亚历山大里亚和帕加马三个文化中心，举世闻名的“断臂维纳斯”就是这一时期的杰作。建筑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在希腊人称道的“七大奇迹”中，就有四大奇迹出现在“希腊化”时期。

1. 亚历山大帝国的勃兴与解体

亚历山大帝国是马其顿建立的，因为这个帝国的缔造者是亚历山大，他死后便宣告帝国的终结，所以后人便以这个传奇式的君主命名，把它叫做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半岛从来未有的统一在亚历山大时代实现了，并在短短的几年内急剧扩张，形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马克思把它称为“希腊外部极盛时期”。犹如天上的流星划空而过，它奇迹般地出现，又戏剧性地消失，从建国到崩溃只有 20 年左右时间。

历史的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马其顿原先住在希腊北面，平原部分称为上马其顿，山地部分称下马其顿。当希腊繁荣的时候，马其顿尚处在“军事民主”阶段，被排斥在“希腊世界”之外，而谓之“蛮国”。然而，地中海形势的急剧变化，却使这个充满“英雄气概”的蛮国有了用武之地。波希战争是一大转折，在此之后，雄峙亚非的波斯帝国一蹶不振，希腊走向繁

荣。可是不到半个世纪，希腊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城邦危机四伏。历史给马其顿一个机遇，它凭着“英雄时代”的雄武，完成了希腊半岛的统一，并以势如破竹之势灭亡了波斯，在波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

马其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才开始崭露头角，在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形成一个地广兵强的国家。它的开创者腓力二世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马其顿迅速强盛起来。他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把权力集中，使王权凌驾于部落之上。推行币制改革，兼用希腊银币和波斯金币，以利于对外贸易。注意吸收希腊文化，渐渐由“野蛮人”融入“希腊世界”之中。最重要的是实行军事改革，建立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他将军事民主时期“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的制度改变，把服役的骑兵和步兵变为常备军，并招募雇佣兵扩充队伍。他仿照底比斯的军队编制，组成密集、纵深的作战队形，其中有手持长矛的重装步兵和善于冲锋陷阵的重装骑兵，号称“马其顿方阵”。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拥有战舰百余艘。经过这番改革，马其顿一跃而为军事强国。此时的希腊城邦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在大军压境之时仍在争论不休，一派主张亲马其顿，另一派主张反马其顿。公元前 338 年，腓力二世的军队在喀罗尼亚击败了反马其顿联军，全面控制希腊。并在科林斯召开“泛希腊会议”，确立马其顿对各城邦的统治地位。

科林斯会议后不久，腓力二世遇刺，由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开始进行东征，其目的是“把战争带给亚洲，把亚洲的财富带回欧洲”，借以挽救希腊的危机。东征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波斯，双方于公元前 334 年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格拉尼库河交锋，波斯大败。亚历山大以“解放希腊城邦”为口号，得到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支持，很快就占领小亚细亚。他挥军南下，在伊苏战役中击溃大流士三世率领的波斯军，夺取了叙利亚。推罗攻坚战胜利后，征服了腓尼基。公元前 332 年，亚历山大水陆两路进

攻埃及，在四个月之内将埃及吞并，朝拜阿蒙神庙。继续挥戈东向，与波斯军决战于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接着攻占苏萨和巴比伦，进而火烧波斯波利斯城，于公元前 330 年结束了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统治。公元前 327 年进军印度，经过两年苦战把印度征服，于是定都巴比伦，建立起比波斯更为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

他把都城由希腊半岛的科林斯迁往巴比伦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因为地中海东岸是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而且是波斯帝国的故土，只有把政治中心转移到东方才能有效控制地中海。作为一个军事大帝国，权力高度集中，与希腊传统的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而与东方专制主义十分接近，所以在政治上便以波斯帝国为榜样，实行中央集权。在亚历山大看来，凡是“马其顿方阵”踏过的地方就是他的领土，灭掉波斯他就是波斯皇帝的继承人，吞并了埃及他就是“阿蒙神了”，名正言顺地戴上法老的桂冠。帝国沿袭了波斯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采用东方宫廷礼仪，仍维持波斯划分的 20 多个省区，派总督进行分管，可以说是波斯帝国的“希腊版”。所不同的是，统治者由波斯人换成了马其顿或希腊人，但后来也不得不任用波斯人、埃及人、印度人担任总督，惟一的条件就是要忠于亚历山大。不过，在战乱的环境中，许多省形同虚设，有些地方并未纳入行政建置，有的地方名义上归属帝国而实际上仍保持独立或自治。希腊城邦基本维持原状，但在这种专制气氛下寡头政治盛行起来，雅典也不例外。天不假年，这位年轻气盛的“天才军事家”在 32 岁时就结束了生命，时为公元前 323 年。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在统帅死去之后，群龙无首，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于是在原先的历史状况下分裂为三个王朝，即希腊的马其顿王朝、西亚的塞琉古王朝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

统治希腊半岛的主要是马其顿，在亚历山大死后进入了几十

年诸将争立的混战之中，公元前 276 年安提柯·贡那特建立马其顿王朝，即安提柯王朝，首都科林斯。在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大量财富流入希腊半岛，首先得利的就是科林斯，它占着对罗马进行贸易的优越位置，成为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雅典民主制度受到摧残，在长期反马其顿的斗争中形成了寡头政治。在公元前 3 世纪，中希腊各邦结成埃陀利亚联盟，伯罗奔尼撒各邦结成阿卡亚联盟，展开对马其顿的斗争。此后出现过“斯巴达改革”，从平分土地入手以增强军事力量，但阿卡亚联盟在马其顿的反击下成了泡影。罗马兴起后首先威胁着希腊，虽然两个联盟共同对抗罗马，但力量对比悬殊，马其顿王朝终于在公元前 146 年为罗马所灭。

亚历山大的部将塞流古控制了叙利亚、巴比伦、小亚细亚一带，以安条克为首都建立塞流古王朝，又称叙利亚王国，即中国史上所说的“条支”。塞流古称王后极力恢复亚历山大帝国旧土，但此时印度北部已为孔雀王朝统一，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希腊又为马其顿王朝统治，所以只保有波斯帝国在西亚的领土。从公元前 276 年起，塞流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为争夺地中海东部和爱琴海的霸权进行长期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经过四次叙利亚战争之后，米底、帕提亚、巴克特利亚等成为塞流古王朝属国，而叙利亚海岸则为埃及占有。公元前 203 年，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和马其顿王腓尼五世联合，乘埃及国内局势动荡之机夺回了失地，并进入爱琴海地区，但此时罗马正在向东扩张，马革尼西亚一战之后，塞流古王朝从此衰落。公元前 64 年，罗马统帅庞贝领兵进入西亚，塞流古王朝被推翻，变为罗马帝国的行省。

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埃及为部将托勒密占有，建立托勒密王朝，以亚历山大里亚为首都。托勒密王朝继承埃及法老的传统，宣扬“王权神授”，国王号为“救主”，把已故国王尊为神

灵。国家机构原封未动，把全国分为上、下埃及两部分，下设若干州。官衔相当杂驳，有埃及的官衔，也有马其顿和波斯的名号。在埃及，军队掌握在希腊手中，宗教祭司为埃及人，而行政权以希腊人为主、埃及人为辅，实际上是希腊人与埃及贵族联合统治。反对托勒密的起义不断发生，王朝统治摇摇欲坠，争夺王位之事也时有发生。罗马大将恺撒、屋大维等先后侵入埃及，于公元前 30 年结束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

2. 地中海文化的交融期

严格说来，亚历山大帝国并没有真正统一地中海，即使在它的极盛时期也只是短暂的征服，分裂为三个王朝后更是各自为政。然而，它以征服者的姿态，统一了“希腊世界”又灭掉了雄峙亚非的波斯帝国，打破了“两个世界”隔离的政治壁垒，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因而出现了一个文化大交融的“希腊化时代”。在此期间，已充分发展起来的希腊文化迅速扩散，不断放大，波及整个地中海，在东方形成许多“希腊化”城市，仅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就有 70 多个。另一方面，波斯帝国已将埃及、巴比伦、希伯来、腓尼基、小亚细亚及印度统一起来，使古老的东方文明相互交融而为一个高文化区，强烈影响地中海。马其顿和希腊人占领这片土地后，有机会亲临其境地接触、了解东方文化，并深受其影响。两种文化广泛接触、交流、渗透、影响，注入了新的活力，把地中海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政治东方化”是这一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无论是亚历山大帝国或者马其顿王朝、塞流古王朝、托勒密王朝都没有跳出这“历史的怪圈”，希腊传统的民主制度已被压得黯淡无光。如果从希腊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转型”，由民主转向专制；从东方专制主义来说，则是扩张。也就是说，在马其顿希腊用武力征

服东方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却被东方征服了。历史发展到了这一时期，打破国家、民族界限势在必行，统一地中海的客观形势呼唤着大帝国的出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统一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军事征服，犹如波斯帝国一样。作战强调意志集中，步调统一、服从命令、权力高度集中在统帅手中，军事独裁必然导致政治专制，在这一点上与东方专制主义一拍即合。何况，在亚历山大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靠武力征服形成的波斯帝国，这行之有效的各种制度都是现成的范本。再说，这种君主制度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都已根深蒂固，统治这些地方势必要沿其旧习。马其顿本身并未受过希腊民主的洗礼，他们刚从“军事民主制”走出来，如果走“民主”之路反而妨碍军事权力的集中，而采用东方专制主义则可顺利完成帝国的大业。在这里，东方的制度文化占了上风，希腊的民主竟被淹没在时代的狂涛中。

“城市希腊化”又是这一时代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希腊城邦在政治上屈服于马其顿的强权，在经济上却因亚历山大帝国的扩张而走向地中海。随着马其顿军队的步履，大批希腊人来到东方，在许多城市和港口居住下来，掀起了希腊历史上第三次大移民的浪潮，主要方向是西亚和北非。军队所到之地都建立城堡，并打上“亚历山大”的标记，例如在阿富汗高原就有赫拉特城的亚历山大、德兰吉吉的亚历山大城、阿拉霍西亚的亚历山大城和高加索的亚历山大城。不用说，这些数不清的“亚历山大城”都是希腊的军事移民区，因为它们控制了交通要道，后来便发展为工商业城市。由于政治重心的转移，东方的城市也兴盛起来，例如小亚细亚的帕加马、亚历山大帝国首都巴比伦、塞流古王朝首都安提阿和海港塞流西亚、托勒密的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和托勒密迈伊等等。加上希腊半岛、小亚细亚、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城邦，城市在地中海沿岸已是星罗棋布。这些城市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马其顿、希腊人与其他民族杂处，工商业日渐兴

盛，许多城市都享有“自治权”。它们是希腊文化传播的据点，又是吸收东方文化的窗口，同时又是文化交融最显著的地方。亚历山大鼓励马其顿和希腊人娶东方女子，他本人还带头娶了两个波斯公主和一个巴克维娅公主为妾，促使生活方式接近。对编入马其顿军队的西亚战士，让他们接受希腊教育，推动文化交融。

在为数众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中，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堪称“时代的骄子”。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海滨，背靠埃及和北非，面向克里特岛和希腊，东近两河流域、腓尼基和小亚细亚，西望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处于地中海东部的中心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它由军事要塞一跃而为地中海最大的新兴城市，成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是“五方杂处”的地方，城内有埃及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三个聚居区，波斯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罗马人也留居这个城市。城市按希腊模式修建，以两条垂直交叉的大道为中心形成街道网络，城内有花园、广场、体育场和喷水池，建有希腊神庙和埃及神庙。这里是一个大港口，往来船只如织，海上建有照耀航行的大灯塔，并有长堤与城市连通。亚历山大博学园是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它包括图书馆、动物园和研究院几个部分。图书馆藏书达 70 万卷，保存了大量埃及纸草书卷和希腊文献，成为荟萃地中海文化的巨大宝库。研究院以优厚的待遇招揽人才，许多著名科学家都云集这里，如科学家欧几里德、埃拉托斯特尼、希帕卡斯、希腊典籍专家卡利马科斯，阿基米德也来过这里。亚历山大博学园是地中海文明的交流中心，它推动了希腊文化、埃及文化的发展，在自然科学、哲学等方面做出了卓著成绩，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贸易范围的扩大，使地中海经济繁荣起来，特别是地中海东部。海运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进出口贸易十分活跃：输出的有埃及的粮食，亚历山大的玻璃及亚麻布、纸草、象牙等；输入

的有各地的矿产、金属、木材、大理石及来自阿拉伯和印度的药物、香料，还有西亚和希腊的精巧手工产品。塞流古王朝控制了几条重要商路，一条是从小亚细亚沿岸横贯两河流域、伊朗至中亚的大道，一条是从两河流域东走印度的商道，另有一条是沟通中国的“丝绸之路”，安提阿和塞流西亚便成为转口贸易的中心。安提阿的手工艺、腓尼基的纺织品、吕底亚的地毯、帕加马的羊皮纸以及中国的丝绸都在这里集散。帕加马因商业而富庶，它控制西亚通往爱琴海的商路，又控扼博斯普鲁斯海峡，是小亚细亚的一个重要水陆码头。东部的经济一直处于优势，希腊城邦反而冷落，除科林斯因与罗马的贸易呈现繁荣而外，雅典也趋于萧条。随着经济重心东移，文化中心也不再是雅典，显出多极化的特征。希腊文化的中心转移到科林斯，戏剧和诗歌人都在这里延续。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帕加马是一个新起的中心，它们都设有大型的图书馆，而亚历山大里亚是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中心。雕塑艺术中心有三个，即亚历山大里亚、帕加马和靠近小亚细亚的罗德岛。

3. 地中海上“第一次科学浪潮”

如果说在希腊古典时代自然科学还夹揉在“自然哲学”中的话，那么，“希腊化”时代已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虽然希腊哲学家人都是科学家，涉及不少科学领域，如集古希腊哲学大成的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动物、植物、生理、医学方面颇有造诣，毕达哥拉斯还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定理”，但他们的视线主要还是集中在哲学思想上。希腊时代也出现过一些科学家，如几何学家希波革拉底、天文学家墨东、“医学之父”希波革拉底、地理学家优多克索，但在“哲人时代”却受到冷落，并没有突出的成就。自然科学独立发展起来是在“希腊化”时代，在数学、天文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希腊化”时期在科学上最重要的成就是数学，这一突破性的进展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东方是产生数学的一片沃土，最早的几何学产生于埃及，最早的代数学产生于巴比伦，最早的数码产生于印度，而且已发明了十进位法、六十进位法、数学用表，数学最基本的知识在这里都已具备。其次，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就形成了一个以研究数学来探讨哲理的学派，培养了一批数学家，发展了数理的抽象思维，创造了“毕达哥拉斯定理”、“面积贴合法”和“穷竭法”，发现了“无理数”，把数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作为“智慧之都”的亚历山大里亚，以优厚的条件集合了一批数学家在这里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对人类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和发展，因而硕果累累。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乌是这一时代的三大数学家，他们的成就是可光照千秋。欧几里德告诉人们：“学几何无坦途”，他孜孜以求，用毕生精力写成了一部《几何原本》巨著，是两千年来无可争辩的优秀数学教科书。他以严密的演绎逻辑，把建立在一些公理之上的初等几何知识构建成一个严整的数学体系，在公理选择、定理排列、严密证明等方面做出贡献，是世界上最早的公理化数学名著。美国数学家麦克·哈特评论说：“欧几里德的伟大功绩在于按照自己的构思，综合整理前人留下的材料，融合前人的工作并发明了新的证明方法，写成《几何原本》一书。”阿基米德在数学上的重大贡献是研究一些形体复杂的面积和体积计算方法，如球体面积、球体与其外切圆柱面积、体积之比，求抛物线所围面积和弓形面积的方法，还有求“阿基米德螺线”所围面积的方法等。阿波罗尼乌斯是第一个从同一圆锥的截面上来做研究圆锥曲线的数学家，给出了圆锥曲线的定义，说明了求圆锥曲线的直径、有心圆锥曲线的中心、抛物线和有心圆锥曲线的轴的方法，讨论了双曲线的渐近线和共轭双曲线，研究了有心圆锥曲线焦点的性质，为圆锥曲线研究奠定了基础。

占星术无论在埃及、巴比伦或印度都起源很早，而且已有了许多天文知识的积累。在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都希图从天体来了解世界的本原，尽管说法互不相同，但探索毕竟是有益的，如阿拉克西美尼的“天体环绕大地运动说”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宇宙整体模型”构想等。在“希腊化”时代，人们不但继续探索宇宙的成因，研究日食和月食，更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地心说”和“日心说”。欧多克斯首先建立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壳层模型，阿波罗尼乌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轮—均轮模型”，认为天体虽以地球为中心，但各星体都沿着自己的“本轮”做匀速圆周运动，天文学家伊巴谷经过数十年观测编制了一个包括 850 颗恒星的星象表，进一步发展了地球中心说。与此相反，阿拉斯塔克将地球运动的观点和太阳是一团火的说法结合起来，第一次提出太阳中心说，认为包括地球在内的行星都围绕太阳这个恒星旋转。这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亵渎神灵而被控告，然而却得到阿基米德的支持，成为早于哥白尼学说 1800 年的最早“日心说”。“地心说”和“日心说”都是大才的大胆猜想，打开了人们对探索宇宙之秘的思路，在往后的发展中，先是托勒密的“地心宇宙体系”统治了西方天文学 1300 年，然后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取得了胜利。

阿基米德被后人誉为“力学之父”，他既重视观察实验，又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既认真研究物理现象，又注重数学上的证明，力求得到准确的数量关系，这种科学研究方法对于近代物理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他在深入探讨力学问题中，创立了“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他不仅是一个数学家和力学家，而且还是一个著名的工程师，一生中发明了许多机械，在运用技术上进行开拓。在亚历山大里亚期间，他发明了一种螺旋扬水器，尼罗河两岸的人民一直使用这种扬水器进行提灌。在罗马军围攻叙拉古城时，阿基米德设计制造了一种投石机，能将巨

石抛投到很远地方，准确击中敌人。他又创制了一种铁爪式起重机，能把敌船从水中提起，甚至翻倒在大海中。他制造了一面巨大的凹镜，能把太阳光聚焦起来，使敌船起火燃烧。总之，阿基米德是一个科学巨人，他的成就不仅是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实验科学的方法，他重视把科学转化为技术，运用科学原理进行发明创造。

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哲学家们就以好奇的眼光去探求生命的起源，大胆猜想，阿拉克西曼德就天真地认为人是由鱼演变来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研究生物，进而把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部类，这无疑是对生命现象认识逐渐深化的结果。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克芒可能是希腊最早进行人体解剖的人，据说他发现人脑是感觉和思维的器官，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它是大宇宙的缩影。然而，在神灵统治的希腊世界，解剖学是被禁止的，所以进展不大。希波克拉底是希腊最著名的医生，他之所以被称为“医学之父”，是因为他把医学从巫术中分化出来，不相信“神赐疾病”的谬说，提出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黑胆“四液”组成，确立了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即所谓“希波克拉底誓词”，对国际医学界产生深远影响。到了“希腊化”时代，医学有了长足进展，在埃及“木乃伊”的刺激下解剖学建立起来，从而奠定了西方医学的基础。希洛非洛斯是亚历山大里亚著名的医师，他利用囚犯死尸进行解剖，写了《论解剖学》一书，详细地描述了人体的神经、脉管、消化、生殖、骨骼等系统，并区分了人脑和小脑，有些疾病至今仍沿用他的命名。另一个名医是厄拉西斯托拉图，他在解剖学上做了更多工作，认真研究了大脑和小脑的功能、人体中动脉和静脉的分布，成为建立人体生理学的第一人。

“希腊化”时代的这些科学成就，是地中海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它们聚焦于“智慧之都”亚历山大里亚，发挥交通便利和

人才荟萃的优势，广泛吸纳东方与希腊文明，因而在数学、天文、力学、医学等方面有重大突破，这无论如何比希腊古典时代前进了一步，在科学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被誉为“第一次科学浪潮”。

4. “希腊化”时代的雕塑与建筑

文化的传播、碰撞与交融使地中海充满生机，在文化上值得人加称赞的除了自然科学而外，最受人青睐的当推雕塑与建筑。也许是一种时代激情的躁动，也许是风格多样而无拘无束，也许是上一时代的技艺到了“希腊化”时代臻于成熟，在雕塑与建筑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使人惊讶、叹服，成为万世不朽之作。帕加马的“垂死的高卢人”、萨摩色雷斯岛的“带翼的胜利女神”、罗德岛的“拉奥孔群像”以及米诺斯岛上的“断臂维纳斯”，都是这一时代的经典之作，从不同的审美观念给人以无与伦比的艺术感受，对后来欧洲的雕塑艺术产生强烈的震动和影响。在希腊人称道的“世界七大奇迹”中，除了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和希腊奥林匹亚山上的宙斯神庙而外，其余四大奇迹均属“希腊化”时代，它们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小亚细亚爱斐斯（以弗斯）的阿忒密斯神殿和哈利卡拉苏的摩索拉斯国王陵墓。看得出来，希腊文化的生命在延续，东方文化焕发容光，中心不止一个，风格各有不同，而两种文化交汇的小亚细亚更显得光焰灿灿，“垂死的高卢人”、“拉奥孔群像”、太阳神像、阿忒密斯神庙和摩索拉斯国王陵墓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雕塑艺术光彩夺目，题材比希腊更加广泛，风格自由奔放，构思和技巧都显得独特、怪异，自然主义发挥到无拘无束的地步，大胆而夸张。人体雕塑大放异彩，打破古希腊展现人体的节制观念，不再追求从前理想化的古朴模式，而以尽其展现人体的自然本性和曲线美为能事，不但表现男子的阳刚之美，而且袒露

女子的阴柔之美。活动于公元前 4 世纪的吕西波，因得亚历山大赏识而取得这位大帝塑像的专利权，塑像动作奔放，身材修长，举止优雅，而庞英俊，于矫健之中显出粗犷，于俊秀之中显出英武，活化出年轻的军事天才，开启“希腊化”的先声。“垂死的高卢人”又称“受伤的高卢人”，它是公元前 200 年左右的帕加马作品，被打倒在地的高卢人肌体壮实而有力，双腿伸展在地，一手努力支撑垂危的身躯，另一手按住疼痛的大腿，头部向下低垂，面容憔悴而痛苦，是希腊化现实主义的哀婉动人的经典之作。1863 年在萨摩色雷斯发现一尊“胜利女神”像，它立在水池后面的一片天然岩石形成的建筑中，女神体态柔美而胸部挺前，一脚站立而另一脚向后稍稍离地，双臂为展翅欲飞的双翼，巨人而指向蓝天，衣衫飘逸而纹路细致入微，逼真而有神性，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奇妙手法表现出胜利者的喜悦，给人以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凝聚了这一时代的奋进精神。“拉奥孔群像”可能是希腊化晚期的作品，是罗得岛艺术的精华。在群像中，传说中的特洛伊祭司拉奥孔活灵活现，他和两个儿子正在与巨蟒搏斗，拉奥孔已被大蟒咬伤而奋力挣扎，难受的疼痛使他暴跳起来而面部变形，幼子被蛇紧缠而奄奄一息，长子正试图把脚从大蟒的缠绕中抽出而最终难免一死，场面紧张，构图复杂，以惊心动魄的一瞬间表现真挚的情感，成为文艺复兴和西欧艺术家的楷模。帕加马大祭坛有一组长达 400 英尺的浮雕带，由 94 块浮雕组成，场面相当宏大，以典型的希腊雕塑把历史时间注入神话世界中，构图的主题是宙斯用闪电刺穿巨人波尔菲里昂。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场面，宙斯神力敌三个巨人，雅典娜正抓住一个巨人要将他处死，而地母该亚乞求饶恕她生育的巨人，可是胜利女神却飞来准备为战神雅典娜加冕。

希腊化时代最激动人心的雕塑恐怕要推“米诺斯的维纳斯”了，它发现于 1820 年，出土地点是米诺斯岛，据说是在运往法

国的途中将美神的胳膊丢失，很多自命不凡的艺术家都企图将断臂重新恢复，结果都是弄巧成拙，画蛇添足，狗尾续貂，因而又被称为“断臂的维纳斯”。起初人们都以为它是希腊古典时代的作品，但经过反复论证，确认它是公元前 2 世纪的作品，是希腊化时代的艺术杰作。“维纳斯”本是希腊的爱神阿芙洛狄特，她是希腊女性肉体与灵魂完美的象征，后来在罗马传说中被称为“维纳斯”。米诺斯的“维纳斯”是希腊女性裸体像的发扬光大，它渊源于公元前 4 世纪著名雕塑家的普拉克西特的“爱神阿芙洛狄特像”，全身裸露，体态优美，目光温柔，内心充满喜悦。这件作品问世之后，保守的科林斯人拒绝它留在自己的国上上，而热情奔放的尼多斯人则把它迎至爱神的殿堂中，由此变成了“尼多斯的维纳斯”。一时间引起轰动，许多雕塑家都来模仿、复制，遂有“卡皮托利的维纳斯”、“梅迪慧的维纳斯”等，它们都被称为“端庄的维纳斯”。到了公元前 2 世纪，裸体艺术风行起来，而女性裸体艺术大放光彩而使男性裸体艺术黯然失色，于是出现了“米诺斯的维纳斯”。这尊雕像成功之处在于把优美的体态、温柔的神情、圣洁的心灵美有机地结合起来，塑造一个完美、典雅的女性形象。女神上身裸露，下身掩着滑落下挽的衣裙，右腿支撑身体，左腿微曲，臀部丰满，右转的头部与左扣的腰身形成一个柔美的 S 形。表情端庄、典雅，显出青春的活力和安详的神态，给人以不可言传的圣洁、甜美、难忘的印象。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希图把断臂接起，也有不少人试图复制而枉费心机，索性保持它残缺的原状更富于想像，更能在“不完美”中体味那雕塑艺术的神韵。

在爱琴海与地中海交接处有个得罗斯岛，20 世纪中叶在这里发掘了一座神庙，从门廊走去有一道陡峭、弯曲的台阶，由此通往一个迷宫式走廊，它在 30 米的距离内转了 7 个 90° 的直弯，可到达两个地下室，经考证是阿波罗神庙。阿波罗是希腊神祇，

他是掌管光明与青春的太阳神，是诸神中最能体现希腊民族精神的偶像，各种各样的美、年轻、明智、节制统统汇集在他的身上，德国哲学家尼采把“阿波罗精神”看成是希腊文明的一个象征。关于太阳神的崇拜，应当说埃及最早而且最为炽烈，巴比伦还把太阳神看成是“正义与公理”的化身。三者 在罗得斯岛上找到了结合点，信仰上可以相互对话而神像却是希腊式的。据说，公元前 5 世纪，雕塑大师菲迪亚便为阿波罗塑了一尊神像，创造了一个最为完美的男子形象。后来，希拉克西忒在塑造“尼多斯的阿芙洛狄特像”的同时，也为阿波罗造了一尊神像，刻画的是一个清秀的阿波罗在杀死一只蜥蜴。到了公元前 2 世纪，在罗得斯这个新起的艺术中心就创造出一个不朽的“阿波罗”，谓之“望楼的阿波罗”。这尊阿波罗神像，据说是罗得斯人战胜马其顿之后塑造的，所用的金属系用收缴的武器熔铸而成，时间是公元前 292—前 280 年之间。神像比人体的 5 倍还高，他戴着光芒四射的金冠，右手高举火炬，左手的指头上戴着一只象征发布神谕的指环，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的海洋，可惜半世纪之后，这一大奇迹在地震中倒塌了。

与希腊半岛隔海相望的小亚细亚半岛的哈利卡拉苏地方，高筑起一座摩索拉斯城邦国王陵墓。据说，他于公元前 395 年就下令修建，到公元前 353 年他死时还没有修建完毕，最后是由他的王后主持修建竣工的。墓呈长方形，长 39 米、宽 33 米、高 50 米，规模宏大，气势巍峨。陵墓全用白色大理石砌成，上有华丽的雕饰。台基上是一圈廊柱，总共 36 根，墓顶是金字塔形，其上有国王摩索拉斯和王后阿尔泰米兹乘坐的四架马车雕像，像高 4 米，栩栩如生。这座陵墓，建筑上兼有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风格，而雕塑却是希腊式的，两种文化结合得天衣无缝。距离摩索拉斯不远的以弗斯海滨，又有一座十分壮观的阿泰密斯女神庙，据说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神庙长 126 米，宽 65 米，共有

10 级台阶，四周围绕着 127 根高 23 米的巨柱，上面盖着长方形的人理石屋顶。庙前有 3 排石柱，每排 8 根；庙后有两排石柱，每排 9 根，柱的下部均附有一人多高的金属基座。柱上的雕刻精美绝伦，刻画着种种神话故事。

最为壮观而又长期施惠于人的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它耸立在近城的法罗斯岛上，始建于公元前 300 年，经过 20 年才竣工，是托勒密王朝的一大建树。灯塔建在岛上一堵高出地面几百米的悬崖上，有一条约 1 公里的长堤将岛与城市相连。灯塔总高约 120 米，分为三层：底座是正方形的，内有仓库和牲口厩；中间为塔身，呈八角形，上有窗户；上层为塔顶，呈圆柱形加锥顶。有一条坡道和螺旋状环形阶梯通往塔顶，据说中央还安装有水力驱动的升降机。塔尖上安装一面巨大的曲面金属反光镜，据说可把太阳光聚集起来烧掉敌人船支。顶部有一个大火炉，夜晚燃起熊熊烈火，照耀附近数十里海域。它存在 1600 年左右，照亮了地中海的航道。

5. “小苏格拉底学派”

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民主政治的环境也渐消失，然而唯物与唯心的争论并没有停止，哲学家们沿着上一时代的哲学流派依时演变。人们在君主的统治下已经没有那种政治热情，对政治趋于冷淡，逃避现实成了哲学的主流，怀疑主义、折衷主义、神秘主义抬头，哲学变成了“思想的避难所”和“生活的艺术”，犬儒派首开其端。当时最时髦的是“快乐哲学”，犬儒派的创始人安提斯泰尼主张回归自然，不要政府，不要财产，不要宗教，甚至抛弃家庭，回复到古朴自然的逍遥世界，因为他们常在雅典郊外过着浪荡的简陋生活，相戏为一只“快乐的犬”，故称“犬儒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也是“快乐哲学”的追逐者，只不过他们更强调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快乐，在恬静的生活中排

除肉体的痛苦和灵魂的烦恼。这一时期兴起的斯多葛派似乎走得更远，对现实的快乐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而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大同世界”。在这里，希腊哲学的奋进、探索、求真的精神消散了，而消积、厌世、寻乐的情绪滋长起来，成为对专制主义政治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微弱反响。

犬儒派渊源于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刑之后，他的弟子纷纷逃散，形成了所谓“小苏格拉底学派”，犬儒派便是其中之一。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安提斯泰尼，他们鄙弃物质享受，厌恶纷乱的现实，不愿受社会道德的约束，希望在大自然成为自然的人，像动物一样能维持生命就够了。这显然是一种沦落的心态，由于对政治的失望而采取的逃避态度，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苦中作乐”。他的追随者第欧根尼根本不去做什么理论探讨，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安提斯泰尼的主张。据说他披着破衣服在科林斯行乞，夜间睡在一个木桶之中，当亚历山人来寻访他时，他毫无表情，只请求“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他的行为虽为世人所鄙，但居然也找到不少知音，底比斯的大富豪克拉底竟至抛弃了财产与他一起行乞，底比斯的女弟子希伯基娅甘愿和他同甘共苦。他们的行为逐渐扩大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效法他们，并成为逃避社会义务、推卸个人责任的一种美妙的借口，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标志着精神的崩溃和道德的沦丧，希腊哲学走上了末路。

伊壁鸠鲁学派的先驱是昔芬尼派，也是“小苏格拉底”的派别之一。他们虽然不像犬儒派那样走向极端，但安于“水和面包”的清淡生活，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快乐，劝人们不要过多干预政治，也不必去追名逐利，只求在灵魂的安宁中获得快乐和幸福。他对希腊的哲学家多有不敬，给他们取了许多绰号，甚至连他的教师昔芬尼也被他说成是“软体动物”。不过，他在不知不觉中却受到德谟克利特“原子说”的潜移默化，世界由原子和空虚构成，灵魂和人体也不例外，因此人的死亡无非是原子的离

敌，没有必要害怕和恐惧。他认为，我们存在之时，死亡并不存在；而死亡到来之时，我们便不存在了。他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做了补充，认为原子与原子之间不但大小、形状、排列、状态不同，而且重量也有区别，粗浅地“知道了原子量和原子体积”。如果说德谟克利特一味强调原子运动必然性的话，那么，伊壁鸠鲁已意识到在原子降落的必然之中包含着倾斜运动的偶然性。在认识上他主张“流射说”，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导者”，概念依赖于感性的知觉。他认为每个人追求快乐的时候不应破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幸福生活，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主张称为原始、朴素的“社会契约论”。

继犬儒学派而起的是斯多葛派。斯多葛一词源于希腊文的“画廊”，这是因为这一学派常在画廊中演讲，故又称“画廊学派”。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芝诺，他钦佩苏格拉底，曾受教于犬儒派，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创立学派。他们把哲学分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三部分，以伦理学为中心。伦理的核心思想是顺从自然，服从天命，过自然生活，人在现实中是别无选择的，于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虚幻的“大同世界”。他要求人们跳出希腊城邦的小圈子，犯不着为一些实际利益争斗和厮杀，共同进入一个由理性和自然法则建立起来的社会，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互相友爱，这种思想对后来的基督教神学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派的学说中，唯物与唯心混杂，认为人的灵魂是可以写字的纸，外界之物在心上造成的印象就是知觉，回忆起的知觉便形成概念，经过判断、推理便可找到真理。但他们又认为物质是被动的，神才是积极的原动力，所以应当服从“命运”，摆脱现实的欲望与喜怒哀乐，去追求快乐的明天。

不难看出“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已失去了绚烂的光彩，缺乏生气，蔓延着一种消极厌世的情绪，避世而失望，又由失望唤起虚幻的憧憬，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只不过是一线微弱的闪光，这一

切对后来的罗马哲学产生较大影响。

6. 希腊文学的余波

文学到了希腊化时代已失去了“如歌岁月”的激情与风采，希腊文学虽然还在延续，但已渐渐势微，只是一阵余波。像《荷马史诗》那样激动人心的诗篇不再产生了，震撼心灵的希腊悲剧销声匿迹，惟有那“狂欢游行之歌”的喜剧在宫廷中找到它的生存空间，仅存的几部史诗也不出色，田园诗荡起一点微波。总的说来，希腊化时代的文学已没有虎虎的生气，只不过露出一线微弱的余晖，并无惊人之作，但它却是希腊文学与罗马文学之间的一条纤细的联系纽带，有如小桥流水。

希腊化时代的剧场已不是政治活动的中心，而是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人们似乎对那些回肠荡气、发人深思的悲剧不感兴趣，喜欢的却是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的“新喜剧”。这种喜剧离开了社会大舞台，不再反映那些社会、政治的重大主题，内容被缩小到家庭与爱情的小圈子，强调从戏剧中得到欢乐。与此相关，新喜剧要求情节委婉曲折，结局出乎意料，文辞典雅生动，但因内容苍白而流于形式主义。人物倒也新鲜，多是一些市井中的小人物，如暴躁的老人、撒谎的奴仆、微笑的关人以及食客、艺伎等等，他们贴近生活而有生动的讽刺意味。新喜剧一般分为 5 个部分，中间穿插歌舞。著名的新喜剧作家是米南德，据说写过 100 多部喜剧，但留传下来的只有《恨世者》和《评判》的残篇。他的剧本结构紧凑，接近口语，重视人物性格，认为主人公的幸与不幸都取决于他的性格，主题多是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他的风俗喜剧，对后来的罗马喜剧颇有影响。民间的喜剧多是短剧，以歌舞表演为主，描写日常生活，有讽刺意味，风格粗俗。

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几部史诗，比较可读的是阿波罗马俄斯的《阿耳戈号航海记》，讲的是耶宋取金羊毛的故事，有浪漫情调，

颇能描写心理，诗风优美动人，但结构松散，人物刻画较差。值得一提的是田园诗，又称牧歌，主要诗人是忒俄克里托斯，他的诗以描写西西里的农村风貌和自然风光见长，意境优美，格调哀婉，清新可爱，对后世的田园诗有一定影响。

（四）“伟大属于罗马”

在地中海文明的进程表上，罗马比希腊要晚相当长一个时段。在公元前 8—前 6 世纪时，希腊城邦已经繁荣起来，而罗马才刚刚露出地平线。然而，后起的罗马文化一开始就建立在希腊和腓尼基筑起的台阶之上，缩短了历史进程。从公元前 8 世纪开始，希腊人就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城邦，如叙拉古、他林敦、库米等，成为“大希腊”的一部分。腓尼基人的地中海环行也很早到达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从公元前 7 世纪起，他们建立的迦太基殖民地又把势力伸向撒丁岛和西西里，以后扩张到科西嘉等地。在长达 3 个世纪的“希腊化”时期，罗马在地中海文明的哺育下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地控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与弹丸之地的希腊相比，罗马这个泱泱大国的空间范围显然要大得多。除开古老的“王政时代”不算，“共和时代”加上“帝国时代”将近千年，因而文化的持续性也比希腊要长得多。作为后起之秀的罗马，尽管在某些方面远逊于希腊，但在文字、教育、政治、法律、经济、农业、建筑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后来的欧洲却产生了直接而且深远的影响，所以欧洲人赞不绝口地称道“伟大属于罗马”。就整个人类文明来看，由罗马开创的一些制度后来又越出欧洲而蔓延到美洲，一些有价值的文化因素对世界文明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法律、科学与教育。基督教的形成、发展、传播与罗马帝国息息相关，它从地中海走向世界。如果从欧洲“文艺复兴”来看罗马，它的世界意义更是不可

估量。

1. 雄峙地中海数百年的罗马帝国

古罗马的发祥地在南欧的亚平宁半岛，又称意大利半岛。它位于地中海北岸偏西，北面以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其余三面环海，东为亚得里亚海，南为爱奥尼亚海，西为第勒尼安海，海岸线长达 3000 多公里。亚平宁半岛与巴尔干半岛隔海相望，南面有西西里岛、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西面是比利留斯半岛。亚平宁山脉纵贯南北，靠近东海岸的一段地势较高，平原狭小，海岸线平直，没有良港，不利农耕和航行。西部和南部山势较缓，有肥沃的平原，如伊达拉里亚平原、拉丁姆平原、坎佩尼亚平原等，诺河、波河、台伯河有航行之利。西南海岸曲折，有奥斯梯亚、皮托利等良港。平原为富庶之区，盛产大麦、葡萄和橄榄，而且不像希腊半岛因地形破碎而相互隔绝。山地多林木，东北山区为牧场，沿海地区多有盐场和渔场，西西里岛是一人粮仓。大理石产量甚丰，达拉里亚产铜和锡，撒丁岛产铜和银，厄尔巴岛产铁。

古代的居民有意大利人、伊达拉里亚人、拉丁人，还有外来的希腊人和腓尼基人。最先进入半岛的是意大利人，他们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进入半岛，逐渐南移到波河、台伯河流域，占据拉丁姆平原，以农业、畜牧为生。公元前 9 世纪，伊达拉里亚人从海上侵入亚平宁半岛，他们原先是爱琴海岛屿上的居民，生产技术较高，又长于商业和航海，使用希腊字母，所以日渐发达，于公元前 6 世纪占领拉丁姆和坎佩尼亚地区，建立许多城市，征服意大利人，统治一百多年。拉丁人是意大利人的一部分，他们首先起来反抗伊达拉里亚人，于公元前 509 年宣布独立，到公元前 400 年终于将伊达拉里亚人驱逐出境。拉丁的城市起初有 65 个，经过兼并仅存 8 个，公元前 6 世纪罗马强盛起来，其余城市

结成拉丁同盟进行自卫。

罗马位于拉丁姆平原的台伯河南岸，是台伯河流域与海上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城市建在以巴拉丁山为中心的 7 座山岗上，便于防守。住在这里的罗马人具有拉丁血统，但多是混血种族的后裔。罗马城相传是特洛伊英雄埃尼亚的后人罗慕路所建，所以建城的这一年（公元前 753 年）便是马罗人纪元的开始，而城名就是以罗慕路命名。罗马人登上历史舞台时尚处于父系氏族时代，10 个氏族组成一个“库里亚”（胞族），又由 10 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落。公元前 6 世纪时有 3 个部落、30 个库里亚、300 个氏族。这是罗马史上的所谓“王政时代”，国王“勒克斯”是军事首领、最高祭司兼审判长，但不掌握民政权力。“勒克斯”由元老院从贵族中选出，职务不世袭，他有 12 个手执棍棒加斧头的护卫，罗马人叫做“法西斯”，象征“勒克斯”的权力。元老院由氏族显贵组成，代表 30 个氏族，实行终身制，凡重大事件必先交元老院讨论，然后提交库里亚民众大会通过实行。民众大会以库里亚为单位，由勒克斯负责召集，按库里亚分组开会，表决时每个库里亚各占一票。这是“军事民主”制度，凡公民都得服兵役。他们是多神信仰，家庭祀奉门神、灶神、仓库神和家庭保护神，全国共祀的有天朱诺特和他的妻子朱诺女神，此外还有专司智慧和手工艺的女神密涅娃，他们同居在罗马的卡匹托林山顶上。随着希腊人的移入，希腊的阿波罗、狄密特、道尼苏斯等神也为罗马人信奉，密涅娃女神无形中雅典娜合而为一。

公元前 509 年罗马人推翻了伊达利里亚人的统治之后，取消了“勒克斯”，进入了将近 5 个世纪的“共和时代”。这一时期最高权力机构是元老院，一切官吏均由民众大会选出，国家元首是两个有同等权力的执政官。元老院仍由 300 个氏族的显贵组成，对民众大会通过的议案有批准和否决权。民众大会的重大变化是“森都里亚大会”取代了原先的“库里亚大会”。罗马人按居住地

分为 21—35 个行政区，然后按财产多寡分为 5 个等级，每个等级在民众大会中有一定数目的投票单位，称为“森都里亚”。森都里亚由百名战士组成，实际上是一个军事组织，所以又称“百人队民大会”。富有的第一等级有 80 个森都里亚，第二、三、四等级各有 20 个森都里亚，第五等级有 30 个森都里亚。这种划分，破坏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库里亚”，代之而起的是以地域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新制度，公共权力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森都里亚大会的职权是：选举高级官员（包括执政官），决定对外宣战，通过法律，表决执政官提交的议案，复审死刑案件，但决议须经元老院批准后施行。执政官任期一年，辞职后不得重选连任，平时共理政务，战时领兵出征，军事紧急时可由元老院提名一人为“狄克推多”（独裁者）统一指挥军队，为期半年。5 世纪中叶起又增加许多新的官职，如四名财政官、两名市政官、两名监察官以及司法官等。“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演变”，为后来的帝国开辟了道路。

随着形势的发展，平民为了达到经济上、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掀起了反抗贵族的激烈斗争，他们往往采取拒绝参战的手段迫使贵族让步，取得了如下胜利：一、选出自己的保民官，由 4 人增至 10 人，他们的人身不可侵犯，有权保护平民生命财产，否决执政官和元老院的决议案，否决法官对平民死刑的判决；二、每年由 10 人组成法律委员会，将起草的成文法刻在 12 块铜牌上，称为“十二铜表法”；三、按行政域组织非军事组织的“特里布斯会议”，享有立法权，以后，“森都里亚大会”演变为选举机构，“特里布斯大会”成了专门的立法机关；四、取消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法律条文，禁止将罗马人变为债务奴隶，允许平民当选财政官、执政官和狄克推多，还可参加元老院。然而，债务、土地、粮食三大问题并未有效解决，阶级关系日趋复杂化了。

罗马的势力向拉丁姆扩张，与拉丁联盟发生多年战争，于公元前 493 年将拉丁各部征服，共同向台伯河北岸扩展。然而在公元前 5 世纪末北方的高卢人大举南侵，于公元前 390 年攻入罗马，直到公元前 334 年双方订立和约才相安无事。公元前 340—前 338 年拉丁联盟又与罗马发生战争，最后以罗马的胜利结束。罗马向意大利半岛中部推进，打败了坎佩尼亚平原的萨谟奈人及北部的高卢人和伊达里亚人。公元前 281 年开始进攻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城邦，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先后将它们吞并，于公元前 265 年完成意大利半岛的统一。

当时的地中海上除罗马外主要有四个国家，即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形成的埃及托勒密王朝、西亚塞留古王朝、希腊马其顿王朝及腓尼基人建立的迦太基。迦太基最为强劲，地中海西部都是它的贸易范围，并在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科西嘉岛、撒丁岛、西西里岛建立殖民地，直接威胁罗马。公元前 264 年，以争夺西西里岛的麦西那城为导火线爆发了战争，因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称为“布匿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在公元前 264—前 241 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将西西里改为行省，继后又将科西嘉和撒丁两岛并为一省，获取巨额赔款，地中海西部的海上霸权为罗马取而代之。双方的斗争并未了结，先是迦太基远征西班牙与罗马发生冲突，又于公元前 218 年爆发第二次布匿战争。起初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五万精锐步兵和 9000 骑兵翻越阿尔卑斯山入意大利半岛，使罗马军一败涂地，直逼罗马城下，但在罗马与西班牙军的配合下，汉尼拔处于不利地位，于公元前 201 年不得不接受罗马的条件媾和。根据条约，迦太基割让海外一切领土，赔偿战费一万银他连特，交出所有战船，非得罗马许可不得进行战争。罗马战胜迦太基后开始进行对马其顿的战争，从公元前 215 年到前 146 年，相继进行了四次战争，终于将希腊半岛征服，改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由罗马总督进行统治。然而迦

太基海外贸易又渐趋繁荣，使罗马大为不安，决心“一定要消灭迦太基”。公元前 149 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又起，于公元前 146 年将迦太基灭亡，改为非洲行省。罗马继续扩张，公元前 129 年吞并塞琉古改为亚洲行省，公元前 30 年将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灭亡，形成了一个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庞大帝国。

一系列对外扩张的战争，使得罗马的各种社会矛盾尖锐起来，解决土地和政治权利问题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对外侵略激起了被压迫者不停的反抗，在公元前 2 世纪到前 1 世纪之间，爆发了两次西西里起义、西班牙人民起义、斯巴达克起义等。为了适应这种复杂局面，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强化统治、走向独裁成为历史的必然。马略军事改革和苏拉独裁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而“前三雄”与“后三雄”终于导致了共和制的破灭。马略创立募兵制，军队开始变为个人统领的武装。苏拉独裁，表明武力高于一切。公元前 59—前 54 年，在征战中拥有实力的武人庞培、恺撒与巨富克拉苏联手把持罗马政治，占据执政官、总督等要职。后来克拉苏和庞培先后死去，恺撒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狄克推多兼执政官和保民官，实行独裁，史称“前三雄政治”。公元前 43 年，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结成第二次三巨头联盟，在权势的争夺中屋大维终于成了罗马的最高支配者，史称“后三雄政治”。罗马通过武力进行扩张，实行强权统治，势必要把权力集中起来，依靠铁腕人物独霸地中海，“前三雄”和“后三雄”于是应运而生。个人权力的急剧膨胀，迅速打破政治舞台的平衡，元老院失控，民众大会有名无实，军事独裁终于埋葬了“共和制”，罗马帝国在军人的耀武扬威中诞生。

独裁者的最高典范就是东方的皇帝，至高无上、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东方模式移入罗马，和亚历山大帝国一样，都以波斯帝国为蓝本。然而，罗马的“共和制”毕竟延续了 5 个世纪，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原有的轨道运行，于是出现了屋大维开创

的“普麟栖柏”制，即所谓“国家第一公民统治”，或称“元首政治”。屋大维战胜一切政敌之后，集狄克推多、终身执政官和保民官于一身，被元老院尊为“奥古斯都”和“国父”，有权召集民众大会和否定元老院决议，在“共和”的幌子下实行军事独裁。他坚信军队是罗马政权的柱石，建立职业化常备军，组成 30 万人的“罗马军团”和驻防罗马城的 9 千人近卫军，军团分驻各行省。元老院是一个可供利用的无形资产，他自居元老院第一人，然后更新换代，三次调整，把在征战中获利最多的巨富和骑士充实进来，改变元老院的成分，作为执政的基础。元老院总管全国政务和赋税，腹心地区的总督自然由奥古斯都兼任，边远各行省的总督均由有权势的元老担任。民众大会尽管还有选举权和立法权，但一切决议必须体现奥古斯都的意志，名义上自然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宗教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控制手段，因此广建庙宇、塑造神像，而把奥古斯都塑造为神，名正言顺地统治地中海。在他统治期间，罗马帝国强盛一时，疆界南至埃及、迦太基，北至莱茵河、易北河流域，东起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西迄比利留斯半岛的西班牙，其统治范围远胜于波斯帝国。从奥古斯都开始，历经朱理—克劳狄王朝（公元前 27 年—公元 68 年）、弗拉维王朝（公元 69—96 年）、安敦尼王朝（公元 96—192 年），前后近两百年时间，比亚历山大帝国统治的时间要长得多。

由于军事的征服把地中海各国统一在罗马帝国之内，而且在两个世纪之中基本处于稳定状态，保持着和平的环境，因而促进了帝国的繁荣。更重要的是，从罗马统一意大利开始，就以罗马城为中心修筑道路。先是由阿庇乌斯主持修建从罗马南行至卡普亚的大道，长约 212 公里，称为“阿庇乌斯路”。继后又修了一条由罗马北上至阿里米昂的“弗拉米乌斯路”。以后又建到西北热拉亚的大道、横贯亚平宁半岛的瓦莱里亚大道、拉丁大道，进而修筑到西班牙、北非、小亚细亚、阿拉伯等地的道路，将 13

个行省联系起来。这些道路都以罗马为中心，以 29 条主干道为骨架，共有 320 条联络线，总长度为 7.8 万公里，故有“条条大道通罗马”之说。这是罗马帝国的一大壮举，它所形成的陆路交通网络与地中海环行航道相配合，对于商业贸易的扩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使罗马兴盛起来，而且推动了地中海东部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在“地中海世界”里，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希腊、罗马文化也扩散到整个地中海区域，上升为主流文化。

到了公元 3 世纪，罗马奴隶制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庞大的生产已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过着悠闲生活的罗马自由人完全靠奴隶供养，农业衰败，大庄园没落，工商业一蹶不振，城市凋敝，昔日的繁荣已变得黯淡无光。在塞维鲁王朝统治的 50 年中，罗马帝国由盛而衰，江河日下。专制的顶点就是衰败的起点，塞维鲁当政以后，实行武人专政，公开宣称私人军队是政权的支持者，给军人优厚待遇，退役后担任高级行政长官，实行军事殖民，致使军费开支日益扩大。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剥夺元老的权利，元老院的一切立法都必须秉承皇帝意志，最后的一点“民主”余光都被抹杀了。在此之后，政变迭起，暴露出东方专制主义不可治愈的致命伤。各省军团纷纷自立，互相厮杀，烽火遍地。内忧外患接踵而起，“蛮族”不断入侵，住在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人乘虚而入，法兰克人深入西班牙，乌克兰一带的哥特人骚扰小亚细亚和希腊，汪达尔人蹂躏潘诺尼亚，高声宣布脱离罗马帝国，瘟疫蔓延各地，天灾人祸把帝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50 年内战的最后胜利者是近卫军将领戴克里先，他于公元 284 年即位后自称“多米努斯”（专制君主）。屋大维开创的“普麟栖柏”制此时已经不复存在，代之以“米多拉特”，把罗马传统完全淹没在东方专制的浪涛之中，见皇帝必须跪拜。公元 305 年，戴克里先因病退位，群雄并起，混战后由君士坦丁和李西尼

共同统治罗马帝国。不久内讧，君士坦丁成了惟一的独裁者。这一时期，经济重心移向地中海东岸，罗马只不过是一个行省，于公元 330 年在东西交通要冲的拜占庭建立新都，称为君士坦丁堡。此时的帝国已成为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蛮族基础上的巨大躯壳，而在重压下的人民已把蛮族奉为救星。君士坦丁死后，诸子争位，最后是他的外甥朱理安当了皇帝。在此之后，政权掌握在军事统帅瓦伦第安、瓦伦斯兄弟手中，瓦伦第安统治西部，瓦伦斯统治东部，产生了帝国的第一道裂痕。公元 375 年瓦伦第安之子格拉第安为西罗马皇帝，不久以司令官狄奥多西为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于公元 392 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借以支撑摇摇欲坠的政权，终于把罗马帝国暂时统一。但裂痕继续扩大，公元 395 年狄奥多西死后，帝国正式分裂，西罗马帝国以罗马城为首都，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正当罗马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候，原住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在多瑙河流域出现，这支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游牧民族引起了日耳曼蛮族的大迁徙。匈奴首先征服东哥特人，被驱赶的西哥特人在南下途中与西罗马军队发生遭遇战，亚得里亚一战对帝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西哥特人长驱直入巴尔干半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把罗马军压缩到东方的城市。日耳曼蛮族纷纷蚕食罗马，敲响了西罗马帝国的丧钟。汪达尔人从高卢进入西班牙和北非，建立了汪达尔王国。进入罗马的法兰克人占据高卢，建立法兰克王国。伦巴德人在波河流域建立城市国家，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不列颠群岛。公元 476 年，日耳曼雇佣军推翻了两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依然存在，统治地中海东部近千年，这便是强盛一时的拜占庭帝国，中国史书上称为“大秦”。

2. “商品世界法律之母”罗马法

罗马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是“罗马法”，它不但是古代

世界各国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的法律，而且由于它对“法制”的重视以及罗马法确立的基本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对近现代“法制社会”起着巨大推动作用。在欧洲中世纪，罗马法成为市民阶级反封建的犀利武器，成为世俗反对宗教信条和宗教法庭的理论支撑。当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都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号召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急需有“公法”、“私法”、“商法”来处理“商品世界”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保护私有财产，而“罗马法”就是“现成”的法律，它所提供的法律条款、立法司法程序、审判和刑罚的基本法规，以及法学的理论依据大体都可适用，因而成为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楷模，成为欧洲各国立法的范本，所以，恩格斯把它称为“商品世界法律之母”。1804年，法国以“罗马法”为蓝本制定了“拿破仑法典”。后来欧洲各国都普遍采用了“罗马法”的原则，美洲各国制定法律时也以“罗马法”为圭臬，这些法律理论后来又传到日本和中国。由此看来，“罗马法”在时间上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罗马社会，在空间上越出了罗马、地中海、欧洲而扩大到全世界，它的真正意义就在于超越时空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罗马法”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时期，前后约一千年。它的发展轨迹大体是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由罗马“公民法”到地中海的“万民法”，在帝国前期达于兴盛，它的完善则是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如果说希腊人特别崇尚“自由”的话，那么，罗马人崇尚的则是“法制”，尽管罗马帝国采取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某些集权手段和统治方式，但它始终沿着“以法治国”的轨道运行，不断修改和充实法律条款，不断发展法学理论，把“法”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

在“王政时代”，与氏族社会相适应，罗马的法律大抵属于“习惯法”的范畴。所谓“习惯法”，是指一种自发形成、“约定

俗成”的行为规范准则，往往把道德、法规、习俗混杂在一起。这种“习惯法”建立在“原始民主”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氏族、部落成员的意志和要求。它具有朴素的特点，判案或惩处的办法都很简单，往往是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法”，财产继承权属于氏族，婚姻遵从古老的惯例。这是一种不成文法，解释权属于祭司和头人，随意性很大。然而，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这种“约定俗成”、靠习惯势力维持社会秩序的法规已经不再适应，于是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产生了有文字依据的《十二铜表法》。

《十二铜表法》是罗马历史上的第一个成文法，它形成于公元前 450—前 449 年，因为将法律条款镌刻在十二块铜板上而得名。《十二铜表法》在公元前 390 年因高卢人突然入侵罗马被毁，原文已不复见，但从古代著述中可知其梗概。它的第一表是“传唤”，第二表是“审判”，第三表是“求偿”，第四表是“家父权”，第五表是“继承及监护”，第六表是“所有权及占有”，第七表是“房屋及上地”，第八表是“私犯”，第九表是“公法”，第十表是“宗教法”，第十一表是“前 5 表补充”，第十二表是“后 5 表补充”。它的进步性表现在“有法可依”，开创了“公法”与“私法”、“刑法”与“民法”、“实体法”与“程序法”，把社会导入“法制”的轨道。这里虽然还保留着若干“习惯法”的胎记，但也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突破了“习惯”的框框，“约定”多于“俗成”，具有“立法”的性质，并由不成文法转变为成文法。它一方面以严刑峻法来保护私有财产，维护债务奴隶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意，打破了不准平民与贵族通婚的禁令，设立了享有执政官同等权力的“保民官”，又组成了十人法律委员会和专事立法的“特里布斯大会”。这意味着法制意识的增强，平民有了参与立法权利，并可通过立法手段来争取和保护自身的权益，从而推动法制的发展。

然而，“十二铜表法”只适用于罗马公民，对罗马“共和国”以外的人不适用，住在罗马的异邦人也不享受公民权，因此，它只是一种小国寡民的“公民法”，目的在于调节罗马内部“公民”之间的关系。随着领土的扩大和罗马帝国的建立，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到公元 3 世纪初，罗马法由“公民法”向“万民法”转变。首先，法律越出了“罗马公民”的范围，必须解决罗马公民与异邦人之间的关系，既要调整罗马公民内部的社会矛盾，同时又要能调整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内部的矛盾，一言以蔽之，要把地中海区域的法律统一起来，成为包容性更为广泛的法律，无形中带有“国际公法”的若干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从而使地方上的社会秩序都被宣布为无效，因为它们和罗马法制不相符合。”其次，由于交通与商业的发展，商品、货币、债权债务关系日益突显得复杂起来，古老的法律已经无法包容，必须制定若干适应商品社会的条款，以利于“公平交易”，因而罗马法就必然具有“商法”的重要特征。其三，由于这种“万民法”起源于古老的习惯法，又必须考虑到原先各国的历史渊源关系，法官在执行过程中不免根据实际情况而有变通，因此，“案例”成了司法的重要依据。其四，罗马帝国的专制色彩势必强烈影响法律，皇帝的敕令、行政长官的告示都直接影响罗马法，元老院的决议也左右着法律的制定与施行，保护私有制和专制政治成了罗马法的核心。其五，罗马法离习惯法越远，祭司对法的控制力越弱，而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权越大，于是法学应运而生，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在不断争鸣中推动罗马的法学研

究，也不断改进罗马的法律。

在“共和制”向“帝国”转变期间，在诸多的学派之中，以普罗古路斯派和萨努斯派争论最为激烈。前者从维护“共和制”出发，对《十二铜表法》多加注解，尽管有较大的保守倾向，但发挥了“民权”的观点。后者极力鼓吹元首制，把法律导入专制政体，但却推动“公民法”向“万民法”转变。两派自立门户，互相争辩，虽然政见不同，但对法学理论的探讨却逐渐引向深入。双方愈辩愈明，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揭示了法学的原理、原则，使之更加丰富和全面，于是殊途同归，在争辩声中把法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经过“综合”而走向“辩证的统一”。如果说罗马法还带有许多时代局限特征的话，那么，罗马的法学在理论上则往往突破这种樊篱，具有更多的超时空性。罗马法的巨大发展是在帝国前期，即从奥古斯都到安敦尼王朝前后两百年间。这是“万民法”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也是罗马法学最昌盛的时期，涌现出大批法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有益乌斯、伯比尼安、保罗斯、乌尔比安、莫迪斯蒂努斯，被誉为“法学五杰”。据统计，公元 533 年完成的《法学汇编》，绝大部分是摘自这五人的著述，其中，盖乌斯 535 段，伯比尼安 601 段，乌尔比安 2462 段，保罗斯 2081 段，莫迪斯蒂努斯 345 段，另有犹太阿努斯的 457 段和庞波尼乌斯的 578 段。盖乌斯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法学阶梯》，它系统地总结了罗马法学的成就，首创私法体系中的人法、物法、诉讼法三篇分述的结构，为后世树立了典范。这部著作长期被当作法教材，“是一本迄今所知最早的并且完整保存的西方法学著作”。公元 426 年颁布的《引证法》，规定只有盖乌斯、伯比尼安、保罗斯、乌尔比安和莫迪斯蒂努斯五人的解释和著作才具有法律的效力，遇有疑难问题均以他们的解释为准；若他们的说法不一，可用表决方式取决于多数，若表决数相等，最后以伯比尼安的解释为准。

到了帝国后期，一方面是皇帝独裁的“米多拉特”（专制）取代了“普麟栖柏”制，体现皇帝意志的敕令在法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法学家们可探讨的问题受到很大束缚；另一方面则是因五大法学家的理论成了权威，使法学日益走向僵化、凝固，因而罗马法学在此期间没有多大发展，法典化和法学理论汇编成为主流。这种倾向在帝国中期已经露头，从戴克里先起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日益发展，先后编纂了三部法典，即公元 294 年的《格雷戈里安努斯法典》，公元 324 年的《海摩格尼安努斯法典》和公元 438 年的《狄奥多西法典》。《狄奥多西法典》最为完备，它包括在此以前的种种法律，分为 16 篇，篇下依法律颁布的年代分日编订，前 5 篇为私法，其后分别为公法、刑法、市政法、军事法、教会法等。

这项工作继续到东罗马帝国时期，尤以查士丁尼时代最为突出，公元 529 年，查士丁尼任命法学家特里波尼阿努斯组成 10 人编纂委员会，负责编纂法典，删除历代法律中相互矛盾和已经过时的部分，按时序分编成册，于次年正式颁布，是为《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此后，又将查士丁尼死后的法律辑为后编，称为《新敕令》。公元 530 年，查士丁尼又组成了一个 16 人的委员会，负责编纂历代法学著作，博采 39 位法学家的著作 2000 余卷，历时 3 年编成《法学汇编》一书，共 50 卷，于公元 533 年颁布施行。与此同时，又令特里波尼阿努斯等编一部法学教科书，讲述法律基本知识和要点，谓之《法学阶梯》。以上四部法典和汇编，后人把它们统称之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反映整个罗马时期的法律全貌，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法典。《民法大全》确立了“私有制”的法律概念，明确划分公法与私法：“公法是有关系罗马帝国政府的法律，私法是有关系个人利益的法律。”私法分为人、物、人权、物权及民事诉讼五部分，体现了私有制和商品交换的法律关系，故恩格斯称它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

世界性法律”。

3. 对世界文字产生重大影响的拉丁字母

罗马对于世界文化做出的贡献，除了法律而外，拉丁字母影响特别巨大，如果说希腊字母是欧洲各国字母的母亲的话，那么，拉丁字母则是走遍世界的国际通用字母。罗马是拉丁字母的故乡，所以拉丁字母又称为罗马字母。以这种字母形成的拉丁文，不但在罗马帝国时期成为地中海区域的官方文字，而且在西罗马灭亡之后，通过基督教的拉丁文《圣经》传到欧洲各国，形成拉丁语族诸种文字，进而使日耳曼文字拉丁化，并与斯拉夫语族、凯尔特语族争夺地盘。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线的开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殖民地的扩大，拉丁文占领了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在非洲处于优势，在亚洲也日益扩大传播范围。不使用拉丁文的国家，如中国和日本，也把它作为国际交往的语言文字。拉丁文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特别是生物学、医药学。在信息化时代，拉丁字母又是网络通信的信息符号，成为国际化的基础。

腓尼基字母传到欧洲，希腊字母作了创造性的改进，然后以意大利埃特鲁斯坎字母为中介，最后形成了拉丁字母。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城邦最先使用希腊字母，大约在公元前 8 世纪才产生意大利本土的埃特鲁斯坎字母。最早的实物证据是一块“马西利亚那”象牙板，上面刻着 26 个早期的埃鲁斯特坎字母，其中有 22 个闪米特字母和 4 个希腊增补的字母。在一枚公元前 7 世纪的斗篷别针上，从左至右写着“MANIOSMEDFHEFHAKEDNUM ASIOL”，意思是“马尼乌斯与努美里乌斯制作了我”，它是“王政时代”的作品。到了公元前 4 世纪，埃特鲁斯坎字母减为 20 个，包括 4 个元音和 16 个辅音，书写款式先是由右向左，才改为自左向右。这种字母在拉丁姆地区通行以后，发展为拉丁字

母。罗马人在 26 个埃特鲁斯埃字母中，只取了其中的 21 个，即 A、B、C (K)、D、E、F、I (zeta)、H、I、K、L、M、N、O、P、Q、P (R)、S、T、V、X (X 被称为“最后字母”)。但这种文字在最初的 6 个世纪中并未越出意大利半岛，直到公元前 1 世纪才向地中海沿岸扩散。罗马征服希腊后，从希腊借来的外来词逐渐增多，于是在字母表上增加了 Y 和 Z 两个字母，由 21 个增加为 23 个。到了中世纪，从 I 分化出 J，从 V 分化出 U 和 W，这便形成了流传至今的 26 个拉丁字母。

希腊字母在“古典时代”形成醒目优美的几何图形，在此基础上，罗马人又将字母形体加以简化和美化，到 4 世纪时达到完美的程度。它尽量采用简单的图形，避免可能混淆或不便书写的字体，将断线改为直线或曲线，弯曲不超过两次，笔划不超过三笔，使之对称、整齐、匀称、实用、美观，并符合语言科学的规律，因而能走遍天下。拉丁字母有大写和小写的区别，大写用于句首以便分清段落，用于专有名词开头可与普通名词分开，两种字体并用则可丰富文字的表达功能。印刷体是从简明的铭刻体演变而来，利用字体上伸和下延笔划夹在“短字”中间，长短相间，参差错落，便于阅读，给人美感。手写体原先是用针刻在蜡板上，后来改用羽毛笔写在纸草或羊皮纸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欧洲后才产生手写的草书体。在此以后，印刷上应用最广的是“罗马体”(正体)，其次是“意大利体”(斜体)。拉丁字母的名称分为五类：一、元音字母以音值为名，有 A、E、I、O、U 五个字母；二、由辅音音值后加元音构成，有 B、C、D、G、H、K (ka)、P、Q (ku)、T、V 十个字母；三、由辅音音值前加元音构成，有 F、L、M、N、R、S 六个字母；四、X 是由复辅音 KS 前加元音构成；五、Y 和 Z 的名称借自希腊字母。

拉丁字母以其科学、优美、实用而被广泛使用，它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希腊字母。这种文字从拉丁姆平原开始，扩散到整

个意大利半岛，进而通行于地中海和欧洲，后来由于西欧国家的海外殖民和基督教传播，成为南北美洲及大洋洲的通用文字，在中非、东非和南非广泛使用，亚洲也有部分地区使用拉丁文，构成了一个分布最广的“拉丁字母流通圈”。从世界文化的大格局来看拉丁字母，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罗马文化的载体，而且在于广泛影响欧、美及亚、非许多地区和国家，在信息化时代更具有国际通用字母的作用，这一巨大功绩应当归功于罗马。但从字母文字的源流上看，它的先祖在东方，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构成了一条文字自东而西传播的路线，客观地反映出地中海文明的发展历程。

4. 关注心灵的教育

讲罗马文化必须着眼于教育，倘若罗马教育不兴，拉丁文就不可能广为传播，没有文化素质的人也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明。更重要的是，罗马的教育模式，在“文艺复兴”以后一直为欧洲各国效法，开启了近代教育的先河。罗马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昆体良培养和塑造优秀人才的思想，对欧洲教育产生重大影响，成为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一块基石。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类素质的提高，关系着文化、科学的发展，关系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因此，回过头来看世界的文明进程，教育占有显著地位，而罗马的教育是一个重要里程碑。

大约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叶以前，罗马的教育仍以家庭教育为主，拉丁文 *Educatio* 一词就是指父母为老师的家庭教育，主要是通过长辈的身教言传来传授知识、技能和道德、礼仪，有了文字之后才加入了一些法律、诗歌、历史之类的文化课程。学校教育始于 2 世纪中叶，它的最大功绩就是创立小学、中学、专业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体系，确立讲求实用和培养公民素质的教育方针，形成了罗马教育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的形成，直接受希腊教育

的影响，希腊化时代的教育和希伯来的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文化背景。

早在公元前 5 世纪，以雅典为中心的“智者学派”就颇重视教育，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以教书为业，收取学费。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终生从事教育，培养了不少有学问的精英。他的学生柏拉图于公元前 387 年在雅典郊外开创“阿卡德米学园”，这是欧洲的第一所综合性学校。亚里士多德是这个学园的学生，他在公元前 335 年创办雅典的“吕克昂学园”，并设有图书馆。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成了文化教育中心，设有研究院、图书馆和博物馆，对整个地中海产生巨大辐射，伊壁鸠鲁还在雅典开办学校。大约在公元前 3 世纪，在希伯来中已经有了犹太教的学校，提倡义务教育。罗马征服希腊后，大批希腊文人学者和教师涌进罗马城，掀起办学之风，学校教育才兴盛起来。

最初开办的是小学，拉丁语称为 *Ludus*，意为初级学校。小学招收 6—12 岁的儿童，主要是传授拉丁文，注重读书写字，为了学习技能开设算术课，重视道德教育，但只把音乐、体育看成课外娱乐。学校规模不大，一般多是私立，教师多是从希腊俘来的奴隶，社会地位低贱。也许是罗马人起初还没有学习的习惯，也许是教师习惯于奴隶生活，小学实行体罚教育，对儿童责骂、鞭打，但经过一段强制，公民普遍入学，无论男女都可受到教育，文化水准得到提高，成为罗马教育的起点。

12—16 岁进入中学，学生多半是富家子弟。最初的中学实际上是外国语学校，以希腊人授课，传授希腊文化。从公元前 1 世纪起，增设拉丁文和拉丁文学课程，并出现专门的拉丁文法学校。中学的任务是学习语法和文学，主要教材是《希腊语法》和《拉丁语法》，通过讲解和朗读提高青年的文学欣赏能力，拓展视野。在讲解时，往往加入历史、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仿效亚历山大里亚的方法展开讨论。中学之外又有专业学校，按

照雅典的模式培养雄辩家，重点是讲修辞学，所以称为修辞学校。这类学校与政治贴得较近，渐渐由私立转为公立。为了使学生长于论辩，特别注重思维训练、逻辑和修辞，广泛涉及政治、军事、法律、哲学、伦理、文学、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物理、音乐等学科领域，并开展演讲和辩论活动。中学和专门学校，对提高罗马文化有重要意义，罗马文学、史学和修辞学的发展与此有关，自然科学知识也得以传播。

罗马原先并没有大学，深造必须到希腊去，所以“共和时代”的名人都是希腊留学生，如布鲁图斯、恺撒等等。公元 125 年，哈德良皇帝仿亚历山大里亚创办“罗马学府”，成为罗马最早的公立大学。到了 2 世纪中叶，各行省和自治城市纷纷建立大学，君士坦丁堡的大学与“罗马学府”光辉交映。大学的入学年龄为 18—25 岁，各科设有教授，主要是攻读法学、医学、建筑学、文法及修辞学，在这些方面出了不少人才。据说，重要城市必须配备 10 个医生、5 个文法家和 5 个修辞学家。在希腊文化的哺育下，罗马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不难看出，罗马的教育制度主要参照希腊和亚历山大里亚，但它有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由小学到中学、专科、大学的几个阶梯，这种学制直接影响近代教育。

罗马注重教育，因而教育家层出不穷。最早的教育家是老迦图，著有《儿童教育论》，主张注重罗马传统教育。他之后的教育家是瓦罗，他的《教育九书》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百科全书，显然是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公元前 1 世纪以后，社会崇尚演讲，因此教育家西塞罗主张培养政论家，用严格方法训练学生博闻强记、思维敏锐、口齿伶俐、举止端庄、德道高尚，强调实用价值。集罗马教育大成者是昆体良，他本人就是雄辩家和修辞学教授，著有《演说家的教育》一书。他有一套较完整的教育理论，宣称要培养具有道德、多方面受到良好教育的政治家，“经过他的咨询可以治理国家，经过他的立法可以奠定国家的基础，

经过他的判决可以洗涤社会罪恶”。他认为教育的功能在于培养人才，人生来就有智慧和理解力，关键是全面系统的教育。教育要从儿童开始，注意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使语言和行为保持纯洁性，发挥他们记忆力强的特点。他高度评价学校教育，把它看成是可以接受多种知识，相互竞争，彼此观摩，融入社会生活的社会团体。教师的主导作用至为关键，提倡因材施教，解决“教什么，何时教，如何教”的问题。竞争是教学的良方，奖励优秀者，鼓励后进者，让他们有“成就感”。他强调创造力，使学生“以创造为快乐”。教师对学生要和蔼可亲、严而不厉，认为体罚是一种“下流卑鄙的行径”。要培养合格的政治家、演说家，必须经过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大学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实际运用能力。他的这些观点，核心是以人为本，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特别受到推崇，人本主义者伊拉斯莫说：这种教育思想“已是完美无缺”，学校教育只要遵行即可，“不必另提教育理论”。

5. 罗马文学与修辞学

在布匿战争以前，罗马似乎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文学作品。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希腊人安得尼加斯用拉丁文译成《奥德赛》史诗和一些希腊戏剧，从此才兴起文学创作。戏剧是希腊时代的余脉，但罗马缺乏雅典式的民主，已失去戏剧发展的广泛群众基础，作为直接面对现实重大题材的悲剧枯萎下来，而迎合市民趣味和宫廷生活的喜剧得以发展。诗歌成就较高，“共和国”后期至帝国初期达于鼎盛，进入了“黄金时代”，而在帝国后期渐渐暗淡下来，转向所谓“白银时代”。前期人们热衷于抒情诗、田园诗和爱情诗，史诗摹仿《荷马史诗》的痕迹很重，后期诗歌呈现一种空洞、颓靡之风，只有讽刺诗较有价值。拉丁散文兴起较晚，这与崇尚演说和著史之风有关。在演讲术的刺激下，修辞学兴盛起来，对文学起推动作用。

从公元前 240 年起，罗马开始在赛会上演出戏剧，著名作家有普劳图斯和泰伦斯，他们都生活在“共和制”末期至帝国初期。普劳图斯留下 20 多部剧本，主要有《孪生兄弟》、《凶宅》、《吹牛的军人》、《一坛金子》等。《孪生兄弟》直接影响莎士比亚创作《错误的喜剧》、《一坛金子》，启发莫里哀创作《悭吝人》。普劳图斯的喜剧，继承了希腊化时代喜剧作家米南德、菲尔曼的风格和手法，有些剧目也从希腊移植而来，但语言和诗韵都是罗马式的，格律丰富多变，是一种拉丁语诗剧。作者善于塑造形形色色可憎、可恶、可笑的人物，运用旁白、独白等手法揭示人物心理活动，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还善于创造喜剧情节，故意制造一连串的误会、巧合以增加喜剧效果，语言诙谐俏皮，动作滑稽，往往引起哄堂大笑。泰伦斯写过 6 部喜剧，大都是改编或翻译米南德的作品，代表作有《婆母》和《两兄弟》。他的喜剧注意刻画人物心理，每幕戏都有“前言”，结构严谨，语言优雅，但不如普劳图斯那样受下层民众的欢迎。进入帝国时期以后，虽有奥维德、塞内加等作家，但由于政治自由减少，戏剧离开民众而走进宫廷，迎合少数贵族的趣味，以消遣娱乐为主，渐渐口薄西山。

在罗马戏剧发展的同时，拉丁韵文也渐渐兴起，作者多是出身下层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以写抒情诗为主，称为所谓“现代派”。奥古斯都时代，诗歌创作出现高潮，著名的诗人有维吉尔、贺拉新和奥维德。维吉尔是个田园诗人，他的代表作是《牧歌》和《农事诗》。《牧歌》采用牧人的对话对歌形式，把短歌体新诗带入罗马文学，诗中洋溢着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追求，也有哲理和哀怨。《农事诗》是一个长篇巨著，形式上模仿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描写种植粮食、橄榄和葡萄，描写畜牧和养蜂等农事活动，实际上是“教谕诗”，劝导人们关注农业。维吉尔的另一个成就是史诗，写了一部 12 卷的史诗《埃涅

阿斯记》，前半部模仿《奥得赛》写埃涅阿斯的流浪，后半部仿《伊利亚特》写埃涅阿斯与图尔斯之战，中心思想是歌颂罗马的光荣，关心帝国的命运，所以有人把它称为罗马的民族史诗。它与《荷马史诗》有很大相似性，结构、布局、手法都差不多，但它缺乏希腊人乐观勇武的风格，充满悲天悯人的忧郁情调，还表现出为奥古斯都歌功颂德的意图，艺术手法的特点是对人物心理描写细腻，是典型的“文人史诗”。

贺拉新既是抒情诗人又是文艺理论家，早期的《讽刺诗集》揭露社会弊端，后期的颂歌集颇有为奥古斯都唱赞歌之意，富于抒情，并善于通过恰当的艺术形象和希腊神话来表达诗人的哲理思想和生活信条。文艺理论集中表现在《诗艺》中，第一卷讲人生哲理，第二卷是文艺评论，强调“寓教于乐”，有真情实感，在文艺理论史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优良传统，下开“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的先河。另一个诗人是奥维德，他主要写爱情诗，代表作有《恋歌》、《爱的艺术》、《爱的医疗》、《变形记》等，对恋爱心理的描写真实、细腻，有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修辞技巧，但也不免有些轻佻。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诗歌也开始走下坡路，内容空泛，粉饰雕琢，华而不实，流入俗套。

拉丁散文兴起于共和国后期，最初是与希腊散文并行，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才脱颖而出，这是因为用拉丁文表述准确而简洁，并富有韵律和节奏的音乐感。促使它兴盛的重要条件是激烈的政治斗争，时代呼唤演说家登场，与之相配合的是传授拉丁语的小学、讲授拉丁文法的中学和注重修辞的大学。不用说，演说辞是拉丁散文的排头兵，从格拉克兄弟到前后三雄都是著名的演说家。当时流行两种演讲方式：一种称为“亚细亚式”，使用华丽的辞藻；另一种称为“亚狄加式”，讲究直截了当。西塞罗是把演说提到文学高度的人物，他把文学与政治、逻辑与修辞结合起来，兼取“亚细亚”和“亚狄加”两派之长，写了许多评论文

章,著名的演说辞有《反维列斯》、《反喀提林》、《腓力比克》、《反安东尼》等,专讲辩论术的则有《论推理》。他演讲很精彩,词汇丰富,讲求语法,有强大的逻辑力量,又有抑扬顿挫的声调,善用提问、比喻、讽刺等修辞手法,能打动听众的心,称为“西塞罗式句法”。恺撒是个政治家,同时又是散文家,他写了一些史学著作,也有不少演说词,风格与西塞罗大不一样,简明扼要、朴实无华而一语破的。彼特隆纽斯是一个小说家,他写了一部《萨蒂里卡》,在散文中夹杂诗歌,是欧洲最早的一部流浪汉小说。塔西陀是一个传记文学作家,著有《阿格利可拉传》,记述了罗马驻不列颠总督阿格利可拉的一生,他还写了一些史书和乡土志。

修辞学在罗马发展起来,适应辩论术的需要,这不仅推动了罗马文学,而且是罗马对世界文化的一个突出贡献。当时罗马很注重修辞学,把它当作最高学府的主要课程,各地都有修辞学教授,中学和专科学校也上修辞学课。最著名的教育家昆体良就是修辞学家,他写了一本《演说家的教育》,又译作《修辞学教程》。他认为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演说家,不但要有高尚的道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而且要口才出众,能言善辩,有较高的修辞学造诣,成为“思想和言论崇高圣洁的人”。

《教程》是作者长期教学和演说实践的经验之谈,汇集了许多名言,总结了罗马的演说理论,对材料取舍、组织,文字表达、记忆、语言、音调及演说家的风度都做了论述,把共和以来文学修辞的优秀成果融为一体,还特别把西塞罗作为典范来作评述,对后世修辞学颇有影响。

综观罗马文学,给人留下几个印象:第一,罗马文学实际上是希腊文学余波的继续,翻译、改写、移植、模拟大于创新,譬如戏剧,虽然希腊遗风犹存,但舞台已大为缩小,激动人心的悲剧已渐寥落,喜剧开出几朵鲜花之后便凋谢了;诗歌在抒情诗、

田园诗、讽刺诗方面有所进展，史诗也只是平平；拉丁散文兴盛一时，后来也不见多少光彩，惟有修辞学倒是一个成绩。第二，罗马文学兴起较晚，它是在希腊文学高峰过去之后才登上文坛，而它的兴盛期又是那样短暂，不过一二百年时间，并没有产生什么惊人的作品，也没有出现划时代的作家。第三，由于政治体制的缘故，人类童年天真烂漫的天性失去了，好奇的探索、大胆的想象、豪迈的气概似乎都被时光的流逝冲淡了，帝国后期的专制与纷乱已使文学失去旺盛的生命力，引不起冲动，变成茶余饭后的消遣文学和歌功颂德的帮闲文学。第四，不过，它毕竟是承先启后的中间过渡，而且时代比希腊要近得多，所以“文艺复兴”也从罗马文学中发掘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6. 罗马的著史之风

罗马开始著史大概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当时，元老皮克脱和琴其乌斯利用官方档案和祭司的记录，按希腊的治史方法和史书体裁，用希腊文编写历史，将神话传说、档案及亲身经历按时间顺序进行编年。用拉丁文写罗马史的第一人是老迦图，他的《创始记》共 7 卷，从罗马城市的起源写起，叙述布匿战争，迄于公元前 168 年罗马征服马其顿王朝。以后，由大祭司恺沃拉主持编纂了《大年代记》，实际上是资料长编。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写了一本《罗马史》，起自第二次布匿战争，终于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前后 70 年，是一部断代史，或者说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当代史”。这部书围绕罗马称霸地中海的主题展开，宣扬“惟有罗马征服了差不多整个世界”。它不但有严密的系统性，而且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认为“真实之于历史，正如双目之于人间”。在他看来，历史可以垂范后世，启迪后人。他说：“因为历史，而且只有历史，能使我们不涉及实际利害得失，而训练我们的判断能力……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

教育和训练就是研习历史。”不过，这些都只是史学的准备和前奏，真正把罗马史学推向高峰的是共和国晚期的萨鲁斯特、帝国前期的李维和帝国后期的塔西佗，他们合称“罗马三大史学家”。

萨鲁斯特是一个有洞察力的史学家，他选取了共和国时期的两件大事写成《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两个篇幅不大的记事本末，还写了一部五卷本的《历史》。《喀提林阴谋》记述了元老喀提林、国王朱古达利用社会矛盾阴谋反对共和国的经过，《朱古达战争》记述了罗马对北非努比底亚的战争，《历史》主要是记述自苏拉以来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可惜书未成而作者已死。他的三部著作集中反映了共和国晚期的政治斗争，揭露“前三雄”的欺骗行为，并指出导致共和国崩溃的原因。和以往的编年史和战争纪实不同，萨鲁斯特注意对历史的评价、分析，寻找因果关系，围绕主题展开情节，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因而被列入罗马三大史学家之一。

“前三雄”之一的恺撒，把他亲身经历的战争写成了《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材料丰富，文风朴实，文字简洁，是罗马早期学的上乘之作。《高卢战记》是写给元老们看的，目的是标榜自己的战功，后半部分是手下将军伊尔久斯补叙，对恺撒的赞扬更多，尽管如此，它毕竟记录了征高卢的战况，描述了日耳曼的风土人情。人们常把《高卢战记》与另外三部作者不详的《亚历山大战记》、《阿非利加战记》和《西班牙战记》，合称为《恺撒战记》，共同组成罗马对外征战的历史画面。《内战记》主要是记述恺撒与庞贝之间的火并战争，虽然作者极力推卸他发动内战的责任，但客观上反映出这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反映罗马由共和走向独裁的历史转折。

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史学出现兴旺景象，涌现出一批史学家，最著名的是李维。在此之前，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希腊学者，一个是狄奥多洛斯，另一个是哈里卡纳苏，前者编纂了一部 40

卷的《历史文库》，后者编写了一部 40 卷的《罗马古事记》，可贵之处在于把罗马放在地中海的大环境中来考察，指出“世界历史不从罗马起，也不会以罗马为最后目标”，并把罗马的起源与古希腊联系起来，近乎于“世界史”的写法。李维在罗马史学上占有突出地位，他的巨著《建城以来的罗马史》是罗马史学的经典之作。全书从罗马建城之时开始，计划写到奥古斯都为止，包括王政、共和、帝国初期，确立了罗马史的基本框架，但没有完成，只写了 142 卷，现存 35 卷。全书贯穿“罗马伟人”的观点，赞扬罗马人坚强、勇敢、守纪律、重法律、有责任心、忍辱负重的美德，因而得到罗马人的赞许。他虽尽量尊重史实，但宣扬爱国和道德过于突出，写战争也不免偏向罗马，美化元老派的倾向也较明显。他认为：“研究历史是医治心灵疾病的良药，在历史记载中，你可以一览明示于众的人类经验的形形色色，你可以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找到范例和教训；善美者可奉为楷模，鄙腐者可引以为戒。”他旁征博引，运用大量文档、议案、法令、条约、神话传说和前人著作，把大量史料加以梳理、取舍，突出因果关系，文字流畅、生动，但因他闭门造车，书斋气很浓，又不懂政治、军事、地理，不免有许多错漏。在这一时期还留下一份珍贵的《奥古斯都自传》，全文刻在他陵墓前的铜牌上，《自传》概括了奥古斯都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值得一提的还有高卢人特罗古斯，他以冷静的态度看待罗马和地中海的历史，认为政治中心是由东方转向西方，即亚述—米底亚—波斯—马其顿—罗马，颇有历史见地。

帝国后期的史学家首推塔西佗，他的著作有《演说家对话录》、《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等，最重要的是《历史》和《编年史》。《编年史》共 18 卷，起自奥古斯都末年（即公元 14 年），终于尼禄之死（公元 68 年）。《历史》共 12 卷，主要是写弗拉维王朝韦帕芻时期的历史，它与《编年史》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部从提比略到图密善（公元 14—96 年）的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此同时，罗马还出现两个传记史家，普鲁塔克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苏埃托尼乌斯著有《十二恺撒传》。

罗马史学从公元前 3 世纪末开始，绵延千余年直到罗马帝国晚期，不像文学那样经过一段繁荣之后便衰落了，不同时期都有其代表史家，但无论是萨鲁斯特、李维或塔西佗，他们的成就都无法与希腊时代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罗马史的意义在于，它们所记的史实不仅局限于罗马和意大利，涉及许多国家，是研究地中海历史的宝贵资料，可以看出长达千年地中海历史的变迁。

7. 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

如果和意识形态领域相比，罗马的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要辉煌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希腊化”时期，自然科学已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一些独立学科。另一方面是在帝国前期出现了和平、统一的环境，农业、手工业兴盛起来，刺激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在科学事业中，真正的天才是那些发明新的方法的人。有名的发现常常是由他的后继者做出的，因为他们能以新的活力应用这种方法，不用预先花费精力研究这种方法；但是对于进行科学研究所要求的思维和智能来说，无论后继者多么才华横溢，也比不上第一个发明这种科学方法的人。”希腊人的开创，在罗马人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分门别类地形成许多学科。在罗马的自然科学中，首先要提到的是卢克莱修对古代原子论的总结、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创立、恺撒修定儒略历及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其次是地理学、农学、医学、代数学和工艺制造，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过希腊。

“原子论”是希腊唯物主义哲学的精华，它由留基波和德谟克利特创立，“希腊化”时期伊壁鸠鲁又发展了这一理论，罗马的卢克莱修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加以发挥，使之更加系统、完整。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了一本《物性论》，对古希腊哲学派别做了评述，详细阐述了伊壁鸠鲁的学说，提出自己原子论的观点，事实上是对古代原子说的一个历史总结。卢克莱修的观点是：一、任何东西都是由原子构成，包括思想、灵魂在内，灵魂是生命的本原，思想是人的智慧；二、原子既不会“无中生有”，也不会消灭，它们总是在永恒的运动之中；三、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原子在虚空中相互碰撞，或因重量下降呈直线、斜线运动，因而世界万物有千差万别；四、时间和空间都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没有脱离时空的物质。这些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属哲学范畴，但对物质构成的这种大致合理的解释，显然对科学研究有重大指导意义。这一宝贵的思想财富，后来为科学实验所证明，并释放出足以影响近现代科技的巨大能量。

如前所说，亚历山大里亚在希腊化时代成为科学研究中心，后来并入了罗马帝国。生于埃及的托勒密在这种环境下从事科学研究，对天文、地理、几何、光学、历算都有很深造诣，著有《天文学大成》、《地理学》、《光学》等书。《天文学大成》是集古代“地中海世界”天文学大成的科学论著，阿拉伯人称它为“至大论”。他继承了希腊关于宇宙整体模式的构想、几何模型的研究、星体运行的学说及伊巴谷的“本轮—均轮”理论，通过大量天文观测，绘制出一幅包括 1022 颗恒星位置及亮度的星象图，论述了地球、太阳、月亮及行星的运行规律，详细研究了日食、月食及确定行星位置的推算方法，还有各种天文仪器。他的最大功绩就是设想出一个庞大的宇宙体系的几何模型，用“本轮—均轮”的偏心模式来解释地球及日月星辰的运行。然而，宇宙的神秘，在观测手段不高的古代是很难全面认识的，沿着欧多克斯、

阿波罗尼乌和伊巴谷的道路，他详细地论述了“地球中心说”，由于他推算的日月星辰位置大体接近实测结果，日月食的预言又往往得到证实，因而这种学说统治西方天文学达 1300 年之久，直到“文艺复兴”哥白尼建立“太阳中心说”才被彻底动摇。尽管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又长期为天主教神学所利用，但从人类认识史来看，它毕竟是人类走近“大体”的一个认识阶段，其局限性是由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思想观念所决定的。

世界通用的“公历”起源于古罗马，而它的始祖则是古埃及的“太阳历”。顾名思义，“太阳历”是根据地球绕太阳的周期制定的，一年为 365 日。然而，地中海各国早先使用的历法并不一样，例如巴比伦就使用“太阴历”，且各国都有自己的王朝纪年。在“希腊化”时期，开始采用以公元前 776 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纪元，向纪年世界化迈进了一步。在罗马扩张时期，由于历法混乱常常造成误会，以致有人感叹地说：“罗马人经常打胜仗，但不知胜仗是何年何月。”为此，罗马最高统帅儒略·恺撒决定统一历法，以太阳历为基础加以改进，于公元前 46 年颁布施行，称为“儒略历”。“儒略历”测定历年平均长度为 365 又 $\frac{1}{4}$ 日，于是规定每年为 365 日，每隔 3 年设一闰年为 366 日。到帝国建立后又做一次改进，称为“奥古斯都历”，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推行。随着基督教被确认为罗马“国教”，开始按基督教史制定纪年法，公元 535 年教皇约翰一世命狄奥尼修斯编制“复活节日期查定表”，推算耶稣诞生于罗马纪年的 754 年，以后便以此为纪元之始。由于“儒略历”的年长度比科学测定的“回归年”长 11 分 14 秒，久而久之，误差越来越大。公元 1582 年，罗马教皇格利高利命天文学家利里奥修改历法，设法从 400 年中减去 3 个闰年，能被 4 除尽的年份才为闰年，称为“格里高利历”。自此以后，欧洲各国纷纷采用，并推广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通用的

历法。

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又是罗马科学的又一杰作。这是一部有 37 卷的古代科学的百科全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及工艺制造，并旁及雕刻、绘画、社会经济若干知识，真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包。这部巨著产生于罗马帝国决非偶然，因为它有条件荟萃各种文化，通过老普林尼的搜集摘引，古希腊、罗马的知识得以保存，古代东方的成果也汇入知识宝库，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科技信息。据统计，全书有近两万个条目，摘引、参考了古文献 2000 多种，提到希腊学者 326 人、罗马学者 146 人。他抱着有闻必录的态度，坚信科学真理高于一切，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自然史》集合古代科技，总汇东西方文明之功不可磨灭，是一部“像自然本身一样千宫多彩”的书。

罗马的扩张使“已知世界”的空间大为扩展，军事本身需要地理知识，行政管理也离不开地理，交通、贸易也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因而地理学的发达程度超过希腊。公元前 2 世纪希腊作家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已涉及普通地理学概念，阿尔提米多鲁斯写了一本名为《有人居住世界的地理学》，罗马共和国晚期又出现了梅尼普斯的《内海航行记》和伊西多鲁斯的《帕提亚旅程》。帝国初期，地理学大为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全书共 17 卷，“引言”中讨论了普通地理学，往后讲述了以西班牙、高卢、不列颠、意大利、日耳曼、巴尔干半岛为主的欧洲地理，从 11 卷开始讲述亚洲概貌，涉及小亚细亚、波斯、印度、两河流域、叙利亚、阿拉伯、埃及和北非。他把大地看成是一个球体，研究地理首先必须绘制一幅“已知世界”的地图。他用自然因素的影响来解释人类社会，认为由于气候、地形等条件不同而造成区域的复杂性，对社会经济、历史发展、风土人情产生多方面影响。根据这一观点，对“已知世界”的地形、气

候、山川、物产、矿物、城郭、交通、民族风俗、历史沿革等进行分区描述，把自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起来，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此后，庞鲍尼乌斯·麦拉写了一部《地理图志》，生动报道了各地风土人情，并提出大陆四周为海洋环绕，地球分为两个半球、五个气候带，北温带是“有人居住的世界”。托勒密也是罗马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著作《地理学》又名《地球形状概论》，把“已知世界”细分为 82 个区域，提到 8100 个地名，并绘制了一幅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粗略地图。他的重大贡献在于试图确定各地的经纬度，然而，从天文观测只能得知纬度，而经度则须实测，因而用里程推算的经度多不准确。

希腊农业不甚发达，而罗马地大物博，在它控制的境域内，既有农耕发展最早的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又有伊朗、阿拉伯等畜牧地区，而罗马本身的农业在帝国“和平时期”又有较大发展，因而农学远胜于希腊。罗马农学的鼻祖是迦图，他在公元前 160 年写了一部《农业志》，虽然主要是讲庄园经济，但涉及各种农作物栽培及农事活动的季节安排，是世界上较早的农书之一。瓦罗的《论农业》成书于公元前 37 年，分为三卷，用问答形式讲述农耕概论、家畜饲养及家禽、养鱼和养蜂。维吉尔的《农事诗》用文学形式劝导人们重视农业，其中含有大量农业知识。科路美拉的《农业志》是古罗马农书中最系统全面的一部，共 12 卷，分述农作物、葡萄栽培、土地面积和林木、家畜饲养、家禽和养鱼、养蜂、花园等，还有经营管理经验，对提高农业生产问题有独到见解。

在罗马帝国的昌盛时期，手工业蓬勃发展，作为应用科学的“工艺”发达起来。当时，意大利半岛，以青铜铸造、制陶、制革、毛纺、玻璃制造，珠宝加工称著；莱茵河沿岸，冶金和纺织兴盛；西班牙地区矿业发达，主要开采铜、金、银和铅、锌；还有腓尼基的染料、埃及的麻纺、小亚细亚的纺织品等。这一时期

出现了一个实用科学家兼工程师，他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的赫伦（又名希罗），不但发明众多，还著有《压缩空气的理论和运用》、《战争的机器》和《机械学》等书。他研究了研杆、滑轮、轮子、斜面、螺旋等机械原理，设计和制造了滑轮系统、双缸单程鼓风机、计程器、虹吸管、照准仪等机具。据说，他发明了一种新式玩具，利用水蒸气的反冲力使空心圆球转动，被认为是近代蒸汽机的始祖。水磨在帝国时期普遍使用，这是近代水轮机的先声。在泥板书的启示下，罗马人发明了奇异的“蜡版书”，用针在蜡上刻字。继埃及“纸草书”之后，罗马人发明了“羊皮书”，以羊皮加工成薄纸。大约从公元 1 世纪起，罗马已铸金属硬币，正面多是当时的皇帝半身像，反面是神像、动植物及某些标志性物品，还刻有“黄金时代”、“祖国之父”、“罗马万年”、“大元帅”、“吉祥”之类字样。罗马已经有了“水泥”，但它不是人工制造，而是利用天然的火山灰，渗入砂石后便成“混凝土”。罗马以武力征服地中海，武器自然精良，传统的兵器有弓箭、投枪、双刃短剑和小铜盾，后来又发明了用坚木蒙皮包铁片的大半圆形盾，发明了用皮革和金属片制成的铠甲，还有套头式铜头盔。罗马有一种特制的“攻城槌”，在一座装有轮子的木架上悬着一根又长又重的大圆木，一端为铁制的羊头，攻城时不断撞击城墙。又有一种木制“攻城塔”，可以移动、升降，塔上有投石器，中间几层装有“攻城槌”。

医学在帝国初期也有长足进展，塞尔苏斯和盖伦被誉为“西方古典医药学的先驱”。塞尔苏斯写了《医学大全》8 卷，用拉丁文写成，分述治疗学和病理学原理，专论内科各症，着重讲外科及多种手术，如外科整形术、切除甲状腺肿、扁桃腺手术、骨折手术等等，堪称一代名医。盖伦长期为御医，有著述 130 余篇，对人体解剖、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都有研究，特别精到的是神经，分为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和混合神经三类。盖伦创立

了“三灵气说”，认为消化系统摄取营养而入肝、血，称为“自然灵气”；血液经心肺与空气接触后称为“活力灵气”；心脉连通大脑，便成“灵魂灵气”。这种说法虽然不尽科学，但对后世的血液循环学说有很大启发。他又集古代药物学大成，列出了矿物药 100 种，动物药 180 种，植物药 540 种，被奉为西药的经典。

在数学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丢番图的代数学，其代表作为《算术》、《多角形》。《算术》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可以相提并论，是代数学的鼻祖。他的代数方程只取整数答案，被称为“丢番图方程”。他用特殊的方法解不等方程式，列举了 100 个题目。他用字母表示未知数和一些运算，是近代符号代数学的嚆矢。

8. 罗马式建筑与雕塑

人们提起罗马，自然就想起那高大、雄伟、宽敞的廊柱式建筑，巨大的列柱支撑着穹窿式的大圆顶，显示出罗马特有的气派。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中这样写道：“罗马的艺术和文学只不过是伟大的希腊文化的一个分支，它继承了希腊和西亚、巴比伦和埃及所给的一切。但某些方面，罗马有它自己明确的推进，没有比建筑更为突出的了。罗马帝国标志着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规模上起了变化，反映在更大胆、更庞大的建筑上。罗马对建筑的主要贡献是水泥和水泥广泛使用。罗马军队开到哪儿，圆拱和水泥就传到哪儿。水泥使得巨大的圆拱和穹窿成为可能，并能用人理石盖面。豪华的科林斯圆柱被采用了，加以变化和加工并跟圆拱结合在一起。连拱廊是典型的罗马建筑，同样地还有倾向于圆形建筑和用连拱廊叠成的层楼。罗马人所到之处都留下圆形露天剧场、拱形凯旋门、柱廊街道、高架渠和宫殿式建筑。他们还修建了带有适当坡度的精美桥梁、高架渠道路。至今意大利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建

筑师。”

在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脚下，埋葬着一座古老的“死城”——庞贝，它始建于公元前 8 世纪，突然在公元 79 年葬身于呼啸、喷射的岩浆之中，在 1713 年才重见天日。这是一个诺大的城池，占地面积 63 公顷，东西长 1200 米，南北宽 700 米，周长 3.8 公里。城为椭圆形，城墙用石头构筑，有 8 座城门和 14 座城塔，最重要的是离海最近的西门——玛丽娜门，意为“通向大海之门”。笔直的街道纵横交错，形成棋盘式网络，将全城分为 9 个区域，主街宽约 7 米，用石板铺筑，石上留下深深的车辙印，十字路口有带雕像的水池，泉水通过架空的石渠引入城中。城中有 3 座公共浴池，使用锅炉烧水，天花板砌成圆拱形。中心广场 1.5 万平方米，三面围着整齐、精美的柱廊，政府、法庭、太阳神庙、女神庙及市场都集中在这里。它有两座露天剧场，大剧场可容 5000 人，小剧场可容 1200 人，四周设有环形的观众席，豪华的舞台旁边有乐室和化妆室。商店、酒肆、作坊、客栈遍布大街小巷，豪华住宅鳞次栉比，依稀可见当年的繁华。庞贝城长眠地下 1600 多年，使它没有受到风雨剥蚀和人为的破坏，成为一座丰富多彩的城市博物馆，所以有人说：“庞贝城在维苏威火山爆发时死去，也从那时凝结起来，进入了永恒的不朽。”

公元前 4 世纪初，高卢人突然袭击罗马城，使罗马人惨遭城破国亡之苦，于是他们不惜一切地修建防御工程，建造坚固的城墙、城门、塔楼和碉堡，于公元前 378 年竣工，巴拉丁山、阿芬丁山等 7 个山丘包入城内，固若金汤，此后 800 年一直没有被敌军攻破，被誉之为“永恒之城”。奥古斯都大兴土木，“把砖上的罗马变成了大理石的罗马”，首先修建恺撒神庙、奥古斯都凯旋门和奥古斯都广场以壮国威，接着又在广场修建马尔苏斯神庙，在帕拉丁山上修阿波罗神庙，还有一个纪念屋大维的柱廊。建筑家阿格里巴主持修建了许多新的建筑物，有公园、浴场、桥梁、道

路、引水渠等公共设施，也有陵墓、神庙、凯旋门、纪功柱、雕像等纪念性建筑物，以万神殿最为宏伟。公元 64 年国马遭到大火，尼禄皇帝再次重修罗马城，建造了一座湖光山色掩映的皇宫，建筑师塞鲁斯和维特鲁维奥大肆施展他们的艺术天才，再造一个新罗马。尼禄死后，弗拉维王朝建造了一座“科洛赛姆角斗场”，又建了一座大理石浮雕的“图拉真纪功柱”。

罗马的建筑以工程浩大、气势宏伟称著于世，在那总长约 8 公里的“马路”上建起了许多巨大的石拱桥，最令人瞩目的建筑有科洛赛姆场、罗马万神庙（潘提翁庙）、古罗马水渠和凯旋门。

“科洛赛姆”意为巨大，这个大角斗场是“古代世界最为宏伟的高超建筑”，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它始建于公元 72 年，以坚固、实用、精美、宏大而闻名世界，外墙 48.5 米，呈椭圆形，长径 188 米，短径 156 米，周长 527 米，占地约 2 万平方米。60 排内低外高、呈阶梯状的看台可容 5—8 万观众，均铺以大理石，前面为贵宾席，中间是骑士席，后面是平民席，皇家专用席张挂着遮阳的天棚。中间是一个长 86 米、宽 57 米的角斗场，让那些可怜而又凶悍的“角斗士”与猛兽进行生死搏斗，让一片惨痛的嘶叫声换取人们比野兽更可怕的狂笑。当然，它也是一座多功能的体育场，可以表演剧烈的海战。从外观看，它是一座 4 层楼的高大建筑，除最上一层保持开小窗的墙面外，其余三层都开有拱门。每层 80 拱，拱门夹在柱子之间构成“柱式拱门联合体”，第一层为质朴的“多利亚柱式”，第二层为秀美的“爱奥尼亚柱式”，第三层为华丽的“科林斯柱式”，第四层为罗马人偏爱的“方倚柱”，使建筑体虚实相间、节奏感强，仪态非凡而富有气韵。这种建筑体现的是罗马的宏伟气概，“通过这种办法，罗马公民能感到他自身是高大建筑物和建筑物所代表的巨大帝国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所以，罗马人说：“科洛赛姆倒塌，罗马就要灭亡。”

罗马万神庙被视为古罗马建筑的杰作，它建于公元 120—124 年，是一座直径为 43.6 米的圆形建筑物，妙在它的顶高与直径相同，顶部为半球体穹窿状，正面的科林斯式大门廊气势逼人，柱上有精美浮雕。罗马的引水渠是最具特色的市政设施，它穿山越岭、跨越沟壑，是一条条架空的石砌拱券渡槽，渠顶盖石板以防污染，可谓是世界上最早的“自来水”。像这样的水渠，在罗马有 9 条，总长 90 多公里。法国尼姆地区的一处水槽离地面 48 米，叙利亚有一水槽高 64 米。提起凯旋门，人们便联想起巴黎，其实，凯旋门的发祥地在罗马，它是一种用大理石建成的纪念性建筑物，以巨大的拱门来显示隆重，两边的柱体特别厚实，上有雕刻装饰，柱上檐部用小山墙或一顶阁增加气势。最初的凯旋门只有一拱，以后发展为三拱，现存的凯旋门有两座：一座是公元前 82 年修建的提图斯凯旋门，取单拱形式；另一座是公元 4 世纪修建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取三拱形式。当然，“罗马是一部读不完的书”，还有许多造型奇特的古建筑，如圣·天使古堡、都密善皇宫、哈德良离宫、奥古斯都广场、图拉真广场、千人大浴场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罗马的建筑与雕塑配合得十分紧密，或以雕像为建筑的中心标志，或以雕塑使建筑更加精美绝伦。罗马的雕塑不像希腊那样富有神话色彩和展现人体的美感，非常注重写实，富于表现力，形象自然而逼真，给人以立体感。陈列在梵蒂冈美术馆的“奥古斯都立像”，是 19 世纪在罗马城北郊的一座帝王园林废墟中掘出来的，他身材魁梧，充满王气、霸气，左手执杖象征权威，右手高扬指挥千军万马，庄重的面孔露出威严、明智与坚定，深沉远望的双眼和紧紧闭拢的嘴唇表现出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身上的铠甲记满了他的战功，脚边的小爱神反衬出他的伟大，被认为是罗马人物雕像的典范。在罗马广场的基石上矗立着一尊“奥理略骑马铜像”，它原先立在拉特兰大教堂前，是公元前 2 世纪的作

品。奥理略皇帝端坐在马鞍上，握紧马缰，坐骑正在昂首阔步、奋蹄前行，显示帝国统一、稳定、太平，而这位皇帝若有所思，似在思考他的《沉思录》，堪称“情绪肖像”的佳作。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恺撒雕像、图拉真和哈德良的骑马像。现藏罗马公共浴池博物馆的《坐着的斗剑士》铜像又是一件杰作，这个身体壮实的奴隶浑身都是力量，那略微斜视的深目好似在对命运作无言的控诉，鼓筋暴绽的肌肉还流着滴滴血汗，忙里偷闲的神态透露出摆在面前的残酷现实，具有无穷的艺术震撼力。罗马建筑上的大型浮雕饮誉古今，人物故事在图案中突显出来，表现出好胜喜功、讲求实际的时代风貌，立在和平祭坛上的三根神柱，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战车入城图，图拉真皇帝的纪功柱都莫不如此。

建筑发达的罗马，自然有许多名师，维特鲁维奥就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他写了一部《建筑十书》，总结了罗马的建筑思想和理论。全书共 10 卷，论述了各种建筑材料、各种建筑物、建造原理、建筑方法及施工设备、供水技术等等，还特别详细地讨论了各种柱式及其组合，研究了建筑声学。书中提出了“坚固、实用、美观”的三条建筑原则，成为西方建筑学的理论基础。维特鲁维奥强调建筑在整体上的和谐。他写道：“在人体中自然的中心点是肚脐、因为如果人把手臂张开，作仰卧姿势，把圆规放在他的肚脐上作圆时，两方的手指、脚趾就会与圆接触。……如果自然构成人体，使肢体按照比例与其综合的全部外形相对应，那么人们似乎就有根据来规定：在完成建筑各个细部对于全部外貌应当在计量方面保持正确。”《建筑十书》是希腊、罗马建筑保留至今的惟一完备的建筑典籍，其价值决不亚于那些建筑巨构本身。

第三篇 地中海与基督教文化圈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基督教，它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 20 个世纪，如今拥有 15 亿信徒，这就是说，大约在 4 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基督教徒。基督教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一大标志，然而它的发源地却在地中海，是地中海文明孕育了基督教。基督教脱胎于希伯来的犹太教，而它的神学理论则渊源于希腊哲学，所以有人把它说成是“两希”文化交融的结晶体。基督教本来是“被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它产生和形成于罗马的重压之下，而在帝国后期却变成了“国教”，在罗马帝国的扶植下奠定了基督教迅速传播的基础。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也分化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两大派别，对欧洲中世纪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文艺复兴”期间，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它打破了欧洲思想的沉寂，产生了适应变革的基督教新派。伴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和殖民地的扩大，基督教越出欧洲而走向世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基督教文化圈”。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基督教是地中海文明向世界扩散的重要媒介，它由地中海而欧洲，由欧洲而美洲，进而传到世界其他地方，使地中海文明逐步放大。

（一）“东西合璧”的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在许多方面具有东方文化的因素，但神学理论的提升则是靠希腊、罗马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产生了。”这是一个东西合璧的宗教，反映了地中海文明的诸多特征。罗马帝国与基督教有极其奇妙的关系，它的武力征服与强权政治压出了一个基督教，帝国统一下的地中海促成了基督教文化的产生，而基督教上升为“国教”又成为它广为传播的契机。

1. 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

“基督”一词源于希腊文 *Christos*、拉丁文 *Chritus*，原意是“救世主”的宗教，汉语按其音译而称“基督教”。按早期教会的说法，基督教是由耶稣基督及其门徒在巴勒斯坦创立的。据说，耶稣生于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时代，时间在公元前 27 年至公元 14 年之间。他是“上帝之子”，降生在苦难的犹太人，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向世人宣传上帝的“福音”，后来被门徒犹太出卖，由犹太教祭司将他交给罗马总督处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复活，第 40 天忽然升天，以自己的死来换取“圣灵降临”。他的门徒领受“圣灵”，暗中传教，预言“救世主”将再次降临人间，重新审判世界，建立“千年王国”。传说毕竟是传说，很难佐证它的真实性，但既然人们盼望“救世主”的出现，呼唤“千年王国”，背后显然隐藏着许多苦难、辛酸的历史。

犹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他们受尽磨难从埃及逃回故地建立犹太王国，可是好景不长，又变成了“巴比伦之囚”。波斯

灭巴比伦，把他们解救出来，但公元前 4 世纪初又被亚历山大帝国奴役。罗马军团的铁蹄终于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公元前 63 年罗马大将庞培攻占了耶路撒冷，屠杀了 1 万多犹太人，灭亡了犹太国家，把他们推进了更加苦难的深渊。不愿做奴隶的犹太人不断发动起义，可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在公元 6 年被列为行省，直接受罗马统治。在强大的罗马帝国面前，一个弱小民族的反抗只能是以卵击石，毫无胜利的希望。在绝望之中，他们诅咒世界已到了“末日”，要改变残酷的现实已经无望，于是幻想“救世主”把他们带进“天国”，渴望在“彼岸世界”得到补偿，让生命在“天堂”里得到永生。在这里种情况下，基督教应运而生，它作为“被压迫者的运动”出现，在宗教领域内“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门”，为受苦受难的人找到一条“从文明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

基督教原先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是从艾赛尼派中分化出来的一支，称为“拿撒勒派”。在反抗罗马的斗争中，犹太教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迅速分化：代表祭司、贵族、富商的“撒都该派”主张恪守犹太教规，代表中产者和知识层的“法利萨派”强调与异教、异族隔离，代表下层激进者的“伊便尼派”宣称上帝耶和华即将派“救世主”降临人间，而以牧民和农民为主的“艾赛尼派”则坚信他们“与上帝同在”，犹太的复兴就在于“救世主”的降临。撒都该派和法利萨派处于犹太教的正统地位，而将反对正统的其他派别斥为“异端”，原始的基督教便从艾撒尼派中分化出来，并与伊便尼派有诸多联系，称为拿撒勒派。

基督教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犹太教分道扬镳，并在若干基本点上与犹太教决裂，形成独立的宗教。首先，基督教打破了犹太教“特殊神宠论”的狭隘观念，跳出犹太民族的小圈子而走向广阔的世界。基督教认为，受苦受难的并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普天下的人，因此，“上帝的选民”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所有信奉上帝的

人，这些被宰割的“羔羊”最终要战胜“七头十角的野兽”而得到拯救，从而表达了广大受压迫、受欺凌者的心声，成为基督教能够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它以强烈要求“平等”的思想去轰击现存社会，宣称“大地上将不再用墙和篱笆隔开”，在未来的“天国”里，没有穷人和富人，要人们“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实行公共消费，并说“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安慰，是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比之“犹太复国”的主张更有号召力和吸引力，与犹太复国主义划清界限。其三，基督教认定耶稣基督就是人们期待的救世主“弥赛亚”，他必将再次降临人间，给人类带来“福音”，从而使人们“与上帝同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与犹太教认为“弥赛亚”并未降临而应当继续等待的说教完全抵触。其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犹太教，自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真正的“优秀民族”，以“割礼”（男孩出生后第八天用石刀割去包皮）来证明他们是“上帝惟一的选民”，并实行一整套严格的戒律和烦琐礼仪把他们和其他民族截然分开，而基督教则主张填平这道人为的“鸿沟”，废除阻碍民族交往的清规戒律和烦琐礼仪，为基督教的传播扫除障碍。这一切终于导致基督教与犹太教彻底决裂，成为有可能走向世界的新宗教。

不过，基督教既然源出于犹太教，就势必留下鲜明的胎记，继承其精髓而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首先继承的是“至高一神”的观念，认为上帝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神，他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品格“至善全美”、“全知全能”，从而使基督教成为“绝对一神的宗教”。“救世主”的观念也被继承下来，坚信有“救世主”降临拯救人类，惟有相信和依靠救世主才能得到永生，这就使基督教成为“信奉救世主的宗教”。基督教还继承了犹太教信仰“先知”及其“启示”的观念，认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通过“先知”获得“启示”，

认识“超自然的真理”，否则在认识上将是贫乏、残缺的，因而成为“启示的宗教”。

基督教还继承了犹太教的全部经典，并增加新的经典，作为神学、教义、教规、教仪、节庆的根本依据，称为《圣经》。《圣经》分为《旧约》与《新约》两大部分，从根本上继承了犹太教“与上帝盟约”的观念。《旧约全书》实际上是犹太教的经典，它是摩西代表犹太人与上帝耶和华签订的“西乃盟约”，核心是“摩西十戒”，因为基督教在信仰上与犹太教一脉相承，所以仍然把它奉为经典，作为《圣经》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基督教毕竟跳出了犹太教的狭小圈子，而向犹太以外的广大信徒，必须与上帝重新立约，于是有“旧约”与“新约”之分。《新约全书》是耶稣以自己的生命作“赎价”，代表人类与上帝签订的永恒盟约，它以“因信称义”为核心，集中反映了基督教区别于犹太教的原则。《新约》共 27 卷，亦分四大类：福音书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记的都是耶稣的言行，宣扬耶稣对世人的救赎和普遍的爱。历史书《使徒行传》是最早的教会史，重点记彼得和保罗的传教；《使徒书信》主要有《保罗书信集》，是基督教神学与教义的重要文献，其中，《腓利门书》被称为“教会解放奴隶的宣言书”，《希伯来书》告诉人们“新约”取代了“旧约”；最后一部分是《启示录》，可视为《新约》中的“先知书”。《新约全书》是基督教新的宣言，它要把这种新的宗教传给所有的“外邦人”，给他们带来新的“福音。”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三位一体”，就其神的本性而言只有一个上帝，但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圣父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世界的主宰者；圣子是“从真神出来的真神”，是上帝的化身，“为拯救世人而降临”；圣灵（圣神）是圣父、圣子共同生发的基本信条，接受圣灵的感

动便能在生活中表现种种美德。三者不可分割，都具有共同的“神圣本性”，这“一位一体”的上帝，实际上是一种“理念”，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它的奥妙在于只能靠信仰来领悟和接受，而不能靠理性来理解。二是原罪与救赎论，“原罪”是基督教对人性的基本判断，而“救赎”则是它立教的基本宗旨，把“罪感”与“爱感”体现在统一的信仰中。在基督教看来，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就犯下了弥天大罪，这便是所谓“原罪”。原罪之外还有“本罪”或“现犯罪”，即违背上帝意旨而犯下的种种罪过。因为人犯有“原罪”和“本罪”无法自解，所以上帝派耶稣来到人间拯救这些有罪的人，宁可承受钉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以宝贵的血来作“赎价”为人们求得永生。三是“道成肉身”，即上帝的“道”（逻各斯）通过童贞女马利亚“纯洁受孕”让耶稣降生人间，使人时常感到“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望而可及，有强烈的现实感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希望。四是“因信称义”，即信仰的虔诚是得到救赎的必要条件，只有恪守与上帝的盟约才能称为“义人”，因此，信徒必须服从上帝安排，不断忏悔、改过才能得救、再生、永生，死后进入“天堂”。五是“末世审判”，基督教认为人死后灵魂将受到审判，无罪者进入天堂，有罪者打入地狱，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所有的人都将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说法无非是要让人们建立起“心灵法庭”，巩固信仰。

犹太教的教会组织形式也被继承下来，祈祷、唱诗、诵经、讲道的礼拜仪式继续沿用，“安息日”演变为“礼拜日”，从“逾越节”中演变出“复活节”。随着犹太教教规、礼仪的破除，基督教创立了许多新礼仪，重要的有如下几种：圣事亦称圣礼，是耶稣基督亲自制定的崇拜礼仪，举行圣事可使人得到“神恩”和“保佑”；洗礼又称领洗或圣洗，经过这一仪式可洗涤去“原罪”与“本罪”，成为基督教徒；为了坚定信仰，洗礼后再接受主教

的按手礼，使“圣灵”降身，称为“坚信礼”或“坚振礼”；为了赦免教徒对上帝所犯各种罪过，教徒应向神甫告明自己的罪过以示忏悔，称为“告解”；“圣餐”是为了纪念耶稣的“最后晚餐”，以饼和酒表示祝福；到教堂举行婚礼，求上帝祝福；临终时擦“圣油”，赦免一生罪过；担任神职人员，必须举行“授圣职礼”；因耶稣基督在星期日复活，故称为“主日”，在这天上午举行礼拜。节日也因基督而产生，如圣诞节是耶稣诞生日，受难节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蒙难的日子，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复活”，升天节是纪念耶稣“升天”，圣灵降临节是纪念“耶稣门徒领受圣灵”的节日，如此等等。

2. 基督教文化的东方因素

在人们的观念中，基督教仿佛是西方文化产生的，这是因为整个欧洲中世纪都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近代欧美各国都普遍信仰基督教，而且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都与基督教有关。然而，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是只看结果不寻根源。其实，基督教植根于东方而成熟于西方，它是一种“东西合璧”的宗教。不用说，基督教脱胎于巴勒斯坦的犹太教，犹太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同时又是基督教的圣地。如果更深一层地挖掘，基督教的根本教义、思想观念、《圣经》故事、宗教文学大都来自东方，不但直接渊源于希伯来文化，而且来源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因此，就宗教的起源、形成及其教义、经典而言，它是“东方型”的。

基督教一开始就是“绝对一神的宗教”，这是因为独尊一神的观念在犹太教的母腹中已经形成，而犹太教在由崇拜多神走向一神的过程中，在切身体验耶和华是惟一真神的同时，也深受埃及宗教的启发。在埃及，虽然信奉的神祇很多，但最高的是太阳神，无论是“拉”、是“阿蒙”或“阿吞”，都离不开这个最高神祇，而且总是同法老紧密结合，它的惟一性与永恒性在人们心目

中根深蒂固。波斯的琐罗亚斯特教（即祆教）对基督教也颇有影响，虽然它立教的基础是“二元对立论”，但崇奉的却是阿胡拉马兹达，把他看成是创造和主宰光明世界的惟一“真神”。由阿胡拉马兹达创造的“六天天神”虽然各有执掌，但他们都有共同的心灵、声音和行为，集中体现阿胡拉马兹达的神性，实际上是“七位一体”。这种观念对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或许也是一种启示。事实上一神教在东方已相当普遍，印度的“梵天”，巴比伦的“安努”都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很自然地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教”观念。

基督教是“信奉救世主的宗教”，这种“救世主”的观念直接脱胎于犹太教的“弥赛亚”（默西亚）。“弥赛亚”原先是以色列人理想的君主，原意是“受膏者”或“受上帝祝福的人”，而犹太教的先知们一再强调他是上帝派到人间的“救世主”，盼望他早日降临。不过，因为犹太复国遥遥无期，所以“弥赛亚”始终没有降临，要人们继续等待。基督教不以“犹太复国”为目的，宣称耶稣就是“弥赛亚”通过“童贞女受孕”而降临人间，进一步发展了“救世主”的观念，而且把它具体化为“道成肉身”。这种“救世主”的观念，在东方比比皆是，琐罗亚斯特与童贞女赫沃之子扫希安特的神奇诞生就标志着救世主的出现。摩尼教更是直截了当，宣称“明王出世，大放光明”。在埃及也有救世主降临之说，奥西里斯之妻爱西丝女神就被描绘成一个哺育圣婴的母亲，当是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耶稣的原型。

基督教又是一个“启示的宗教”，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全知全能”、“至善至美”，通过“先知”传达上帝的“真言”，人类才能完美。这一思想在犹太教中已充分体现，他们宣扬“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智慧定天”，所以人们必须不断得到上帝的启示，提倡“学习如敬神”。琐罗亚斯特教的说教也是如此，认为人们只有通过先知得到阿胡拉马兹达这位“智慧之神”的启示，弃恶

从善，才能进入“光明世界”。婆罗门教的“吠陀天启说”，就是只有通过神圣知识的启示才能从精神上与神相通。

“末世论”是基督教拯救人类心灵的理论基石，由此引出“末世审判”、“天堂”、“地狱”、“今生”与“来世”的观念。“末世审判”与“天堂”、“地狱”的观念，在基督教产生以前就普遍在东方流行。在古埃及的“金字塔文”、“生命书”和“死亡书”中明确划分“人世”与“冥世”，奥西里斯是主宰冥世之神。人死之后要接受“末世审判”，把心放在“天平”上去称，一端是死者的心，另一端是爱西丝，行善者被迎入“天国”而获得永生，积恶者便被打入地狱而永远死亡。法老死后成为奥西里斯，他的后继者则为奥西里斯之子荷鲁斯，不断在阴阳两界转换。“末世审判”的观念在波斯尤其突出，琐罗亚斯特教明确提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灾变，宣布“末日审判”开始。他们宣称，在生行善积德的人死后灵魂便进入“光明世界”，而作恶多端的人在刀刃般的分别桥上便跌入地狱。事实上在印度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中，“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思想早已盛行，虽然不一定影响基督教义，但说明这种观念在基督教产生前已弥漫东方。

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直接来源于犹太教，所以《旧约》开宗明义就是《创世纪》，在这里讲述了“六日工程”的故事，讲述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及“方舟”的故事。这种“创世说”在巴比伦的泥板文书上可以找到它的源头，巴比伦史诗亦称创世史诗，《吉伽美什史诗》中就有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它们与《圣经·创世纪》的描述极其相似。基督教中十分重要的“原罪论”实际上是从“伊甸园”的故事引出，而“伊甸园”是幼发拉底河下游平原的名称，希伯来语把它引申为“乐土”，可后来竟成了“失去的天堂”，而基督教对“天堂”的描绘就是以此为素材。

作为基督教神学、教义、信理、教规、伦理、制度基础的

《圣经》，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都是希伯来民族痛苦的体验，是这一弱小民族向全世界发出的沉痛呼声，因此，就整体而言，它乃是“一部救赎的历史”，《摩西五经》是“人类救赎历史的开端”，《新约》的《四福音书》则是宣布耶稣给拯救人类带来的“福音”。全部《圣经》都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不了解这部苦难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圣经》。事实上《圣经》的故事，绝大部分是希伯来民族的故事，例如亚伯拉罕、约瑟遭难、出逃埃及、摩西结盟、约西亚大战耶利哥、所罗门王的智慧、巴比伦之囚、耶稣诞生、耶稣荣进耶路撒冷、最后的晚餐等等。由于希伯来民族颠沛流离，广泛接触东方各国，因而也把许多民间故事编为《圣经》故事，如上而所说的“创世”、“洪水”、“伊甸园”、“方舟”故事之类。总的说来，《圣经》的故事都来源于东方，以犹太民族苦难的历程为主线。

《圣经》中有许多用以感化人们心灵的文学作品，形成了所谓“先知文学”、“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圣经》中的“先知书”就是先知文学的代表作，它们是公元前 8 世纪以来的古希伯来文学体裁，以“先知”（上帝的代言人）的“默示”传达上帝的“真言”，所以常用“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等语以增强其权威性。智慧文学是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后的希伯来文学体裁，内容注重伦理道德，表达方式主要是格言、警句、比喻、寓言、诗歌、赞词，如《旧约》中的《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约伯记》等，目的是教导人们获得真正的“智慧”。启示文学亦称默示文学，是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之间流行的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文体，用异象、比喻、启示、隐喻等手法来讲述“主的日子”、“最后审判”、“世界末日”、“弥赛亚的拯救”等神学命题，影射现实社会，抒发民族感情，宣扬宗教信仰，鼓舞人们奋斗，并假托是受了上帝的启示，如《但以理书》、《启示录》之类。先知文学、

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构成了基督教文学的基础，对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及西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而它们都是希伯来文化的结晶，是神圣化了的东方文学。

3 基督教神学与希腊罗马哲学的契合

基督教植根于东方宗教文化的土壤上，而它在形成过程中则深受希腊、罗马哲学的影响，通过哲学来论证神学，借以提高它的哲理性，形成一个合乎逻辑、具有思辨特征的神学理论体系，从而构成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一大特色。我们通常所说的“东西合璧”主要就是指东方神学与希腊、罗马哲学的契合，在这里，哲学已深入到基督教的灵魂深处，直接进入了它的神学体系。在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创立时期，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斯多葛派曾经起过重要作用。在往后的发展中更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派影响，促成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神学融会贯通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斐洛，而集大成者则是罗马帝国后斯的奥古斯丁。

毕达哥拉斯学派本来就是一个神秘的宗教学术团体，其学说的核心是“神秘的数”，当他把数学、推理与信仰结合起来，便构成了一种具有抽象推理的数学神秘主义。他对数做了种种解释，并赋予特定的社会意义，如把“1”等同于“理性”、“灵魂”、“本体”，“3”表示“开始”、“中间”和“终结”，“4”是“正主”和“神圣”，“6”象征“和谐”，“7”象征“机会”，“8”象征“均衡”，“9”象征“强大”，而“10”则是最完美的数，象征“神圣”、“伟大”、“全知”、“全能”，基督教在这一点上找到了“上帝”存在的理论根据，并从“数”的推理中自然推导出来。所以，罗素说：“有一个只能显示于理智而不能显示于感官的永恒世界，全部的这一观念都是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得来的。如果不是他，基督徒便不会认为基督就是道；如果不是他，神学家

就不会追求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的逻辑证明。”从纯抽象的理念出发，毕达哥拉斯相信灵魂存在、灵魂不朽、“灵魂轮回”，这便为基督教的“彼岸世界”做出了哲学的论证。

苏格拉底哲学对基督教的影响，主要是“知识即至善”的理论。在他看来，理性是人的根基，知识是最高的善行，最好的善存在于灵魂之中，只有不断净化灵魂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而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惟有神才是最高最完善的智慧，从知识与善德的关系上论证了上帝的“至善至美”。他指出：“美德和真正的幸福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人不节制、勇敢、聪明和正直，就不会幸福。”这就为基督教提倡的“谨慎、正义、勇敢、节制”四大美德做了宝贵的提示。他的“精神助产术”，是从先验模式出发，通过辩证方法为信仰“先知”和“启示”做了很好的解说。

对基督教意识形态影响最深的是柏拉图，他被基督教思想家们称之为“说希腊话的摩西”，称为“犹太化的哲学家”。他认为“理念”独立于实体之外，高于一切，真实完美，永恒不变，现实世界的一切只不过是理念不完善的“影子”和“摹本”，这可谓是对“上帝创造世界”在哲学上的绝好说明。他在《斐多篇》中阐述了灵魂回忆说，把“求知”看成是一个“回忆”与“觉醒”的过程，无非是把被遗忘的“理念”找回，这与基督教的“启示”神学不谋而合，或者说是为这种神学找到更充足的理由。“灵魂不灭论”为进入“天堂”敞开了希望之门，而“理念世界”和“理想国”则勾画出“天堂”的美妙图景。灵魂向上升华与向下沉沦的说法实在是“天堂”与“地狱”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他的学说归结到一点，就是“理念”的惟一性、永恒性、至善至美性，因而为后来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所以，梯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力图使它的教义被有教养的罗马人所理解和接受时，柏拉图的体系乃成为它的思想宝库。它的唯

心主义、目的论，以一套理念为世界模型的思想、二元论、神秘论、对物质和感官世界的轻蔑、伦理的国家、灵魂不死的论证和人类坠落的学说，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论点，对于希望表明这种新信仰是合乎理性的人来说，是受欢迎的礼品。”

斯多葛学派是罗马帝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学派，在这里，哲学与神学逐渐聚焦，希腊哲学探索、求真的精神日益淡薄，神学的意味日渐增多。斯多葛派伦理学的基本思想是“顺应自然，服从天命”，世界的一切都是神预先安排好的，人们除了顺从之外别无选择。这一结论直截了当地把人们引入“神的世界”，为基督教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大同世界”的主张，实际上是为罗马帝国张扬，当然也从观念上帮助基督教跳出犹太民族的小圈子。正如恩格斯所说：“新的世界宗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

直接影响基督教神学的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葛派，它们是罗马帝国衰败时期的思想潮流。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普罗提诺，他把柏拉图的学说导入神秘主义而进入神学。他的“流溢说”对基督教思想观念的形成起过作用，认为世界的本原是“超存在的”、神秘莫测的“太一”，由此流溢出“理念世界”，再由它流出“灵魂世界”，最后流出的才是“现象世界”。也就是说，“理念世界”并不是最高境界，必须往上追溯到神秘的本原，有了这种理论，就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永恒的上帝”，推导出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与上帝同一”。新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是塞涅卡，他认为“天国就在我们心中”，内心世界才是惟一真实的世界，物质和肉体都是一种罪恶，只有过清静寡欲的生活才能使灵魂完善，逐步接近上帝，这就直接服务于禁欲主义思想。他又极力宣扬宿命论，认为命运是无法抗争的，“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以上这些理论，为早期的基督

教神学家广泛采用。

基督教广泛吸收希腊、罗马哲学，其一是把希腊哲学思想与犹太教结合为“犹太希腊哲学”，其二是在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基础上创建世界宗教，其三是以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葛派理论构建神学体系。首先把希腊哲学融入犹太教神学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斐洛，他既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又是一个博学的哲学家，他在《律法评注》和《比喻解释》两书中，就引入了许多柏拉图的观点，用以阐明一神教、二元论、启示、预言和天使说，被称为“第一位犹太思想家”。引入的这些哲学概念实际上是为犹太教立说，它不但为后来的基督教所继承，而且某些因素导致了基督教与犹太教分道扬镳。

大约在公元 2 世纪中叶以后，有一批信徒用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来论证基督教义，创立所谓“教父学”体系的神学。最早的是奥里金，他以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葛派理论为基础建立基督教神学，被誉为“基督教神学的拓荒者”。另一个是德尔图良，他主张“信仰就是一切”，排斥理性，提倡禁欲主义，着重论述了“逻各斯基督论”。集大成式的人物是帝国后期的奥古斯丁，其代表作是《上帝之城》、《忏悔录》和《三位一体论》，成功地运用新柏拉图主义系统阐述神学。《上帝之城》在讲述罗马历史和宗教之时，系统论述了基督教关于创世、善恶、原罪、堕落、预定、拣选、恩典、拯救等问题，被视为“基督教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和“早期教会最完备和最权威的神学著作”。《忏悔录》的第一部分是讲他前半生的思想变化，第二部分实际上是用哲学诠释《圣经》，对“时间”的论述特别精到，用“记忆、感觉、期望”来补充“过去、现在、将来”，目的在于说明上帝的永恒性。《三位一体论》认定圣父、圣子、圣灵就神性而言是等同的，上帝、造物主、全能共同体现它的“惟一、伟大、全能、善良、公义、慈悲”，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尼西亚信经》。以上事实表

明，基督教神学理论是犹太教神学与希腊、罗马哲学结合的产物，富有哲理性。

4.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

基督教与罗马帝国有密切关系，它因罗马帝国的压迫而产生，又因罗马帝国定为“国教”而广为传播，基督教文化在罗马帝国后期逐渐形成。

正当犹太民族摆脱了塞琉古王朝的统治而走向独立的时候，公元前 63 年罗马统帅庞培征服了巴勒斯坦，使犹太人深感亡国之痛、流散之苦，愈加盼望“救世主”的降临。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下，“耶稣降生”的故事很快传开，给苦难中的人民带来了“福音”。耶稣宣扬“博爱”，叫人们“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在被奴役、被压迫人民心中产生巨大共鸣。从公元 66 年到 135 年，犹太民族不断反抗，爆发了四次“犹太战争”，结果都失败了，神庙被毁，大批教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复国已无希望，面对强大的罗马帝国，一个弱小的民族是无能为力的。人们渐渐意识到，要解救自己，必须打破“特殊神宠论”，把对上帝的信仰传到“外邦”人中去，让所有的“上帝选民”都得到拯救。在这样的背景下，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彻底分离出来。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圣地，同时又是基督教的圣地，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最早的基督教徒团体在耶路撒冷建立，耶稣的第一门徒彼得就是第一任教主。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到“外邦”的是保罗，他原先不是教徒，也不是犹太人，而且参加过迫害教徒的活动，后来受了耶稣的“灵召”而皈依基督，经过他的努力，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开来，成为一种“普世”的宗教。在此之后，基督教会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来，犹太的民族情绪渐渐冲淡，《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就是耶稣的门徒在外邦传教

写成的。

被压迫的人，在基督的感召下心心相印，造成一种潜在的反抗势力，对罗马帝国无疑是巨大的威胁。从公元 64 年罗马皇帝尼禄开始，到 305 年戴克里先为止，前后两百年中，先后发生了 10 次对基督教的迫害事件，在罗马帝国后期更动用国家机器实行严厉镇压。在此苦难的岁月里，基督教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主要成员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小商小贩、游民和奴隶。他们往往以神秘主义宗教思想为基础组成一种互助团体，过着共同消费的基督教公社生活，举行“圣餐”时把饼和酒拿出来大家共享，时刻记着“基督的身体和血”。教徒们以“鱼”做暗号保持联系，因为“基督”含有耶稣基督、上帝之子和救世主三层意思，而这三个词的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就是一个“鱼”字。十字架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一大标志，这不仅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而且具有“基督”、“拯救”、“赎罪”、“信仰”、“福音”多种含义，致使基督教成为“十字架信仰”的宗教。

残酷的迫害并没有把基督教扑灭，反而使基督教更加壮大，罗马帝国治下的被压迫者纷纷涌进基督教，把耶稣基督当作精神上惟一的寄托，希望通过信仰得到拯救。基督教的传播不仅在西亚和北非，而且传到了希腊、罗马，并日益取代了那里的多神信仰，连罗马贵族和官员也皈依了基督教。与此同时，基督教在四次“犹太战争”失败之后也改变了处世态度，要求教徒“忍耐”，避免因反抗而带来更多的苦难，于是由反对罗马政府转为“顺从”。到了帝国后期，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统治者看到镇压无济于事，基督教蔓延全国已不可遏制，转而利用基督教的“忍让”与“顺从”，采取扶植的政策，通过基督教维持统治。

公元 313 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联合发布《米兰敕令》，宣布承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禁止对教徒进行

迫害，从而化解矛盾，使基督教与罗马政府靠拢。325年，君士坦丁大帝亲自召开有3000名教士参加的“尼西亚公会议”，强行制定了统一的信条和教会法规，把基督教纳入政治轨道。在罗马统治者的扶植下，基督教摆脱了厄运而走向繁荣。此后，罗马政府颁布了法令，禁止非基督教的异教崇拜，甚至关闭罗马传统的神庙。公元392年，狄奥多西一世在宣布禁止向异教神祇献祭的同时，规定基督教为罗马惟一合法的宗教，这便是基督教成为“国教”的开始。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态度，由迫害转为扶植，这固然与帝国的兴衰有关，但由此也可看出宗教的二重性，它既是解救被压迫者心灵的宗教，又可成为统治者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在某种意义上讲，宗教的社会控制力可能超过政权的暴力，这便是后来欧美各国奉行基督教的重要原因。

基督教突破了国家、民族的狭隘界限，是它能走向世界的重要起点。罗马对基督教的扶植政策，使它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不但成为有合法地位的“国教”，而且为基督教走向世界提供了政治保障。然而，仅此两点还不足以使它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能走向世界的决定性原因之一，是它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给人以希望和生存的力量，给人以慰藉和心灵的解脱，它所宣扬的“平等、博爱、自由”思想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督教与地中海文明的结合，只有这种高文化的支撑，教义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宗教的感召力和感染力才能充分体现，在潜移默化中紧紧系住千百万人的心。基督教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吸收希腊、罗马文化，特别是成为“国教”之后与主流文化结合。首先，基督教神学与希腊、罗马哲学的结合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完成的，它始于埃及亚历山大学派的斐洛，而以罗马帝国后期的奥古斯丁集其大成。其次，随着传教范围的扩大，先后出现了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耶路撒冷等宗主教会，形成许多传教中心。其三，为了便于传教，使用希伯

来语已不适应，逐渐采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其四，希腊、罗马文化不断渗入基督教文化，在建筑、雕塑、绘画、音乐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基督教的教堂建筑凝结了希腊、罗马文化。早期的教堂是所谓“宅第教堂”，只是一个秘密举行仪式的场所，实际上是“地下教堂”。大约从 4 世纪上半叶开始出现“巴西里卡”式教堂：大厅平面为长方形，入口在西端，门前有一天井，四面围以回廊；大厅用两行柱子分隔，中殿两侧为侧廊，中殿设圣所和祭坛，后部为半圆形后殿，中殿与后殿之间交叉甬道；外墙无窗，光线从中殿上部窗口透入；中殿、侧廊为木架顶，后殿为拱形圆顶。最早修建的是罗马的拉特兰圣约翰教堂（公元 324 年建），属于“巴西里卡”风格的还有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圣保罗教堂等。从 5 世纪开始在东部出现了“拜占庭式”教堂，它实际上是“巴西里卡式”的改进型，加入了东方基督教风格。加洛林王朝时期，西部逐渐向“罗马式”过渡，9—12 世纪普遍采用“罗马式”风格。这种建筑仍为长方形教堂，但仿照古罗马凯旋门、城墙、古堡式样，采用罗马式拱券。其特点是石墙厚实、窗户狭小、半圆拱门、圆顶低矮、逐层挑出门框，上部为圆弧形拱环、交叉拱顶结构，大量使用立柱和拱券，典型的如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法国的卡昂圣艾蒂安教堂、德国的美因茨教堂、英国的达拉姆大教堂等。12 世纪以后在法国北部出现“哥特式”教堂，给人以伟岸挺拔、高耸入云之感，以高大、明快、豪华为特征，如巴黎圣母院。尽管建筑风格随着时代不断演变，但最基本的是在罗马城修建的“巴西里卡式”，最突出而影响最大的是“罗马式”，基调是希腊罗马风格。

希腊、罗马建筑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使用人量雕刻、绘画，并成为建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艺术风格在教堂建筑中充分表现出来。不过，无论是雕刻或绘画，在教堂中都非常注

意突出宗教主题，取材均以《圣经》的人物、故事为主，其艺术造型都具有象征、抽象、超越的意义，以“可见的”形象来表达宗教的信仰和激情，使人强烈感受到“不可见之上帝”的“存在”和“伟人”、“领悟灵性的真理”，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宗教意义和永恒不朽的艺术价值。雕刻虽有人物雕像，但更多的是大型浮雕，且构成某一《圣经》故事系列，并布置在墙壁、额板、立柱和祭坛上，这在“罗马式”教堂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例如法国莫伊萨克的圣皮埃尔修院教堂，正门上方是一壁《最后审判》的大型浮雕，处于中央的基督为灵光环绕，四周是福音书的象征图案，两边站着天使，下方为先知、长老及受福者和受罚者的群像。早期基督教因受犹太教反对偶像崇拜的影响，一般不注重绘画艺术，但在地中海文明的濡染下，逐渐用绘画来表达宗教信仰和感情，把基督传说融入“异域风情”之中。绘画强调“灵性”，采用象征手法，如十字架下的羔羊、牧羊人、鸽子、船、孔雀、心脏等等。一般采用壁画、镶嵌画或玻璃镶嵌画，拜占庭艺术中的镶嵌画和圣像画堪称一绝，如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的《圣母圣子与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大帝》、圣阿波利纳教堂的《殉教女圣徒行列》等等。总之，希腊、罗马的雕刻、绘画艺术在基督教建筑中得到运用和发挥，对后世的欧洲有深远影响。

西方音乐受基督教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基督教音乐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罗马音律影响。早期的基督教音乐来自于犹太教，以“唱诗”为主，后来根据《新约全书》的《福音书》创作了许多“福音颂歌”，如“感恩颂歌”、“降临节赞歌”、“圣餐乐曲”及“晚祷音乐”等。及至基督教转入公开活动以后，教堂音乐逐渐吸收帝国流行的音乐，形成以赞歌颂诗为主的独特体系，由两个合唱班相互唱答，被称为“安布罗斯颂调”。公元6世纪末，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主持编订了《格列高利颂歌谱》，简朴、优雅、动人，称为“格列高利歌调”，从此成为各地“教堂歌调”

的范本，流行千余年。9世纪以后又出现复调音乐，是一种以多声部重唱、合唱为主的赞美诗歌，用于基督教重要节日演唱，称为“奥尔加农”。在这里，“格列高利歌调”的出现是一个重要转折，基本音阶由 Sol、La、do、re、mi 五音构成，其特点是吟咏歌颂、单音无伴奏、节奏自由、无和声，歌词采用拉丁文的《诗篇》，演唱方式是独唱与合唱交互进行“对答”，有“弥撒曲”和“祷告曲”两类。

（二）拜占庭帝国与东正教

罗马帝国崩溃后分为东、西罗马，东罗马即中国史书上所说的“大秦”，因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古称拜占庭，所以习惯上把它叫做拜占庭帝国。这是一个地处欧、亚、非三洲结合部的国家，其疆域在地中海东部，包括埃及、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及巴尔干半岛。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到土耳其彻底摧毁特拉布松小朝廷为止，延续了千余年。它是罗马帝国的延伸，著名的“罗马法”形成于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堡号称“新罗马”。它是一个“基督教东方帝国”，基督教成为“国教”实际上是从拜占庭开始，东正教的形成和发展也与拜占庭帝国息息相关。这里既处在“新月形东方文化带”上，又是希腊文化长期传承与传播的区域，同时又是中亚游牧民族南下的大通道，文化现象复杂多样。从一方面讲它是“希腊化的帝国”，而另一方面则是“东方专制主义国家”。

1. 建立在地中海东部的拜占庭帝国

公元三四世纪之交，罗马帝国进入了它的晚期阶段。324年，君士坦丁在内战中打败了李西尼，成为惟一的独裁者，称为君士坦丁大帝。那时的罗马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辉，由于大庄园的

崩溃，工商业的衰落，贵族们的养尊处优和勾心斗角，加之“蛮族”不断侵挠，罗马城已是衰落不堪，地中海西部处于萧条。而地中海的东部，原先是古代东方和希腊文明兴起的地方，经过波斯帝国的经营和“希腊化”时代的发展，在罗马帝国后期经济、文化的繁荣已达到令人瞩目的情况，成为地中海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重心的转移，使罗马城失去了它控制地中海的作用，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君士坦丁决定放弃罗马城，迁都拜占庭，因其为“君士坦丁之城”，故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即今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堡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相交的地方，因水陆交通方便而繁荣起来。它是一座“金色桥梁”，不但沟通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而且是欧亚两洲的天然通道，是联通中亚、西亚、南亚、北非及中国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迁都后，君士坦丁决定按照罗马城的模式在这里修建新都，仍将城市分为七个区域，在城内修建宫殿、元老院、竞技场、剧场、公共浴池、供水渡槽、法庭、会议厅，并沿山修筑“君士坦丁堡长城”，谓之“新罗马”。政治中心的转移推动了城市的发展，经济蒸蒸日上，致使君士坦丁堡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富的城市”。新的中心建立，从此奠定了帝国分为东、西两大部分的历史格局。

君士坦丁实现了罗马帝国的暂时统一，在他统治的 13 年中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他最明智的举措，一是迁都拜占庭以摆脱政治上的困境，二是对基督教采取宽容扶植政策而得到人民的支持。在基督教史上，君士坦丁是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他的统治时期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界线。他停止对基督教的迫害活动，采取与基督教结盟，进而控制基督教的方针。公元 311 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君士坦丁与李西尼共同颁布《宽容敕令》，允许基督教信仰自由。313 年，他又与李西尼共同签署了《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并保护教会财产。

他称帝后更大力扶植基督教，下令禁止异教崇拜和祭祀，政府官员多由基督教徒担任，促使基督教向官方宗教转化。为了解决基督教内部的纷争，把基督教纳入政府控制的轨道，他于 325 年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召开了主教会议，成为基督教会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会上制定了《尼西亚信经》，统一了“三位一体”的神学观点。公元 337 年君士坦丁去世，他的后继者朱利安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政策，但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到革拉先皇帝时又继续君士坦丁的政策，公开宣布不再担任罗马神庙的最高祭司，实际上是否定罗马原先的宗教祭祀而推崇基督教。狄奥多西是对基督教具有决定意义的“护法王”，他两次下令禁止基督教以外的异教活动，并于 380 年宣布全国都要“遵守使徒彼得所交与罗马人的信仰”，从此基督教便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朱利安死后，军事首领瓦伦第安、瓦伦斯兄弟并称皇帝，瓦伦第安统治西部，瓦伦斯统治东部。379 年，罗马皇帝格拉第安委任司令官狄奥多西为东罗马皇帝，后来格拉第安被杀，狄奥多西力图统一罗马。395 年，狄奥多西临死前任命长子阿克第驻君士坦丁堡为东罗马皇帝，次子荷拉留驻罗马为西罗马皇帝，从此正式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大迁徙的冲击下，西罗马受到巨大侵扰，公元 476 年日耳曼雇佣兵灭亡了西罗马帝国。与此相反，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却在“一个国家，一部法典，一个宗教”的方针下日益强盛，成为控制地中海东部的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延续了罗马帝国的政体，从皇帝到臣民都自认是“罗马的后裔”。最重要的是继承了罗马的法制，著名“罗马法”实际上是查士丁尼时代成熟的。这一时期制定了《查士丁尼法典》，编纂了作为法学理论基础的《法学汇编》和《法学阶梯》，以后又制定了《法令新编》，合称《民法大全》。查士丁尼极力恢复罗马的统一，远征北非，登陆西西里，灭亡东哥特王国，占领了西班牙、科西嘉和撒丁岛，大有“复兴”之势。然而辉煌的战

果并不能掩盖帝国的虚弱，公元 565 年查士丁尼在内外交困中死去，恢复大帝国的美梦终于在历史潮流中破灭。

查士丁尼以后，拜占庭帝国累受侵挠。对拜占庭威胁最大的是新波斯帝国，两国为争夺地中海和黑海商路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611 年波斯军攻入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围攻君士坦丁堡，并在耶路撒冷夺走了基督教的圣物“真十字架”，激起了一场圣战，结果波斯失败，双方谈判交换占领地。正当两帝国苦苦鏖战的时候，阿拉伯国家兴起，号称“安拉之剑”的哈立德率骑兵侵入拜占庭帝国，占领大马士革、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把拜占庭压缩到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阿非利加和西西里。阿拉伯倭马王朝建立后，对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展开攻势，对君士坦丁堡发起进攻，拜占庭使用“希腊火”烧毁了阿拉伯舰队，迫使倭马王朝停战言和，签订了 30 年和平条约。这个和约大体确立亚欧交界处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分界线，拜占庭也因此而享有“基督教世界东方前哨”之誉。

公元 717 年人民推翻了希拉克略王朝，护戴将军利奥三世称帝，建立伊苏里亚王朝，阻止了阿拉伯人的进攻，一度强盛起来。伊苏里亚王朝时期，掀起了一个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破坏圣像运动”，在反对偶像崇拜的口号下夺取教会财产，使教会屈服于军人的统治。867 年瓦西里夺取政权，建立马其顿王朝，与阿拉伯的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取得了对保加利亚战争的決定胜利，并重新审定《帝国法典》，又出现一个短暂的辉煌。但瓦西里死后又陷入混乱，皇位走马灯式地更迭，终于在 1001 年为科穆宁王朝取代。科穆宁王朝利用“十字军东征”之机，企图收复东方领土，遏制塞尔柱人的侵犯，在 12 世纪初一度控制小亚细亚，但 1185 年被人民推翻了。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拜占庭成了牺牲品，以进攻埃及为名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建立依附罗马教皇的拉丁国家。与此同时，科穆林家族在特拉布松建立王国，安吉

利家族在伊庇鲁斯也建立一个国家。时值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政权兴起，1356年进入巴尔干，1390年进入多瑙河流域，拜占庭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孤城。1453年君士坦丁堡终于被土耳其攻破，1460年征服了伯罗奔尼撒，次年摧毁了最后一个小朝廷——特拉布松朝廷，结束了拜占庭帝国的历史。

2. 自认是“正统”的东正教

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也分化为东、西两大教派。西部教会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或“加特力教”，它源于希腊文 *Katholikos*，意思是“普世的”、“大公的”，因其在信奉天主圣父、圣子、圣灵之外还崇奉圣母玛利亚，所以中国人把它叫做“天主教”。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认是保持传统教义的正宗教会，因其“正统”而又在东部，故称“东正教”。造成教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争夺基督教的最高领导权，它是政治斗争折光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地中海东、西两大部分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西部教会强调罗马的第一任主教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彼得，应当是名正言顺的最高领导者。而东部则强调君士坦丁堡教会才有资格领导基督教，因为君士坦丁堡大帝被奉为基督教的“第十三使徒”和“第一位圣者”，对基督教具有决定意义的“护法王”是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

东、西两大教派的纷争从四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中叶才最后决裂。先是东部教会在拜占庭帝国皇帝支持下派出传教士团四处传教，不仅抢占了原先为西部教会控制的马其顿、西西里、伊利利亚、费萨利亚、达达尼亚，而且还在摩拉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大肆活动，致使矛盾日趋尖锐。343年，罗马主教朱列亚一世以统一基督教教义为名，在撒狄卡召集会议，重申“尼西亚信经”为“正统信条”，并斥阿利乌派为异端；而东方教会则在费列波列斯举行会议与西方教会对抗，支持阿利乌派，这

是第一次明显分歧。445 年，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授予罗马主教有传召其他主教的特权，罗马主教于是自封为整个基督教的惟一首脑；而拜占庭皇帝马西安却在查尔斯顿召开第四次公会，规定君士坦丁堡主教同罗马教皇在教务上有同等权利。595 年，君士坦丁堡主教自称是“普世主教”，而罗马主教格里高利则重申只有彼得信徒的罗马主教才能享有最高主教的称号。858 年，拜占庭皇帝米歇尔三世任命佛提乌为君士坦丁堡主教，罗马教皇拒绝承认，这就是所谓“佛提乌分裂”。到了 1054 年，君士坦丁堡主教凯鲁拉里指责罗马教会违反传统教义、教仪，罗马教皇则派红衣主教绝罚凯鲁拉里，而凯鲁拉里召开会议宣布革除罗马教皇及其使者的教籍，东、西两派断绝往来。11 世纪中叶，罗马教皇利奥九世夺取了君士坦丁堡管辖的南意大利教区，终于导致东、西教会决裂。

顾名思义，东正教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正统”，即坚持早期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恪守《尼西亚信经》的基本原则和前七次大会会议的决议，特别强调“救赎论”和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奉行圣礼（洗礼）、坚振（坚信礼）、告解（忏悔）、圣体（圣餐）、终傅（涂圣油）、神品（授职礼）和婚配（除主教外神职人员可以结婚）等七件圣事，因而具有很大的保守性。与此相关，它强调与神交通的神秘意义和礼拜的神圣气氛，要求教士成为神秘的祈祷者和苦修者，终身过隐修生活，教士穿着十分醒目，教堂布置庄严、华丽，仪式隆重肃穆，使参加者陶醉在圣乐、圣歌之中。坚持传统教义、教仪，注重与神交通的神秘感和礼拜的庄严、华丽气势，集中体现了它的保守性。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东方文化传统深厚，另一方面是早期基督教最先在这一地区传播而造成深刻影响。

东正教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对国家权力有极大的依附性，而皇帝与国王直接控制教会，所以，马克思

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征，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东正教从一开始就是在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下形成的，教会牧首的任免，主教会议的召开，乃至宗教会议决定的批准及对教义的解释，都取决于皇帝。在这一总的框架下，东正教的各个正教会都仿此办理，各自依附于本国的政权，成为东方专制主义者的御用宗教。俄罗斯正教最为突出，教会不但屈服于沙皇，而且神化沙皇。

东正教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像天主教那样有统一的教会中心和教皇，教会各自独立，出现许多中心。起初形成的是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四大教区，主教们为了争夺牧首的地位经常展开争斗，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后在此四大教区的基础上发展为四个正教会，虽然在拜占庭帝国的支持下，君士坦丁堡主教享有“至圣主教”和“普世牧首”的尊号，但并没有统一东部各教会，其他三个正教会仍然继续保持独立。后来，东正教向外扩大传播，越出了拜占庭帝国的境域，新建立的正教会也沿袭这一传统，分别依附于所在国家的政权，因而出现了更多的正教会。君士坦丁堡教会毕竟有拜占庭帝国为后盾，在东南欧和东欧迅速传播，由此分离出来的正教会最多，其次是安提阿正教会分出来的新正教会，但都与原先的教会没有宗主关系。

东正教实行牧首制，以牧首领导和管理教会组织，这种制度直接继承了早期基督教会的组织形式，渊源于四大教区，在神职人员的“神品”（教阶）上仿照世俗官阶制度。神品分为黑白两种：行过剪发仪式、当过修道士、不结婚的神职人员穿黑袍，称为“黑僧侣”，有资格升为主教以上高级神职人员，称号前加“修士”二字；可结婚的神职人员称为“白僧侣”，称号前不加“修士”，不能晋升主教。黑神品有牧首→都主教或督主教→大主

教→主教→修士大司祭→修上司祭→修士大辅祭→修上辅祭→修士；白神品有司祭长→大司祭→司祭→大辅祭→辅祭→副辅祭→诵经士。

东正教在宗教仪式中以希腊语为主，故有“希腊正教”之称。一般采用“儒略历”，主要节日有 12 个：主领洗节，亦称主显节或显现节，纪念耶稣显灵；主进节亦称献主节；圣母行洁净礼节，纪念圣母将圣婴耶稣献给上帝；圣母领报节亦称天使报喜节，纪念圣母玛利亚“圣灵感孕”生耶稣；圣三主日亦称三位一体节；主显圣容节亦称耶稣显圣容日；圣母安息节亦称圣母升天节；圣母圣诞节；举荣圣架节，纪念君士坦丁大帝及其母皈依基督教；圣母进堂节亦称圣母献堂瞻礼节；圣诞节亦称主降生节；主进圣城节，纪念耶稣最后一次骑驴进耶路撒冷；主升天节亦称耶稣升天节；此外还有复活节，圣灵降临节、耶稣受割礼日等。从节日上可以看出，东正教受传统影响很深，特别崇拜圣母和耶稣基督，并感激君士坦丁大帝。

东正教向外扩大传播是从 9 世纪中叶开始，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同罗马教皇相抗衡，传播的主要对象是斯拉夫民族。使用斯拉夫语的民族分为三支：居住在中欧西部的称西斯拉夫，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波兰；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称南斯拉夫，包括保加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等；居住在东欧的称东斯拉夫，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东正教首先进入巴尔干半岛及黑海岸边，将塞尔维亚、保加尼亚、格鲁吉亚纳入势力范围，与天主教平分秋色，大体在多瑙河以南属东正教，多瑙河以北属天主教。10 世纪以后传入东斯拉夫民族，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先后皈依东正教。在南斯拉夫的传教活动受到德意志的抵制，但操罗曼语的罗马尼亚人信奉东正教。到了近代，东正教又传到中国、朝鲜、日本及西欧、美国。全世界有 16 个东正教会，它们是：君士坦丁

保正教会、亚历山大里亚正教会、安提阿正教会、耶路撒冷正教会、塞浦路斯正教会、塞尔维亚正教会、罗马尼亚正教会、希腊正教会、保加尼亚正教会、阿尔巴尼亚正教会、波兰正教会、捷克正教会、斯洛伐克正教会、美国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俄罗斯正教会。另有芬兰和日本两个自治正教会。东正教的教徒约 1.5 亿人，主要在东欧和东南欧，其次是西亚和北非，以俄罗斯最多，信徒约 8000 万人。

3. 在“东方基督教”框架下的拜占庭文化

拜占庭帝国是东方文化的一片沃土，这里有二千多年的文化积淀，融汇了埃及、巴比伦、希伯来、腓尼基、波斯诸种文明。拜占庭帝国又囊括了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是直接受希腊文化哺育的区域，在希腊化时代扩散到西亚和北非。作为罗马帝国延伸的拜占庭帝国，显然深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十字军东征期间又再次被卷入“拉丁化”浪潮。斯拉夫人、保加尼亚人、塞尔柱人、塞尔维亚人、诺曼底人的介入，又给拜占庭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加入了“蛮族”的异质文化。然而，在这个“东方基督教国家”中，随着基督教成为“国教”和东正教的形成，各种文化都被纳入这一总的框架，经过接触、碰撞、渗透、交融之后，最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拜占庭文化。这种文化高扬着基督教精神的主旋律，又兼有多种文化交融的特征，既有别于古代东方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又有别于欧洲中世纪文化。

拜占庭文化的形成，发端于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从君士坦丁大帝到狄奥多西是一个转型时期，在此期间起了两大变化：一方面是基督教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另一方面是在“新罗马”的旗帜下进一步使罗马文化在东方扩散。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转化为“希腊化中世纪帝国”，在文化上形成了与地中海西部显然不同的“拜占庭风格”，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雕塑等方

面都展现出新的风貌。7—9 世纪累遭“蛮族”侵挠，文化受到较大摧残，进入了“黑暗时代”。“破坏圣像运动”虽然有破坏的一面，但客观上却为世俗文化、民间文化拓展出较大空间。马其顿王朝再次振兴拜占庭文化，沿着宗教与世俗两条道路并列发展，构成了拜占庭中世纪文化的典型特征。之后进入了一个文化交融时期，希腊文化、拉丁文化、斯拉夫文化、日耳曼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在这个国度里回旋激荡，在帝国末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可谓是拜占庭文化的“回光返照”。

希腊字母是欧洲文字的母亲，它在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地区和小亚细亚一带广为传播，并衍生出小亚细亚、吕底亚等多种文字，君士坦丁堡处在这一区域自然深受影响。东正教在形成过程中，传教多采用希腊语，致使希腊文字随着宗教传播而扩大使用范围，大致在查士丁尼时期，希腊文在官方文书中已取代了拉丁文。9 世纪中叶以后，东正教传到斯拉夫民族中，为了传教的方便，教士们以希腊字母为基础，结合斯拉夫语言的特征，创制了两种斯拉夫字母：一种是以希腊草书为范本的格拉哥里字母，另一种是以希腊楷书为范本的西里尔字母。格拉哥里字母流行一段时间之后便趋于没落，而西里尔字母则因其字体简便而日益盛行。西里尔字母共 43 个，其中有 25 个近似于希腊字母发音，而有 18 个字母是斯拉夫语发音。斯拉夫语音中有硬元音和软元音的区别，西里尔字母用两个希腊字母加一横线表示连读，拼合而成新的字母。它又补充了新的辅音字母，借用了 3 个希伯来字母。在往后的流传过程中，“字母跟着宗教走”，操斯拉夫语的民族先后用这种字母创制本民族文字，以俄罗斯文字影响最大。

在拜占庭帝国境内，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及雅典、爱菲斯等，它们一度是“希腊化”的城市，又在拜占庭时期变而为“新罗马”城市，成为东正教的传播中心和文化中心，在拜占庭文化形成中起重要作用。为了打击“异教”

活动，查士丁尼关闭了雅典教育中心——雅典学院，而君士坦丁堡却一跃而为文化中心，在高等学府中开设希腊语、拉丁语和修辞学，还附设一个有 12 万卷书的图书馆。亚历山大里亚自希腊化时代就成为一个文化中心，在拜占庭时期仍然昌盛，它不但有著名的高等学府，还形成了“亚历山大学派”，基督教神学与希腊哲学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盛行新柏拉图主义，相继出现了亚历山大里亚—罗马学派、叙利亚—帕加马学派、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等。在神学问题上，不但东、西两教派争论激烈，而且东正教内部也争论不休，亚历山大和安提阿之间的论战最为突出。

拜占庭的史学特别发达，17—18 世纪德国和法国学者把拜占庭帝国的史书汇集而成巨型丛书，有人认为它可与中国的“二十四史”相提并论。拜占庭的史家有相当一部分是神职人员，他们把基督教精神贯穿于史书之中，著名的教会史学家犹西比乌斯主教就是重要代表，他写了《君士坦丁大帝传》和《基督教会史》，被称为“基督教会史之父”。马其顿王朝时代的史家多是教职人员，他们在关注宗教历史的同时也关注帝国政治，如约瑟夫、吉尼西乌斯、利奥、萨洛尼卡等，还编纂了 813—961 年的拜占庭编年史。另一部分史家是非基督教士，大多数是王室贵胄和宫廷官员，他们坚持罗马著史古风，以记述政事、人物为主，普利斯库斯的《拜占庭历史》大概就是这类史书的开创之作，查士丁尼时代的普罗科匹厄斯留下了三部著作，《战史》和《论建筑》主要是歌颂查士丁尼和贝利撒留，而《秘史》则饱含辛酸揭示这两个风云人物的人格和精神面貌，反映社会的危机。

在基督教精神的渗透下，文学成为“圣者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4—6 世纪基督教文学迅速发展，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希腊教父圣瓦西里、圣格里哥利、西里尔、狄奥多里特等，他们用基督教的眼光重新审视希腊文化遗产，“言必称《圣经》”，“言必称希腊”。赞美诗是主要的文学形式，诗歌从《圣经》和希腊作品

中找到灵感，具有简短、优雅、动人、韵律整齐的特点，诗句轻盈、优美。罗曼努斯是东方基督教的著名诗人，被称为“最伟大的宗教天才”，甚至有人把他说成是“新希腊的但丁”。描写修士和圣者生活的作品层出不穷，约翰·克利马库斯的《圣灵的阶梯》和约翰·莫斯库斯的《圣灵的草地》流传很广。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司乔治·比希迪亚用短诗句写的《希拉克略皇帝远征波斯记》、《阿瓦尔人攻击君士坦丁堡记和圣母显灵后他们的失败》和《希拉克略皇帝》都颇有影响，《六日》是一部“创世纪”的神学长诗。在城市工商业的推动下，世俗文学也有发展，早先的作品主要是谚语集、逸话集、寓言集、名言录、诗集之类，后来传记文学渐成主流，民间叙事诗以《瓦西里·锹吉尼斯·阿克里特》为代表，少有自传体、回忆录和小说等作品。

建筑和雕塑艺术成了“神学的附庸”，教堂集中体现这一特点。拜占庭风格与东正教密切相关，谓之“拜占庭式”，以后在斯拉夫民族中又与罗马式风格结合而演化出“斯拉夫式”。拜占庭艺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影响遍及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及俄罗斯部分地区。拜占庭式教堂是罗马流行的“巴西利卡”教堂结构的进一步发展，在布局上沿袭其“集中式”和“十字形平面”的传统，而以穹窿形屋顶和独立支柱上加帆拱为特色，其典型建筑是 532 年在君士坦丁堡修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座教堂有一个直径为 33 米的大圆顶，它由 4 根支柱和 4 个大圆拱支撑，圆顶下面是一圈透光窗口，使教堂产生一种奇特的采光效果，庄严、明净而肃穆。雕刻绘画占有重要地位，增加教堂的华丽感和艺术感染力。镶嵌画独树一帜，色彩明快，造型生动，代表作品如索菲亚大教堂中的《圣母子与君士坦丁和君士坦丁大帝》、拉文纳圣维塔里教堂中的《查士丁尼及其随从》，还有旧港圣阿波利纳教堂中的金星十字架、飞翼天使和 12 只羔羊等。圣像画极为突出，在“破坏圣像运动”之后流行一种木板上

的蛋胶画，它是由古希腊肖像画演变而来，内容以圣母为主，线条明快，构图简洁，着色深厚，神态温良慈祥，名作如《符拉基米尔圣母》。

“斯拉夫式”是“拜占庭式”的衍生物，在拜占庭艺术的基础上加上罗马风格，流行于斯拉夫地区，以俄罗斯成就最高。它因源于“拜占庭式”，故有“仿拜占庭式”或“晚期拜占庭式”之称。斯拉夫式教堂，多为穹窿顶或八角形加圆顶，有罗马式的厚重感，在整体布局和屋顶设计上另有创新，显示独特风格。它以多层圆顶形成大小不一的蘑菇群状，顶端是立有十字架的圆塔或半圆形金顶，有的饰以洋葱式或椰壳式建筑，比拜占庭式更加华美。属于这一类的教堂，早期的如基辅的索菲亚大教堂和诺洛哥罗德的索菲亚大教堂，最典型的是 1479 年修建的沃洛科拉姆斯基约瑟夫修道院教堂和 1475 年修建的莫斯科圣母升天大教堂。17 世纪以后受西欧风格影响将巴洛克风格引入斯拉夫式门洞建筑中，还引入了钟楼。建筑与雕塑均成一体，著名的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人教堂尖塔上的“有翼天使”雕像。绘画以圣像为主，比拜占庭式圣像更富有人情味，且不限于圣母像一种，如莫斯科天使米迦勒教堂的“大天使米迦勒圣像”。

总的说来，拜占庭是联系东方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的一条纽带，在地中海文明形成中占有特殊位置。由于东正教坚持“正统”，继承多于创新，在这里，希腊的古典文化找到了它生存的土壤，成为“希腊化”的另一种特殊形式，因而较多地保存希腊文化的因素，正是因为拜占庭文化较多地继承了希腊传统，所以成为后世“学习古典”的一个重要门径，对欧洲“文艺复兴”起到推动作用，无异乎是架在“古典”与近代欧洲文明之间的一座桥梁。

4. 俄罗斯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

俄罗斯属于东斯拉夫的一支，9世纪时尚信奉较原始的多神教。自基督教在斯拉夫民族中传播以来，9—10世纪之交传入俄罗斯，建立了基辅的伊利亚教堂，基辅女大公奥丽加及其子斯维亚托斯人公先后皈依了基督教。大约100年后，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了东正教，于988年接受东正教大主教施行的洗礼，不久宣布为国教，借以提高大公的权威，实现国家的统一。所以马克思说：“弗拉基米尔把北方征服者的军事统治同拜占庭皇帝后裔的神权专制制度合为一体，从而同时成为他的臣民在地上的主人和天上的庇护者。”东正教自传入俄罗斯起，就被统治者视为精神支柱和统治工具，加之东正教服从拜占庭帝国的传统，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文化有密切关系，影响俄罗斯的全局，世俗政权与宗教首领之间的斗争贯穿着俄国的中世纪。

在10—13世纪的基辅罗斯时期，东正教逐渐发展，但罗斯教会只是君士坦丁堡牧首下的一个都主教区，都主教及高级神职人员是希腊人，教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是平列的，国家支持教会，教会听命于君士坦丁堡牧首。11世纪初，雅罗斯拉夫为大公，编制了一部法典——《雅罗斯拉夫真理》，创办了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的学校，建造了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设立了罗斯第一个图书馆和第一个修道院——基辅洞窟修道院，加快把希腊文译成罗斯文，并任命罗斯人伊拉利昂为主教。大约在13世纪末，基辅罗斯分解为10多个独立的小公国，莫斯科公国便是其中之一。1223年蒙古军西征，许多王公都俯首称臣，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于1243年在罗斯的土地上建立金帐汗国，对东正教实行保护政策。

1439年，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在佛罗伦萨开会和解，俄罗斯东正教会在莫斯科大公支持下予以抵制，并于1448年自行召

开主教会议，自选都主教。奥斯曼土耳其灭拜占庭帝国后，君士坦丁堡牧首已无法控制俄罗斯东正教。1480年俄罗斯大公伊凡三世起兵反抗蒙古军，不久结束了蒙古人的统治。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自称“统治全俄罗斯领土的君主之君主”，宣称“君主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莫斯科是世界东正教的中心”、“莫斯科是第三罗马”。1589年俄罗斯正教会独立，号召俄罗斯人民服从沙皇统治。1653—1665年，牧首尼康实行宗教改革，修订《圣经》俄译本，统一教仪，教会势力增大，与沙皇政权发生冲突，尼康被革职、流放。18世纪初，彼得大帝颁布宗教管理条例，取消牧首制，成立主教公会总管全国宗教，宣布东正教为国教，从此教会就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沙皇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宗教领袖。十月革命后，教会同国家分离。

东正教与俄罗斯的关系极为密切，它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封建制度的形成，在沙皇时代成为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东正教的传播，俄罗斯有了文字、学校和图书馆。俄罗斯文学的兴起也深受东正教影响，18世纪和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一席。随着拜占庭文化的传入，俄罗斯的音乐、美术、建筑都起了明显变化，俄罗斯人的婚育、丧葬习俗也在东正教思想的规范和影响下形成。

在东正教传入以前，俄罗斯因没有文字，流行的基本上是口头文学，内容虽然丰富，但毕竟处于初级阶段。俄罗斯书面文学的出现，大约是在10世纪末及11世纪初，即西里尔字母流行和“罗斯受洗”之后。从11世纪到17世纪，俄罗斯主要是宗教文学，它在拜占庭宗教文学的影响和熏陶下形成，以宣扬教义为目的，有明显的教诲性，其体裁主要是圣徒传、编年史、讲话、朝圣记等，尽管没有惊人之作，但它开启了俄罗斯文学的先河。到了18世纪，在宗教改革后文学艺术开出了花朵，在西欧启蒙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俄罗斯文学繁荣起来。这一时期，启蒙思想与

宗教思想兼容又相矛盾，出现了古典主义鼻祖康捷米尔、宫廷诗人杰尔沙文、“勇敢的讽刺之王”冯维辛、伤感主义作家卡拉姆辛，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当推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9世纪俄国文学进入了辉煌时期，杰出作家犹如雨后春笋，著名的作家如大寓言家克雷洛夫，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茹科夫斯基，大诗人普希金，天才诗人莱蒙托夫，“俄国散文之父”果戈里，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柯夫等。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品，普希金的诗歌使俄罗斯文学跻身于世界的前列，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引起世界关注，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小说轰动一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使他获得世界声誉，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都是世界名著，契柯夫的小说也登上文学高峰。在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宗教的态度明显分歧，茹科夫斯基、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对东正教信仰虔诚，而其他作家对宗教持不同态度，其主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但宗教对世俗文学仍有影响。

俄罗斯音乐自来发达，以其深沉浑厚的特有风格称著于世。尽管民间音乐活跃而且普遍，但十月革命前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东正教音乐。它来源于拜占庭教会歌咏，吸取了俄罗斯民间音乐成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会歌咏曲调体系——“八调歌法”，歌词来自于拜占庭颂诗与经文，部分为俄罗斯教士创作。在17—18世纪，教会音乐曲调部分融入世俗音乐之中，例如多声部诗体曲调“坎特歌”；一些教会音乐团体逐渐转变为世俗乐团，如宫廷唱诗班后改为宫廷合唱团。彼得大帝改革后，引进西欧音乐，在宫廷上演歌剧，以乐队为舞蹈伴奏，推广钢琴和小提琴，创立俄罗斯全唱形式。18世纪处于模仿西欧阶段，到了19世纪

便进入了成熟阶段，把西欧音乐体裁、曲式、技巧、乐器、唱法同民族传统结合起来，出现了许多杰出的音乐家，如格林卡、达尔哥梅什斯基、谢洛夫、柴可夫斯基等。

俄罗斯的美术长期受拜占庭艺术影响，在 10—12 世纪主要流行木板圣像画、圣像湿壁画、镶嵌画和雕塑，以后形成了富丽堂皇的基辅绘画风格，还出现吸收民间画技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画派。直到 14 世纪中叶，拜占庭画师仍起主导作用，并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自己的卓越画家，形成诺夫哥德—普斯科夫画派和莫斯科画派，在 15 世纪把圣像画推到高峰。16—17 世纪，画家们用圣像画的技艺作肖像画，形成所谓“巴尔松纳肖像画”，北部画派也将圣像大众化而靠近世俗，并兴起壁画和油画，18 世纪开始以世俗画为主流，但有时仍借宗教人物和故事表现世俗思想。彼得大帝改革后受着西欧美术的强烈影响，“巴罗克”和“洛可可”风格兴盛一时，还创办了彼得堡美术学院，于是涌现了一批俄罗斯画家和雕塑家。19 世纪，俄罗斯美术进入了新的时期，在民族意识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潮下，产生许多优秀作品，如马尔托斯的纪念碑和雕塑、吉普林斯基的普希金肖像、勃留洛夫的油画《基督显示》、阿金为果戈里《死魂灵》所作的 100 幅插图等。巡回展览画派把俄罗斯美术推向高峰，画家们走出象牙之塔漫游各地，产生了大量富有新意和概括力的现实主义作品，克拉姆斯科依、列宾、苏里柯夫、瓦斯涅佐夫、萨符拉索夫就是这一画派的代表人物。

俄罗斯的建筑极富特色，原先是以木屋为主，所以说“城市不是建成的，而是砍出来的”。在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下，从 10 世纪开始兴起石构建筑，主要是教堂、宫殿和官邸。11 世纪出现了俄罗斯教堂特有的风格——饱满浑圆、富有生气的葱头形穹顶。1037 年在基辅修建的索菲亚大教堂是早期的典型，它雄伟壮观，结构紧凑，教堂正对广场，四周有走廊环绕，墙厚窗小，

东面有 5 个半圆形圣坛，上有拱顶覆盖，并冠以 13 个高低不一的穹窿顶，内壁有大理石浅浮雕、镶嵌画和湿壁彩画。12 世纪以后石构建筑增多，出现了白石修建的德米特里耶大教堂，还有被称为“战盔式穹顶”的圣母安息大教堂。16 世纪俄罗斯国家形成后，民族意识增强，出现阳墩式、帐篷式教堂，基座宽阔而屋顶峭拔，犹如一座纪念碑，莫斯科近郊的耶稣升天堂就是代表，被称为“奇迹中的奇迹”。19 世纪受西欧巴洛克式风格影响，建筑宏伟富丽、新奇夸张、富于动感，且广泛使用红砖、陶砖和釉带，装饰细致而艳丽，被称为莫斯科巴洛克式或纳雷什金式。18 世纪世俗大型建筑增多，彼得堡城就是按西欧古典式和巴洛克式修建的，布局为中轴线对称，主次分明，端庄稳重，气势宏伟，耸立着高大的钟塔，还有夏宫和冬宫，享有“俄罗斯的凡尔赛”之誉。19 世纪的建筑综合各种风格，最著名的就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宗教对戏剧的影响远不如文学艺术，世俗题材一直占着上风。俄罗斯有古老的民间“百戏艺人”，表演歌舞、说唱、驯兽、杂技、木偶，但常遭教会禁止。18 世纪开禁以后，出现了被称为“巴拉甘的戏班子”，除上述各种民间戏剧外，还有简单的喜剧、哑剧、历史剧和外国戏，剧中常有大力士、高长人和侏儒。17 世纪一度流行宗教戏，大都是将《圣经》故事戏剧化。18 世纪盛行话剧、歌剧和芭蕾舞剧，还有“拉洋片戏”（西洋镜），传统的木偶剧也得到巨大发展，艺术水平在世界上领先。19 世纪俄罗斯戏剧臻于成熟，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民族特色鲜明。普希金成功地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与俄国文学结合起来，创作了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是一个重要界碑，使俄国戏剧跻身于世界之林。契柯夫创造了社会心理抒情话剧，写了《伊凡诺夫》、《海鸥》等剧本。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演员，如谢普金、莫恰诺夫等。戏剧最发达的是雅罗斯拉夫

尔、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彼得堡的俄罗斯歌剧喜剧院和莫斯科大剧院都很著名。

俄罗斯的民间舞蹈生动活泼，充满朝气，受东正教的影响较少。传统舞蹈中，小白桦舞久负盛名，女子轮舞富有抒情性，卡玛林斯卡雅舞欢快热烈，哥萨克舞活泼豪放，卡德利特舞、彼列普里亚斯舞、芭勒娘舞、乌克兰舞都各具特色。17世纪从法国引进了产生于意大利的芭蕾舞，到彼得大帝时在宫廷流行，叶卡杰琳娜二世时迅速发展，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建立芭蕾舞团，许多法国人师来俄国传授舞技。19世纪影响最大的是法国芭蕾舞家佩蒂帕，他在俄罗斯工作50多年，编导了60多部芭蕾舞剧，如《天鹅湖》、《堂·吉珂德》、《睡美人》、《吉赛尔》、《仙女》等，使芭蕾舞的古典风格和结构复杂化、多样化、固定化，被誉为“古典芭蕾之父”。芭蕾舞在俄罗斯受到重视，加上法国舞蹈家与俄国音乐家、美术家的通力合作，到19世纪下半叶臻于完美，涌现了大批芭蕾舞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东正教是俄罗斯普遍的信仰，因而在节日中有相当多的是基督教节日，最盛大的是复活节、圣诞节、主领洗节。在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下，婚姻、生育、丧葬习俗都有明显的宗教意味。婚姻年龄由东正教规定，婚礼在教堂举行，男女婚事不能自主。婴儿出生后第八天在教堂受洗礼，认定教父和教母，所以自幼便是东正教徒。人在临终前须请神甫涂油并举行临终忏悔，希望死后灵魂升天。下葬前遗体在教堂停放数天，一般葬于教会墓地，送葬人穿黑衣、戴青纱、唱悼歌，神甫诵经文。悼念亡灵往往在宗教节日，特别是圣诞节前一天，谢肉节最后一天，复活节后第一周。

（三）天主教与西欧中世纪

天主教是罗马帝国分裂后逐步形成的西部教派，自称“加特

力教”，因 Catholic 含有“普世”与“大公”的意思，故称“公教”。为了与后来兴起的基督教新派相区别，有时也把它称为“旧教”。“公教”与“正教”在争夺领导权和势力范围上发生冲突，在教义和礼仪上争论不休，终于导致决裂。天主教不像东正教那样分散，而是统一在罗马教皇的领导下，且教权高于政权，左右欧洲形势。正当东、西教派斗争之时，伊斯兰教骤然兴起，宗教冲突、文化冲突、政治冲突、经济冲突交织在一起，爆发了绵延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天主教最初主要盛行于欧洲西部，对西欧中世纪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1. 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分歧

东、西两大教派的分裂，从表象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对教义的某些解释各执己见，教规、教仪有所差别，但在表面文章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原因。文化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东部教派以希腊语传教，西部教派以拉丁语传教，本身就说明东部和西部所受的文化濡染不同。再深入一层看，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是因为地中海的经济重心已移向东方，“东盛西衰”已见分晓。基督教成为国教是在 392 年，而东、西罗马的分裂是在 395 年，一开始就潜伏着分裂的危机。拜占庭帝国延续了千余年，而西罗马帝国仅存在 81 年便寿终正寝了，这更加深了东、西两部分的不平衡。东部教派有拜占庭帝国做后盾自然要以“正统”的姿态出现，而西部教派则以“彼得的继承者”自居，于是在争夺教会领导权的问题上相持不下，暗斗终于变成明争，趋于表面化。以后的斗争，事实上是围绕着势力的扩张展开，最后在 1054 年彻底决裂。

应当说，在 8 世纪以前，东、西两大教派虽有纷争，但在基本问题上仍有共识，所以，第一至第七次大公会议无论是东正教或天主教都是承认的，东正教把这七次大会的决议奉为经典，天

主教也高扬“普世性”精神。所谓“大公会议”，是指基督教的世界性主教会议，前 7 次都是由罗马皇帝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是 325 年的“尼西亚会议”，由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会议地点是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尼西亚信经》强调圣父、圣子同性同体。第二次是 381 年的“第一届君士坦丁堡会议”，由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召集，确认《尼西亚信经》，并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第三次是 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由狄奥多西二世召集，宣布耶稣基督有人性和神性，尊玛利亚为圣母，并宣判聂斯托利为异端。第四次是 451 年的“查尔西顿会议”，由拜占庭皇帝马西安召集，强调基督“一位两性”。第五次是 553 年的“第二届君士坦丁堡会议”，由查士丁尼一世主持，强调圣灵从圣父和圣子而来。第六次是 680—681 年的“第三届君士坦丁堡会议”，由君士坦丁四世主持，确立“道成肉身”的观点。第七次是 787 年的“第二届尼西亚会议”，由伊丽娜女皇召开，谴责“破坏圣像运动”，制定 22 条教规。

公元 857 年，拜占庭皇帝米海依尔三世将不服从他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依格纳提乌废黜，另立佛提乌为牧首。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极力反对，于 863 年在罗马召开会议，宣布佛提乌为非法牧首，将其革除教门。这一举动激起东部教派的不满，佛提乌在拜占庭皇帝的支持下于 867 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宣布开除尼古拉一世的教籍，从此双方处于对立状态，互相诅咒、指责。矛盾在争夺意大利南部教会管辖权的问题上激化，1054 年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派红衣主教到君士坦丁堡谈判，遭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拒绝，教皇指责东部教派“充满异端”，而牧首迈克尔·凯鲁斯则在拜占庭皇帝的支持下召开宗教会议，宣布革除罗马教皇的教籍，从此东、西教会彻底决裂，处于隔绝状态。自此，西部教会强调它的“普世性”而称“公教”，即天主教；东部教会标榜“正统性”而称“正教”，即东正教。

东正教与天主教在教义上最大的分歧，无非是对“三位一体”的理解不同，天主教认为圣灵出于圣父和圣子，而东正教认为圣灵只出于圣父而不出于圣子。至于是否可用“功库”中的“多余善功”抵罪问题，教会是否可出售“赎罪卷”问题，有小罪的人死后是否可通过“炼狱”而进入天堂问题，其实都无关宏旨，只不过是小题人做而已。教仪之争，说来说去不外乎受洗礼的方法不同、圣餐的食品不同，天主教实行“注水洗礼”，举行圣餐时非神职人员只能领食无发酵饼，用手划十字，祈祷用拉丁文；东正教坚持传统的“浸礼”（即全身浸入水池），圣餐用发酵饼。在教规上的主要区别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不准结婚，东正教只有隐修者才不结婚。其实，最根本的分歧是罗马教皇主持召开的历次会议（8—21 次大会会议），东正教均不承认。撇开权势之争的实质问题，这些争论都不足以造成绝交。但两相比较，天主教比较灵活，东正教趋于保守，天主教力量集中，东正教势力分散；天主教的教权高于政权，而东正教始终依附于政权。

天主教有一套严格的教价体制，其神品分为七品：司门员为一品，诵经员为二品，驱魔员为三品，襄礼员为四品，副助祭为五品，助祭为六品，司祭为七品，前四品为低级神品（亦称小品），后三品为高级神品（亦称大品）。随着教会发展的需要，主教品位又分为主教、大主教、都主教、枢机主教（红衣主教）、宗主教，以教皇最高，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教士与世俗严格分开，教士不能结婚。

天主教有一种“隐修”制度，主张信徒离开尘世独身苦修，实际上就是僧侣制度。在西欧有许多隐修会，它们是：“本笃会”是 529 年意大利人本尼狄克所创，将祈祷、体力劳动和学习结合起来进行修炼，开办学校，培养传教人员；“耶稣会”创于 16 世纪初，修士不脱离世俗工作，参照军队精神，规定会士服从会长、效忠教皇；“多明我会”又称“多米尼克派”、“布道兄弟

会”，它是 1215 年西班牙人多明我所创，实行默念与积极工作相结合的制度，过集体生活；“方济各会”又称“法兰西斯派”、“小兄弟会”，创于 13 世纪初，提倡学术研究，重视文化教育，积极从事海外传教；“托钵修会”又称“托钵僧团”、“乞食修会”，13 世纪创立，标榜教徒不占任何财产，专以乞食为主；“加尔默罗会”又称“圣衣会”，“奥古斯丁会”又称“奥斯定会”，都是由托钵修会分出。在十字军东征中还建立了“圣殿骑士团”。

天主教有“四大瞻礼”和“八大节日”。四大瞻礼是耶稣圣诞瞻礼（圣诞节）、耶稣复活瞻礼（复活节）、圣神降临瞻礼（圣灵降临节）和圣母升天瞻礼（圣母安息节），以圣诞节最为隆重。八大节日是三王来朝节、大圣若瑟节、圣母领报节、举荣上架节、万圣节、追思节、圣母献堂节、圣母无染原罪始胎节。天主教特别重视纪念圣母玛利亚的节日，除圣母圣诞瞻礼、圣母领报瞻礼、圣母献堂瞻礼、圣母升天瞻礼而外，还有 10 多个纪念圣母的节日。

天主教的礼仪有圣礼、划十字、祈祷、弥撒。圣礼又称圣事，据说是耶稣基督亲自制定的礼仪，目的是通过圣礼使信徒得到某种神奇力量——“恩宠”与“保佑”，借以巩固信仰、壮大组织，主要有洗礼、坚振礼、告解礼、圣体礼、终傅礼、礼品礼、婚配礼等。“划十字”是为纪念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解救世人受难而做的动作，用手掌在胸前自左向右、自上而下“划十字”，有别于传统的划法。“祈祷”是为了使教徒与上帝相通，表达感谢之情，忏悔自己的罪，祈求上帝和基督赐福。“弥撒”是天主教的主要祈祷仪式，把经过神父或主教祝圣的无酵饼和葡萄酒视作耶稣的身体和血，通过领“圣体”和“圣血”来祭奠耶稣，仪式庄严、隆重、肃穆，在乐器伴奏下祈祷和唱赞美歌。

“告解”是求赦免罪过，前提是“认罪”与“悔改”。最严厉的处

分是“绝罚”，遭到“绝罚”的人没有人和他交往，死后不能升天。天主教会的“四规”是：凡主日及一切罢工瞻礼日应“望全弥撒”；遵守教会规定的大小斋期；妥当告解、善领圣体；尽力帮助解决教会经费。天主教使用的是格列高利历（公历），而不是东正教使用的“儒略历”。教堂为罗马式或哥特式，与东正教的拜占庭式和斯拉夫式有别。主教戴瓜子帽或四角帽、穿黄金色长袍、胸挂十字架、手戴权戒，与东正教主教戴圆帽、穿白色或黑色神袍、胸挂圣像、手持权杖明显区别。天主教堂的墙壁上，通常挂 14 幅耶稣受难的画像。

天主教主要在操罗曼语的意大利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科西嘉人、罗马尼亚人及操日耳曼语的德意志人、奥地利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中传播，操斯拉夫语的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及操乌拉尔语的匈牙利人也信奉天主教，主要分布在西欧、西南欧、中欧，以后向北欧发展。随着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建立，天主教又扩展到拉丁美洲、北美洲、亚洲、非洲及大洋洲。目前，全世界共有天主教信徒 9 亿多人，其中，欧洲有 2 亿多人，美洲 4 亿多人，亚洲 8000 多万人，非洲 9000 多万人，大洋洲约 800 万人。

2. 罗马教皇与西欧封建国家

公元 493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进入了欧洲中世纪。要了解西欧中世纪一千多年的政治史，离开了天主教简直无法理解，这就是说，天主教是研究西欧中世纪的一把重要钥匙。整个西欧中世纪，同时存在着两股重要势力：一股是以教皇为首包括各级教会、神职人员和天主教徒的宗教势力，另一股是掌握各国政权的世俗政治势力，它们相互利用又相互斗争，构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里，天主教在反对东正教和“蛮族”入侵的斗争中团聚在罗马教皇的旗帜下，通过传教活动和修道院的建立使西欧

迅速基督教化，从而成为一个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国际性组织。而当时的欧洲在政治上并不统一，各封建国家互相争斗，政权不断更迭，这就给天主教渗透和干预政治造成许多机会。首先，在普遍信仰天主教的国家里，封建主要维护其统治，单凭政治权力是不行的，必须借助宗教的力量进行社会控制，取得教会的支持，并通过宗教裁判所来维持封建社会秩序。其次，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常常引起纷争，新立君主的合法地位往往是通过教皇的“加冕”来确认，给他套上一个神圣的光环，体现“君权神授”的思想，这就意味着教皇对君权可以承认或否决。在国际争端中，教皇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调解，无形中抬高教皇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政权分散的情况下，封建国家要实行对外扩张，必须借助教皇的声望作为号召，把各国政治势力结合起来，“十字军东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西欧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教权高于政权的格局，罗马教皇成了西欧政治的主宰。

教皇制在天主教中占有特殊地位。教皇亦称“教宗”，源于希腊文 *pappas*，原意是“爸爸”。起初，这个词只是对神职人员的一般尊称，如教父、神父之类。后来因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等五大教会突显起来，教皇之名便专指这些主教。东、西罗马分裂后，罗马主教成了西部教会的“宗主教”，这又成了罗马主教的专称。罗马教皇的全称是：“罗马主教、罗省省都主教、西方教会宗主教、梵蒂冈君主、教皇”，从这里可以看到它逐步演变的过程。5世纪以前，教会互不统属，罗马教会只是其中的一个，故只称罗马主教。罗马帝国建立了30多个行省，罗马主教上升为罗马行省的大主教。在东、西教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罗马主教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宣称罗马第一任主教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彼得，而自己是“圣彼得的继承者”，应当享有领导各教会的权利。公元445年，西罗马皇

帝瓦伦丁下诏授予罗马主教有传召各教会的特权，罗马主教利奥一世便以诏令为依据自封为教会的惟一首脑，但遭到东部教会的反对，实际上只是“西方教会宗主教”。

西罗马灭亡后，西部教会失去了政治依托，为了联合起来与东部教会抗衡并对付“蛮族”入侵，内聚力增大，于 560 年西部各教会才公认罗马主教的绝对权威，教皇的尊号无形中为罗马主教专有。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教皇须经世俗君主或罗马贵族遴选、认可。直到 1054 年东、西教会大分裂，教皇一职才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1179 年的第三次拉特兰大会议和 1274 年的第二次里昂大公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教皇选举法，但法兰克、西班牙、奥地利三国君主对教皇人选仍有否决权。在天主教史上，围绕教皇人选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出现了 36 个相互对立的教皇，他们都自称是“合法教皇”，而对方则将他们斥之为“非法教皇”或“敌对教皇”。教皇制度确立后，追认彼得为首任教皇，按时间先后排序，现任约翰·保罗二世为 266 任教皇。

教皇不但是“圣彼得的继承者”，还是“基督在人间的代表”、“普世教会至高无上的祭司”，在天主教中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崇高地位。教皇是终身制，除非犯了“异端”罪，任何人不得罢免，但教皇可自行辞职，无权指定继承人。教皇有如下权力：一、掌握世界各地传教，建立天主教区，任命各地主教；二、就《圣经》对教义、宗教道德发表权威性意见，制定、修改或废除教会法规；三、享有宗教最高立法权和司法权，组织宗教法庭审判。仅次于教皇而又高于主教的神职人员为枢机主教，后来为了表示庄重与尊严而穿红色服装，故称“红衣主教”。从 6 世纪起，由他们组成的“枢机主教团”便成了罗马教皇的咨询机构，成员来自世界各地，由教皇任命。他们有教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教廷的重要活动，在教皇缺席时，代行其职权并主持会议，选举新的教皇。

教皇制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欧的政治形势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在 5—6 世纪，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先后建立许多国家，它们是：西班牙和高卢的西哥特王国，意大利北部的东哥特王国，高卢南部的伯根地王国，北非的汪达尔王国，高卢北部的法兰克王国，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德王国，盎格鲁—萨克逊人建立的英吉利王国。公元 590 年格列高利一世任罗马教皇，他因组织武装保卫罗马城而名声顿起，用外交手段笼络了进犯的伦巴德人，设立慈善机构赈济难民和收容战俘，在罗马城、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北非和高卢发展教会产业，大力培养神职人员，发展神学理论，严格教规，制定《格列高利历》，致使罗马教会成为天主教的中心，奠定了教皇制的基础。从 6 世纪开始，教皇派出大批宣教团到各国传教，又在各国建立教会和修道院，西欧各国君主纷纷皈依了天主教。公元 756 年，法兰克国王矮子平为酬谢罗马教皇支持他篡位，将意大利中部大片土地赠给罗马教皇斯捷甫二世，史称“丕平献土”，从此形成了罗马教皇国。8—9 世纪之交，法兰克国王极盛，国王查理发动了 50 多次战争，使版图扩大到西班牙厄布罗河，东至易北河和多瑙河，南面包括意大利大片土地，罗马教皇授予他“罗马人的皇帝”称号，史称查理曼帝国。为了感谢教皇的支持，查理大帝又将贝内文托和威尼斯等城赠给教皇国。查理曼帝国分裂后形成意大利、德意志和法兰西三个王国。后来德意志兴起，罗马教皇为了摆脱意大利的威胁，支持德意志入侵意大利，并于 962 年为德意志奥托一世加冕，立为“罗马皇帝”，于是成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或称“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在此期间，教皇国版图不断扩大。

11—13 世纪是教皇国的鼎盛时期，在此两百年间，欧洲封建国家在教皇的组织 and 领导下，以“拯救东方教民”和“收复圣地”名义，发动了八次“十字军东征”，借以扩张势力。在此形势下，教皇国实际上成为西欧的国际政治中心，教皇成了宗教与

封建势力的共同首领。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1189—1216年），特别宣扬“教权至上”的思想，希图建立欧洲天主教封建神权的大一统国家，使用各种权术制服世俗君王，迫使他们向教皇称臣纳贡，俨然是凌驾于西欧各国君主之上的“太上皇”。然而，在此期间，天主教内部出现了一批反对教会封建特权和传统宗教礼仪的“异端”，如鲍格米勒派、阿尔比派、韦尔多派、清洁派、鞭笞派等。到了14世纪，英、法、西班牙等城市经济发展起来，民族意识增长，分别形成一些中央集权国家，于是提出“君权独立”的主张，逐渐排除教会对世俗事务的干预，致使教权急剧衰落。15世纪虽一度出现教皇英诺森六世的中兴，但大势已难以挽回。16世纪欧洲出现“宗教改革”运动，给天主教会和教皇沉重打击。1798年拿破仑攻占罗马，迫使教皇庇护六世放弃教皇领地，取消世俗权力。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意大利乘机收复罗马，只允许教皇保有梵蒂冈地区，使之变成了“梵蒂冈囚徒”。现在的梵蒂冈只有0.44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约1380人，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3. 弥漫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11—13世纪，在欧亚大陆上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字军东征，前后8次，绵延两个世纪。发动战争的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欧天主教会和封建国家，提出的口号是反对“异教徒”——穆斯林，夺回“圣地”耶路撒冷。这是“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一次大决战，因为在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在阿拉伯帝国的推动下夺取了不少基督教的领地，打破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两种文化剧烈冲突。斗争的焦点自然是耶路撒冷，因为这里是耶稣基督诞生、钉死在十字架、复活、升天的“圣地”，但后来被伊斯兰占领并成为“圣地”之一，相传穆罕默德从麦地那乘飞马至此直上了七层天。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天主教在与伊斯

兰教冲突的同时，还伴随着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决裂的殊死战斗。更要注意的是，在文化冲突的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刻的政治与经济的冲突，所以，它既是“宗教战争”，又是“政治扩张战争”，同时是一场激烈的“商战”。

自“蛮族”大迁徙以来，欧洲建立了许多封建国家。8世纪以后，法兰克兴盛起来，形成了查理曼帝国。但为时不久，843年“凡尔登条约”之后分裂为意大利、德意志和法兰西三个国家。后来，德意志王奥托一世得到教皇的支持，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教皇国在政治斗争中不断扩大势力，11—13世纪达于鼎盛，一跃而为西欧的国际中心。教皇势力的膨胀，封建国家的扩张，使西欧成为一个巨大的风暴中心。与此同时，东方形势急剧变化，阿拉伯帝国分裂，塞尔柱突厥帝国兴起，拜占庭帝国日渐衰落，给教皇与西欧封建主东侵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在宗教的旗帜下，以拯救东方教民、驱逐塞尔柱人、收复“圣地”、让伊斯兰教徒改宗为名，集合各种势力涌向东方，因参战者在衣服上都以红十字为标记，故称“十字军东征”。这是教士蛊惑虔诚教徒进行“圣战”的好机会，也是骑士们乘火打劫的好时机，农民也希望通过远征走出困境。最积极的是威尼斯、热诺阿、比萨等地的商人，他们希望夺取东方的港口和市场，排挤拜占庭和阿拉伯的商业贸易，因此主动为十字军提供船只、粮食和武器，在“圣战”的幌子下进行“商战”。

塞尔柱人占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阻碍了西欧通往东方的商路和朝圣道路，为此，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11月召开克莱蒙会议，号召教徒“援助东方兄弟”、“登上赴圣地的征途”，次年开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法、德、意三国的封建主和骑士组成的“十字军”分四路进军，于1097年在君士坦丁堡会合，1099年占领耶路撒冷，屠杀穆斯林，在地中海东岸建立起耶路撒冷王国、安提阿公国、的

黎波里伯国和爱德沙伯国，它们都是按法国模式建立的拉丁国家。东海岸的贝鲁特、西顿、阿克、凯撒里亚、推罗等港都为威尼斯、热诺阿商人控制，阿拉伯和拜占庭商人下降到次要地位。十字军的胜利使西欧激动起来，先后组织了法国的“神庙骑士团”、意大利的“医护骑士团”、德国的“条顿骑士团”，因系宗教性军事组织，故直接由教皇指挥。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1149 年）的起因是塞尔柱人占领了希腊的埃德萨，耶路撒冷拉丁王国请求援助，教皇尤金尼乌三世在德、法两国国王的支持下发动第二次东征。“十字军”在小亚细亚遭到穆斯林军队阻击，损失惨重，余部又在大马士革彻底失败。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 年）是因为埃及苏丹萨拉丁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伊斯兰萨丁帝国，并攻占了耶路撒冷，威胁着地中海东岸的拉丁国家和十字军占领的城市。消息传来，西欧各国又激起一次宗教狂热，教皇克雷芒与德皇、英王和法王共同组织了“十字军”约 3 万人，于 1189 年向东进发。拜占庭帝国暗中与萨丁帝国结盟，致使德皇腓特烈的军队大败而归。英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率领的军队从海上进军，也因内部矛盾而归于失败。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 年）是由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鼓吹攻打埃及、收复耶路撒冷，暗地里却是进攻拜占庭帝国。1202 年，德、意两国十字军在威尼斯集中，与威尼斯商人企图打败商业竞争对手的要求不谋而合，他们给十字军提供援助。1204 年“十字军”占领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大肆破坏宫殿、教堂和文化珍宝，掠夺大量财富。十字军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大部分土地，以达达尼尔海峡为中心建立拉丁国家，强迫东正教徒改信天主教。这种狂暴行为激起拜占庭人民反抗，推翻了拉丁国家，恢复拜占庭帝国。此间流行一种谬说，认为成年人有

罪，只有纯洁的儿童才能夺回圣地，宣称“儿童能虔诚信仰感动上帝施行奇迹，完成十字军骑士未竟的事业”，于 1212 年组成了两路“儿童十字军”。第一路是法国儿童，共 3 万人，到马塞港后被贩运到北非卖做奴隶。第二路是德国儿童，约 2 万人，在行军途中大都因饥饿、疾病而死。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7—1221 年）由匈牙利国王率领远征埃及，以失败告终。第六次十字军东征（1228—1229 年）由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一世组织、指挥，他利用人马上革总督与埃及、苏丹的矛盾进行谈判，兼任耶路撒冷国王。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4 年）因蒙古军西征威胁着伊斯兰国家，教皇英诺森四世以为有机可乘，由法王路易九世率军进攻埃及，兵败被俘。第八次十字军东征（1270 年）一开始就因瘟疫而退回，到 1291 年十字军在中近东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城也被穆斯林夺去，标志着十字军东征彻底失败。

“十字军东征”是地中海宗教、文化冲突的集中表现，它既是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剧烈冲突，又是天主教与东正教矛盾激化的表现，经过两百年的反复较量，在地中海确立三足鼎立的局面：欧洲西部和西南部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属东正教的势力范围，而西亚和北非则是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罗马教皇极力想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西欧封建国家极力想对外扩张，意大利商人也力图通过战争打败拜占庭商人和阿拉伯商人，三种势力结合导致了两个世纪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留下许多惨痛的记忆。战争洗劫了东方，刺激西欧城市经济的发展。“十字军东征”改变了地中海的政治形势，在此之后，西欧封建国家发展起来，拜占庭帝国元气大伤，而教皇势力也从此走向衰落。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欧洲人对东方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拉丁国家的建立也扩大了西欧文化在地中海东岸的传播。

4. 天主教与西欧中世纪文化

就中世纪而言，把西欧同中国相比，有三点明显的不同：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欧要长得多，如果按“西周封建论”，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三千多年，即使从战国算起也有两千多年历史，而西欧不过千余年。其次，在中国是皇权高于政权、神权、教权，而西欧则是神权高于教权、政权。其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学、艺术、哲学、科技放射奇光异彩，而西欧的封建社会却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对于“黑暗中世纪”的说法，近年来有人提出质疑，对此应当作辩证的分析。就禁锢思想、压制“科学”和“民主”而言，“黑暗中世纪”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否则就无须乎搞什么“文艺复兴”了。但如果对“蛮族”而言，文化的提高却是相当可观的，“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冷藏库”，虽然没有大的发展，但也不至于毁灭。

天主教对西欧文化的重大贡献，是欧洲文字的“拉丁化”。罗马是拉丁字母的故乡，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已成意大利半岛通用的官方文字。罗马帝国建立后，随着罗马军队、官吏和商人的足迹传到地中海各地，渐渐成为操罗曼语的民族如意大利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共同使用的文字。3世纪将《圣经》由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4世纪又将希腊文转译为拉丁文。东、西部教派分裂后，西部教派使用拉丁文传教，9世纪以后传到操日耳曼语的民族中，包括德意志人、奥地利人、荷兰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等等。大约在查理帝国的所谓“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之后，民族意识增强，开始用拉丁字母记录本民族语言，在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渐成熟，形成了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英文、德文、荷兰文、丹麦文、

挪威文、瑞典文等等。在“拉丁化”的过程中，有些斯拉夫民族也使用拉丁字母创制本民族文字，如波兰文、捷克文、斯洛伐克文、克罗地亚文，属于乌拉尔语系的芬兰、爱沙尼亚、匈牙利等也被卷入“拉丁化”的浪潮。到了近代，波罗的海诸国也走向“拉丁化”，成为欧洲最普遍的文字，进而成为世界上传播最广的国际文字。欧洲许多民族从没有文字到创制本民族文字，拉丁字母从罗马走向欧洲、走向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与天主教的传播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天主教征服了西欧，许多文化都以修道院为中心扩散到整个社会。修道院不仅是教会研究和传播神学的中心，而且是保存和发展“古典”文化的学术、教育机构，是慈善救济团体，它的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西欧社会。进入中世纪以后，修道院遍及西欧各国，仅法国在 12 世纪就达 702 所。修道院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修士们的任务就是劳作和读书，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进行文化活动，因而成为大大小小的文化研究和传播中心。由于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基础是希腊、罗马哲学，所以这些“古典文化”受到重视，修士们不断抄写、翻译和整理希腊、罗马文献，无形中把这些古老文化继承和保留下来，成为古典文化与近代文化之间的一条联系纽带，是“黑暗中世纪”的一盏“光明的神灯”。这在“蛮族”粗暴摧毁文化的情况下，教会和修道院无疑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在保护文化上是有功的。

欧洲的大学多半是由修道院孕育形成。“大学”一词源自拉丁文的 *universitas*，原意是“教师和学生的社团”和“有知识的公众”，后来形成一种以研究和教学为目的的新型实体，这便是后来的“大学”。欧洲的第一所大学是 11 世纪末意大利创立的博洛尼亚大学，它的前身是一所法律专科学校，1352 年教皇英诺森六世开办神学系，渐渐发展为综合大学。12 世纪初兴起的巴黎

大学，实际上是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圣根尼威夫大教堂学校和圣维克多修会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20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成立，有神学、艺术、法学、医学四个学院，传授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等“七艺”，成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典范和楷模。继后，伦敦郊外的牛津成了巴黎神学家们讲学的地方，一批留法学生回到英国后按巴黎模式创办牛津大学，1214年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认可，进而成为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大学在教皇和教会的支持和控制下发展起来，不少大学直接脱胎于教会学校、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在往后的发展中，一些人主张把大学办成专门的神学院，而另一些人则主张把大学办成学术研究与教学中心。冲破“黑暗世纪”后，事实上朝着两个方向发展，而后者渐成主流，成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

中世纪的图书馆具有鲜明的基督教特色，附设于教会、教堂和修道院，收集和珍藏许多图书和抄本。教会图书馆以亚历山大图书馆最为著名，它起源于希腊化时代，基督教兴起后便成了亚历山大教会的图书馆。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法国里昂的教会图书馆。最早的修道院图书馆是529年在罗马城西北的本笃会修道院图书馆，后来又出现卡西诺修道院图书馆，它以服务“七艺”为目的，除保存基督教神学文献外还收藏大量世俗图书，编制了一个《神性文献和世俗文献提要》。5-7世纪修道院图书馆迅速发展，著名的如爱尔兰修道院图书馆、意大利博比奥大修道院图书馆、法国吕克瑟伊修道院图书馆、瑞士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德国赖赫瑙修道院图书馆等，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图书馆的修道院，就像没有武器的城堡一样”。12世纪开始许多大教堂也办图书馆，而且规模比修道院更大，著名的如巴黎圣母院图书馆、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图书馆等。随着大学的举办，学校图书馆也与日俱增，以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藏书最为丰富。图书

馆对文献收藏和文化传播有重要意义，为后来欧洲文化的兴起蓄积起知识的力量。

中世纪的哲学主要是“经院哲学”，因产生于 11—14 世纪天主教会学院而得名，它的特点是运用理性形式，通过抽象、烦琐的辩证方法来论证基督教信仰，是一种思辨性的宗教哲学，重点在于探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先是围绕着圣餐中“实体转化”这一末节展开争论，演化出“唯名论”与“实在论”两大派别。法兰西都尔教堂学校校长贝伦加尔首先用逻辑方法对“实体转化说”提出质疑，阿伯拉尔根据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论证“共相不是实体”，而是同类事物的共性，主张通过怀疑、验证而达到真理，做到“理解才能信仰”，从而创立“唯名论”。与之相对立的是“实在论”，早期代表人物是兰弗郎克，他指责贝伦加尔“抛弃了神圣的权威”，他的学生安瑟伦全面发展了“实在论”，把“共相”看成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第一性实体，坚持“先信仰后理解”的原则，并用“三段论法”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成为正统的经院哲学。12 世纪下半叶，亚里士多德的“神学口的论”和“形而上学论”受到基督教重视，从而使亚里士多德哲学注入经院哲学，弥补早期基督教神学只侧重柏拉图主义之不足。集经院哲学大成的是 13 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其代表作是《神学大全》。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动因”与基督教的“上帝”直接关联，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形式与质料”等范畴来解释基督教神学，把“上帝”理念化为“自有、永有”的“最高存在”和“第一真理”，对基督教神学体系产生深刻影响。14 世纪以后，神学与哲学渐渐分离，经院哲学进入衰落时期，“二重真理论”兴起，奥卡姆等人的经验论和怀疑论标志着经院哲学的终结。

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是在早期“先知文学”、“智慧文学”和“启示文学”的启迪与熏陶下形成的，以“寓意”的手法来表

述《圣经》、圣徒故事，作者多半是修道士，如《创世纪》诗歌、《基督》、《圣女欧拉丽赞歌》、《圣徒列瑞行传》之类。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欧洲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也渗透着基督精神和宗教色彩，最著名的是 11 世纪法国的《罗兰之歌》，全诗 4002 行，共 291 卷，它描写了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远征西班牙的故事，塑造了罗兰这一基督教英雄的形象，全诗贯穿着基督反对异教的斗争，充满对基督教的赞扬与歌颂，引用《圣经》故事，渲染宗教气氛，是基督教英雄史诗的典范。在“十字军东征”中兴起一种“骑士文学”，主题是“英雄与美人”，为信仰和爱情去冒险，有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两种形式。骑士抒情诗以《破晓歌》最为著名，骑士传奇多取自民间传说，模仿希腊罗马作品或虚构，以骑士为中心写成长篇故事。骑士文学反映的生活面很窄，但它对基督教禁欲主义是一个巨大冲击。中世纪欧洲文学的最高成就是 13 世纪但丁的《神曲》，全诗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以梦幻形式描写地狱与天堂的奇妙故事，充满神秘的宗教气氛。作者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的作品是对黑暗现实的批判，给人们指出一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途径，具有反封建、反蒙昧主义的进步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基督教艺术，广义的包括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及建筑，它们都以《圣经》宣扬的教义、故事、历史为主要题材，突出基督教的象征、抽象和超越意义，用可视可感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宗教的信仰和激情，让人们去感受上帝的存在和伟大，“领悟灵性的真理”。早期的教堂音乐以唱诵诗篇为主，用作基督教的感恩颂歌、降临节赞歌、圣餐礼仪歌及晚祷音乐，以乐器伴唱。6 世纪末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主持编订了《格列高利颂歌谱》，把

这种简朴优雅的“格列高利调”作为教堂音乐的范本，流传千年以上。9—10 世纪出现复调音乐，以多声部重唱、合唱为主，后又形成各种无伴奏合唱的赞美诗歌，称为“奥尔加农”。“福音颂歌”和“受难曲”为两大主题，出现许多流派，巴黎乐派的《教仪音乐》是教堂音乐的范本，罗马乐派的《弥撒曲》和《经文歌》也广为流传，还有尼德兰乐派的弥撒曲、经文歌和赞美诗。教堂音乐包括四种形式，即经文歌、弥撒曲、赞美诗及四声部合唱圣歌，对西方音乐有重大影响。

早期基督教因避偶像崇拜之嫌而不重绘画，后来则强调绘画中“灵性”的表述，往往寓以象征意义，如十字架下的一只羔羊，用鱼和牧羊人象征基督，用鸽子象征心灵和圣灵，用方舟象征教会，用孔雀象征永恒，用心脏象征心爱等等。绘画进入教堂之初只具有装饰意义或做祈祷辅助物，后来变成了祈祷对象，形成常设的主题画像和祭坛画，又用人象征《马太福音》，用鹰象征《马可福音》，用牛象征《路加福音》，用狮象征《约翰福音》。以后相继出现了细密画和湿壁画，内容日益丰富，包括《圣经》故事、圣母及耶稣生平、先知、使徒、圣徒、教皇、英雄等事迹和肖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耶稣受难的 14 幅画像。这种寓意、象征、抽象的基督教风格构成了中世纪欧洲绘画的主流，直到“文艺复兴”。基督教雕塑主要是基督圣像、圣母子像、耶稣受难像和圣徒像，还有许多浮雕，著名的如德国科隆大教堂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法国图卢兹大理石浮雕《荣耀归于宝座上的基督》、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教堂青铜门上的《亚当与夏娃》和《耶稣生平》浮雕组，还有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彼得被钉十字架》浮雕群像等。

基督教早期的教堂为“巴西里卡”式，9—12 世纪兴起的“罗马式”是在“巴西里卡”教堂布局的基础上，采用罗马凯旋门、城墙、古堡式样及拱券，其特征是石墙厚实，窗户狭小，门

为拱形，低矮的圆顶逐层挑出门框，上部为圆弧形拱环、交叉拱结构，并使用大量立柱和拱券，从而产生敦实厚重，均衡安稳，力度饱满，结构完整的美学效果，并因堂内光线黯淡而增加神秘气氛。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法国的卡昂圣艾蒂安教堂，德国的美因茨大教堂，英国的达拉姆大教堂等，都集中表现了这一风格。12—15 世纪盛行“哥特式”，因其最先在法国北部兴起，人们以“哥特”一词贬称，其实它是“罗马式”的进一步发展。1140 年在巴黎北面兴建圣母尼修道院，院长苏热尔认为教堂应体现“光、高、数”三个理念，于是大胆创新，将塔顶向上延伸，增加窗户通光，重新安排堂身比例，“哥特式”建筑自此产生。

“哥特式”的特点是：教堂拔地而起，尖塔高耸入云，穹窿为棱形状，花窗高大而复杂，给人以高大、明快、豪华的感觉，体现虔诚信仰和神学意境的审美情趣。从“罗马式”到“哥特式”的发展，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心态及审美情趣的嬗变，表明神权统治已经确立，体现出经院哲学复杂微妙的思辨色彩，并用“神圣感”代替了早期的“神秘感”。

以上事实说明，欧洲中世纪并非一团漆黑，也不完全是“文明倒退”的“野蛮世纪”。中世纪是欧洲文化的转型时期，它以基督教文化为中介，把地中海的文明带到了欧洲，推动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发展，奠定后来欧洲文化发展的基础。然而，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来看，它仿佛是横亘在希腊罗马文明与近代文明之间的一个低谷，缺乏奋进、创新的活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因循保守、滞后、僵化的状态。在文化的反思中，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了“中世纪”的概念，意思是处于“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之间的“中间世纪”，是一个“人类由希腊思想和罗马统治的高峰降落下来，再沿着现代知识的斜坡挣扎上去所经过的一个阴谷”。“中世纪”一词的本身，

就是一种贬意。诚然，这一时期的文化使“蛮族”得以提高，但无论文学艺术、哲学思想都是“宗教的婢女”，文字的发展、大学和图书馆的产生、建筑特色的形成都是为宗教服务，被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囿于天主教的经院，显得死气沉沉，见不到希腊、罗马时期的那种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因循多于创新，保守多于进取。

“中世纪”之所以被称为“黑暗时代”，除了“蛮族”对古老文明的破坏和宗教战争带来的灾难及宗教裁判所的专横而外，更重要的是对思想的压抑和对科学的阻碍，这对于“科学”与“民主”来说，无疑是“千年的黑暗”。在宗教神学笼罩下的西欧，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教皇的权威，服从于教会与封建专制，思想受到禁锢，言论没有自由，行为被教规、教仪约束，一切都屈服于神圣化了的宗教与世俗统治，根本看不见一点“民主”的影子。最可悲的是“十字军东征”，成千上万的人拿着十字架盲目地杀向耶路撒冷，而且持续了两个世纪，其落后、愚昧、迷信、盲从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可诅咒的是宗教裁判所，它把正统的天主教思想作为判别一切是非的准则，并把思想统治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强化，凡一切违背“正统”的思想言行都被斥为“异端”，受到严厉的惩办，俨然是维护教会与封建双重专制的卫道士和刽子手。当然不能说中世纪科学技术毫无进展，譬如修道士的实验活动、大学的兴办对知识的传授、“公历”的逐步形成等都是应当肯定的。但是，自然科学在这一黑暗时期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哥白尼遭到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布鲁诺被活活烧死，伽利略被终身监禁，凡是被宗教权威认为与神学相悖的科学思想、科学活动和科学家都被取缔。对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与“民主”来说，压制民主、扼杀科学、禁锢思想的确是一个“黑暗时代”，所以，“黑暗的中世纪”这一提法并不为过，只是要做具体分析罢了。

（四）“宗教改革”与“基督教文化圈”

“宗教改革”既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又是欧洲社会变革的重要契机，它给基督教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形势，打破了思想的沉寂。“宗教改革”后产生了基督教新教，造成了东正教、天主教与新教三大教派共同发展的局面，这对于基督教走出欧洲、走向世界有重要作用。在此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西欧国家的海外殖民，基督教传到了美洲、大洋洲及亚洲、非洲的若干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基督教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的形成，对于世界，特别是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有诸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文化圈”的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震撼欧陆的“宗教改革”

16世纪欧洲各地相继出现的“宗教改革”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激活了基督教文化，引起了基督教的第二次大分裂，创立了富有鼎新精神的基督教新教，形成了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者并立的格局，并为基督教跨出欧洲、走向世界做好了准备。“宗教改革”的真实意义在于，它以一发不可遏止的激烈方式冲破了“黑暗的中世纪”，用新的思想观念重新诠释《圣经》，发现和发扬基督教的积极进取精神，把人从“神本主义”和“神权至上”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强调人的“灵性”，重视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关爱与恩惠，唤醒人们的自我意识造成欧洲中世纪“黑暗”的重要原因，是教皇的绝对权威、教会的特权地位和封建专制的强固结合。这里是天主教的一统天下，思想、言论、行动都受到“正统”宗教意识的约束，稍有偏离便被视为“异端”，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把人变成了屈服于

神权的奴隶，没有自由也少有创造。教皇凌驾于国王之上，宗教势力渗透封建国家，教会本身就是“最大的封建领主”，还给“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赐的圣光”，这就使人民处在神权与封建权力的双重压迫之下，因此，“要在每个国度内起来和世俗的封建制度作斗争，就必须首先摧毁它的这一中心的神圣组织”，在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改革”乃是一次大规模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政治运动。

导致“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原因，是没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不堪封建压迫和剥削不断起来进行反封建斗争，爆发了多次起义。另一方面，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新兴的资产者要求打破封建的桎梏，谋求新的发展。人民的反封建斗争与资产者争取经济和社会平等的要求，渐渐汇合成一股社会变革的思潮。他们说：“人民和贵族以及富人平等的时代已经到了。”10—15世纪天主教出现的“异端”便把矛头指向教皇、教会和教规、教仪，成为“宗教改革”的先声。当基督教传统的神秘主义与社会改革碰撞之后，在“神秘仰望”与“心灵体验”中爆发了“因信称义”、“与上帝直接交往”、“恢复灵性”的火花，转而指向教会对“灵性”的干涉，成为一种反教会特权的冲击力量。君权的抬头，意味着社会上出现了一种与教权相抗衡的世俗力量。方兴未艾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荡涤“中世纪的幽灵”。这一切社会变革的重大突破口就是宗教，只有进行“宗教改革”才能打破欧洲的沉寂，改变日趋僵化的局面。

首先发难的是德国维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他在1517年发表了抨击罗马教皇兜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实际上是讨伐罗马教皇的一纸檄文。他接着发表著名的《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呼吁皇帝和诸侯讨伐“流毒于全世纪的恶汉”，并当众烧毁教皇将他开除教籍的敕令，公开与

教廷决裂。他在《一个基督教徒的自由》一文中，宣称《圣经》是真理的惟一来源，不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和教会对教义的解释权，主张信徒直接与上帝交通，反对教阶制和教会拥有巨大财产的特权。他把《圣经》译成德文，使广大平民能直接运用《圣经》的语句进行斗争，对此，恩格斯写道：“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撰写了成为 16 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的词和曲。”他的言行引起了巨大反响，鼓舞了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闵采尔公开宣布：“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闵采尔把“宗教改革”与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把理性”作为最高信仰，力图在人间建立“理想的天国”。

路德的宗教改革和闵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狂飚式地袭击欧洲大陆，在法国掀起了加尔文宗教改革的浪涛。加尔文是一个新教徒，因受到迫害而逃往瑞士。瑞士在 1516 年已出现慈温利神甫的宗教改革运动，慈温利的《六十七条目》对教义的解释比路德更加理想化，公开与罗马教皇决裂，反对出卖“赎罪券”和教士独身，废除忏悔仪式，教区的牧师由信徒选举。他用武力推行新教，引起了一场战争，瑞士从此分裂为新教州和旧教州。加尔文在瑞士专心研究《新约全书》，1535 年写了一本《基督教要义》，否定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认为人得救全靠上帝恩典，《圣经》是上帝的直接教诲，而教会的说教实际上是对《圣经》的歪曲，应当废除主教而选举长老，简化宗教仪式，取消望弥撒、崇拜圣像、朝圣和斋戒。他在 1541 年创立加尔文教，并在日内瓦建立欧洲第一个基督教新教执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加尔文教波及法

国、尼德兰、苏格兰、英格兰，成为新教的一大教派，对 16 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和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

影响所及，英国也出现了宗教改革。英王亨利八世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王相继在大不列颠打起了宗教改革的旗号，宣布英国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国王是“教会元首”，从而创立了“安立甘教会”（即圣公会）。这一改革直接动摇了罗马教皇的统治，但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具有较大的保守性，保留了天主教传统的教义、教仪和主教制，将《四十二条信纲》作为“国教”的官方教义。从 16 世纪 60 年代起，在新加尔文派的影响下，英国的国教会内部又出现改革浪潮，要求清除天主教的影响，简化宗教仪式，取消教堂中华丽装饰和过于铺张的宗教庆典，反对贵族和教会上层骄奢淫逸的生活，提倡“清俭廉洁”，被称为“清教运动”，而实行这种改革的人被称为“清教徒”。清教徒构成了国教会内部的反对派，其中一派主张以长老会代替主教制而称“长老派”，另一派则因主张脱离国教会而成“独立派”。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化，在英国先后出现了主张教堂由教徒“公众治理”的“公理宗”，主张教堂自主、实行“浸礼”而反对婴儿受洗礼的“浸礼宗”，主张改良社会、遵循各种道德规范的“循道宗”，还有宣称教会和《圣经》都不是绝对权威的“公谊会”。17 世纪初，英国的宗教改革发展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导致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宗教改革”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动摇了罗马教皇在西欧的统治，改变了教权高于政权的政治局面，从此教皇国一天天衰落，仅保有小小的一片梵蒂冈。“宗教改革”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统一的“天主教世界”分裂，不但产生了新教，而且出现了若干新的教派，不同国家教派不同，同一国家之内也有多种教派，西欧国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思想的层面上，由于新教对《圣经》做了新的诠释，焕发出新的观念和意识，打破了思

想僵化，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从而为“人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有力地推动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是在天主教居于绝对统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社会政治运动，不从宗教上打开缺口就很难实现社会变革，而这种改革必然是从天主教内部开始，从对《圣经》的诠释开始。“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由此导致了尼德兰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他革命，所以，恩格斯说：“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西欧各国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触动了它的根本制度，出现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爆发了一连串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因而很快走到世界前列。

2. 具有鼎新精神的基督新教

基督教新教，是指 16 世纪“宗教改革”后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教派，为了与原先的天主教相区别而称“新教”。新教最初起源于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在此之后，德意志帝国的封建诸侯也随之分为两派，拥挤旧教的诸侯 1529 年在斯拜耶召开帝国会议，强行通过恢复天主教会特权的决议，引起新教诸侯的强烈抗议，因而被称为“抗议宗”。因新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又称“抗罗宗”。这一教派在教义、教仪、教规上有若干修正更改，故又称“更正教”。在中国，起初把它称为“耶稣教”，后来使用“基督教”作为新教的专称。

无论天主教、东正教或新教都以《圣经》为依据，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相信“道成肉身”的基督，相信“原罪论”与“末世审判”，强调“因信称义”。但“新教”与“旧教”有许多分歧：首先，新教遵照“上帝十诫”中关于“除上帝外不可敬拜别的神”、“不可敬拜偶像”的原则，取消对圣像、圣徒、天使、

圣物的崇拜，不承认玛利亚是天主之母，这就在教义上恢复了反对偶像崇拜的信条，贯彻了“三位一体”与“道成肉身”的真实含义，从而把对上帝的信仰看成是一种“理念”而不是具体的神或人，在思想上获得解放。与此相关，新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不接受罗马教廷的统一领导，并反对天主教固有的教阶制度，主张教会制度多样化，从而在组织上打破凝固状态，从根本上否定教会的封建特权，使之呈开放势态。新教认为教牧人员与普通信徒之间没有根本对立，信徒可以不经过教会或神甫的中介直接与上帝沟通，这就使教徒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去理解《圣经》，摆脱教会和教士的羁绊，有利于思想自由。新教还宣布取消隐修制度，废除禁止神职人员婚姻的规定，这既有利于消除教牧人员与普通信徒的界限，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使之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对于天主教的烦琐礼仪，新教也做了改革，简化宗教仪式和圣礼，圣事只保留洗礼和圣餐两项，便于一般信徒实行。反对“炼狱”之说，直接否定了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合法性。总之，新教是对中世纪天主教会统治的一种反动，它适应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

因为新教坚持“教会制度多样化”的原则，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统一的教会组织，不断产生新的教会。最先产生的三个主要宗派都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逐渐形成的。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形成了路德宗，因其特别强调“因信称义”而称“信义宗”，它的理论依据是《圣经》的权威高于一切，信徒可以直接与上帝交通，以此否定了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和天主教会的特权，从而宣布脱离罗马教廷的统辖，自立教会。加尔文宗是以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因其由信徒选出长老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而称“长老宗”，它的理论根据是《圣经》是信仰的惟一泉源、信徒因信仰而得救，它相信“上帝预定论”，但不相信圣餐中的饼和酒是上帝的身和血，反对偶像崇拜和婴儿受洗。圣公宗即圣

公会，它是在英国宗教改革中形成的，因自认保有使徒亲自传下的主教制度和正统教义，故名。因此宗系英国的国教会，“英格兰的”英语词为 Anglican，所以又称“安立甘教”。圣公宗宣布脱离罗马教廷的主要依据是自认它与“公教”和“正教”都同是古老教派，所以虽支持“宗教改革”，但仍保留主教制和天主教的大部分教仪。

由于英国的“宗教改革”相当保守，所以后来出现了“清教运动”，并纷纷创立脱离“国教会”的新教派，最先兴起的是公理宗，它因主张教会由教徒“公众治理”而得名，又因其创始人勃朗而称“勃朗派”，主要是反对设立统一的教会管理机构，强调教堂体制、礼仪由各教堂信徒自定。17世纪出现浸礼宗，顾名思义，是坚持传统的“浸礼”制度，但反对婴儿受洗，强调各教堂自主不受政府或其他教会干预。18世纪又产生循道宗，以提倡遵循各种道德规范而得名，因其创始人卫斯理而称“卫斯理宗”，其主张是要改良社会，关爱下层，宣称“内心平安喜乐就是幸福”。以上六宗是新教的主要派别，它们在重新理解《圣经》、反对罗马教廷、反对偶像崇拜及烦琐礼仪、自立教会等基本点上是大体一致的，但又各具特色，互不统率。至于宣称教会和《圣经》都不是绝对权威的英国公谊会（亦称贵族会或教友会），因其主张过激，影响远不如六大宗派。

新教最初盛行于欧洲，主要是德国、英国、瑞士、荷兰，后来扩散到北欧。德国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故乡，最先创立新教，形成新教与天主教平分秋色的格局，以路德宗和加尔文宗为主。英国不断进行宗教改革，16世纪出现了圣公宗、公理会，17世纪出现了浸礼宗、公谊会，18世纪出现了循道宗，19世纪又出现内地会、救世军和基督教女青年会，所以新教势力较大，约占60%的人信奉新教。法国虽是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策源地，但加尔文教派多逃往瑞士，所以法国的新教不大而瑞士的新教反

而盛行，新教与天主教大约各占一半。荷兰因以新加尔文教派为旗帜反对西班牙统治成功，资产阶级革命后定新教为国教。北欧的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都信奉新路德宗，并具有国教的性质，这是因为在“宗教改革”的浪潮波及下，民族意识增强，各国都实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自立教会与罗马教廷相抗衡。临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多信奉新教。

新教传入美洲是 17 世纪的事，主要盛行于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1620 年，英国的“清教徒”遭到当局的迫害，希望在海外寻找宗教的自由乐土，于是由长老威廉·布卢斯特率领 102 个清教徒乘“五月花号”商船横渡大西洋，抵达今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拉开了欧洲人大批向北美移民的序幕，同时把新教传到北美。美国宗教信仰自由，最初传播的是英国的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公谊会。19 世纪创立了基督教复临派，用“末世论”来解释一切社会危机和弊端；安息会主张以“安息日”取代“守主日”，后与基督复临派合并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奋兴派用“心灵奋兴”来鼓动宗教狂热，谋求教会复兴；五旬节派主张继承“五旬节”圣灵降临传统，宣称信徒“成圣”。基督教新教的国际性社会活动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也产生于美国。加拿大人主要是英、法两国移民的后裔，新教和天主教信徒大约各占一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居民大部分是英国移民后裔，新教的影响超过天主教，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教派。

据统计，全世界的新教徒共 4.5 亿人，主要分布在西欧、北欧、北美和大洋洲。新教之所以能冲破教会与封建统治的藩篱在欧洲取得胜利，并迅速向北美和大洋洲发展，是因为它的思想观念能与时俱进，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尔文“信仰得救”的思想鼓舞新兴资产阶级勇敢地向封建制度发起攻击，《民族信仰宣言》成为争取民族独立的一面旗帜，他编写的《教会法案》和《教理问答》被确定为指导市民思想行为的规范和法规，

“仰赖于未知的至高的经济权力的恩施”正适合于资产阶级商业竞争的要求，因而取得了尼德兰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宗教国家。第一批奔向美洲寻求新大地的清教徒，在航行途中签订了一个名为《五月花公约》的政治纲领，希望在“新大陆”建起一个“新社会”，组成“公民团体”，制定公正、平等的法律，这便成为后来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思想先驱和蓝本。在欧洲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那些“资本占有者”和“现代企业家”多为新教徒。新教提倡不知疲倦的劳动和节俭生活的自我克制，乃成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有伦理色彩的生活原则”，给社会注入了一种新的生机。

3. 基督教文化圈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的信徒最多，大约有 15 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从空间分布看，佛教主要流行于亚洲，伊斯兰教主要盛行于西亚、中亚、南亚、北非、中非及印度尼西亚，而基督教则传遍世界五大洲，整个欧洲、美洲和大洋洲都以基督教为主，亚洲和非洲也有传播，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基督教文化圈”。世界五大文化圈在近代发生了巨大变动，佛教文化圈缩小，汉字文化圈受到局限，游牧文化圈大为压缩而多并入伊斯兰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也受到许多冲击，而基督教文化圈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却豁然扩大，由欧洲传到美洲及大洋洲，并在亚、非有所扩散。基督教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现实世界多元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对欧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尤为深刻，因此，研究基督教文化圈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基督教真正具有“普世意义”，走向世界是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宗教改革”和西欧各国的殖民活动是推动基督教海外传教的一大动因，在 16—17 世纪进入高潮。一方面，受到迫害的

清教徒向美洲寻找新天地；另一方面，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因受“宗教改革”的冲击而衰落，于是鼓励西班牙、葡萄牙向新大陆传教，借以达到“在欧洲所失要在海外补回”之目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欧各国在海外纷纷建立殖民地，基督教迅速传到世界各地。在美洲、中美及南美最初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主要传播天主教，称为“拉丁美洲”；而北美主要是英国清教徒移民的地区，以新教为主。大洋洲的居民多是英国移民的后裔，在 18 世纪以后新教的影响远远超过天主教。非洲在罗马帝国后期已出现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但 7 世纪伊斯兰教席卷欧亚大陆后大都不存，直到 15 世纪以后葡萄牙才开始在非洲西海岸传教，18—19 世纪新教又在非洲扩大传播，可是其势力仍不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向亚洲的传播自 16 世纪开始，尽管在印度、斯里兰卡、中国、朝鲜、日本都有一定传播，但由于佛教文化圈与伊斯兰文化圈的存在，只有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的天主教国家”。

基督教文化圈的形成是基于对基督教的信仰，它的共同因素是基督教文化。在这里，宗教信仰是它的核心，而基督教文化渗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各方面。由于基督教分化为三大教派，传播区域不同，因而又形成三个亚文化圈。大体上讲，东正教亚文化圈主要在东欧、巴尔干和俄罗斯；天主教亚文化圈主要在西欧、西南欧及拉丁美洲；新教亚文化圈包括英国、德国、荷兰、瑞士、北欧、北美及大洋洲，且多与天主教亚文化圈交叉。基督教分布如此之广，它在传播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持基督教文化的基本传统，另一方面又要与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协调一致，这种地域化、民族化的过程就是所谓“本色化”。就整个基督教文化圈而言，宗教信仰是基本的，但由于教派的不同和“本色化”的结果，在文化上又有许多差异，具有“求人同，存小异”的特征。

基督教由欧洲向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的传播，与

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有密切关系，在这里，“海外传教”与“海外殖民”基本上是同步的。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它与基督教教义的适应性有内在的联系，或者说，基督教的许多思想观念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要求，事实上，基督教文化圈内的大多数国家均属资本主义社会。“上帝创造世界”的世界观，使西方人在观念上不像东方人那样囿于“国土”，眼光看到整个世界，因而在海外拓殖，开辟新大陆就成为名正言顺的事情。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到达了美洲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将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次年他回到西班牙，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便宣布新发现的地方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并要求在那里传教。1493年第二次航行就带了一批传教士，在“开辟商业殖民地”的同时肩负着“使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的使命。他们打着“传播圣教”和“救主耶稣”的旗号征服了海地，又以“神圣十字军”和“信奉上帝”的名义征服了墨西哥。在他们看来，新大陆是上帝创造的，基督教应当传到那里，这样，殖民与传教便成了一而二、二而一的任务，用基督教神学作为他们的对外扩张的理论根据。

基督教义中的某些观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譬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未必都能做到，但“平等、自由”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却留下深刻的印象，被视为一种“天赋人权”，因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在观念上自发倾向民主、自由。“宗教改革”后教会的多元化，特别是“教随国定”和“教会自立”的思想，对于打破传统和一统化有积极意义，它适应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与社会组织结构。清教徒要求在海外建立“自由乐土”的愿望，对建立美洲社会的新秩序和新国家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独立运动和解放黑奴就是一种实践。其价值观虽然有“禁欲主义”倾向，但已不是传统的“遁世禁欲”思想，而是转变为

“自我克制”，追求刻苦实践与简朴生活的观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新教不崇拜偶像，不迷信权威，这就使人有一种鼎新精神，敢于打破旧的框框，勇于创新，因而促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上也不断创新。一般说来，在新教盛行的国家社会发展比较迅速，而比较保守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相对滞后。

《新约全书》中提出了“上帝之道”，它表述了天国与人间、上帝与自我的神学命题，而基督教文化中的若干基本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却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都体现一种“契约”观念，要求缔约双方都讲求信义，履行条约，这便成了人们处世的基本原则，在经济活动中及政治关系中都得到广泛运用。基督教宣扬的“公正”原则往往难以实现，但人们在思想上还是相信的，所以，美国总统就职时必须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在法庭上要按着《圣经》表示不说谎。“罪感”的思想，强调自我反省和醒悟改悔，这实际上是“自我控制”的重要手段，用“心灵的法庭”来自觉维护社会道德。基督教文化中的“拯救精神”，含有净化思想、自我牺牲、面对现实、关怀人生终极的多层含义，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和消除思想烦恼有相当作用。基督教所说的“圣爱”是信仰体系和社会伦理的核心，包括对上帝崇高的敬爱和“爱人如己”的“博爱”，这种“爱感”既是对信仰的坚定，又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及“福利社会”的建立都与此有关。然而，这些观念也有很大局限性，“平等、博爱、自由”对于“上帝选民”以外的人往往不适用，特别是对不信上帝的“异教徒”和黑人。

作为基督教文化圈来说，它最核心的部分当然是崇拜上帝和耶稣基督的宗教信仰体系，包括神学理论、哲学思想、教规教仪、宗教节日、教会组织等等。但由此而产生的基督教文化却涉

及许多方面，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在意识形态上，直接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审美观和思想情感，造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由于宗教的熏陶、濡染，人们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风俗习尚、思维模式及文学艺术风格也与其他文化圈不同。它还深层次地影响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法律制度、教育体制和各种文化活动。

基督教文化圈还有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普遍使用拼音文字，包括拉丁文字、希腊文字和斯拉夫文字，尤以拉丁文通行的范围最广。在欧洲，除希腊沿用希腊文，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马其顿、保加尼亚、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使用斯拉夫文而外，其余各国都被纳入拉丁文的体系，并与各民族的语言结合而产生多种文字。首先是属罗曼语族的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普罗旺斯文、加麦隆文、罗马尼亚文；接着是属日耳曼语族的英文、德文、卢森堡文、荷兰文、丹麦文、挪威文、瑞典文、冰岛文等；在“拉丁化”的过程中，属斯拉夫语族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也因信奉天主教而通行拉丁文，属乌拉尔语系的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立陶宛等也逐渐拉丁化。此外，土耳其人也使用拉丁文。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美洲全部拉丁化了，主要是因为欧洲移民和基督教传播的原因。大体说来，美国通用英文，加拿大用英文和法文；中美洲除伯利兹用英文外，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尼加和巴拿马均用西班牙文；西印度群岛各国中，古巴和多米尼加用西班牙文，海地用法文，巴哈马、牙买加、安提瓜、巴布达、多米尼加联邦、圣卢西亚、圣文森堡、格林纳丁、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特立尼达、多巴哥、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联邦均用英文，南美的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通用西班牙文，巴西用葡萄牙文，圭亚那用英

文，苏里南用荷兰文和英文，法属圭亚那用法文。大洋洲也因欧洲移民而拉丁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英文为官方文字，夏威夷群岛、关岛、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提、斐济等都通用英语。

拉丁字母在非洲和亚洲的传播主要是西欧各国殖民地的扩张，使用宗主国的文字。非洲原先多无文字，伊斯兰教扩播以后北部成为阿拉伯文字区，10—19 世纪葡萄牙、英、法、德等国入侵，大部分沦为殖民地，拉丁字母迅速扩散而阿拉伯字母区逐渐缩小。大体说来，在从西非喀麦隆至东非肯尼亚的语言分界线“班图线”以南，包括中非、东非和南非的大部分，都是拉丁字母系统的天下，主要通行英文和法文，一些阿拉伯国家也走拉丁化道路。亚洲的拉丁化较晚而且范围较小，这是因为亚洲早已形成了汉字、印度字母和阿拉伯字母文化圈，所以，西亚只有土耳其用拉丁字，东南亚用拉丁文字的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印度英语也颇为流行。

当然，基督教文化与现代社会中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最根本的是社会世俗化的趋势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世俗的真实是一种“非本质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宗教的“本质世界”在现实中又是不真实的，这就要求“真实生命”在“非本质世界”中度过，并去追求“本质”的彼岸世界。韦伯等人认为，世俗化标志着社会的“理性化”，随着“世界理性”的发展，它在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文教各领域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世界的非神秘化”而与宗教背逆。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两个世界”的分裂，产生人的“自我异化”，要么投入现实而失去宗教信仰，要么保持宗教本质而与现实格格不入，这就使基督教陷入两难的困境。在新的时代氛围和社会环境中，基督教力图解决若干困扰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新教派或独立于教会之外的新宗教，如摩门教、基督教复临派、耶和华见证会、基督教科学派、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等。20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基督教出现了一个“普世教会运动”，强调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世主”，教会应是超民族、超国家、超阶级的普世性实体，消除各个教派之间的纷争与对立，并建立“世界基督教协进

第四篇 地中海与伊斯兰文化圈

“十字东征”告诉我们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文明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一旦“政治气候”出现异常，就会引起激烈冲突。然而这两种特质不同的文明，都孕育、形成于地中海，并与希伯来文明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可谓是“同源异流”“相反相成”。

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同是一个地中海，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不同的文明，两者因时间、条件不同而异。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形成的时间相差七八个世纪，但谁也没有取代谁，经过一番较量之后，同时存在于地中海。大体上讲，地中海西部、北部是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东部及东南是伊斯兰教势力范围。它们都以地中海为圆心向外扩散，分别形成两个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圈。从深层次上考察，虽然它们都同是地中海文明的产物，但因各地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取向不同，因而接纳不同的文化。

从罗马帝国灭亡到“文艺复兴”之间有一个长达千年的时间空位，地中海文明的延续实际上是三条不同的路径：其一是西欧中世纪，其二是拜占庭帝国，其三是伊斯兰教。前二者事实上都是以基督教做媒介进行传承与传播，而伊斯兰教对希腊罗马文明的传承则仿佛是一条“历史暗道”，通过辗转的“翻译活动”找回了“失落的文明”，仿佛是搭在“古典”与“近代”文明之间

的一道“文化之桥”，此即所谓“趋舍异路，殊途同归”。

（一）伊斯兰教与阿拉伯帝国

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因此文化的根在阿拉伯民族。然而它的大背景却是地中海，在这个区域内的各种文化对伊斯兰教的形成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处在“新月形东方文化带”的包围之中，深受希伯来和波斯文化的濡染与熏陶。耶路撒冷是宗教文化的聚焦，它既是犹太教、基督教圣地，又是伊斯兰教圣地。要特别注意的是，伊斯兰教的兴起与阿拉伯帝国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伊斯兰教的创立推动了阿拉伯帝国的形成，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又推动伊斯兰教的迅速传播，在这里，宗教、国家、民族的联系十分紧密，在许多场合下简直是“三位一体”。就整个“伊斯兰世界”而言，“全民族信教”也极为普遍，并形成若干“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国家”。

1. 阿拉伯民族与伊斯兰教的创立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民族的发祥地，同时又是伊斯兰教的摇篮。它位于亚洲的西南部，北邻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西北是约旦河谷地，西临红海并有西奈半岛与埃及相通，南濒亚丁湾和阿拉伯海，东北隔波斯湾、阿曼湾与伊朗相望，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被称为“世界之桥”。阿拉伯半岛面积达 300 多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它是一个由西南向东北倾斜的“台地式高原”，沿西海岸向南为山脉环抱，向东是平坦的高原和低地，阿曼湾西岸又耸立着一列南北走向的山脉。由于高原与山脉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潮湿的海风，致使半岛内部成为广袤的沙漠，大约有 40% 是沙漠地带。总的说来，高原、沙漠、山地构成了半岛的主要景观，东部沿海地区为狭长平原，西南部也门地

区有“阿拉伯福地”之誉。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干燥炎热地带，年平均降水量在 100 毫米以下，鲁卜哈利沙漠夏季气温超过 50℃。波斯湾沿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产区，沙特阿拉伯号称“石油王国”。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故乡，也是阿拉伯民族登上世界舞台的始发地。阿拉伯是闪米特族的一支，按闪族语，“阿拉伯”乃是“沙漠”或“沙漠中的人”。虽然在阿拉伯半岛上也有定居平原的农耕者，但绝大部分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即所谓“贝都因人”，正是这个原因，在《古兰经》中的“阿拉伯”与“贝都因”几乎是同义词。贝都因人、骆驼、椰枣树是阿拉伯的三大生命，其生存环境就是一望无垠的沙漠。特殊的生态环境赋予阿拉伯人独特的性格与心态，具有游牧民族的典型特征。沙漠养成人们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游牧生活使他们惯于独来独往，“四海为家”。勇武是一种习尚，强悍好战，相信“强权就是公理”。以尚武为荣，极端自尊，不受羁绊约束。重群体而轻个人，视死如归。游牧民族是天生的商业民族，必须与其他民族交换产品，而且惯于长途贩运。多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使他们在性格上表现出鲜明的矛盾性：暴躁与豪爽、强悍与慈悲、服从与抗暴、信义与欺诈、掠夺与扶弱……以极其复杂的心态来应付变化多端的环境。这些游牧民族的重要特征，后来都凝结起来并升华为伊斯兰教的信仰。

在阿拉伯半岛周围，先后崛起了埃及、巴比伦、波斯等强大国家，而阿拉伯民族则像是一盘散沙。伊斯兰教史把创教以前称为“蒙昧时代”，那时高原上散处着许多游牧部落，人们以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四处游荡，骆驼是他们的“沙漠之舟”。部落、氏族之间经常为争夺水源、草地、牲畜发生战争，“血亲复仇”世代不绝。由于游牧民族需要与农耕民族进行产品交换，在绿洲上也兴起了一些城市，如麦加、麦地那。处在这种分散落后的状

况下，人们还停留在原始信仰阶段，崇拜自然，崇拜祖先，相信万物有灵。最受到崇拜的是水，降雨被视为“救旱”，泉水被称为“神水”，所以麦加城唯一的一处“渗渗泉”被奉为“圣泉”。奇异的山也往往成为崇拜对象，把它当作保护神，在麦加“克尔白”天房的墙上镶嵌的黑石，竟被称为“圣石”，所有的朝拜者都要去亲吻它、抚摩它、祈求保佑。天体中最受崇拜的是太阳、月亮和金星，植物中最受崇拜的是椰枣树。各种各样的神都渐渐偶像化，不同的氏族、部落崇拜的不同的神。外来宗教也在阿拉伯人中传播，主要是来自希伯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有来自波斯的祆教。

公元 6—7 世纪是阿拉伯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氏族、部落之间绵延不断的战争，带来了一连串重要后果，贫富分化，奴隶制盛行，渐渐形成若干部落联盟，客观上出现一种统一趋势。阿拉伯人善于经商，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阿拉伯的一些城市很早便成为西亚、北非、印度、中国的物资交流集散地，奴隶主贵族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控制商路，发展对外中转贸易。然而，长期以来，东方的商路先后为波斯帝国、塞琉古王朝、拜占庭帝国控制，阿拉伯人一直处于劣势。在 2—6 世纪的几百年间，埃塞俄比亚还与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结成联盟，不断侵略阿拉伯，527 年波斯的萨珊王朝又成为阿拉伯的统治者。历史呼唤阿拉伯结束四分五裂的状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实现统一，对外抵抗侵略、发展贸易。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意识形态势必也要发生变化，要求以共同的一神信仰取代分散状态的多神信仰，“哈尼夫运动”就是创立本民族一神教的先声。“伊斯兰时代”终于到来了，公元 622 年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

“伊斯兰”是阿拉伯文 Islam 一词的音译，原意是“顺从、服从、归顺、纯净”，因此，伊斯兰教就是顺从惟一真主安拉的宗

教，而它的信徒们就是“顺从者”，阿拉伯语称为“穆斯林”（Muslim）。伊斯兰教信仰的内容虽然涉及精神、物质、伦理、政治、经济、文化许多方面，但其基本信仰归纳起来就是五点，即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谓之“五大信仰”。信真主是伊斯兰教的核心，真主安拉是惟一的神，他创造万物，主宰世界，无所不在，无始无终，无形无影，全知全能，大仁大善，因为有许多美德，人们用九十九个“尊名”来颂扬他。“天使”是真主用“光”创造的妙体，听真主驱使，执行真主的命令，传达真主的启示，是真主的化身，因此，信真主就必须信天使。真主的“天启”集中表现在《古兰经》中，包括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基本功课、教规、教仪、伦理道德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各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穆斯林必须遵循的神圣准则和指南。“使者”是安拉在不同时期派到不同民族中的代表，负有传达真主命令，传布“安拉之道”的重大使命，据说曾派过315名使者，著名的有“六大使者”，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使者，也是最伟大的先知、至圣，故称“封印使者”。“信后世”也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之一，相信人们都要经历今生和后世，世界终有一大会灭亡而出现“世界末日”，人死后或入“天国”或入“地狱”，一切依生前的善恶而定。与此同时又“信前定”，相信世间的一切都是安拉预先安排好的，必须服从安拉的意志。伊斯兰教是坚决反对偶像崇拜的，无论真主、天使、使者都不立偶像。

伊斯兰教对每个穆斯林，除要求在意识上有“五大信仰”而外，在行为上还必须履行“五大功课”，即基本的功修和必须遵守的宗教义务。五大功课是指念功、礼功、斋功、课功和朝功，借以体现信仰、坚定信仰、完善信仰、磨炼意志。念功主要是指念诵“作证词”（舍哈德）及一切赞颂真主的经文，以“清真言”伴随自己的一生，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我作证：万物非主，惟

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礼功即礼拜，它是穆斯林面向麦加“克尔白天房”诵经、祈祷、跪拜的一整套宗教仪式，每日有五次礼拜（拂晓时行“晨礼”，正午时行“晌礼”，日落前行“晡礼”，黄昏时行“昏礼”，夜间行“宵礼”），星期五为“主麻日聚礼”（集体礼拜），开斋节和古尔邦节集体礼拜，丧葬时有“殡礼”。斋功即斋戒，逢伊斯兰教历的“莱麦丹月”（九月），成年男女穆斯林必斋戒一月，每日从拂晓到日落禁饮食、房事，戒除一切邪念，纯洁思想，一心向主。课功又称“天课”，它是“奉主命而定”的赋税，通过交纳天课来使自己的财产洁净，这种经济制度具有法律约束的性质。朝功即朝觐，规定每个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的成年穆斯林在一生中须至少到麦加城朝觐一次，以教历 12 月 9 日至 12 日为“大朝”或“正朝”，“小朝”时间不拘，目的是增加“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古兰经》规定，“圣战”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义务，即进行保卫伊斯兰教和反对异教徒的战争，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由哈里发或伊玛目发布动员会，行军及作战中念《古兰经》，高呼“安拉至大”，誓死如归，死于“圣战”者被尊为“舍牺德”（殉道者）。

伊斯兰教的创立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宗教变革和政治变革，它以一神教取代了多神崇拜，用共同的信仰来打破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以真主安拉作为统一的象征把阿拉伯人团结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它通过“政教合一”的政权形式，消除了阿拉伯的分裂割据状态，建立起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并推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社会变革措施，为阿拉伯帝国奠定了基础。它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一大宗教之一。这个新的宗教体现了阿拉伯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态，并把许多传统习俗和制度转化为神圣的功课和礼仪。例如：礼拜源于古老的宗教仪式，初期只有早晚两次，后来才逐渐规范划一；斋戒也是古已有之，在莱麦丹月人们都去麦加郊外希拉山洞祈祷和忏悔；

天课实际上是游牧社会的一种赋税制度，它在统一阿拉伯的战争中发展起来并成为制度化；不食“不洁净之物”、不食自死物、血液等，实际上是阿拉伯人早已形成的生活习俗。“圣战”与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密切相关，在伊斯兰教形成的过程中，以战争反对异教徒的迫害，以战争夺取政权、保卫政权，以战争抵御外来侵犯和扩大疆土。不崇拜偶像，事实上是对原先一切崇拜有形物和偶像的彻底否定，使人们在观念上消除传统的影响。

伊斯兰教的形成固然根源于阿拉伯民族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但也要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是犹太教。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均属闪米特族，奉亚伯拉罕为祖先，在伊斯兰创立以前几百年犹太教就在阿拉伯半岛传播。犹太教关于创世、复活、罚恶扬善、天堂地狱等观念早已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犹太教《圣经》中涉及的许多人物、故事在《古兰经》中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述。更重要的是伊斯兰继承了犹太教如下几个重要教义：首先是一神教的教义，在这里，惟有“耶和华”一神被转换为唯有“真主安拉”，对安拉神性的表述几乎与耶和华无异；其次是反对偶像崇拜，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偶像崇拜是一种罪恶和亵渎；其三是宗教与民族一体，犹太教只承认它的信徒为犹太人，伊斯兰教也把宗教作为统一阿拉伯民族的信仰；其四，犹太教曾建立过政教合一的国家，并有强烈的“犹太复国”情绪，伊斯兰教以此为楷模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其五，犹太教的“摩西十戒”既是道德行为规范同时又具有法律性质，伊斯兰教法也是如此。此外，在教仪上两者也有许多相近之处，如饮食上区分“洁净”与“不洁净”，屠宰牲畜要经过宗教仪式，禁食血液和自死动物，礼拜前要“净身”，男童须行“割礼”，还有诵经、礼拜等等。

基督教也很早就在阿拉伯半岛传播，特别是那些被斥为“异端”的教派如景教，在麦加还有一个信奉基督的“阿比西尼亚侨民团”。《古兰经》中提到的“弥撒”即耶稣，“麦尔彦”即玛利

亚，“叶哈雅”即约翰。有些故事与《圣经》类似，关于天国、火狱、天使、魔鬼的说法也很接近，还转述了《圣经》中的某些节文，如“骆驼与针眼”、“建筑在沙上上的房子”之类。基督教的礼仪如聚礼、斋戒、壁龛、讲台等也颇相似。不过，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基督教把所有的信奉者都视为“上帝的选民”，伊斯兰教也突破阿拉伯的界限把宗教传到世界上许多民族和国家；二是基督教强调“上帝与我同在”的思想与伊斯兰教“真主与我同在”是一致的；三是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与基督教的耶稣基督同样都是“先知”，但是，伊斯兰教反对“三位一体”的说法，也反对“道成肉身”的说教。

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也对伊斯兰教产生过重大影响，很可能是在伊斯兰教征服波斯的过程中融入的。伊斯兰教称真主为安拉，同时又称之为“胡达”，“胡达”是波斯语 *khudai* 词的音译，意思是“真神”。“天神”和“使者”的观念，也可能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影响最强烈的是关于“末世审判”的思想，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人死三日后灵魂到达“分别之桥”，经过神的审判或升入天堂或跌入地狱，这与伊斯兰教的“信后世”实际上是一致的。如果进一步探讨，十叶派主张的伊玛目世袭制来源于古波斯王权神授的思想，苏菲派关于灵魂的净化、神光思想以及盖德尔派和穆尔太齐赖派关于意志自由的思想，都受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

总之，伊斯兰教的形成，从根本上是阿拉伯历史的产物，它植根于阿拉伯文化的土壤上，反映了游牧民族诸多的文化特征、心理要素和传统习俗，适应阿拉伯民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受到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多方面的影响。而这一切都装进伊斯兰的宗教框架，升华为宗教信仰，套上神圣的光环。

2. 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教的扩展

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使阿拉伯走向统一，他的后继者们高举着伊斯兰教旗帜在“圣战”的呐喊声中踏上了扩张的道路，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建立以后伊斯兰教在地中海周围迅速传播。在这里，伊斯兰教的形成、发展与阿拉伯的统一和帝国的建立息息相关，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相互促进，互为前提。正如希提《阿拉伯通史》所说：“穆罕默德在短短的一生中，把向来散漫的阿拉比亚（即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坚强的民族；把一个仅仅是地理上的名称——阿拉比亚改变成一个有组织国家；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宗教，在广大的地区，取代了犹太教和基督教，而现在仍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信奉这个宗教；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这个大国辽阔的版图，包括了中世纪时期文明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地区。”

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大约在 570 年诞生于麦加城古莱氏部落的哈希姆家族，由于家道中落而陷入贫困。据说他 40 岁时在麦加城北的希拉山洞中沉思冥想，突然得到“天启”，从 613 年开始传道。信徒们以“安拉是独一无二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的信条，号召人们不分部落氏族、消除血亲复仇、禁止高利贷盘剥、行善好施、释放奴隶，受到广大下层人民拥护。一神教的主张与当时盛行的多神崇拜完全抵触，而他提倡的社会改革措施又直接损害了古莱氏贵族的宗教特权和经济利益，因而遭到强烈反对，致使他在麦加难以立足。622 年，穆罕默德带领他的信徒迁往麦地那，阿拉伯语称为“希吉拉”（即迁徙），从此伊斯兰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故这一年成为伊斯兰历纪元的开始。麦地那住着两个阿拉伯部落和三个犹太人部落，为了协调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制定《麦地那宪章》，使之和平共处。穆罕默德在这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乌玛），在“凡

穆斯林皆兄弟”的号召下统一了麦地那，确立了五大信仰、五大功课及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的各种制度，并建立了穆斯林武装。公元 624—627 年，在“为安拉而战”的口号下，穆斯林武装对麦加贵族进行了多次战争，迫使麦加贵族签订《侯代比亚和约》。630 年，穆罕默德以麦加贵族违背协议为由，率军直逼麦加城，改“克尔白天房”为清真寺，从此麦加便成为穆斯林朝觐的中心。通过“圣战”统一了阿拉伯半岛，通过传教使阿拉伯成为共同信仰伊斯兰的民族，并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穆罕默德也因此成为宗教领袖兼政治领袖。632 年，穆罕默德率 10 万穆斯林到麦加朝觐，以安拉的名义宣布伊斯兰教的胜利，就在这一年他与世长辞了，所以称这次朝觐为“辞别朝觐”。

穆罕默德去世后，麦地那的穆斯林沿袭部落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推举继承人，称为“安拉使者的哈里发”，简称“哈里发”。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国家体制的原型，其原则有三，即政教合一、弘扬伊斯兰精神和通过民主选举哈里发。从 632 年至 661 年先后推选了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四人为哈里发，称为“四大哈里发时期”或“正统哈里发时期”。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在位两年，派出 11 路军队镇压各地暴乱，挽救了伊斯兰教的危机，重新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并开始向外扩张。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在位 10 年，从 634 年派被誉为“安拉之剑”的哈立德进军叙利亚开始，先后征服了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并占领波斯大部分土地，他还确立了国家的行政、司法、军事、土地制度和年俸制度，制定了伊斯兰历法。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在位 12 年，继续远征北非迦太基，平定波斯叛乱，向中亚进军，他主持编纂的《古兰经》成为定本。第四任哈里发阿里在位 5 年，在此期间出现了相互对立的政治派别，导致穆斯林之间的内战与教派分裂。四大哈里发在伊斯兰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巩固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地位，

向外扩展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继承了穆罕默德的事业。

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期间，麦加古莱氏部落倭马亚家族的穆阿维叶拥有一支长期对拜占庭作战的叙利亚雇佣军，用武力与阿里对抗。661年阿里被刺，穆阿维叶哈里发把政治中心移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开始了哈里发的世袭制，史称“倭马亚王朝”。这个王朝存在89年，虽仍沿用哈里发的称号，但实际上已变成了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此时阿拉伯人由游牧经济转为定居农耕，实行土地分封制，统一了赋税和币制。在各地兴建清真寺，鼓励异教徒改奉伊斯兰教，并以《古兰经》和“圣训”制定法律。在文化上广泛吸纳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的先进科学文化，逐步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倭马亚王朝采取招募军队的政策，发动了规模巨大的对外战争，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初，向东占领了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向北进入中亚阿姆河地区、外高加索，向西征服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经过3年战争占领了西班牙半岛，形成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在倭马亚王朝末期，政治、宗教斗争激化，王族争权夺利，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在“还政于先知家族”的号召下，747年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艾布·阿拔斯举起黑旗攻占木鹿城，后被拥戴为哈里发，于750年建立阿拔斯王朝。因阿拔斯家族以黑色为标志，被称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存在508年，它是伊斯兰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大规模的征战已经结束，出现了一个安定和平的环境，阿拉伯商人的足迹遍及欧、亚、非各地。这是伊斯兰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王朝在各地创办宗教学校、图书馆、天文台和医院，在医学、数学、天文、化学及哲学、史学、地理学、文学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就。在此期间阿拉伯语广为传播，并出现了一个长达两世纪的翻译活动，保存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的古代文化遗产。伊斯兰教在这几百年中成为帝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并

使社会生活“伊斯兰化”，伊斯兰教义学、教法学及伊斯兰哲学都有较大发展，出现许多派别。但自 9 世纪中叶以后，各地总督和封建主各据一方，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帝国东部先后建立了希尔塔、萨法尔、萨曼、伽色尼、花刺子模等小王朝，北非先后建立了哈瓦利吉派王朝和伊德里斯王朝，西部出现了阿格布拉、图伦、伊赫什德等王朝，它们仅在名义上保留与阿拔斯王朝的宗主关系。10 世纪出现了两个与阿拔斯王朝分庭抗礼的哈里发国家，它们是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和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法蒂玛王朝为十叶派所建，史称“绿衣大食”，先定都马赫迪亚，后迁都弗斯塔德（今开罗），极盛时控制北非和西亚，存在于 909—1171 年。后倭马亚王朝建于 756 年，它由倭马亚家族王子阿布都·拉哈曼一世所建，建都科尔多瓦，9—10 世纪强盛于西班牙，史称“白衣大食”，1236 年为西班牙人推翻。“十字军东征”时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一些拉丁国家，但经过两百年的较量，西亚和北非仍是伊斯兰教的领地。12 世纪末阿拔斯王朝一度中兴，但这个庞大的帝国终于在 1258 年被蒙古军的铁骑摧毁。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统一与崛起的过程中兴盛起来，并成为阿拉伯民族的精神支柱。在伊斯兰的旗帜下，阿拉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或可称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在帝国时期，伊斯兰成为国教，阿拉伯语通行于帝国统治下的许多地方。阿拉伯国家的建立，使地中海沿岸许多地方迅速“伊斯兰化”，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包括西亚、中亚、北非广大区域。在这个辽阔的国度里，各种文化交融而成独具特色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将东、西方文化铸为一炉，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地中海文明发展的长过程来看，它是继希腊、罗马之后出现的一大旷世奇迹，在 7 世纪后伊斯兰文化上升为地中海的主流文化，阿拉伯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中心，并强烈地向外辐射。从纵向考察，希腊、罗马文化并没有直接延续

下来，而是通过阿拉伯帝国的翻译活动保存在伊斯兰文化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在世界文化史上做出的贡献是巨大而且不朽的。

3. 三足鼎立的伊斯兰国家

13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动，正当阿拉伯帝国分崩离析，“十字军东征”成了强弩之末时，蒙古在大漠勃然兴起，建立了金戈铁马的草原帝国，急风暴雨式地席卷欧亚大陆。继拔都远征欧洲建立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之后，1253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统领大军进入地中海东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258年颠覆了阿拔斯王朝，建立了一个包括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及中亚阿姆河西南地区的伊儿汗国。阿拉伯帝国虽然破灭了，但几个世纪以来造成的“伊斯兰世界”依然存在。蒙古人对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对伊斯兰教加以扶植，更重要的是这种宗教很容易为游牧民族接受，所以很快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上升为伊儿汗国的国教。伊儿汗国信奉伊斯兰教，不但直接影响波斯，而且对小亚细亚和印度都有深远影响。它推动伊斯兰在中亚突厥民族中的传播，使我国新疆的察合台汗国迅速“伊斯兰化”。在牧民中广泛流行的苏非派越来越受到蒙古、突厥统治者的重视，经过蒙古风暴之后，苏非派教团成为穆斯林宗教生活的一种方式，盛行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并给伊斯兰教注入了一种自我复兴的活力。

然而，经过蒙古人的猛烈袭击，阿拉伯从此一蹶不振，丧失了他在“伊斯兰世界”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再也没有力量来建立统一的帝国，从此穆斯林在星期五聚礼的祈词中也不再提起“哈里发”的称号了。阿拉伯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后，各国的伊斯兰教势必独立发展起来，虽然统治者仍以伊斯兰教作为精神支柱和统治工具，但伊斯兰教对于国家的建立、王朝的更迭并不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因而促使宗教与政治脱节。与此同时，宗教的传播也不可能再依靠征服与扩张，更多的是靠信仰，通过愈加严格的教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稳定伊斯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16—18 世纪是伊斯兰中世纪的“后期复兴”阶段，出现了以小亚细亚为中心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以伊朗为中心的帖木儿帝国和沙法维王朝以及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这些帝国虽然被誉为“伊斯兰正统信仰最坚决的捍卫者”，继承伊斯兰帝国向外扩张的传统，但它们的统治者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而是来自中亚的突厥民族了。而且，在这三个帝国之中，无论其中的任何一个都无力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只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

13 世纪初，属于突厥民族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中业兴起，其部落首领奥斯曼一世称“苏丹”，建立了奥斯曼国家。从 14 世纪开始向外扩张，占领中亚、巴尔干半岛，侵入小亚细亚，并在 1453 年灭了拜占庭帝国，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改圣索菲亚教堂为清真寺。在 15 世纪与 16 世纪之交，奥斯曼已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封建帝国，占有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及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还把势力伸向北非。这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从苏丹赛利姆一世开始自称“哈里发”，奉伊斯兰逊尼派为国教，并以哈乃斐教法为立法、司法的依据。政府设立“伊斯兰委员会”作为管理宗教的权力机构，维护信仰，监督教法实施，并用行政手段实行“伊斯兰化”，凡不信伊斯兰教的人都必须交人头税。它在各地修建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图书馆，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伊斯兰文化。由于它控制了地中海通往黑海的商路，又占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对欧洲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造成巨大威胁，影响东南欧和中欧的政治形势。17 世纪以后，由于内外矛盾交困，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18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亚、非殖民地，

奥斯曼帝国首当其冲，于是在拿破仑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号召下终于导致这个帝国的彻底崩溃。

蒙古人建立的伊儿汗国以伊朗为中心，在这里扶植了伊斯兰教。1370年，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帖木儿推翻了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成为西察合台的“大汗”，他追随成吉思汗的步履，在位30余年间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1390年开始进攻伊儿汗国，夺取了伊朗和阿富汗。以后又进攻钦察汗国，进军两河流域、南高加索和印度，建立了一个北起俄罗斯东南部、南至德里的伊斯兰国家。帖木儿帝国虽是蒙古人所建，却很少采用蒙古制度，而是建立伊斯兰社会，国家元首称为“苏丹”。从14世纪末起，帖木儿帝国衰落，1500年为中亚的乌兹别克人所灭，其后裔进入印度后建立莫卧儿帝国。16世纪初，沙法维教团的伊斯玛仪攻占伊朗，建立沙法维王朝，宣布十叶派为国教。沙法维教团的首领伪托是十叶派第七伊玛目的后裔，伊斯玛仪是“隐遁伊玛目”的代表，其教义实际上是十叶派伊玛目与苏非神秘主义的混合物。沙法维王朝建立后，把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十叶派乌里玛请来进行一次十叶派的宣教活动，用强制手段迫胁人们皈依十叶派，对逊尼派进行残酷迫害，打着十叶派的旗号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相对抗。在沙法维王朝初期，苏非派的神秘主义为十叶派吸收，出现了以毛拉·萨德拉为代表的“伊斯法罕学派”（即“照明学派”）。到了后期，十叶派的乌里玛与王朝矛盾加深，在政治上力图摆脱对王朝的屈从地位，在宗教上强调捍卫十叶派教义的纯洁性，于是视苏非派为异端，造成十叶派与苏非派的分离。沙法维王朝建立后首先面对的劲敌就是奥斯曼帝国，双方进行了起起落落百余年的战争，在军事扩张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括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及阿姆河地区的帝国。这个帝国不同于以往的波斯帝国和新波斯帝国，因为它已成为了一个伊斯兰国家，而且是以十叶派为国教的国家。但它以十叶派的形式保留了波斯

的文明和波斯的民族特征。不过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到了 17 世纪，终于在人民不断起义与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况下走向衰落。

莫卧儿帝国是 16 世纪在印度北部建立的伊斯兰国家，其开创者是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因其统治者具有蒙古血统，故称“莫卧儿”（Mughal），意为“蒙古”。从 1526 年巴卑尔攻占德里起到它的灭亡共 331 年，经历了 17 代君主。前 6 个君主统治的 181 年间，莫卧儿帝国由创始进入极盛，第六代君主阿克巴经过 40 多年的征战不断扩大版图，北起克什米尔，南至戈达瓦里河上游，西起喀布尔，东到布拉马普特拉河，成为一大军事大帝国。在此期间，阿克巴极力缓和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矛盾，依靠伊斯兰教来控制国家，在强调伊斯兰正统情况下使之逐渐印度化。国家机构与宗教体制并不统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措施都由帝国政府制定，但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互相支持。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分全国为 15 个省，省长由君王委派。他大兴土木，使德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之一。但在此后的 150 年间，由于加重对农民的负担，重新挑起伊斯兰教对印度教的迫害，加之贵族内讧、省督拥疆自立及外族入侵，终于在 1857 年寿终正寝，最后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13 世纪以来，由于蒙古人和突厥人占居统治地位，并皈依伊斯兰教，使“伊斯兰世界”大体保持阿拉伯帝国时代的地盘，但其统治者已不是阿拉伯人而是以突厥民族为主，帝国一分为三，这对以后的“伊斯兰世界”变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4. 伊斯兰教派及教法教义学派

伊斯兰的派别极其纷繁，有人曾传出一条“圣训”说：“犹太人分为七十一派，基督教徒分为七十二派，我的人将分为七十三派。”虽然有人对此“圣训”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但伊斯兰教史表明的确存在许多派别。这里有因政治斗争而形成的教派及其

分化出来的若干支派，有因对教法、教义理解不同的各种学派，还有既不同于教派又不同于学派的苏非派，若不认真条理分析，很容易陷入迷惘之中。有人说：“伊斯兰教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政治斗争的历史。”这一说法虽未免有些绝对，但却抓住了本质，教派之间公开的、隐蔽的乃至诉诸武力的斗争，贯穿着整个教史，核心都是政治问题。教派是一个总纲，由它不断析出支派，演绎出各种不同学派。

尽管穆罕默德一再告诫穆斯林们“要统一”、“不要分裂”，但他去世之后却因“哈里发”问题引起纷争，围绕着继承权展开了剧烈争斗，终因矛盾激化而导致教派产生。在四大哈里发中有三人被刺身亡，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阿里被选为第四任哈里发，穆罕默德之妻阿绮纱首先反对，她骑着骆驼与阿里作战，爆发了穆斯林之间的第一次战争，史称“骆驼之战”。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以阿里包庇刺杀奥斯曼的凶手为由，拒不承认阿里的合法性，双方激烈冲突，于 657 年爆发了“隋芬战役”。相持不下，于是穆阿维叶提出“以《古兰经》裁判”。阿里营垒中迅速分化为主战派与主和派，大多数人主张和平解决，于是阿里便同意“依经裁判”。主战派认为阿里此举是背叛行为，愤而出走，因阿拉伯语称“出走者”为“哈瓦利吉”，从此形成了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教派——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派代表下层牧民、释放奴隶的利益，主张“穆斯林平等”，号召人们用武力夺取领导权，因而又被称为“军事民族派”。他们不但与阿里誓不两立，而且坚决反对后来兴起的倭马亚王朝，举行了 35 次起义，因而遭到残酷镇压。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但他们对信仰极端虔诚，“平等”、“民主”的思想得到下层穆斯林的拥护，所以又死灰复燃，起义持续 14 年之久，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哈瓦利吉派内部因为在政治和军事上经常产生分歧，先后出现了 20 个支派，其中主要有阿扎里加

派、纳吉德派、伯哈希叶派和易巴德派。

伊斯兰教中影响最大的是逊尼派和十叶派，它们都是在“哈里发”继承权的斗争中同时形成的，斗争的焦点是“哈里发”由穆罕默德家族产生还是由民主推选。“逊尼”是阿拉伯语音译，由“逊奈”一词而来，原意是“教训”、“告诫”、“行为”、“品行”等，专指穆罕默德的言行，因自认是忠实遵守穆罕默德的“教训”，承认由推选产生的四大哈里发都是合法的，称为“正统派”。与此相反，十叶派认为哈里发只能由穆罕默德家族继承，并认定阿里为正宗，不承认其他三大哈里发的合法性，于是被斥为“异端”。“十叶”是阿拉伯语，意为“分派”或“宗派”，又因是阿里的追随者而称“阿里派”。两派之间虽有共同信仰却水火不容，斗争延续千年之久，经常兵戎相见。由于逊尼主张哈里发由推选产生，所以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后来各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都支持它，因而成为最大的教派。十叶派有很大的局限性，既不符合阿拉伯帝国两个王朝的要求，更不适合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因而只局限在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等地，其人数大约只占穆斯林总数的 14%。

逊尼派和十叶派存在许多分歧：其一是哈里发问题，逊尼派认为四大哈里发都是合法的，十叶派只承认阿里才是合法继承人；其二是“使者”问题，逊尼派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个也是最伟大的使者，而十叶派却认为阿里也是使者，甚至对阿里的崇拜有时还超过穆罕默德；其三是对《古兰经》的理解问题，因为各有不同说法，都指责对方曲解经义，褻渎经文；其四是对“圣训”的态度问题，逊尼派奉六部《圣训集》为立法依据，而十叶派则斥之为“伪训”，自创“圣训”以适应自己的主张；其五是对宗教领袖的看法问题，逊尼派认为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是宗教领袖，有执法权而无立法权，而十叶派认为“伊玛目”才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和人间最伟大的导师。显然，由政治

原因导致的教派，在往后的发展中在教法、教义方面也引起许多纷争

十叶派因为受到逊尼派及其当权者的排斥，处于劣势，作为被压迫者出现，产生了“神光”、“马赫迪”思想、《古兰经》隐义说，强调“塔基亚”原则，在许多方面有别于正统的逊尼派，也有别于哈瓦利吉派。十叶派宣称阿里是得穆罕默德“遗嘱”的继承人，并在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的影响下，将阿里及其后继者“伊玛目”神化为“救世主”，因而具有“神光”。他们认为伊玛目是“被引上正道的人”，阿拉伯语称为“马赫迪”，提出“马赫迪伊玛目转世”说，宣称穆罕默德和阿里将来还会转回人间，使世界充满公道，伊玛目由真主所定而无须人们选举。又认为《古兰经》除了那些明确表达的教义而外，还有许多隐含的经义，只有阿里才精通这些隐义，正因为他们强调“隐义”而被称为“内学派”（即巴颓尼亚派）。“塔基亚”意为“警惕”、“害怕”、“掩饰”，即教徒遇有危险时可暂时隐讳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本是伊斯兰教普遍的一条原则，但因十叶派随时处在危险之中，故特别强调这一原则。此外，十叶派认为伊玛目“永无错误”，有独断独行的绝对权威，在教法上显然不同于逊尼派。因为对伊玛目的神化程度不同和对其后裔的崇拜不同，形成了许多支派，大体可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两类，主要有十二伊玛目派、栽德派、伊斯玛仪派、卡尔马特派、德鲁兹派、尼查尔派、穆斯塔尔派、岂桑派、努赛里派、阿赫里哈克派等。10世纪至11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日趋衰败，十叶派逐渐抬头，出现了所谓“十叶派世纪”。这一时期，十叶派的布维希王朝曾一度控制阿拉伯帝国的朝政，在埃及出现了伊斯玛仪派的法蒂玛王朝，开罗成为伊斯兰文化中心。16世纪初，沙法维教团的伊斯玛仪占领了波斯，建立了沙法维王朝，宣布十叶派为国教。

随着哈瓦利吉派和十叶派的分化，逊尼派为了使广大地区的

穆斯林在信仰上趋向同一，行为上逐渐规范，确立了官方的《古兰经》注、“圣训”汇编、教义学和教法学，使之由政治派别发展为教派。《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立法依据和神圣指南，但因理解不同而有多种注释，逊尼派著名的经注有《凯沙甫》、《太甫绥鲁·凯比勒》、《巴达维古兰经注》、《塔百里古兰经注》等，与十叶派的《布尔汗》、《希德拉图·穆塔哈》不同。逊尼派奉为权威的六部穆罕默德言行录称为“六人圣训集”，包括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实录》及提尔米基、阿布·达伍德、奈萨仪、伊本·马哲汇录的《圣训集》，而十叶派则另辑“四圣书”，即《宗教学大会》、《教法自通》、《圣训辨异》和《法令大全》。教义学争论的中心是“真主独一”问题，8世纪产生的“凯拉姆学”依照逻辑及辩论方式表达其信仰，被正统斥为异端，8—9世纪由于艾什尔里及其弟子的努力，创立了“新凯拉姆学”，强调安拉的全能，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安拉“前定”的，但人有选择自己行为的能力，人们必须在安拉面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学说渐渐为逊尼派普遍接受，遂成为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学，11世纪安萨里将苏非派神秘主义加以改造引入正统信仰，最终确立了正统的教义学体系和地位。伊斯兰教法至关重要，它是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规定，按安拉的立法来规范穆斯林全部行为的准则，在逊尼派中被公认为正统、权威的有四大教法学派。

伊斯兰教法的阿拉伯语为“沙里亚”，含有“路径”、“常道”、“诫命”等意思。教法学派既不是教派，也不是教团，而是阐述教法的学派。早期自发形成的教法学派，具有地域性特征。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定型，转变为以权威学者的学说为基础的“个人学派”。到了阿拔斯王朝前期，有的学派已被淘汰，为逊尼派公认的只有四大教法学派，即哈乃斐学派、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和罕百里学派。哈乃斐学派的前身是伊拉克的库法学派，

阿布·哈尼法首先进行构建教法体系的尝试，他的门生阿布·优素福著有《赋税论》一书，另一个门生舍巴尼是学派的真正创始人，主张尽可能保留独立判断的权利，但必须有高度系统、严密的推理，采用类比推理的方法。马立克学派起源于麦地那的司法实践，主张以麦地那“公议”的惯例为基础进行个人推理，对《圣训》考虑取舍，若与社会福利冲突时可离开类比修改圣训原则，马立克的门生伊本·嘎西木所著《教法札记》标志这一学派正式形成。沙斐仪学派对严格奉行天启与运用理智之间做了调和，主张以“先知的逊奈”取代各学派的现行惯例，用社团的公议否定学派的公议，并以严格的类比推理排斥自由斟酌的个人意见和决断。罕百里学派是保守的正统派，坚持教法的每条规定必须以圣训为依据，汇编了《穆斯奈德》圣训集，坚持法律和伦理的双重规范，后来也接受“公议”与类比推理。四大教法派虽有某些差异，但教法渊源、法理原则、法律体系基本相同。大体上讲，哈乃斐学派盛于西亚、中亚和南亚，马立克学派盛行于北非、西非和中非，沙斐仪学派流行于东非、阿拉伯南部、下埃及和东南亚，罕百里学派后来成为沙特阿拉伯的官方法律学派。由于有了共同的注经学、圣训、教义学和教法学，逊尼派比较统一，没有产生众多的支派，在官方的支持下成为伊斯兰教中最大的教派，绝大部分穆斯林都属这一教派。

大约在 9 世纪初出现了苏非派别，它不同于因政治原因形成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也不是上属教派的支派，不卷入政治斗争，采取超脱的态度专注于精神修炼以求“人与主合一”。它也不同于那些教法、教义学派，在教法问题上虽有自己的主张而始终没有形成独立学派，它除坚持神秘主义教义而外，还有一套独特的神秘主义宗教仪式，是一个独特的神学派别。正是这个原因，苏非派的成员分属于不同的教派和学派：既有逊尼派苏非，又有什叶派苏非；既有“遵法派”苏非，也有“非遵法

派”苏非。尽管它被统称为苏非派，但从来没有成为统一派别，从 12 世纪中叶起形成许多苏非教团，成为“教中之教”。教团内实行以导师为中心的教阶制，导师是苏非成员的精神领袖及宗教、世俗生活的主宰者，教团有固定的教堂，固定的朝拜圣地和圣墓，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信徒还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教团交纳钱财。教团之间因道统、道堂、精神修炼道路、修持方式、赞念仪式、叩拜仪式、祈祷词及衣着、习俗不同而互相区别，一般以创始人命名。它们除宣传伊斯兰教义外，还传播本教团的神秘奥义。

“苏非”(sūfī)一词，众说纷纭，或为“洁净”、“品位”，或为“虔诚礼拜”、“穿羊毛衣的人”。从苏非派的信仰、仪式和生活方式来看，他们的确不同于其他穆斯林，过着清贫的生活，以敬畏、虔信、坚忍、克制、苦行、禁欲为召唤，追求灵魂净化的极高境界，专注于内心的精神修炼，其核心是神秘主义。它是穆斯林虔诚信仰的实践结果，初期以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为特征。其后受到希腊、波斯、印度宗教思想影响，发展为“神爱论”（安拉与信仰者的关系不是主仆关系而是爱与被爱的关系）、“神智论”（经过精神修炼和灵魂净化获得“神光照明”，从而萌发安拉的知识“神智”）和“泛神论”（得“真知”而“与安拉一起永存”）^{11—12} 世纪之交，安萨里对苏非神秘主义进行取舍，使之与调和理性与启示、科学与信仰的艾什尔里派观点结合，得到官方承认，从而将苏非派的某些神秘主义引入逊尼派教义学，安萨里也因此被奉为“伊斯兰教权威”和“宗教复兴者”。他的学说之所以成为“官方信仰”，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足苏非的神秘主义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把它吸收进来有利于争取更多的穆斯林，包括逊尼派与十叶派中的苏非；其二是需要用哲学和神学来论证信仰，深化逊尼派的教义学，有利于统一思想，抵制异端教派，更好地与十叶派抗衡；其三是提倡虔诚信仰，一心向

主、净化灵魂，有利于巩固伊斯兰教信仰，坚定人们的信念。所以在“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期间，虽然国家受到很大威胁和摧残，但穆斯林们并未放弃自己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讲，它实际上是伊斯兰教的一次宗教改革，使之增加新的活力。

（二）地中海孕育的伊斯兰文化

提到“伊斯兰”，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伊斯兰教，把视线集中在宗教上，而于它的文化内涵很少关注。其实，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独特而重大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宗教为核心引发出多方面的文化，构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伊斯兰文化体系无可讳言，宗教是它的内核，围绕着“顺从真主安拉”的信仰，形成一整套宗教文化，包括经典（《古兰经》和《圣训》）、教义、教法、教仪、教规以及宗教组织（教派、学派、教团）、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道堂、经堂、圣地、陵墓）等。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层面，即由宗教直接导致的社会文化现象，如思想意识、伦理道德、社会制度、生活习俗之类。第三个层面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医学、工艺、建筑等等，它们都深受伊斯兰教影响，打上宗教的印记。在这里，伊斯兰文化虽然以伊斯兰教为本原，但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外延要宽广得多。

关于伊斯兰文化的形成，美国学者希提在《阿拉伯简史》中做了如下概括：“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并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由于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它的母本是在阿拉伯文化土壤上发育起来的伊斯兰文化。然而在阿拉伯帝国形成与伊斯兰教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波斯文化对它产生重大影

响，并吸收了地中海文化，包括埃及、巴比伦、希伯来文化及希腊、罗马文化和印度文化。这不仅是文化吸纳范围的扩大，而且是一次新的提升，使之成为以阿拉伯文化为原质特色，以伊斯兰教为命脉而兼容地中海诸文化的一种新文化，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或称“阿拉伯—穆斯林文化”。对此，埃及伊斯兰学者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做了准确的解释，他说：“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乃是由三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一是阿拉伯人的固有文化；二是伊斯兰教文化；三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的文化。”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阿拉伯语言、文字及其传播，从“翻译运动”入手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进程，从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两方面展现其文化风貌。

1. 阿拉伯语言文字及其扩播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圣训》及许多重要的伊斯兰教典籍也使用阿拉伯文，久而久之，阿拉伯文便成了伊斯兰教的文字。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和伊斯兰教传播范围扩大，阿拉伯文也就扩散到许多地方，使用阿拉伯文或者运用阿拉伯字母创制本民族文字，就成为伊斯兰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标记。尽管到了近代，阿拉伯文和阿拉伯字母的流通范围一再缩小，但仍然是仅次于拉丁文的一种国际文字。当今世界上有 20 多个阿拉伯语的国家以阿拉伯字母作为通用文字，它们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也门、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毛里塔尼亚等。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虽然不是阿拉伯语国家，但也以阿拉伯字母作为正式文字。我国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文字，也是由阿拉伯字母发展演变而成。

阿拉伯字母源于阿拉马字母，它是北方闪米特字母的一个分支。在公元前 8—7 世纪，阿拉马字母就流行于叙利亚、阿拉伯北部、波斯、阿富汗等地。波斯帝国瓦解后，阿拉马字母的黄金时代过去了，阿拉马字母也随之分化。大约在公元前 200 年，阿拉伯半岛上的那巴泰人利用阿拉马字母创制适合阿拉伯语的那巴泰文，6 世纪前后又接受源出于阿马字母的古叙利亚文，并由这两种文字演变为阿拉伯的纳斯赫文和库法文。库法文的碑铭字体早已不用，后来通行的是以麦加和麦地那的流线形草书字体。阿拉伯字母有 28 个，从右至左书写。其中有 22 个是闪米特字母，另加 6 个新分化出来的字母，还有一个表示声关闭音的符号 [']。最初的阿拉伯文简单、粗糙，没有带点的符号，基本沿用闪米特字母的顺序。重大的改革是由哈里发阿里的门徒完成的，首先使用新的词尾变化规则，并在单词的上方、下方、前方加黑点或短线标出发音符号。阿拉伯字母本来只表辅音，后来阿拉伯语言学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表示长元音和短元音的符号及叠音符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准确。由于阿拉伯文必须使用附加符号以示区别，看去斑斑点点。书写或印刷时两三个字母常常笔划相连，弯弯曲曲像葡萄藤一样，造成阅读和打字的困难。

如前所说，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阿拉伯分为许多氏族、部落，各地语音、词汇差异较大，仅《古兰经》所反映的就有 7 种方言。由于语言不统一，同一个字在不同方言中有不同含义和不同读音，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的情况相当突出，这就影响到人们对《古兰经》、《圣训》的准确理解，也影响到颂经的语音和声调，为此必须对语音、词汇、语法进行规范，导致阿拉伯语法的产生。按语言的纯正来说，应当是那些很少与外族杂居和交往的游牧部落，但就语言的影响力和《古兰经》产生的背景来说，学者们认为麦加城古莱氏部落的语言更具有代表性和最能表达经义，因此确定以麦加古莱氏部落的语言作为标准语，并逐渐成为

阿拉伯的通用语。然而，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在语言上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征服了西亚、北非之后，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在原先的阿拉伯语中没有这些词汇，于是大量引进外来词，以来自波斯语的外来词最多；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外族人被俘虏到阿拉伯做奴隶，使阿拉伯人与多种民族杂处，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引起混杂、错乱。居于这些原因，语言学家们首先是广泛搜集词汇，进而分类整理，然后按语言规律编纂辞典和语法。阿拉伯语研究分为巴士拉派和库法派，著名的语法学家有艾布·爱斯瓦德，西伯威等。8世纪初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马立克规定阿拉伯文为帝国的官方文字，9世纪初阿拉伯的语法大体完备。

因为阿拉伯帝国实行政教合一，通过宗教传播和行政命令推行阿拉伯文，所以在帝国境内通行起来，不但在西亚和北非，就连西班牙、西西里等地也一度使用阿拉伯文。但阿拉伯语的推广却要缓慢得多，因为帝国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习惯很难改变，所以强制语言“阿拉伯化”曾引起强烈反抗，持续了两三个多世纪。一般说来，阿拉伯语在闪米特语民族中比较容易推行，非闪米特语的民族虽使用阿拉伯字母却不操阿拉伯语。有些地区如埃及、北非，由于移入大量阿拉伯人，加之政治和宗教的力量，语言也实现了阿拉伯化。11世纪以后，阿拉伯语在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北非普遍流行，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亚及我国西北少数民族中也有很大影响，并用阿拉伯字母创字。

阿拉伯语言、文字的形成发展与扩散，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交融的过程，一方面是阿拉伯语言文字不断扩大覆盖面，另一方面是外来语不断渗入阿拉伯语，使之丰富起来。这就是说，它在传播中日渐走出阿拉伯而扩大影响，同时又在传播中进一步发展阿拉伯语言文字，相辅相成，双向交流，互为推进。无论语言、文字的形成、发展、传播都与伊斯兰教息息相关，由部落语发展为

通用的阿拉伯语是因《古兰经》的推动，伊斯兰教的传播又使它成为一种国际语言。阿拉伯文传播的范围要宽得多，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作为正式通行文字，二是借用阿拉伯字母创造本民族文字，三是在宗教活动中使用阿拉伯文，因而成为“伊斯兰文化圈”的一大标记。阿拉伯语的推广范围要小得多，主要是在“阿拉伯文化圈”的核心区域。不过，在阿拉伯帝国衰落以后，西班牙、西西里、巴尔干地区放弃阿拉伯文而恢复拉丁文或希腊文，到了近代，随着奥斯曼帝国的瓦解，阿拉伯文化圈逐渐萎缩，土耳其改用拉丁字母，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普遍拉丁语化，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也以拉丁字母作正式文字。

2. “阿拉伯化”与“翻译运动”

不可讳言，阿拉伯帝国是在军事扩张中形成的，但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创建了一种新的文化，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种文化，显然已不是阿拉伯固有的文化，也不是单纯的伊斯兰教文化，而是广泛吸纳地中海文化而提升起来的新文化。它是三者的结合，是阿拉伯民族与被征服的非阿拉伯民族文化创造的结晶。这种文化的形成，与帝国时期的“阿拉伯化”政策有关。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阿布都·马立克大力推行“阿拉伯化”政策，这不仅意味着阿拉伯文化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而扩散到帝国的统治区域，更重要的是把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以及希腊、罗马文化吸收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使之成为阿拉伯民族的东西，进一步推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向前发展。由于这些古老的文化原先是以不同的文字传承和传播，大量典籍都是外国文字写的，因此，阿拉伯人学习这些文化必须用阿拉伯文翻译过来，这便出现了一个长达两个世纪的“翻译运动”

“翻译运动”伴随着帝国的“阿拉伯化”进程，从7世纪中

叶倭马亚王朝建立后便开始了，但这个王朝存在的时间只有 90 年，且尚处在战争环境中，仅是奠基阶段。8 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军事扩张基本停止，帝国境内安定、统一，随着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文化上也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迫切希望吸收各种先进文化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有效地统治这一历史上的高文化区，同时以一种较高的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竞争、抗衡，因而出现“翻译运动”的高潮，主要是翻译波斯、印度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典籍。到了 9 世纪第七代哈里发买蒙时期，道路通畅，商业发达，国库充实，而且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缓和，“翻译运动”达于鼎盛，主要是翻译希腊、罗马著作。买蒙扩大了在巴格达建立的一个综合性的学术机构，集收藏、翻译、整理、研究为一体，称为“智慧宫”。在 9 世纪的 100 年内，翻译活动常盛不衰。总的说来，倭马亚王朝时期的翻译尚处于分散的个人活动，阿拔斯王朝前期译书成为国家的一项有计划的事业，“智慧宫”建立后译书规模扩大，翻译内容增广，翻译家辈出，有力地推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伊斯兰文化的中心，最初在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各成一个学派，主要是在圣训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教法学、历史学、传记学并收集整理了大量阿拉伯文学作品发展了阿拉伯音乐。倭马亚王朝迁都大马士革，中心移向叙利亚，教派争执剧烈，诗歌、散文、哲学、医学、教育日渐兴盛。阿拔斯王朝建都巴格达，文化中心又移到伊拉克，巴士拉、库法和巴格达三城形成学派，互相争鸣，从经济学、圣训学、教法学到语言学和语法学，从哲学著作的翻译到教义学的发展，从医学、数学到建筑、工艺，从雕塑、绘画到音乐都获得较大发展。巴格达是当时“阿拉伯世界无与伦比的大都市”，各地商人、学者、诗人、说书人、诵经师、医生、工匠、歌手都云集于此，文化欣欣向荣。巴格达的“智慧宫”，汇集了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的大量典籍，在翻

译的基础上开展各种学术及文学艺术活动，堪称继亚历山大里亚之后兴起的地中海文明中心。伊拉克即两河流域，它处于“东方文化带”的腹心部位，在地理位置上更便于沟通埃及、印度和拜占庭，对于吸收古代东方及希腊、罗马文化极为有利。

阿拉伯与波斯仅一海之隔，迁都巴格达后更接近波斯。波斯是地中海上最先崛起的大帝国，又是文化荟萃之地，这对于刚走出沙漠的阿拉伯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老师，所以首先要翻译的就是波斯文。阿拔斯家族推翻倭马亚王朝主要是借助波斯人的力量，所以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的七八十年间大量取用波斯人做大臣，各级政府的书记员也多是波斯人，因为他们兼通波斯文与阿拉伯文，所以成为最佳的翻译者，伊本·穆加发便是最杰出的代表。波斯是“西方交会”之地，词汇特别丰富，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词汇就显得相当贫乏，因而在翻译中大量的波斯外来词进入阿拉伯语，还有许多成语、谚语和格言。阿拉伯人最迫切需要的是治理国家的经验和制度，在这方面波斯是他们的典范，所以像《波斯历代国王史》、《民族与国王史》、《波斯国王传记》、《萨珊国王历史》等许多可供借鉴的史书被译成阿拉伯文，记述波斯典章制度的《阿因纳迈》、伊本·穆加发的《近臣书》以及《阿达希尔施政》、《科斯里的批文》等更显得重要。长期生活在无垠广漠中的阿拉伯人，情调比较简单、朴质，接触到丰富的波斯文学之后为之倾倒，波斯风格的诗歌、散文、寓言、故事很快在阿拉伯人中风行起来，《卡里莱和迪木乃》、《稀有的真珠》、《大文学》、《小文学》之类的文学作品被译成阿拉伯文，《希扎尔·埃夫萨乃》便是《一千零一夜》的原型之一。阿拉伯人修辞学、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多来自波斯，还将波斯关于星象学、地理学、几何学、博物学的著述译成阿拉伯文。琐罗亚斯特教的《波斯古经》及其注解被翻译出来，推动了经注学的发展。

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很早就有交往，印度的宝石、香料、宝剑

是阿拉伯人梦寐以求的稀世之物。阿拉伯征服印度后，印度文化被纳入了这个大熔炉。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也是哲学思想活跃的国度，它的宗教哲学对伊斯兰教有诸多启示，譬如“梵天创世”说、“因果报应”说、“天堂地狱”说、“轮回转世”说等等，伊斯兰教派的发展也不同程度受印度影响，特别是苏非派。阿拉伯的数学知识得力于印度，被称为“阿拉伯数字”的记数法实际上是从“印度数字”学来的，“零”的符号也来自印度。印度星象学对阿拉伯早期天文学发展有过重大影响，梵文写的《拜拉赫麦斯胡塔信德汗特》是一部关于观察天象的理论书，阿拉伯学者运用这种原理制定了《天文历法》，还翻译了《艾尔坎德》、《艾尔节伯海尔》等天文书。印度的医学书也被译成阿拉伯文，还从印度请来一些名医如曼卡、巴兹卡尔等。前面提到的《卡兰莱和迪木乃》，实际上是《印度寓言》，它通过波斯文转译然后才译成阿拉伯文。印度因明学发达，对阿拉伯语法的创立起过重要作用。在阿拉伯语的外来词中，印度词汇也占相当一部分，阿拉伯文学作品中引用了不少印度格言，还有一本讲印度格言的《宝鉴精华》。此外，印度的逻辑学，修辞学对阿拉伯也有影响。

阿拉伯学习希腊、罗马文化主要有三个重要渠道：一是亚历山大里亚，二是哈兰，三是拜占庭帝国。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一直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心，罗马帝国时代的亚历山大学派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把希腊、罗马哲学引入基督教神学也从这里开始，阿拉伯帝国吞并埃及后，将这里原先由希腊文译成古叙利亚文的著作，转译成阿拉伯文。哈兰是伊拉克北部的一座由希腊、罗马时代延续下来的古城，是不愿信基督教的希腊人的逃亡地，曾出现过迪沙普尔学派、哈兰学派，前者继承了希腊的医学和哲学，后者重在数学和天文学，这些文化遗产经过翻译进入阿拉伯文化。最重要的是拜占庭帝国，它将罗马文化延续

千年之久，又将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纳入版图，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便成了保存希腊、罗马文化的巨大宝库。在阿拔斯王朝的买蒙时期，与拜占庭的关系改善，派人到君士坦丁堡搜集大量希腊、罗马典籍，召集大批学者在“智慧宫”翻译、整理、研究，以阿拉伯文形式保存希腊、罗马古籍。在阿拉伯译本中，主要内容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很少有文学作品。早期主要翻译医学、冶金术、星象学及数学，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希腊医学家的著作，目的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买蒙时代更多地转向哲学，翻译了毕达哥拉斯的《金色格言》，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范畴篇》、《物理学》、《形而上学》等等。

两百年的“翻译运动”，以开放的态势把多种文化吸纳进来，并用阿拉伯语言把它们纳入统一框架。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因此被外来文化“同化”，更不是用这些先进文化来取代固有的文化，而是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深入发掘、研究、弘扬阿拉伯固有的文化，以阿拉伯文化为母本兼容其他文化，使之具有“伊斯兰精神”并具有“阿拉伯思维”。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是有选择性的，其基本原则就是“为我所用”，讲求“实用价值”。比方说，在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前提下，吸收了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特教、佛教的某些文化因素，引进希腊、罗马哲学，进一步发展教义学。自然科学的引进，直接服务于天文历法、医药卫生、工艺制造、商业活动，主要是向印度和希腊学习。文学艺术以东方为主，把波斯的、印度的以及埃及、巴比伦的，同阿拉伯固有的文学艺术结合起来，《一千零一夜》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里，“阿拉伯化”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是将外来文化变成阿拉伯民族自己的东西，经过消化、吸收、发展而加以推广；另一方面则是将帝国境内的各民族迅速实现“阿拉伯化”，普遍信仰伊斯兰教，统一使用阿拉伯文，极力扩大阿拉伯语，然后将他们

的文化纳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框架。

毫无疑问，进入帝国时期形成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已经远远超出阿拉伯固有文化的范围，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梯，成为阿拉伯固有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与地中海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使它成为一种特质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正是这个原因，它取得了跻身于世界文化殿堂的入场券，伊斯兰教凭着这种文化的支撑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随着宗教的传播而走向世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是地中海的一大变奏曲，它不仅把已经衰落的希腊、罗马文化接续下来，在 8—13 世纪成为地中海文化的一条主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个总结，虽然这个总结还不具有全面、系统的性质，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过程来看，“翻译运动”使那些正在消失的古文化包括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文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保存下来，并在阿拉伯—伊斯兰的土壤上找到了新的寄生点继续生长，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种幸运倘若不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拜占庭对地中海古代文明的保存和延续，欧洲的“文艺复兴”便只能是空中楼阁。因为希腊早已灭亡，“希腊化”时代也成为过去，兴盛一时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西罗马帝国在公元 476 年遭到灭亡，距离“文化复兴”长达 9—11 个世纪，若没有上述几条“历史暗道”凭什么去“复兴”呢？在这里，阿拉伯的“翻译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希腊、罗马的典籍被译成阿拉伯文保存下来，“文艺复兴”期间，人们又从阿拉伯文转译成拉丁文，使欧洲人有机会重见地中海的古老文明，在新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阿拉伯通史》中所说：“在 8 世纪中叶到 13 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话的人民，是个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火炬主要的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

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正因为如此，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值得大书特书，载入人类的史册。

3. 地中海上的又一次科学浪潮

阿拉伯原先是一个游牧民族，科学技术并不发达。当他们走出了阿拉伯半岛，进入地中海的大千世界后，接触到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的先进科技，以执著追求和刻苦学习的精神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出现了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阿拉伯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有如电子在壳层上的跃迁，由较低的层位跃升到较高的层位，使一个落后的民族一跃而为当时的先进民族。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科学含量显著增加，而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文化。在世界科技史上，阿拉伯科学技术是一个重要的篇章，在世界中世纪，可与阿拉伯媲美的惟有中国，欧洲中世纪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显得相形见绌。阿拉伯在世界科技的发展中，既是东西方科技沟通的桥梁，又处在一个承先启后的关节点上，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中写道：“穆罕默德以前几个世代阿拉伯人的内心，可以说，早已酝酿着一股热情，产生了诗歌和不少宗教争论。它在国家和种族成就的激励下，立即放出了那仅次于希腊人最盛时期的灿烂的光辉，人类对科学的追求因此复兴。如果说希腊人是科学之父，那么阿拉伯人则是其义父，近代世界是经由阿拉伯人的途径，而不是经由拉丁人的途径而接受了那个光明和力量的赏赐的。”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值得称道的科学技术，主要有数学、天文、历法、医学、物理、化学、水利、地学，引进中国的造纸术并传到西方也是一大贡献。

数学在伊斯兰教中有“特殊地位”，这大概是因受毕达哥拉斯“神秘的数”的影响，把“1”看成是安拉最径直明了的象征，

把数字系列看成是人生境界的阶梯，并构成一种“亚伯拉罕式的毕达哥拉斯”思维模式，成为穆斯林与安拉神性沟通并保持平衡、协调的神秘主义，所以在伊斯兰的造型艺术与视觉、听觉艺术中对数都有一种偏爱，造型中讲求规整、对称，视觉艺术中喜爱几何图形，还把音乐看成是数学的分支。善于经商和工艺制造的阿拉伯，需要数学知识，天文、历法、建筑也离不开数学。在宗教与经济推动下，数学得到优先发展。众所周知，埃及人最先发明几何，巴比伦最先发明代数，亚历山大里亚长期是地中海数学研究中心，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乌斯三大数学家的著作在阿拉伯人中有所流传，还有数学很早兴起的印度，这便给阿拉伯数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印度的记数法传到阿拉伯人手中，由于商业和工艺制造等方面的需要而扩大运用范围，并推广到地中海，进而传到欧洲，成为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学”。阿尔·花拉子模是阿拉伯第一位数学家，他所写的《代数学》讨论了方程式解法，把未知数叫做“根”，还研究了二次方程的一般法和它的两个根，这部《代数学》在 12—16 世纪一直是大学的主要教本，拉丁语的“代数学”（algebra）也源于阿拉伯文，“根”这一概念沿用至今。三角学在阿拉伯发展起来，先是阿尔·花拉子模运用了正弦函数，引进了正切函数，白塔尼引入了余切函数，艾卜勒·外发开始用几何方法解代数方程，奈绥儿第一个把三角学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后来为欧洲接受。阿尔·卡西在《算术之钥》中用穷竭法计算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 17 位，求得 $\pi = 3.14159265358979325$ ，在数学上是一大突破。

生活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很早就注意到观察天象，根据星辰来分辨游牧方向，判断季节和天气变化。伊斯兰教产生后，占星术发展成一门“神秘学”，在阿拉伯人那里，占星术与天文学几乎是意义相同的词。在学习波斯、印度和希腊的天文学后，阿拉伯天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建立了天文

台，并形成许多观测和研究中心，伊儿汗国的撒马尔罕有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天文台。阿拉伯人创造了许多观测仪器，如星盘、象限仪（四方仪）、平纬仪、方位仪、浑仪（天体仪）、地球仪、观象仪和日晷等在观测天体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绘制天文图表，如阿尔·花拉子模的《天文表》、苏非的《恒星图象》、伊本·尤努斯的《哈基姆天文表》、欧麦尔·赫雅木的《哲拉星历》以及后来的《伊尔汗天文表》和《乌柏格天文表》，最多时记录了 900 多颗行星。阿拉伯人把数学知识运用于天体观测中，测绘出行星与恒星的距离，力图完善托勒密天文学，伊本·海赛姆在《天文学概论》中，以“物质模式”取代托勒密的“数学模式”。纳西尔·图西等人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打破了托勒密的日心说，认为地球并不处在宇宙中心，行星运行的轨道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阿拉伯天文学对欧洲近代天文学以及中国和印度天文学都有影响。

与天文学和数学密切相关的是历法。阿拉伯历法属“太阴历”系统，即按月象变化来确定时间系统。它渊源于苏美尔人的“太阴历”，经过改进和细化，结合伊斯兰的宗教活动而成伊斯兰教历。因为这种历法是以穆罕默德率众迁往麦地那之年（公元 622 年 9 月 24 日）为纪元之始，而阿拉伯语“迁徙”一词为“希吉拉”，故又称“希吉拉历”。它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一月，历时 29 日 12 时 44 分 2.8 秒，为了方便计算，安排单月 30 天，双月 29 天。全年 12 个月，历时 254 日 8 时 48 分 33.6 秒，比公历少 10 日 21 时 1 分。不置闰月，所余时间积 3 年多 1 日，置 12 月末，作为闰年。12 个月的名称是：一月“穆哈兰”，二月“萨法尔”，三月“赖比·奥俄”，四月“赖比·舍尼”，五月“主麻达·奥俄”，六月“主麻达·舍尼”，七月“拉德哲”，八月“舍本”，九月“赖麦丹”，十月“沙威勒”，十一月“左·卡达”，十二月“左·希贾”。以 7 天为一星期，星期日为“日隆日”，星期一为

“伊斯那尼日”，星期一为“苏拉萨日”，星期二为“阿拉比阿日”，星期四为“赫米赛日”，星期五为“主麻日”，星期六为“萨卜特日”。宗教活动都按伊斯兰教历进行：主麻日是穆斯林到清真寺集体礼拜的日子，1月10日为阿术拉日，3月12日为圣纪日（穆罕默德诞辰），7月21日为剑宵节，10月1日为开斋节，12月10日为古尔邦节等（宰牲节）。在一年中，9月为“斋月”，起止日须望月而定，8月29日傍晚若见新月便从9月1日开始，若未见新月则以第二天为8月30日（大建），第三天进入斋月。同样，开斋节的时间也以望月而定。伊斯兰教与季节无关，故斋月有时在春季，有时在夏季、秋季或冬季。

阿拉伯医学，兼取希腊、印度、波斯、中国医学之长。起初在阿拉伯行医的多是犹太教、基督教或琐罗亚斯德教团，帝国时期兴起医学教育，形成一些医学世家，印度和波斯医生也常来阿拉伯，并在巴格达建立综合性医院。拉齐曾任巴格达医院院长，著医书百余种，他的《医学大全》被称为“医学百科全书”，《天花与麻疹》被誉为“阿拉伯医学的光荣”。伊本·西那被称为“医学之父”，著作99种，最著名的是《治疗论》和《医典》，前者重在医学哲理，后者包括解剖、生理、治疗、药物、卫生、饮食诸学科，书中论述了大脑和神经的作用，记有水疗、日光疗、空气疗及外科手术，还有中国的脉诊法。阿拉伯对眼科特别重视，阿里·伊本·伊萨科的《眼科医生手册》记述了眼病130种。外科也很发达，已知使用麻醉剂，能做膀胱结石、气管等手术。由于伊斯兰教注重沐浴和饮食卫生，所以卫生科学发达。

穆斯林对物理学做出了许多贡献。他们围绕着亚里士多德的时空与运动问题展开激烈争辩，形成了相互对立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派”和“反亚里士多德派”。在宇宙论方面，穆尔太齐赖派和艾什尔里派提出了一种“独特原子论”，照明派提出“宇宙象征论”，穆拉·萨德拉创立了“超物质性运动”的学说。以上事

实说明，在物理的领域内曾有过“百家争鸣”的盛况。力学方面，伊本·西那提出了倾角概念来解释抛物体运动，巴格达迪研究了自由落体运动，比鲁尼用连通管原理解释了天然喷泉，哈尼兹编写了比重表。阿拉伯人奠定了光学的基础，肯迪的 361 种著作中大都讲光学。伊本·海赛木的《光学》一书，研究了光的入射线、折射线和法线，解释了彩虹的成因，还研究了球面镜、抛物面镜、平凸透镜及球面象差问题，因此获得“光学之父”的美名。阿拉伯人讲求物理实验，比鲁尼精确测量了 18 种宝石和金属的比重，伊本·海赛木做了大量光学实验，哈尼兹发明了测量特殊物体重量的公式和天平，阿拉伯学者还研制一些机械装置，如风车、水车等。

化学的研究是从炼金术开始，因为阿拉伯人相信两件事情，一是把贱金属变成黄金，二是矿石中可提炼出“长生不老之药”。这两件事虽然都是徒劳无功，但却促使人们去研究矿石、冶炼术，发现新的物质，了解许多化学现象。吉伯是著名的炼金术士，修正了希腊和印度“四大元素”的说法，发现了硫的易燃性及硫酸，汞的升华及升贡防腐剂。酸的发明是阿拉伯人的一大贡献，能制造硫酸、硝酸及其生成的盐类，如硝酸银、硫化贡之类。酒精之名源于阿拉伯文，能制成各种酊剂。由于炼金术和化学的推动，阿拉伯人善制各种器皿，染色、制革、香料、制糖、玻璃、酿酒都有发展。

阿拉伯原先多住沙漠地区，对水极为关注，建立帝国后逐渐转向定居农业，而境内许多地方都是农耕发达之区，因而在水利浇灌方面取得许多成绩。根据古埃及测量尼罗河水涨落的经验，沿河修建了许多测水站。继承了古代东方的传统，修筑水坝、水库、引水渠，开凿运河和水井，使用风力、水力、畜力的提灌设备，制造岸水车。他们推广了波斯人发明的“开那”，即地下供水系统，由成百上千个竖井和地下水渠构成，长达数十里，并普

为“安拉恩赐的礼物”。阿拉伯的农田水利和城市供水工程宏大，令人惊讶。

阿拉伯的地理学也很发达，这是因为阿拉伯人长于征战、贸易和航海，帝国建立后更加扩大活动范围，见多识广，有丰富的地理知识。9世纪伊本·忽尔达兹比赫根据阿拉伯邮传档案编纂了《道里郡国志》，记述了阿拉伯与中国的交通。扎希兹的《商务观察》，记述了世界各地输入巴格达的货物。阿尔·花拉子模著有《地形》一书，绘制了大量地图。雅古特的《地名词典》，实际上是古代地理学百科全书。在哈里发买蒙的主持下，阿拉伯人实测了地球的子午线，并由此推算地球赤道的周长和直径。

在中国文化西传中，阿拉伯是一个重要桥梁，大约在公元8世纪，阿拉伯在坦逻私战役中俘虏了一批中国工匠其中就有造纸工，于是在撒马尔罕建立第一个伊斯兰世界的造纸坊，以后又在巴格达、大马士革、也门等地造纸，9世纪传入埃及，10世纪传入欧洲。造纸的兴起，对阿拉伯文化的发展有重大意义，直接推动了“翻译运动”。火药传入阿拉伯大概是13世纪，并用作火器。指南针也因海运传入阿拉伯，时间大约是13世纪。此外，瓷器、丝织传到西方也多通过阿拉伯人之手。关于中国文化西传将在第六篇中译述，这里就不赘言了。

阿拉伯科学技术的勃兴，与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有很大关系，它不仅包容了古代地中海科技发达的区域，而且成为沟通印度、中国的桥梁，形成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区。在这里，“阿拉伯化”是一个关键，它把当时世界科技的主要成绩集中起来，然后转化为阿拉伯人所有，出现了一批学者和科学家。令人惊讶的是，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往往对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而阿拉伯民族却能继承和弘扬古老的文明，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4. 令人着迷的伊斯兰艺术

伊斯兰艺术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和韵味，使人感到扑朔迷离，仿佛有“神光”闪现，留有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艺术特质的形成，是因为它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发展而发展，高昂着“伊斯兰精神”的主旋律，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与艺术在心灵上相通，虔诚的信仰焕发起宗教的激情，以美的形式再现伊斯兰对宇宙、人生的追求和理想，表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审美情趣，令人神往。苏非派的神秘主义对伊斯兰艺术创作有特殊的意义，内心的修炼，灵魂的净化，在精神专注中赞念和记忆安拉，流露出无限真情，感人至深。苏非派讲求“神光照明”，尤重获得安拉赐予的“神智”，进入被安拉吸引和融化的“人主合一”境界，在此情景中产生的作品自然不同凡响，对内心世界有巨大的穿透力，能引起丰富的想象，使心灵颤动。

这里所讲的是广义的艺术，包括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及建筑艺术等等，泛指抽象艺术、造型艺术、听觉艺术。伊斯兰艺术的本原是“伊斯兰化”了的阿拉伯艺术，它无尽的源泉就在《古兰经》。在帝国统一时期，各种艺术荟萃交融，而以东方艺术为基调，波斯的色调特别浓郁，希腊、罗马艺术的影响要淡薄得多。帝国衰落以后，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法蒂玛艺术、马格里布—安达卢西亚艺术、塞尔柱艺术、蒙古—波斯艺术、奥斯曼艺术、莫卧儿艺术、中国伊斯兰艺术先后崛起，显得琳琅满目。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变换都遵循着伊斯兰审美的基本原则：显示真主安拉的惟一性，体现世界的协调和谐，反映事物的动态美。伊斯兰艺术中心依时而变，由麦加和麦地那开始转至大马士革，进而出现巴士拉、库法和巴格达，以后则有萨马拉、开罗、伊斯坦布尔等等。

伊斯兰文学始于阿拉伯，在伊斯兰教产生以前主要是口头文学，以故事和诗歌为主，诗歌形式有“格绥德”（颂体诗）、“卡扎尔”（抒情诗）和“卡特埃”（短诗）。《古兰经》的出现是伊斯兰文学重要起点，它不仅是一部经典，而且是伊斯兰最早的散文作品，将修辞、韵脚、节奏、吟咏浑然一体，构成优美的艺术境界，引人进入愉悦、高尚的精神殿堂，以其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打动人们的心。伊斯兰教产生以后，由于吟诵的关系，诗与歌结合紧密，增强了诗歌的思想性与神圣性，充满神爱与赞颂真主的炽烈情感。进入帝国以后，阿拉伯文学与波斯文学交融，阿拉伯人受到波斯文化濡染，波斯人也迅速阿拉伯化，对波斯格言、诗歌、散文的热爱成为时尚，《一千零一夜》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其实，《一千零一夜》并不都是阿拉伯故事，它的原本是印度故事，流传到波斯后加入了波斯故事而称《卡里莱和笛木乃》，把它翻译成阿拉伯文后，增加了阿拔斯王朝的奇闻轶事和两河流域的民间故事，以后又增加埃及的冒险故事和神话传说，显得离奇、古怪、动人而富有神迷感和人情味，谓之《天方夜谭》，成为享有盛誉的世界名著。苏非神秘主义产生后，苏非文学成了伊斯兰宗教文学，用诗歌、散文、故事来表达其信仰、思想和体验，其特点是虔诚信仰安拉、注重精神直觉、刻意描写自我内心体验，语言趋于象征和喻义，以散文和诗歌为其两大支柱。苏非诗中广泛运用隐喻和象征手法，将直接感观提升到精神层面，变人间情爱为人与安拉的神爱，变豪情痛饮为“人主合一”的陶醉，于是“美女”成为爱的象征，“醇酒”成为陶醉的象征。“凯拉玛特”是苏非文学的又一珍品，它描写的故事短小精悍，叙述简洁明快，而事情却出乎意料，异乎寻常，奇迹随处可见，后来将这类作品集为《圣徒凯拉玛特集》。在波斯沙法王朝时期流行一种称为“塔阿吉亚”的神秘宗教剧，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和浪漫情怀，故事奇迹般地出现。在苏非诗中，有费尔道

西的史诗《王书》，有萨纳伊的抒情诗和颂诗，有阿塔尔的哲理叙事诗，集其人成者是波斯的鲁米，他与费尔道西、萨迪和哈非兹一起被誉为“诗坛四柱”。鲁米的代表作是《玛斯纳维》诗集，共 52000 行，它用富于哲理和劝戒的“玛斯维纳”体写成，诗中援引《古兰经》和《圣训》，采用大量民间故事和神话，借以阐发苏非派神秘主义哲学及道德修养，被誉为“诗的海洋”、“波斯文的《古兰经》”。萨迪的《蔷薇园》、《果园》两部诗作，写诗人心中的“理想王国”，有浓厚的道德教谕意味。被誉为“神舌”和“设拉子夜莺”的哈非兹，以抒情诗见长，它既有“毛拉维的灵魂”（苏非的教义和哲理），又有“萨迪的语言”（凝炼、质朴、清丽），被认为是波斯古典抒情的巨擘。此外，埃及伊玛目蒲绥里，我国维吾尔族的长诗《福乐智慧》和《真理的入门》，在伊斯兰世界中也享有盛名。

苏非派认为听觉是人体奇妙的感受能力，是安拉赐予人类的“奇迹中的奇迹”。美妙的音乐能开启人的心扉，导入冥想，激发探寻，领悟“安拉的隐密”。早期的音乐无非是驼队的吟歌，战争的豪歌，宗教的颂歌，婚礼的欢歌和丧葬的悲歌，常用的乐器是被称为“阿拉伯乐器之王”的版面琵琶“乌德”，还有类似马头琴的“拉巴卜”、竖笛“纳依”和单面手鼓“纳加拉”。征服波斯以后，大批波斯歌女供贵族享乐，波斯歌曲被引进阿拉伯，波斯的皮面琵琶、手鼓、长笛、芦管、双簧管等乐器也流传开来。倭马亚王朝时期，各国歌手云集大马上草，出现了一批歌手和音乐家，著名歌妓如阿宰·米拉、加米莱及其女弟子哈巴卜和赛拉多。第一个音乐家是麦加的赛义德，以后有卡里德、伊本·穆赫里兹、麦阿拜德、萨依卜等四大歌手。倭马亚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叶齐德一世就是一位作曲家。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音乐的黄金时代，各地歌女会集巴格达，风格多样，技艺高超，摩苏尔人伊卜拉欣被认为是“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祖师”。哈里发拉希德特别

重视音乐，宫中歌女如云，还组织了一次有两千男女歌手参加的演唱会，他的儿子举办了一次“狂欢之夜”。在这一时期，希腊的音乐理论书籍被译成阿拉伯文，如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书》和《问题书》，格林的《声音书》以及《规范书》、《旋律书》、《节奏书》、《音乐大全》等，并推崇毕达哥拉斯为音乐奠基人第一个使用乐谱的阿拉伯人是肯迪，法拉比撰写了《音乐大全》和《科学纲领》两部音乐专著，伊本·西那将他以前的音乐理论都归纳到《治疗论》一书中。阿拉伯音乐后来传到欧洲，对文艺复兴产生重要影响。

伊斯兰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而雕塑与偶像十分接近，所以雕塑艺术不发达，目前仅发现倭马亚王朝前几任哈里发的宫室里有一些雕塑作品，民间有一些小雕塑，但宗教活动场所是绝对禁止雕塑的。在绘画方面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具象绘画，但肖像和动物图像也被严格禁止，注重创造“精神启示的气氛”，以修饰技法来加强画面的华丽与炫目效果，因而装饰艺术显得十分重要。阿拉伯的纹饰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几何纹，一种是植物纹，另一种是书法纹，实际上是把具象转化为抽象表现形式从阿拔斯时代开始，艺术家们吸收了各种绘画精华形成了若干不同风格的画派，13世纪出现了以阿拉伯—波斯风格为特色的巴格达画派，13—14世纪出现了受中国画影响的蒙古—伊朗画派，15世纪出现帖木儿画派，以后有兼容蒙古与帖木儿两派风格的巴赫宰德画派，有兼容帖木儿与巴赫宰德两派的比赫里画派，还有萨非画派、奥斯曼画派、莫卧儿画派等，风格和画技有所不同。波斯的细密画是一种手抄本上的非宗教插图，内容多是寓言、传说、故事、传记、诗篇，追求平面空间视觉感受，充分利用阿拉伯几何图形和植物纹饰，装饰性极强，以《列王记》中的插图“萨德何之宴”最为精美。莫卧儿细密画深受波斯风格影响，但手法接近写实，运用焦点透视，重视背景烘托，色彩鲜艳，有人物、动物

描绘,《斗牛图》、《阿米尔·罕扎传奇》就是明证。

书法艺术倒相当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写的,用规范漂亮的书法抄写《古兰经》是对真主的虔诚和恭敬,是用笔写成的“誓言”,具有崇高地位。阿拉伯书法由库法城开始,倭马亚王朝时期的库特巴·穆哈里尔被认为是阿拉伯书法鼻祖,阿拔斯王朝的大书法家伊本·穆格莱兄弟确立了书法的基本原则,10世纪创立了工整、圆润、曲折的“纳斯黑体”,13世纪臻于完善。阿拉伯书法首重阿拉伯字母“ل”,把它看成是“安拉惟一”的象征。在书写上确立字母宽度、笔锋宽度和虚构圆直径三个标准,结构上注重疏密与均衡,重视间架和章法,遵循匀称、和谐、呼应的原则。书法有8种字体,即库法体、三分体、纳斯黑体、卢格体、安达卢西亚体、波斯塔里克体、马格里布体和迪瓦尼体。库法体最为古老且具有融字母与纹饰为一体的特点,纳斯黑体广泛流行于伊斯兰世界,三分体和迪瓦尼体常用作装饰清真寺宣礼塔及柱头、旗帜。在清真寺的墙壁、拱顶、券门和壁龛上,书法的装饰性极强,强调纵向和横向笔画,以曲线变化为特征,与几何纹、植物纹有异曲同工之妙。

装饰艺术广泛用于建筑及各种工艺品,常将几何纹、书法纹和植物纹交叉重叠使用,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几何纹以圆形和方形为基础衍化出多种纹饰,最常见的是以星形图案象征巨大的天穹,星形图案由三星形、五角星形和六角星形进行多种组合,四方形和八方形象征四面八方,此外还有十字形、X形及构思独特的扭曲状编织纹。植物纹并非具象描摹植物,而是波状曲线的几何纹变体,最典型的是象征宇宙万物生机勃勃的棕叶纹,象征“生命之树”的圣树纹,后来又出现枝蔓丛生的葡萄纹。陶瓷器常用黄色陶土敷以蓝色、绿色和釉彩或具有金属光泽的涂料烧制而成,用库法体阿拉伯纹将几何纹和植物纹连接起来,在空白处填以阿拉伯箴言及《古兰经》、《圣训》的词语。玻璃制品大都以

釉彩描金作装饰，图案亦如陶瓷器。金属器皿表面光滑，造型简炼，其上有铸造、砸花、透雕、镶嵌等工艺的图案，尤以镶嵌艺术最为突出，纹饰仍是上述三种。地毯一般用植物纹或几何纹图案镶边，羚羊、骆驼、狗、雄鸡、孔雀之类动物多是以几何图形拼合而成，植物图案以“生命树”为主，还有象征智慧的柏树，不过各地在制作工艺上有许多差异。纺织品极为精美，或织花、印花，或用金银线绣花，人物及飞禽走兽图案均转化为几何图形。清真寺的门窗、讲坛和书架多有木雕图案，纹饰亦不离上述三种。

伊斯兰艺术的最高表现是建筑艺术，以宗教建筑最具标志性，而且聚焦于清真寺。清真寺建筑的基本形制是封闭式庭院，主体建筑是礼拜堂，整体形状如阿拉伯文的“|”字，表示“安拉惟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最大的特点是无偶像、塑像和画像，其次是礼拜堂设壁龛、讲坛，其三是使用券门窗及拱顶，其四是有高大的宣礼塔，其五是屋顶上有新月标志，其六是设有浴室，其七是以石料或土坯构筑。第一座清真寺是麦加城的克尔白天房，穆罕默德将原先的 360 尊神像捣毁后从此不立偶像，在土坯围着的庭院内修建朴实的立方体建筑，被称为“先知清真寺”，为后世树立楷模。礼拜堂以阿拉伯纹装饰墙壁，地板上铺地毯，朝麦加方向的壁上设一壁龛，前方为 3—11 级阶梯的木质讲坛，这种布局起于四大哈里发时期，可能是受基督教堂影响。券门券窗及拱顶大概始于倭马亚王朝，直接取法于两河流域、拜占庭和萨珊建筑，由分行排列的方柱或圆柱支撑券门券窗，券形为锐角或钝角，并衍生出双拱、三拱和多拱的瓣状券，于券尖上架起穹窿拱顶，饰以“山形花边”或“回文雕饰”。宣礼塔首次出现在大马上革的倭马亚清真寺，它系由基督教堂改建而成，其原形很可能是教堂的塔楼或望楼，又受“光塔”（灯塔）影响，有四方体式、螺旋体式、多塔体式、圆柱体式、双顶式几种。新月标志

始于奥斯曼帝国，它原先是波斯萨珊和拜占庭帝国的国徽，奥斯曼土耳其人用作旗帜，后来才在清真寺上竖起“金色新月”，并普遍推广，象征“幸福、快乐、新生、壮大”。为了满足穆斯林礼拜前沐浴的需要，清真寺设有浴室，形制类似罗马，分冷浴、热浴、温浴三部分。清真寺的建筑材料起初为土坯加椰枣树枝，大约在 10 世纪开始改用石料。阿拉伯式的陵墓、宫殿、城堡、学校、客栈、民居都很有特色，这里就不逐一介绍。

由于伊斯兰教分布广泛，历史发展和文化底蕴不同，形成多种建筑风格叙利亚—埃及一带，清真寺原先为平顶屋，10 世纪法蒂玛王朝开始出现圆顶清真寺和山形花边装饰，使用半圆券、尖券、钝券门窗，宣礼塔为四方柱体和多棱柱体，以埃及欧姆尔清真寺、大马上革倭马亚清真寺为代表。伊拉克—波斯一带，清真寺为圆形券门，在四方体基座上建球茎形拱顶，有两座圆柱形宣礼塔，内外镶有植物纹花砖，少有几何图形，以巴格达阿拔斯清真寺为代表。莫卧儿式用球茎形拱券，增添镂空大理石巨柱，以德坦克莫卧儿清真寺为代表。马格里布—安达卢西亚式清真寺，多在大门上筑齿形木制城垛，采用四方券，饰以山形花纹，宣礼塔为方柱体，以花砖贴面，以科尔多瓦清真寺为代表。奥斯曼式清真寺由四方形大殿构成，无庭院，拱顶低矮，大殿两旁侧厅上建半拱顶，外饰蓝色瓷砖、彩砖，以伊斯坦布尔清真寺为代表。中国式又有不同，采用四合院结构，突出大门、邦克楼和礼拜堂，装饰为中外合璧，有庭园情趣。

（三）伊斯兰社会模式

伊斯兰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而且是一种强固的社会模式。在伊斯兰社会中，社会意识深受宗教信仰支配，社会制度多方面受着“神圣律法”的制约，伦理道德以

《古兰经》和“圣训”为基准，人们的社会生活完全“伊斯兰化”，从生到死，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言行举止、风俗习惯莫不与教义、教法有关。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伊斯兰教对社会的渗透力和控制力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过其他宗教，形成一种极大的社会势力，因此有必要从社会意识、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社会生活几个层面进行解析，以求深入了解。

1. “真主独一”信仰支配下的社会意识

在伊斯兰社会中，信仰高于一切，特别是在全民信教的情况下，信仰对于社会的控制作用显得愈加重要、强烈。“真主惟一”是整个伊斯兰教信仰的前提、基础和核心，由此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世界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认识论等等。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的人，从呱呱坠地的婴儿起就是“天生的穆斯林”，在浓烈的宗教氛围中，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许多固有的思想观念，控制着人生的道路，影响着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对伊斯兰社会模式的剖析，首先应从意识层面开始，从心灵深处寻找它的根源。事实上伊斯兰教法立足于它的教义，它对社会的控制作用也是基于由教义生发出来的各种思想观念。

穆斯林心目中的“世界”，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世界”不同，它并不单指能够引起感观的“物质世界”，还必须包括一个需要感悟才能认知的“精神世界”，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原型”，谓之“原型世界”。这两个世界都统一于真主安拉，是真主创造，按真主预定的律则和方向运行发展，以真主为其总的归宿。在他们的观念中，真主是世界的本原，独一无二，超越时空，绝对永恒，自我存在，无形无象，实际上是一个高度抽象、概括的理念。在这里，大千世界被统一在“真主”的最高信仰之中，在人们观念上形成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这种观念与基督教是一

致的，然而在神学上却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伊斯兰教强调“真主独一”，基督教强调“惟我耶和華”，相互间都有很大的排他性，以致纷争不休。

在穆斯林的宇宙观中，把自然形态综合进一个“天启”的形而上学框架，首重真主在这些自然形态中的“显现”与“预兆”，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宇宙的幻象，并经过冥想进入精神世界，以象征手法表达真主创造和主宰世界的理念。他们如实地把世界万物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类，而每种自然形态都有一种主宰的精神力量（即灵魂），如动物的知觉与运动，植物的生长与繁殖，矿物的凝固与聚散等等，并分出“物类等级”。在这里，对自然形态的研究是具体的、科学的，而指导思想则是抽象的、神秘的。正是这个原因，伊斯兰文化中包含着许多科学成分，同时又受到神学思想的局限，所以，科学既是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又是进入伊斯兰神学殿堂的阶梯。

伊斯兰教承认人是“万物之灵”，有知觉，有思维能力，因而是认识的主体。它又承认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客体，是认识的对象。因此伊斯兰教的认识方法，就是通过人的听觉、视觉、味觉、嗅觉和触觉去获得感性认识，然后运用概念、判断、推理、论证进行理性思考，进入真主设定的“精神世界”。由感性到理性建立起来的“知识模式”应当说是唯物的、科学的，然而，当他们走进信仰之门时，又情不自禁地被导入另一扇神秘之门，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使这种真实的知识虚化，从“万物实有”中推导出“真主独一”，成为体现“真主造物”的例证，最终变成了“认主”的学说，成为《古兰经》中各种信条的注脚。

伊斯兰教的社会观，实际上也是从“真主独一”的信仰中引伸出来。真主既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当然也包括人在内。但人是“万物之灵”，是真主在世界上设置的代位者，世间上的一切都是真主为人类而设，而人类则是世界的主人。人类应当用真主

赋予的智慧、知识、德性和意志去治理社会，按真主的意志去建立一种社会模式，让万物为人类造福，不断充实人生，寻求生活的真实意义。毫无疑问，对社会的治理必须以“真主独一”的信仰为前提，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指引的道路发展，遵循伊斯兰教法，包括各种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及社会生活的种种准则。

伊斯兰教的世界观、宇宙观和社会观决定了穆斯林的人生观。在他们看来，世间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真主为人类而设，是真主对人类的恩赐，允许世人享受现世的物质生活，在享受中时时念记真主。他们认为生活资料的获得必须通过正当的谋生手段，各人只得享受自己的劳绩，努力奋斗的人可以得到真主加倍的恩赏，这就确立了“奋斗尘世”的人生观。不放弃现实，讲求实际，主张“奋斗人生”，这是伊斯兰教的一大特色，在这一点上与那些一味追求“来世幸福”的宗教严格区别开来，也正是因为这种务实精神而使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由阿拉伯迅速走向世界。

不过，穆斯林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并不局限于满足现世的幸福，他们追求的是“生活的真实意义”，即同时进入物质与精神两个境界。他们注重今生的幸福，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但又执著地追求“来世的幸福”，并认为人生是短暂的，来世是永久的，因此即使黄金满地而没有“信道”，来世还将受到惩罚和痛苦。看来，他们的价值取向是“双向”的，重视物质生活而追求精神世界，既重今生更重来世，两者在虔诚信仰真主，遵循伊斯兰“正道”的基础上走向“同一”。这就是说，在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念念不忘真主，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为来世的幸福创造条件。

在伊斯兰教看来，因为世界是真主创造的，因而是“有始的”。但“绝对永恒”的真主，又使世界的发展是无限的，这种

“世界无限”的思想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死观。人生的旅途是短暂的，但人死后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归了结，所以“逝世”只是离开今生，忌讳称为“死亡”，而称为“归真”，即回归到真主阙下。在这种观念下，人去世后只不过是有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空间转换，“来世”只是“今生”在时间上的延续，因此死亡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若能为真主而死更是莫大的幸福。

总的说来，伊斯兰的社会意识是由宗教信仰形成的，各种观念都出自于“真主独一”的信仰。因为在伊斯兰社会中，人生下来就是天生的穆斯林，整个社会沉浸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之中，所以这些世界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在人们心灵中根深蒂固，而不是少数哲学家、思想家学术活动的结果。正是因为这些观念深入人心，推行伊斯兰教法也就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顺理成章而长期延续，并直接影响社会制度、伦理道德和生活习俗。

2. 建立在“神圣律法”基础上的社会制度

伊斯兰社会的各种制度都建立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之上，因此，要走进伊斯兰社会必须以伊斯兰教法为门径。阿拉伯语称伊斯兰教法为“沙里亚”（Shariah），原意为“通向水源之路”，引申出来则泛指“道路”和“行为”。“通向水源之路”一语表明，它是一切“法”的根源，即作为安拉意志体现的“安拉法度”。因为它是安拉“降示”的诫命大全，给穆斯林指明了一条“正道”，所有的穆斯林在行为上都必须遵循其规定，故又称“穆斯林法”。伊斯兰执掌政权以后，伊斯兰教法事实上起到法律的作用，并形成一整套社会制度，所以又称为“沙里亚法典”。这种律法与一般世俗律法不同，它在法理上是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安拉意志为最高依据，理论基础是《古兰经》和“圣训”，强调对安拉意志的敬畏和服从，其神圣性不是来自理性判断和社会功

利，而是出自穆斯林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因而被称为“神圣律法”。伊斯兰教法具有“诸法合一”的特点，集宗教制度、民法、商法、刑法为一体，而且将许多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内容上升到法律高度。伊斯兰教法实际上是伊斯兰社会的“母法”，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都由此衍生出来。

伊斯兰教是宗教改革与社会改革相结合的产物，从它产生之日起，教权与政权就紧密结合，因此伊斯兰教法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直接影响着政治制度。《古兰经》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就是“统一信仰”，“绝对服从真主及其世间的使者和代理人”。信仰真主是伊斯兰社会赖以建立的社会基础和精神支柱，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可能实现“绝对服从真主”，因此坚持信仰统一就成了政治的首要原则。作为真主在世间的代理人和使者继承人的哈里发，凭着真主赋予的特权名正言顺地统治人间，集宗教神权与世俗君权于一体，这便形成哈里发制度。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社会的政治轴心，由此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这种国家的神圣使命就是捍卫伊斯兰教信仰和国家主权，按伊斯兰教法推行各种制度，构建起伊斯兰社会，必要时发动保卫真主的“圣战”。

“圣战”的阿拉伯语为“吉哈德”（Jihad），原意是“奋斗”，起初专指反对异教徒迫害和保卫传教活动的战争，四大哈里发时期演变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扩大疆土的军事行动，往后则包括对内镇压异己势力、反对其他教派及对外抵御侵略、反抗压迫的种种战争。根据《古兰经》的规定，“谁侵犯你们，你们可以同样方法报复谁”，于是圣战成为每个穆斯林应尽的神圣义务，并形成伊斯兰社会的军事制度。圣战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由哈里发或伊玛目发布动员令，在“为主道而战”的旗帜下，人们口念《古兰经》，高呼“安拉至大”，以极大的宗教热忱和自我

牺牲的精神去进行战斗，相信为圣战而死的人灵魂可进入天国，并取得“舍牺德”（殉道者）的荣耀尊号。圣战既是一种“整体义务”，又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对强化伊斯兰信仰、巩固伊斯兰社会和捍卫伊斯兰世界有巨大的外抗力，对外来的侵犯和压迫特别敏感。

在全民信教和政教合一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法的强制性实际上具有法律性质。立法权属于真主，立法的依据是《古兰经》和“圣训”，并参照“公议”（权威性的决议）和“比类”（以推理判断得出的律例）。司法权属于哈里发国家，自阿拔斯王朝起“卡迪”成了专施教法的法官，主持宗教法庭，随着世俗矛盾的增多和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当局以“符合教法的统治权力”控制最高司法权，从而形成双重法庭制度，即行政法庭与宗教法庭分立，宗教法庭的司法权局限于家庭婚姻、财产继承、宗教基金、整肃风纪及孤儿、未成年事务，但由于教法的力量和权威，在穆斯林生活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两类法庭分立，而执行的都是统一的伊斯兰教法，民法指穆斯林在社会和个人生活方面的规定，包括土地占有、财产继承、商业活动、债权债务、婚姻缔结、释放奴隶及发誓、作证、禁食、丧葬、礼仪等日常生活问题。刑法是对穆斯林犯罪行为的惩罚，包括杀人罪、伤害罪、偷盗失窃罪、奸淫罪、背教渎神罪、饮酒吸毒罪等。罪有大罪和小罪之分，小罪要悔过改正，大罪必须受惩，不可赦免的大罪莫过于不信真主和以物配主。

伊斯兰的经济思想建立在真主创造世界、世人皆可享用的基点上，由此产生了以下几项经济制度：一、土地是安拉的财产，只有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承者哈里发才有权支配，分为国有土地、私有土地和清真寺土地三类，除清真寺土地外都应缴纳赋税，允许私有土地买卖。二、鼓励商业活动，提倡公平交易，进行商务活动应当缔结契约，严禁违约、欺骗及假冒伪劣。三、允

许借贷，立据为凭，以物抵押，如期偿还，无力偿还者酌情减免，严禁高利贷。四、穆斯林必须缴纳“天课”，即国家以安拉名义征收的课税，凡穆斯林每年都必须清理财产，除正常开支外，盈余的动产和不动产都按一定比例完纳天课，用以作为宗教活动、行政开支、圣战经费及周济穷人。五、为了体现“穆斯林皆兄弟”的精神，穆斯林除交纳天课而外，还向富人征收“赈款”救济穷人，并提倡乐善好施，对穷人进行施舍，调节贫富不均的矛盾。

基于知识是安拉独一“显现”和知识神性的观点，伊斯兰教重视宗教知识（先天知识）与才智知识（后天知识）的传授，目的是使穆斯林通过教育而获得真理的启示，利用安拉给人类的智慧掌握有关学科的理性知识，如医学、数学、天文、历法、文学、历史等等。伊斯兰的教育具有普及性、宗教性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包括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两类。清真寺是重要的教育中心，以后又产生一种称为“马德拉萨”的专门学校，有的马德拉萨还发展为正规大学，如开罗的爱资哈尔、摩洛哥的卡拉维因、突尼斯的齐东奈等。医院、天文台等也成为教育中心，传播专门知识。苏非道堂也是教育中心，传授“神秘知识”。经堂教育是伊斯兰教育在中国的一种形式，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传授及经典学习占有很大比重。

在各种制度中，哈里发制度最为关键，既以政权的力量来推行宗教，又以宗教的力量来维护政权。圣战制度是政治力量的延伸，加上法律的强制性、经济的功利性和教育的普遍性，共同构建起一种独特而强固的伊斯兰社会。在这里，“真主独一”的宗教信仰，通过哈里发国家转化为社会制度，各种制度又因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致使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高度结合。

3. 伊斯兰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在伊斯兰社会里，伦理道德不仅是个人思想言行及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对真主的服从关系。因为是一种宗教道德，判定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只能是宗教信条，一切都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作为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里主要是强调“行为规范”。伊斯兰教法中包含有许多伦理道德的内容，有的已进入法律条款，具有“德法兼治”的特征。如果说“法”是一种社会外控力的话，那么，伦理道德主要体现一种巨大的内控力量，它不是靠法律的强制，而是靠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内心的反省、自责、内疚与忏悔，这种“心灵法庭”的审判在某种意义上讲超过法律，它既是守法的思想基础，同时又涉及若干法律无法制裁的行为。

伊斯兰教对人性的判断完全不同于基督教，它根本否定人有“原罪”的说法，认为“罪感”主要是来自对真主的不忠，违背真主的意愿、教诲和规定，强调对真主的敬畏与服从，并以此判定美德与恶行。伊斯兰教要求每个穆斯林都按照真主指引的“正道”做人，越轨者即视为“有罪”。罪有“大罪”与“小罪”之分，凡以物配主、忤逆父母、邪术、杀人、吃利息、侵吞孤儿财产、临阵脱逃、诬蔑贞女、奸淫妇女、作伪证、杀害子女、褻渎圣地、偷盗、饮酒为“大罪”，必须受到惩罚。不属于上列各款而又不符合教义的行为属“小罪”，可以祈求真主赦免，但必须忏悔、改正。有罪与无罪、大罪与小罪的界限一清二楚，以此为大是大非的行为准则。

伊斯兰教在禁止“恶行”的同时，大力倡导“善行”，善行的根本就是遵循“正道”，除遵守伊斯兰教法和履行五种功课而外，积极提倡各种美德。对己而言，首先是“守正无邪”，严格

克己，自洁其身，强调“身体力行”，培养“坚韧”和“忍耐”的精神。对人而言，提倡诚实守信，善待父母，团结亲友，乐善好施，扶助贫弱，主持公道，注重礼节。宽恕是有条件的，譬如在圣战中，对侵犯者格杀勿论，停战后就不能“过分”，战俘如肯皈依便给予宽恕，奴隶可以释放，谓之“常守中道”。这些美德在长期的宗教生活中逐步形成，通过人们的赞许而成为一种社会舆论，通过潜移默化与道德实践转化为社会风尚，久而久之积淀而成良好的传统习俗，成为一种趋向善行的习惯势力。

伊斯兰教对现实社会的态度是积极的，它不回避现实，主张“入世”，努力追求现实的幸福，因而特别重视人间的伦理道德规范，以实际行动为检验标准，借以调整人际关系，发挥伦理道德对社会的控制作用。但它作为宗教，召唤人们努力争取“来世”幸福，宣称行善的人在“天国中必定见主，必定归主”，使每个穆斯林在心中产生强烈的“见主”、“归主”愿望。不放弃“今生”而向往“来世”，以今生为出发点，以来世为最后归宿，把今生与来世的幸福紧密联系起来。在由今生通往来世的道路上，是走向“天国”还是进入“火狱”，就取决于人们生前的“善行”还是“恶行”。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善者将在“天国”中永享幸福，作恶者必将在“火狱”中长期受苦，这就从神学的观念上有力地推动伦理道德的实行。对“两世幸福”的追求，是伊斯兰社会伦理道德能普遍实行的基本动因，是穆斯林发自内心的一种宗教感情和自觉推动力量，其最终目标是忠于和服从真主，更加坚定对“真主独一”的信念。

4. 穆斯林的社会生活

穆斯林的社会生活深受宗教意识的影响，又受着伊斯兰教法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在全民信教的大环境中，人们从生到死，方方面面都被纳入“伊斯兰化”的框架，包括宗教生活、人生礼

仪、禁赌、禁酒、禁毒、饮食习惯、婚姻家庭、丧葬习俗、待人接物、言谈举止等等。这些生活范式直接出自伊斯兰教，有的成为穆斯林必须履行的功课，有的进入伊斯兰教法，有的纳入道德行为规范，而最终都成为传统习俗。从渊源上看，许多习俗源于阿拉伯民族的生活习惯，有许多是在伊斯兰教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前者在伊斯兰教创立后被神圣化了，后者则因长期宗教活动而凝结为生活习俗，两者交融而为阿拉伯—伊斯兰生活模式。

宗教在穆斯林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身有礼功，心有念功，性有斋功，财有课功，命有朝功”构成了生活的主旋律。礼拜是一生之中、一天之内最重要的活动，日出前行“晨礼”，日中行“晌礼”，日偏行“晡礼”，日落行“昏礼”，夜间行“霄礼”，逢“主麻日”（星期五）集体在清真寺举行礼拜，此外还有自愿举行的深夜礼拜，斋月休息礼拜及殡葬时向真主祈祷的礼拜。人们念念不忘真主，口诵心念，礼拜时反复念诵“清真言”，初生婴儿首先听到的就是这种诵词，临死时也以清真言送终。斋戒每年一月（莱麦丹月），斋月中白天不吃、不喝、不行房事，挨饥忍饿，清心寡欲，节制情欲，磨炼意志。完纳天课，义不容辞，不断净化财产。朝觐是一生中的大事，无论男女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朝圣一次，即使是身体不支、贫困无力也得“心朝”。

宗教生活中，节日是最盛大的活动，而且都是宗教节日。一年之中，按伊斯兰教历，1月10日为阿舒拉日（安拉创造人类、天园和地狱之日），3月12日为圣纪（穆罕默德诞生日），6月15日为法图麦节（穆罕默德之女、上代哈里发阿里之妻法图麦忌日），7月27日为登霄节（穆罕默德升天日），8月14日为拜拉特夜（安拉“赦免之日”），9月2日为盖德尔夜（安拉向穆罕默德颁降经文之夜），9月斋戒最后一日为开斋节，12月10日为古尔邦节（即献牲节或宰牲节）。在这些节日中，以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最为隆重。宗教节日构成一条主线，以特定时间，特定

内容集中表现宗教生活，贯穿人生，世代传承。

伊斯兰家庭出生的人无需举行任何入教仪式，他们来到人间便是天生的穆斯林，在观念上认为“灵魂在妙世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只需长大后学习经典、履行穆斯林的义务罢了。原先不信教或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入教须经过“大净”洗涤不净的人生，学习经典、教法，改行穆斯林生活方式，由教长起一“经名”，然后成为穆斯林。天生的穆斯林虽然不举行入教仪式，但男子在7—10岁必须进行“割礼”，即割去生殖器上过长的包皮，这种习俗可能来自犹太人。穆斯林在礼拜或斋戒前必须进行“净礼”，目的是使自己身、心、衣着洁净，阿拉伯语称为“塔哈勒”。净礼分为“大净”和“小净”，封斋、聚礼、朝觐前作大净，礼拜或诵经前作小净，皆采取淋浴冲洗，不允许用盆、桶或浴池。大净用净水全身冲洗，仪式有天命和圣行，天命洗涤全身及发根，还要漱口、呛鼻；圣行要默念洗涤污秽，作小净后洗双脚，然后按顺序洗涤全身各部。小净只洗部分肢体和器官，其天命仪式是洗脸、洗两手至肘肘、洗两脚至踝骨及摸头的四分之一；圣行要洗两便，诵安拉尊名，洗双手、漱口、呛鼻，摸胡须、头部、两耳、脖颈、手指缝、脚趾缝等，各洗三次，连续完成。无水或因病不能用水的情况可改作“上净”，用双手拍打净土、净沙，然后摸脸、摸手。净礼是宗教礼仪，同时又是卫生习惯，有利于身体健康。

伊斯兰教不主张禁欲，认为婚姻是人的天职，男女婚配是真主赐给人类的恩惠，生儿育女犹如田上生长五谷，是人类繁衍的必要条件。结婚必须双方“心甘情愿”，男子应付给女方一定聘金，但决不允许逼婚、骗婚和买卖婚姻，奸淫必遭惩罚。提倡一夫一妻制，允许多妻最多不超过四人，且必须“公平对待各妻”，禁止血亲、近亲通婚，更不得与异教徒通婚。男子三次提出休妻即为离弃，妻子只能在丈夫不予供养时才能提出离婚，离婚后可

以改嫁，复婚必须另嫁一男子后再离婚方可。

人死后要举行一整套丧葬仪式，具有作殡礼、上葬、速葬、薄葬等特点。殡礼是集体为死者向安拉祈祷，参加殡礼者须作大净、小净，死者经小净、大净通后川白布缠身，置于麦加城克尔白方向，伊玛目举行仪式后即送遗体埋葬，不鞠躬，不叩首，仪式简单。埋葬不用棺槨，“入土为安”，回归自然，大多以沙土掩埋，或盖一石板，不一定留坟头和立石碑，如在海上亡故可行水葬。实行速葬，一般不超过三天，谓之“亡人奔土如奔金”，迅速“归真”而不返回，所以无扫墓之事。伊斯兰教主张“厚养薄葬”，认为子女应孝敬父母，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得到赡养，安度幸福的晚年，人死后无论贫富、尊卑都一律实行薄葬。反对借丧事大吃大喝、挥霍浪费、讲排场、摆阔气，也不穿孝服，不以物陪葬。这种丧葬习俗，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的人生观和生死观，重视现实人生，不把死亡看成是可怕的事，“归真”实际上是“回归自然”在宗教思想上的折光反映，所以实行土葬、速葬，薄葬与伊斯兰教的经济思想密切相关，提倡勤俭反对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体现平等观念，任何人死后都没有贫富贵贱之别。

伊斯兰教严禁饮酒、赌博和吸毒，认为这些都是“恶魔的行为”，把它们列入不可饶恕的“大罪”，有这种“秽行”者必遭到严厉惩罚。饮酒之所以严格禁止，是因为酒后神智不清，乱了方寸，不能保持虔诚的信仰，还因为醉后容易引起事端，胡言乱语易泄露机密。在伊斯兰教看来，赌博有百害而无一益，既坏良心、丧品行、伤性命、荡家产、失伦理，又常生事变，离骨肉、犯国法、遭天谴，使人变得卑鄙齷齪，造成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恨。吸毒也是不可宽容的，不但影响身心健康，而且毒害社会，使国家衰败，民族衰落。这些禁止虽然主要出于宗教目的，但却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特别是禁毒对人类社会意义重大。

伊斯兰教认为要保持健全的身体和纯洁的心灵，必须以洁净

之物滋养，禁食不洁之物，穆罕默德告诫人们说：“一口不洁，废四十日之功”。不食自死之物，是因为这些动物“死必有毒”，并认为只有除去“血气”之后才能消除“嗜欲之性”。牲畜必须经过屠宰，除去“血气”，且屠宰时必须念诵真主尊名，取得安拉允许，然后由穆斯林屠宰，否则认为是非法之物，不能食用。他们认为鱼的血气在水，鱼离开水便无气血，故可不宰而食。《古兰经》规定，性情温和的反刍动物如牛、羊、驼、鹿等可食，飞禽如食谷的鸡、鸭、鹅等可食，鱼类可食，凶禽猛兽禁食。其实，这些规定，一方面与伊斯兰教义有关，另一方面则是阿拉伯游牧生活的习惯所致，只不过因宗教而神圣化、制度化罢了。

（四）“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世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但同时也是一个宗教概念和文化概念。自7世纪伊斯兰教产生以来，经过130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宗教，当今世界的穆斯林总数大约在10亿左右，约占全世界总人口数的18%。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亚、非两大洲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伊斯兰文化圈，不仅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21世纪仍然继续存在。由于伊斯兰教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巨大渗透力和控制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伊斯兰社会模式，具有极强的内聚力和外抗力。伊斯兰教的传播和伊斯兰社会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主体部分是原先的游牧民族和弱势群体。在欧洲殖民主义向外扩张地过程中，伊斯兰世界受到巨大冲击，许多国家和民族沦为殖民地。适应着形势的变化，伊斯兰教出现了一些宗教与社会改良运动，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往往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结合在一起。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国家，基本上属于

“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国家”，它们与世界霸权主义形成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值得高度重视。

1. 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

世界上存在着五大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限制了基督教文化圈，挤压了佛教文化圈，渗透汉字文化圈，而且吞并了游牧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的形成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密切相关，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在阿拉伯统一过程中形成全民宗教，二是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形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三是在 8 世纪以后扩散到它的“外围”地区。由于历史背景不同，传播的手段并不完全一样，军事征服与帝国的建立对早期传播起过重大推动，往后的传播则主要靠商业贸易、移民通婚、传教活动与文化交流。无论是何种方式传播，要使如此众多的人接受这种信仰，必须有它生存发展的空间，关键是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强制推行是不可能让宗教深入人心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伊斯兰文化圈有其独特的内涵，由于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导致许多共同的文化特征，诸如宗教信仰、社会意识、制度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等，应从多角度进行立体考察。

伊斯兰教的兴起，适应着阿拉伯民族走向统一、崛起的历史潮流。穆罕默德举起“安拉独一”的旗帜，实际上是以一种信仰取代多神信仰，使之成为打破部落界限、团结全民族的精神力量。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的召唤下实现统一，伊斯兰教又在统一过程中扩大传播，两者相辅相成，以致成为全民族的宗教。

“凡穆斯林皆兄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消除血亲复仇、禁止高利贷盘剥、行善好施和赈济贫弱、善待和释放奴隶等主张，给人民带来实惠，因而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为安拉而战”的口号下，消灭了敌对和异己势力，并夺取了政权，从一开始就步入

了政教合一的轨道。在“顺从安拉和使者”的思想指导下，各种制度相继建立，确立了五大信仰纲领、五项天命功课及伊斯兰教法，创建了伊斯兰社会的雏形。应当说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的传播，主要是靠《古兰经》的号召力和感召力，当然，用“圣战”打垮麦加贵族和征服异教徒也起了很大作用。

四大哈里发和倭马亚王朝时期，伊斯兰教走出了阿拉伯半岛，在地中海沿岸建立了一个地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伊斯兰处于国教地位，在政权的支持下迅速扩展，随着阿拉伯人的足迹传到西亚、北非及西班牙。脱胎于氏族社会的平等精神，对于处在封建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民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加之教义简单明了，信奉者趋之若鹜。帝国宣布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萨比教徒可以缴纳赋税来换取宗教信仰自由，但非伊斯兰教徒却要征收人头税和较高的土地税，出自功利目的，也有一些异教徒改信伊斯兰教。阿拔斯王朝时期再次掀起高潮，主要是因为推行“阿拉伯化”政策，一方面各种文化交融而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另一方面是这种文化在帝国范围内日益推广，各民族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为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进行较量，结果西亚和北非仍然是伊斯兰的势力范围，基督教退回欧洲，伊斯兰仅丢失西班牙、西西里等地盘。大致说来，在波斯普鲁斯海峡以南，直到小亚细亚、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印度、埃及都盛行伊斯兰教，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

从8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向外扩大传播，主要是中亚、中国西北部、西非、东非、印度及东南亚。阿拉伯人进入中亚地区虽然在7世纪后期就开始了，但伊斯兰教广为传播是在8世纪后半期到9世纪初，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更推动了中亚的伊斯兰化，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等民族都皈依了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始于 7 世纪中叶，但大量传入是在元、明时期，信奉伊斯兰教的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东非的传播早于西非，大概在 7 世纪就开始了，但盛行于东非是在 13 世纪，而在西非广为传播是在 16 世纪以后。14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南亚次大陆的孟加拉等地，莫卧儿王朝的建立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盛行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主要是沿着阿拉伯—印度—中国的海上航道，通过穆斯林商人，13 世纪末传入印度尼西亚，14—15 世纪传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

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伊斯兰教为亚、非广大地区的人民接受，从根本上讲与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有关，原因非常复杂。伊斯兰教既重来世幸福又重视现世幸福是一个关键，它不像佛教那样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虚幻的彼岸世界，而要求人们在今生奋斗，这就显得现实得多，所以佛教发源地印度的许多地方都被伊斯兰教占领，我国西北民族和东南亚国家原先也信奉佛教，后来有相当一部分改信了伊斯兰教。“穆斯林皆兄弟”有很大号召力，使人们在现实中可以看见某种相对的平等，因而易于为受压迫、受凌辱的人接受，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16 世纪以来，西欧殖民主者在西非大肆掠夺奴隶，这就促使许多弱小民族和部落信奉了伊斯兰教，并在 19 世纪初建立起一系列“神权国家”。对这些弱势群体来说，信奉伊斯兰教可仿效阿拉伯民族实现统一，并加入到伊斯兰世界中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民族，在教义、教法中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所以成为游牧民族普遍的宗教信仰，中亚各国就是最好的明证。应当看到，在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当时世界上较高的文化，而且兼容了多种文化，正是这个原因，它取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通过伊斯兰教

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到世界许多地方，并以文化来支撑和巩固信仰。

伊斯兰文化圈的“文化源”在伊斯兰教，许多文化现象都由此产生。因为伊斯兰教是一个真主、一部经典，一切信仰都围绕着“真主独一”，一切文化都源于《古兰经》，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文化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还因为伊斯兰社会模式的存在而得到巩固，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意识到社会制度，从伦理道德到生活习俗，都纳入统一规范，不轻易受到其他文化侵蚀。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文化圈内的民族，由于整个社会环境和群体观念的原因，全民信教的情况极为普遍，这就使文化的传承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这里，宗教感情与民族感情水乳交融，显得特别强固。穆斯林之子恒为穆斯林，与穆斯林通婚的人必须改信伊斯兰教，这就保证了它在信仰上的纯洁性，并随着人口的增殖而扩大范围。尽管这些民族原先的风俗不同，文化底蕴不一样，但接受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伊斯兰理成了主流，本民族文化仅在某方面表现一些特征，只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单个民族因信奉伊斯兰教而趋于一致，整个文化圈又在信仰上统一起来。朝圣是穆斯林的“五功”之一，通过朝圣使全世界的穆斯林在思想感情上联系更加紧密。

伊斯兰文化圈比其他几个文化圈都要稳固得多，关键是信仰高度制度化、习俗化。哈里发制度影响最为深远，从四大哈里发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直到 1924 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才正式废除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制度。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赋予宗教管理国家的极大权力，同时又给政权套上神圣的光环，因此一切宗教事务和国家事务都可能引起国际纠纷，甚至诉诸武力。圣战制度是捍卫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民族的有力武器，动员面大，战斗力强，表现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概。伊斯兰教法具有普遍意义，逊尼派法学家们还提出了“创制之门关闭

说”，认为它已是完整的体系，无须再有“创制”，只能“遵循”、“仿效”，因此贯彻始终，渗透到宗教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及日常生活各方面，从而成为建立伊斯兰社会模式的牢固基础。因为《古兰经》和“圣训”都是用阿拉伯文写的，所以阿拉伯文在伊斯兰文化圈中普遍流行，有 20 多个国家以阿拉伯文为正式通用文字，有许多民族用阿拉伯字母创制本民族文字，即使不通用阿拉伯文的国家和民族在宗教活动中也使用阿拉伯文。伊斯兰教历在伊斯兰文圈内也广泛使用，特别是宗教节日非按伊斯兰教历不可。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也普遍推广，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

2. 近现代伊斯兰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

18 世纪末，正当西欧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法沙维帝国和莫卧儿王朝都相继衰落，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受到强烈冲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1798 年拿破仑进攻埃及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口号下，西欧各国把伊斯兰教世界作为主要掠夺对象，在一个世纪之间，北非、西非和东非先后沦为英、法、葡萄牙等国殖民地，沙皇俄国也乘机吞并中亚各汗国，印度及东南亚各国也遭到同样命运。这些地区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商品市场，自然经济迅速瓦解，为宗主国提供单一的农产品和矿产，大批黑人被掳掠为奴隶贩卖到美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侵蚀着古老的社会，西方的政治思想、科学文化渐渐渗透进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激剧变化，文化传统受到世俗化和近代文化的冲击，对伊斯兰教发起了挑战。而对世界形势的大变局，伊斯兰教不得不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借以捍卫国家独立和摆脱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于是相继出现了复古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现代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掀起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如瓦哈比

运动、赛努西运动、马赫迪运动、巴布教运动、阿赫默底亚教派运动等。这些社会思潮和改革运动，目的都是为了复兴伊斯兰教，挽救伊斯兰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使伊斯兰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顺应历史潮流。

18 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出现的瓦哈比运动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开端，它的发起人是穆罕默德·本·阿卜都·瓦哈布，他写了一本《崇拜真主独一是真主赋予其奴仆的义务》的书，号召人们坚定“万物非主，惟有真主”的信条，回到《古兰经》和早期“圣训”的本原上去，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法，取缔“异端”，净化伊斯兰教，恢复伊斯兰的“真精神”，在“复古”的口号下复兴伊斯兰教。他特别强调“圣战”是伊斯兰教的权利，用武力清除异端和抵御外来侵略。他的主张得到了沙特家族的支持，于 1811 年在内志建立了瓦哈比国家。这个政权虽然遭到埃及总督的颠覆，但不久又再度兴起，终于在 1926 年重建政教合一的国家，1932 年定名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瓦哈比运动是对西方侵略的一个回应，唤醒穆斯林起来捍卫伊斯兰传统，复兴伊斯兰教，对后来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北非的赛努西运动、印度的哈瓦比运动、印尼的帕达里派运动有一定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斯兰复古主义在新形势下又有发展，1928 年哈桑·巴纳在埃及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旨在恢复哈里发制度和实现伊斯兰国家的统一，对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19 世纪中叶又兴起了“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其创始人是阿富汗的哲乌鲁丁·阿富汗尼，他活动于阿富汗、埃及、印度、伊朗和土耳其，主张重建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哈里发大帝国，用以抵抗殖民主义侵略和反对基督教的渗透。他认为伊斯兰教的教旨有回击任何挑战的能力，但要进行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把教育提到首要任务，在纯化宗教信仰的同时，用理智巩

固信仰，以经济自强和学习先进科学来改变伊斯兰社会的落后状态，实现伊斯兰教的复兴。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具有反殖民主义的色彩，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强烈要求，但重建哈里发帝国的主张却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泛伊斯兰主义又趋于活跃，但已不再要求恢复哈里发制度和建立伊斯兰大帝国，而是强调全世界穆斯林应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各方面进行广泛联系与合作，促进各国的繁荣和发展，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产生了一些伊斯兰国际组织，重要的有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

在社会思潮的推动下，19世纪中叶及后半叶出现了利比亚的赛努西运动、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和伊朗的巴布教派运动。赛努西运动是复古主义思想与苏非神秘主义结合的产物，创始人是阿尔及利亚的穆罕默德·本·阿里·赛努西，他主张在北非建立政教合一的基层组织“扎维亚”，发动部落进行圣战，反对奥斯曼帝国殖民主义侵略，是北非影响最大的伊斯兰社会运动。苏丹的马赫迪运动的领导人是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自称“马赫迪”（即救世主），号召人们反压迫、均贫富、反对腐败现象和纯洁伊斯兰信仰，以“圣战”赶走英国殖民者和异族统治，建立平等、正义的“理想之国”。他领导苏丹人民举行大规模起义，一度建立以伊斯兰教法治国的政权，后来为英埃联军击败。巴布教派运动是一次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运动，其创始人阿里·穆罕默德自称“巴布”（即信仰之门），宣称“马赫迪”将降临人间，并建立平等、公正、幸福的“正义王国”，他所写的《默示录》主张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财产公有，保障人身自由，发展商业贸易，这一教派举行多次起义都遭到失败。

19世纪末在埃及出现了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其倡导者穆罕默德·阿布等人都是受西方

教育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基本纲领是在坚持伊斯兰教信仰的前提下，倡导运用理性和科学对《古兰经》作新的解释，使传统的宗教观念理性化，使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相互协调。他们认为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在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应当吸收先进科学文化，把教育改革作为社会和宗教改革的突破口，对于伊斯兰教法，他们主张打破“创制之门关闭说”，依据《古兰经》、“圣训”及四大教法学派的理论，运用理性和独立判断结合社会需要创制新的教法律例。主张运用新的思想，对伊斯兰社会进行改革，革除政治、经济、社会弊端，并建立新型的伊斯兰教团体——“伊斯兰教青年会”和“伊斯兰教兄弟会”。与此同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出现这种社会思潮，但政治倾向有所不同。1924 年在土耳其爆发了凯末尔领导的世俗主义宗教改革运动，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创建了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伊斯兰改革运动有所下降，但仍继续探讨伊斯兰教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

从 20 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个世界性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入高潮，西亚和非洲的许多民族都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为了摆脱经济社会落后境况，一些伊斯兰国家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探索“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古兰经》中已包含社会主义原则，如公平正义、穆斯林一律平等、反对高利贷和施舍济贫之类，应当以伊斯兰教义为指导，通过阶级合作调整社会关系，通过土地改革建立农业合作社，允许私有制的同时实现部分生产资料公有化，发展工人自治和公费医疗，建立一种“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理想世界”，以致出现了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进入 20 世纪之后，现代主义继续发展，埃及伊斯兰学者阿里·拉兹克以更激进的世俗主义立场提出宗教改革，认为哈里发

制度完全是一种世俗政体制，并不具有宗教的神圣性，主张政教分离。20 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黑人中兴起一种以伊斯兰为旗帜，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运动，先后建立“美国摩尔人科学圣殿”和“普世黑人改良协会”等组织，称为“黑穆斯林运动”。

3. 当今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在 10 亿穆斯林中，亚洲约占 80%，非洲占 19% 左右，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尼亚、南斯拉夫和塞浦路斯有一定分布，美国及拉丁美洲有数百万黑人也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主要分布区连成一片，以西亚和北非为核心地带。西亚是穆斯林最密集、伊斯兰国家最多的地区，这里除以色列信奉犹太教外，其余国家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数均占总人口数的 90% 以上，有的几乎是 100%。与西亚紧密相连的是中亚，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国中，穆斯林人数约占总人口数的 69.8%，以乌兹别克斯坦比例最高。与西亚和中亚相连的是我国的新疆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主要集中这一区域。在印度次大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是伊斯兰国家。东南亚主要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非洲的穆斯林总数虽然只及亚洲的四分之一，但占全非人口总数的 40% 左右，以北非为中心向西非、东非和中非发展，在伊斯兰国际组织的成员中非洲有 24 个国家。

“伊斯兰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但如何界定“伊斯兰国家”却有争议。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国家，应当是以伊斯兰为国教，国家元首和主要领导人是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活都遵循《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教法，将不属此类而穆斯林占人口总数大部分的国家称为“穆斯林国家”。根据 1987 年统计，参加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有 46 个，其中，亚洲有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伊朗、阿富汗、

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非洲有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马里、塞内加尔、冈比亚、布基纳法索、西撒哈拉、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塞拉利昂、贝宁、尼日尔、喀麦隆、乍得、苏丹、索马里、吉布提、乌干达、加蓬、科摩罗。在这些国家中，国名上冠以“伊斯兰”的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和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国名冠以“阿拉伯”的，有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冠以“苏丹”的有苏丹共和国和阿曼苏丹国。

上述国家穆斯林的总数均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其中，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阿富汗、埃及、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摩洛哥、苏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国的穆斯林均在 1000 万以上。毫无疑问，在这些国家中伊斯兰教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政治体制上却有许多不同。土耳其 1924 年建立共和国后，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强调伊斯兰教与科学、民主、理性的一致性，建立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大国民议会议员中产生总统，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和重要企业国有化，对外在“相互谅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伊朗在 1979 年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它是一个以十叶派为主体的神权政体，宪法规定“伊斯兰共和国只承认真主的统治”，宗教领袖掌握国家大权，可以任免总统、最高法院院长，统帅全国武装力量，决定宣战和停战，并实行“全面伊斯兰化”，在外交上提出“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

兰”的政策，号召穆斯林起来推翻本国政府，建立伊朗式“伊斯兰政府”，对中东地区产生巨大冲击，以致引起两伊（伊朗和伊拉克）战争、海湾战争和黎巴嫩内战。沙特阿拉伯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王国，国王同时是教长，控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设有人臣会议和咨询会议，政府下设司法部、教育部和朝觐事务与宗教基金部，设有成文法和立法机构，仍然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依据，伊斯兰法庭分为三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七个酋长国组成，实行政教合一，最高权力机关是由七个酋长国组成的联邦最高委员会，由“沙里亚”法庭管审判、司法，由伊斯兰事务与宗教基金部管理一切宗教事务。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实行议会制、总统制和内阁制，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必须是穆斯林，《古兰经》和《圣训》是立法的主要依据”。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实行人民议会制、总统制和内阁制，政府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立法以伊斯兰法典为重要依据，宗教事务由宗教基金与爱资哈尔事务部主管，伊斯兰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宗教机构，并在省市县设立分会。苏丹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元首为总统，政府由总理和部长组成，大力推行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政策，有大量教团性质的教派。利比亚原为联合王国，1969年政变后建立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实行“反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主张以伊斯兰教的原则和精神走“第三条道路”。印度尼西亚90%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但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并不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国会由普选产生，总统是国家元首兼内阁总理，最高评议院为总统的咨询机构，政府设有宗教部主管宗教事务。以上所举各例说明，伊斯兰国家政体沿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面对着世界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20世纪以来，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推动下，出现了一些伊斯兰教的国际组织，加强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最先建立的是世界伊斯兰大

会，亦称世界穆斯林大会，它是历史最长的泛伊斯兰国际组织，成立于 1926 年，总部先设在耶路撒冷后迁卡拉奇，成员团共 42 个，其目的是使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重新团结起来，增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维护伊斯兰教信仰，抵制无神和世俗化倾向，在联合国享有“非政府性咨询机构”的地位。继之而起的是 1962 年成立的伊斯兰世界联盟，它的章程是：“履行宣传伊斯兰教的义务，坚持伊斯兰教的原则，研究伊斯兰教的各种问题，以实现穆斯林的利益和愿望，同背离伊斯兰教、破坏穆斯林之间兄弟团结的各种会议、组织作斗争。” 1973 年以来活动加强，召开了各国伊斯兰教组织会议及非洲、亚洲、东南亚、太平洋、北美洲等伊斯兰会议，成立了亚洲、非洲和欧洲伊斯兰理事会及伊斯兰国家宗教事务部长年会，国际清真寺事务最高委员会、伊斯兰情报资料最高委员会，现有 54 个国家参加。1971 年成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政府级的国际组织，有 46 个国家参加，经常就各成员国关心的问题交换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愈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还出现了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外长级会议和伊斯兰国家组织秘书处。属于泛伊斯兰组织的还有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宣教协会等。此外，在伊斯兰的名义下，还建立了伊斯兰开发银行、伊斯兰国际通讯社、伊斯兰团结基金会等。

在当今世界上，伊斯兰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它不仅拥有 10 亿之众，有许多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还建立了 40 多个伊斯兰国家，建立了世界性的伊斯兰教组织。伊斯兰世界的联系较为紧密，有国家之间的世界组织，有非政府性的世界组织，还有民间的朝圣活动。从分布上看，伊斯兰教的主体部分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横亘在欧亚大陆之间，控制着半个非洲大陆。它的核心地带在西亚和北非，即所谓“中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控扼了亚洲通往欧洲、非洲的道路和印度洋通往大西洋的航道。西亚是

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产区，石油的储藏量占世界一半以上，是所谓“东半球油极”，石油产量约占世界的 40%，主要产于波斯湾沿岸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伊拉克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控制着世界石油供应的命脉。中东自古风云激荡，拿破仑远征埃及后，英、法、俄、意在此角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最近半个世纪，这里更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矛盾冲突，经常是硝烟弥漫，1948 年爆发了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第一次中东战争，1956 年爆发以色列和埃及的第二次中东战争，1967 年又爆发以色列对阿联、叙利亚、约旦突然袭击引起的第三次中东战争，1980—1989 年发生了持续 8 年之久的两伊（伊朗与伊拉克）战争，1990—1991 年发生了为石油问题而起的海湾战争，2001 年“9·11”事件以后中东形势更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2003 年 3 月 20 日爆发了美、英侵略伊拉克的战争。

第五篇 人类文明的伟大转折

从 14 世纪开始，地中海文明的中心开始转移到意大利，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帷幕。这是一支响彻云霄的历史变奏曲，高扬着“人文主义”的基调，倡导解放人性、呼唤理性、张扬个性，以后进一步深化发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把人们从神权的绝对统治下解救出来，出现了“产生巨人的时代”。人们走进了“理性的殿堂”，从天体上夺取了第一个科学阵地，培根的“科学就是力量”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第一次科学革命划开了一个时代，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8 世纪和 19 世纪相继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由蒸汽机时代跨进了电气化时代。在这几个世纪之间，欧洲发生了巨大变化。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是一个“大航海时代”，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世界变得更加宽广；从尼德兰革命到法国大革命，急风暴雨式地摧毁了西欧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一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迅速推进，实现了近代工业化。一系列的重大变革，使落后的欧洲一跃而为先进的欧洲，世界文化中心向欧洲转移。以科学、民主为特征的近代文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世界面貌从此日新月异。自“文艺复兴”以来，东、西文化的分异日益明显，形成了巨大反差，根本的差异是工业与农耕，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进取与保守。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西方文明，使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东方文明相形见绌，“西学东渐”成了不可

抗拒的历史潮流。

（一）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

思想变革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新的思想呼唤着新时代的到來。14—16 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宣告“黑暗的中世纪”即将过去，闪现出近代文明的第一道曙光。它打破了欧洲中世纪的沉寂，思想日益活跃，人文主义的兴起，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宗教改革的出现，科学革命的爆发，都表现了新时期的萌动。17—18 世纪的“启蒙运动”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执著地追求建立“理性王国”。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在各方面展现才华，出现了一个“巨人时代”。欧洲的勃兴，近代文化的兴起，都离不开这宏伟的“历史三部曲”。

1. 响彻云霄的历史变奏曲

如果我们的目光不仅仅是局限于欧洲，而是放眼世界，那么，欧洲“文艺复兴”的世界意义就会使人感到不同凡响。它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变奏曲，古代文明经过这一重要转型期朝着近代文明的方向发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航向和命运，所以恩格斯把它称为“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思想大变革，同时又是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文化运动，因为这一时期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重新受到青睐，文学艺术的成就令人瞩目，故称之为“文艺复兴”。在当时说来，“复兴”是一种比较温和的词语，容易为人们接受。其实，“复兴”是对中世纪文化反思的结果，标榜古典文化事实上是“以古非今”，以古典时代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来改变中世纪死气沉沉的状况。但“复兴”古典文化并非一味好古，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取向，顺应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萌芽

的历史潮流，取其有用加以弘扬。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认真对待几千年积累起来的遗产，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前提下继承，以“复古”的名义实现文化的“复兴”。充满激情的文艺创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大鲜明标记。在重新“发现自己”的同时重新“发现世界”，爆发了一场震撼全球的科学革命。宗教权威已经无法压抑汹涌澎湃的浪潮，在天主教内部也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发生地震，动摇了罗马教皇和封建统治，使整个时代处在激荡与剧烈变革之中。

“文艺复兴”的灵魂是人文主义，又称人本主义。起初的所谓“人文主义”，是对那些热衷于研究“人文学”的人而言，他们厌恶那刻板、呆滞、毫无生气的中世纪思想文化，狂热般地追求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希图从中吸取使文艺得以复兴的力量。14世纪中叶，人文主义者以教育为己任，以古老的“人文学科”如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等来提高人的素质和修养，通过“自由教育”来塑造完美的人格，使人的潜在能力能充分发挥出来。15世纪古典风格取得了胜利，在艺术领域内产生了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等大家，拉丁文和俗语文学创作也兴盛起来，史坛上出现了“公民政治史学派”和“古史辨派”，伦理道德上反对禁欲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公共庆典蔚然成风，中世纪的“坚冰”正在解冻，一切欣欣向荣。16世纪的“宗教改革”对教皇和封建统治发起攻击，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同人生价值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的发现”和“发现自己”，越来越显示出“以人为本”的精神。当然不能设想那个时代的人已经摆脱神的束缚，但心灵上有了“自我”，意识到人的尊贵和生命的价值，相信人自身有无尽的创造力，从而把人性从神的奴仆中解救出来。人们不再一味“迷信”神的绝对权威，用理智的态度关注世界，审视人生，感受活生生的现实，呼唤理性，把事物放在“理性的天平”上去衡量。追求

荣誉成了一种新的风尚，自由竞争的意识不断增强，人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注重展现个性和人的内心世界。正是因为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理性战胜迷信，自我表现得以凸显，人的伟大创造力被释放出来，无论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思想上都有重大突破，致使“文艺复兴”成为欧洲中世纪转向近代文明的开端，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变奏曲。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故乡，它最先从神学的迷惘中苏醒过来。地中海的文化漩涡，历史地由阿拉伯旋转到意大利半岛，在这里激起了惊涛骇浪，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啸。经过为时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经过13世纪“蒙古征”的扫荡，罗马教皇的神圣权威已经黯然失色，拜占庭帝国也衰落不堪，不可一世的阿拉伯帝国在蒙军的重创之下分崩离析，地中海文化处在激荡与重组之中。意大利半岛曾经有过古罗马的辉煌，也是中世纪罗马教皇统治的中心，在经过漫漫的黑夜之后，人们在历史的反思中对文化的沦落有更深切的感触，巨人的反差使人们更加钦慕古典文化，强烈要求“复古”。然而，给意大利注入新生命的是社会变革，是资本主义萌芽。也许是“十字军东征”使商人们发财致富，也许是阿拉伯海上霸权的丧失给意大利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几经兴衰的意大利城市蓬勃发展起来。意大利商人的足迹遍及地中海和欧洲各国，威尼斯成为国际都市，继之而起的有热那亚、比萨、帕维亚、佛罗伦萨等等。矿产开采、金属铸造、纺织、造船等手工业发展起来，出现了工场、行会、合伙公司、银行、业主与雇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兴未艾。资本主义在的母体中萌动，推动了文化转型，新的文化因素不断增长，不断冲破藩篱，“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展开。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大体可分三个时期：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为“黎明期”，或可看做是“文艺复兴”的前奏，以但丁的《神曲》作为重要界碑，它在黑夜即将过去时闪现出曦微的晨

光，预兆文艺的变革即将来临。14—15 世纪末是“文艺复兴”的早期，在绘画上展现出新的风格，马萨乔、多纳泰罗、菲利波·布鲁奈列斯奇的作品让人耳目一新，彼特拉克的《歌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谈》在文坛上放射出光芒。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三大艺术巨匠的出现，标志着“文艺复兴”进入了鼎盛期，佛罗伦萨画派和威尼斯画派互相争艳，文学上出现了《疯狂的奥尔斯托》、《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等优秀作品，自然科学发表了自己的独立宣言，布鲁诺等人公开向经院哲学宣战。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的骄傲，它最先举起“文艺复兴”的旗帜，高高飘扬在地中海上。这里不但景色迷人，设计优美，而且经济繁荣，人文荟萃。它从 13 世纪起就是一个国际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铸造了新金币“佛罗琳”，银行兴盛，出现许多富豪家族。1187 年取得了城市自治权，13 世纪发展为城市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是由 7 大行会首领组成的“长老会议”，以“贤人团”和“旗手团”为辅助机关，立法权属于人民会议和公社会议，其间虽然为美第奇家族控制了 3 个世纪，但这种政体并未废除。它有如当年的雅典，在自由、宽松、优裕的环境里哺育许多奇才。这里是伟大诗人但丁的故乡，接着产生了被尊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十日谈》和《神谱》光照于世，拜占庭学者克里索罗拉斯来到佛罗伦萨大学传授希腊文化。市民编年史风行一时，重要的著作有《佛罗伦萨创建记》、《佛罗伦萨编年史》，后来形成了一个以历史唤起人们政治热情、培养积极公民的“公民政治史学派”，后期也出现了浸透强烈政治情结的“政治史学派”。这里是一个“艺术工作的国家”，从“意大利绘画之父”契玛布埃创作《圣母和基督》以来人才辈出，古典艺术风格在 15 世纪取得了胜利，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圣约翰》和《最后的晚餐》标志着“文艺复兴”盛世的到来，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究》和《教义论辩》把艺术和理想完美结合起

来，米开朗琪罗的杰作《丘比特像》、《大卫像》都堪称世界精品。城市建筑突破了以教堂为主的格局，公共建筑、民宅、宫苑显著增加，建筑语言上表现出柱式、墙垣、拱门与穹窿顶和谐的风格。公众庆典成为一种时尚，为各种人物施展才能提供了舞台，营造一种活泼、开放、竞争、创造的文化氛围。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欧洲的前程。

威尼斯是个国际都会，海上贸易和造船业特别发达，政权由元老院、大议会和总督组成，是一个商人势力强人的城市共和国。人文主义教育在威尼斯兴起，威尼斯画派在 16 世纪突显出来，其代表人物有乔万尼·贝尼尼、乔尔乔涅和提香，市民生活多姿多彩，成为“文艺复兴”后期的中心。意大利北部的米兰，13 世纪兴起共和制而建立城市公社，虽然它处在扰攘不宁的环境中，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在俗语文学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罗马城是基督教的圣地，是罗马教皇的统治中心，几经战乱之后又重建罗马城，尼古拉五世重视文化建设，随着教廷的世俗化，最顽固的堡垒也发生许多变迁，出现了“古史辨学派”和宫廷文学。

“文艺复兴”的浪潮向北推进，通过讲学与求学、商业活动与图书传播，从 15 世纪开始大规模越过阿尔卑斯山向欧洲各国扩散。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德意志，16 世纪初进入高潮，表现出“民族自豪和自由精神”，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铺平道路。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落后于意大利，白法兰西斯一世邀请欧洲艺术家到法国后掀起热潮，值得一提的是将新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结合的勃费弗尔，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和散文家蒙台涅，他的文学作品《随笔录》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提倡宽容与怀疑精神。英国的人文主义在伊丽莎白一世时达于鼎盛，仰慕佛罗伦萨的“精神家园”，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作。西班牙受意大利的影响最大，魏微斯的

《论学科》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优秀的教育著作之一，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不失为旷世之作。荷兰的伊拉斯谟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之王”，他的《愚人颂》、《谈话录》、《和平的申诉》等书在欧洲风靡一时。这一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则是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十四行诗。

地中海文明经过古代东方、希腊罗马、伊斯兰与欧洲中世纪几次大的回合，在“文艺复兴”时期达到新的高峰，转向近代文明。它之所以最先进入近代文明的主流圈，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地中海汇集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反差很大，能博采诸种文化之长，在回旋激荡中掀起巨澜。“文艺复兴”距希腊、罗马千年以上，要从这失落的文明中找到真迹实在太不容易了。古老的希腊、罗马文明并没有直接传承下来，而是通过几条“历史暗道”才重现它的尊容。阿拉伯帝国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把当时尚存的希腊、罗马文献译成了阿拉伯文，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又涌向西班牙把它们再转译成拉丁文，这算是一条辗转翻译的历史暗道。拜占庭帝国存在千年之久，尽管它已经发生“变形”，但它毕竟是东方的“新罗马”，更何况希腊半岛被纳入它的版图，因而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古典文化，“文艺复兴”期间有一批拜占庭学者来到意大利，又有一批意大利学者到拜占庭考察，从“变形”中找到它的“原型”。欧洲中世纪被宗教压得暗淡无光，但欧洲毕竟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发祥地，它“冷藏”着许多古籍和遗物，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宝库，大量的考古发掘使之重见天日。意大利得风气之先，最先从人类的智慧中吸取营养，得到新的生机，进而使欧洲崛起，开创世界的近代文明。

2. 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像决了堤的洪水一发不可遏止，

人们高举起“人文主义”的旗帜，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初升的太阳。17—18 世纪欧洲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重在“启迪蒙昧”，唤人觉醒，故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其精髓都是“人文主义”，即“以人为本”。如果说“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新思想的激发与冲动的話，那么，“启蒙运动”则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场锣鼓，是资本主义胜利进军的号角，从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到北美独立和法国大革命，展开了一幅新的历史画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古典主义”的同义语，而“启蒙运动”则把“一切都要经过理性法庭的审判”写在旗帜上，态度鲜明地反对盲从迷信、愚昧无知、封建专制，推崇知识，尊重科学，解放思想，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大声疾呼“人权”和“法制”，要求建立“理性王国”。

整个中世纪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宗教像“紧箍咒”一样把人们的思想束缚起来，迷信“万能的上帝”，看不见人的价值，崇拜神权和王权，把“人权”压缩到最低限度，科学被埋葬在神秘的迷惘之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炸开了缺口，人开始站立起来，在文艺上创造出惊人之作，在天体上夺取了第一个科学阵地。“启蒙运动”主要是对“非理性”发起猛烈进攻，以思想为先导创建“理性王国”，把人们的思想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恢复理性的权威。这是一个“哲学的世纪”，整个时代精神都集中在哲学思想上，为近代文明注入了“活的灵魂”，为资产阶级革命呐喊，为各个领域的鼎革创新开辟道路，使之成为时代前进的动力和杠杆。

“启蒙运动”的发源地在英国，它与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有关。1688 年的所谓“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为了巩固新的政权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启

蒙运动”应运而生。弗·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把经院哲学称为“不生育的修女”，集中攻击“偶像”，叫人们“研究自然本身”，相信“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泉源”，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响亮口号，在方法论上强调“归纳”。尽管他把哲学和神学归纳为“二重真理”，但“知识就是力量”却充分展示理性的光辉，并最终导致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霍布士的关注点是政治、国家和伦理道德，他的“社会契约论”是反封建的一枚重磅炸弹，“生命运动论”旨在张扬人的个性，他把经典力学的原理无限广延而建立机械唯物论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培根经验论的同时强调只有理性思维才能“照明真理的道路”，并认为最好的方法不是“归纳”而是“演绎”。牛顿经典力学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用精确的机械观点来解释整个自然”，使上帝在哲学上丧失了权威。英国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是洛克，他的《人类理智论》论证了培根和霍布士的原则，以“白板说”（没有先天的善恶）来建立他的人性论，以“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君主立宪的合理性，因而成为“一切形式资产阶级的代表”。尽管他的思想有明显的妥协性，但对法国启蒙思想家产生重大影响，伏尔泰对他推崇备至，称他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性、妥协性相一致，启蒙思想也带有温和色彩，但它却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点燃了欧洲“启蒙运动”的熊熊烈火。

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最有价值的是对民主政治的论述，他以霍布士的“自我保存”说为出发点，认定“民主”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认为“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每个人应该做他所愿做的事”，教会应与国家分离，人人都应当执行国家法令，情感、欲望应服从理性。这一时期法国的重要的思想家是笛卡儿，他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奠基人，坚持“普遍怀疑”的原则，主张一切都用“理性的尺度”来衡量，认为理性是“天赋”的，它使人具有“正确地

做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要通过发扬理性来改造社会，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就是“服从法律”。笛卡儿认为只有理性知识才是可靠的，感觉往往会欺骗我们，应当从众所周知、“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一步步推演出许多命题，构成一个知识体系，创立了演绎逻辑。他的“物理学”实际上是指自然科学，认为物质是惟一的实体，机械运动是“物质生命的表现”。他的“形而上学”是超乎自然的学说，“我思故我在”充分表现了先验论的思想。笛卡儿和洛克的思想是 18 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两大来源，理性的精神闪闪发光。

18 世纪法国进入了一个极端专制的黑暗时代，但由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启蒙思潮作为“政治变革的前导”澎湃而起，浩浩荡荡，几乎占据了整个世纪，使法国成了欧洲“启蒙运动”的主战场。这场声势浩大、持续百年、深入各个领域的思想变革运动，终于导致了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所以拿破仑说：“大革命是思想家的业绩”。这一时期涌现出 200 多位启蒙学者，最著名的有培尔、梅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从 18 世纪 40 年代到 80 年代，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新思想不断出现，旗帜鲜明地呼喊“平等、自由、民主、博爱”，发表了《人权宣言》和《女权宣言》，宣称“天赋人权”，高唱《马赛曲》直捣封建王朝。他们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和深刻性，在思想上直接影响 19 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卢梭的“天赋人权”，对德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以及北美独立战争都有深刻影响。

梅叶（1664—1729）是从天主教阵营中杀出来的叛逆者，他的《遗书》震撼人们的心灵，叫人读了“吓得发抖”，但又使人“深信不疑”。他写道：“我的目的，是要尽我的力量使你们睁开

眼睛（虽然晚了一点），看一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有多少人啊）不幸地诞生和生活在其中的那些荒唐的谬误。”他身为神甫，公然宣称“世界上根本没有神”、“宗教是骗人的谎言”，简直把钢刀插入了“神”的心窝。他痛恨封建专制，认为它是造成社会苦难的祸根，提出要建立公有制的“自由公社”。梅叶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开路先锋，又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先导，他的雕像耸立在法国的“理性殿堂”。

伏尔泰（1694—1778）是“启蒙的泰斗”，由于他知识渊博，涉猎哲学、历史、政治、诗歌、小说、戏剧许多领域，写下了《哲学通讯》、《形而上学论》、《牛顿哲学原理》、《路易十四时代》、《议会史》等哲学、历史巨著，还写了戏剧《恺撒之死》、长诗《奥尔良的女儿》、哲理诗《里斯本的灾难》、哲理小说《查理格》等多部文学作品。由于他著作等身，思想深刻，又是一个长寿老人，影响一个时代，所以雨果说：“伏尔泰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他去世11年后，爆发了法国大革命，人民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将他的遗骸迁葬巴黎名人公墓，在灵车上写着“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伏尔泰在哲学上极力宣扬洛克的经验论和牛顿的机械唯物论，拨开神秘的雾罩使人们看见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他以文学为武器，辛辣地讽刺教皇、教会和专制统治者，激起人们反黑暗、反封建的勇气和热情，去创造一个自由、幸福、科学、文明的“家园”。作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通过学术活动和通信联系影响一代精英，支持“百科全书派”。

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他的主要功绩是把哲学、历史和法学的研究直接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著有《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等书。《论法的精神》影响最大，它不仅系统地研究了法学，还广泛涉及社会历史各方面，黑格尔称之为“一部美妙的著作”。

孟德斯鸠发展了洛克的分权思想，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模式，强调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必须分立，建立一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政治机制。“三权分立”的学说被西方国家广泛采用，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吸取了它的精髓。

卢梭（1712- 1778）是启蒙思想家中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拜伦说他的预言“像神秘的古代毕西亚山洞的神谕，把整个世界投进熊熊的烈火，直到所有的王国化为灰烬”。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认为文明的进步会造成人类的堕落和社会的苦难。《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曾经震动欧洲，主要论点是“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最响亮的口号是“天赋人权”。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提出了“人民主权论”的政治观点。“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论”始终是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特别得到第三等级的拥护，把它写在《人权宣言》中，将革命进行到底。对此，路易十六哀叹说：“伏尔泰和卢梭毁灭了法国”，而雅各宾派的首领罗伯斯庇尔则称卢梭是法国大革命“导师”。事实上，欧美各国的革命无不以“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为号召，掀起一场席卷世界的风暴。卢梭是一个坚定无畏的反封建斗士，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对开拓近代民主政治有不可磨灭的功勋。

“百科全书派”的出现是法国“启蒙运动”史上的一座丰碑，标志着这一思想解放运动进入高潮。“百科全书派”得名于1751—1772年间编纂的《百科全书》，这不是一般的知识辞典，而是18世纪欧洲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反映，它以科学对抗神学，以民主反对专制，以理性批判旧的制度、传统和观念，是一部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大典，对人民来说它是一部“战斗机器”，对敌人来说则是一门“可怕的大炮”。参加《百科全书》撰稿的有160多人，有哲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伏尔

泰、孟德斯鸠、卢梭都是积极的支持者。主编这部巨著的是一批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如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显然，《百科全书》是启蒙思想的大荟萃，是这一伟大变革时期的历史缩影。拉美特利（1709—1751）是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心灵的自然史》、《人是机器》、《人是植物》、《反莱尼加或论幸福》、《各派体系的提要》等，中心思想都是宣扬唯物论和无神论。狄德罗（1713—1784）是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他为“真理和正义”贡献了一生。卢梭称他为“本世纪一位惟一的奇才”，伏尔泰说他是知识广博的“万事通”，他的《哲学思想录》、《论解释自然》、《关于物质和运动的哲学原理》等著作，都表达了坚定的无神论观点，宣扬自由、平等思想，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制造舆论。爱尔维修（1715—1771）的《论精神》被罗马教皇利敏特十三世称为“可怕的著作”，在《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中进一步坚持理性的原则，其基本思想是强调个人利益、智力平等、理性进步、人性善良和教育万能。霍尔巴赫（1732—1789）偏重于自然科学，《自然的体系》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机械唯物论，被誉为 18 世纪“唯物主义的圣经”，也被称为“上帝的个人的仇敌”，是百科全书派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启蒙运动”以哲学思想为先导，深入各个领域，影响极为深远。理性精神的弘扬，建立起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感觉主义的认识论，归纳与演绎结合的逻辑方法，推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进化论的历史观，充满激情的文艺创作，“教育万能”的思想，以及人性、功利、奋进、博爱的道德取向，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进步。“天赋人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主权在民”的思想导致了民主政治，“在法律而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成为建立法制社会的基础，“三权分离”创建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启蒙思想直接促成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最终推动了欧洲的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3. 产生巨人的时代

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洗礼，人们终于挺拔地站立起来，在“发现自己”中发挥人的伟大创造，在“发现世界”中理智地走进科学、民主的殿堂，于是出现了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孕育着新的人物，新的时代、新的变革造就了英雄和诗人，人才有如万泉并涌，不拘一格。犹如普罗米修斯，最先把“圣火”盗入人间的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们，从但丁到彼特拉克、薄伽丘、蒙台涅、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从马萨乔到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从桑察诺姆、维尼兰到布鲁尼和马基雅维里，展现出一代精英的才华，标志着“巨人时代”的到来。马丁·路德、托马斯·闵采尔和加尔文是无畏的猛士，面对“神圣的教权”敢于向上帝讨回“人的尊严”，扫清“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哥白尼勇敢地发表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布鲁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向迷信挑战，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以极大的冒险精神，打破了海洋的阻隔，发现了一个广袤的世界。一道道藩篱被冲破，一代巨人涌现出来。

死气沉沉的“经院哲学”已经走到尽头，“人的哲学”再现光辉，思想界活跃起来，宣布“哲学世纪”已经到来。培根是一个“复兴”的信号，他的哲学让“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发出微笑”，“知识就是力量”的声音划破长空。继之而起的是英国的霍布士和洛克，法国的笛卡尔、荷兰的斯宾诺莎，到了18世纪则涌现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的古典哲学显得光彩夺目，康德的“二律背反”对辩证法起了推动作用；黑格尔以“绝对精神”创建了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同时又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成一个“辩证”的过程；费尔

巴哈把黑格尔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颠倒过来，在哲学上重新树起唯物主义的权威。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人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俄国产生了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义者，在西欧则产生了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以及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在欧洲中世纪，除了但丁而外，很难找到著名的文学家，可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举世闻名的诗人、作家层出不穷。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被誉为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文坛三杰”，而在文艺复兴的繁荣期则出现了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伊拉斯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7 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有法国的高乃依、拉辛和喜剧大师莫里哀，还有英国诗人弥尔顿。18 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多半是文学家，英国小说家笛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德国“狂飚突进运动”作家歌德和席勒，展现了启蒙主义文学的风采。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 30 年代浪漫主义成为欧洲文学的主流，诗人有德国的海涅、英国的拜伦和俄国的普希金，法国小说家雨果更负盛名。此后又出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出的作家有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莫泊桑，英国的狄更斯、哈代，俄国的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列夫、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此外，还有北欧作家安徒生、易卜生、尼克索及匈牙利的裴多菲等。

17 世纪以来近代艺术兴起，出现许多流派。17 世纪盛行的是“巴洛克风格”，追求动势与起伏，显得自由活泼、情绪激动、充满活力，意大利的贝尼尼集建筑家、雕塑家和画家于一身，画家鲁本斯被誉为“无冕之王”，还有荷兰画派的代表人物伦勃朗、

哈尔斯、弗美尔等。18 世纪又兴起“洛可可风格”，讲究小巧玲珑、精美雅致，喜用 C 形 S 形或漩涡形曲线及柔和色彩，主要画家有法国的华托和被称为“巴黎之光荣”的布歇。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各种艺术风格迭起，有新古典主义画家路易·大卫和安格尔，浪漫主义画家哥雅和德拉克洛瓦，现实主义画家米勒、柯罗、库尔贝及列宾，印象派画家马奈、莫奈和塞尚等。

近代音乐产生于 16 世纪末，形成了威尼斯乐派和那波利乐派，17 世纪产生了法国“歌剧之父”吕里和德国“音乐之父”巴赫，18 世纪后期形成了维也纳古典乐派，海顿被称为“交响乐之父”，莫扎特是个多产的作曲家，德国的贝多芬则集交响乐之大成，把古典主义音乐推到高峰。19 世纪初浪漫主义音乐兴起，又涌现一大批杰出音乐家，如德国的威柏、门德尔松、舒曼、瓦格纳和勃拉姆斯，奥地利的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施，意大利的罗西尼和威尔第，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法国的柏辽兹，俄国的民族乐派以柴可夫斯基为代表。

适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重商主义应运而生，主张推行经济扩张政策，强调货币的作用和对外贸易，鼓励商品输出，其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曼和法国的柯尔柏。继后在法国产生了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创造财富的惟一事业，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入生产领域，以法国的魁奈和杜尔阁为代表。随着产业革命的推进，出现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倡导自由竞争。大卫·李嘉图发展了价值学说和自由竞争的理论，进一步分析工资、利润和地租，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在此期间，还产生了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认为生产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按几何级数增长，要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人口增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自从第一次科学革命以来，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科学革命引起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又推动科学发展。从 16 世纪开始到 19 世纪，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上，他们的业绩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

（二）“知识就是力量”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文艺复兴”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使人挺拔站立起来，走出“神秘的殿堂”而步入“理性殿堂”，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发现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世界。科学技术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新世代发展的动力和杠杆。地中海文明的科学宝库被打开，几千年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给欧洲人一份丰厚的赠礼。然而，近代科技并不是古代科技的简单继承和延伸，而是一场独破天荒的“革命”。科学不再是“神学的婢女”，也不只是天才的猜想或经验的总结，从理论体系到研究方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近代科技的基础是实验科学，推动它发展的动力不是“灵光的闪现”而是社会生产的需要。来源于直觉的经验被提升到理性高度，用知识代替“灵性”，以理智代替盲从，用逻辑论证代替权威崇拜。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归纳与演绎结合，实验与数学结合，科学研究与技术运用结合，从而构成一个严密、实用的科学技术体系。这场革命首先在天体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经典力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石，以后在数学、物理、生物、医学、化学、地学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科学的胜利进军，有力地推动了“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导致“蒸汽机时代”的到来，第二次技术革命又把世界推进到“电气化时代”。

1. 从天体上夺取第一个科学阵地

神秘的天体一直是神学盘踞的大本营，“梵天创世”也罢，“上帝创造世界”或“真主缔造万物”也罢，神圣与神秘都来自渺茫、不解的天穹。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之所以统治西方天文界 1300 多年，是因为它暗暗吻合“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特别是经过托马斯·阿奎那改造和歪曲之后，更成为宗教理论的“科学注脚”。面对这一神圣堡垒，人们望而生畏，不敢轻易触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拔帜先登，勇敢地发起攻击，他的《天体运行论》实际上是向宗教权威发出的一份挑战书，是自然科学的“独立宣言”。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凭着“科学的良知”向世界郑重宣布：地球并非亘古不变，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它围绕着自己的中轴线自转，同时又围绕着太阳公转。他用“太阳中心说”成功地解释了天体的视运动，解释了日落日出，月相变化及岁差，取得了科学的发言权。这一新的学说，把长期被颠倒了宇宙观重新颠倒过来，与神学家们赖以支撑的“地球中心说”形成尖锐对立。他的结论导致了“绝对真理”的不可信，“上帝创世”的信条令人怀疑，“以人类为中心的妄想也就站不住脚”。哥白尼的叛逆精神打破了神学的禁区，在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分界线上树起了一座丰碑，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哥白尼）对于西方摆脱教权和学术统治枷锁的精神解放所做的贡献，几乎比谁都要大。”

在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之初，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巨大反响，是布鲁诺和伽利略用生命来捍卫这种新的学说，使之发扬光大。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写了一本《论无限、宇宙和世界》的书，支持了哥白尼学说并扩大其视野，他认为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太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而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他的观点更加骇人听闻，激起了神学家们的愤

怒，于是通过宗教裁判所宣判他的死刑。当他被绑在十字架上将被烧死的时候，宗教裁判官问他“地球是否还在转”，他坚定地回答说：“地球仍然在旋转”，为科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也是一个无所畏惧的科学家，他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能放大 30 倍的天文望远镜，通过实验观测，发现了月球的斑点、太阳的黑子、木星的卫星和茫茫无垠的银河系，用事实证明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他的力作《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充分展开了哥白尼的新观点，深刻批驳了托勒密“地心说”的陈旧宇宙观，同样遭到宗教裁判的残酷迫害，监禁终生含冤而死。但他始终没有屈服，在监狱中继续研究科学。强权改变不了真理，科学的光焰永远不会熄灭，正是因为这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科学家的决死战斗，“科学革命”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出绝境，浩浩荡荡，势不可挡，迎来了人类“科学的春天”。

为科学奋斗的人继续前行，开创了近代的天文学。被誉为“近代天文学泰斗”的丹麦天文学家的第谷·布拉赫（1546—1601），创立了一套近代观测天象的方法，记录下 760 颗行星，天不假年，他没有完成观测 1000 颗行星的计划。他的学生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继承了老师的未竟之业，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条定律”。第一条定律告诉我们，太阳并不处在圆形轨道的中心，它运动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形，打破了传统的“本轮—均轮说。”第二条定律是说，行星运动服从“面积规律”，即在单位时间内，行星的向径构成了一个“面积相”。第三条定律给出了一个公式，即任何两个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二行星轨道长半轴的平方成正比。对他们师生二人的评价有人说：布拉赫是“看”的老师，开普勒是“想”的学生。开普勒的功绩还在于，他不仅发现了行星运动不均衡的原理，第一次用数学语言对行星运动作了定量表述，而且发现了天

体之间有“引力”存在，为后来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作了很好的提示，所以有人说：“开普勒看见了万有引力的影子，牛顿则抓住了万有引力的定律本身。”

神学在天文学上受到重创的同时，在生物学上也遭到沉重的打击，它的突破口就是人体解剖学。如果说哥白尼动摇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的话，那么，比利时医学家维萨里（1514—1564）的血液循环理论又给“上帝造人说”致命的一击，所以近代科学史上维萨里似可与哥白尼齐名，被誉为科学革命的两大旗手。他在1543年出版了《人体的构造》一书，从男人和女人的骨骼上否定了用亚当的肋骨造夏娃的神话，用血脉循环理论来解释人体的活动。他的学说被视为亵渎神灵，招致僧俗两界攻击，以“故意杀人”罪被罚往耶路撒冷朝拜赎罪，不幸死于途中。他的同学迈克尔·塞尔维特（1511—1553）在《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中讨论了心肺之间的血液小循环，认为静脉血通过肺部而变为动脉血，并得出“灵魂本身就是血液”的结论，这就意味着人死之后灵魂将随同肉体一起消亡，以此获“异端罪”而被活活烧死。此后，英国生物学家哈维（1578—1656）以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肯定了维萨里等人的研究，用实验手段证明了血液循环是心脏收缩的机械原因引起，不需要什么“灵气”的推动，于是宣称“心脏是生命的开始，它是微型宇宙的太阳，正如太阳是世界的太阳一样”。“天体上的太阳”与“人体中的太阳”光辉交映、照亮了人类科学的前程。

2. 经典力学为近代科学奠定第一块基石

行星运动与血液循环的研究把人们的视线引向自然界最普遍的“运动”现象。世界万物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既然“神的力量”遭到怀疑，人们便努力从物体自身的原理上来寻求原因，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物体的机械运动，研究自然从机械运动开始，

这便使力学优先发展起来。推动力学迅速发展的动因是社会需要，由于手工作坊的发展，制造手工机械日益迫切，客观上为力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科学家们对各种力学问题进行探讨，逐步走向深入，终于导致牛顿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产生，创立了经典力学。

经典力学的形成，是一代科学家努力的结果。开普勒关于行星运动不均衡的描述，实际上已蕴含着星体间有引力存在的因素。伽利略在力学方面做出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他在意大利斜塔上做了自由落体运动的实验，在斜面实验中发现了惯性定律，通过实验与数学研究了抛物线运动，提出了经典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伽利略相对原理，还研究了物体重心和平衡问题，钟摆的等时性问题等等。惠更斯继续研究单摆运动，发现了一般圆周运动的向心力定律。根据开普勒行星运动第三定律和惠更斯向心力定律，胡克得出了太阳对行星的引力与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关系，数学家瑞恩通过计算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天文学家哈雷发现了“哈雷慧星”，并根据引力原理成功地预测它的再次出现。笛卡儿在太阳系行星运动问题上提出了“漩涡说”，也给人一些启示。科学家们相互切磋，推动了力学的发展，端恩·哈雷与惠更斯的讨论，哈雷在牛顿的启发下研究慧星运动都是很好的说明。

17世纪自然科学上最大的成就就是经典力学的创立，它标志着人类在认识自然上已获得突破性进展，力学已达到成熟的阶段，英国科学家牛顿（1642—1727）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便是划时代的一座丰碑。牛顿是经典力学的集大成者，他综合、归纳开普勒天体力学和伽利略地面力学的成就，规定了质量、动量、力等基本物理概念，提出了物体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指出它们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然规律。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是惯性定律，他写道：“每个物体若非有外力影响使其改变

状态，则该物体仍保持其原来静止的或等速直线运动的状态。”这就是说，外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而不是维持原有状态的原因，原有状态服从于惯性定律。牛顿第二定律是外力变化与动量变化成正比。他的表述是：“运动的变化与所施的力成正比，并沿着力的作用方向发生”。牛顿第三定律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同时出现，他说：“对于每一个作用力，总存在一个与之相等的反作用力和它对抗，两个物体彼此施加的相互作用力总是相等的，而且方向相反。”物体运动三大定律的发现，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成为认识一切力学现象的依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体之间的引力作用推广到包括地而上一切物体在内的所有物体上，并得出了引力定律的数学公式。这个定律告诉我们：任何两个物体间相互的作用力，不仅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还与两个物体质量的乘积成正比。

物体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是经典力学的基础和核心，在 19 世纪末近代力学产生以前一直是物理学的纲领。从科学发展的观点看，它以“科学定律”的方法表述了自然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把人们对自然的研究导入了一个“规律化”的轨道，这不仅可以客观地认识世界，而且可以预测和发现许多未知的现象和规律，显示科学规律的伟大预见性。在此之后，经典力学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是与生产实际和工程技术结合，不断扩大力学应用范围，先后创立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地质力学等等；另一方面，在欧勒、拉格朗日、哈密顿等人的努力下创立了分析力学，成为由经典力学过渡到近代力学的桥梁。经典力学推动了近代物理学的建立，其研究方法影响一个时代，最明显的就是风行数百年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在若干学科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表现出来。

3.16—18 世纪自然科学的进展与第一次技术革命

科学革命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对物质世界自身规律的研究，16—18 世纪在经典力学的带动下，物理、数学、化学、生物等学科相继建立，出现了一次近代科学兴起的热潮。力学原理的推广促使热学、电磁学、几何光学发展起来，在力学的刺激下数学取得了重大成就，化学从炼金术中脱颖而出，在认识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开始研究生命现象。由于力学原理在生产技术中的广泛应用，手工机械不断出现，急需解决机械的动力问题，于是蒸汽机应运而生，导致了第一次技术革命。

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经典力学借助数学语言才能准确地表达科学定律，而力学的长足进展又反过来推动数学的进步。古代数学到近代数学的转折是通过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来实现的，这一时期主要有三项重大发明，即解析几何、对数和微积分。费尔马和笛卡儿首先创立解析几何，把代数学和几何学结合起来，将许多几何学上难以解决的问题用代数方法化繁为简，同时给代数语言一个直观、形象的表达。法国数学家费尔马的《平面和立体的轨迹引论》是最早的解析几何论著，但真正创立这一学科的是法国哲学家兼科学家笛卡儿（1596—1650），其代表作是《更好地指导推理和寻求科学真理的方法论》。笛卡儿在研究力学中有效地应用了数学方法，开始用代数方法来解决几何作图问题，产生了用方程表示曲线的思想，建立几何坐标，与此同时又将变量和函数带进数学，把几何图形看做是依照一定函数关系运动点的轨迹，从而解决了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问题，并为微积分的出现打下基础。为了改进和简化数学计算，英国数学家耐普尔发明了对数，找到真数和对数的对应关系，做出了常用对数表，“用缩短计算的时间来使天文学家的寿命加倍”。力学的发展使数学面临若干难题，急需解决物体运动的距离与时间的函数关系，

求曲线的切线、函数最大值与最小值、曲线围成的面积、曲面围成的体积及物体的重心等等，于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牛顿和莱布尼茨创立了微积分学。牛顿把他发明的微积分方法称为“流数法”，把数学中的量看作是由连续轨迹运动产生的“流量”，给出这些量的流数之比的方法就是“微分”，给出求流量之间关系的求积法就是“积分”。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创立的微积分叫做“求差、求和方法”，解决了求极大值和极小值问题，给出了求两个变量相乘积的微分规则和求幂的微分规则。微积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在 18 世纪又产生许多数学分支学科，如微分方程、无穷级数、微分几何、变分法、复变函数等。瑞士科学家欧勒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物理学而创立分析力学和刚体力学，法国数学家柯西解决了微积分学基础理论的逻辑困难被尊为近代微积分学的奠基人。

当力学迅速发展时，热学、电学、磁学、几何光学才从实验科学中兴起。热学从伽利略创制温度计开始，18 世纪布克提出了“热质说”，用以解释许多热现象。磁学刚刚起步，电学则有一系列的发现与发明：吉尔伯特发现摩擦起电现象，格里凯制造了世界上第一部起电机，丢费发现正电和负电，克莱斯和穆欣布罗克发现电震并发明了储电瓶，富兰克林证明天空闪电与物体上的电相同，标志电学研究从定性进入定量阶段的是“库仑定律”和“高斯定律”，伽伐尼发现电流又把电学研究由静电转向动电阶段，以后伏打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产生电流的装置——伏打电池，富兰克林提出了电的流质说，对后世电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天文学的需要，光学也有较快发展，开普勒提出了光度学原理，斯涅耳发现了折射定律，格里马蒂发现了衍射现象和薄膜干涉现象，牛顿做了日光的分光实验和“牛顿环”实验，对于光性问题则有牛顿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

化学跳出了炼金术的窠臼朝着化学工艺和理论探讨发展。

时的实用化学主要是冶金化学和医药化学，意大利化学家毕林古齐（1480—1530）主要研究用火制取金属、非金属、火药的生产技术，兼论采矿、冶金和化学检验。医药化工方面，在研制化学药物的同时探讨物质的组成，巴拉塞尔斯认为一切物质都由汞、硫、盐组成，荷尔蒙脱对气体做了研究。实现由化工向化学理论转变的是英国科学家波义耳（1627—1692），他的《怀疑派化学家》一书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一、化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应当同化学工艺区别开来；二、物质是由用化学方法不可再分的粒子组成，它们结合为大小、形状不同的粒子团，成为参加化学反应的基本单位并决定物质的性质；三、提出了“元素”的概念，但还没有把元素同单质分开。德国科学家施塔尔（1660—1734）提出了“燃素说”，认为植物从空气中吸取燃素，动物又从植物中吸取燃素，富有燃素的木炭与矿物混合加热可以还原金属。氢气、氧气和氮气的发现，为燃素说敲起了丧钟，法国科学家拉瓦锡（1743—1794）通过化学分析和理性思维发现了质量律，提出了氧化学说，证明燃烧并不是燃素的释放与吸收，而是可燃物或金属与空气中一部分气体化合的结果，揭开了笼罩在燃烧现象上的迷雾，为化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他的《化学纲要》标志着化学已独立为一门科学。

生物学继血液循环理论之后的一个重大发现是细胞，它是在显微镜下观察的结果。对于胚胎的形成，多数人认为是“预成”的，即“精原”与“卵原”的扩大，而哈维则提出“渐成说”，认为胚胎不是一次形成的，有一个发育过程。德国科学家沃尔佛（1733—1794）用小鸡进行实验，仔细研究其发育过程，证明了“渐成说”的正确，被誉为是“近代胚胎学的创始人”。人们广泛搜集资料，发现了生物界有惊人的多样性，于是开始进行整理、分类，产生了生物分类学。瑞典科学家卡尔·林耐（1707—1778）出版了一本《自然系统》，主张采取自然分类法，即把物种看成

是彼此间有连续性和亲缘关系的自然体系，将已知植物分为纲、目、属、种，奠定了植物分类学的基础。科学家们开始对生命本质进行探索，当时流行的有两种理论：一种是“生机论”，把生命归结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如“灵气”、“活力”之类；另一种是“机械论”，从物理和化学角度进行类比，笛卡儿把生物比作机器，拉瓦锡用氧气来类比生命。

这一时期在科学研究方法上有巨大进步，并形成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特征。培根在《学术的伟大复兴》一本中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响亮口号，主张用科学技术改造世界面貌，在经验与实验中寻找新的原理、操作程序和新事物，通过提出假说、进行实验、归纳概括来建立“科学理论金字塔”，并极力提倡归纳法，通过逐级归纳加深认识，成为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笛卡儿主张理性高于感性，认为“怀疑就是思想”，创立了演绎法，他在《方法论》一书中强调演绎法的简单性、清晰性和明了性，提出四条法则，即判断只能是无法怀疑的东西，难题必须尽可能分割成细小部分，思想应具有从简单到复杂的清晰条理，观察应尽量全面而无遗漏。伽利略创立了观察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重视实验，强调用理智将自然过程纯化、简化，并用数学关系进行定量说明，被尊为“近代实验科学之父”和“近代科学方法论的奠基人”。牛顿创立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主张先分析后综合，分析从结果到原因、从特殊到一般，综合则假定原因已经找到并用这些原理去解释现象、证明其正确性，事实上是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结合起来。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科学还处在搜集材料和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研究阶段，习惯于孤立地看问题，看不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运动和变化，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又由于当时最发达的是力学，对于化学运动、生物运动还没有很好认识，一切都以机械运动作类比，因而又具有“机械唯物主义”的特征。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引导人们深入认识物质世界，进

行实验、观察和微观研究；其消极作用则在于对世界缺乏总体上的认识，往往以个别代替一般，以简单代替复杂。

科学研究转化为生产力，有力地证明“知识就是力量”，终于在 18 世纪后半期出现了第一次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始于英国纺织业的机械化，先后出现了自动往来的“飞梭”，用轮子带动的“珍妮纺车”、水力纺纱机、兼采珍妮纺车和水力纺纱机的“骡机”、水力织布机等，它们都是力学原理推广应用的结果。生产效率提高以后，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动力机械代替人力操作，在力学和热学的推动下终于导致蒸汽机的发明。17 世纪末出现了“蒸气泵”以后又出现被命名为“大气机”的抽水机，1763 年英国工匠瓦特经过大量实验和研究发明了蒸汽机，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用蒸气动力代替人力，从而成为第一次技术革命的伟人旗手。瓦特发明的双动旋转式蒸汽机，耗煤少，运转快，性能可靠，切合适用，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所以很快推广，到 1784 年已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动力机械，不仅用于纺纱织布，还制造了炼钢用的蒸汽动力鼓风机，矿山用的蒸汽抽水机、蒸汽凿井机、蒸汽曳运机、机械行业的蒸汽锤和机床的动力机械，还发明了蒸汽轮船和蒸汽火车，使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第一次技术革命把人类带进了“蒸汽机时代”，机械在生产各部门广泛应用起来，迅速推进了欧洲的工业化，英国成了“世界工厂”，瓦特被称为“蒸汽大王”。

4.19 世纪科学的突飞猛进和第二次技术革命

第一次技术革命迅速改变了欧洲社会经济面貌，实现了从手工业到机器工业的转变，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生机和繁荣，显示出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因而科学研究受到社会各方面普遍重视，大学和科研机构犹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社会的需要比任何力量对科学技术的推动都更加有力，19 世纪掀起了自然科学研

究的新高潮，在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这一时期电磁学在自然科学中异军突起，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电能的生产部门和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发明了电机、电灯、电话、电报和无线电，把世界推进到“电气化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它使社会的发展呈加速度前进。伴随着电气时代到来的是内燃机的发明，从此有了汽车、拖拉机、摩托车，并为内燃机车、机动船、飞机开辟了广阔道路。科学不断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又促进科学蓬勃发展。

天文观测仪器的不断改进，使人们的视野豁然开朗，有可能深入了解浩瀚的银河系，于是发现天体上更多的奥秘，例如：恒星并非不动，还发现了双星、聚星、天狼星、天王星、海王星等等，对天体物理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关于太阳系的起源，首先由哲学家康德提出了“星云假说”，认为宇宙空间存在着许多弥漫物质，由于粒子相互吸引、排斥、碰撞，在引力最强之处凝聚成中心天体，在行星转动平面上聚集的便形成卫星，从而建立起他关于太阳起源的力学模型。另一个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也提出同样的假说，并用数学作了严密论证。他说：太阳系起源于一团巨大炽热、转动缓慢的原始星云，逐渐冷却后便向内收缩，转动加快，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在周围形成行星。他们不谋而合，创立了“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这种天体演化论使僵硬的形而上学观点受到猛烈冲击。

演变观点在地学中也表现出来。关于岩石的成因，有“水成说”也有“火成说”，德国地质学家维尔纳（1749—1821）集其大成，从海水的进退和火山爆发合理地解释了两种成因。英国地质学家赖尔（1797—1875）关于地壳运动的学说在地学界引起震动，他的《地质学原理》标志着近代地质学的诞生。他通过大量古生物化石的分析比较，从风、雨、河流、海浪、潮汐、火

山、地震诸种因素来解释地质史上的种种变化，又从地质应力的角度来说明地壳的变迁，承认它的渐变性也承认它的突变性，辩证地勾勒出地质演变的图景，并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开辟道路。

生物学界树起了两座丰碑，一是细胞学说，一是生物进化论。德国科学家施莱登从植物研究中提出了细胞学说，施旺把这学说推广到动物界，雷马克和寇力克又将细胞说与胚胎学结合起来，微尔和把细胞说应用于病理研究。细胞学说的意义在于，它通过细胞的发现找到了生物界统一的基本单位，从横向上把植物和动物联系起来，建立起有机体的构造学和发育学，把生物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物进化论是从纵向上考察生物演进的历史，最先是由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提出了动物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图式，英国科学家达尔文（1809—1882）的《物种起源》创立了这一学说。达尔文把赖尔地质演变学说推广到生物界，在拉马克的启发下作了长达 5 年的实际考察，提出了以“生存竞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论，并提出“由猿到人”的进化学说，“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界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因而证明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他的学说发表后爆发了一场风暴般的争论，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1825—1895）支持了达尔文理论，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的学说，他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后来由严复译成中文的《天演论》。

直接推动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是化学和物理学，在化学方面重要的成就是近代原子—分子论、有机化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和物理化学。德谟克利特对于原子的大才猜想，到 19 世纪终于得到了科学的论证，英国化学家道尔顿（1766—1844）引入了化学元素原子量的概念，认为元素的最终组成为“原子”，同一元

素的原子在形状、质量和性质上是相同的，不同元素的原子以一定比例结合便成为化合物中的“复杂原子”。这一理论的建立，深入探讨了元素的本质在于它的原子量，以此说明物质结构和一切化学现象，为整个科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意大利科学家阿弗加德罗（1776—1850）又引入了分子的概念，认为单质分子由相同元素的原子组成，化合物分子由不同元素原子组成，并测定了气体物质的原子量和分子量。“生命力”统治有机物的谬说在 19 世纪宣告破产，尿素的人工合成是一枚重磅炸弹，接着人们合成了醋酸、有机酸、油脂、糖类等有机物，促进了有机化学的发展。化学元素被陆续发现，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1834—1907）提出了周期律，认为按照原子量大小排列起来的元素在性质上呈周期性，原子量大小决定元素的性质，科学地论证了物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并预测出未知元素的性质令世界惊讶，这就为探索未知世界打开了大门。物理与化学联姻产生了物理化学，它是介于物理与化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由此导致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电化学、溶液理论和物质结构理论的产生，为科学发展开辟无限的前景。

19 世纪的物理学已不再是经典力学的一统天下，热学、光学、电磁学勃然兴起，又引起了技术上一次新的革命。热学的最大成就是发现“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经过一代人的努力认识到各种运动形式可以互相转化，机械能可转化为热能，热能可转化为电能，电能可转化为磁能，电能还可转化为化学能，维持人体的热能也是由食物中的化学能转化而来。在迈尔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础上，英国物理学家焦耳（1818—1899）测定了电热当量和热功当量，确定了电热转化的“焦耳定律”，以后又确定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在认识能量转化和传递中的守恒定律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定律之一。以后，克劳修斯、麦克斯、玻尔兹曼等人把统计方法和几率概念引入热学，开创了统计力学。小孔成像的

实验发现了光的干涉现象，接着又发现光的偏振现象，并证明光在各种媒质中的传播速度不同，使光的波动说取得胜利。光学在技术上的应用，产生了达盖尔阳光照相法，摄影技术很快推广，成为以后兴起的电影、电视的先导。

电磁学的创立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重要杠杆。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1787—1851）发现的“电流磁效应”首先揭开电与磁的内在联系，法国物理学家安培（1775—1836）发现了电流与磁场关系的“安培定律”，法国物理学家提出了关于直流电对磁针作用的“毕奥—萨伐尔—拉普拉斯定律”，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德国物理学家楞次关于感生电流磁场的“楞次定律”。这一切科学发现和实验成果经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创造性地综合研究，建立了经典电磁学的理论体系，为第二次技术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电力的开发利用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的主要标志，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电能作为一种新能源逐步取代蒸汽动力而占主导地位，开创了人类利用电力的新时代。从直流发电机到交流发电机的不断改进是电力开发的关键，继之而来的是高压输电、配电系统和电动机的发明在电力的应用方面，各种电器设备应运而生，最伟大的发明家就是美国的爱迪生。电学很快改变信息传输手段，人类不但有了电报电话，有了无线电通讯，还开创了广播、电视。与此同时，内燃机的发明又开辟了新的能源，在交通上的应用意义特别重大，不用说发明了汽车、摩托车，发明了内燃车，还发明了飞机，开创了航空技术。第二次技术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和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比蒸汽机要巨大和深远得多，它加速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并迎来了20世纪现代科学技术空前的发展。

（三）欧洲的崛起与东西文化的分异

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化蒸蒸日上，几个世纪之间，落后的欧洲一跃而为先进的欧洲，成为近代文化的中心。近代文化产生于“黑暗的中世纪”，简直叫人不可思议。近代文化勃兴的源泉在地中海，这里不但有几千年的文化积累，而且文化间有极大反差。也许是“杂交”优于“纯种”，不同文化的碰撞恰好是新文化产生的契机，而丰厚的文化积淀正好是新文化蓬勃生长的沃土。

欧洲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它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为先导，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就外部条件而言，“大航海时代”是一个关键，它给欧洲一个巨大的活动舞台。就内部条件而言，席卷欧洲的政治风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引起了前所未有的“产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经济基础。

世界文化中心向欧洲转移，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近代文明处于领先地位，使得以农业为基础的古老文明相形见绌，到了这个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日益分明，形成了巨大反差。世界文化的走向发生了逆转，文化流向不是从东方流向西方，而是由西方流向东方，“西学东渐”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整个世界文化起了很大变化。

1. 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航海时代”

整个世界是由七大洲四大洋组成，然而在 15 世纪以前，人们并不知道南北美洲及大洋洲的存在，历史活动的舞台局限在欧亚大陆及北非。处在欧、亚、非三洲结合部的地中海显得特别重要，而浩瀚的海洋却将几块大陆分隔开来。欧洲与亚洲的联系主

要是靠陆路交通，中间横亘着高山、草原和沙漠，从西欧到南亚、东南亚及远东行旅艰难。从 15 世纪到 17 世纪出现了一个“大航海时代”，它以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麦哲伦环球航行为其开端，伴随着新航线的开辟、世界性的大探险，从而构成了“地理大发现”。远洋航行打破了海域对人的障碍和封锁，发现了南北美洲、大洋洲及许多前所未有的地方，并将六大洲、三大洋连成一片，世界显得豁然宽广。由于世界航道的开通，西欧不再是偏远的“隅”，一变而为四通八达的几何中心。欧洲人从此踏上海疆，登上巨大的历史舞台，走向世界。

“大航海”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使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一个整体，于是，“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大航海从地中海沿岸的伊比利亚半岛（比利留斯半岛）开始，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的主角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往后则是荷兰、英国、法国和俄国。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冲动，它的主要动因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海外贸易”、“海外殖民”与“海外传教”。大航海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目的是拓宽世界市场，获得更多的原料和财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随着海外贸易的开展，向海外移民蔚然成风，欧洲的发达国家纷纷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在非洲掳掠黑人也成了一种疯狂的活动。自认是“普世宗教”的基督教，认为整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每块地方都应当听到基督的“福音”，而“新大陆”更是新教徒创建“千年王国”的理想地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们都渴望建功立业，探索世界，具有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诸种因素的凑合，使欧洲成为“大航海时代”的骄子。

从全球的观点看问题，中国和阿拉伯在世界航海史上有过不朽的功勋，美国学者阿塔夫里列斯诺在《全球通史》中写道：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西方人才能做出那些改变人类生活道路，开创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富有历史意义的发现。这种观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尤其是如考虑到中东的穆斯林和东亚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航海传统的话。”自 8 世纪以来，中国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便逐渐兴盛起来，形成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把地中海、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联系起来，“郑和下西洋”开通了一条由中国经东南亚、印度到东非和阿拉伯的航线，事实上已打破了世界的孤立、封闭状态。郑和下西洋始于 15 世纪之初，而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这个世纪之末，可视为“大航海时代”的前奏。更重要的是，中国远航船只的制造、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以及航海经验的积累、地理知识的扩大，在客观上为“大航海”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必要的前提，航海事业不可能突兀而起。

欧洲人扬帆远航的最初动机是梦想到东方发财，寻找黄金产地，主要对象是印度和中国。《马可·波罗行记》曾在欧洲风行一时，书中神话般的描写使人对东方无比向往，相信“东方遍地是黄金”。正是这种对“黄金渴望”的驱使，许多人都想到东方来把“黄金梦”变成现实。达·伽马开辟新航线，目的地就是印度。哥伦布本来是想从另一个方向找到通往印度的捷径，意外地发现了美洲。麦哲伦也怀着同样的目的，出乎预料地绕了地球一周。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中写道：“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在印度及整个远东地区搜寻着黄金，黄金这两个字变成了驱使西班牙人远渡大西洋的符咒。黄金也是白种人刚踏上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追求的头一项重要的东西。”

15 世纪初，葡萄牙已在非洲西海岸占领了一些港口和岛屿，继续向南探航。1487 年迪亚士南航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10 年后达·马率领四支帆船绕过好望角驶入印度洋，在阿拉伯人的领航下，于 1498 年 5 月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里库特，满载香料、

宝石、丝绸而归。他们在西非的确找到了黄金产地，命名为“黄金海岸”，即今日的加纳。这条“海角航路”，使葡萄牙控制了通往东方的商路，最先富裕起来成为海上商业强国和殖民大国。从西欧经非洲到印度的航线与早已开辟的印度经东南亚至中国的航线连通以后，欧、非、亚三洲紧密联系起来，对后来开辟从美洲到亚洲的新航道，对麦哲伦环球航行以及 17 世纪对大洋洲的发现都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沟通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

当葡萄牙开辟新航线的时候，哥伦布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于 1492 年 8 月带领 90 名水手在巴洛斯港拔锚启航，他选择的航向是往西走，认为可应用“等纬度法”直航日本，然后到达中国和印度，不必去绕非洲一圈。10 月 12 日他终于登上了西半球的第一块陆地，将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即“神圣的救世主”，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美洲发现日”或“哥伦布纪念日”。他向南航行到了古巴和海地，以为在南北美洲之间的岛屿是印度，把它称为“西印度群岛”，还把美洲的土著居民称之为“印第安人”。他回来以后又三次西航，先后抵达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及南美洲东北角和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巴拿马等地。歪打正着，哥伦布并没有找到通往东方的捷径，无意中却开辟了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线，还奇迹般地发现了“新大陆”。后来意大利人亚美利哥·维斯普奇到南美洲海岸考察，断定这里根本不是印度，而是从未为人所知的新大陆，于是人们便以他的名字称为“亚美利加”。

1513 年，西班牙人巴尔波亚率领一批移民越过巴拿马海峡，看见南边有一片汪洋大海，便把它称为“大南海”。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怀着哥伦布同样的信念，认为绕过南美洲进入“南海”便可到达印度，于是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于 1519 年 9 月率领五只大船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次年 10 月到达南美洲南端的海峡，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麦哲伦海峡”的地方。驶入浩瀚无

际的“南海”，风平浪静，因之改称为“太平洋”。横渡太平洋到了菲律宾群岛，他本人虽然死于非命，但同伴仍继续向西航行，终于在 1522 年 9 月回到了西班牙。这又是一次意外的惊喜，横渡了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雄辩地证明地球是圆的。

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密克罗西亚、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几部分，它的发现经历了三个多世纪，即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人们便希图寻找“南大陆”。麦哲伦在横渡太平洋的途中，发现了马绍亚纳群岛和大岛关岛，以后为了争夺“香料群岛”（今印尼的摩鹿加群岛），西、葡两国继续向太平洋挺进。1606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威廉·杨茨等寻找南大陆，最先登上澳洲大陆，以后陆续发现西海岸及附近的一些岛屿。1642 年荷兰人塔斯曼受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派遣到新西兰一带探险，发现了许多地方，为了纪念这个历史名人，有好些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例如澳大利亚的塔斯曼尼亚岛和塔斯曼尼亚洲，新西兰的塔斯曼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塔斯曼海和塔斯曼海盆等。在此之后，英国探险家丹皮尔进一步考察澳大利亚，到 17 世纪末大洋洲各主要岛屿基本发现，从 18 世纪开始荷兰、英国人量向大洋洲移民。

新大陆发现后，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大批操拉丁语的人进入美洲，致使中美及南美成为“拉丁美洲”。为了解决西、葡两国的矛盾，在佛德角群岛以西划了一条“教皇子午线”，此线以东属葡萄牙，此线以西归西班牙。从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英、法两国继续寻找西北通道，出现了德雷克环球航行，进一步发现北美以及加拿大北极群岛、戴维斯海峡和哈得逊湾。16—17 世纪，俄国人向西北利亚拓展，并发现北冰洋和北太平洋的一些地方。

“大航海时代”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人们理解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欧亚大陆，还有辽阔的非洲，新发现的南北美洲和

大洋洲，人类活动的空间骤然扩大，展现出—个“大千世界”。与此同时，由于—系列新航线的开辟，海洋不再是人力不可克服的天然障碍，六大洲构成—个整体，迅速改变以往各自孤立发展的状态，没有—个国家不被纳入世界的网罗。国际贸易中心由地中海移到了大西洋，大量财富流入欧洲并转化为资本，欧洲成了“世界工厂”，同时又把世界变成了欧洲国家的巨大市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导致了人口的大迁徙、大流动，欧洲移民大量进入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的黑人被大批掳掠为奴送到美洲，美洲的印第安人—量遭到杀戮。农作物广泛传播，从美洲传出了玉米、马铃薯、烟草、橡胶等数十种农作物。揭开了大洋文明的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走遍世界，人类文明出现了新的面貌。整个世界政治形势出现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很快波及美洲。亚、非、拉许多地方都成了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地，古老的东方也受到强烈震撼，印度、中国和日本都被卷入历史的浪潮，社会起了很大变化。

2. 席卷欧陆的政治风暴

16世纪末到19世纪，欧洲风云激荡，社会处在剧烈变动之中。从荷兰革命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欧洲胜利进军。经过这场持续三个多世纪的政治风暴荡涤，欧洲的封建社会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很快影响到美洲及其他地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次历史性的进步，民主代替了专制，为新生产力的发展拓开了—个广阔的空间。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掀起了波涛滚滚的产业革命，推动了欧洲近代化的历程。欧洲社会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历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变革，从思想上扫清了专制主义的影响，从制度

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显示出民主与法制的优越。政治变革是欧洲崛起的重要原因，倘若不经过这一历史的阵痛，社会就不可能突飞猛进。

最先揭开序幕的是尼德兰革命。尼德兰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当时是西班牙的属地。新航线开辟后，尼德兰海上贸易兴盛起来，拥有海牙等 300 多个城市，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增长，与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发生尖锐矛盾。宗教改革的浪潮波及尼德兰，大批卡尔文教徒涌了进来，遭到残酷迫害，于是在卡尔文教派的旗帜下开展反对教权和西班牙专制统治的独立战争，1581 年宣布废黜西班牙王腓力二世，成立联省共和国，亦称荷兰共和国，建立了欧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荷兰独立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很快，成为国际贸易和信贷中心，荷兰船只远航世界各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17 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马克思称之为“17 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

17 世纪的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下，国家与教会紧密结合，作为国教的圣公会相当保守，因而一切反对封建专制的人都以“不信从国教”的方式进行反抗，故人们把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称为“清教徒革命”。这次革命从 1640—1653 年的“长期国会”为开始，中间经过两次内战，于 1649 年将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废除君主制，宣布建立英吉利共和国。但 1653 年又出现克伦威尔的护国公统治，1660 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88 年，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辉格党和代表地主贵族的托利党联合发动政变，逼迫英王詹姆士二世逃往法国，迎接在荷兰执政的奥兰治亲王威廉登上王位，次年议会决定由威廉三世和他的妻子玛丽二世共同掌权，史称“光荣革命”。1689 年议会通过了《权利法案》，1701 年又通过《王位继承法》，在进一步限制王权的同时提高了议会的地位，确立了立宪君主制政体。国家权力转移到议会以后，在华尔波尔当政时期实行了内阁制，以

下议院多数党的首领为内阁首脑（即后来的首相），阁员须在议会中占有席位，集体对议会负责，国王只是一种象征。英国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与大土地所有者妥协、合流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保守性。革命后的英国政府一直奉行“重商主义”，提倡“自由竞争”、“对外扩张”，从 18 世纪 60 年代起进行产业革命，由手工业工场向机器工厂过渡，实现国民经济起飞，并通过殖民战争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和工业强国，逐步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海上霸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并在产业革命后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它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英国，对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发生重大影响，因而成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

新大陆发现后，英国重点探索北美，17 世纪初开始大量移民，在东起大西洋西迄阿帕拉契山脉的狭长地带建立了北美十三州。移民主要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大都是受迫害的清教徒、丧失土地的农民以及商人和企业家，还有大批被贩卖的黑奴。英国政府加紧对殖民地倾销商品、提高税率，并限制经济发展，1765 年颁布的《印花税条例》激起了人民的抗议，于是十三州代表在纽约集会，组织反抗斗争。1774 年在费城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权利宣言和陈情书》，提出同英国断绝输入、输出和消费联系。1775 年召开第二次大陆会议，决定将民兵改为大陆军，以华盛顿为总司令，同年 6 月在波士顿附近的邦克山与英军发生武装冲突。次年 7 月 4 日发表《独立宣言》，庄严宣告“应建立自由独立的合众国”；“人人生而平等”。从莱克星顿枪声到 1781 年约克顿战役结束，经历了六年半的艰苦战斗。1783 年签订的《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利坚合众国为自由独立国。1787 年通过《美国宪法》，其基本原则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实行联邦制。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院由每州两名议员组成，众议院议员则按各州纳税人口

比例选出。总统是最高行政长官、国家元首、武装统帅，任期四年，由公民投票选举。司法权集中于最高法院。立法、司法、行政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制约与均衡。1791年将《权利法案》载入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1787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华盛顿当选第一任总统，初以纽约为临时首都，后迁往费城，1801年定名为华盛顿。北美独立战争是继英国之后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开启了美国现代文明的历史，为欧洲鸣起警钟，它的成功为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树立了榜样，直接影响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

18世纪的法国仍在波旁王朝的统治下，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教士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为第三等级，封建专制已成为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桎梏。法国是启蒙运动的主战场，在它的推动下，法国大革命表现得相当彻底。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开幕，第一、二等级以特权压倒第三等级。6月17日第三等级毅然宣布改三级会议为国民会议，酝酿组织“国民自卫军”，7月14日举行巴黎起义，冲破巴士底狱，各地纷纷响应。8月27日国民会议通过《人权宣言》，宣称“人类生而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民会议制定了1791年宪法，规定法国为君主立宪制政体，并选出立法会议，次年4月对地奥地利宣战。法军在前线节节失利，7月立法会议宣布“祖国在危急中”，各地义勇军高唱《马赛曲》汇集巴黎，要求立法会议废除国王。8月9日巴黎人民起义，囚禁国王。1792年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代表分为三派：吉伦特派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雅各宾派代表广大平民，中间派被称为“沼泽派”或“平原派”。1793年1月投票表决，将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法兰西共和国成立，吉伦特派掌握政权，财政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法国面临新的危机。5月底至6月初雅各宾派发动巴黎第三

次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实行雅各宾专政，把法国革命推向高潮。雅各宾专政的重要机构是公安委员会，控制在铁腕人物罗伯斯庇尔手中，在紧急关头保卫了法兰西共和国。危机过去之后，雅各宾派发生内讧，反对派在 1794 年 7 月 27 日（法国新历热月 9 日）逮捕罗伯斯庇尔，结束雅各宾专政，史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一步步推向高潮，从根本上推翻了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以致整个 19 世纪，即给予个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的标志下度过的”。

1848—1849 年欧洲又爆发第三次政治风暴，在法国、奥地利、德意志、匈牙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是在产业革命过程中发生的，范围更加广泛，各国的任务不同。法国在“热月政变”后走了一段曲折的路，1795 年建立督政府，1799 年“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帝国崩溃后是以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七月王朝”。七月王朝代表大金融家的利益，对内独裁，对外仇视各国革命，1848 年巴黎发生“二月革命”，在“打倒路易·菲力浦”和“共和国万岁”的喊声中冲进波旁宫，粉碎了君主立宪的阴谋，2 月 25 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史称“第二共和国”。同年 12 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暗中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于 1852 年 12 月宣布法兰西为帝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则称拿破仑三世。1848 年在德国发生了柏林三月革命，国王威廉四世任命康豪森和汉泽曼组成资产阶级自由派新政府，5 月全德国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于 1849 年 3 月通过了一个保守色彩浓厚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并推动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 世纪中叶奥地利仍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专制国家，首相梅特涅独揽大权，1848 年维也纳三月起义后建立了新政府，颁布宪法草案，但斐迪南三世又重新聚集力量对匈牙利宣战，激起了十月起义。匈牙利处在奥地

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在维也纳三月起义的鼓舞下，由著名诗人裴多菲领导了匈牙利革命，成立了公安委员会，通过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努力摆脱奥地利的统治，经过抗击奥地利军队的艰苦战斗，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独立宣言，废除哈布斯堡王朝，并于5月21日光复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但后来因沙俄出兵而使革命失败。1848—1849年欧洲革命虽然大都以失败告终，但“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三个世纪之间，欧洲革命风起云涌，政治不断变革，这正是欧洲能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3. 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面貌的产业革命

从18世纪初开始，大约经过了一个半世纪，欧美各国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并影响世界各地。“产业革命”这一概念是恩格斯在1845年首先提出来的，后来英国经济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写了一本《英国产业革命讲话》。长期以来，人们着眼于工业化的过程，把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工业称为“工业革命”，但更确切地讲，应当称为“产业革命”，因为它不仅涉及工业化的过程，而且使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由向大自然索取物品的采集、狩猎经济转变为依靠生产创造财富的农业经济是一次伟大的变革，而从农业经济转变为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又是一次更伟大的变革。尽管这一变革是从工业开始，而且以工业为主导，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起了很大变化，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农业走向近代化，近代交通、通信产业兴起，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迁。

产业革命以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为前提，它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第一次技术革命把人类推进到“蒸汽机时

代”，以蒸汽机为动力带动机器生产，纺织、采矿、冶金、机械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并兴起了铁路、内河航道和海上交通。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重要标志是电能的开发应用和内燃机的发明，由此引起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人类迈步进入“电气时代”以后，工业上广泛使用电机和各种机械，农业逐步走向电气化，交通上出现了电气火车和电动轮船，通讯上相继出现了电报、电话、无线电通讯以及广播、电视、雷达，日常生活中使用了电灯和其他家用电器，以发电、输电、配电三大环节形成的电力工业优先发展起来，发电机、电动机及各种电器设备的工业勃然兴起。能源的开发范围扩大，不但可把煤的热能转化为电能，水力资源转化为电能，内燃机的出现又使石油资源得到利用。内燃机的发明，导致了汽车、拖拉机、摩托车、飞机的制造，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不仅使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加快了经济发展的速率，而且极大地改变着产业结构。在产业革命的过程中，英国首开其端，并推广到欧洲各国，德国在“电气时代”走在前列，而美国得益于两次技术革命。

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自“大航时代”以来，世界航海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大西洋，英伦三岛得其地利，海外贸易有力地刺激了工商业发展；其次，英国在 17 世纪就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并率先出现启蒙运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起来，为经济“起飞”构建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其三，16 世纪以来日盛一日的“圈地运动”使封建经济土崩瓦解，在“羊吃人”的阵痛之后，农民与土地分离，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传统的毛纺织业在海外贸易的推动下兴盛起来，为了逐利，将大片土地改为牧场，致使小农场、自耕农大量破产，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尽管出现了“羊吃人”的悲惨景象，但却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使社会上涌现出大批“自由劳动力”。继之而起的是棉纺织业，为了增加产品，在经典力

学的推动下广泛使用手工机械，纺织机械的使用，迫切需要新的动力，于是蒸汽机应运而生。蒸汽机的推广使用，在许多工业部门都以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并广泛应用于交通。由于高效率的工业制造和先进的交通工具，英国成了“世界工厂”，夺取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海上霸权，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商业据点，并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

在英国产业革命以前，法国的经济实力比英国雄厚，法国大革命以后又得益于英国的技术、资本与经验，在 19 世纪 60 年代完成了产业革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个工业强国和贸易大国。然而，当法国兴起的时候，世界竞争相当激烈，不但英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德国、美国也迎头赶上，所以在 70 年代之后逐渐下降到世界第四位。法国大革命比英国彻底，但革命之后政治动荡不安，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为法兰西第一帝国取代，以后又出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受到挫折。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影响很深，农村并未经历如同英国那样的重大变革，直到 20 世纪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较大比重，城市化进程缓慢，农村中盛行“家庭加工系统”。工业中小企业占优势，主要是轻工业，奢侈品工业畸形发展，由于重工业不发达而缺乏再生能力。金融资本高于产业资本，“过剩资本”流向海外。

德国工业化在 19 世纪 30 年代才开始起步，以铁路建设为重点带动重工业发展，采煤、钢铁工业发展迅猛。1848 年柏林三月革命后，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但它没有向民主化方向发展，而是以“铁血”政策对外扩张，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军火工业，出现了欧洲最大的克虏伯兵工厂。但普鲁士王国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1850—1900 年间世界各国的重大科技发明以德国的 202 项最高，超过英、法、美三国的总和，1867 年德国的西门子

发明了自激式直流发电机，使德国最先步入“电气时代”。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工业突飞猛进，很快超过法国。科学技术与军事扩张结合，德国逐渐走上法西斯道路，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

美国是后起之秀，在 18 世纪初到 19 世纪 80 年代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美国是新大陆上的国家，这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亟待开发，大量移民和资金流向北美，一开始就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条件——劳动与资本。移民大多是英国清教徒，他们渴望在这里建立“千年王国”，拼命劳动，努力创造而不追求侈华，这对社会发展和资本积累有很大关系。美国没有历史包袱，一开始就建立起独立、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1861—1865 年的南北战争又进一步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美国兴起之时，不但第一次技术革命已经完成，而且开始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爱迪生发明了电灯、电话、留声机，莫尔斯发明了“莫尔斯电码”，贝尔和华生制成了最早的实用电话机，费森登开创了无线电技术，1941 年美国开始了电视广播，内燃机被广泛应用于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和飞机，产业革命在高起点上进行。美国工业化建立在农业大国的基础上，西部开发为农业拓展广阔空间，而且很快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科学化。铁路的修建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860 年已成为世界第一铁路大国，1890 年铁路网已遍布全国。在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的同时，美国的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机械制造业处于优势地位，经济发展有很大后劲。近代化农场和股份制企业出现，为资本主义注入了新的活力。1860—1894 年，美国工业总值增加了 4 倍，打破了英国的垄断地位，跃居世界之首。

在历史大潮的推动下，欧洲的瑞士、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在 19 世纪中叶或后半期先后开始了产业革命。地跨欧亚的俄罗斯帝国，在彼得大帝改革之

后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五位工业国。在 19 世纪后半期，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推行殖产兴业、贸易立国、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几十年间成了亚洲第一强国，并在军国主义的支配下发展为帝国主义。继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之后，英、法、俄在世界上建立许多殖民地，把世界纳入了这一新的经济体系，古老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浪潮，走上一条艰难发展的道路。

4. 东西文化的分异与反差

从地中海文明发展的长过程看，古代东方文化是源，希腊罗马文化是流，同是地中海，既产生基督教文化又产生伊斯兰文化，然后出现欧洲的“文艺复兴”。各种文化相互贯通、促进、交融，很难严格区分什么是“东”什么是“西”。语言固然有较大差别，但希腊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都源于腓尼基字母，希伯来字母、波斯字母、阿拉伯字母、突厥字母都源于阿拉马字母，它们共同的祖先是闪米特字母。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基督教是从犹太教中分化出来，伊斯兰教也深受犹太教影响。在自然科学上，希腊及希腊化时代掀起一个高潮，阿拉伯帝国时期又掀起一个次新的高潮，两者有许多内在联系。尽管希腊民主政治曾经一度闪现光辉，但往后的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大体都是在波斯帝国的轨道上运行。文学艺术的联系更是千丝万缕，譬如《伊索寓言》、《圣经》故事多来自东方，犍陀罗艺术又多受希腊影响。哥特式、拜占庭式、斯拉夫式、俄罗斯式建筑虽然各具特征，但它们都是由罗马式建筑演化出来，往上追溯，廊柱式和穹窿顶又都起源于埃及、巴比伦，而与阿拉伯式建筑又有若相相似之处。由此看来，在古代世界，“东”与“西”的界限并不是一清二楚。

希腊罗马文化——欧洲中世纪文化——近代文化的单线条发

展公式并不成立，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督教文化并不是单纯的希腊、罗马文化，它是希伯来宗教与希腊罗马哲学的产儿，或可认为是一种“东西合璧”的文化形态。欧洲中世纪文化当然不能一概抹煞，但对科学、民主而言，它毕竟是一个黑暗时代，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对人类影响深远的近代文化是难以设想的。近代文化深厚的泉源在地中海，它汇集了人类几千年的智慧。欧洲的崛起是诸种因素的凑合，而首先是把人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进而是启蒙运动使人们进入了“理性的殿堂”，它们冲击的目标恰好是“黑暗的中世纪”。“大航海时代”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同时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世界大舞台。从尼德兰革命到法国大革命以及 1848 年的欧洲革命，摧毁了欧洲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一批资产阶级国家，成为近代社会的“催生婆”。“知识就是力量”的声音震撼全球，由科学革命导致两次技术革命，并转化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正是这些原因，世界文化的中心转向欧洲，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东、西文化的差异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东”与“西”，只能看作是一种“文化符号”，严格说来，“西”是指以欧洲为中心的近代文化，“东”是指古老的东方文化。这种方位概念的产生，实际上是欧洲人的视角，或者是站在亚洲本位上去看欧洲，并不是一种绝对可靠的分类系统。地球是圆的，“东”与“西”在 any 一点上都只具有相对意义，以中国而论，美国在它的东方而不是西方，但它的文化却属“西方”范畴。东、西文化的差异，说到底，是工业与农耕、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奋进与保守。欧美各国在产业革命之后，大工业生产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而东方许多国家仍然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形成了巨大反差。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法制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东方国家

仍沿袭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在“理性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而与迷信尖锐对立，这里所说的“迷信”，不只是宗教的迷信，还包括对权力的迷信，对权威的迷信，对个人的迷信等等，凡此一切“非理性”的都在迷信之列。由于奋进，欧洲人敢于开拓、进取、创造、鼎新，这与东方人的墨守成规、因循保守、四平八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本质的差别集中表现出来，就成为东、西文化的分异，至于表达方式、文化风格的不同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有的，而且依时而变。

“文艺复兴”是由古代文明转向近代文明的一部伟大的历史变奏曲，它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命运和航向，开启了世界文化的新纪元。从“文艺复兴”算起，到现在只有 7 个世纪；以产业革命为开端，时至今日不过 300 多年。700 年和 300 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伟大的一瞬”，然而，在此几百年间，人类文明的进展却超过以往的几千年，犹如自由落体运动，在每一点上都呈加速度前进，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到了近代，东、西文化的差异日益明显，形成巨大反差，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西方文明蓬勃发展，使得以农耕为基础的东方文明相形见绌，“西学东渐”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印度、日本、中国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六篇 地中海与中亚及中印两大文明古国

我们把地中海称为“世界文化的漩涡”，不但因为在地中海区域各种文化回旋激荡，还因为它把“四大文明古国”和“草原帝国”都卷进漩涡。地中海把四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埃及、巴比伦的古老文明直接注入了地中海，邻近地中海的印度不断被卷了进来，远离地中海的中国也深受这“文化强极”的影响，中国文化西传也以地中海为中转站。中亚是古代世界的风暴中心，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引起风云突变，不断改变地中海的形势，同时也注入新的生机。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地中海，对这一“世界文化漩涡”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一）强烈影响地中海的中央亚细亚

历史上所说的“中亚”，即“中央亚细亚”，实际上是泛指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地带，它东起西伯利亚，越过蒙古高原的大沙漠，进入天山南北及土拉平原、吉尔吉斯草原和南俄罗斯草原，向西延伸至黑海、里海之滨。由于这一辽阔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心，极少受到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流的影响，因而雨量稀少，大部分地区是满目苍凉的草原和沙漠，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大都以游牧为生，是所谓“游牧行国”。中亚自来是世界风暴的中心，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地中海上引起急风暴雨式的激变。然

而，人们把目光集中在这些惊天动地的战争，却往往忽略了游牧民族的文化，更少有人关注他们对地中海文明的贡献和影响。

1. 中亚的“游牧行国”

“游牧行国”与“田园居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在“工业文明”产生以前，它们一直主宰着世界。“行国”的特点是：“不郛郭，不宫室，不播殖，居穹帐”，“逐水草而居”，人随畜走，畜随草迁，居无常处，浪迹天涯。“行国”之民，以畜牧为生，以行走求生存，以迁徙求发展，这与世代定居、“老死不出乡里”的农耕民族显然不同。“行国”与“居国”判若天渊，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

与农业经济相比，游牧经济有两点特别不同。其一是游牧经济极不稳定，具有“暴涨暴落”的特点，因为牧业生产是以牲畜繁殖为手段，受气候、水草、疫病的影响很大，天适地利则六畜兴旺，一旦自然界出现“灾异”，特别是干旱和瘟疫，牲畜就会大量死亡，远不如农业经济那样稳当、安适。其二是牧区经济结构相当单一，不可能像农区那样“自给自足”。游牧民族必须以牲畜、皮毛及其他畜产品和土特产与农耕民族进行交换，换回粮食、布帛、茶叶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因而商品交换始终是游牧民族的生命线。在这里，牲畜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兼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双重性质，既可作为商品出售，又可作为货币流通，还可以作为财富积累。所以，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民族共同体接触，因而引出产品交换。”

“逐水草而居”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征。然而，水有盈缩，草有枯荣，即令在正常年景，人们也不得不随季节更替而转换牧场。中亚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区，冬长夏短，寒暑变化剧烈，年

温差大，降水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干旱现象时常出现，所以必须轮流使用夏秋牧场和冬牧场。春夏之交，冰消雪融，草木旺盛，可供放牧的地方很多，牧场豁然开阔，于是人们携带着帐篷，驱赶着畜群按一定路线集体放牧，在几片水草丰美的草地上巡回游动。入秋以后，天气渐凉，水枯草黄，牧人思归。迨至隆冬季节到来，一派北国风光，只有少数背风、向阳、有水的山谷或盆地可供放牧，牧场骤然缩小，于是人们便纷纷返回驻牧地点。看来，常规性的游牧，是以冬牧场为圆心形成一个游牧圈，其游牧半径随季节而有伸缩，由春至夏逐渐放大，由夏至冬日益缩小。

可是，当自然界出现某种异常，灾害接踵而来，常规立即打破，整个游牧圈必须移动，另寻乐土而迁往他乡。一个部落的移动，往往使其他部落不得安宁，争夺牧场的风波由是而起，“强凌弱、众暴寡”，激起阵阵波涛。所以，草原上的风波很难平息，经常是戎马倥偬。迁徙是司空见惯的事，游荡不定，四海为家，有时竟至长途跋涉，一去千里，地域极不固定。游牧民族需要一个比农耕民族人得多的空间，既要有可供四季轮流放牧的草场，又要有足够的水源、猎场和柴山，以此构成一个相当广阔的天地。游牧圈的大小，很大程度取决于草原的载畜量，取决于牲畜的数量和水草的状况。但能否获得足够的空间，则主要是靠部落的实力，人多势众的部落便可占据大片土地，人少势单便被驱赶或压缩到一个狭小的空间，因此，游牧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占有一片牧场。牧场是公有的，凡本部落的人都可自由放牧，严格禁止别的部落侵入。

社会组织深受“行国”的制约。最直接的联系是血缘，人们以氏族为单位集体放牧，把这个氏族共有的游牧圈称为“古列延”。但随着人口的增殖与牲畜量的增加，许多人在一起游牧和生活诸多不便，于是在氏族内部划分为若干较小的单位，以几户

或十几户有近亲血缘的人在一起游牧，称为“阿寅勒”。随着时间的推移，草原上的氏族越来越多，互相干扰，争夺牧场，于是在利害关系的推动下，相邻或相关的氏族便因共同利益联合起来，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谓之“兀鲁思”。“兀鲁思”含有“领上”、“主权”、“疆界”、“属户”诸种意思，已具有“国家”的雏形。“兀鲁思”的出现，标志着游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游牧民族进入“文明”的时间并不比农耕民族晚，他们很早就建立了“草原帝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重要的角色，不断改变政治局势，牵动世界历史。

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私有制在游牧民族中迅速发展起来，进入军事民主阶段以后，邻人的财富更助长了人们的贪欲，“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掠夺性的战争一发不可遏止，组织战争的国家机器更显得十分必要。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军事首领的地位日益显赫，争夺牧场、掠夺财富、保卫本部生命财产安全都全凭军事实力。于是“草原帝国”陆续登上历史舞台。适应这种环境，其民强悍而尚武，惯于马背上生活，来去飘忽，进退犹如疾风闪电，具有强大的战斗力量，动辄以“控弦数十万”而称雄。不过，因为游牧民族的地域常有变迁，人口流动量大，经济暴涨暴落，建立在这种脆弱基础上的政权多不长久。各部落兴衰无常，一时勃兴，一时衰败，此起彼伏，动荡不安，尽管是“一代天骄”，但很快便成过眼烟云，历史发展波澜曲折，形成“匈奴亡，突厥兴；金夏衰，蒙古盛”的更迭局面。

与之相适应的是“马背上的文化”，风貌与农耕民族迥然不同。首先，游牧、狩猎、贸易、作战构成了生活的基调，栖息、迁徙、雄踞形成了一条滚滚的历史长河，因而人们具有一种勇武、浩荡、豪迈、潇洒、开阔、进取的特有气质，不畏艰险，敢于开拓、创新，文化风貌显得独特。其次，由于经济起伏、社会

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文化总是处在不断破坏与重建的过程中，因而文化积累远远不如农耕民族，且因接触面广，文化随时变迁，很难形成世代相承的文化传统。其二，人口大幅度流动，各民族、各部落相互对流穿插，文化的传播大于文化传承，故同多于异，习俗大同小异，轻裘、宝马、骑射、歌舞、毡房、肉食成为普遍的习尚，且因人与地的联系极不固定，地方特色很难凝结在文化之中。其四，游牧民族四海为家，视野特别宽阔，能够广阔接纳各种文化，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譬如宗教，他们原先普遍信奉原始宗教，但外来的祆教（拜火教）、摩尼教、犹太教、基督教、佛教都可在游牧民族中传播，伊斯兰教在他们当中更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五，游牧民族的群体意识特别强烈，尽管平时各自分散，相互械斗，一遇战争便迅速集合为一个整体，步调一致，力量集中，为了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自己，以“马革裹尸”为荣，因而战斗力极强，堪称“金戈铁马”。

游牧民族以“尚武”的姿态出现于世界舞台上，他们的文化往往不受重视。其实，“马背上文化”不仅独特，而且重要，对世界文化产生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和影响。首先，人类在靠生产来创造物质财富的伟大变革中，农耕与畜牧都具有重大意义。其次，世界上许多重要发明并不都来自农耕民族而是来自游牧民族，他们在牲畜养殖和兽疫防治方面的经验显然比农耕民族丰富得多，马弩箭镞的制造在世界上遥遥领先，骑射尤为精到，而且最先使用牛车、马车、驼车，优先发展了金属制品、毛纺、制毡、制革，裤子的发明权也属游牧民族。其三，游牧民族很早就有了产品交换，从它出现之时起便与贸易结下不解之缘，成为世界上最早、最活跃的商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经济互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游牧民族是国际贸易的先驱，他们长途跋涉、穿越戈壁、沙漠、草原和高山开辟国际交通线，打破国界进行物资交流。其四，“草原帝国”的扩张固然给人类带来许多灾

难，但它却不断改变世界格局，打破封闭，带来新的“异质文化”，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 innovation。基于以上各点，我们对游牧文化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以中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游牧文化圈”，它是世界五大文化圈之一。与其他文化圈相比，游牧文化圈显得格外独特，它不像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那样以宗教为传媒手段，也不像汉字文化圈那样通过汉字传播文化，游牧文化圈的主角是游牧民族，它传播文化的手段是迁徙、贸易和战争。游牧文化圈极不稳定，它随着游牧民族的兴衰而有盈缩、突然放大又突然收缩，极盛时越出中亚草原，扩展到东亚、西亚、南亚及欧洲。游牧文化圈最为活跃，由于它的突变性、扩张性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几乎与所有的文化圈都有接触，常常因为它的变动而影响其他文化圈。由于中亚距离地中海不远，西亚在历史上又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大通道，因而地中海受到中亚的影响特别强烈。

2. 中亚是古代世界的风暴中心

游牧民族的地位、作用不容忽视，它牵动了世界几千年的历史，掀起阵阵狂涛，引起风云突变，致使中亚成为世界风暴的中心。中亚处在欧亚大陆的居中部位，紧靠中国、西亚、地中海和欧洲，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世界的轴心，所以中亚的每一变动都影响世界局势，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住在中亚的民族很多，大体上讲，分属于黄种人和白种人。属黄种人的多是蒙古利亚种，语言属阿尔泰语系，包括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绝大部分是游牧民族，少数是所谓“打牲部落”。属白种人的是欧罗巴种，语言属印欧语系，主要有操闪米特的塞种人和操日耳曼语的哥特人。中亚的游牧民族，或因天灾而向外求食，或因贸易受阻而危及生存，或因利益驱动而掠夺四邻，或因势力膨胀而向外扩张，因此，中亚的崛起，很快就打破

世界的均衡状态，使欧亚大陆动荡不安。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对峙的过程中，游牧民族总是占主动地位，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则常处被动地位，采取守势。然而，“草原帝国”忽兴忽衰，它们所造成的大变局使人感到突如其来，一阵风暴过去之后渐渐恢复平静，但为时不久，又是一场狂风暴雨，叫人防不胜防。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千年，直到近代“工业文明”兴起，一方面因游牧渐渐改为定牧、农区挤压牧区，另一方面则因枪炮的威力使游牧民族的马战失去了优势，致使游牧文化圈急剧缩小，影响减弱。

在中国历史上，长城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线，长城以南是“居国”，长城以北是“行国”。和平时期，长城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线，沿长城开设若干“边市”；遇有战争，形势即刻紧张起来，变成了一条血雨腥风的烽火线。纵观中国历史，中原王朝受到的巨大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人抵在秦汉时期，匈奴在大漠兴起，隔着万里长城相互对峙，有时争战，有时“和亲”，有时匈奴越过长城，有时汉军出塞征讨。匈奴分裂后，南匈奴纷纷内附，北匈奴西迁进入欧洲。东汉以来，防线渐渐突破，西、北边疆的民族纷纷内迁，主要有匈奴、鲜卑、氐、羌、羯五族。东晋时，这些民族在北方纷纷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以后，鲜卑族逐渐统一北方，相继建立了魏、东西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宋、齐、梁、陈隔江分治，史称南北朝。隋唐虽然统一中国，但周边仍有许多民族政权，如漠北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西域的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还有西北的回纥汗国等。宋朝一开始就处在战争环境中，先是契丹在漠北建立辽国，党项在河西一带建立西夏，以后东北的女真兴起，将北宋灭亡。金国占据北方半壁河山，与南宋对抗一百多年。蒙古兴起后，灭了西夏、金和南宋，建立起版图空前辽阔的元朝。明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后来又被东北满洲人

建立的清朝所取代。阿尔泰语系的游牧民族，不仅影响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影响欧洲和地中海，最突出的就是匈奴人和蒙古人。

直接关系地中海的是来自中亚的塞姆人，亦称塞种，他们是民族大迁徙的先驱，是西亚的主体民族。塞种是活动在中亚许多游牧民族的总称，包括南方的巴克特里人、东方的乌孙人和月氏人、西方的塞西安人、北方的萨尔马提亚人和玛撒该达人等。中国史书上所说的大宛、大夏、奄蔡、康居、乌孙、大月氏、小月氏等，大抵皆属塞种。大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有一批操闪米特语的塞姆人便进入西亚，在两河流域建立阿卡德王国，建立古巴比伦王国的阿摩利人也是塞姆人的一支，另一支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为亚述帝国的主人，后来建立新巴比伦王国的迦勒底人也属于操闪米特语的塞姆人。从语言上考察，对世界文字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阿拉马人和腓尼基人，创立犹太教和《圣经》的希伯来人，创立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阿拉伯人，大抵都是操闪米特语的塞种人。伊朗高原上的早期居民也来自中亚的游牧人，他们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逐渐南迁，与当地土著融合成雅利安人，是米底人和波斯人的远祖，另一支迁入南亚次大陆。印度西北的巽宾是塞种建立的国家，以后大月氏南迁在印度建立了贵霜王朝，继之而起的吠哒人实际上是大月氏人与匈奴的混血种，西方人称之为“白匈奴”。

推动欧洲“蛮族大迁徙”的是匈奴人，欧洲人把它称为“上帝之鞭”。匈奴在汉代分裂为南、北两大部，南匈奴附汉，留居漠北的北匈奴自公元前 2 世纪开始西迁，于公元 4 世纪来到顿河流域，与哥特人发生冲突。哥特人分为两部，游牧在顿河流域的称东哥特，活动在多瑙河下游一带的称西哥特。375 年匈奴人打败东哥特，西哥特人恐慌万状，于是西迁进入罗马帝国，成为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开端。在此以后两个多世纪中，匈奴人有一部

分定居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与欧罗巴种融合，法兰克人越过莱茵河进入高卢，汪达人经西班牙进入北非，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渡海到达不列颠群岛，整个欧洲处在大迁徙、大动荡之中。在匈奴和“蛮族”的打击下，罗马帝国于 395 年正式分裂为以罗马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公元 419 年，西哥特人在高卢西南部以上鲁斯为中心建立了第一个蛮族国家，以后，日耳曼人先后建立了法兰克王国、汪达尔王国及大不列颠的许多小国。匈奴人两次进攻罗马，不久罗马又遭汪达尔人洗劫，罗马军权操于蛮族将领手中，公元 476 年奥多阿克终于废除了最后一个皇帝，西罗马帝国灭亡。奥多阿克的政权，于 493 年为东哥特人所灭，随即在意大利半岛建立东哥特王国。

蒙古军西征又使欧洲和地中海发生一次巨变。自 1206 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畔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之后，尊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建立了庞大的草原帝国。军锋南下，先灭西夏，次灭金国，最后攻占临安，结束了南宋的统治，在中国建立元朝。蒙古灭金以后，窝阔台在和林举行大会，决定远征欧洲，又有拔都西征和旭烈兀西征。经过三次西征，在“儿鲁斯”的基础上建立四大汗国：大漠地区建立窝阔台汗国，在天山南北建立察合台汗国，在中亚及东欧建立钦察汗国，在西亚一带建立伊儿汗国，地跨欧亚，震惊世界。钦察汗国即俄国史上所说的“金帐汗国”，包括俄罗斯大公国、基辅公国以及今保加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地。旭烈兀西征，于 1258 年占领巴格达，结束了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统治，在伊朗、阿富汗、两河流域及中亚阿姆河西南地区建立伊儿汗国（或称伊利汗国），为时 130 年。蒙古西征之后，伊斯兰世界再也无法统一，继帖木儿帝国之后，出现了奥斯曼帝国、伊朗沙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三足鼎立的局面。伊斯兰教在此期间，由于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统治者的支持，有了很大发展，深入中亚、南亚和中国西北地区。西征打

开了欧亚大陆的交通，中国文化西传，西域的“色目人”进入中国，天主教来中国传教，马可·波罗把中国介绍到欧洲。游牧民族在西亚和南亚的势力扩展，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伊朗的土库曼人都来自中亚，莫卧儿帝国为帖木儿的后裔所建。

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无论中国、西亚、南亚和欧洲，都有游牧民族的行踪，他们的马蹄声震撼欧亚大陆，不断改变世界形势。由此可见，游牧民族在世界古代及中世纪的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中亚在地域上靠近地中海，西亚又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大通道，因而在历史上引起很多风波，民族成分也特别复杂。中亚对地中海的影响，概括地讲主要有四：一、塞姆人在西亚占有重要地位，在两河流域的建树尤多；二、推动地中海文明的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是游牧民族所建；三、左右欧洲形势的“蛮族大迁徙”由匈奴引起，并导致东、西罗马的分裂和西罗马帝国灭亡；四、蒙古西征使欧洲和地中海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3. “马背上文化”与地中海文明

游牧民族叱咤风云，掀起惊涛骇浪，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识弯弓射大雕”，事实上，“马背上文化”对世界文明曾做出过诸多贡献。从世界范围来看，“游牧文化圈”最大的优势就是与其他文化圈都有接触，经过冲突、碰撞、交融，引起许多文化变迁，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震撼力和穿透力的文化圈之一。与游牧民族驰骋万里的事实相关联，他们打破国界、洲界，对沟通世界文化具有特殊意义。由于游牧民族的介入，不断带来“异质文化”，给古老文明注入新的生机，这在中国、印度、地中海都是如此。无可讳言，游牧民族在征战中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当他们征服了高文化的民族之后，很快就被高文化征服，在继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这在两河流域表现得特别明显。游牧民族视野

开阔，能广泛接纳各种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最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游牧民族的文字，其实，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字是他们创造的。根据文字学家的研究，字母文字的祖先，既不是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也不是埃及的碑铭字体或纸草书，而是产生于塞姆人中的“北方闪米特字母”。这种字母的出现是由于地中海贸易的需要，记账要求简便快捷，与不同语言的人交往需要有一种容易沟通的文字符号，而游牧民族最善于经商，因而在他们当中最先发明了字母。北方闪米特字母有两个重要分支：向西的一支是迦南字母，由此发展为拼音文字；向东的一支为阿拉马字母，由此发展为音节文字。迦南字母在腓尼基人手中得到广泛运用，后来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制了希腊字母，由希腊字母衍化出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不但欧洲各国的文字由此产生，而且拉丁字母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因此语言学界把腓尼基字母视为拼音文字的始祖。阿拉马字母在闪米特语民族中的传播，形成了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叙利亚字母、巴尔米拉字母、曼代字母、摩尼字母，以阿拉伯字母的影响最大。阿拉马字母在非闪米特语民族中的传播，形成了印度佉卢字母，波斯字母、粟特字母，早期突厥字母、早期匈牙利字母，中国的回纥文、蒙文、满文都属于这一系统。阿拉马字母的另一分支是印度字母，包括婆罗米字母、天城体梵文字母、缅文字母、泰文字母、高棉字母、掸文字母等，中国的藏文、傣文以及历史上的龟兹文、焉耆文、八思巴文等都属于这一系统。事实告诉我们，字母文字发源于地中海，而它的创造者就是操闪米特语的塞姆人。

美索不达米亚最先开启地中海文明，住在这里的苏美尔人最先开创农业，建立城邦，发明最古老的楔形文字。然而，继承这种文化的却是来自中亚的塞姆人，包括阿卡德人、阿摩利人、加

喜特人、亚速人和迦勒底人，他们从游牧转为农耕以后，兼得两者之长，使文化不断创新，共建“文明古国”。阿卡德人第一次统一了两河流域，使楔形文字具有闪米特语的特征，并加以推广。古巴比伦建成了两河流域的灌溉系统，扩大楔形文字的运用范围，并发展了中央集权国家，在《乌尔纳姆法典》的基础上制定了世界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亚速把两河流域的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帝国强盛时期使楔形文字成为西亚各国通行的文字，并建立收藏丰富的巴尼拔图书馆，它的辉煌成就使“亚速学”得以建立。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在文化上又有新的建树，出现了堪称世界奇迹的“空中花园”，在数学、天文和历法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纵观两河流域的历史，政权的更迭，历史的变迁，都与游牧的闯入有关。然而，创建文明古国也有游牧民族的功劳，正是因为他们不断渗入新的文化因素，给这个文明古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文化蒸蒸日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如果说两河流域从纵向上体现文明继承与发展的话，那么，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则是在横向上体现文化的包容。阿拉伯在7世纪以前还是一个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但建立了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之后，广泛吸纳地中海文明而迅速提升，在“阿拉伯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翻译运动”把波斯、希伯来、巴比伦、埃及、印度以及希腊、罗马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又把伊斯兰文化迅速扩散出去。巴格达的“智慧宫”，汇集了古代东方和希腊、罗马的大量典籍，对地中海文化做了一次历史性的总结。帝国时期出现了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是继希腊、罗马之后出现的一次高潮，在世界科技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它兼容东方各国的文化，产生了令人着迷的伊斯兰艺术，《一千零一夜》在世界文坛上享有盛誉。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特征，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凝结在《古兰经》中，并通过宗教的传播，

形成了一个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文化圈”。

游牧民族的创造是多方面的，对地中海文明有多方面影响。希伯来民族也是塞种人，在他们当中产生的犹太教直接孕育了基督教，对伊斯兰教也有深刻影响，可谓是“小民族，大声音”。腓尼基也属塞种，他们把游牧民族的商业特长运用到海上贸易，成为“地中海上的马车夫”，对文化交流、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波斯将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大文明古国囊括起来，并与中国进行交流，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二传手，它的文化具有“四方交会”的特征。乌拉尔图人最善养马，最先使用战车，赫梯人最先由青铜时代跨入铁器时代，都与游牧民族的“马背上文化”密切相关。

（二）印度与地中海文明

“印度”之名源于印度河，梵语为 SINDHN，意为“江河、海洋”，中国史籍译作“身毒”或“天竺”。古代的“印度”并非国名，实际上是泛指印度半岛，包括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它东、南、西三面环海，北面有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把它和亚洲大陆隔开，在地面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故有“南亚次大陆”之称。

印度虽然不邻地中海，但与地中海区域紧紧相连。它西北有山口与西亚相通，历史上不断受到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侵扰，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雅利安人、大月氏、喉哒人和蒙古人。地中海上建立的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都曾经征服过印度，贵霜王朝的首都犍陀罗也靠近地中海区域，几次被卷入地中海的漩涡。印度半岛与阿拉伯半岛隔海相望，因而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又受到强烈辐射，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地造成很大势力，莫卧儿帝国实际上是伊斯兰国家。到了近代，印度首先沦为欧洲殖民地。

1. 雅利安文化与波斯文化的渊源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公元前 2300—2000 年，印度河流域便出现了许多城市和农庄，形成了农业和手工业颇为兴盛的“哈巴拉文化”。早先的居民是“达罗毗荼人”（Dravidian），属地中海高加索人种，以农业为生，使用象形文字。大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与 15 世纪之交，游牧的雅利安人闯入了印度，出现了长达千年的“吠陀时代”，成为印度文化兴起的重要时期。吠陀时代得名于雅利安人的宗教经典《吠陀》，它分为《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四部，《梨俱吠陀》反映的时期称为吠陀早期，其余三部《吠陀》反映的时期称为吠陀晚期。雅利安人的进入是印度历史上的第一件大事，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婆罗门教的产生以及宗教哲学等等，都与雅利安人的到来息息相关，因此，研究印度历史和文化，首先就要谈到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的先祖，原先住在中亚，他们在里海和咸海以北的一片弧形大草原上游牧，所以其后裔把中亚称为“雅利安人的故乡”。雅利安人的语言属印欧语系，身材高大，头型长，鼻梁高，嘴唇薄，毛发卷，皮肤在白色中显浅褐色。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逐渐向外迁徙，向南的一支进入伊朗高原，他们征服了当地土著之后，自认是“高贵”的种族，称为“雅利安”（arya）。留居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便是后来波斯人和米底人的先祖，而继续南迁的一支便是印度的雅利安人。他们最初迁到北印度，把这里称为“雅利亚伐尔塔”，意为“雅利安人居住的国土”。以后分批陆续迁入，绵延好几个世纪，并扩散到印度许多地方，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在征服达罗毗荼人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从游牧向农耕过渡，氏族组织转变为按地域结合的农村公社。

雅利安人的征服，使印度社会迅速分化，出现了一种世界罕

见的“种姓制度”。这种制度非常复杂而离奇，在印度延续了3000多年。在印度，人被分为四种“瓦尔那”（即种姓），即婆罗门（僧侣）、刹帝利（贵族和武士）、吠舍（工商业者和平民）和首陀罗（农民和手工业者）。此外还有一种处在社会底层的“贱民”，大多是奴隶，被称为“不可接触的人”。种姓是一种非常凝固的等级制，高低贵贱不能改变，必须世代承袭。种姓与职业紧紧相连，不同种姓的人固定从事某种职业。实行种姓内婚制，严格禁止不同种姓的人通婚，不允许血缘混杂。社会地位因种姓高低而定，在政治、法律上极不平等。宗教生活也受种姓制约，只有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才有资格入教，称为“再生族”，即可获得宗教生命的人；首陀罗和不可接触的人是无权参加宗教活动的，称为“非再生族”。这种社会制度，明显地体现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通过政治、法律的不平等使人们对立起来，把已分化的阶级用职业加在固定，并以婚姻限制来保证雅利安人血统的高贵。

雅利安人还把他们的宗教上升为国教，称为婆罗门教，从宗教信仰上维护他们的政治统治。雅利安人原先信奉很多自然神，包括天神、地神、宙神、风神、雨神、火神等等，随着统治地位的确立，在众神之中以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位大神最为显贵，并形成“梵天创世”之说，逐渐演变为一种人为宗教，因其称僧侣为婆罗门，故称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教义，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吠陀”的含义是“智慧”，它来源于天神“梵天”，而梵天是宇宙万物的缔造者，无所不在，永恒不灭。在他们看来，只有祭祀天神，人们才能获得解救和幸福，谓之“祭祀万能”。与种姓制度相联系，从事与神交通和祭祀的婆罗门地位最高。婆罗门教不但是印度最早的人为宗教，它后来演变为在印度占重要地位的印度教，而且在反婆罗门教的过程中产生了佛教和耆那教，因此，婆罗门教是印度宗

教的总根。

雅利安人给印度带来了《吠陀》，它是印度宗教哲学的重要泉源。《吠陀》是婆罗教的经典，它集中反映了古印度的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死观。由于婆罗门教以“独尊”的地位维护万恶的种姓制度，引起社会普遍不满，于是在公元前 6—前 3 世纪掀起了一股反婆罗的思潮，史称“沙门思潮”。沙门思潮中形成了 60 多个派别，著名的有富兰迦什等“六大师”，佛教和耆那教也是沙门思潮的产物。在各种社会思潮特别是佛教的猛烈冲击下，婆罗门教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存亡与发展，于是婆罗门的思想家们纷纷对教义做出新的解释，形成了婆罗门教的“正统六宗”。佛教虽然是以反婆罗门教的姿态出现，但它的许多宗教思想都与《吠陀》及解释《吠陀》的《奥义书》有关，深受沙门思潮和“正统六宗”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吠陀》的传入，为印度宗教哲学奠定了基础，许多哲学思想都要从《吠陀》中来寻找根源。

如前所说，这一切变化都是由雅利安人的侵入而引起，而印度的雅利安人与伊朗雅利安人原先是一个部落共同体，因而印度与波斯文化有很深厚的渊源关系。这就是说，印度文化从吠陀时代开始，便与存在于地中海的波斯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从语源学上考察，印度雅利安人的梵语，实际上是印欧语系伊朗语的一个分支，印度早先的佉卢字母与波斯字母也存在着亲缘关系，同出于阿拉马字母。波斯的祆教与印度的婆罗门教同出一源，它们都是在雅利安人原始崇拜的基础上衍化出来的，祆教的“马兹达创世说”与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祆教崇拜火，而印度雅利安人的神祇中也有火神“阿耆尼”。《梨俱吠陀》是伊朗和印度雅利安人未分化前共同的神话故事和诗歌总集，它后来成了婆罗门教最古老的经典，而祆教的《伽泰》和经典《阿维斯陀》也保留着古老的痕迹，同样都被视为“智慧”之

源。灵魂不灭、弃恶从善、轮回转世等宗教观念，无论在祆教或婆罗门教都颇一致。种姓制度在《梨俱吠陀》中已有反映，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大体上都是从“瓦尔那”中分化出来。作为《一千零一夜》原型之一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与《希扎尔·埃夫萨乃》（一千个神话故事），实际上包含着印度和波斯的故事，或云产生于印度，或云为波斯人搜集。总之，印度雅利安人与波斯先祖同源，文化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雅利安人起到了沟通印度和地中海文化的作用。

2. 波斯和马其顿势力伸入印度

吠陀时代过去之后，公元前 6—前 4 世纪印度进入了“列国时代”，许多小国同时并存，互相纷争，恒河流域兴起了迦尸、居萨罗、跋祇、阿般提等国，摩揭陀在南方称霸。然而在此时地中海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波斯，公元前 6 世纪末侵入印度，统治印度西北部两百余年。波斯衰落后在希腊半岛上又兴起亚历山大帝国，“马其顿方阵”又踏上印度半岛。战争与征服给印度带来灾难，影响它的历史进程。但换个角度来看，两次入侵却在政治上撤出了一道篱笆，扩大了地中海文化的辐射范围，使古老的印度走出封闭。

印度西北与伊朗高原接壤，因同属雅利安人种而有天然联系。公元前 550 年居鲁士领导波斯人推翻了米底王国，建立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开始向外扩张。到了大流士时国力更加强盛，时值印度分崩离析，乘虚而入，于公元前 518 年占领印度西北部。波斯是地中海上最先建立的大帝国，它第一次把埃及、巴比伦、印度三大文明古国以及希伯来、腓尼基、小亚细亚纳入统一的国度，使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古老文明相互交融，地中海文明因此增加了许多印度文化的因素，譬如印度文学、天文、数学、医学等，印度数码也流传到西亚。大流士修筑了一条由波斯

经阿富汗到印度的大道，这条大道与中国“通西域”的古道相接，这就使“丝绸之路”延伸到了印度，同时成了后来印度佛教东传的主要通道。印度不再是孤立发展，它与中国、埃及、巴比伦等古代文明中心联系起来，被卷入地中海文化的漩涡。波斯帝国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了一个行省，在这里征收赋税，每年要从这里拿走 360 塔兰特的砂金，据有关学者研究，这些砂金约合 9 吨，相当于波斯帝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波斯军队进入印度，同时又从印度征发兵员，西亚人走进了神秘的印度，印度人也有机会外出了解地中海。波斯的金币和银币流入印度，促进了经济发展。

波希战争以后，波斯走向衰落，无力控制印度，于是被火的 20 多个小国纷纷独立。正在此时马其顿在希腊半岛北部崛起，统一希腊后急躁扩张，公元前 330 年结束波斯阿黑尼德王朝的统治，在波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在亚历山大的心目中，印度是个神奇的地方，它三面都是浩瀚的海洋，到了印度似乎就到了“世界的南端”，于是决心远征印度，占领最后一块土地。公元前 327 年，亚历山大亲自率领数万大军，翻过兴都库什山的哈瓦克山口和考尚山口进入印度。两路大军向南挺进，于次年春在印度河会师，神话般地取得了希达斯河战役的胜利，继续向恒河流域推进。公元前 320 年夏远征走到了尽头，在印度修建了 12 座大祭坛，感谢奥林匹斯 12 位大神保佑他一直战无不胜。他决定从水路返回，航行于印度河上，想出海去攻打波斯湾，实行他东征的计划。公元前 323 年他回到了阔别 8 年的巴比伦，准备在这里建立首都，然而他的胜利之路竟成了不归之路，就在这年 6 月间，这位仅 33 岁的盖世英雄便离开了人世。

亚历山大征服印度后仍然沿用波斯的统治方法，在印度设立了三个行省，任用印度人做总督。他在印度的一些战略要地留兵驻守，新建了儿座城市，按其惯例都叫做亚历山大城。然而亚历

山大帝国在历史上有如昙花一现，亚历山大一死很快就土崩瓦解，因而在印度的统治不长。公元前 324 年旃陀罗及多在印度西北建立孔雀王朝，与马其顿军队展开激烈战斗，终于把马其顿人赶出了印度。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开创了一个文化大交融的“希腊化时代”，在此两百多年中，印度与地中海各国的贸易发展起来，希腊文化在印度西北部得到传播，希腊人中亦有一些佛教徒。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在西亚建立的塞琉古王国，与印度孔雀王朝保持友好关系，促进了文化交流。尽管印度两次受到外国侵占，但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在印度西北建立行省，客观上打破了诸国并立、分裂割据的状态，结束了印度的“列国时代”，一个统一的孔雀王朝建立起来，标志着印度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孔雀王朝时期。

3. 贵霜王朝与犍陀罗艺术

旃陀罗及多出生于饲养孔雀的家族，故人们把他建立的王朝称为“孔雀王朝”。他在位 25 年，驱逐了马其顿人，与塞琉古王国修好，巩固了新生政权。他的儿子宾头沙罗继位，以统一南、北印度为己任，兵锋直达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这个大业终于在他的儿子阿育王时代完成，实现了印度次大陆的第一次统一。阿育王的前半生穷兵黩武，而后半生则皈依佛门，这也许是对血腥屠杀的忏悔，也许是感到单凭暴力并不能治理国家，必须用宗教的力量来进行社会控制。他以“正法”为国策，即以佛教的教义来规范社会的思想信仰和伦理道德，宣扬忠诚恭敬、慈悲为怀，宽容节制，倡导公益事业，使人们放弃反抗，循规蹈矩。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在印度有较大发展，并传播到斯里兰卡。正是这个原因，阿育王自称是“神所宠爱者”，而佛教则把他看成是“佛的护法人”。

佛教在反婆罗门的声浪中脱颖而出，在种姓制度的重压下发

出了沉痛的呼声，特别是在列国纷乱与外族征服的情况下，人们更需要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和解脱，在绝望中看见一线虚幻的灵光。佛教的切入点是人生，把“苦”作为对人生价值的基本判断，以此为出发点建立“四谛说”、“五蕴说”、“报业轮回说”和“三法印”。“四谛”即人生的四大真理，认为人间是一个大苦海，产生痛苦的根源是“贪爱之心”，因此要消除一切烦恼方能进入彻底解脱的“涅槃”境界。解脱的途径是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正进、正念、正定，谓之“八正道”。佛教认为人生中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总谓之“因缘”，有因才有果，一切都依条件而定，并用“十二因缘”来解说人生，还提出了“三世”（前世、现世、来世）的“两重因果说”。它以“色”（物质）、“受”（感受）、“想”（知觉）、“行”，（意志）和“识”（精神）五种因素的积聚来剖析人生，称为“五蕴”，并由一切变化无常的理论导出“种姓无定”的结论，提倡“四姓平等”。所谓“业报轮回”，是以前世的业行为起点，根据人们的善恶而有转生，善者变人、升天，恶者则变狱鬼、畜牲和阿修罗（魔鬼）。“三法印”是佛理的最高概括，即佛家的三大纲领：“诸行无常”是说一切都在流转之中，“诸法无我”是说一切都以“因缘”而变，“一切皆苦”则是佛学立足的根本，最彻底的解脱就是进入“涅槃”。因为佛教主张解救芸芸众生，所以很快发展起来。

阿育王在位 37 年，他死后孔雀王朝又衰落下来，出现地方割据的局面，公元前 187 年被大臣普沙密多罗·巽伽篡夺了王位。继之建立的巽伽王朝，反其道而行之，支持婆罗门教，打击佛教，公元前 75 年为甘华王朝取代。不过，甘华王朝的势力范围局限在摩揭陀地区，德干高原及西海岸另有一个安度罗国，南印度有羯陵伽国及其他小国。正当王朝更迭、小国纷立的时候，西北面的大夏国又入侵印度。大夏又称吐火罗，在今阿富汗的地区，统治者为希腊人，居民多为塞种。大夏侵入印度是在米兰德

王朝时期（公元前 155—前 130 年），军队直抵恒河流域，一度占领华氏城，在东起马士腊、西到巴里扎里、北迄犍陀罗地区设立行省。米兰德崇尚佛教，致使佛教中心向印度西北转移。公元前 1 世纪，大夏政权被塞种人和大月氏人推翻，有一支塞种人在北印度的旁遮普、卡提阿瓦那等地建立一些塞种人的小国。

月氏汉代时住在中国西北的阿尔泰山、河西走廊及河套一带，以游牧为生。公元前 2 世纪上半叶，因与匈奴作战而分散，驻牧伊犁河流域的称大月氏，退居南山一带的称小月氏。大月氏因受匈奴和乌孙的压迫南迁，灭大夏后逐渐转向农耕，公元前 1 世纪贵霜部落强盛，征服其他部落而建立政权，故称贵霜王朝。立国后对外扩张，入侵安息，攻入克什米尔地区的罽宾国，然后进入印度，阎膏珍执政时（公元 65—75 年）向印度河流域推进，其疆界北逾阿姆河，东越葱岭而抵大山南路，南包印度，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迦腻色伽时代（公元 78—102 年）达于鼎盛，与罗马、安息、中国并称当时的四大帝国。它的首都设在犍陀罗地区的白沙瓦，其地在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毗连之区，便于北控阿富汗、南控印度。这里在“希腊化”和大夏时期深受希腊文化熏陶，贵霜王朝建立后又成为佛教中心，是一个文化荟萃之地。迦腻色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在白沙瓦建了一座著名的大佛塔，高 194 米，又在各地广建佛塔、佛寺。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僧人在犍陀罗举行了“第四次结集”，并派出大批僧人到国外传教，通过“丝绸之路”把佛教传入中国。

希腊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在此交融，促成了犍陀罗艺术的繁荣。在此之前，佛教并无佛像，只是用佛的足印、佛发、法轮、伞盖、宝座或菩提树等来表现佛的圣迹，以象征手法来隐喻佛陀的形象。自佛教中心转到犍陀罗，在希腊崇拜的影响下，借助希腊神像的雕塑方法，开始塑佛像，这在佛教史上是一个重大转折。犍陀罗艺术最早的遗存就是白沙瓦的迦腻色伽大佛塔，在旁

遮普附近还出土了一尊石雕佛像。3世纪以后，佛像雕塑日盛一日，形成主流。当时所造佛像，脸型椭圆，眉毛细长，鼻梁高直，眼窝深陷，发型呈波浪状，有明显的希腊风格。但头顶上的肉髻，眉宇间的白毫，肩宽壮实的体形，又仿佛是印度人的风貌。佛像面部宁静而庄严，流露出沉思内省的神态，身披袈裟，脑后配有佛光，又使人感到佛理的深邃和佛法的宏大。

在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下，在印度的秣菟罗（今新德里一带）也开始塑造佛像，更多地体现印度风格，称为秣菟罗艺术。这里造像喜欢用裸体，崇尚肉感表现，人物形象和衣着俨然是印度人。佛面方圆而唇较厚，肩脊隆起，头发剃光，袈裟偏袒右肩，衣衫轻薄，紧紧贴身，在肩宽胸实、肌肉匀称的形象中体现出生命的巨大活力。到了及多王朝时期（公元320—600年），犍陀罗艺术与秣菟罗艺术渐渐交融，互相借鉴，完成了希腊式佛像向印度式佛像的过渡，把印度文化与希腊文化完美结合起来，出现了佛像艺术的黄金时代。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上，留下许多石窟，如龟兹石窟、高昌石窟、焉耆石窟、敦煌石窟，然后在北路上有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南路则有四川大足石窟等。在新疆早期石窟中的造像，体形敦实，富于质感，健壮浑厚，酷似巴基斯坦雕塑中的人物，具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敦煌石窟的精华在莫高窟，北魏时期的塑像体形高大，额宽鼻高，眉眼细长，头发弯曲，袒露上身，显然是受印度秣菟罗艺术的影响。到了隋代，佛像面部变得丰满，线条柔和，鼻梁降低，耳朵加大，逐渐接近中国人。唐代造像最多，佛像温和慈祥、神态庄严从容；天王像显出刚毅、果敢、威严的气质；菩萨像有如唐代美女，体形丰腴，面庞圆润，微带笑容，袒胸露臂，衣衫飘拂，已没有外国人的形象。“飞天”是“香音之神”，能奏乐飞舞，满身飘散香气，有如西方的“天使”，又好似道家的“仙女”，很像是“安琪儿”的变

形。

4. 伊斯兰教传入与印度佛教的衰亡

兴盛一时的贵霜王朝，在迦赋色伽死后又分裂为一些小国，而此时萨珊王朝在伊朗兴起，对印度造成威胁。4世纪初，摩揭陀地区的印度人在旃陀罗及多的领导下驱逐了大月氏，建立了笈多王朝。这是印度再度统一的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婆罗门教复兴，而佛教在宽容政策下仍然继续发展，大乘佛教形成。5世纪末，与匈奴有亲缘关系的嚙哒人又从北方侵入印度，经此侵扰之后，印度又处于四分五裂。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兴起以后，迅速向东传播，几个世纪之间，成为印度的主要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在印度急剧膨胀，对婆罗门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挑战，经过商羯罗改革和虔诚派运动，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的某些教义和民间信仰，演变为印度教。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夹击下，印度佛教一败涂地，竟使这个“佛国”在历史上消失，而在中国和东南亚寻求发展。这是印度文化的一大变迁，一直延续到近代。

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始于712年阿拉伯人占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地方。10世纪末到11世纪初，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富汗伽色尼王朝占领了白沙瓦，在苏丹马默德时期17次远征印度，据有北印度之后，大肆破坏佛寺和印度教寺庙，屠杀僧尼，使佛教遭到一次大的劫难。以后，突厥系塞尔柱人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廓尔王朝兴起，取代了伽色尼王朝，在1175—1202年期间，几次出征旁遮普，确立了穆斯林在北印度的统治，12世纪末孟加拉地方基本上为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16至19世纪莫卧儿统治印度时期，伊斯兰迅速发展，上升为国教。

伊斯兰教之所以在几个世纪之间就以迅猛之势发展为印度一夫宗教，当然不能脱离外来征服的历史背景，特别不可忽视政权

对宗教的支持和推动力量。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印度社会存在着伊斯兰教扩展的广阔空间。印度的种姓制度，使广大低种姓的人深受压迫与贫困之苦，而伊斯兰教倡导“穆斯林皆兄弟”，对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伊斯兰教重视现实生活又追求来世幸福，这就满足了人们现实的要求与未来的希望，成为医治社会弊端的一剂良方。印度的伊斯兰教派，绝大部分是逊尼派，只有一小部分是什叶派。在伊斯兰教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具有许多“印度色彩”，同时因各地语言和民族不同而有若干差异。尽管他们反对种姓，但在不知不觉之中却受到这种社会风气影响，在伊斯兰教内产生一定的等级划分，例如阿什拉夫人属高种姓，而阿尔扎尔人则为低种姓，只是没有印度教那样严格区分罢了。

在印度文化的熏染下，伊斯兰文化艺术发生了显著变化。伊斯兰教大量修建穹隆顶、拱门式建筑，广泛使用几何图案和铭题，出现许多新式建筑，例如带有高塔的清真寺、圆顶形陵墓，与印度原先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但是，由于雇佣印度工匠修建，使用当地建筑材料，在平面布局上采用印度寺庙的布局，因而无形中融合了印度风格，这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尤为显著。不过，这种影响在各地不同，有的以伊斯兰艺术占优势，有的受印度艺术影响较大，因而绍纳福儿式、孟加拉式、比贾普尔式、古吉拉特式都有所不同。在莫卧儿王朝时期，伊斯兰绘画在吸收印度、伊朗和中国画的基础上形成新的风格，壁画在建筑上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肖像画、动物图画和连环画的学派，突破了伊斯兰反对偶像绘画的框框。伊斯兰在传统上不太注重音乐，但受印度风俗和波斯苏菲派影响，音乐也兴盛起来。他们将波斯的“马卡姆”和印度的“兴都尔拉格”结合起来，形成了“耶曼拉格”，有其独特的旋律框架，每种“拉格”都有自己的音阶、音程和特定的旋律片断，借以表达不同的情趣。乐器方

而，创造了七弦琴和手鼓等。随着时代变化，穆斯林妇女戴面纱的日益减少，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妇女增多，一男可娶四妻的风俗也逐渐向一人一妻制靠拢。

伊斯兰教对印度教的冲击是巨大的，它的“国教”地位就使印度教受到很大压抑，而且伊斯兰教宣扬一神教和平等思想都与印度教发生冲突，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关系十分紧张，互不相容。印度教的前身是婆罗门教，它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是种姓制度，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因而印度教仍有它继续存在的社会基础。面对伊斯兰教的挑战和冲击，印度教通过内部改革和外部调适而获得新的生机。从婆罗门教演变为印度教实际上就是一次重大的宗教改革，婆罗门“正统六家”首开其端，通过商羯罗的宗教改革来适应社会的发展，抵抗佛教。在伊斯兰教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从 12 世纪起，印度教又以“虔诚派运动”的形式进行宗教改革，其代表人物有罗摩奴阇、罗摩难陀、伽比尔、纳那格等，目的是保护印度教和克服社会弊端。所谓“虔诚”，就是强调只要对神的信仰一心一意，人人都可得到神的恩宠，得到彻底解脱。它宣扬各种姓“在神的面前一律平等”，反对种姓隔离，虽然没有彻底否定“种姓”，但缓和了种姓之间的对立。它将印度教经典通俗化、教仪简单化，有利于印度教扩大传播。伽比尔还极力主张把“梵我如一”的理论同伊斯兰教苏菲思想结合起来，宣称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是“梵”，向一神教转化，并反对偶像崇拜，提倡“普遍的爱”。经过宗教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种姓制度和社会陋习，缩短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距离，扩大了印度教的群众基础，因而在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中站稳了脚根，并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伊斯兰教的渗透与瓦解，印度教在婚姻上采取种种保护措施。首先，种姓内婚制更加严格，禁止高种姓与低种姓通婚，其结果是低种姓的人多改信伊斯兰教，高种

姓的人坚守印度教并强化种姓制度。为了防止女子与穆斯林通婚，将印度教徒女孩的结婚年龄降至 8—9 岁，甚至提倡“指腹为婚”。为了避免女子与穆斯林产生爱情，杜绝通婚的可能性，在高种姓种中流行戴面纱的习俗，不让别人看见她们的真面孔。严格限制寡妇再婚，宣扬寡妇为大殉葬是一种美德，目的是保证种姓之间血缘不致相混，印度教女子不易与穆斯林通婚。尽管印度教在婚姻上筑起了一道保护墙，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同处在一个国度之内，两种文化之间的渗透与交融仍然不可避免，因而在文化风貌上起了很大变化。在伊斯兰教“印度化”的同时，印度教也不断受到伊斯兰教的濡染。

佛教一开始就以反婆罗门的姿态出现，它面对种姓不平等的残酷现实，提出“四姓平等”的口号，在芸芸众生心中燃起了熊熊的圣火，向天下生灵敞开了精神解脱的大门，为他们探寻一条通往“极乐世界”的道路。公元前 5 世纪，佛教在反婆罗门的历史浪潮中诞生了，在孔雀王朝时期兴盛起来，贵霜王朝进入繁荣时期，在印度盛行十多个世纪，成为反婆罗门教的一面旗帜。在此期间，佛教经历了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上座部佛教）两大教派。在及多王朝的支持下，婆罗门教大肆回潮，又经过宗教改革而演化为印度教。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发展受到很大压力，7 世纪印度佛教度过了它的繁荣期后，不得不与印度教妥协，吸收印度教的某些教义、教仪和民间信仰，于是出现了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咒术、坛场和仪轨为特征的“密宗”。

历史在 8 世纪发生了重大转折，极盛一时的佛教骤然衰落，以致渐渐销声匿迹。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有内因也有外因，既与政治形势有关又与社会变化有关，还有宗教之间以及佛教内部的种种因素。问题的根本在于长期制约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并没有因佛教的创立而动摇，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过程中

反而更加牢固，种姓制度与阶级分化盘根错节，并因农村公社的长期延续而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婆罗门教演变为印度教后，把“法”（宗教规定的道德准则）、“利”（现实的物质利益）、“情欲”与人生的最后“解脱”结合起来，结成了一条物质与精神、现世利益与来世追求的长链，更适合于人生，更易于为人们接受。伊斯兰教传入使佛教遭到致命的打击，这不仅因为它在政治上处于优势，而且因为伊斯兰强调不放弃现实人生而又追求来世幸福，比之佛教要人们放弃人生情欲而追求虚幻的来世更有力量。佛教反对种姓制度而没有实际力量，“四姓平等”的口号很快被伊斯兰的“穆斯林皆兄弟”所取代，它在印度失去了社会基础，因而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夹击下衰萎、消亡，转向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展。印度佛教在 19 世纪后半期虽然有所复兴，但直到现在仍处于弱势，远不如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昌盛，甚至还不如锡克教和耆那教。

印度一直是欧洲人向往的神秘、富饶的地方，新航线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都是为了与印度通商，16 世纪初葡萄牙人便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果阿、达曼、第乌等地建立殖民地。17 世纪前半期，荷兰攻占斯里兰卡，在印度西南海岸建立奎隆、柯钦等据点。到了 17 世纪后半期，英国在孟买、加尔各答建立设防城市，法国也在印度的一些城市建立商馆。18 世纪中叶，英、法在印度争夺剧烈起来，经过 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之后，根据 1763 年双方签订的《巴黎和约》，法国在印度只能保留 5 座不设防的城市。到了 19 世纪，英国加紧对印度的侵略，1894 年吞并旁遮普后，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印度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分为直接统治区和间接统治区，并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掠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1947 年 6 月，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同意印、巴分治，把英属印度的居民按宗教信仰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1950

年 1 月建立印度共和国，1956 年又建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起初，巴基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1972 年东巴基斯坦独立，建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三）中国与地中海的文化交流

地中海与中国相距甚远，中间隔着高山、草原和沙漠，然而自西汉张骞“凿空”以来，世界上两个高文化区就有割不断的联系。中国历史上的所谓“西域”，是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狭义地讲专指新疆的天山南北，广义地讲则包括葱岭以西的西亚和中亚各国。中国通往“西域”的交通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渠道，无论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都以地中海为终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是“西域”，举凡冠以“胡”字或“蕃”字的物品大都来自西上，中国的外来宗教如佛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从“西域”传入，把地中海文明带入中国。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文化也通过这一渠道向西传播，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近代文明兴起后，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1. 沟通中国与地中海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中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康庄大道，它既是中国吸纳外来文明的主要渠道，又是中国文化西传的重要通道，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的名称是国外学者的赞誉，它以“丝绸”为标志，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国际意义。在这条道上，从西上输入的东西很多，其中以香料最为著名，故又称为“香料之路”。在世界文化史上，“丝绸之路”是一条闪闪发光的文化之路，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是国际商路与和平之路。张骞是凿通西域的第一人，自此以后在丝绸

之路上商旅络绎不绝，传教的求法的奔走于这条道上，唐代达于鼎盛。8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取代了波斯人、印度人而获得海上优势，中国与阿拉伯海上交通发展起来，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元代更是盛况空前，不惟海运兴盛，而且进一步拓宽了欧亚大陆的交通。举世瞩目的“郑和下西洋”，其终极目标主要是阿拉伯世界，包括现今的中近东及东非。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大月氏以夹击匈奴，招引西域三十六国“以断匈奴右臂”，曾经到达中亚的大宛、康居和阿姆河、锡尔河一带的大月氏，还有今阿富汗境内的大夏。西汉末年，汉室衰微，无力控制西域，匈奴乘虚而入。东汉建立后，各种政治势力在西域的斗争异常复杂，东汉与西域的联系“三通三绝”。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超率骁勇36人深入西域，经过复杂的外交活动使隔绝60余年的关系重新恢复。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控制西域各国，直到东汉末年。

两汉对西域的经营虽然主要出自政治、军事目的，但却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门户，开辟了“丝绸之路”。这条道路从长安出发，穿行河西走廊，在敦煌分为二道：北道出玉门关至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沿天山北麓西行经龟兹、疏勒等地，越过葱岭进入中亚草原，到达大月氏、康居、奄蔡（今咸海、黑海之间），这大概就是所谓“草原丝绸之路”；南道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北），沿天山南麓西行进入南疆，然后以塔里木河为界分走“北道诸国”和“南道诸国”，经于阗、莎车后越葱岭而达大月氏、安息（今伊朗）、条支（今伊拉克）和大秦（即拜占庭帝国），这便是通往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从于阗经克什米尔有一条通往印度的古道，西汉时拓展为“乌托—罽宾道”。丝绸路上，“使者相望于道”，沿途“设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胡商贩客口款于塞下”，“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当时从西域输入的物产很多，大

都冠以“胡”字，例如胡桃（核桃）、胡蒜（大蒜）、胡荽（芜荽）、胡豆（蚕豆）、胡瓜（黄瓜）、胡麻（大麻）、胡萝卜、胡药等。还有许多稀罕之物，如中亚、西亚的毛毡、毛布和汗血马，大宛的葡萄和苜蓿，大夏的石榴，安息香料等等。胡笳、胡角、胡笛以及箏篥、琵琶、胡舞、幻术之类，也是从西域传来的。这些物质与精神文化产品，中国过去是没有的，自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才源源传入，且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逐渐被吸收、消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它们源于西域而发达于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政治纷乱，但丝绸之路仍未间断。当时，中亚的康居、大宛，西亚的罽宾，印度的犍陀罗，波斯的萨珊王朝，都与中国互通使节。北魏太安元年（445年），萨珊王朝遣使来华，路过新疆，或由海路辗转到达广州，故新疆的高昌城和广东英德南齐墓中发现有萨珊王朝的金币。罗马帝国分裂后，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中国史书上称为“大秦”或“拂菻”、“蒲林”，黄龙五年（226年）有大秦商人到达孙吴的都城建业（今南京），东晋时大秦使者来到建康（今南京），晋哀帝于兴宁元年（363年）遣使回报。在此期间，西亚及中亚的火浣布（石棉布）、琉璃、药材、汗血马等不断流入中国。

隋唐之际西域为突厥控制，唐太宗贞观年间对西域出兵，在龟兹建立安西都护府，统领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唐初，维吾尔族先民回纥内附，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条“参天可汗道”。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灭西突厥，于中亚碎叶川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濠池都护府，皆受安西都护府节制。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又在天山北路增设北庭都护府，从此东突厥衰落。唐玄宗“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据西域及河西走廊，唐朝和西域商人多改道经回纥进行贸易，致使回纥成为东西交通的枢纽，势

力达于中亚。

隋唐时期，西亚出现了四个较大的国家，即波斯、吐火罗、拂林和大食。波斯的萨珊王朝自北魏以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7世纪被大食灭后波斯工卑路斯及其子定居长安，许多波斯人流入中国，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开设波斯商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胡药驰名。吐火罗国在今阿富汗北部，唐初即与中国通商，玄奘取经由此国经过，高宗时封其王为吐火罗叶护、怛坦王，授使持节二十五州诸军职衔，唐玄宗时贡汗血马、异药、玻璃玛瑙等物。拂林即东罗马帝国，贞观十四年（643年）遣使来唐，贡赤玻璃、绿金精等物，自此以后访唐使者不绝，近年来在洛阳发现有东罗马金币。大食即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对中国文明十分向往，故《古兰经》鼓励穆斯林“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当去”。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遣使与唐通好，此后148年间共遣使入唐36次，不少阿拉伯商人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落籍，谓之“驻唐番客”。

唐代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具有很大开放性，充分吸纳外来文明。美国学者谢弗著有一部《唐代的外来文明》，列有许多从外国引进的物产，其中，家畜类的有马、骆驼、绵羊、山羊等9种，野兽类有大象、犀牛、狮子、黑貂、白貂等10余种，飞禽类有孔雀、鸵鸟等5种，毛皮和羽毛类有13种，植物有椰枣树、菩提树等9种，木材有紫檀等4种，食品有葡萄酒等10余种，香料有安息香、苏合香、丁香、玫瑰香水16种，药物有波斯树脂、阿魏等20余种，纺织品有石棉布、越诺布、“朝霞”等14种，颜料有猩猩血、龙血、扁青等11种，矿产有金刚石、密陀僧，宝石有玉、孔雀石等。大量外来物品输入，丰富了中国的物质生活。“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一诗反映了唐人追求外来之物的时髦风尚，夜光杯、葡萄酒、琵琶及宝马都来

自西域。唐代的名马很多，有火食马、大宛马、突厥马及吐火罗的汗血马，唐玄宗把六匹汗血马分别用粟特文命名，谓之“六骏”。珍贵的犬类有波斯犬、拂林狗、罗马犬，还有一种“两头犬”。永徽元年（650年），吐火罗贡一只鸵鸟，使人感到惊奇，故唐高宗墓前特为之立起一尊鸵鸟石像。外国传来的“羽衣”更富有艺术魅力，穿上这样的服装有如仙女一般，故有“霓裳羽衣曲”之作。郁金香是从国外引进的，原产希腊和西西里，故史书上有“伽毗国献郁金香”的记载。“菠菜”是由波斯传来，“安息香”是安息国的特产。玻璃当时被视为宝石，有来自罽宾的“白玻璃”、来自拔汗那的“碧玻璃”、来自吐火罗的“红玻璃”和来自拜占庭的“赤玻璃”。以上所举，只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唐代从外国输入的物品不胜枚举。

唐代中叶出现一大转折，陆上丝绸之路极盛而衰，海上丝绸之路渐次兴起。导致这一变化的政治原因是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与唐朝在中亚发生坦罗斯战争。陆上交通受阻，海上贸易却因东部丝绸业、瓷业、造船业的推动而兴盛起来。唐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蚕桑大盛，除中原的绢帛而外，江浙丝织品种类繁多，有充足的丝绸可供国际市场，而东南亚、南亚各国对丝绸的需求量颇大，且自汉唐以来已有船只航行于南海。瓷器在唐代有重大发展，邢窑的白瓷“类银”、“类雪”，越窑的青瓷“夺得千峰翠色”，景德镇的瓷器有“假玉器”之称，还出现了“唐三彩”，这些瓷器产地偏东近海，若从陆路长途跋涉外运必多损耗，改走海路更为便捷。唐代沿海港口多有造船工场，能制造可载万石的“俞发”海船和能乘六七百人的“巷舶”，有条件航行南海，自广州经南洋群岛到印度。与此同时，阿拉伯人控制了海上贸易，从阿拉伯海、波斯湾出印度洋，经印度辗转来到中国。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广造奇器异巧以进”。

宋代北方先后建立辽、西夏、金及蒙古政权，战争频仍，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更加重视海上贸易，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地设立提举市舶司。海上贸易以丝绸为主，海外之物皆“以易金、帛”，东南地区“茧箔山立，繰车之声连葢相闻”，四川也出现了“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的盛况。宋代瓷业更盛，有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县）、汝窑（河南临汝）、定窑（河北曲阳）、哥窑（浙江龙泉）等五人名窑，以后又在景德镇设官窑，因而瓷器也渐成为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品。宋代的船舶体积大，载重多，航海技术先进，船可到达大食。

《岭外代答》记载：“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今爪哇），其次三佛齐国（苏门答腊），其次及诸国。三佛齐者，诸国海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

13世纪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蒙古军三次西征，建立了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与元朝中央保持藩属关系。钦察汗国不仅占据中亚，还控制莫斯科大公国和基辅公国，俄国称之为“金帐汗国”。伊儿汗国直抵地中海东岸，灭了波斯和大食，使地中海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打通欧亚大陆的同时，海外贸易进一步拓展，先在泉州和杭州设立市舶司，后又增设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温州和广州等司，在市舶司的控制下实行“官本船”制度，具有专卖性质。据《马可·波罗行记》、《伊本·白图泰游记》等书记载，海上交通路线大体同于宋代，但也增加了一些新航线，船可到达西亚和东非。船分三等，“大船有三帆以至十二帆”，“一只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

15世纪是世界的“大航海时代”，在这个世纪之初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而在世纪之末则出现了达·伽马开辟新航线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改变了世界的格局。郑和下西洋始于明

永乐三年（1405年），于宣德八年（1433年）完成第七次航行回国。在28年中，郑和率船百余艘，载万余人，行程十万余里，抵达三十余国，在世界航海史上树起一座丰碑。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到达的地方，在南洋群岛有苏门答腊、旧港、爪哇、南宇里（均在今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有占城（越南南部），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刺加（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在印度半岛有榜葛刺（孟加拉）、古里（印度西海岸）、柯枝、琐里、加异勒等地，还有锡兰山（斯里兰卡）。值得注意的是，郑和的船队曾到达东非的木冈都束、卜刺哇、竹步（索马里）、麻林（肯尼亚），到达阿拉伯半岛的忽鲁谟斯、祖怯儿、阿丹，最后到达天方（麦加城）。

郑和下西洋的动因，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中国，而且偏重政治，强调“宣扬国威”。其实，它是由政治、经济、文化诸种原因共同促成。从政治上讲，当时亚洲有两大政治势力，东端是大明王朝，西端则是伊斯兰建立的国家，在西亚有奥斯曼帝国和波斯的法沙维王朝，在南亚有莫卧儿帝国，而且元代大批“色目人”进入中国后在明代形成“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西北民族纷纷皈依了伊斯兰教，有必要通过外交途径稳定政治局势。佛教在印度衰落后中心转到中国，形成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而东南亚各国及缅甸、斯里兰卡又多信奉佛教，同属于佛教文化圈。在此情况下，通过宗教进行和平外交是最明智的选择，而郑和就是一个最恰当的人选，他本身是穆斯林，又尊崇佛教的佛、法、僧三宝，被称为“三宝太监”。这里并不排斥“宣扬国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南京《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载：“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蕃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

从经济方面着眼，郑和下西洋是唐宋以来海上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宽。通过七次航行，以中

国—印度—阿拉伯为主线，发展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船队带去许多物品，以丝绸和瓷器为大宗。支持长达 28 年的航海活动，没有雄厚的国力是不可能的。明初经过休养生息，到明成祖时国势强盛，农业、手工业及对外贸易都有较大发展。造船极为发达，下西洋前命福建都司造船 137 艘，命南京都司造船 50 艘，又命浙江都司造船 1180 艘。船分宝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五等，以宝船最大，船长 44.4 丈，宽 18 丈，有 9 个桅杆，共计 36 艘。造巨船航行海外诸国，从京师到各地转输供应各种物品资费以万万计。

郑和下西洋的伟大意义不亚于张骞通西域，它从国外换回了大批海外异物，据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记载，从海外各国带回的珍宝都是中国过去没有的，例如：金莲宝象国的海镜、大火珠、象牙簪，宾童龙国的龙眼杯、凤尾扇、珊瑚枕，罗斛国的白象、白狮、白鼠、白龟，渤淋国的神鹿、鹤顶鸟、火鸡，满刺加国的白鹿、红猴，苏门答腊的金麦、银米、水珠、螺子黛、千年枣，百达国的夜光壁，南渤里国的狡狴，刺撒国的鲸睛、千里驹，忽鲁谟斯国的狮子、麒麟、草上飞，阿丹国的猫眼石、白鸵鸟，天方国的天方图、四景画、木难珠、金刚石等等。此外，还有许多香料、药物、胡椒、大风子油、蔷薇露、苏木、吉贝、火蚕绵、白砂糖、香稻、花毯、十样锦等，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通过七次航行，中国人走向海外，看见广袤的大千世界，知道“肇域四海，辐员之广”，在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国家。在此期间，随从郑和下西洋的人记述了许多异域风情，著名的如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蕃国志》等。自郑和下西洋以来，东南沿海的人民不断出海，几百年间，南洋华侨剧增，特别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地，致使东南亚成为世界上海外华人分布最广的区域。与此同

时，中国文化在海外也广为传播，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2. 从“西域”传入中国的宗教

中国的宗教，除了道教是土生土长的而外，其余的都是外来宗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西天”最富有神秘感，各种天神地祇都从西方而来。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但它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而且对佛教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犍陀罗就靠近地中海。中国与波斯交往密切，从波斯传来的不仅有祆教和摩尼教，还有属于基督教东部教派的景教。自唐代以来，基督教几次传入中国，绵延千年之久。伊斯兰教兴起后，从陆路和海路两个方向传入中国，有 10 个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文化，通过这些宗教，把地中海文化和印度文化带到中国，经过长期交融而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在“第三次结集”之后开始向外传播，它传入中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汉哀帝元年（公元前 2 年），至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从宗教的角度考察，中国最早的人为宗教当推佛教，在它传入中国以后近两百年才出现道教。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其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延续时间之长，远远超过道教和其他宗教。在三大语系佛教之中，汉语系佛教（即汉传佛教）和藏语系佛教（即藏传佛教）都形成于中国，南传的巴利语佛教（即小乘佛教）在中国也有传播，而且在 8 世纪印度佛教衰落以后，中心转向中国。

大乘佛教传入中国，与汉族社会和汉文化结合形成了汉传佛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译传、创造、融合三大阶段，在自身日益“中国化”的同时，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来自西土，传入后首先经过一段艰苦的译传阶段，在东汉及魏晋南北朝长达 580 年的时间中，将梵文写成的佛经译成汉文，并因传入的经文和僧众的理解不同

而形成了“般若六家七宗”。隋唐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出现了儒、道、佛“三家鼎立”的局面，佛教发展达于鼎盛，形成了天台、三论、慈恩、华严及律宗、禅宗、净土、密宗等许多宗派。经过 900 多年的流传，佛教不断与儒、道接触、碰撞、渗透、交融，在宋、元、明、清四代进入融合阶段，出现了“三教圆融”的局面。经过历史的选择，佛教的一些宗派逐渐消融、衰败，与儒、道充分交融的禅宗和与中国民俗紧密结合的净土发展起来，并出现“禅净双修”的趋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印度和西域高僧不断前来传法，中国僧人如三国时的朱士行、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等先后到西土求法，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交流热潮。

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印度文化，它以佛教为先导，把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同时把印度人的智慧带到中国，与中国人的智慧碰撞出现耀眼的火花。佛教的传入改变了中国哲学的构架，使“独尊儒术”的“一元”结构变为儒、道、佛鼎足而三的“多元”结构，进而造成儒、道、佛三家互补的新格局。印度“因明学”传入后，逐渐形成中、印合璧的“东方逻辑”。在佛经的翻译过程中，引入了大量外来词，推动了音韵的发展。佛教对中国的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六朝的志怪小说，唐代的传奇和变文，宋代的话本、鼓子词和诸宫调，元杂剧和明清神怪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佛经的濡染，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禅宗的影响。中国的绘画、雕塑受佛教艺术至深，引以自豪的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都是佛教艺术，历史上著名的画家莫不受佛教艺术的熏染。在中国古建筑中佛式建筑占有显著地位，印度佛塔移植到中国后演变为多种塔式建筑。印度的天文、历法、医学也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唐代的《大衍历》就是一例。佛教对中国民俗的影响广泛而且深刻，许多佛教文化都隐含在民俗之中。

佛教密宗传入西藏后，与藏文化结合而产生藏传佛教，即通常所说的喇嘛教。它经过“前宏期”之后，从10世纪末进入了“后宏期”，形成了四大教派，14世纪宗喀巴“宗教改革”后“格鲁派”（即黄教）成为最大的教派。佛教与藏族社会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特征。由于全民信教和政治力量的推动，整个社会生活完全“佛化”。藏文源于梵文，对藏文化的形成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明学”在西藏传承下来，其影响超过汉族地区。藏历既受汉历影响，又受印度历法影响。藏医独树一帜，主要是受益于印度医学。藏传佛教的寺庙建筑和藏式佛像都与汉传佛教不同，还发展了“唐卡”、壁画、酥油花等佛教艺术。

祆教又称拜火教或火祆教，也就是产生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萨珊王朝建立后尊为国教。先是在中亚一带风行，大约在北魏时期由粟特商人传到天山南北的突厥人中，盛行于疏勒、于阗、高昌等地，故《魏书》有“俗祀天神（祆神）”的记载。隋初通过河西走廊传入内地，故在伊州等地设立管理祆教的官“萨宝”。唐代在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都建有祆祠，号“大秦寺”或“波斯寺”。宋敏求《长安志》说：“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祀祆神。”武宗毁佛时，祆教亦在禁止之列，但在中原衰落后仍继续在新疆游牧民族中传播，《旧五代史》说：“于阗，其俗好事祆神。”

从波斯传来的还有摩尼教，它号召人们争取光明，战胜黑暗。创始人摩尼受到迫害后，教徒流落国外，在中亚、小亚细亚、北非等地建立摩尼教团，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有波斯商人传入内地，开元年间在泉州等地设摩尼教堂。摩尼教人善观天象，《唐会要》摩尼寺条载：“贞元十五年（799年）以久旱，令摩尼教祈雨。”天宝年间成为回鹘国教，《九姓回鹘可汗碑》记有此事。安史之乱后因回鹘助唐再次传入内地，大历二年（768年）在长安建寺，赐额“大云光明之寺”，以后又在荆州、扬州、越

州“罽人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白居易有诗记云：“静览苏邻传，摩尼道可惊，二宗陈寂默，五佛继光明。”及至武宗毁佛，摩尼教亦受牵连，会昌三年（842年）“敕天下摩尼教寺并废入宫”，死者大半，被流放到西域的仍然继续传教。摩尼教虽遭禁绝，但其“光明战胜黑暗”的教义始终鼓舞受压迫、受奴役的人民，于是以秘密组织形式存在于民间，梁贞明六年（920年）陈州的“母己起义”就是由摩尼教发动。其后，摩尼教暗中向东南沿海转移，流行于闽浙一带民间，称为“明教会”。宋代的明教或明尊教即摩尼教，在民间已形成一股潜在的反抗势力，故朝廷下令取缔，方腊起义就是以明教为号召。元代摩尼教与由佛教分化出来的白云宗、白莲宗结合，称为白莲教，信奉弥勒佛，以“光明战胜黑暗”鼓励人民反抗。他们起初衣着尚白，后受净上宗影响，认为“白色为凶，红色为吉”，于是披红巾、穿赭服，演变为元末的“红巾军”。在元末农民起义中，他们公开宣称“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天遣摩兵（指摩尼）杀不平，世上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在义军看来，“明王”和“弥勒”是他们期待的救世主，故刘福通拥戴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以后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表示“日月重开，明王出世”，由此可见，摩尼教在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总以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是近代的事，其实，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明清之际的“耶稣会”都属于基督教，迄今已有 1300 多年历史。17 世纪以前无人知道基督教在唐代传入中国，直到明朝天启三年（1623 年）在西安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才揭开这一历史。景教是基督教东部教派的一支，被正统派斥为“异端”，称为叙利亚教会或波斯教会，实际上就是“聂斯托利派”。因在拜占庭帝国遭到排斥而转入波斯，波斯国王承认它是合法的教派，建立独

立教会，与东正教断绝关系。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教会迁往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于是在波斯、叙利亚、中亚、印度及中国建立主教区，在中国称为“景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用叙利亚文刻的，上端立有十字架，碑额上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序”等字，序文首叙基督教教义，次序唐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元帝支持景教的功德，并署有 70 名传教士的名字。此碑发现后 300 年，又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了景教的 7 件文献，证明景教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 年）即传入中国，历时 250 年，唐武宗以后才销声匿迹。当时在长安、洛阳、灵武、成都、扬州等地都建有景教寺。景教传教手段主要是取得皇帝支持，但因它没有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结合，仍按西方传教方式，且使用难识的叙利亚文，所以在民间流传不广，故穆宗时所立的《重岩寺碑序》说：“合天下三夷寺（指景教、祆教、摩尼教），不足吾释氏一小邑之数”，所以，当它失去武宗皇帝的支持后便衰落不堪。不过，景教在内地虽然被逐，但在边疆并未绝迹，仍在维吾尔、吉尔吉斯、蒙古、契丹等部落中传播，11 世纪以后又卷土重来。

元朝建立后对各种宗教都很宽容，在景教复兴的同时又由罗马天主教皇派来了方济各会（即法兰西教会或小兄弟会），因其同属耶稣基督，蒙古人把它们统称为“也里可温”，意为信奉上帝的人。蒙古贵族中多有信奉景教的人，景教徒马薛里吉思为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时，曾在镇江建有大兴国寺、云山寺和聚明山寺，以后又修建杭州大普兴寺、丹徒四溟安寺、黄山高安寺、镇江甘泉寺等。据法国人卢白鲁克《东行记》载，景教共有 25 个主教区，其中 4 个在中国，主教堂设在大同，喀什葛尔（今新疆喀什）、大都（今北京）和甘州（今甘肃张掖）。都主教马聂斯托利驻大都，奉伊儿汗国大汗之命出使欧洲，拜见过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尼斯二世、法兰西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罗马

教皇尼古拉四世，成为中国到欧洲最早的使者。景教在元代盛行一时，其教徒多是波斯、叙利亚商人，“雄于资财”，“好放债收重利”，故“教堂皆整齐华丽”。这一时期景教的遗迹有：房山县的十字寺遗址，河北涿县琉璃河山中的两块叙利亚文十字碑，张家口石柱梁的三块十字墓碑，扬州三座景教堂，此外，在温州、泉州、昆明都有景教遗物。

与此同时，天主教方济各会也来中国传教，目的是想在东方建立一个强大的天主教国家，并与景教对抗。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约翰·孟高维诺以教皇特使的身份来到大都，建立第一所教堂，以后又在太汗宫门前建教堂一所，收养幼童 150 人组织唱歌队，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了对付景教，争取其教徒改宗天主教，按“正统”宣传教义，用拉丁文、波斯文、叙利亚文译注《圣经》和诗篇。元顺帝时派泉州主教安德鲁率 16 人前往罗马，罗马教皇派马黎诺里等 4 人作专使来中国，但不久罗马教廷分裂，而元朝也已薄西山，天主教也随元朝的覆灭在中国消逝。尽管如此，中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在此七八十年间进入高潮，使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欧洲人向往中国。至元二十一年（1275 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随父亲尼可罗·马可及叔父来中国，受到忽必烈的欢迎，很快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在朝廷做了官，因常奉命巡视各地，了解许多实情，回国后将其见闻写成了《马可·波罗行记》。马可·波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他的《行记》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向欧洲展示了奇异的东方世界，引起了欧洲人的冲动与追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达·伽马开辟新航线都是受了它的吸引。此后，佛罗伦萨商人皮果罗提写了一本《商业手册》介绍中国，意大利传教士鄂多力克写了一本《真福和德里传》，马黎诺里教士将其在中国的见闻写成了《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

“也里可温”在元代虽备受尊重，在朝廷的支持下，景教在全国设有主教堂 72 所，天主教在大都和泉州设立教区，但因没有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结合始终未能扎下根来。到了 16 世纪，由于新航线的开通，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以“教皇宗座钦使”的名义派人到东方传教，经印度到达中国，1557 年占据澳门后便以此为据点向中国传教，主要教派是耶稣会。奠定在华传教基础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以学习中国文化和展示西方异物的方式结交官员和士绅，语言文字、饮食起居全盘中国化，并潜心研读儒家经典，将《四书》译成拉丁文，被称为“西儒”。他与上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等交往密切，向他们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等书，他所编的《坤舆万国全图》在中国刊印，还翻译了《勾股义》、《圆容较义》、《西字奇迹》、《西琴曲意》等书，成为在中国系统传播西方文化的第一人。率先学习西学并做出成就的是徐光启，他主持历局聘请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等耶稣会士参加编修《崇祯历书》，在中国历法史上引起一次大的变革。清初，汤若望将此历书献给顺治皇帝，下令颁行天下，定名《时宪历》。徐光启还编著了《农政全书》，总结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经验，引进西洋水法，介绍了由国外传入的番薯、玉米、烟草等农作物。明亡以后，在北方的耶稣会上以汤若望为首归附清朝，在南方的传教士毕方济等则支持南明王朝。汤若望翻译《火攻挈要》，协助清军制造战炮，呈进所制浑天星球、地平日晷、窥远镜、舆地屏图，被任为钦天监。继后，比利时人南怀仁任钦天监，制造了大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等天文仪器，又著《新制灵台仪像志图解》，督造西洋大炮 440 门。康熙六十年（1721 年）梅骞成等人汇编《数理精蕴》53 卷，是一部介绍西方数学的基础读本。耶稣会稍后来中国的

还有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方济各会天启间在台湾鸡笼（今基隆）、淡水设立教堂，多明我会在西班牙支持下由菲律宾向中国传教。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各国在中国扩大传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新派在各地传播开来。

从“西域”传来的宗教，伊斯兰教占有重要地位，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柯尔克孜、东乡、撒拉、塔吉克、乌孜别克、保安、塔塔尔等 10 个民族都信奉这一宗教，约占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它最初传入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唐代永徽二年（651 年），绵延将近 10 个世纪。传播路线分为东、西两个方向，大抵是沿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以陆路为主。在 10 个伊斯兰民族中，回族等 5 个民族的形成与西域人口东迁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密切相关，维吾尔等 5 个民族则是由其他宗教改信伊斯兰教。

回族的起源可上溯至唐代的“驻唐蕃客”，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阿拉伯人比例增大，且在广州、泉州、扬州、洛阳、长安等地建立“蕃坊”（即留居地），广州怀圣寺和光塔、泉州清净寺、扬州仙鹤寺都是宋代所建。元代是回族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回回遍天下”的局面。蒙古三次西征，建立了四大汗国，灭亡了阿拉伯帝国，将西亚、中亚的穆斯林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为了灭金、夏和统一中国，在西亚和中亚征调大批军队和工匠，被称为“色目人”，其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他们随军分驻全国各地，或做官或为民，有为数众多的士兵、工匠和商人，大都信奉伊斯兰教，在各地建立清真寺。据河北正定《重建礼拜寺记》说：“近而京师，外而诸路，其寺万余，俱面向以行拜天之礼。”明朝建立以后，许多穆斯林受到重用，如大将常遇春、胡大海、汤和、沐英、蓝玉等，并设回回司天监翻译《回回历》，为清真寺题赐匾额。在称呼上不再沿用“大食法”、“大食教”之类名

称，把伊斯兰教与“回回人”联系起来，称为“回回教”或“回回教门”。由于在政策上受到保护，先后有 70 多批回回移入中国，他们与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了以伊斯兰教为共同信仰的民族，故学者认为，伊斯兰教“显著于元而实兴于明”。由于回族分散在全国各地与汉族杂居，普遍使用汉语，使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充分交融，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学通四教”（即伊斯兰和儒、道、佛）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体现出伊斯兰教的中国风格。回族的伊斯兰教基本属逊尼派，并结合中国社会形成格底目、伊赫瓦尼、西道堂三派和“四大门宦”。类似回族形成的民族，有甘肃的东乡族和保安族，还有青海的撒拉族和新疆的塔吉克族。

新疆地当西域的要冲，西来的宗教都在这一地区传播，原先多流行佛教及祆教、摩尼教和景教。自伊斯兰教兴起以后，由于新疆地接西亚和中亚，伊斯兰教渐渐传入，特别是在帖木儿帝国和察合台汗国的推动下，伊斯兰教逐步取代其他宗教，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孜别克、乌孜别克和塔培尔等族都先后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民族在语言上均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伊斯兰文化与突厥文化交融是一大特征，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深受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影响。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派极其复杂，既有逊尼派又有什叶派，还分化出若干支派，如伊禅派、瓦哈比派、十二玛日派等等。由于全民信教，尽管各民族生活习惯上有某些差异，但整个社会生活都伊斯兰化了，包括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婚姻、丧葬、礼仪及饮食习惯等等。

各种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地中海和印度文明，经过长期接触、碰撞、交融，纳入中国文化体系，使中国文化成为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中国文化的生命活力就在于内外文化交融，这正是它能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线的重要原因。

3. 中国文化的西传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地中海文化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同样，中国文化也不断西传，通过地中海而影响世界。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算最古老。当埃及人在尼罗河畔修建起金字塔的时候，中国尚处在“三皇五帝”时代。中国的甲骨文，即使是从商汤建国算起，比之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可能要晚千余年。印度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5 世纪，公元前 2 年传入中国，在此两百年后中国才产生道教。古希腊最辉煌的时代，大致和中国的春秋战国差不多。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公元前 221 年，在此之前 300 多年地中海上已出现地跨欧亚的波斯帝国，此后又出现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然而，埃及和巴比伦都灭亡了，印度也衰落不堪，光彩一世的希腊、罗马也随着历史浪潮而消逝，惟有中国，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线，至今巍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简直是天大的奇迹。中国文化是一座神秘的殿堂，它博大精深，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在古代世界，中国和地中海一东一西，光辉交映，影响人类文明的进程。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往往与外国人不同，中国人偏爱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而对于科学技术并不那么重视。外国人恰好相反，他们的视线主要集中在科技上，这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文化取向有关，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语言文字的障碍难以深入意识形态。中国人对自己祖先的发明创造了解不甚深入，倒是外国人“旁观者清”，给予极高的评价。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以毕生精力潜心研究，在搜集大量资料、认真研究、反复比较的基础上，写成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至少在文艺复兴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美国记者罗伯特·坦普尔受到这种启发，从《中国科技史》中选出了在时间上或科学内

容上中国居世界第一的 100 个事例，以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写成了一本向世界介绍中国发明创造的书，题为《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或译作《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他在《西方受惠于中国》一文中，写道：“迄今为止尚未披露的最大历史秘密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近代世界’原来是中国和西方成分的极好结合。‘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然而却鲜为人知。”事实上中国对人类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物质文明和科技，以此构成了中国文化西传的主线条。

中国文化引起世界关注的首先是丝绸，因为它光洁柔软、富有弹性，穿在身上轻凉透明、异常华美，所以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稀世宝物，于是争相运销，把地中海卷入国际丝绸贸易市场，从而成为驱动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中国向来“以农桑为立国之本”，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丝的国家，西安半坡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已发现丝绸的痕迹。《诗经》中有“氓之蚩蚩，抱布贸丝”之句，说明殷周时代丝绸已经进入市场。春秋以降，“齐纨鲁缟”颇负盛名，西汉则有绀、绀、绀罗、纨锦，所以张骞通西域后丝绸即行销国外。丝绸中以绮为极品，西业各国和印度都称中国为“产绮之国”。古希腊人称中国为“赛利斯”(seres)，意思也是“产丝之国”。中国丝绸最先运到波斯，所以最早提到“赛利斯”的是公元前 416—前 394 年在波斯宫廷充当医生的希腊人泰西阿斯。公元 1 世纪，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博物志》中作了如下描述：赛利斯国以树林中盛产细丝而闻名，丝是灰色的，悬垂于树上，赛利斯人把它采集后放在水中浸湿，由妇女加以梳理，再精织成美丽的绮。看来，他们当时对丝绸生产还一无所知，误以为丝长在树上，然而，正是这种神秘感使他们对中国神往。公元 6 世纪的西方文献中有了丝绸西传的记录，米勒《希腊文历史片断》中写道：“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某一位波斯

人向拜占庭人指出了孵化蚕虫的办法。在此之前的任何一名拜占庭人都不懂得这种做法。这名波斯人自赛利斯国中返回，把这些蚕丝卵藏在其手杖的空心中，并成功地将之平安无恙地携往拜占庭。开春时，他将蚕卵放在桑叶上，桑叶形成了它们的自然食物。蚕虫诞生、生长并完成了全部工序。后来，当查士丁纪向突厥人出示拜占庭出产的蚕虫和丝绸时，突厥人对此表现得惊呆了。”又有科斯马赫·因迪科普莱斯特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载：“本处所说的地区完全位于左侧（指东方），以至于使大捆的丝绸在相继经过位于大地内陆的许多民族之手，以后便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波斯帝国。因为把秦尼扎与波斯分开的道路经陆路要比海路短得多，所以才有许多丝绸存在波斯。”中国—阿拉伯航线开通后，丝绸又从海上运销阿拉伯和地中海。丝绸牵动了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因而“丝绸之路”长久地成为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光亮线。

瓷器的发明权属于中国，在海外享有盛誉。汉代开始发明铅釉技术，东汉末年完成了由原始瓷器向青瓷的过渡，唐宋时青瓷发展进入高峰，越窑的秘色瓷有“九秋雨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誉，柴窑的“雨过天青色”、耀州窑的“姜黄”、钧窑的“钧红”和“钧紫”、龙泉窑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都很出色。白瓷始于南北朝，它为影青、青花瓷、釉里红、斗彩、五彩、粉彩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唐代邢窑的白瓷“如银似雪，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宋代定窑的“象牙白”和景德镇窑的“影青”都很名贵。元明以来青花瓷异军突起，彩釉中的“釉里红”、“祭红”、“孔雀绿”、“娇黄”、“素三彩”、“郎窑红”、“美人醉”等皆称精品。瓷器传入地中海大约是在唐代中期海运开通以后，以郑和下西洋为其高潮。在中国瓷器风靡欧洲之时，欧洲人心目中的瓷器与中国简直就是一回事，故英语称瓷器为 China，实际上是以瓷器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法国小说《牧羊女司泰来》

的男主人公雪拉同常戴一顶青斗笠，在人们思想上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当青瓷在法国风行后，人们便把青瓷叫做“雪拉同”。大概在 16 世纪以前输入欧洲的瓷器有限，大都通过阿拉伯人转手，因而在欧洲格外珍贵。据说，撒克逊王奥古斯特二世曾用 600 名御林军从普鲁士国王威廉手中换取 127 件中国瓷器，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闻。1604 年，荷兰海军袭击葡萄牙船“卡特丽娜”号，从船中掠取了 60 吨中国瓷器，运到阿姆斯特丹拍卖时使整个欧洲轰动。瓷器只不过是走向世界的产品之一，使外国人感兴趣的的东西还有许多，例如：“中国翻筋斗者”（不倒翁）、“中国墨水”（墨）、“中国石”（白铜）、“中国白色”（铅白）、“中国盐”（硝酸钾）、“中国陀螺”（儿童玩具）、“飞唐”，（唐人的风筝）、“唐图”（七巧板）之类。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世界上 660 多种主要栽培植物中，起源于中国的就有 136 种，占总数的 20% 以上，居世界第一。农作物的传播带有自发性，它不受国界和政治因素限制，也不因语言文字隔绝而受影响，无声无息地传到其他国家。中国是茶的故乡，茶的资源品种丰富，栽培历史悠久，种植面积广泛，唐代即有《茶经》。据考，茶 9 世纪传入日本，16 世纪传入欧洲，17 世纪传入俄国，18 世纪传入印度。大豆原产中国，传到国外是近 200 多年的事，约在 100 年前才传入美国。地中海的小米（谷子）和高粱是从中国传去的，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一书中写道：“谷子和高粱是古代中国大陆上的农作物，通过丝绸之路而先传至波斯，后传到罗马。在罗马，仅仅在儒略·恺撒执政时期才知道了这种作物。”他还详细考证了这两种作物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德语名称，说明其演变由来。有些农作物外传的情况目前虽不很清楚，但从名称上可知是从中国传去的，譬如：英国人称苧麻为“中国草”，称豇豆为“中国豆”，称白腊为“中国腊”，称楝树为“中国树”，称月季花为

“中国蔷薇”，称桐油为“中国木本油”，称青菜为“中国菜”，如此等等。

外国人既然羡慕中国物产，势必要刻意加以仿造或引进，于是中国科技也伴随着物产而走向世界。《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列举了许多科学技术，例如农业方面的铁犁等 5 项，天文和制图方面有太阳黑子等 5 项，工程技术有铸铁、蒸汽机原理等 18 项，口川及文化用品技术有造纸、印刷术、瓷器等 21 项，另有医学 7 项、数学 8 项、磁学 4 项、物理学 7 项、交通 13 项，声学 5 项以及火药、火箭等 8 项。有关资料表明，链斗水车 1672 年传入欧洲，轮碾磨 1607 年传入欧洲，冶金鼓风机传入欧洲的时间是 1200 年，旋转风扇是 1566 年，活塞风箱是 1500 年，手拉织机是 400 年，弩机是 1100 年，陀螺是 1700 年，风筝是 1589 年，火药是 1200 年，指南针是 1190 年，造纸术是 1140 年，活字印刷是 1440 年……。在众多的科学技术中，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最为重要，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四大发明”。

1990 年，在比利时马尔梅迪举行的国际造纸历史协会第二十届大会上，与会学者一致公认中国是纸的发明国，蔡伦是造纸术的伟大发明家。纸是文化能够发达的一个重要条件，有了价廉物美、轻便易写的纸，便可做大文章，积累知识、传播信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比把字刻在泥板上或写在莎草纸、羊皮纸上要方便得多。造纸术向西传播，纯属偶然。唐玄宗天宝十年（751 年），唐朝与大食（阿拉伯）交战，唐将高仙芝全军覆没，被俘的士兵中，有几名原是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将造纸法告诉了阿拉伯人，于是在撒马尔罕建起了造纸厂。794 年，又在阿拉伯首都巴格达建立了更大规模的造纸厂，从 9 世纪起，在阿拉伯半岛的蒂哈马和叙利亚的大马上革先后办起了纸厂。大马上革纸在好几个世纪都是出口欧洲的主要商品，所以人们都误以为纸是阿拉伯人发明的，直到 1150 年

才证明这种造纸技术来自中国。1150年，在阿拉伯帝国统治下的西班牙开始造纸，被认为是欧洲的第一个造纸厂。1276年，在意大利的蒙第法诺建立造纸厂，以后发展为欧洲的造纸基地。1320年，德国的科隆、梅因兹也有了造纸厂。大约在14世纪以后才传到法国、奥地利、俄国、英国及北欧，美国造纸始于1690年的费城纸厂。造纸术传入欧洲，正是文艺复兴时期，它有力地推动这一新文化的发展。纸对现代文明的推动是巨大的，大量的图书、报刊、印刷品都需要用纸，纸币取代了金属货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货物包装、建筑及生活用纸的需求量也更大。纸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全世界都受益于中国的造纸技术。

与纸相关的是印刷术，它是人类社会的“文明之母”，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中国的印刷术经历了雕板印刷、活字印刷两个阶段，北宋年间布衣毕昇创造的活字印刷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印刷术也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的，时间大约是在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期间。印刷术在欧洲的发展是受了纸牌的推动，现发现最早的印刷品是1423年印刷的圣克利斯多夫像，因为纸牌在欧洲风行，意大利、德国、荷兰先后成为印刷基地，以威尼斯的雕板印刷最为发达。活字印刷西传是以中亚为中介，经波斯传入欧洲，这与元朝的纸钞流传有很大关系。蒙古军横扫欧陆不久，德国兴起了活字印刷，1454年印刷了欧洲第一部拉丁文《圣经》。欧洲在14—15世纪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扩大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成果，对往后世界文化的传播意义更为重大。

火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最早的记载是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丹经》，谓之“伏硫磺法”。不过，火药发明以后，中国人很少把它用于生产，而是用来制造爆竹、焰火以供娱乐。到了宋

代，火药被用作“火器”，出现了引火球、蒺藜火球、毒药火球以及霹雳枪、震天雷、突火枪等杀伤力较大的火器。元代武功极盛，发明了“回回炮”和“西域炮”。火药西传与火器有关，主要是通过阿拉伯人。当火药传到阿拉伯时，人们感到新奇，因看上去像雪，故称“巴鲁得”，意为“中国雪”。后来传到波斯，他们还以为是盐，于是又有“中国盐”的名称。蒙古军西征时使用了火器，能在远距离发射，击中后一片火海，使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人为震惊，把它称为“契丹火枪”，而将其枪头称为“契丹火箭”。经过血的教训，他们开始研究火药配置，14世纪初开始制造“火筒”、“突火枪”及两种威力更大的“马达发”（火器）。那时欧洲人还不知道火器，是在与阿拉伯人作战时吃了苦头才努力学习制造枪炮。据西方文献记载，意大利始于1326年，法国始于1338年，英国始于1340年，德国始于1345年，俄国始于1382年，从此开始了新式战争。枪炮对摧毁欧洲中世纪骑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德克·海德所说：“如果没有火药，世界也许会少受点痛苦，但另一方面，中世纪欧洲那些穿戴盔甲的骑士们可能仍然在他们有护城河围绕的城堡里称王称霸，不可一世，而我们的社会可能仍然处于封建的奴役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讲，火药乃是欧洲社会的“催命符”和预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助产婆”。最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中国发明的火药、火器，后来竟然成了资本主义列强攻打中国的“洋枪洋炮”。然而，火药的伟大价值，既不是用于制造爆竹和焰火，也不是用来制造杀人的枪炮，而在于开启了近代文明。倘若没有火药，就不可能大规模地开采矿山，不可能大量修筑铁路、公路，更不可能开凿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许多艰巨的工程都难以完成。

早在两千年前中国人就认识了天然磁石具有指示南北方向的特性，创造了“司南”。到了宋代则出现指南针、指南鱼和指南龟，并将指南针运用在航海上。朱或《萍洲可谈》说：“舟师识

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阿拉伯人使用指南针航行是在 13 世纪，最早的记载是 1230 年。自此以后，世界航海事业突飞猛进，在 15 世纪初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这个世纪之末出现了地理大发现，所以马克思说“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从指南针得到的启示，人们去研究机械运动与光、电、磁的关系，为电机制造作了宝贵指示，指南针的运用，给世界文明带来了新的福音。

“四大发明”的伟大意义已被人们公认，但许多看去是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儿”却蕴藏着深奥的科学原理，包含着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它们的科学价值直到近代才被渐渐认识。譬如独轮车，俗称鸡公车，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很落后的交通工具，可是，它却开辟了人类“车子化”的道路，往后的牛车、马车、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都沿着这条道路发展。风筝在中国放了几千年，谁也没有把它看成是什么“发明”，可是它却给人一种伟大的启示，后来发明了滑翔机和现代的各种飞机，成为航空的始祖。中国儿童施放的火箭，到了 20 世纪居然转化为一种高科技，发展为多级火箭，把人造卫星、宇宙飞船送上了天。水磨现在大都淘汰了，但它给人以宝贵的启示，知道水力可以转化为机械力，后来发明了水轮机。人们受了木偶戏的启迪发明了机械人，受了钓鱼竿上绕线轮的启迪发明了人吊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此，中国文化的西传，并不局限于几项重大的发明，许多隐形的影响将一一被揭示出来。

在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中，波斯和阿拉伯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许多重大发明都通过他们转传到欧洲。第一个“发现中国”的欧洲人是马可·波罗，他的《马可·波罗行记》使欧洲产生巨大的冲动，随着传教士的到来，欧洲人对中国文化渐有了解。利玛窦就是一个“走进中国”的重要人物，他将四书译成外文寄回欧洲，所写的《基督教进入中国史》在欧洲出了 17 个版本，风行

一时。1687年柏应理将《大学》、《中庸》、《论语》等书译本汇集成册，题为《中国哲学家孔子》。18世纪在欧洲广泛流传着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其一是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其二是《耶稣会士通信集》，其三是《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在这些影响下，17—18世纪欧洲产生了一股“中国热”，中国服饰、工艺、园林引起欧洲人极大的兴趣，乐黛云《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说：“不管怎样，18世纪总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洛克风格之后的洛可可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所谓‘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在此期间，中国哲学引起欧洲学者关注，笛卡儿、莱布尼茨、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接触中国文化后都有不同的“中国文化观”。中国文学也被介绍到欧洲，杜哈德主编的大型汉学丛书《中国通志》就有《今古奇观》、《诗经》、《赵氏孤儿》等译文节选，以《赵氏孤儿》影响最大。1772年，《孙子兵法》的法译本在巴黎出版，日益受到重视。不过，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和思维模式的不同，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程度远远不如日本人，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有异于西方的“他者”，中间有一层隔膜，存在着许多疑惑和不解。

4.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际和国内环境起了很大变化，中国历史发生了“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文艺复兴”以前，欧洲尚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科学文化被宗教压得暗淡无光，而此时的中国，文化欣欣向荣，所以世界文化的走向是东方流向西方。然而，历史发生逆转，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几个世纪之间，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近代文化有如旭日东升，强烈地冲击古老的中华文化，于是文化流向改变，

“西学东渐”成了时代的潮流。在最近一个半世纪，中国文化发生了变迁。这个变迁是巨大的，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引起了全方位的变化。这个变迁是急剧的，一百多年的变化超过以往的几千年，而且呈加速度前进，愈往现代变化速率愈快。这个变迁是深刻的，它不但改变了千百年来难以冲破的社会习俗，而且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形成了新的习俗，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大进步，与近现代文化逐渐接轨。正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所说：“揭来大洋文明时代始萌蘖，愈近愈剧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世界风潮至此忽大变，大风泱泱兮大潮滂滂。”

1840年，英国以洋枪洋炮打进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使中国从盲目自大中惊醒过来。一连串的失败，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大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在民族灾难深重、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富国求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了时代的呼声。人心思变，变革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受外来侵略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使人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当中国与西方列强开始接触时，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西方“船坚炮利”，于是感到中国“器物之不足”，必须“师夷长技”，由此而产生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打开了一扇天窗，透进了一线近代文明的曙光，成为近代思想变革的重要起点。但反思是粗浅的，在认识上有很大局限，具体表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不变更原有的思想体系和政治体制。在甲午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这又引起了第二次大反思。人们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中国“制度之不足”，只有走“变法”之路，学习英国、俄国和日本，改变封建政体，实行君主立宪，才有希望走向富强，于是维新思潮澎湃而起。但在中国，连君主立宪这一步也走不出去，“百日维新”留下的是滩殷红的血。变法既然没有希望，第三次反思的就是学

习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终于在 1911 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但辛亥之后封建制度的社会根基并未动摇，出现了军阀混战、封建复辟的局面，这就引起人们更深刻的反思，从思想文化上认识中国之不足，合乎逻辑地提出了“科学”、“民主”的响亮口号，请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是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它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化的新的取向。

引起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首先是物质文明，它是近代文明传入的先导。物质文明的传播不需要其他媒体的中介，也不受政治疆域的限制，同时也不因语言文字的隔绝而受阻，可以直接进入生活。对于物质生活，人们总有一种求新向好的愿望，一旦发现某种东西的优越性，就会自发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追求它，造成一种自然发展的趋势。正如有了电灯，人们就渐渐抛弃菜油灯和煤油灯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它。对于外来的“舶来品”起初感到新奇，因为它们是飘洋过海来的，所以往往加一个“洋”字，如洋油、洋火、洋纱、洋布、洋枪、洋炮等等。时日既久，“洋气”消散，渐渐化为国产之物，自己学着制造。由不习惯到习以为常，由购买到自己制造，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一个重要开端，修铁路、设邮电、开矿山、建工厂、学制造，就是近代文明走进中国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近代企业的管理模式也进入了中国，在由官办转向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过程中出现了股份制，上海轮船招商局就是一个开头。然而，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制约，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十分缓慢，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艰难的道路，拖着沉重的步履。洋务运动惨淡经营了二三十年，甲午战争就被日本扼杀在摇篮之中；三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刚有起色，上海的发展被称为“杨树浦奇迹”，结果又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近代化进程加快，经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其间又受干扰，发展道路曲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加入了 WTO，与世界经济接轨，迅速走向现代化。

引起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教育，其重要标志是“废科举，兴学校”，它宣告古代教育的终结和近代教育的兴起。学校是文化知识传授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基地，由于引进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体系，并通过学校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新的人才，对社会产生强烈的辐射作用。事实上近代的许多社会变革，思想运动和新的风尚都是从学校开始的。教育体制改变以后，人们不再去进官学、书院，也不再去死读《四书》、《五经》，更用不着去做毫无用处的八股文章，而是学习各种各样有用的知识，人才向多方面发展。

传媒是改变文化面貌的一种重要手段，报纸的出现是一个新的起点。有了报纸，中国人可以知道世界和中国发生的大事，不再坐井观天，所以维新派极力主张办报，借以“开化思想”。杂志、图书的发行日益扩大，各种新的观点、新的学说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线电广播及电话、电报的兴起，信息传播快捷。中国的电视兴起较晚，大约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比先进国家晚了半个世纪。电视对文化传播的意义不同寻常，它进入了千家万户，打破了省界、国界、洲界，把世界各种文化都显示在屏幕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的变迁就更加巨大和急剧。电视出现以后，不但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就连近代引进的话剧、电影、广播都面临着巨大挑战。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信息传播范围扩大，传播手段敏捷，连近代兴起的邮政、电报都处于劣势，中国文化如何发展值得人们深思。

当今，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国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必须冷

静思考、理智对待，既不可抱残守缺、固守“国粹”，也不可盲目追随而淹没在历史的大潮之中，要与时俱进而有独创、顺应潮流而不自从。重要的是看清世界形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培育自强不息、勇于创造的民族精神，培养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学习先进的优良品质，在新的时代再造新的辉煌，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上不断突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地中海——世界文化的漩涡

理念·视角·构架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尽管最初兴起的文明往往处于孤立发展状态，但终究渐渐汇入历史的长河，这就要求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俯仰古今，环视全球。

——拂去历史的尘埃，一切明白如昼。东、西文化并非从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把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西两大板块的观念已经过时。

——地中海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结合部，很难把它定格为“东”或者“西”。地中海值得高度重视，它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多种文化又在这里分流。站在 21 世纪的高度反观历史，许多问题应当重新认识。

——人类文明的星辰最先在欧亚大陆及北非升起，东方显得特别明亮。地中海文明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延续、发展与提升，它们是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梯，而不是相互平行的两个系统。

——地中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层，它由古代东方文化、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近代文化构成。时间坐标显示：公元前 3600 年至公元前 4 世纪以东方文化为主，波希战争以后希腊罗马

文化上升为主旋律,从 7 世纪开始伊斯兰文化勃然兴起,自“文艺复兴”以来地中海首先进入了近代文化的主流圈。

——同是地中海,既产生了基督教又产生伊斯兰教,并以此为原点分别形成了“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对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中亚自来是世界风暴的中心,游牧民族纷纷南下,在地中海激起轩然大波。邻近地中海的印度也被卷入历史漩涡,掀起阵阵波涛。远离地中海的中国也深受这一“文化强极”的影响,与地中海长期进行文化交流。

——平静的地中海从来不平静,它牵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当今仍然是世界诸种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地区,特别是中近东、巴尔干、高加索和中亚,经常引起国际争端。